



西藏 现代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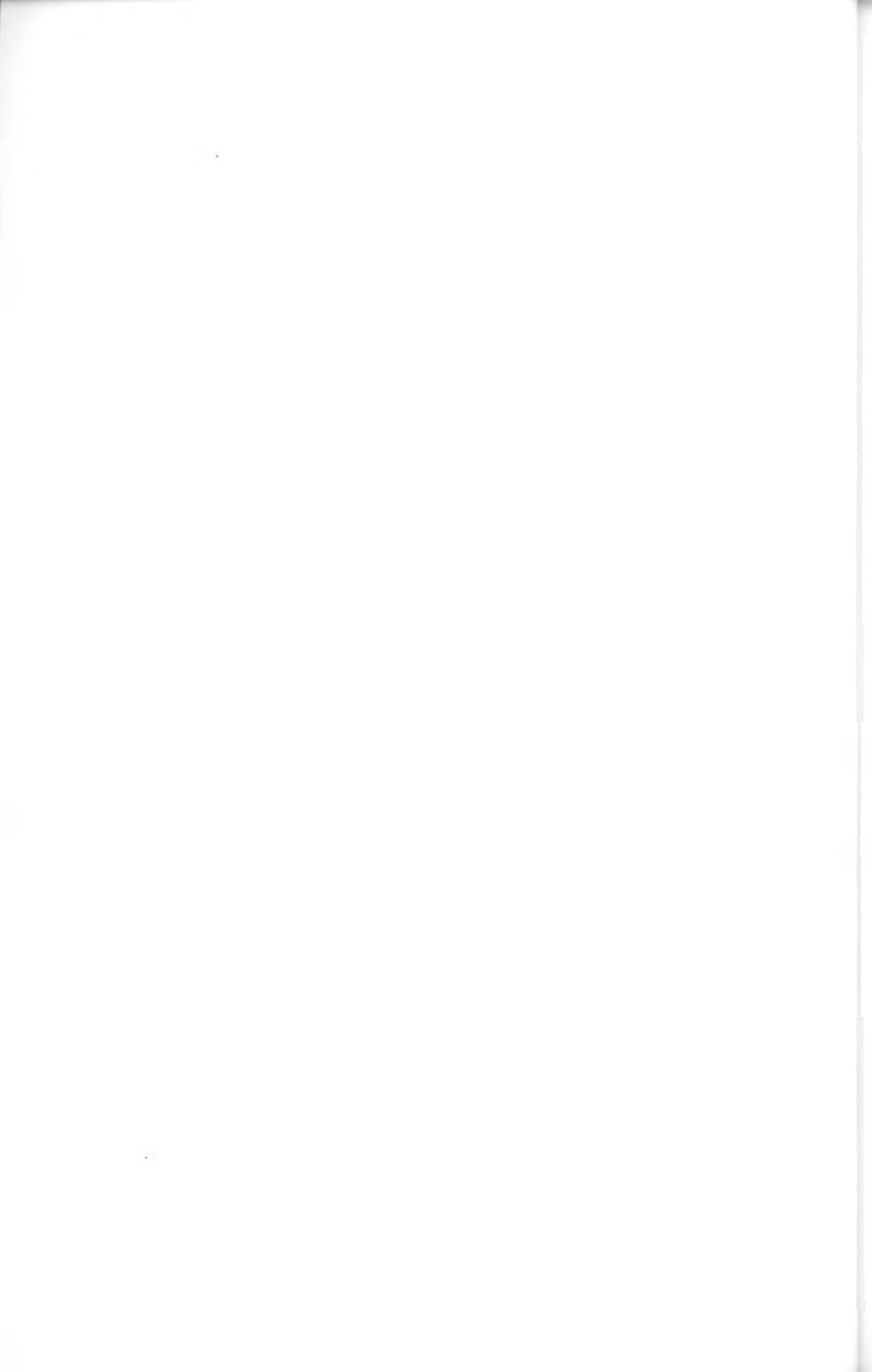
第二卷

暴风雨之前的平静
1951-1955

梅·戈尔斯坦 著

吴继业 译

西藏现代史第二卷



西藏现代史第二卷

暴风雨之前的平静 1951-1955

梅·戈尔斯坦 著

吴继业 译

HKU
PRESS
香港大學出版社

香港大学出版社
香港薄扶林道香港大学
www.hkupress.org

© 香港大学出版社 2014

2014 年初版

2015 年第一次重印

© 2007 The Reg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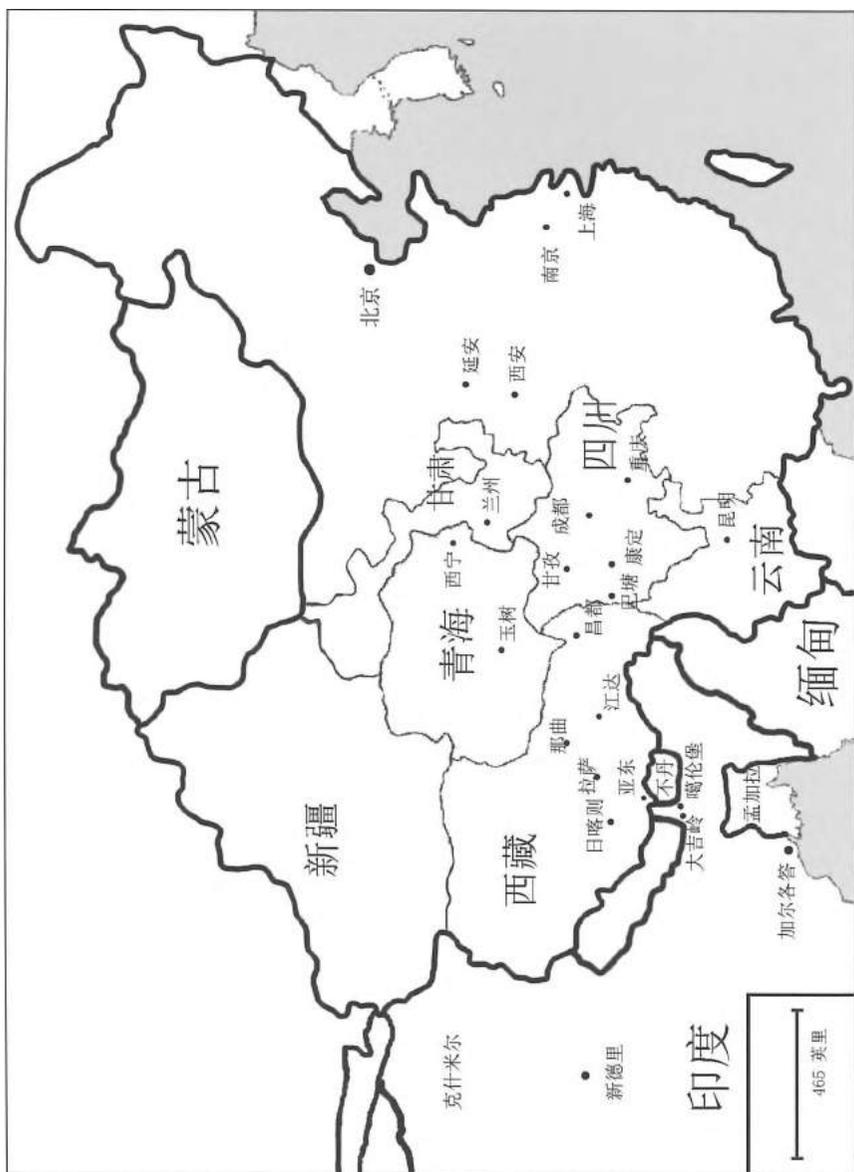
ISBN 978-988-8139-69-9

版权所有。本书任何部分之文字及图片，
如未获香港大学出版社允许，
不得用任何方式抄袭或翻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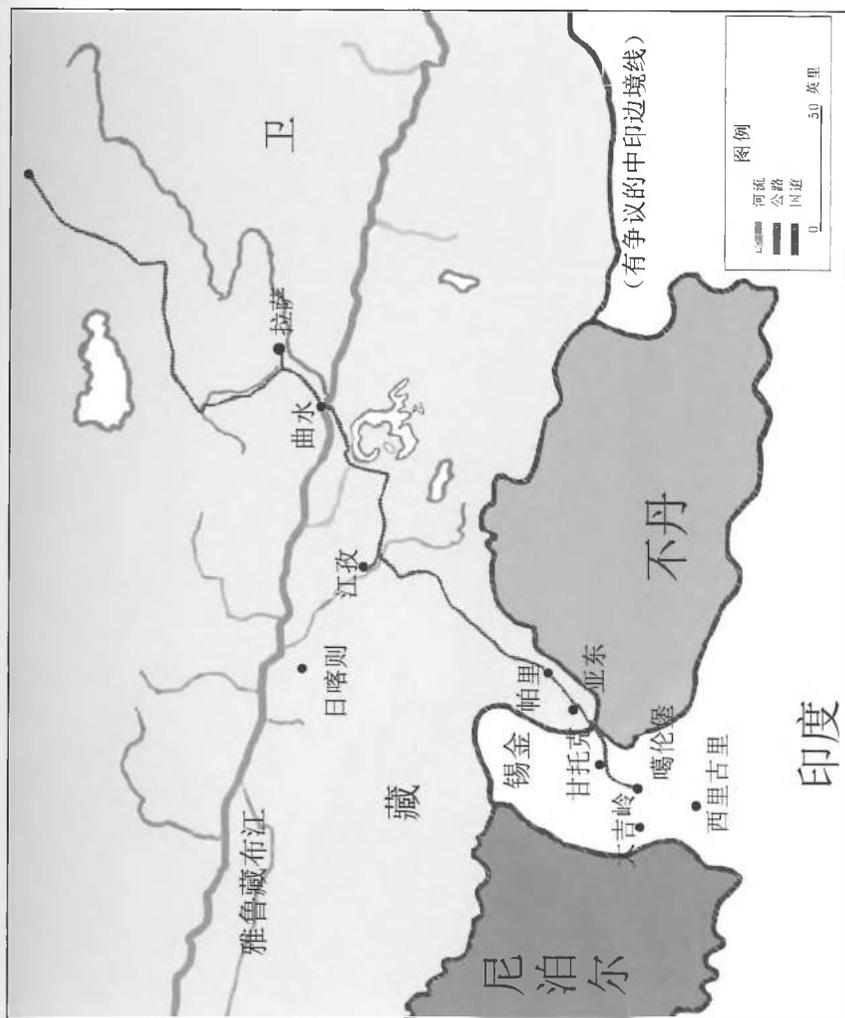
10 9 8 7 6 5 4 3 2

良友印刷厂有限公司承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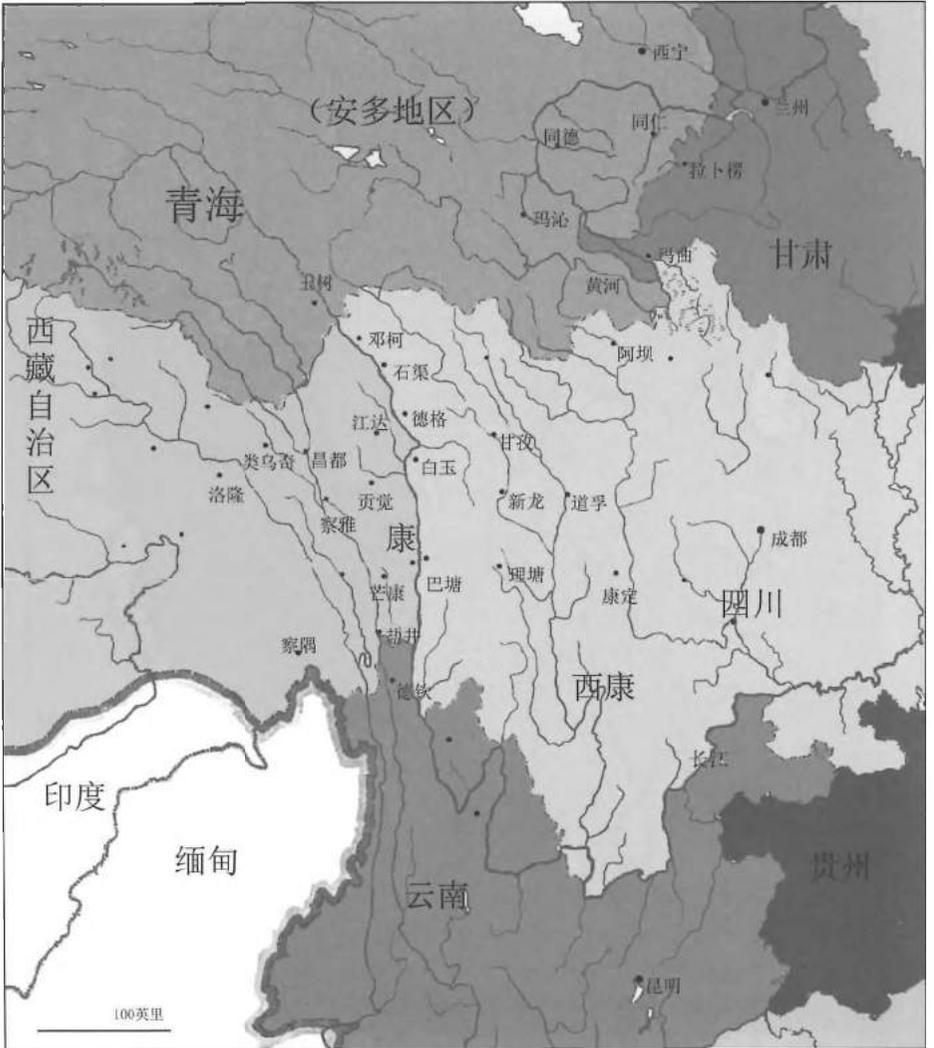
致 CM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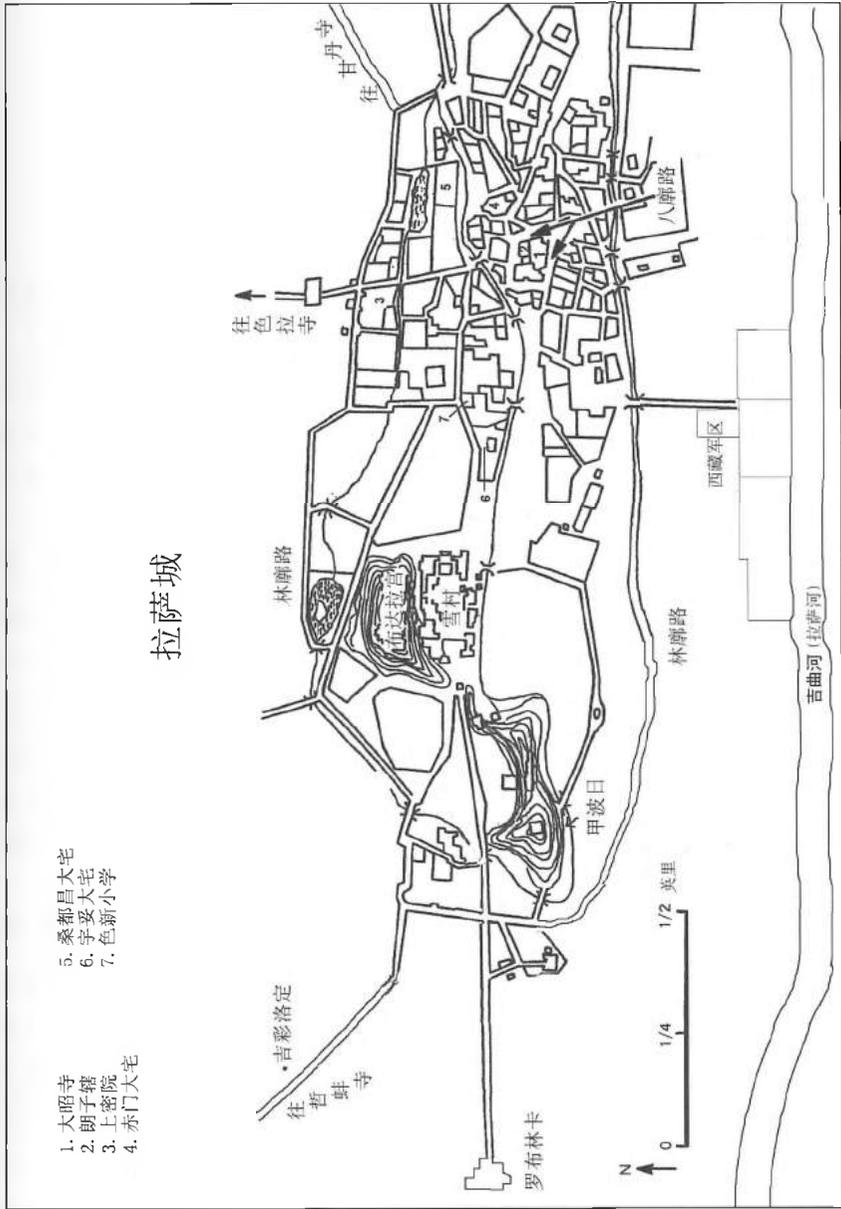
地图 1：中国



地图 2：卫藏



地图 3：康区



地图 4 : 1950 年代的拉萨城。来自车仁 (晋美) 1959 年的一幅手绘地图 (见中根千枝, 1984)。



目录

插图目录	xiii
人名术语表	xv
致谢	xxv
前言	xxvii
引言：并入中国前夕的西藏社会	1
第一部分 通向中藏协议之路	
第一章 中国视角：北京电台	19
第二章 西藏视角：接触中国共产党	39
第三章 西藏向联合国申诉	57
第四章 和北京的谈判	81
第五章 美国的介入	113
第六章 达赖喇嘛返回拉萨	137
第二部分 最初的两年：冲突与调整	
第七章 初步的接触和策略	167
第八章 解放军先遣支队进入拉萨	205
第九章 食物危机	243
第十章 班禅喇嘛和解放军	265
第十一章 执行《十七条协议》的前奏	299
第十二章 西藏人民会议	313
第十三章 向达赖喇嘛求助和撤销司曹职务	341
第十四章 班禅喇嘛的回归	385

第三部分	合作与改革	
第十五章	改革之风	399
第十六章	在西藏的共产党内部矛盾	423
第十七章	开始迈向社会经济改革	453
第十八章	在印度发生的事件	463
第十九章	达赖喇嘛前往北京	477
第二十章	达赖喇嘛在北京	491
第二十一章	返回拉萨	523
第二十二章	结论	541
附录一	1952年洛桑三旦致孜本夏格巴的信	551
附录二	1953年噶厦改革西藏债务的法令	553
附录三	在印度的秘密抵抗组织的协议	561
参考文献		565
索引		585

插图目录

地图

1. 中国	vi
2. 卫藏	vii
3. 康区	viii
4. 1950年代的拉萨城	ix

图片

1. 十八军为昌都战役做战前训练，1950年西康	38
2. 索康家族	53
3. 参与谈判的五名西藏官员：桑颇、凯墨、阿沛、拉乌达热和土登列门，1951年摄于北京	95
4. 孜本朗色林（班觉吉美）	139
5. 1951年7月张经武骑马从亚东前往拉萨	157
6. 开会中的西藏高级官员	195
7. 1951年解放军部队进入拉萨后在八廓街附近游行	206
8. 解放军在拉萨河边安营扎寨	209
9. 1951年10月张经武在拉萨的某寺院向僧人们布施	212
10. 中藏官员参加一个庆祝西藏“和平解放”的晚宴	224
11. 修建从昌都到拉萨的公路	245
12. 几名贵族开会商讨为解放军提供粮食的事宜	253
13. 1952年解放军在拉萨开垦荒地	257

14. 1952年夏第一季萝卜试验田收割	259
15. 范明、十世班禅喇嘛、扎西（青海省党委书记），1951年2月摄于西宁	283
16. 1951年12月联合庆祝西北军挺进拉萨	295
17. 1950年代打着军旗的藏军部队	302
18. 为去西藏的解放军教授藏语	308
19. 1952年班禅喇嘛第一次正式与达赖喇嘛会面	392
20. 1952年2月达赖喇嘛与班禅喇嘛在拉萨会面	392
21. 川藏公路，1954年12月通车	420
22. 班禅喇嘛、牙含章、范明，1954年5月摄于西安	485
23. 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投票，1954年9月摄于北京	493
24. 1954年北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496
25. 1955年庆祝藏历新年	505

人名术语表

- 阿乐群则 (Alo Chöndze) 第二次人民会议 (People's Association) 的领导者之一。
- 阿沛·阿旺晋美 (Ngabö Ngawang Jigme) 1950 年中国人入侵时的昌都总管，也是赴北京谈判签订《十七条协议》的西藏谈判团首席代表。他于 1951 年 9 月回到西藏，恢复噶伦职位，是西藏政府中进步势力的首脑。
- 昌都 (Chamdo) 西藏东部的城市，是康区／东藏总督的驻地，解放军在 1950 年进攻的目标。
- 秤 (*dotse*) 西藏货币单位。一秤等于 50 桑吉 (*ngüsang*)。
- 赤江仁波切 (Trijang Rimpoche) 达赖喇嘛的副经师。
- 春都 (*Tshongdu*) 不同类型民众大会的一般称呼。民众大会是噶厦为传达某个观点或重要问题而召集的会议。
- 打卦 (*senril*) 西藏政府用以作重要决定的一种预言方法。将写着选择答案的纸揉进糌粑里，做成形状和重量完全一样的糌粑球，然后把这些糌粑球放进一个签钵里，在神像或神迹面前抖动签钵，直到一个糌粑球掉出来为止。掉出来的糌粑球里的答案就被认为是神的选择。

- 达拉·平措扎西 (Takla Phüntso Tashi) 来自安多的藏族人，与达赖喇嘛的姐姐结婚而成为西藏政府的官员。他是为数不多的懂中文的官员之一。
- 大洋 中国旧社会使用的一种银质硬币。1950年代解放军在西藏使用大洋，原因是西藏人不接受中国的纸钞。
- 大札仁波切 (Taktra Rimpoche) 1941–1950年间的摄政。
- 代本 (*depön*) 传统藏军中掌管一个团的军官。如果一个团只有500名士兵，那么通常只有一位代本。但是如果一个团有1,000名士兵，那么通常就会有两位代本。
- 当采仁波切 (Taktse Rimpoche) 达赖喇嘛的大哥，是青海省塔尔寺的转世喇嘛。他于1950年到达拉萨，随后前往美国，在美国成为国务院和中央情报局的重要情报来源。
- 邓小平 1950–1952年间西南局的两位领导人之一。
- 洞波·钦饶汪秋 (Dombor Kyenrab Wangchuk) 1950年代西藏的一位代理噶伦。
- 范明 西北局的一位高级干部，是驻班禅堪厅的代表。他是拉萨的西藏工作委员会（简称西藏工委）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 噶伦 (*kalön*) 任职于噶厦的大臣。
- 格西 (*geshe*) 喇嘛的一种高级学位。
- 噶厦 (*kashag*) 西藏政府的最高机构。

- 噶仲 (*kadrung*) 噶伦的重要助手。通常会有两位噶仲，都是世俗贵族。他们的工作是提供噶伦需要的任何帮助，平时要做的具体工作包括书写噶厦给达赖喇嘛和其他官员的文书、信件、文件、命令和建议。按照惯例，即使噶伦在场，噶厦的印章也只有两位噶仲有权使用。
- 噶准 (*kandrön*) 噶厦的管理助手。一般有三个噶准，都是贵族俗官。他们管理向噶厦提出的请愿。
- 国民党 中国的民族主义政党，统治中国直到被中国共产党打败、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止。
- 计晋美 (*Che Jigme*) 班禅堪布会议厅的两位最高官员之一。
- 基巧堪布 (*jigyabkhembo*) 政府里职位最高的僧官。其职责包括监督达赖喇嘛的侍从和管理达赖喇嘛的私人财产。基巧堪布有权出席噶厦的会议，但除了一些特殊的情况，如达赖喇嘛有什么事情要告诉噶厦，一般来说他们很少这样做。1952到1956年间的基巧堪布是达赖喇嘛的哥哥洛桑三旦。
- 甲本 (*gyagpön*) 传统藏军里的一种军士官职，掌管100名士兵。
- 嘉乐顿珠 (*Gyalo Thondup*) 达赖喇嘛的二哥，坚堪孜松的领导人之一。
- 坚堪孜松 (*Jenkentsisum*) 在印度的一个反中流亡组织的非正式称呼。藏文是三个人的头衔的首字母合写，这三个人是嘉乐顿珠、孜本夏格巴和堪穷洛桑坚赞。坚代表哥哥，堪代表堪穷，孜代表孜本，松为藏文数字三的发音。

- 凯墨札萨 (索朗旺堆)
〔Kheme Dzasa (Sonam Wangdü)〕
- 堪穷 (*khenjung*)
- “克” (*khe*)
- 库库拉 (Coocoola)
- 拉鲁 (Lhalu)
- 拉让 (*labrang*)
- 朗色林 (Namseling)
- 乐于泓
- 里
- 李井泉
- 李维汉
- 藏军总司令，前往北京签订《十七条协议》的西藏代表之一。他也是索康噶伦的叔叔。
- 西藏传统等级制度中僧官的一个官阶，相当于俗官中的四品官。
- 西藏的体积度量单位。—“克”青稞大约重31磅。
- 一位说英语的锡金公主，她嫁给了西藏彭康家族 (Phünkang) 的一名成员。她是美国人关于西藏的情报来源。
- 噶伦，1950年阿沛到任之前的昌都总督。
- (1) 对班禅喇嘛的政府的称呼 (有时指扎什伦布寺拉让)；(2) 位于甘肃的格鲁派大寺的名称 (拉卜楞寺——译注)；(3) 负责管理转世喇嘛的财产的机构。
- 一个敌视中国人的民族主义贵族官员，孜康的四位首脑 (孜本) 之一。
- 又被称为阿乐部长 (Alo Budrang)，1951年随同张经武进藏的一位重要干部。他任职于拉萨的西藏工委，保留了一份非常有价值的日记。
- 中国的长度单位，相当于500米。
- 四川省党委第一书记。
- 北京负责少数民族事务的一位重要官员，中央统战部部长和国家民委主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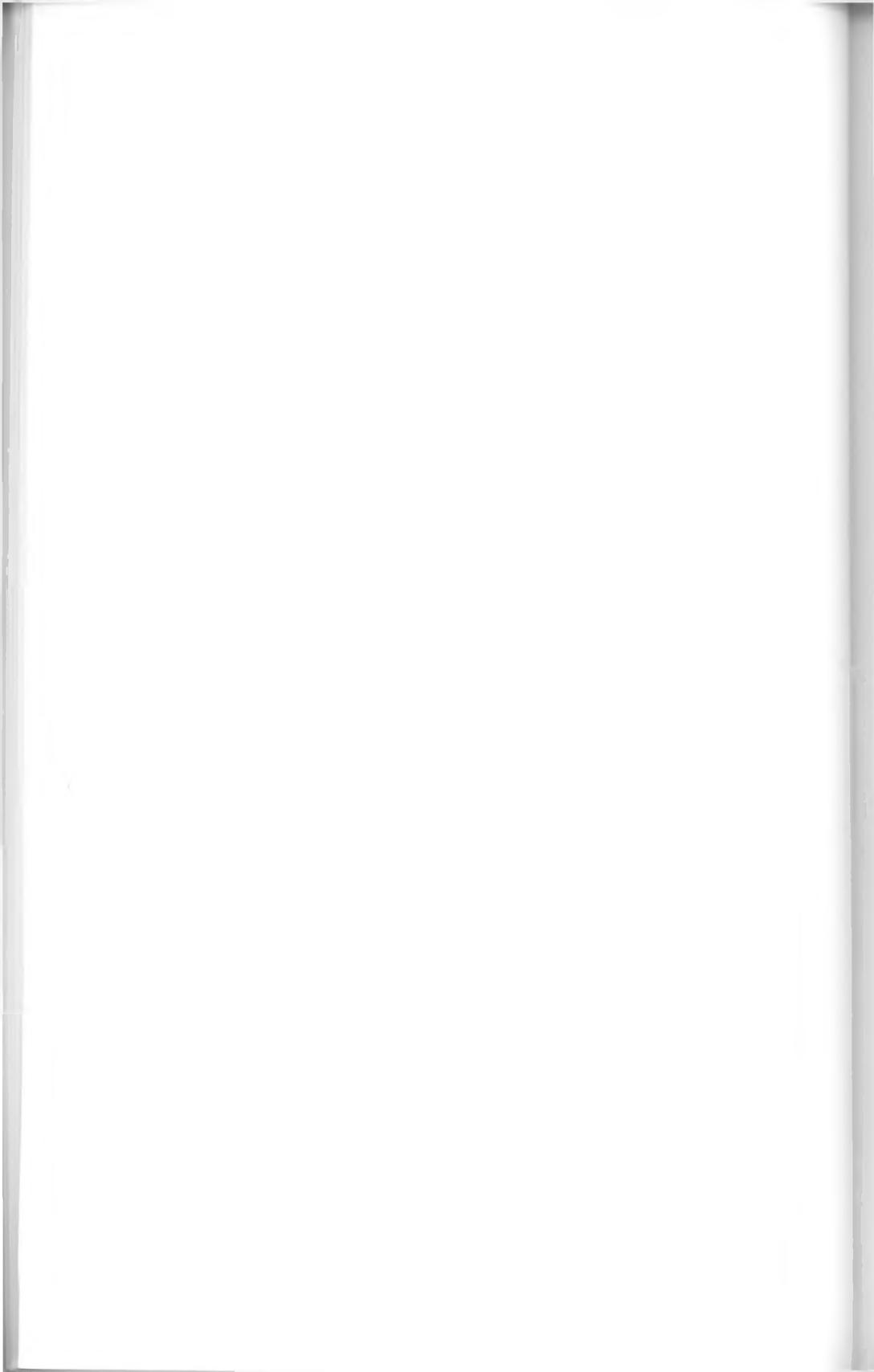
- 林仓仁波切 (Ling Rimpoche) 达赖喇嘛的正经师。
- 刘伯承 第二野战军司令员，西南局的主要领导人。
- 刘格平 回族，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国家民委副主任。
- 柳霞·土登塔巴 (Liushar Thubden Tharba) 西藏政府外交局局长，负责接待中国人的两个联络官之一。
- 鲁康娃 (Lukhangwa) 俗官，1950–1952 年间的两位司曹（又称司伦或伦钦）之一。
- 洛桑三旦 (Lobsang Samden) 达赖喇嘛的三哥，西藏政府的僧官。1952 年初被任命为基巧堪布。
- 洛桑扎西 (Lobsang Tashi) 僧官，1950–1952 年间的两位司曹之一。
- 曼扎 (*mendredensum*) 一种献给喇嘛的宗教供养，代表三个方面：身体（通过神像）、语言（通过经文）和思想（通过佛塔）。
- 米赛 (*miser*) 指农奴或人身自由受束缚的个体，某些语境下也可以指公民。例如，“领主的米赛”指的是西藏的公民。
- 默朗 (*Mönlam*) 在本书中为“默朗钦摩”的简称。
- 默朗钦摩 (*Mönlam Chemmo*) 西藏每年藏历一月在拉萨举行的传召大法会。
- 莫里克 (Mullik) 印度情报局局长，1950 年代大部分时间在此位。
- 慕生忠 与范明一起到拉萨的西北局高级干部。
- 帕拉 (Phala) 很有权势的僧官，他来自一个重要的贵族家庭。这个时期他是达赖喇嘛的大卓尼。

- 彭德怀 西北局的第一书记和第一野战军的司令员，也是朝鲜战争中解放军的司令员。
- 平措汪杰 (Phüntso Wangye) 西南局的藏族干部，也是拉萨的西藏工委中惟一的藏族人。
- 平措扎西 (Phüntso Tashi) 见“达拉·平措扎西”。
- 平汪 (Phünwang) “平措汪杰”的简称。
- 强佐 (*chandzö*) 为寺院、拉让或贵族家庭工作的管家。
- 群培土登 (Chömpel Thubden) 译仓的四位首脑 (仲译钦莫) 之一；1951年力劝达赖喇嘛返回拉萨、不要流亡国外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
- 然巴·土登贡钦 (Ramba Thubden Güngyen) 噶厦一位年迈的噶伦。
- 绕噶厦·平措绕杰 (Ragasha Phüntso Rabgye) 1950年代的一位噶伦。
- 热振 (Reting) 1933到1941年间担任摄政，并于1944-1945年谋划重新掌权，失败后策划了一场针对现任摄政大札的阴谋。事发后被捕入狱，紧接着神秘死亡。大多数人相信他是被毒死的。
- 仁波切 (*rimpoche*) 对转世喇嘛的称呼。
- 如本 (*rupön*) 藏军里位于代本之下的军官，通常掌管半个团。
- 萨旺钦莫 (*sawangchemmo*) 致辞中对噶伦的尊称。
- 三大寺 拉萨周边格鲁派三大寺院的合称。这三大寺是甘丹寺、色拉寺和哲蚌寺，在1959年大概有两万名僧侣。

- 桑 (*sang*) 同桑吉 (*ngüsang*)。
- 桑吉 (*ngüsang*) 西藏货币单位，50 桑吉等于一秤。
- 僧兵 (*dobdo*) 很多大型寺院里一种不爱读经书、好斗、喜欢惹事生非的僧人。
- 司曹 (*sitsab*) 1950 年达赖喇嘛身处亚东时所任命的领导拉萨政府的两名官员。
- 索康·旺钦格勒 (Surkhang Wangchen Gelek) 1950 年代的噶伦之一。
- 索穷噶厦 (Surjong Kashag) 由三位噶伦组成的特殊的“小噶厦”，受命协调《十七条协议》的执行。
- 谭冠三 西南局的官员，拉萨西藏工委的领导人之一。
- 王其梅 西南局的高级官员，他带领十八军的先遣支队于 1951 年 9 月进入拉萨。
- 西康 (省) 一个紧挨着四川北部的省份，人口中藏族（康巴人）占绝大多数。1955 年与四川省合并。
- 西藏工作委员会（简称西藏工委） 1950 年代中国人在西藏的主要管理机构。
- 习仲勋 西北局的领导人（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后被调至北京出任国务院副总理。
- 夏格巴·旺秋德丹 (Shakabpa Wangchuk Denden) 1950–1951 年间与美国和印度打交道的一名重要的西藏官员，后来成为位于印度的反中组织坚堪孜松的一位首领。

- 夏苏 (夏噶娃·居美多杰, 1950年代的代理噶伦之一。
Shasuraka Shenkawa Gyurme Dorje)
- 徐淡庐 西藏工委的一位重要干部。1954–1955年间在达赖喇嘛往返中国东部的旅行中,他作为中央政府的联络官随行。
- 雪准 (*shöndrön*) 摄政秘书处的僧官助手。
- 亚东 锡金边界附近的一个小城。1950年至1951年解放军占领昌都之后达赖喇嘛逃到这里。藏语中叫做卓木。
- 牙含章 1950年代初在西藏的西北局高级官员。
- 译仓 (*Yigtsang*) 西藏政府中僧官的最高机构,为首的四名官员叫做仲译钦莫。
- 糌粑 (*tsamba*) 西藏人用烘烤过的青稞面粉做成的主食。
- 札萨 (*dzasa*) (1) 西藏政府中的一个高级官阶; (2) 某些拉让管家的头衔,如功德林拉让的管家称为功德林札萨。
- 张国华 在西藏的西南局的最高官员和十八军的军长,也是拉萨西藏工委的第一副书记。
- 张经武 中央派驻达赖喇嘛方面的代表和西藏工委的第一书记。
- 仲译钦莫 (*trunyichemmo*) 译仓首脑的头衔。
- 仲孜 (*trungtsi*) 译仓的首脑(仲译钦莫)和孜康的首脑(孜本)的合称。

- 仲孜杰 (*trungtsigye*) 四个译仓首脑 (仲译钦莫) 和四个孜康首脑 (孜本) 的合称。这些首脑举行的会议是除了噶厦之外最重要的会议。他们也经常和噶厦一起讨论重要的问题, 并且还担任民众大会的主席。
- 周恩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总理。
- 朱德 解放军的总司令。
- 驻藏大臣 (*amban*, 按班) 清王朝皇帝派驻西藏的代表。
- 卓木 (*Tromo*) 亚东的藏语名称。
- 卓尼钦莫 达赖喇嘛宫廷的僧官, 管理面见达赖喇嘛事宜, 又称大卓尼。
- 孜本 (*tsipön*) 税务部门首脑的头衔。
- 孜康 (*Tsigang*) 财税部门。
- 孜仲 (*tseñdrön*) 达赖喇嘛秘书处的僧官助手。
- 祖拉康 (*Tsuglagang*, 大昭寺) 拉萨市内最重要的寺院, 四周环绕着八廓街。觉卧佛堂就在这座寺院里面。



致谢

本书的研究如果没有中国国内外很多人的帮助是不可能完成的。这些人向我指明了关键的问题和事件，以及那些至今仍在世、能够帮助我了解事件原委的历史参与者。他们和其他很多人同意接受录音采访，不是因为钱或者为了出名，而是因为他们有强烈的责任感，想让将来的西藏人和中国人知道在 1950 年代到底发生了什么。对他们所给予的建议和帮助我感到无以回报。由于种种原因，他们的名字无法让公众知晓，对此我也很遗憾。他们只希望将来的人们可以获得客观、没有偏见的历史原貌。这也正是本书从筹划到完成整个过程的出发点。

在这里，我要感谢四位西藏学者、同事和助手。在印度，班觉·擦绒博士 (Paljor Tsarong) 在回国开始自己的研究之前就在克利夫兰和我一起进行本书的研究。回到印度后，他帮助采访了很多关键人物，并且对采访稿进行了最初的翻译。他对西藏现代史的理解是极其深刻的，并就那个时期的事件给了我很多宝贵的建议和批评。如果没有他深刻的观点和洞察力，这本书将远没有现在这么客观公正。

在中国，自从 1985 年我在西藏自治区进行研究工作开始，北京藏学研究中心的旦增伦珠博士 (Tenzin Lhundrup) 就和我一起共事。他对西藏社会和西藏现代史的理解是非常杰出的。同样的，在看到我的观点和翻译有错误时，他也给了我很多宝贵的建议和批评。另外，拉萨西藏大学的扎西次仁教授 (Tashi Tsering) 是我在华盛顿大学时的同学和长久以来的朋友。他对我的实地考察和采访工作给予宝贵的帮助。作为一个曾经生活在旧社会，之后又成为新社会一分子的西藏人，他对两种社会的认识和理解给了我极有益的帮助。

最后一位我想感谢的人是我的研究助理，已故的赤来多杰（Trinley Dorje）。严格来说，赤来多杰并非一名学者，他是一个普通人，但却是一位真正的智者。他非常聪明，对现代西藏了如指掌。直到故去之前，他陪我进行了所有的实地考察，其中也包括本书涉及的一次实地考察。他在拉萨出生和长大，但在海拔 16,000 英尺的地方住在牧民的帐篷时，他也能像待在拉萨的甜茶馆里一样怡然自得。他在世时没能看到这本书付诸印刷，这使我感到非常遗憾。

这些西藏学者的看法和认识并不相同，但是我尊重他们每一个人的看法。我很幸运，因为每次在我感到困惑的时候都有如此杰出的西藏人可以请教，在我欠缺厘清困惑所必需的知识时有他们让我茅塞顿开。我会听取他们（还有其他人）每个人的意见，并最终形成自己对问题的看法。但是我希望他们不要失望，因为在很多问题上我最终的观点都与他们的不一样。

自从 1985 年在西藏进行研究以来，我与位于拉萨的西藏社会科学院进行了长期的合作。我要深深地感谢西藏社科院的研究人员和工作人员，感谢他们在过去的二十年里给予我的支持和配合。作为一名外国学者，我在那里一直受到热情的招待。我也很庆幸能与这么多杰出的研究人员共事。

本书包含了大量这个时期的相关人物的照片。我想在这里对允许我使用他们的个人或家庭照片的人表示感谢，在中国有江乐金（Janlocen）家族、第穆（Demo）家族、范明、平汪（Phünwang）；在北美有宇妥（Yuthok）和索康（Surkhang）家族。此外，我想表达对陈宗烈先生的感激。陈宗烈是著名的获奖摄影记者，作为摄影师他为《西藏日报》工作了二十五年。他慷慨地把自己精美的摄影作品集拿出来，让我在这本书中使用里面的照片。

我也想表达我对夏格巴家人的感谢，感谢他们让我查阅已故现代西藏最伟大的人物之一孜本夏格巴的信件和文件。

我还要真诚地感谢加州大学出版社的里德·马尔科姆（Reed Malcolm）。他和他的员工一如既往地支持本书中的研究，使我能够专心完成手稿。

最后，但同样重要，我要感谢西藏研究中心那些协助进行该课题研究的优秀学生们。

前言

本书是我所做的关于1951—1959年间西藏历史研究的第一部分，是《西藏现代史第一卷：喇嘛王国的覆灭1913—1951》（加州大学出版社，1989）的承接之作。在本书的开头，我叙述了一系列错综复杂的事件，正是这些事件导致西藏政府在1951年5月签订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¹在《十七条协议》中，西藏有史以来第一次勉强接受中国的主权。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和官员根据这个协议迅速进入拉萨。对西藏人来说，尽管很不情愿，一个新的时代还是开始了。而中藏双方如何应对西藏的这个新的开局正是本书所要探讨的主题。

本书内容终结于协议签订四年之后的1955年6月中旬。此时达赖喇嘛刚刚结束了为期一年的中国内地之旅回到拉萨，正踌躇满志地准备使西藏在从属于中国的框架下开始现代化。此时西藏是平静的，宗教和世俗的习惯及制度完好地保留着。一些新事物，比如小学等，也正逐渐增多。这一时期是中藏友好合作的高潮。

但是，就在达赖喇嘛回到拉萨最初的几个月，中藏关系开始急剧恶化，一直到四年之后的暴动和达赖喇嘛的流亡。承接本书的下一卷将会详细检视从达赖喇嘛回到拉萨到1959年暴动的这四年。

西藏在1959年暴动失败后开始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尽管1950年代作为从传统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的开端是非常关键的时期，但是对之较

1. 本卷开始几章与《西藏现代史第一卷》的后四章有一定的重叠。在重叠的部分，以本卷对这些事件的讨论为准。

有深度的研究还是很缺乏的。²这一时期大体上被简单地看作是西藏人和中国共产党的对抗。面对旨在消灭西藏的中国人，西藏人在这场对抗中似乎注定失败。尽管这种以偏概全的看法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新材料显示中藏双方内部各自都存在着不同的声音，而非如先前人们所认为的那么团结。不但中藏各方内部都存在着一些重要的意见相左的小派别，而且这些派别还与对方阵营中的特定派别联合在一起，于是形成了异常复杂的局面。这一点是人们以前没有考虑到的。所以本书尝试在讨论这一时期的同时也考虑存在于中藏双方的这种复杂性，希望呈现给读者一个关于这个重要时期的详细而均衡的描述。

■ 资料来源和研究方法

我在研究过程中运用多种研究方法，采用来自五方面的资料。(1) 原始资料，包括政府档案、西藏人未发表的信件和日记；(2) 口述历史资料。我们为这项研究专门采访了相关的西藏人、中国人以及牵涉其中的美国人。这些采访材料构成口述历史资料；(3) 类似“回忆录”的第一手材料，这些材料的作者是前西藏官员、中国官员、欧洲和印度官员（分别用藏文、中文和英文写成）；(4) 中国出版的限制流通书籍（内部书籍），这些书籍引用了一些文件和采访材料；(5) 报纸、书籍、学术专著以及论文，其中一些收录有原始的政治文件。

原始资料：政府档案和其他原始文件

这样一项近现代史题材的研究本应该以分析政府档案作为立论和探究的基础，但是获得政府档案这样的资料是相当困难的。西藏自治区（以及

2. 但是关于这一时期（或这一时期中的某一段时间）还是有一些有用的论著，如戈伦夫德（Grunfeld）1996、克劳斯（Knaus）1999、夏加（Shakya）1999、史密斯（Smith）1996。还有一本更老的研究这一时期的专著：金斯伯格和麦索（Ginsburg and Mathos）1964，该书所提供的信息在刚出版的那个年代还是适用的。但现在，众所周知，书中有许多不准确之处，因而不适宜作为参考资料。

中国其他地区)不允许外国人查阅其大量档案中的任何资料,印度政府也同样如此。

美国政府提供有限的查阅权限。美国国务院的某些资料可以在国家档案馆或者通过《美国对外关系》(*U.S. Foreign Relations*)从刊查阅到,但是更多,大概也更为重要的资料却没有放在档案馆里供人查阅或者发布。尽管我以“资讯自由”(freedom of information)为由提出申诉,但是情况没有任何改变。中央情报局和国家安全局实际上没有公布任何文件,宣称这样做会损害美国的国家利益。事情已经过去五十多年了,这样说似乎有些荒唐,但是这确实是我进行撰写本书的研究时所面对的一个现实问题。

英国的国家档案馆(公共档案馆,Public Records Office)保存有这一时期的一些资料。但是这些资料在质量和数量上都是很有限的,尤其是1953年之后的资料,因为从这一年开始印度政府不再将其拉萨代表处(Lhasa Mission)每个月发回德里的报告副本转发给伦敦。

然而,我在印度找到了一系列非常重要的中文文件《对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未出版的手记)》,这些文件是在文化大革命后期带出来的。另外,那时出版的一些书籍和中国政府编纂的官方文献集,尽管没有前述文件那么重要,但也引用了一些重要的中文资料,例如毛泽东对西藏的谈话纲要。我也从西藏流亡政府以及位于达兰萨拉的西藏著作档案馆(Library of Tibet Works and Archives)和西藏著名官员孜本夏格巴(Shakabpa)所写的书中获得了一些重要的资料。

以上这些原始资料汇集到一起就成为了解1950年代西藏历史弥足珍贵的窗口。当然,对于这段历史还有很多衔接不上、不很清楚的地方。这就要等待余下的资料,尤其是保存在中国的资料,解密和公布了。但是,仅仅现有的这些原始资料就已经是十分珍贵和翔实的了。所以我尽可能引用相关文件的全文,以便读者可以看到这些文件的全部内容,而不仅仅是一两句概括性的语句。

口述历史资料

口述历史资料是由对某一时期和事件的目击者的一系列采访记录构成的。在无法获取政府档案的情况下,这些资料就提供了宝贵的信息。即使

在有政府档案可用的情况下，这也是很好的信息补充。然而，利用口述史料来研究历史也有局限性，因为记忆往往是有选择性的，参与者对事件的描述往往偏向于己方利益。并且，当今的政治事件也会影响这些叙述的质量和数量。因此，我们必须根据当事人所处的社会历史背景，对口述历史资料进行仔细的评判和鉴别，并与可用的档案材料和其他人的访谈记录相互印证。当然我也一直在努力这样做。

在国家人文科学基金会 (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 的基金 (RO-22251-91 和 RO-22754-94) 支持下，我们对中国、印度、尼泊尔、英国和北美的一百多人进行了采访。这些受访者包括一些重要的藏族上层人士，如达赖喇嘛、阿沛 (Ngabö)、拉鲁 (Lhalu)、达拉·平措扎西 (Takla Phüntso Tashi)，以及一些重要的汉族官员如范明。此外，本书还利用了我为编著《西藏现代史第一卷》〔在国家人文科学基金会 (RO-20261-82 和 RO-20886-85) 的基金支持下〕而采访的一些材料。一些涉及西藏的前美国中央情报局人员也在受访者之列。

我也获准使用位于达兰萨拉的西藏流亡政府公共关系办公室 (Publicity Office) 和西藏著作档案馆进行的一些采访文稿。其中一些是对某些非常关键的西藏官员的采访，而这些人在这本书着手筹划之时就已经过世了。

我们大部分的采访于 1991 年至 1995 年之间进行。总体上对每个受访者都会追加多次补充访问，而且几乎所有的访问都留有录音。追加访问是为了澄清初次访问中的某些信息，或者了解初次访问中没有涉及的问题。很多情况下，对某个人的采访会长达六到十个小时。这些采访的英文文稿总共有六千多页，班觉·擦绒博士在印度单独或陪同我一起进行了绝大多数的采访。在英国、香港、西藏以及中国其他地区的采访是由我单独进行的。在美国，擦绒博士和我共同进行了采访。

当采访中出现矛盾的说法时，我们将根据以下原则加以考察：(1) 事件的时代和社会背景；(2) 其他人的陈述；(3) 受访者的信息来源（道听途说或第一手资料）；(4) 受访者与事件的关系，例如，他/她是否是事件相关人物的亲属或者盟友；(5) 受访者的名声，诚实与否。在很多重大问题上我需要决定接受哪种说法。为此，我们花了大量时间多次访问当事人，或采访其他一些人，力求澄清争端和分歧，阐明真相。在本书中，有

时我会对某些事件的其他说法加以说明，这种说明通常是以注脚的形式出现的。但是对于更多事件我没有这样做，因为这既不现实也没有必要。

所有这些访问材料正在亨利·卢斯基金（Henry Luce Foundation）的支持下，由凯斯西储大学西藏研究中心编纂收入《西藏口述历史档案集》（*Tibet Oral History Archive*）。最终它会被国会图书馆的亚洲分馆永久收藏，并且制成网络档案供学生和学者查阅。

中国的内部出版物

我有幸从中国得到一些重要的资料。这些资料只在有限的渠道出版发行，普通人无法获得。其中之一是多种版本的官方资料《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它按照编年体记录事件，引用了一些文件、电报等等。此外，我能够使用一些内部出版或者短暂公开出版后又被禁止发行的重要书籍。

见证记录和其他书面材料

一个重要的信息来源是大量的见证者撰写出版的记录。这些类似“回忆录”的材料既有藏文的也有中文的，在中国和印度出版，包括阿乐群则（Alo Chöndze）、夏噶娃（Shenkawa）、功德林（Kundeling）和朗色林（Namseling）等人所著的书和在期刊杂志文集上发表的文章，比如珍贵的选集《西藏文史资料选辑》和《革命回忆录》。

报纸、图书和文章

本书利用了中国在这一时期发表的杂志文章，这些文章可以通过《中国大陆出版物调查》系列查到。同时，本书还参考了西方国家和印度出版的一些报纸，比如在印度噶伦堡出版的藏文报纸《西藏镜报》。当然，本书也参考了在中国和西方出版的一些图书，这些图书里面包含很多原始的采访资料或政府档案。在中国，政府档案只能通过这种途径获得。本书还利用了从1950年代发行至今的《西藏日报》辑录。

所以，尽管缺乏官方的政府档案，构成本书之基石的这些原始资料还是在某种程度上达到了翔实和完整。如果缺少上述任何一方面的资料，这种水平都是达不到的。

■ 引用惯例

在本书的引用中，方括号里的文字是我补充的评论和说明。例如：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则予以坚决的军事回击，在“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下，争取获得军事上和政治上的胜利。

在这个引用中，我加入了〔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以补充说明。

引言

并入中国前夕的西藏社会

每一种政治体系都会提出专门的意识形态来概括和合理化自己存在的基石。在西藏，社会和政府的基石是一种认为宗教目标和活动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的价值体系。以达赖喇嘛为首的西藏建立于十七世纪中叶，在这之前西藏经历了数十年痛苦的教派冲突。新的神权政府成立之后把巩固和加强佛教——尤其是“黄帽派”或“黄教”（格鲁派）——的发展作为自己的使命。西藏人把这种政治体系理解为“政教合一”制度（藏语：*chösi nyiden*），因为最高统治者达赖喇嘛是观音菩萨的转世，而僧侣也和俗人一起承担着管理全西藏的任务。并且从十八世纪起，在达赖喇嘛亲政之前摄政的也是转世喇嘛。西藏人认为正是这种“双轨系统”成就了西藏举世无双的地位。这种自信是根深蒂固的，这一点在1946年西藏政府给蒋介石的一封信中体现出来：“世界上有很多国家都获得了空前的财富和权力，但是致力全世界人类幸福的却只有一个国家，那就是珍爱政教合一系统的宗教乐土西藏。”¹

因此，要想理解二十世纪的西藏历史，人们就必须认识到西藏在很多本质方面还是一个尚未现代化的神权政体，并且要认识到造成这种状况的并非其特殊的与世隔绝的地理环境。在二十世纪，西藏直接面对现代世界，但是却拒绝任何变革。其领导人认为西藏的伟大之处正是在于它的宗教制度，所以强烈主张维持这一制度，杜绝公立学校或者职业军队等“现代”事物的竞争和污染。²

1. 戈尔斯坦，1989: 816。

2. 关于二十世纪上半期的历史在戈尔斯坦的著作（1989）中有深入的探讨。

■ 政府

1951年的西藏政府是由一系列等级森严的官僚机构组成的。大约五百名官员在这些机构中工作，僧官和俗官也约各占一半。³ 僧官和俗官共同分享权力，领导着所有的部门和机构。规模如此之小的官僚体系之所以能管理像整个西欧那么大面积的土地，是因为西藏政府采取了极简主义的管理哲学，把大部分的政府职能交给地方上拥有庄园的领主来承担。

政府中的俗官来自二百多户世袭的贵族家庭。每个贵族家庭至少拥有一个包含农奴的庄园。作为对此的回报，每家需要派出至少一名男性家庭成员（无偿地）去政府供职。这说起来是义务，但实际上是一种精心维护的特权。每个贵族家庭都努力捍卫这种特权。除了继任达赖喇嘛的家庭和很少的富商家庭之外，平民家庭的成员是无法成为俗官的。

政府的僧官首先从有限的一些寺院中挑选。这些寺院主要是位于拉萨周边的三大寺（色拉寺、哲蚌寺和甘丹寺），但是有时也包括某些其他寺院如木如寺和喜德林寺。这些僧官没有被要求在寺院里住，也不需要虔诚礼佛。除了独身之外，他们所需要的就是在布达拉宫里的政府学校学习管理知识。对比俗官，除了要求独身和没有庄园之外，他们在其他方面都是相同的。

西藏政府的最高统治者是达赖喇嘛，在达赖喇嘛亲政之前是摄政。一般来说，最高统治者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对所有政策和任命都有最终决定权。而且在理论上，政府中所有的施政计划都必须提交给他审核同意。

达赖喇嘛本身是通过转世制度产生的，也就是说在达赖喇嘛逝世之后的一到三年内，他通过把自己的“本体”附着在男性胎儿的身体里来选择自己的继任者。西藏政府和摄政的任务是在达赖喇嘛过世数年内出生的数千名男童中找到这个孩子。

为了完成这项任务，西藏政府和摄政会仔细地考察梦境、幻觉和各种灵异事件等，由此来确定寻访的方向。之后便派出很多队寻访团去寻找那些可能是达赖喇嘛转世的男童。当可能是达赖喇嘛转世的男童找到后，寻访人员会向他出示若干对物件。每一对中有一件是达赖喇嘛的私人物件，

3. 藏族人称西藏政府为甘丹颇章（*Ganden Phodrang*）或第巴雄（*Dewashung*）。

另一件与这一件完全相同，但却是新的。如果男童选择的是达赖喇嘛的私人物件，而不是那些崭新的、闪闪发亮的物件，那么他就会成为达赖喇嘛转世的下一步人选。继任的达赖喇嘛将会从各个不同寻访团寻访到的多个达赖喇嘛转世人选中选出；随后，被选定的男童会被带回拉萨，跟经师学经。通过这种机制，上一世达赖喇嘛的号召力得以传递给他的继任者，同时也使得选择过程合法化。

在达赖喇嘛亲政之前西藏的最高统治者是摄政，他掌握着权力。只有在18岁亲政之后，达赖喇嘛才可以掌握政权，直到逝世。但是，即使正式掌握了权力，他能在多大程度上运用自己的权力则要取决于环境和他本人的个性和能力。

达赖喇嘛身边围绕着一小群侍僧和僧官，他们帮助达赖喇嘛打理公私事务（藏语：孜噶，*Tse ga*）。⁴这些人中最重要的的人物之一是基巧堪布，他是管理达赖喇嘛的私人财产、领导达赖喇嘛的三个主要侍从的高级僧官。⁵基巧堪布拥有很高的地位， he 可以和噶厦平起平坐，与他们协商事务。但是他们一般不轻易去见噶厦，只有当达赖喇嘛有事情要告诉噶厦，或者噶厦有事情要向达赖喇嘛报告的时候才会去。

达赖的秘书处里另一位重要的僧官是副官长（藏语：卓尼钦莫，*drönyerchemmo*），他是外界求见达赖喇嘛或向达赖喇嘛陈情的渠道。所以虽然他的品级没有基巧堪布高，但是权力却极大，因为他决定了谁可以接近达赖喇嘛。在本书涉及的这段时期，帕拉（Phala）就是这样一位权力很大、非常有影响力的卓尼钦莫（副官长）。

除此之外，达赖喇嘛身边的重要角色还有他的正副经师（以及他们的助手）。他们能经常见到达赖喇嘛，所以也是很有影响力的。在1950年代，林仓仁波切（Ling Rimpoche）和赤江仁波切（Trijang Rimpoche）分别担任达赖喇嘛的正副经师。

有很多因素使达赖喇嘛不能有效地运用自己的权力，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他几乎与世隔绝，无法接触他人。他深居在自己的宫殿之内，除了周

4. 达赖喇嘛的秘书处很小。为首的是副官长（卓尼钦莫），此外还有十六个孜仲（*tseñdrön*）和四个森噶（*singga*），他们都是僧官。

5. 这三个人分别是管理达赖喇嘛饮食的苏本堪布（*söpön khembo*），管理达赖喇嘛起居的森本堪布（*simpön khembo*），以及管理达赖喇嘛日常宗教活动的曲本堪布（*chöpön khembo*）。

围的这些人之外，他同任何人都没有非正式的接触。因此，达赖喇嘛非常依赖由各个机构和官员提供的信息，尤其是周围贴身随从们的信息。要想克服这种制度性障碍，达赖喇嘛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而且噶厦这个西藏政府的最高机构有时也会使出各种手段来误导或者绕过达赖喇嘛，其他的机构也有可能这样做。于是，克服这个制度性障碍就变得越发困难了。

噶厦（内阁）传统上是由四位噶伦（*kalön*）组成的，其中一位是僧官。但是在现代，噶伦的数目并不是那么固定。例如，在1951年就有过八位噶伦（包括代理噶伦）。⁶ 新增的噶伦是终身制，是由最高统治者从噶厦提供的名单中挑选出来任命的。虽然最高统治者并非只能从噶厦提供的名单中任命噶伦，但通常情况下他都是这样做的。直接受这些噶伦差遣的是一群（大概六七名）低级贵族官员。⁷

噶厦是西藏政府掌管世俗事务的行政中枢，同时也相当于西藏的最高法院。它是惟一可以把文件呈送给最高统治者批准的机构，也是惟一可以同最高统治者直接接触的世俗机构。其他所有的下级机构只有通过噶厦才能向最高统治者请示。噶厦也负责对俗官的任命和升迁提出建议。

在噶厦之下，有一系列不同的机构掌管着政府各方面的事务。多数情况下，这些机构里的领导者既有僧官又有俗官，只有两个最重要的机构例外。这两个机构是财税部（藏语：孜康，*Tsigang*）和秘书处（藏语：译仓，*Yigtsang*），分别由四名俗官（藏语：孜本，*tsipon*）和四名僧官（藏语：仲译钦莫，*trunyichemmo*）掌管。译仓负责政府的宗教事务和僧官的选拔；孜康负责税收和世俗事务。

按照传统，噶伦们的职务是没有部门分工的。各项事务都需要集体决定，形成共识之后方能付诸行动。噶厦的权力体现在：任何世俗事务只有通过他们才能传递给最高统治者作决定。因此西藏人常常说噶厦是政府的咽喉，事情总要通过这里才能得到解决。

6. 1951年的五位正式噶伦是然巴·土登贡钦（*Ramba Thubden Güngyen*，僧官）、索康·旺清格勒、绕噶厦·平措绕杰（*Phüntso Rabgye*）、拉鲁·次旺多吉（*Lhalu Tsewang Dorje*）、阿沛·阿旺晋美（*Ngabö Ngawang Jigme*）。三位代理噶伦为土登饶扬（*Thubden Ramyang*，僧官）、夏苏·居美多杰（也叫夏噶娃）和洞波·钦饶汪秋（*Dombor Kyenrab Wangchuk*，僧官）。

7. 这七名低级俗官包括两名噶仲（*kadrung*）、两名噶准（*kandrön*）和三名噶厦的协巴（*shöpa*）。

下面这个虚构的例子可以说明施政计划形成的过程。这是一个宗的宗本（县的长官）提交的陈情书。宗本把它交给孜康，由孜康转交给噶厦，再由噶厦呈交给达赖喇嘛。随后由达赖喇嘛返回给噶厦，噶厦给孜康，最后由孜康返回给宗本来执行。⁸ 在西藏，噶厦和达赖喇嘛使用不同颜色的墨水，所以一眼就可以看出是谁给文件做了何种修改。为了代表不同的墨水，我用方括号表示噶厦的修改，而用下划线和中划线表示达赖喇嘛的决定：

以下文件于木虎年九月五日（由达赖喇嘛）批阅。

木虎年，江孜宗宗本送达报告说，由于大量的降雨，萨玛达地方人民的田地都被水淹了，颗粒无收。考虑到这一〔他人无法效仿的〕事实所造成的完成差税的困难，我们请求在他们完成劳役之后减免他们三年、四年或者五年的实物赋税。〔除此之外，为了弥补损失，请求布施藏银~~200~~→250→300两，青稞70、80、90克。〕⁹

这样做妥当与否请给予明示。¹⁰

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提交给达赖喇嘛的陈情书是按照出自达赖喇嘛的决议文的格式写成的。建议书的第一行说明达赖喇嘛（在他亲政之前是摄政）在何年何月何日批示了这个请求，最后一句话里的下划线表明他同意这个请求。

在这个例子中，噶厦首先在孜康的建议中填上“他人无法效仿的”和“除此之外，为了弥补损失，请求布施藏银 200、250、300 两，青稞 70、80、90 克”，达赖喇嘛删除了建议中请求布施藏银的建议，但是采纳了布施 70 “克”青稞和减免五年赋税的建议。

这个虚构的例子解释了西藏的政治体系用以限制达赖喇嘛（或摄政）的一些基本方法。尽管最高统治者毫无疑问对所有事件都有着绝对的权威，但是他的权力还是受到信息匮乏的制约。例如在以上的事件中，达赖喇嘛知道的只有建议书中的内容。而且由于建议已受到噶厦的支持，他几乎总是会接受基本的建议。尽管他会对其中某些问题做部分修改，而且对于重要的问题还会亲自召集噶厦开会讨论，但是对大部分的问题，他都会根据噶厦提出的建议来作决定。

8. 这个例子是由已故噶伦索康·旺清格勒虚构的（戈尔斯坦，1968: 175-76）。

9. “克”（*khe*）是传统的体积单位，一“克”青稞约为 31 磅。

10. 戈尔斯坦，1968: 176。

长久以来，噶厦有单方面对一些问题的传统，这种行为进一步增强了噶厦的控制力。噶厦之所以能这么做，是因为它的印章就是政府的官方印章。即使是经过最高统治者同意的事务，也要加盖噶厦的印章才能够公布。于是，即使噶厦没有把事情呈交达赖喇嘛批准，它也可以按照已经获得达赖喇嘛批准的文件格式（如上面例子中的格式）直接起草决定，盖上自己的印章发出去。¹¹

噶厦对自己绕过最高统治者行事的解释是事情不重要，不值得去麻烦最高统治者，或者事情涉及一些转世喇嘛不适合过问的问题，比如决定肉体处罚。但是在一些很明确的问题上，噶厦一般是不会绕过达赖喇嘛的，这些问题包括：（1）政府开支的相关事务，（2）土地所有权的转移、土地的罚没或赐予的相关事务，（3）授予永久豁免税收的特权或增加新税的相关事务，（4）晋升或降职的相关事务，（5）边界和外交的相关事务。除了这些以外，其他大部分事务噶厦都会单方面决定。

据已故噶伦索康·旺清格勒的估计，在 1940 年代后期，约有 70% 的事务是噶厦单方面决定的。根据他的估计，在每周六天的工作日里，噶厦向达赖喇嘛提交了大约一百件事务请求最终批复。不难想象，在摄政执政时期或者在达赖喇嘛亲政初期噶厦单方面处理的事务所占的比重会有所上升，而在达赖喇嘛实现强势领导的时期这种比重会下降。但是在达赖喇嘛统治的全部时期，只有很少几位达赖喇嘛能够实现强势的集权独断，十三世达赖喇嘛就是其中之一。而于 1950 年底亲政的十四世达赖喇嘛是否能像他的前任那样继续强势的领导，正是决定 1950 年代历史的一个重要因素。

由此可见，噶厦控制着政府的日常运作，是最高统治者和整个官僚体系之间的关键桥梁。但是，噶厦的支配地位有时会因为另一个官职——司伦——的设立而受到影响，而这正是 1950 年到 1952 年出现的情况。

■ 司伦或者司曹

司伦这一官职设立于达赖喇嘛因英国人入侵拉萨而流亡蒙古和中国内地的 1904 年。当时，他任命了三位噶伦为司伦，在其流亡时期进行统治。

11. 噶厦的印章称为噶唐（*kadam*）。达赖喇嘛自己的印章称为布唐（*bugdam*），他用这个印章来颁布教令。

司伦的意思是“政务大臣”。摄政是在达赖喇嘛去世后和新的达赖喇嘛亲政之前这段时期执掌政权，与此不同，司伦则是在达赖喇嘛在世但流亡在外期间代行权力。但是当达赖喇嘛在1913年从印度返回并重掌大权之后，他选择保留司伦一职，使它成为官僚体系中介于达赖喇嘛和噶厦之间的一个层级。于是政府中原来处于最高层级的噶厦，现在需要把所有的陈情、请求和决议通过司伦呈交给最高统治者。此时，司伦对于噶厦正如噶厦对于它下面的其他机构一样。例如，司伦可以单方面决定不把噶厦的建议转呈给最高统治者。

到了1930年代，1904年任命的三位司伦中只有一位还活着。但是十三世达赖喇嘛任命自己的侄子朗顿（Langdun）为司伦，与仅剩的司伦一起工作。到1933年十三世达赖喇嘛去世时，只有朗顿一位司伦还在世。

达赖喇嘛去世的时候，需要任命一位摄政来监督寻访新的达赖喇嘛，并在他没有亲政之前统治西藏。自从十八世纪后期以来，摄政都是由转世喇嘛担任。但是在1933年，很多人的意见倾向于任命世俗贵族朗顿为摄政。最终，一位叫热振的喇嘛被选为摄政，但是有一个附带条件，即他的权力不能超过司伦朗顿。这项限制只存在了几年，因为热振成功地迫使朗顿辞去了职位。从那时开始一直到1950年11月，司伦这个职位都是空缺的。直到1950年底，达赖喇嘛才又任命了两位代理司伦（仅称司曹），让他们留在拉萨管理政府事务，自己则逃到靠近锡金边界的亚东，在那里观望中国人是否会继续进军卫藏。¹²

■ 民众大会或者春都

民众大会（藏语：春都，*Tsondu*）这一机构似乎出现在1860年代。当时贵族夏札（*Shatra*）召集了一个自称为“大甘丹寺、哲蚌寺和政府官员会议”（藏语：甘哲仲杰，*gandredrungche*）的特别会议。这个会议罢免了摄政，并由夏札来代替。甘哲仲杰后来被称为民众大会或春都。夏札死后，民众大会推选了新的摄政，并且在以后的政教事务中充当着重要的角色。直到现代（1913–1951年），民众大会还在噶厦的要求下不定期地召开，

12. 锡金过去是以藏族为主体的王国，现在是印度的一部分。

针对噶厦提出的具体问题进行讨论，并给出建议。所以民众大会只是一个顾问机构，而不是一个立法机关，噶厦之所以召集民众大会只是为了在一些敏感或难以应对，噶厦不愿意单方面处理的问题上扩大支持基础。按照传统，噶伦们本身是不参加讨论甚至不出席民众大会的。

根据所讨论问题的不同，民众大会的规模和组成也不同。规模最小的民众大会是典型的政府精英会议，这些精英包括噶厦官员以及噶厦之下的两个最重要的机构译仓和孜康的首脑。这种民众大会应噶厦的要求而召开，根据参加者的官衔被称作噶厦仲孜伦杰 (*Kashag Trungtsi Lhengye*)。有时三大寺的现任堪布也会参加，以增强会议的代表性。

规模最大的民众大会称为全体民众大会（藏语：春都杰错，*Tsondu Gyendzom*）。出席人员包括：(1) 三大寺所有现任和卸任堪布；(2) 孜康和译仓的八位首脑（藏语：仲孜杰，*trungtsigye*）；(3) 当时在拉萨的所有僧俗官员；(4) 其他一些寺院或者转世喇嘛的代表，如热振寺、功德林、策墨林、策确林、地珠仁波切、扎什伦布寺、甘丹赤巴和萨迦寺的代表；(5) 驻扎在拉萨的藏军如本和甲本；(6) 在拉萨附近征收房产税和安排差役税的约二十名低级官员（藏语：错巴，*tshopa*）；(7) 三十个办事员和工匠（藏语：仲科，*drungtog*）。只有非常重要的事务才能召开全体民众大会，比如确认所发现的达赖喇嘛的转世。

全体民众大会通常只召开一两天，因为要给召开的第三种主要的民众大会——机要民众大会（藏语：*Tsondu Hragdu*）让路。机要民众大会的与会者有二十到五十人，通常包括三大寺的现任和卸任堪布以及由噶厦和译仓推选由政府代表官员，如两个四品官和两个五品官。机要民众大会是最常召开的民众大会，其使用的印章与全体民众大会相同，而且工作的方式也相同。

机要民众大会和全体民众大会由仲孜杰主持，大会在仲孜杰宣读了要讨论的主题之后开始。因为不采用投票的方式，所以形成决议的方式是由其中一个仲孜杰撰写文件，总结各位与会人员的观点和看法。如果没有出现不同意见，就会形成草案。如果与会人员对草案没有异议的话，仲孜杰便会把它提交给噶厦。如果噶厦对草案有不同意见或者疑问，民众大会就会针对噶厦的意见进行讨论，一般会形成新的草案。最后在民众大会的文件上盖上四个印章：一枚印章代表政府官员，另外三枚各代表格鲁派三大寺之一。

所有这些民众大会都不能自行举行，也不能决定最终的政策。民众大会的意见能否被接纳并且转化为政策取决于噶厦和最高统治者。简而言之，民众大会只是顾问机构，主要代表色拉寺、哲蚌寺、甘丹寺这三大寺的僧侣和众多政府官员的观点。但是，正如我们将要在下面看到的，三大寺在民众大会中的影响力使得它们对西藏的事务拥有某种否决权。

■ 庄园制度

西藏的庄园制度与中世纪的英国及欧洲大陆西部的庄园制度有一定的相似性，它们都是建立在庄园和农奴之上的。农奴在领主的庄园里劳作，并根据法律依附于庄园与领主。在西藏，庄园（藏语：谿卡，*shiga*）的主人可以是贵族家庭、寺院、转世喇嘛或者政府本身。这些庄园是由最高统治者（达赖喇嘛和摄政）赐予的，一般情况下它们会世代继承下去。但是也可能有例外，因为达赖喇嘛可以没收这些庄园，而且历史上也发生过这样的事情。西藏的最高统治者也可以把新的庄园赐给非贵族的平民，正如每一世新任达赖喇嘛的家庭，他们因此获封贵族，成为世俗贵族的一分子。

西藏的庄园是生产资料和世代依附于土地的农奴的结合体。生产资料是可耕地，庄园的可耕地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领主的自营地，另一部分是农奴的土地（称作差地）。领主的自营地占整个庄园可耕地的二分之一到四分之三，全部由世袭农奴以支差（藏语：乌拉，*ula*）的形式耕种。在大部分庄园里，每个农奴家庭平日每天都必须派一个壮劳力到领主的自营地里劳作，而农忙时节则必须派两个甚至更多个。¹³ 如果没有农活可干，领主会安排服差役的劳力去干其他的活，比如捡木柴或纺羊毛，自营地上所有的收成都归领主所有。

庄园里剩余的可耕地分配给庄园世袭的农奴，是农奴们生存的依托。从某种程度上说，农奴并不拥有这些土地，因为他们不能将其出卖。但是在通常情况下，只要他们完全履行了差税义务，就可以世代获得这块土地上的收益。

13. 土地用“可课税土地单位”（藏语：差岗，*tregang*）来计量。如果一个家庭拥有一个这种单位的土地，每天就要派出一个人去给庄园的领主工作。如果一个家庭拥有半个这种单位的土地，每隔一天就需要派一个劳力去给领主干一天活。

西藏农奴制的特点是农奴们对差地具有人身依附性，他们不能放弃这些土地而到别处去寻找生活的来源。他们并不自由，世袭地从属于他们的庄园。如果他们逃跑，领主有权找到他们并强行把他们带回庄园。农奴与庄园和领主的依附关系按性别区分，代代相传。也就是说，在父母亲分属不同的庄园和领主的情况下，后代如果是男性则将成为其父亲所属庄园和领主的农奴，后代如果是女性则会成为其母亲所属庄园和领主的农奴。如果庄园的领主改变了，农奴将会跟随土地依附于新的领主。¹⁴

庄园对农奴的影响既是经济上的又是政治上的。领主负责处理纠纷，执行处罚，同时控制着依附于自己的农奴们的迁徙。农奴对庄园和领主的永恒依附关系在农奴想要永久地离开庄园时表现得非常明显。这些情形包括与另一个庄园的农奴结婚或者入寺为僧，这两种情形农奴都需要获得领主的许可。

对于婚姻，获得农奴主允许的最简单的方法是“人口交换”（藏语：*mije*），指的是当一个农奴经过婚配到另一个庄园去时，另一个庄园通过婚配的方式补偿一个农奴过来。每一个经过婚配到他或她的配偶所属的庄园去的农奴，将会成为其配偶所属庄园的农奴。这种方法是最理想的，因为没有领主愿意失去一个具备劳动力的农奴。

如果新娘嫁出去了但却没有人通过婚配交换进来，领主也可以接受以仆人或者无地农奴替代。交换出去的人将会搬到新的庄园，成为新庄园的一分子。

通常，农奴还可以用终生向领主支付“人身违约金”（藏语：*mibo*）的方法使领主允许其婚配到另一个庄园去。支付人身违约金的农奴仍然从属于他或她原来的庄园和领主，但是可以婚配或者到其他庄园里去生活和工作。在这种情况下，一个生活在她丈夫所属庄园里的女农奴，她以及她的所有女性后代还是属于原来的庄园，但是她的男性后代将成为她丈夫所属领主的农奴。

人身违约金的数目和支付方式千差万别，一般是以货币的形式，但有时也以劳役或物品的形式来支付。领主们会详细记录他们的农奴的情况，包括生育、死亡以及按年支付人身违约金的情况。¹⁵ 所以从本质上说，所

14. 这种权力叫做“从土地获得人力”（藏语：*mitsa yüügug* 或者 *mitsa yüügong*）。

15. 对这种制度的考察见戈尔斯坦，1971b，d。

有的西藏农奴阶级都直接或间接地（通过人身契约）同庄园和领主联系在一起。

僧侣在某种程度上是这种体系的例外。农奴要想成为僧侣必须要得到领主的允许，而这种要求也总是会得到满足。¹⁶ 农奴只要继续留在僧侣体系中，就不需要对庄园和领主尽任何义务。但是从法律上来说，领主仍然拥有这些农奴。例如，如果他或她被寺院开除或者自愿离开寺院，就会自动恢复农奴的身份以及同庄园和领主的从属关系。¹⁷

领主对农奴的权威也包括可以把农奴随意转让给其他领主或者富有农奴，虽说这种情况在西藏并不常见。例如，有时领主会把仆人（藏语：*yogpo*；朗生，*nangsen*）和无地贫穷农奴作为“赋税配属”给予赋税重而又缺乏劳动力的农奴家庭。¹⁸ 类似地，贵族会把一名女仆作为嫁妆随同自己的女儿出嫁，而不管这样做会不会拆散女仆的家庭。领主们也会根据自己各处劳动力需求状况的不同把农奴从一个地方迁到另一个地方。

在 1940 年代，哲蚌寺有这样一个例子。哲蚌寺每天需要为自己的一万名僧侣提供“芒恰”（*mangja*）茶，这就需要大量的柴禾。为此哲蚌寺决定使用它的支差农奴，这样就不用花寺里的一分钱。于是它从自己的庄园里派遣了二十个未婚的农奴到遥远的山区去砍柴，整整十年时间这些农奴就住在帐篷里，整天砍柴、运输柴禾。他们是根据他们家庭的差税义务被派去的，所以在待在那里的整整十年里，他们得不到工资和食物供应，所得到的只是他们的家庭不再需要每天为庄园支差。对于这种事情农奴家庭当然是没有选择的余地。¹⁹

所以说，西藏的政治经济制度不仅为精英们提供了丰饶的财富和资源，最重要的是为他们提供了“被束缚”的劳动力。从领主的立场来看，这个体系极其高效，仅需花费极少的金钱或时间。领主们无需为了获得劳动力而互相竞争，也无需为劳动力的吃饭和睡觉问题费心。领主，不管是活佛、寺院、贵族，还是西藏政府自身，只需要派一名管理人员来组织依

16. 这叫做曲珍（*chödrö*），直译过来就是“宗教释放”。

17. 此时领主的权力叫 *gyatsa rangdag*（“恢复到原来的世俗状态和对领主的归属身份”）。

18. 对这种农奴转让的讨论见戈尔斯坦，1986。

19. 桑珠（*Samdrup*），访问记，1989年，中国西藏自治区拉萨市。桑珠是在哲蚌寺总管（藏语：基索，*jiso*）底下工作的一名僧侣，他亲自负责这项工作。

附于其庄园的农奴。这正是西藏传统社会的特征所在，因为这个特征，所以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都把它看成是和欧洲封建庄园制度大同小异的一种制度。²⁰也正因为如此，在本书中我将用农奴一词来称呼这类农民，而不选用其他表示此意的词语，如受束缚的农民 (*bound peasants*)，或者米赛 (*miser*)、差巴 (*treba*)、堆穷 (*düjung*) 或朗生 (*nangsen*) 等这样的藏语词汇。

底层的农村生活虽然具有这样僵化的一面，但也具有相当大的弹性。领主们只在乎自己庄园的收成，即将他们所拥有的土地转化成高效的经济产物。因此，除了要求农奴充分履行差税义务以外，农奴主并不关心农奴其他方面的生活。在支应差税之外，农奴如何生活与他们无关。而且因为差税是整个家庭而不是个人的义务，因此只要整个家庭圆满地履行了差税义务，家庭成员就可以很自由地做自己想做的事，比如说朝圣或者走亲戚。因此，人身依附于庄园和领主只是意味着农奴不能单方面把差地还给领主而取消自己的差税义务，但是在其他很多方面，只要农奴在需要时履行他们的差税义务，就可以在日常生活中拥有很大的自由度。

最后需要注意的是，尽管所有的农奴阶层都世代依附于某一座庄园和领主，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所有农奴的生活状况都是一样的。首先，西藏政府所属庄园的农奴与贵族、寺庙所属庄园的农奴就有很大的不同。西藏政府的庄园基本上全是差地，也就是说几乎所有的政府庄园都作为差地划分给农奴，而农奴则要承担非常沉重的差税负担。这些差税既包括劳役也包括实物。其次，一般农奴之间也存在着重要的差别，并因此形成一系列的农奴类别，这些类别包括 (1) 拥有差地并且承担沉重的差税义务的“差巴” (纳税人或支差的人)；(2) 堆穷，没有差地，只是人身依附于庄园，因此对庄园承担的差税义务较少；(3) 朗生，是领主世袭的仆人。实际上，农奴并不一定意味着贫穷，很多差巴家庭就很富裕，并且拥有自己的仆人。

总而言之，西藏的封建政经制度是建立在庄园制基础上的。每一座庄园中都有世袭的农奴劳作着，他们为整个政经系统提供人力和其他实物资源。寺院、活佛、贵族以及政府本身都完全依赖于这个体系。

20. 对这种制度的分析数据见戈尔斯坦，1971b 和 1986。

■ 寺院制度和规模寺院制

入寺为僧过寺院生活是大乘佛教和上座部佛教的修行基础。但凡有佛教传播的地方就有寺院和僧侣。但是与其他佛教国家不同，在中国接管之前，西藏寺院所拥有的僧侣的数量大得惊人。调查显示，在1733年整个西藏已经有319,270名僧侣。²¹而且根据估计，1930年代和1940年代10%–20%的西藏男性终生都是独身的僧侣。为了说明问题，可以拿另一个佛教占支配地位的社会——泰国作比较，同一时期，僧侣仅占泰国男性人口总数的1%–2%。²²

在1951年，全西藏大约有2,500座寺院。仅环绕拉萨的三大寺（哲蚌寺、色拉寺和甘丹寺）就有两万名僧侣。为了支撑这些宗教机构，西藏把大量的农地和牧场连带附属的农奴和牧奴分配给它们。在1951年，全西藏37%–50%最好、最肥沃的土地掌握在寺院和转世喇嘛手中（而另外25%掌握在世俗贵族手中），西藏政府则控制着其余的土地。此外，西藏政府还慷慨地资助重要寺庙的祈祷活动和宗教仪式，如每年在拉萨举行的传召大法会。西藏政府对宗教活动和机构的慷慨与对普通民众的无所作为构成鲜明的对比。整个西藏没有学校，没有公共医疗体系，没有警察力量，没有银行，没有报纸。

其实这不难理解，因为在西藏的僧侣、堪布和活佛们看来，西藏的超凡和独特之处正是在于僧侣数量，我称之为规模寺院制，而不在于有大智大慧超脱一切的喇嘛、在神山上经年累月冥思苦想的高僧，或者可以更加深刻地诠释佛法的新著作。西藏人也觉得西藏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它建立了一个良好的制度，通过这个制度，成千上万的男童不断地被从充满痛苦的世俗世界带入到纯洁有序的独身僧侣世界。在传统的西藏社会，人们认为只要是僧侣，不管好坏都比当普通人好。因为通过断绝婚姻和家庭关系，僧侣们完成了达到更高的精神境界所必须经历的第一步（尽管达到更高的精神境界还需要经历数世的重生）。

但是，要想世代代保持繁荣，规模寺院制就需要强有力和高效的机制来维持，以吸引大量孩童成为僧侣，使他们保持独身，并从物质上提供

21. 东嘎 (Dung dkar), 1983: 109。

22. 坦姆比亚 (Tambiah), 1976: 266–67。

支持。西藏的寺院制度在佛教世界里是很特殊的，因为绝大部分僧侣是从小就被他们的父母送到寺院里来的。他们入寺的年纪一般只有七到十岁，父母们一般不会顾及他们的个性和意愿。

父母让儿子出家为僧有多种多样的原因。多数情况下，父母可能是出于信仰，认为入寺为僧是无上光荣的事；也有可能是为了履行儿子生病时在神像前立下的誓言；或者可能是一位身为僧侣的近亲请求孩子的父母让儿子到他们寺院去出家；还有其他的可能性，比如入寺为僧仅仅是为了承担差税义务。在某些地区，有三个儿子的寺院农奴家庭必须让一个儿子出家；²³ 或者由于经济原因，贫困的家庭经常让他们的孩子入寺为僧。在西藏文化中，这是减轻家庭负担的一种最好的方式，同时也可以使这个儿子不再经历艰难和贫困的乡村生活。有时，让儿子入寺为僧还可能是父母组织安排家庭人力资源的一种手段。例如，有四个儿子的父母可能会决定让一个或两个儿子去出家，然后让其余的儿子共娶一个妻子。因为一般认为四个兄弟共娶一个妻子是很困难的，而两个或者三个兄弟共娶一个妻子则是比较理想的。

父母有时会同儿子讨论出家的事，但是更多的情况只是告诉儿子他们的决定。对父母来说，孩子想不想入寺为僧是无要紧要的。虽然寺规规定出家要出于自愿，而且寺院也会很正式地问孩子想不想出家，但是孩子的真实想法对寺院来说并不重要，这一点可以从年幼僧侣逃跑的问题上看出来。当一名新的僧侣从寺院里逃走的时候，多数情况下，他不会因为他的行动所表明的事实而被开除。相反，最后一般都是寺院的僧侣外出找到他，并把他强制带回去。如果这个孩子逃回自己的家里，他一般会遭到父亲的毒打，然后立即被送回寺院。但是对很多有过这样经历的僧侣的采访表明，他们并不认为父亲的行为是虐待。²⁴ 相反，他们嘲笑自己当初不想出家的行为真的很愚蠢。西藏人习惯上觉得小孩子是不会理解出家的好处的，所以大人们要确保他们抓住这个机会。

但是因为僧侣有权离开寺院，而且当他们到了 20 岁时就有能力这么做，所以需要有效的机制来留住这些没有下决心过独身生活的年轻僧侣。

23. 藏语称为布松巴玛（“三子取中”，*phusum pharma*）。

24 我采访了几百名哲蚌寺的僧侣，这些采访是哲蚌寺口述历史课题的一部分。

西藏的寺院制度提供了这样一种机制：一方面，僧侣受人尊敬，但是还了俗的僧侣就会遭人鄙视；另一方面，大的寺院一般不会严格约束僧侣的行为，也不要求他们有什么教育成就。寺院只会开除那些犯了杀戒和色戒的僧侣，而不适合念经、学经和修行则不在开除的原因之列。²⁵ 僧侣不需要参加任何考试就可以留在寺院里（虽然在寺院里考试是达到更高等级的必经之路）。在寺院里，不喜欢学经和修行的僧侣和学者型的僧侣一样受欢迎。即使是完全不识字的僧侣也可以被接纳，因为他们已经像高僧大德一样斩断了与世俗生活的联系。例如，哲蚌寺僧侣的构成就千差万别，可以说是“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其次，离开寺院就意味着经济陷入困境，僧侣们在进寺院的时候就失去了其在自家土地上的所有权利。所以在离开寺院之后，他们需要寻找新的经济来源。而且他们又恢复了以前的农奴身份，又有了给领主服务的义务。相反，假如他们留在寺院里，他们的基本经济需求就可以得到满足，而且不需要付出艰辛的劳动。所有这些因素使得留在寺院里成了对僧侣来说更容易也更有利可图的选择。

前面已经提到，寺院的领导者坚定地认为，既然西藏政府是宗教最重要的支持者和施主，那么宗教的需求和利益就应当放在政府施政的第一位；又因为规模寺院制代表着西藏宗教的伟大，那么政经制度的存在就要为规模寺院制服务。在他们看来，是他们（寺院领导层）而不是西藏政府才有权最终判断哪些政策在短期或者长期内对宗教有利。所以当他们的行动有违宗教利益时，他们有权力也有责任进行干预。当然，这就使他们成为政治事务的主要力量之一，同时也使他们可能会与达赖喇嘛、摄政以及西藏政府中的其他势力产生冲突。尽管达赖喇嘛和西藏政府中的其他势力都赞同规模寺院制的原则，但是在一些具体的问题上还是会经常出现分歧。例如，1946年达赖喇嘛雇佣英国教师在拉萨开办一所学校来帮助西藏更好地应对现代世界，但是拉萨的僧侣们却感到这是对宗教统治地位的威胁，于是就组织抗议，威胁要绑架学生。西藏政府很快就妥协了，几个星期后便解散了这所学校。

25. 尽管西藏的寺院禁止异性性行为，但是对于同性性行为来说，只要不涉及到人体的任何孔道，寺院就会忽视这种行为。所以，僧人一般通过利用伙伴并拢的双腿来进行同性性行为。

寺院集团的政治利益不仅可以通过成千上万动辄便走上街头抗议的僧侣来表达，也可以通过制度性的政府僧官集团来表达，更可以通过参加全体民众大会和机要民众大会的格鲁派三大寺现任和卸任堪布来表达。堪布们通过在民众大会上发声，实现了在政府事务中一种事实上的否决权。于是，在西藏为了适应迅速变化的二十世纪而进行的各种尝试中，宗教特权和声望以及大寺院的利益扮演了一个主要的障碍角色，束缚了西藏政府的手脚，阻碍了改革。因为寺院集团永远把现代化等同于世俗主义，把它看成是西藏独特性、伟大性的终结。规模寺院制和庄园制度的繁盛则恰恰为它们增加了筹码。

第一部分

通向中藏协议之路

第一章

中国视角：北京电台

1951年5月27日，时年16岁的达赖喇嘛正在亚东。亚东是靠近锡金的边境小城，达赖喇嘛和他的下属官员在几个月前来到这里做好准备，以便在人民解放军进军卫藏的时候能直接跨过边境逃往印度。以然巴噶伦和索康噶伦为首的一部分上层政府官员跟随他来到亚东，其余的政府官员则留在拉萨。在离开之前，达赖喇嘛专门任命了两位代理首相（司曹）和两位代理噶伦在拉萨主持领导工作。¹

达赖喇嘛正在他的驻地里一边收听北京的藏语电台一边休息。突然，他听到新华社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已于5月23日共同签订了《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²播音员激动地说，西藏又回到了“祖国”的怀抱。紧接着听到的详细条款让达赖喇嘛更加震惊，因为其中的某些条款是西藏政府早就明确指示其谈判代表不能接受的，例如，西藏地方政府要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协议还说要建立军政委员会，仅仅是“军政委员会”这个名称听起来就有些不妙。达赖喇嘛立刻本能地反应道：

我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我想跑出去把所有人都叫进来，但是却迈不开步子。播音员在收音机里说，在过去一百多年里，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是如何如何渗透进西藏，“进行了各种的欺骗和挑拨”。接着又说“这些情况使西藏民族和人民陷于奴役和痛苦的深渊”。

-
1. 同达赖喇嘛一起待在亚东的官员被称为“远行之政府”（藏语：*cheshung*），那些留在拉萨的官员被称为“家中之政府”（藏语：*shishung*）。
 2. “地方政府”（藏语：*sane sishung*）是中国共产党用来指代达赖喇嘛的西藏政府的名称，以此避免把它说成是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

当我听见这些令人难以置信、交织着谎言的陈词滥调时，我的身体一下子变得不舒服了。³

■ 毛泽东的视角

《十七条协议》决定了 1950 年代的西藏历史，而且直到今天还在影响着中藏关系。它的签订有多方面的原因，首先是毛泽东亲自制定和主导的精明策略，其次是共产党对不堪一击且准备不足的西藏政府施加的强大的军事外交压力。

我没有获得任何对解放西藏的决策进行讨论的中国内部文件，但是很明显有两个根本的原因促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决策层作出这样的决定。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是民族尊严。在过去的一百年时间里，中国由于统治者的腐朽和西方及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而变得非常脆弱，而中国共产党正致力于清除长期令中国遭受耻辱的外国残余势力，一洗民族耻辱。恢复国家尊严的一个方面就是要完全恢复中国在清朝和国民党时期的所有领土主权（和实际控制）。

西藏的分离是中国大国沦落的最明显例子。在北京的历史观中，英帝国主义是使西藏与中国分离的最大元凶。中国人觉得英国人在 1903 到 1904 年间对西藏的侵略和在以后的时间里对西藏自治的支持，不仅使西藏政府产生了从中国独立出去的渴望，而且也阻碍了中国重新控制西藏。⁴ 因此，恢复对西藏的统治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来说，具有深刻的民族主义和象征性价值，特别是在另一个广大的少数民族地区——外蒙古在国民党手中丢掉之后更是如此。⁵ 数年之后，这种观点在 1954 年一次关于西藏党组织内部问题的报告中表现出来：

西藏和祖国很早以来就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是伟大祖国领土的一部分。但从辛亥革命（1911 年）以后，西藏的统治者在帝国主义控制和指使下，脱离了祖国而投靠了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控制着西藏，签订了不平等条约，取得了许多政治、经济、

3. 达赖喇嘛，1990: 63。

4. 对这段历史的详细论述见戈尔斯坦，1989。

5. 对这段历史的论述见戈尔斯坦，1997: 40。

军事上的特权，并且占去了西藏边境的若干领土。由于全国人民反帝斗争的发展，由于藏民族内部反帝力量的存在（其中包括一部分上层——贵族和活佛），因而帝国主义一直未能把西藏完全征服。在这期间，西藏处于半殖民地状态，而对祖国采取“独立自主”的态度。⁶

除了这种强烈的历史和民族情感方面的考量之外，一直萦绕在他们心中的还有西藏的地缘政治对中国国家安全的重要性。失去蒙古在安全上并没有多大的威胁，因为它成了前苏联忠实的卫星国。但西藏不同，它是一个神权政体，其贵族精英在习惯和语言方面都受到英国的影响。当精英们想让他们孩子接受现代教育时，会把他们送到印度的英国教会学校去。很显然，精英们更看重的是英式教育和英文，而不是中式教育和中文。由于这种原因，如果让西藏继续保持事实上的独立状态，西方和印度的利益将极大地影响西藏。更危险的是，如果美国在冷战中支持蒋介石反对中国共产党，那么它很可能也会在西藏问题上扮演一种重要的角色。事实上，西藏政府已经在1948年派出一个代表团赴美。而且著名记者洛厄尔·托马斯（Lowell Thomas）的西藏之旅在美国起到很好的公关作用，使西藏在美国获得大量的关注和同情。⁷ 考虑到西藏与新疆、青海、云南和四川四个省毗邻，同时又与尼泊尔、锡金、不丹等国和印度的阿鲁纳恰尔邦（Arunachal Pradesh，在不丹东面）交界，对于中国而言，任何敌对国家想影响西藏或者在西藏建立势力范围的企图，都意味着不可接受的威胁。1954年毛泽东在同班禅喇嘛和达赖喇嘛的谈话中也提到这一点。他对班禅说：“西藏民族和汉族很好地团结和互相帮助，我们的国防线就不再是金沙江而是喜马拉雅山脉。”⁸ 接着对达赖说：“如果你们选择和帝国主义者合作，和我们以金沙江为界，以我们为敌，那我们将会非常困难。”⁹ 因此，这两方面的原因都使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坚信必须要解放西藏，让它重新成为统一的中国的一部分，而且必须马上行动。

-
6. 《对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未出版的手记）》，出版日期未明。除非特别说明，所有外文材料的翻译都由本人负责完成。
 7. 对这次西藏之旅的描述见托马斯，1959。
 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中国藏学研究中心，2001: 117-22。
 9. 《对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未出版的手记）》，出版日期未明。

毛泽东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很现实，他认为适当的军事压力是必要的。事实上他已经准备，如果需要，完全用武力解放西藏。但是他也认为这样做会产生严重的外交后果，降低中华人民共和国所宣称的对西藏拥有完全主权的国际认同。同时，这样做还会影响即将成为新中国一分子的西藏人对国家的忠诚度。因为这些原因，他觉得最理想的解决办法是用和平的方式解放西藏。换句话说，就是让西藏自愿地接受中国的主权，让解放军不受干扰地进入西藏。武力解放只能是两种情况下的结果：一种是“说服”策略失败了，另一种是需要给西藏的领袖施加一点压力。因此，从1950年年初开始，针对武力解放的军事准备工作和针对和平解放的宣传工作同时展开了。

毛泽东之所以强调要和平解放是源于他对西藏问题的认识。毛泽东认为西藏在本质上与解放军已经解放的其他任何地区都不同，它对中国的长远利益的潜在威胁要远远大于其他地区。所以尽管最简单、最快捷的方法是直接用武力解放，但是和平解放却是对中国的长远利益最安全和最有利的方式。这是由以下几个原因决定的：

首先，西藏与另一个大的少数民族地区新疆不同。新疆有成千上万的汉族人居住，而在西藏实际上没有汉族人居住，也几乎没有会说汉语的西藏人。因此，没有类似第五纵队这样的势力可以提供公开或私下的支持。

其次，西藏不仅没有汉族人，而且至少在过去的三十五年里完全独立于中国之外，并获得一定的国际身份认同。它开始同包括印度、英国和尼泊尔在内的其他国家建立了联系。最危险的是，它还同中国在冷战中的敌人——美国建立了联系。因此，武力占领西藏很容易引起国际争端。毛泽东在他于1950年1月2日从莫斯科发回的电报中阐述了这一点。他说：“西藏人口虽然不多，但国际地位极其重要。”¹⁰

而且西藏也明确地表示希望继续独立于中国之外。西藏外交局在1949年11月2日给毛泽东的信里很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致：

尊敬的毛泽东先生，

北平中国共产党政府主席

10. 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1990，1950年1月10日条目。

西藏是一个佛教昌盛的独特国家，它注定要由观世音菩萨的化身〔达赖喇嘛〕来统治。¹¹ 正因为如此，西藏自古以来都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其政治统治从来没有被任何一个外国接管过；西藏也保卫了自己的领土不受外来侵略，并一直是一个宗教国家。

鉴于青海和新疆等地与西藏毗邻这一事实，我们希望得到中国军队不越过中藏边界或不对西藏采取任何军事行动的保证。因此，请您根据上述要求向驻扎在中藏边境的军政官员发布严格的命令，并恳请您尽快给予答复，这样我们才能放心。至于多年前被并入中国版图的那些西藏领土，西藏政府希望在中国内战结束之后举行谈判来加以解决。¹²

再次，西藏是一个传统的宗教神权政体。佛教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支配着全民族的世界观和西藏的存在意义。转世喇嘛和寺院领袖的威望及地位是非常高的，而且藏传佛教的理论框架很有效地在下层老百姓和穷人中培养出一种消极的政治观，大众对变革的呼声非常小。藏传佛教告诉人们，生活的特点就是其内在的痛苦，所以穷人艰苦的生活环境以及被压迫的处境是很正常的事情。而每个人的痛苦都是由于前世的恶行经过因果报应和转世投胎的过程传递到现世而造成的。因此，西藏无穷无尽的贫穷不是由于庄园制度和领主世代的压榨，而是因为人们自己前世的恶行造成的。人们要想改善现世的生活，就要虔诚地多行善举，以此来积累这一世的善因，并因此在下一世投胎到好的环境中去。而杀死领主和改变现在的政经制度都是没有用的，这就造成在西藏，即使是最贫穷的阶层也不太可能响应号召，站起来反对世俗和宗教的土地所有者，至少在最开始的时候不太可能。而在一般情况下，这些最贫穷的阶层本应该是共产主义者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第四，西藏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给军事进攻的后勤保障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西藏没有公路和机场，物品只能由驮畜通过简陋泥泞的小路运入

11. 达赖喇嘛是观音菩萨的转世。他在一次访问中用英文说明了这个问题：“当然，西藏人首先相信，几乎所有人都相信，西藏人是由挑选出来的……像犹太人一样，〔西藏人是〕由先热日（Chenrezi，观音菩萨）挑选出来的人。我想这就是我们的根本观念吧”（达赖喇嘛，访问记，1994，印度，达兰萨拉）。

12. 英国外交部档案，FO371/76317，1949年11月2日位于拉萨的西藏外交局给毛泽东的信件的副本。

并分配到各地。这些小路在高耸的山脉间延绵数百英里，在冬天还会因为大雪而很长时间不能通行。¹³

另外，西藏有一支常规军队，其中的一半也就是 3,500 到 4,000 人，布防在与中国其他地区交界的地方，并有几千名当地的民兵与他们并肩作战，而且需要时还可以征召更多的民兵。¹⁴ 尽管总体上这些军队组织混乱且缺乏训练，但其实他们手上还是有一些现代化武器的，包括布伦式（Bren）和斯特恩式（Sten）轻机枪、迫击炮、手榴弹、加农炮和重机枪。¹⁵ 并且为了应对中国人的威胁，西藏政府已经开始扩大藏军的规模，正在建立一个新的军团（仲札团）。¹⁶ 藏军在常规战场上当然不是解放军的对手，因为解放军拥有上百万身经百战、装备精良的士兵。但是就像在给毛泽东的信中所暗示的，西藏已经有了同中国人作战的准备。而且由于地形和气候的原因，解放军必须考虑藏军利用游击战术切断其漫长且容易暴露的补给线的问题。假如西藏从中国的敌人比如美国那里获得帮助，这种危险就会更加突出。再假如这种游击战局面持久化和扩大化，考虑到西藏与国际社会的联系以及冷战的现实，西藏政治地位的争端很可能被国际化，这对中国来说是相当危险的。

于是，和平解放西藏就成为毛泽东所采取的策略。这种形式的解放在北京和新疆已经实现了。但是，毛泽东认为在西藏要运用更加和平的方法，这是由于其国际化的身份和其现实上的独立状态造成的。所以，西藏的和平解放要通过达成一份书面协议的形式来实现。在这份协议中，西藏政府和达赖喇嘛同意西藏回归“祖国”，回到中国的完全主权之下。到那时，军队和官员就可以在达赖喇嘛的同意和帮助下进入西藏。这样一份正式文件的出现当然会使国际上任何否定中国对西藏拥有主权的图谋都失去意义，也会使发动全面的军事进攻变得没有必要。这将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以与地方政府签订书面协议的方式来兼并一个政治实体。¹⁷

13. 从昌都到拉萨的距离大约等于从纽约到底特律的距离（650 英里）。

14. 戈尔斯坦，1989: 638-39；拉鲁，访问记，1992，拉萨。

15. 这些武器是在 1947 年和 1949 年从印度购买的（戈尔斯坦，1989: 618-19）。陈炳（1981: 185）说 1958 年藏军仍然持有 490 挺轻机枪和冲锋枪，13 挺重机枪和 48 门炮。但是很显然，在昌都守军被缴械的 1950 年，藏军所拥有的武器一定更多。

16. 洛卓群则（Lodrö Chönzin），访问记，1993，拉萨。

17. 这也是惟一的一次。即使是四十年之后的香港也不具有可比性，因为那时中国共产党面对的是英国人。

但是由于西藏自认为已经独立，并且不想成为共产主义中国的一部分，所以达成和平解放将不会很容易。为了克服这个障碍，毛泽东务实地设计出一套“胡萝卜加大棒”的双轨策略。中国一方面为达赖喇嘛准备了非常有吸引力的条款作为回归“祖国”的条件，另一方面威胁如果达赖喇嘛不就范就会发动一场全面的战争。

■ 军事准备

北京究竟何时开始讨论解放西藏的问题，这一点并不是很清楚。但是自从1949年8月西北局的第一野战军奉彭德怀元帅之命进军解放青海省和甘肃省之时，西藏问题就已进入毛泽东的视线。¹⁸ 毛泽东在1949年8月6日通过电报向彭德怀表达了他对争取藏族人的问题的关心。他在电报中提醒彭德怀要确保谨慎地对待藏族人，因为这将是以后解决西藏问题的前奏。他在电报里说：“班禅现到兰州，你们攻兰州时请十分注意保护并尊重班禅及甘、青境内的西藏人，以为解决西藏问题做准备。”¹⁹ 另一方面，班禅喇嘛在1949年10月1日给毛泽东和彭德怀的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电报中，也都明确地提到了西藏解放（这两封电报将在第十章引用）。²⁰

与此同时，毛泽东认为进军西藏的军事准备需要马上开始，所以在1949年11月23日就这个问题和彭德怀元帅交换了意见。在估计了中国当前的军事形势之后，他认为西北局的第一野战军似乎是领导解放西藏的不二之选。因为在西北地区，到10月份或者11月份时军事活动总体上已经

18. 在1949年3月5日至13日召开的中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中国被划分为五个大区域，每个区域以一个野战军为基础，并在其上设立一个局来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每个区也有一个军政委员会，它是在军队管理之下的过渡性政府，将来会由人民政府取代。西北局负责青海、新疆、陕西和甘肃。在第二野战军基础上的西南局负责云南、贵州、四川、西康和西藏。到1954年，所有这些军政委员会都被人民政府取代。

1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中国藏学研究中心，2001: 1。

20. 英国外交部档案，FO371/83325，1949年11月27日收录于南京方面致英国外交部的急电。该急电引自1949年11月25日南京的《新华日报》。

结束了，而西南局刘伯承、邓小平的第二野战军的战斗才刚刚开始。²¹ 西南地区是国民党蒋介石控制的最后一个大区域，国民党仍有差不多一百万军队部署在那里，刘伯承和邓小平到底还需要多长时间才能打败这些军队并不是很明朗。于是，毛泽东向彭德怀发去了以下电报，在电报中他把解放西藏的任务定在了下一年（1950年）：

德怀同志并告贺〔龙〕习〔仲勋〕刘〔伯承〕：²²

……（2）经营西藏问题请你提到西北局会议上讨论一下。……西藏问题解决应争取于明年〔1950〕秋季或冬季完成之。就现在情况来看，应责成西北局担负主要的责任，西南局则担负第二位的责任。

因为西北结束战争较西南为早，由青海去西藏的道路据有些人说平坦好走，班禅及其一群又在青海。解决西藏问题不出兵是不可能的，出兵当然不只是西北一路，还要有西南一路。故西南局在川康平定后，即应着手经营西藏。打西藏大概需要三个军。

如何分配和何人负责指挥现在还难决定。但西北局现在即应于藏民干部准备问题及其他现在即应注意之问题作出计划。你们意见如何，盼告。²³

按照这封电报的要求，西北局领导对武力解放西藏的可行性做了详细的调查。彭德怀找到了军区联络部部长范明，让他来调查这个问题。范明详细地调研了（从清朝到国民党时期的）档案材料，也询问了从青海去西藏的商人，于二十天后向彭德怀报告说，从青海向拉萨进军的后勤保障是极端困难的，而且也很费时。尽管彭德怀已经决定如果毛泽东坚持他还是会接受这项任务，但是基于范明的负面结论，他还是（于1949年11月30日）给毛泽东回复了一封电报。电报中说：

-
21. 刘伯承和邓小平是第二野战军和西南局的领导人。刘伯承，1949年时57岁，是第二野战军司令员。他也是西南局第二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邓小平，1949年时45岁，是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军区和第二野战军政委。
 22. 贺龙是第二野战军第二任司令员和西南局第三书记。习仲勋是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
 23. 引自吉柚权，1993a: 4。

总之由青海、新疆入藏困难是大，难以克服。……如入藏任务归西北，须在和田、于田、玉树屯兵屯粮，修筑道路，完成入藏准备，需要两年。……如入藏归西南军区担任，上述〔西北局的〕藏民群众训练班，将来可能争取部分送二野随军入藏。²⁴

毛泽东此时正在莫斯科寻求与苏联签署一项防卫条约。在那里他收到彭德怀的复电，并花了两天时间思考这个相当负面的答复。最终他接受了彭德怀的建议。1950年1月2日早上四点，他给中央发了一封详细的电报，把解放西藏的任务交给西南局。现在，西北局将只需要发挥第二位的支持作用。

中央、德怀同志，并请转发〔邓〕小平〔刘〕伯承贺龙三同志：

- (一) 德怀同志十二月三十日关于西藏情况及入藏路线的电报业已收到阅悉。此电请中央转发刘邓贺三同志研究。
- (二) 西藏人口虽然不多，但国际地位极其重要，我们必须解放之，并改造为人民民主的西藏。由青海及新疆向西藏进军，既有很大困难，则向西藏进军和经营西藏的任务应确定由西南局担负。
- (三) 既然由西北入藏每年只有五月中旬到九月中旬共四个月的时间可以通行，其余八个月大雪封路，不能通行，则由西康入藏之时间恐亦相同。²⁵ 而如果今年四月中旬至九月中旬不向西藏进军，则须推迟至1951年才能进军。我意如果没有不可克服的困难，应当争取于今年〔1950年〕四月中旬开始向西藏进军，于十月以前解放西藏。为此，建议：
 - (甲) 请刘邓贺三同志于最近期内（例如一月中旬）会商一次，决定入藏部队及领导经营西藏的负责干部等项问题，并立即开始布置一切；
 - (乙) 迅即占领打箭炉（Tartsedo），以此为基地筹划入藏事宜；

24. 引自吉柚权，1993a: 7。

25. 西康是中国一个以康巴藏人为主的省份，在金沙江的东岸，不在达赖喇嘛政府的控制之下，在藏语中叫做康（*Kham*）。除了这一地区之外，康这个名称还包括金沙江西岸的康巴人地区。西康于1938年建省，1955年与四川省合并。首府先是在打箭炉（又称康定），后于1950年代初迁至雅安。

- (丙) 由现在（一月上旬）至西康西藏的接境地区，修好汽车路或大车路，准备于四月中旬开始入藏；
 - (丁) 收集藏民，训练干部；
 - (戊) 闻西藏只有六千军队，而且是分散的，似乎不需要我在上次电报中提议的三个军，而只需要一个充足的军或四个师共约四万人左右的兵力，即已够用，唯需加以特殊的政治训练，配备精良武器；
 - (己) 入藏军队可定为三年一换，以励士气。
- (四) 进军及经营西藏是我党光荣而艰苦的任务。西南刚才占领，西南局诸同志工作极忙，现又给以入藏任务，但因任务重要，且有时间性，故作如上建议。这些建议是否可行，请西南局筹划电复为盼。

毛泽东

一月二日上午四时于远方〔从莫斯科〕²⁶

西南局于1月7日复电，同意担负解放西藏的主要责任，并指派十八军具体领导（这份电文没有找到）。在1950年1月10日，毛泽复电道：

中央并请转刘邓贺及西北局：

- (一) 完全同意刘邓一月七日电之进军西藏计划。现在英国、印度、巴基斯坦均已承认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对进军西藏是有利的。
- (二) 按照彭德怀同志所推四个月进军时间是从五月中旬（我前电写成三个月是写错了，要刘邓贺加紧督促张国华及十八军等部，在时间上是来得及的）。
- (三) 经营西藏应成立一个党的领导机关，叫什么名称及委员人选，请西南局拟定电告中央批准。这个领导机关应该迅即确定，²⁷ 责成他们负责筹划一切，定出实行计划，交西南局及中央批准。西南局对其工作则每半月或每月检查一次。第一步是限于三个半月内完成调查情况，训练干部，整训部队，修筑道路及进军至康藏交界地区。有些调查工作及干部集训

26. 引自吉柚权，1993a: 3。

27. 这个领导机关就是后来的西藏工委（藏语：*phö leydön uyön lhengang*），它是中国人在西藏的管理机构。

工作，需待占领康藏边界后才能完成，并为促成康人内部分化起见，务希于五月中旬以前占领康藏交界一带。

- (四) 关于西北局方面应协助之事项，请西南局与西北局直接遇事商定，并请西北局筹划各项应当和可能协助之事项，指导所属妥为办理。²⁸

1950年1月22日当毛泽东还在莫斯科的时候，在他与斯大林会谈的最后，斯大林问毛泽东还有什么需要谈的，毛泽东很随意地说到他计划解放西藏。毛泽东对莫斯科向中国派遣一个航空团向斯大林表示感谢，并询问是否可以让它“多停留一段时间，以帮助给刘伯承准备进军西藏的部队运送给养”。斯大林回答说：“你们准备进攻，这很好。西藏人需要被征服。”他说他会同军方人员商议航空部队的请求，商议之后再给毛泽东答复。²⁹

与此同时，在四川刘伯承已经在着手组建一支战斗部队。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他需要克服存在于部队中的大量困难。他本来选择第二野战军的第六十二军进藏，因为该部队就在西康地区毗邻西藏的雅安。这种地理上的优势可以方便人员和物资的运输。³⁰但是六十二军隶属贺龙领导的十八兵团，³¹编入第二野战军还没有多长时间。因为这个原因，刘伯承担心如果他选择让六十二军进藏，贺龙也许会认为刘伯承是把别人都不愿意接手的、最困难的任务交给这些“外来户”。刘伯承不愿意这样做。下一支最有可能的部队是他自己的第十军。但是有一个问题，第十军的军长杜义德最近身体很差。于是刘伯承同第二野战军的政委邓小平商量了一下，他们都同意最好是派一名叫张国华的年轻军长来代替杜义德。³²

张国华，1914年出生于江西省，1929年刚满15岁就参加了游击队。两年后入党，并加入红四方面军，参加了长征。1946年11月，他成为豫皖苏地区司令员。豫皖苏地区在当时的各个战区中是最困难、最复杂的。最重要的一点是，这是一个与其他战区隔绝的孤立的游击区，没有后方提

28. 引自吉柚权，1993a: 11-12。

29. “斯大林同志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 1950年1月22日的谈话记录”，引自“冷战国际历史项目”，1995-96: 9。

30. 吉柚权，1993a: 8。

31. 那时的兵团是解放军中大于一个军而小于一个野战军的编制。

32. 吉柚权，1993a: 8。

供补给。在这个地区成为第二野战军的辖区时，张国华成为第十八军的军长，领导十八军立下了汗马功劳。张国华具有丰富的在敌占区工作和开辟新区的经验，这些特点使刘伯承和邓小平感到他是取代杜义德领导第十军的最佳人选。

于是，刘伯承在1950年1月7日给张国华发去一封电报，命令他马上到重庆来。但是刘伯承一发完电报就开始担心，让张国华代替杜义德是否会影响第十军的战斗士气，而使张国华不能有效地领导队伍。最终，刘伯承和邓小平决定不让一名新军长带领第十军进藏，而是让张国华在第二野战军所有的师中挑选三个最好的师去。但是张国华不愿意带领陌生的军官和战士去完成解放西藏这样艰苦的任务，他要求带领跟随自己多年的十八军去。他说既然刘、邓都预期不会有大的战斗，所以尽管十八军的战斗力没有第十军强，但是不要紧，而且十八军有着丰富的在新区工作的经验，这对解放西藏是很有利的。最后刘、邓同意了他的意见。³³

然而，派十八军进藏的决定与十八军普通官兵的期望有着很大的落差，实际上这引起一小部分人的叛逃和混乱。在成都战役胜利之后（1949年12月27日），这支部队得到将会驻防泸州的承诺，而泸州是四川省南部一个富饶而风景秀丽的地区。所以当进军西藏的消息传开之后，大家都感到非常震惊和不快。吉柚权的《白雪》一书对当时的情况进行了详细的描述。《白雪》是根据对一些士兵的采访和一些外界无法接触的原始档案写成的。该书曾短暂出版，但又很快被禁止发行。

全军官兵都〔因为要驻防泸州〕喜气洋洋。战士们都说：“我们十八军吃苦最多，〔第二〕野战军首长都知道，这次专门照顾我们了。”老战士都开始打算盘娶妻安家的事了。

据进藏时任十八军政工部部长……的陈竞波先生说：“进入天府之国四川的时候，我们的任务是接管川南。军长张国华被任命为川南行署主任，……我是秘书长。政治部多数部长都被任命为川南行署的厅局长，部分团政委到县则任县委书记或县长。当时整个部队都有一种动极思静的思想，在物产丰富、风景秀丽的泸州地区安家是干部战士求之不得的事。〔之前〕行军途中，曾有过在贵州下

33. 吉柚权，1993a: 9-10。

地方的传闻，虽然绝大多数干部战士没有到过贵州，但都知道贵州是个贫瘠的地方。据说贵州是‘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两银’的偏僻山区，甚至有的胡乱传说‘贵州山里人长尾巴’。从这样一个地方一下子上升到天府之国，怎么能够不高兴呢？于是每个人都憧憬着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美景，在脑海中勾画出自己想象的蓝图。”整个十八军沉浸在幸福的气氛之中，谁也不会想到一个艰苦的任务〔比如解放西藏〕会落到他们头上。

……

魏克先生回忆说：“我们〔十八军的〕52师带着胜利的欢乐从川西眉山的太和场向川南宜宾进发。部队虽半个多月没有走路了，但因为是凯旋回师，大家走起路来劲头特别足，也感到从来没有过的轻松愉快，每个人都像是去迎接一个即将实现的美好愿望。部队1950年1月4日出发，7日到达了犍为县宿营，8日早上，大家像往日一样，吃罢早饭，正在整装待发，忽然传来一道命令：‘部队今天不出发，停止待命！’开始大家以为是途中休息一天，谁知一些小道消息不胫而走：我们不去宜宾啦，另有新的任务。有的人说什么任务呀，这么紧急，等我们到了宜宾喘喘气不是一样交待吗？为什么还要半路停下来。大家不停地猜疑。一会儿就听说野司发来急电：让师的首长随张国华军长从泸州坐船赶往重庆，去接受新的任务。”……

进藏时任十八军52师师长吴忠将军……说：“情况来得太突然，毫无思想准备，一时议论纷纷，种种揣测在部队中流传：要军师两级首长去重庆接受任务，可见这任务非同一般，什么任务？到成都担任城市警卫吗？不像。我们刚离开成都，而且那里也用不了一个军；接管西康吗？也不像，听说这个任务已交给从西北南下的十八兵团了；有人拿着刚学过的新华社1950年元旦社论琢磨开了。社论讲了1950年的任务，第一条是‘解放台湾、西藏、海南岛，完成统一全中国的大业’。很明显解放台湾、海南岛主要是三野、四野的任务，那么解放西藏呢？会不会落到我们的头上呀？大家越分析越有理。有的机关干部沉不住气了，跑来问我：‘师长，能不能给我们透一点风呀？早点给我们吃定心丸算了。’”

十八军军师领导从重庆回来，进军西藏的任务一公开，十八军就乱了套，吴忠将军回忆说：“反应十分强烈，弯子实在转得太急。许多问题急待解决，比如干部家庭、婚姻等方面都有不少实际

问题。过去连年征战，根本无暇考虑，无法解决。打败了蒋介石，眼看一些问题有望解决了，这一进西藏又全都顾不上了。不说别的，连通封家信都不容易。进军西藏虽然没有大仗硬仗可打，但都是‘苦差事’。思想工作任务实在艰巨。过去进军大别山条件那样艰苦，也没有出现这种情况。”

干部对下级做工作都不好做，原西藏军区副参谋长吴晨将军说：“一六零团长……对他的部下打保票说，你们该找对象的可以找了，想结婚的也可以做准备了，这次我敢保证川南安家已安定了。想不到我们会在天府之国息养终身，这就是先苦后甜，这次如果要再走，你们就骂我是个混蛋。没有想到几天后十八军进军西藏的任务下达了，这个团长拍着脑袋说：‘我操他娘的，老子从此不作动员啦。’”

另据原西藏军区政治部主任刘振国先生说：“从各部队汇报的情况来看，当听说我们军要进军西藏，许多人感到很突然，特别是那些在胜利形势下准备进城享乐，脑子里早已‘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的同志抵触情绪较大。埋怨上级把最艰苦的任务交给我们，甚至说什么这下可从天府之国打入地狱了。有一些人开始闹情绪睡大觉，小病跑医院，要求下地方工作，一句话，怕进藏。”

部队的病号一天比一天多了，“病得卧床不起”的与日渐增，到了开饭时间没有人来吃饭。连长、指导员急了，下命令叫司务长搞好伙食，发挥司务长这个半个指导员的作用，伙食标准一下提高了。嫩白的豆腐、肥嘟嘟的猪肉一盆一盆地端出来，五菜一汤，看都没人看。牢骚话充满军营，连长喊不动排长，排长喊不动班长，班长喊不动士兵。有个连队的连长，为了做好思想工作，想杀猪改善伙食，从排里派四个公差来杀猪，从早上到下午公差硬是不来。连长把那个排长找来，说：“你这个排长是怎么当的？叫派几个公差，一天也派不来。”排长说：“我叫不动。”连长说：“当排长连个兵都叫不动，你还算什么排长，你这个排长干脆别给老子当了。”排长说：“我正不想干哩，你有本事你去叫来。”连长说：“叫就叫，叫来了你给老子坐三天禁闭，是派的哪几个？”排长告诉了他。他跑到排里，想把排长派的几个战士喊起床出公差。几个战士用被子蒙住脑袋，理都不理。连长急了，说“老子枪毙你们。”战士们一下翻身坐起来，齐声吼：“你枪毙谁？”连长一看这阵势，愣了，说：“好好好，你们睡你们睡。”他只好带着几个排长亲自杀猪给战士们吃，边杀边说：“反了反了。”有的战士把进藏称为“进葬”，

说老子打日本、打老蒋没丢命，这下要“进葬”了，要把这条命丢进西藏，这一下算是完了，有的人一提到这“进葬”就呜呜直哭。

接着这支打日本、打老蒋一直是硬得嘣嘣响的十八军开始出现了让干部们不可思议的事。在打日本、坚持豫皖苏挺进大别山斗争那么艰苦、那么残酷都从未有过逃兵的部队开始有逃兵了，而且越来越多，严重的一个班就只剩下班长、副班长这一对空架子。各连连长慌了，指导员慌了，天天晚上不敢睡觉，轮流值班看着战士们。营长急了，团长急了，他们手中的兵一天天少了，下一步要打仗，没有兵拿什么打。时时都往连里打电话，天天晚上要连里上报当天的逃兵数……

逃兵的增多，十八军的头头们急了，张国华这个军长急了，他气得拍着桌子说：“这些兵真坏，这些兵怎么这么坏，这些兵为什么要这样坏？都给我抓回来！”

于是各部队行动了，组织了强有力的抓逃兵队伍，全由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骨干力量组成，称为“抓兵队”，大部分逃兵被抓回来。被抓回来的逃兵，干部们对他们决不采用内部矛盾处理。首先脱去上衣，用棕绳五花大绑，受这种捆绑的人时间久了大都受不了，哭爹叫娘，一个劲地求连长饶命。干部则挽着衣袖，提着皮带，高着嗓门，咬牙切齿，横眉瞪眼地怒吼：“老子看你还跑不跑？”说到愤怒的时候，皮带就噼噼叭叭地抽在逃兵那勒得青肿的手臂上、屁股上。这一道“弄”过了，接下来就是接受批评，接受教育，作自我检讨，写检查，写反省，之后就算是痛改前非，重新回到革命队伍，要立功赎罪，重新做人了。

不仅战士中有逃兵，干部中也有公开提出不进藏的了。如一表人才、文文静静、有知识、聪明能干的原十八军炮兵营政委，进驻贵阳时宣布为52师154团副政委，张国华准备重用、要提拔为政委的刘结挺，第一个向张国华、谭冠三提出身体不好，不愿进藏。

张国华气得把下唇都咬出血了，一个劲地说：“这刘结挺太坏了，想不到他会有这么坏，他为什么会这么坏。”

谭冠三更是气得怒发冲冠，拍着桌子、口水四溅、破口大骂：“他不去？能由得了他？给我把他捆来！不去？捆，我也要把他捆到拉萨。他走不动？我把他捆在马尾巴上拖死，拖成碎片也要把他拖到拉萨。”

张国华、谭冠三强硬起来了。刘结挺……被谭冠三捆了回来。十八军进入大整顿。……

〔1950年〕1月27日至30日，十八军召开了由师以上党员干部24人参加的军党委扩大会，提出无论如何要坚决完成进军西藏这一神圣的历史重任，要把五星红旗高高地插在喜马拉雅山上。……

接着，十八军又在全军以师为单位召开“挺进祖国边疆西藏动员大会”，军领导分别参加各师的动员会。张国华参加52师于2月5日至10日……的进藏动员会。在张国华的心中，52师是他进军西藏的主力，这个师的思想工作不彻底做通，将会对他进军西藏带来很大的影响。于是，他不但参加这个师的动员会，而且亲自作了两个小时的动员工作。

……

2月9日，张国华又对52师全体官兵作了充满人情味的动员报告。他说：“个人老婆问题的解决，有句老话，叫做‘自古美人爱英雄’，我们去完成解放西藏这一伟大的历史任务，可以说大家都是英雄。我们只要好好学习，努力工作，精神愉快地去完成进军西藏的任务，找个老婆是不成问题的，不管是农村还是城市的姑娘都会爱你们的。有人提出能不能和藏族姑娘结婚，大家都知道，在一千多年前的唐朝，就有文成公主和金成公主先后与西藏王松赞干布和赤德祖赞结了婚。现在我们到了西藏，也可以同西藏姑娘结婚，而且藏族姑娘都非常勤劳和善良，也很漂亮。结婚条件，过去由于战争环境的限制，应当严一点，一两年后，我们国家实行薪金制，条件就会放宽，就可以允许干部带家属。战士的婚姻问题，随着义务兵役制，也就很好解决。必须看到，我们这次进军西藏不同于红军长征，那时我们是作战略转移，蒋介石派兵在前面堵截，后面追击，天上飞机跟着轰炸。而这次有全国人民支援，还有苏联人民的支援和帮助，比长征时的条件好上千百倍，比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也优越很多，我们的装备和供应将是建军以来从来没有过的。我知道还有一些老一点的同志不想去，认为胸前已经有了两三枚光荣纪念章，就想躺在光荣上面睡大觉，不想再前进了，这是不对的，干部要起带头作用，所有的人思想都要通，要高高兴兴地去西藏。”

张国华的两次动员报告印发到全十八军贯彻传达。³⁴

34. 吉杓权，1993a: 18-25。

渐渐地，十八军的领导们重新控制住了队伍，鼓舞起进藏部队的士气。吉柚权在《白雪》中说：

十八军又沸腾了……这时，决心书、血书像雪片一样飞到连长、营长、团长手中。连那些逃跑被抓回来的，也跑到领导面前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坚决要求去西藏，身体瘦弱的就更加坚决地要求进藏，……十八军“川南安家”的弯子终于转过来了。³⁵

中国的军事准备也包括西北局的一支骑兵部队。这支骑兵部队虽然数量不多，但是最终却在昌都战役中立下大功。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在整个1950年代，西北局处理西藏问题的观点和西南局的截然不同，来自这两个方面的领导人之间的冲突，使得在整个1950年代里中国共产党驻防在西藏的组织麻烦频出，这一点将会在以后的章节中详述。

■ 统战工作

1950年春季和夏季，在军事准备正在进行的时候，中国也在尽力说服达赖喇嘛派代表去北京谈判。³⁶ 共产党派了一些来自已经占领的外藏藏族传统聚居区〔在西康和青海省，即康和安多（Amdo）〕的著名喇嘛和头人到拉萨去，试图向拉萨的官员保证不会损害西藏的宗教和寺院。

西南局的藏族干部平汪回忆说：

我们一直在做两方面的准备。一方面，我们组织军事进攻，另一方面，我们尽力去说服西藏政府接受和平解放。我们派出像格达活佛（Geda Trulku）这样的宗教领袖去昌都同当时在昌都的拉鲁谈……。我也去见了邦达多杰（Panda Tobgye），要他说服他的兄长绕嘎（Raga）也去昌都设法影响拉鲁。³⁷

35. 吉柚权，1993a: 26。

36. “统战工作”指中国共产党在无党派人士和少数民族中为党的事业和目标寻求扩大共识的政策，由共产党的统战部负责。

37. 引自戈尔斯坦、道韩喜饶和司本石初，2004: 138–39。

另外，西南局散发了一份有十条内容的文件，其中有几条描述了和平解放协议可能的内容和形式。这份由西南局起草的文件，重要之处就在于它体现了毛泽东解决西藏问题的思想核心。这个核心可以理解为“渐进主义”策略。这份文件包含以下内容：

- (一) 西藏人民团结起来，驱逐英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家庭来。
- (二) 实行西藏民族区域自治。
- (三) 西藏现行各种政治制度维持原状概不变更。达赖活佛之地位及职权不予变更。各级官员照常供职。
- (四) 实行宗教自由，保护喇嘛寺庙。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
- (五) 维持西藏现行军事制度不予变更，西藏现有的军队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武装之一部分。
- (六) 发展西藏民族的语言、文字和学校教育。
- (七) 发展西藏的农牧商业，改善人民生活。
- (八) 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完全根据西藏人民的意志，由西藏人民采取协商方式加以解决。
- (九) 对于过去亲英美和亲国民党的官员，只要他们脱离与英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关系，不进行破坏和反抗，一律继续任职，不究既往。
- (十) 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巩固国防。人民解放军遵守上列各项政策。人民解放军的经费完全由中央人民政府供给。人民解放军买卖公平。³⁸

可以看出，毛泽东的渐进主义策略把实用主义置于意识形态之前，包括两个主要的目标。毛泽东现时的目标是引诱达赖喇嘛接受西藏和平解放的协议。为了达到这一点，正如上面文件中指出的，可以允许西藏至少在某一特定的时期里，作为一个自治地区在很多方面和过去保持一致。根据这个文件，达赖喇嘛所领导的神权政体虽然和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不一致，但是仍将被允许继续像过去那样运转。类似地，共产党不会寻求强推

3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中国藏学研究中心，2001: 20-21。这一文件的内容在1950年5月27日得到中央的同意。

改革，例如，不会通过社会主义土地改革结束人剥削人的封建制度，所有的改革只有在得到达赖喇嘛和西藏人民的同意之后才可以实施。此外，西藏还拥有信仰自由，寺院也将得到保护。以上这些就是毛泽东手中的“胡萝卜”。

毛泽东的长远目标是通过一种能促成合作和友谊的方式将西藏并入。用现在的话说，这个长远目标就是争取让西藏人民成为新的多民族中国的忠诚公民。考虑到1950年西藏对待中国的态度和它的政治现实，策略的核心要集中在争取贵族和宗教精英上，特别是要争取达赖喇嘛。然而，争取这些精英要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远远不是开开会、读读宣传稿就能解决问题的，它要求解放军方面要有正确的行动，要渐进地、慢慢地发展西藏人同“新汉人”（藏语：嘉萨巴，*gyami sarpa*）的合作关系。解放军自称“新汉人”，因为他们宣称他们的到来是为了帮助西藏实行现代化，帮助西藏人发展，而不是来剥削和压迫西藏人的。到了一定的时候西藏最终会在行政上同中国的其他地区合并，会经历社会主义改革，但不是马上。因此毛泽东要求在西藏的中共干部对改革不能太急切，在做工作的时候要慢一点、稳一点。虽然让封建的世俗和宗教精英继续掌握实权是有风险的，但是没有失去西藏的风险，只要中国军队留在那里就不会有这方面的风险。把西藏人争取过来的长远利益是如此之诱人，以致毛泽东愿意作出非常大的让步。这是精明的决策，牺牲了短期利益（允许神权政府和封建农奴庄园继续存在），但是赢得了国家的长远利益（西藏人民真心实意地接受作为中国一分子的事实，并且自己得出结论要实施改革）。

与此同时，正如前面所说，“大棒”也还在那里。这个大棒就是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人民解放军。1950年夏天，十八军开始在高海拔地区加强训练。同时，西南局开始了大规模的筑路工程，从已经控制的西藏以外的藏族地区（在康区〔西康〕）向西藏修筑公路，并且雇佣的是藏族人。如果胡萝卜政策失败了，就让这些藏族人用牦牛为进军部队运送给养。平汪当时负责组织康区的运输工作，据他回忆，当时这项任务并不困难。“人人都很乐意从事这项工作，因为解放军付给他们大洋。”³⁹ 通过以上的努

39. 引自戈尔斯坦、道韩喜饶和司本石初，2004: 138。

力，毛泽东给达赖喇嘛和他的精英们列出了两个选项：要么通过谈判和平地并入中国，要么通过战争被强行并入中国。



图 1：十八军为昌都战役做战前训练，1950 年西康。照片来源：陈宗烈

第二章

西藏视角：接触中国共产党

西藏政府方面也在执行着一种双轨策略。一方面，它把主要的努力集中在寻求外交和军事援助上，意图维持它实质性的独立。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它向英国、美国等西方国家发出呼吁，同时亦加强了在西藏与中国边界地区（在东藏）的军事部署。¹ 例如在 1949 年 11 月，它决定派遣三个高规格的代表团到美国、印度、英国和尼泊尔去通报其危急的处境，并寻求帮助。

另一方面，它也决定同中国接触，因此派了第四个代表团到中国去。² 这个代表团于 1950 年 3 月 7 日到达噶伦堡，为首的是孜本夏格巴和僧官敏珠布·土登杰波（Mindrubu Thubden Gyebo），他们受命就四项议题进行磋商：³

1. 那封没有得到答复的西藏外交局给毛泽东的信〔前面引用过的 11 月 2 日那封信〕；
2. 在西宁和北平〔北京〕的充满威胁语气的广播声明；
3. 要求中方保证不侵犯西藏的领土；
4. 通知中国政府，西藏政府不会容忍任何干涉达赖喇嘛统治的行为，他们会保持自己的独立。

-
1. 西藏人称东藏为康，是藏族人中的康巴人居住的地区。在这段历史时期里，康巴人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属于中国直接统治下的西康省，另一部分属于西藏政府统治，由拉萨的一位高级官员管理。这位官员被称为朵麦基巧（*domey jigjab*）或东藏总管，驻扎在昌都城。但是要注意，昌都这个名称在口头上和文件中经常指整个东藏的大片行政区域，而不仅仅是指昌都城。
 2. 对这些努力的详细论述见戈尔斯坦，1989: 625–37。
 3. 派往中国的代表团成员还包括车仁札萨（Taring Dzasa）和达拉·平措扎西（Takla Phüntso Tashi），他们分别担任英文翻译和中文翻译。

代表们受命在邻近中国的某个地方同中方代表磋商以上四个议题。⁴

这份内部指令表明，中藏双方领导人在认识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西藏与共产党的接触首先是通过达赖喇嘛的兄长嘉乐顿珠（Gyalo Thondup）的关系达成的。因为嘉乐顿珠的岳父（朱绶光）是国民党退休将领，同新的共产党政府有着紧密的联系。⁵ 为了答复一封来自朱绶光的信，西藏代表团致电拉萨，并于4月8日收到政府的指示。这份指示授权他们告诉中国人派一个全权代表到一个靠近中国的地方会面。为此，中国人通过朱绶光答复他们，会派一个人去香港同这个代表团的成员见面，并要西藏政府的代表必须尽快赶到香港。中国人同时声明，这些代表不能以外国人的身份到香港。⁶ 在与印度的英国外交官的交谈中，夏格巴把这个中国人称为“向导”，而不是实际上的谈判代表，暗示他只不过是来把他们带到中国去。⁷ 印度驻拉萨代表处的首脑向新德里报告了这次接触的过程：

嘉乐顿珠为了解决中藏问题通过信件联系了他的岳父，他还想同西藏代表团一起去中国。相信朱先生已经告诉过他，西藏政府不应当向英国和美国派遣代表团，而如果西藏派遣代表团到北京，西藏问题的解决将会更有利于西藏。

-
4. 夏格巴，1967: 299–300；夏格巴，1976: 412–13。选择由夏格巴带领这个代表团只是打卦的结果，而不是出于夏格巴本人的意愿。夏格巴实际上并不想去中国，因为他在1948年的时候欺骗过中国人，那一次他是在北京，和秘密取道北京去美国的商务代表团在一起（此事见戈尔斯坦，1989: 582, 627）。
 5. 嘉乐顿珠在一次视讯采访（在达赖喇嘛位于加州的私人办公室里，时间是1991年）中说，1949年解放军的总司令朱德元帅送了一封信给他，信中说：“请把以下内容转达给西藏政府噶厦：请同新的中国共产党政府联系，中国共产党并不想改变达赖喇嘛的政治权利和西藏的现状。请派一个代表团到中国来，和我们展开对话。”嘉乐说他将这封信的内容汇报给了堪穷土登桑颇（Thubden Sangpo）。土登桑颇此时正按照噶厦的命令在噶伦堡向噶厦报告外国的情报。如果这一时间没有错的话，这件事应该发生在1950年1月1日中国人公开宣布要解放西藏之前，并且很可能发生在1949年11月23日毛泽东联系彭德怀之后。这应该是毛泽东的渐进主义策略的最早例证。
 6. 夏格巴，1976: 413。
 7. 英国外交部档案，FO371/84468，由英国驻加尔各答的副高级专员通过电报向德里的高级专员提交的报告，内容是关于跟夏格巴的会谈。

到中国去的西藏代表团正在途经印度的路上。据我们所知，西藏人打算同中国人在香港或者新加坡谈判的决定还没有改变。⁸

在西藏代表团安排签证和兑换外汇事宜的同时，他们派代表团中的两个人先行一步做前导工作，但是这两个人却在加尔各答机场被禁止登机。⁹他们被告知，英国人认为他们所使用的签证是无效的。而且让他们感到奇怪的是，英国人不给他们换发新的去香港或者新加坡的签证。经过几个月艰难的交涉后，这些西藏人决定接受英国人的建议，在印度举行谈判。夏格巴把这个决定通报给了中国人。据他说，中国人告诉西藏代表团留在印度，等候与1950年9月初到新德里的中国新任驻印度大使谈判。¹⁰但是其他一些档案资料表明，中国人似乎打算在北京举行真正的谈判，在新德里安排的会谈仅仅是初步的对话。¹¹

在北京方面，毛泽东并不确定西藏人会不会真的来谈判。即使他们最终来了，毛泽东也不愿意让这种不确定性延误其他方面的准备，使解放军失去在1950年发起进攻的最佳时机。因此，在9月份即将到来的时候，毛泽东指示周恩来通过印度政府和在新德里的中国大使馆向西藏方面施加压力。关于此事他在给周恩来的首封信件中写道：

恩来：

请注意进攻昌都的时间。请考虑由外交部适当人员向印度大使透露，希望西藏代表团九月中旬到达北京谈判。我军就要向西藏前进了，西藏代表团如有诚意，应当速来，并请印度政府予该代表团的旅行以可能的协助。

毛泽东

八月二十九日¹²

-
8. 英国外交部档案，FO371/84453，截止1950年3月15日的印度驻拉萨代表处的月度报告。
 9. 夏格巴，1976: 413。
 10. 夏格巴，访问记，1983，纽约市；夏格巴，1976: 413-14。对于英国人所作出的决定的详细描述也可见戈尔斯坦，1989: 644-75。
 11. 美国国家档案馆，793B.00/8-2350，1950年8月23日美国驻印度大使发给美国国务卿的电报。内容是关于美国大使同印度外交部部长的会谈。在这次会谈中，印度外长向美国大使通报的情况与此处一致。这个情报是印度驻华大使从中国人那里听来的。
 12.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科研处主办，1993: 7。

同一天，毛泽东还指示周恩来联系在新德里的大使馆。

恩来：

去电申健，叫西藏代表团马上动身来北京。¹³ 电中请说明希望该代表团接电后迅即动身乘飞机至香港，转乘……火车，九月中旬到达北京。

毛泽东

八月二十九日¹⁴

西藏代表团在数天后的9月4日回到新德里，并于1950年9月6日会见了使馆的临时代办申健（因为新的大使还没有到任）。西藏人说，他们已经做好了谈判的准备，只要大使一来就可以开始。同时他们要求北京在会谈的同时不能对康区（昌都）采取行动。申健告诉他们，谈判必须在北京举行，而不能在印度，而且他们必须于9月中旬之前赶到北京。

两天之后的9月8日，代表团会见了印度总理尼赫鲁（J. Nehru）。在长达两个多小时的会谈中，代表团表示希望能得到他的帮助，但是会谈进行得很不顺利。这些西藏人告诉尼赫鲁，除非中国事先同意西藏独立，否则他们不会去北京。他们还说他们不相信中国人，要印度为西藏和中国谈判的任何结果作担保。尼赫鲁答复道，印度将会继续奉行一贯的政策，即在表面上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同时承认西藏内部自治。但是他也很坦率地说，如果代表团坚持西藏完全独立，那么与中国人达成协议将会是非常困难的。他补充说，“要印度作协议的担保，那是三十年前的老话题，在今时今日已经行不通了。”¹⁵ 这些西藏人马上表示反对，说1914年英国和西藏签订的《西姆拉条约》就是西藏独立的证据。尼赫鲁马上打电话给外交部，让他们去查查是否《西姆拉条约》里真的有这样一项条款规定了西藏的独立。通完电话，他有点生气地答复说：

并没有这样一项条款，而且中国也从来没有接受过《西姆拉条约》。

中国人认为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西藏人心想正是因为中国不承认

13. 申健是中国驻印度大使馆的临时代办，不久之后他成为政务参赞，负责处理西藏代表团途经印度前往北京的各种问题。

14.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科研处主办，1993: 7。

15. 夏格巴，1976: 418。

《西姆拉条约》，所以西藏就是独立的。但是那时西藏人却没有以任何清晰明确的决定或行动宣示其所谓的独立，这是错误所在。后来，你们有了时间和机会来做〔关于“独立”的〕事，但是你们却什么也不做，这是你们的另一个错误。而此间中国人的行动却是非常聪明的，他们在国际社会广泛宣传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的主张。所以现在，各位代表，当你们开始同中国人谈判的时候，必须要非常小心〔你们的言论和主张〕。¹⁶

同尼赫鲁会面之后，夏格巴一行又拜会了英国驻印度公使罗伯茨（F. Roberts）。和同尼赫鲁会谈时一样，他们期望英国帮助他们对付中国人。但是英国人告诉他们，从1947年印度独立开始，英国对西藏的所有责任都转移给了印度政府。¹⁷

第二天，夏格巴一行又拜访了美国大使馆。卢瓦·韩德逊大使（Loy Henderson）在报告中说：

夏格巴称西藏政府已经下定了决心，要用武力反击中国共产党的一切侵略行径。他说他的政府希望他对美国提供的军事援助表示深深的感谢。¹⁸ 西藏政府将会遵照建议接触印度政府以求得其给予配合。西藏政府已经从拉萨派遣了另一个由索康代本和堪穷洛桑泽旺（Lobsang Tsewang）组成的代表团，过不了几天就会到达新德里。为了减轻外界的怀疑，这个代表团被称为商务代表团，但是其真正的目的是传达拉萨政府的指示，同时跟印度政府磋商军事援助的相关问题。关于需要追加援助的武器种类和数量的详细信息大概会由他们带过来。到目前为止，夏格巴还没有同印度政府提起这件事……对于西藏政府在即将展开的谈判中想要达成的目的，夏格巴起先不愿意做明确的说明，但是最终他说西藏政府要的就是独立。¹⁹

16. 夏格巴，1976: 417–18。

17. 英国外交部档案，FO371/84469，1950年9月8日与西藏代表团的会谈内容。

18. 在8月初，美国政府答应为了帮助西藏，会提供“战争物资和财政”援助，但是不会向西藏提供军队。不过，与此同时美国称，印度的合作对物资的有效运输是至关重要的。所以他们敦促西藏人首先询问印度政府会不会给西藏政府提供另外的援助，如果印度拒绝（这是可以预料到的），那么就要求他们允许西藏把从海外获得的援助通过印度领土运进西藏（美国国家档案馆，693.93B/8–750，1950年8月7日美国驻印度大使给美国国务卿的电报；也可见戈尔斯坦，1989: 669–71）。

19. 美国国家档案馆，793B.00/9–1050，1950年9月10日美国驻印度大使给美国国务卿的电报。

一个星期之后的9月16日，代表团终于见到了新任的中国驻印度大使袁忠贤。夏格巴在他的书中说，西藏方面一开始就反复申明西藏的传统地位。“西藏将会像现在这样保持独立，我们也将继续与中国保持亲密的‘供施’关系。当然，不需要你们从帝国主义手上解放西藏，因为这里没有英国、美国或者国民党的帝国主义者。统治和庇佑它的是达赖喇嘛（而不是外国强权）。”²⁰

袁忠贤大使答复说不会同西藏人谈论西藏独立的问题，但是如果西藏真的没有受到外国势力影响，他会感到很高兴。接着他给了他们一份小册子来解释中国政府的政策，并告诉他们仔细阅读第50到第53条。²¹他还告诉他们中国政府认为有三点很重要：（1）西藏必须承认其为中国的一部分；（2）西藏的防务必须交由中国管理；（3）与外国有关的所有政治和贸易事务必须通过中国处理。大使称如果西藏接受这些条件，解放军将会以和平的方式解放西藏，否则解放军将会以武力解放西藏。

这些条件远远超出了夏格巴受命处理的范围，所以他告诉袁忠贤大使他需要请示西藏政府。他要求袁忠贤保证在他们代表团获得答复之前，中国军队不得改变边界现状。²²袁忠贤并没有给予他们想要的保证。实际上，他只是一再强调西藏代表团在9月底之前到达北京是非常重要的。²³

三天后，夏格巴代表团给噶厦发了一封电报，报告了代表团同印度政府及中国大使的会谈内容，并请求指示。²⁴夏格巴代表团报告说，西藏政

20. 夏格巴，1976: 419。

21. 夏加 (Shakya) 在书中说，它实际上照搬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前身——“共同纲领”。第50至第53条是关于少数民族问题的（夏加，1999: 446，注释141）。

22. 夏格巴，1976: 419–20。

23. 没有找到中方关于这次会晤的文件。但是印度前情报局局长在书中说，中国人告诉他们西藏代表团应该在9月底之前到达〔莫里克 (Mullik)，1971: 66〕。中国人在1950年11月16日给印度政府的一份照会中也说他们已经把这一点告诉了西藏人〔引自卡莱尔 (Carlyle)，1953: 550–51〕。

24. 关于电报的拍发问题，西藏在1950年有一个规模很小但可以使用的通讯系统。操作人员是尼泊尔人、印度人以及英国人。电报可以从西藏政府在拉萨的电报局或者从设在拉萨与昌都之间或者东藏偏远地区的无线电基站发送到江孜、拉萨、亚东和印度。另外，在1950年一段很短的时间里拉萨曾经建立一个广播站（西藏电台）〔见 www.tibet.com/Status/kazi.html，“对索朗·托结·卡日先生 (Sonam T. Kazi) 在中国人入侵之前的西藏之旅的简述”〕。

府如果不作出一定的妥协就很难同中国人达成协议，并且他们明确建议西藏应该至少在名义上接受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他们还建议西藏争取保留同印度和尼泊尔等国在贸易和文化上的联系，而由中国管理它与其他国家的政治关系。对于中国准备在西藏驻军的（保卫边界）问题，西藏应当提出，由于没有什么潜在的威胁，所以西藏自己的军队就可以胜任。将来假如有来自印度或尼泊尔的威胁，西藏自会寻求中国的帮助。²⁵从实质上说，夏格巴和土登杰波建议西藏政府部分地接受袁忠贤大使提出的第一点，拒绝涉及到武力占领的第二点，而部分地接受第三点。

然而，过了十二天之后西藏政府还没有打算好是否妥协。于是他们在9月28日通知夏格巴说他们还没有作出决定。他们在给夏格巴的电报里解释说这些问题对西藏非常重要，既然中国人誓言要满足这些条件才肯罢休，他们就不得不逐条详细地讨论这些条件，等他们有了结论再告诉代表团。同时，他们告诉代表团成员尽量同中国人谈，以维持友好的关系。²⁶换句话说，他们指示夏格巴拖住中国人，直到西藏政府作出决定。

很多天过去了，中方还没有得到答复，于是他们开始担忧和不耐烦了。前面已经提到，如果冬天向西藏发起进攻，部队就可能会遭受暴风雪的阻挡，或者可能因为道路不通长达数月而被切断供给。这就意味着必须在1950年夏天和秋天（中国人觉得最迟应当在10月发起进攻）的时候展开攻势，不然的话就要等到1951年。后者在策略上来说毫无优势，因为没人敢说西藏政府不会利用多出的时间来寻求国际支持，或者更有效地备战，甚至同时采取这两种措施。因为这个原因，中国人在9月16日的会谈之后又多次联络夏格巴和代表团的其它成员，询问他们是否收到拉萨的回复。

于是，在28日刚收到噶厦的电报时，西藏代表团立即赶往中国大使馆，继续运用拖延战术。他们按照西藏政府的指示编了一个谎话，说拉萨仍然在等待从印度通过马匹送过去的详细信件（因为电报通信在西藏很不发达），所以收到噶厦的答复可能还需要几周的时间。没有记录表明中国人说了什么，但是一定把这些西藏人吓坏了。因为在9月30日，他们又

25. 夏格巴，1976: 421。

26. 夏格巴，1976: 421。

给拉萨发了一份电报催促政府表态。他们说，中国大使不断地催促他们给答复，如果拉萨再拖久一点，战争可能就要在边界爆发了。如果事情真的发展到那个地步，即使代表团马上去北京也于事无补了。所以他们催促拉萨尽快给个答复。²⁷

在同一天，西藏政府终于通过电报通知夏格巴，政府规模最小的民众大会已经决定，接受袁忠贤的三点条件将会令事情无法挽回，因为这样做就意味着西藏将失去所有的政教权利。另一方面，西藏政府在电报中说，中国的军事很强大，在边界聚集了很多军队，所以很难拒绝这些条件，所以他们指示代表团继续采用拖延战术，希望能延迟中国人的进攻，直到拉萨可以重新估计世界形势，并且召开全体民众大会。在印度的西藏代表团对这种拖延策略感到失望甚至是绝望，他们觉得这不仅使他们处在尴尬的境地，更重要的是可能会使中国人提早进攻东藏。代表团成员们几乎马上就回复了电报，说虽然他们知道这个决定对西藏至关重要，但是可以拖延的时间已经没有了。他们说，国际形势不会改善，所以拉萨应该立即给予答复。²⁸

在此期间，噶厦派出磋商军事援助的“商务代表团”于10月4日到达德里。但是正如夏格巴担心的那样，已经没有时间了，毛泽东决定不再等待，命令十八军向昌都发起进攻。10月7日，解放军从多个地点渡过金沙江（实际的边界），开始了多路进攻。²⁹

但是从一开始，这次进攻的目的就不是要完全击垮西藏。中国的计划是用闪电战的方式由五路进攻，包围和俘虏部署在昌都的藏军。³⁰他们认为这会在心理上给拉萨的西藏政府和驻防卫藏的藏军以极大的震慑，迫使拉萨派代表到北京来谈判。昌都战役的本质目的是诱使达赖喇嘛接受和平解放。毛泽东认为这对中国的长远利益非常重要（当然也排除了进攻卫藏的需要）。毛泽东在8月23日就军事进攻给西南局的指示也表明了这一点：

西南局，并告西北局：
八月二十日电悉。

27. 夏格巴，1976: 421-22。

28. 夏格巴，1976: 421。

29. 对于这次战役的详细论述见戈尔斯坦，1989: 648 页及以后几页。

30. 一个战斗口号说“再苦再难也不放走一个藏军”。

- (一) 你们力争今年占领昌都并力争留三千人巩固昌都的计划是好的，你们可以照此作积极准备，待本月底下月初判明公路已通至甘孜无阻，即可实行进军，期于十月占领昌都。这对于争取西藏政治变化及明年进军拉萨，是有利的。
- (二) 现印度已发表声明承认西藏为中国领土，惟希和平解决勿用武力。英国原不许西藏代表团来京，现已允许。如我军能于十月占领昌都，有可能促使西藏代表团来京谈判，求得和平解决（当然也有别种可能）。现我们正采争取西藏代表来京并使尼赫鲁减少恐惧的方针。

西藏代表到京时，我们拟以既定的十条作为谈判条件，争取西藏代表签字，使十条〔声明〕变为双方同意的协定。果能如此，则明年进军拉萨会要顺利些。你们于占领昌都后只留三千人在那里过冬，今年不进拉萨，并将主力撤回甘孜，在西藏方面看来，可能觉得是我们在向他们表示好意的一项措施……

毛泽东

八月二十三日³¹

解放军在昌都的军事行动取得了彻底的胜利，很快就完全占领了昌都。而且，当藏军自昌都撤退的时候，一支来自青海的骑兵部队迅速南插至昌都以西，截断了通往拉萨的惟一去路，俘虏了几乎所有从昌都逃出来的藏军。实际上，败逃的藏军人数比这支骑兵部队要多，但是昌都总管阿沛（Ngabö）已经失去作战的意志，没有尝试强行冲过去。当得知有一小队解放军已经到达前路时，他和身边所有的藏军停止了撤退，径直坐了下来等着被俘虏。这一天是10月19日。

就这样，在进攻开始的十二天之后，驻守昌都的藏军战斗力被彻底摧毁了，通向拉萨的道路也被解放军打开了。但是解放军遵照毛泽东的命令，没有乘胜向卫藏进发。相反，他们停了下来，让北京有机会说服西藏的领导层开始实质性的谈判并同意和平解放。³²

31.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科研处主办，1993: 6（划线部分为强调）。

32. 详细的讨论见戈尔斯坦，1989: 638–773。需要注意的是，经过这次战役，一些解放军的小分队逐渐前进到洛隆宗（Lho dzong）和边坝（Pambar）（昌都以西），而藏军士兵和官员则撤退到更往西的工布（Kongpo）和拉萨地区（见拉鲁，1993: 246–47）。

在印度的夏格巴直到 10 月 17 日才收到昌都战事的消息，这已经是进攻开始之后的第十天，再过一天阿沛就要率部逃离昌都城了。这时候，拉萨通知夏格巴昌都不久就要陷落，要夏格巴立即接触中国大使，设法要他阻止解放军对西藏进一步的进攻。³³ 夏格巴马上去会见袁忠贤大使。他谴责中国公然无视国际法则，在和平谈判正在进行的时候突然发起进攻。³⁴ 袁忠贤大使毫不含糊地予以驳斥。他告诉夏格巴进攻的责任全在西藏政府，因为它没有授权代表团到北京去谈判。夏格巴在书中记录了袁忠贤大使和他说的话：

我们也知道昌都的战事。我们给了你们时间作出答复，但是已经过去差不多一个月了，所以我们没有违反任何规则。不管全世界的人怎么说，反正我们是已经下定决心要解放福尔摩沙和西藏。现在你们如果接受西藏作为中国一部分的事实并马上派代表去北京，就不会遭受进一步的军事打击。³⁵

整个昌都守军全军覆没和总管阿沛及以下的所有拉萨官员可能被俘虏的消息起到了中国人所希望的作用，即重挫西藏政府。³⁶ 虽然在昌都和拉萨之间还有几个代本团完好无损，但是很明显他们缺乏训练，也没有有效的管理。西藏人没有利用游击战打击解放军的补给线并以此对抗中国人的具体计划，而且也没有立即着手制订这样一个计划。在过去的三十年里，保守的观点支配着拉萨，西藏的所作所为只是在有意识地淡化军事、压制现代化。

例如在 1946 年年末，政府雇佣一个英国人当校长，来开办一所官办英文学校。但是三大寺阻止了这项计划，他们的僧兵威胁要绑架和强奸那

33. 阿沛于 10 月 18 日清晨离开昌都，临行前他没有通知他们的英国无线电报务员，所以最终未能将昌都守军已经撤退的消息通知噶厦。因此，拉萨方面只能根据没有收到后续电报的情况猜测昌都已经陷落。

34. 夏格巴，1976: 423。

35. 夏格巴，1976: 423–24。

36. 索康代本和堪穷洛桑泽旺的西藏“商务代表团”在 10 月 16 日与美国大使商议西藏的军事援助需求，并被告知 18 日再继续这个磋商。但是，在收到 10 月 17 日从拉萨发来的关于昌都的电报之后，他们觉得在这种形势下继续磋商这种问题太过危险，所以给美国大使韩德逊发去一封含糊的信件，说他们因为“万分紧急的事务”而不能赴约（美国国家档案馆，793b.00/10-2650，1950 年 10 月 26 日美国驻印度大使发给美国国务卿的电报）。

些年纪小的学生，并攻击那些教师。一名官员的回忆录记载了政府就此事同寺院领袖的谈话，揭示了那个时期寺院对改革的抵制是多么根深蒂固。

大约 35 名僧俗官员是那所学校的学生。这个计划是，在这些学生学成之后，就把他们送到外国〔去进修〕……〔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喇嘛们跑过来说：“为什么你们要开办这样一所学校？”老师们害怕他们的生命受到威胁……三大寺希望学校完全关闭。他们势力很大，并且根本不听我们说的。在那次〔与孜康〕的会议上，我们告诉他们：“你们应当睁开眼睛看看现在的世界。世界正在改变，你们也应当变一变了，不能还是只管穿僧袍托饭钵。你们不应该像现在这样行事，要向前看。这所学校是不会损害我们的政教的。”但是他们仍然坚持自己的看法，也不听我们说的。他们愿意谈论的永远只有护法神和上师。我们会面了好几次，想说服他们，但是他们拒绝听我们的。最后，学校只好关闭了。如果它没有关闭，现在一定发展得非常好。³⁷

虽然在 1947 至 1949 年间，西藏政府已经感觉到来自中国的威胁逐渐增强，并且已经开始扩大军队的规模，从印度购买新的武器，但此时组建和训练一支有战斗力的军队已经太晚了。³⁸ 现在西藏为它的保守和短视付出了代价。没能建立一支训练有素的专业军队，西藏人到现在才发现领导着守卫西藏领土的军队的只是一些徒有虚名的“将军”。这些“将军”只是一些很普通的贵族官员，他们领受军职时没有受过丝毫的特殊训练，也没有人会考虑他们的个性是否适合打仗。

对拉萨来说，昌都的溃败意味着解放军现在控制了西藏最东面的省份。如果西藏人不赶快行动起来，解放军对卫藏的全面进攻似乎就在眼前。于是，西藏最终开始认真考虑袁忠贤大使的三点条件。他们召集了全体民众会议逐点进行讨论。与会人员认为，除了接受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之外已经别无选择了。会后不久的 10 月 21 日，在获得大札摄政（Taktra）同意之后，噶厦发了一封电报给夏格巴通报此事。但是民众大会和摄政对

37. 昌松（Chabtsom），访问记，1992，拉萨。

38. 一位英国军官对 1936 年西藏军队极为糟糕的状况进行了评估，这一评估见戈尔斯坦，1989: 280–89。

中国人仍然抱持强硬的态度，所以在电报中详细地说明：接受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意味着西藏在中国的内部保持完全的独立，他们还指示夏格巴拒绝另外两点。夏格巴在书中记录了他所收到的指示内容：

1. 立即同中国展开谈判。
2. 对于第一点——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如果必须接受，可以接受，但是前提是必须保证达赖喇嘛的名号和权力维持不变，西藏政府继续像现在这样存在，继续独立地作决定和施政。
3. 对于第二点——与外国有关的所有政治和贸易事务必须通过中国处理——你必须告诉中国人，西藏将继续管理自己的对外事务。
4. 对于第三点——中国军队接管西藏的安全和防卫力量——这一点是非常危险的，我们不接受这一点。西藏将会派遣自己的军队来保护自己的领土。
5. 向中国人强调，不得虐待在东藏被俘的西藏政府官员，所有西藏的俘虏应当尽快遣返。³⁹

如此强硬的答复使夏格巴和他的同僚们非常失望，他们觉得这些让步太微不足道，而且也太迟了。但他们还是立即致电中国大使馆，安排第二天，也就是10月22日同袁忠贤大使会晤。

但是在拉萨，即使是这种微不足道的妥协对某些重要人物来说也远远超出了他们的预期。这些人认为，一旦西藏承认是中国的一部分，西藏的法律地位就改变了，他们计划的（例如向美国）寻求国际援助的行动也将不会引起太大的反响。这些官员坚信，即使中国人进攻卫藏，达赖喇嘛也可以像四十年前十三世达赖喇嘛那样，到外国去寻求庇护并在国外继续为西藏的独立而奋斗。持这种观点的不妥协派似乎主要包括索康噶伦、卓尼钦莫（副官长）帕拉以及达赖喇嘛的经师（林仓仁波切和赤江仁波切）。在他们没能说服全体民众大会拒绝第一条后，他们就开始采取单方面的行动了。他们挺而走险绕过摄政，求助于当时还未涉足政坛的、西藏的另一个权力核心——达赖喇嘛。

39. 夏格巴，1976: 425。

时年 15 岁的达赖喇嘛还有三年才可以亲政，所以还没有涉足任何政治事务。但是，鉴于西藏所面对的事态的严重性，这些官员们觉得，他们是他们惟一的希望。如果他们能设法使达赖喇嘛干预这些重要的决定，那么影响将会是巨大的，因为谁也不能无视他的观点。于是在 10 月 21 日，某个能接近达赖喇嘛的人（可能是他的经师也可能是帕拉）把民众大会和摄政的决定告诉了他，同时作了负面的解读。正如这些人所愿，达赖喇嘛强烈反对这项决议，并命令用打卦的方式来定夺。⁴⁰ 于是第二天早上，打卦仪式在其他高级官员在场的情况下当着护法神的面进行了。结果是神指示说西藏不应当接受成为中国的一部分。于是噶厦又给夏格巴发了一封与前电态度相反的指示电。⁴¹

这个时间是德里的 10 月 23 日早上，西藏代表正准备去参加在中国大使馆举行的早餐会，商讨他们收到的（第一份电报上的）指示。突然，他们被告知收到拉萨发来的另一封电报。于是他们让中国大使馆来接他们的车等一下，先用一个小时来解码刚刚收到的电报。这封电报的落款时间是 10 月 22 日。夏格巴回忆说，刚看到新电报的抬头他就感到非常错愕：“至尊达赖喇嘛令”。因为此时达赖喇嘛还没有亲政，这样的抬头一般只有在他亲政时才会用到。⁴² 新指示的内容更让他们大吃一惊，因为它收回了上一封电报中的让步。夏格巴在他的书中记录了电报的内容：

关于如何答复中国方面的三点条件的问题，我们已经会同摄政、噶厦进行了商讨，并且同民众大会进行了磋商，我们已经把决定发给了你们，但愿你们已经收到。大概你们正准备出发前往〔北京〕，但是，对于第一点，对外〔名义上〕接受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达赖喇嘛认为：“鉴于这是对政教事业极端重要的问题，所以我们最好应该祈求三宝，打卦来决定。”这个观点非常正确，所以我们

40. 夏格巴，1976: 426–27。打卦（藏语：*senril*）是西藏常用来作不容易的或者有争议性的决定的方法。操作过程如下：例如有两个选项，“接受”或者“不接受”成为中国的一部分，把这两个选项写在小纸片上，然后分别揉进糌粑（烤青稞面粉）里，做成重量和形状完全一样的糌粑球。接着把这两个糌粑球放到一个饭钵里，在护法神像前摇晃饭钵，直到一个糌粑球掉出来为止。掉出来的球里的选项就是神的决定。

41. 夏格巴，1976: 426–27。

42. 夏格巴，访问记，1983，达兰萨拉。

于罗布林卡的护法神贡布（Gombo）经堂里在护法神贡布和拉姆（Lhamo）面前求了卦。签文说，如果我们接受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那么对政教事业将是非常有害的。既然神的旨意是不会错的，所以请不要接受中国提出的这三点条件。但是，你们所有人应当在10月26日之前出发前往北京。⁴³

夏格巴和土登杰波此时的处境非常困难，因为他们现在没有任何实实在在的东西可以告诉袁忠贤，但是他们还得去应付了事。他们告诉大使，刚刚收到拉萨的指示要他们出发去北京。大使很自然地问夏格巴，对于他之前提出的三点条件他们有没有收到答复，夏格巴回答说指示电报里没有相关答复。但是事后夏格巴在书中写道，大使应该可以从他们的表情和举止中判断出这不是事实。夏格巴告诉袁忠贤，代表团明天会到噶伦堡去取他们的冬天衣物，然后直接去加尔各答。袁忠贤回答说加尔各答总领馆会向他们提供此行所需的所有文件。⁴⁴

但是一个星期之后，拉萨又改变了主意。那是在11月2日，夏格巴一行正在做从加尔各答出发的最后准备，突然收到又一封发自西藏的电报，落款时间是10月31日。上面说：“就在我们同中国人举行和平谈判的时候，他们却侵略了我们的领土。所以你们应当推迟去北京谈判的行程。这是西藏民众大会的决议，请你们立即暂停既定的行程，我们会通知你们何时应该出发。”第二天，代表团又收到另外一封电报，要他们无限期推迟行程。⁴⁵

出现这些突然转变的原因是拉萨的不妥协派所采取的一系列行动取得了成功。这些行动现在终于使达赖喇嘛和其他重要人物决定向联合国申诉。因为不久前联合国为支援韩国出动了好几万人的军队，这些官员们认为应当尽量去寻求联合国的帮助。因此，他们不希望在联合国考虑他们的援助请求的同时，他们的代表团却在北京同中国人谈判。⁴⁶于是夏格巴受命跟进向联合国的申诉。

43. 夏格巴，1976: 426-27。

44. 夏格巴，1976: 426-27。

45. 夏格巴，1976: 429-30。

46. 夏格巴，1976: 429-30。



图2：索康家族。前排左起：索康堪穷（肯绕旺秋）、索康代本（拉旺图登）；后排左起：凯墨札萨（索南旺堆）、索康札萨（旺清泽登）、索康噶伦（旺清格勒）。照片来源：索康家族

这几件事也似乎标志着一些摄政的支持者如帕拉和索康等，开始转而支持新的领袖——达赖喇嘛。所以毫不奇怪，就在两个星期之后的11月17日，大札摄政在这场政治漩涡中被迫辞职，而达赖喇嘛则在15岁时开始亲政。⁴⁷

就在夏格巴于噶伦堡准备出发去北京的时候，在新德里的商务代表团与印度方面讨论了寻求印度帮助向联合国提出申诉的可能性。印度方面并不鼓励西藏向联合国申诉，他们认为这样做会被中国人当作进一步的挑衅。但是拉萨当局没有听他们的，于10月29日直接向印度政府提出，是否可以把西藏的申诉书提交给联合国。印度方面答复说提交申诉书这件事需要西藏自己来办，但也说印度会对申诉行动给予支持，但仅限于要求中

47. 对这个事件的具体论述见戈尔斯坦，1989：704-7。

国放弃武力手段，用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西藏问题。⁴⁸ 这是印度可以给予的最微弱的支持，但对于西藏政府来说这总比完全不支持要好。

此间，达赖喇嘛的大哥当采仁波切（Taktse Rimpoche）从已于上一年解放了的青海来到拉萨。⁴⁹ 他的到来更加强了持不妥协态度的官员们的观点。当采仁波切是塔尔寺的堪布，中国官员要他到拉萨去劝说他的弟弟接受和平解放。最终他决定离开青海，所以撒谎说会把共产党的话带给他的弟弟和西藏政府。但是到达拉萨之后，他却对青海（安多）的情况做了很负面的描述，并要他的弟弟和西藏政府流亡国外。他回忆说：

随后我同这些中国人〔在青海〕相处了六个月。在这六个月的时间里，我听到了中国人说的话，所有的迹象表明这很不利于西藏人，所有的话里面没有一句是对西藏人好的。他们说他们会在从 1949 年开始的五年内消灭西藏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他们说西藏人添酥油灯的习俗很不好，因为这些酥油都被浪费了。如果不添酥油灯，而把所有节约的钱集中起来送到中国去，就可以支援朝鲜战争，打美国人，就可以用来养士兵。他们说，如果你没有饭吃，难道求神拜佛就可以变来面包？还有就是有人说要杀死至尊……

他们说我必须去说服至尊和政府官员同中国人合作。当时，他们很怕至尊和政府官员会逃到印度去。所以他们要我去告诉西藏人同中国人合作，而作为奖赏我将会被任命为拉萨总管。

问：他们还说了其他什么吗？

他们说，至尊在这五年里必须同中国人合作。如果不，那么他们就有权杀死他。于是我同他们说……

每天都是说这些话，……我常常想我必须脱离这个处境，所以我就到拉萨来了。⁵⁰

但是，以上大部分话语似乎都是经过添油加醋的。例如，在他的访问记的另一段，他回忆起第一野战军和西北局的司令员彭德怀元帅对他说，

48. 英国外交部档案，FO371/84457，同巴杰帕伊（G. S. Bajpai）会谈的摘要，引自 1950 年 11 月 5 日英国驻印度高级专员发给伦敦的英联邦事务部的电报。

49. 西藏人称青海地区为安多。

50. 当采，访问记，1993，布鲁明顿，印第安纳州（Bloomington, Indiana）。

中国人和西藏人是同一个大家庭里走散了的兄弟。我们之所以走散是因为帝国主义来了，是因为英国人和美国人的干预。现在我们必须让〔西藏〕回到祖国的怀抱。同室操戈是非常不幸的事情，所以西藏必须通过不流血的方式和平解放。为了这个目标，你必须帮助我们，所以请你到拉萨去。⁵¹

所以说，很难确认当采所说的那些话的实际分量，因为没有人知道说这些话的人是有关人员，还是闲杂人等。但很明显，那些话既不是西北局的政策，也不是中央的政策。

在这个混乱和紧张的气氛中，西藏以刚刚亲政的达赖喇嘛的名义给毛泽东发去一封简短的信。达赖喇嘛的书中有这封信的相关内容：

于是我写信给中国政府，这封信通过昌都占领军的指挥官递交。我说，在我亲政之前，我们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很紧张，但是现在我已经亲政，我真诚地希望恢复我们之间曾经的友好关系。我恳请他们释放那些被他们的军队俘虏的西藏人，并从他们所占领的西藏领土上撤退。⁵²

我没有得到这封信的原稿，但是据我所知，中国方面没有答复这封信。

但是，西藏政府现在把真正的希望寄托于联合国。11月3日，西藏方面通知印度政府他们将会直接向联合国提出申诉，同时也向南亚的佛教国家（显然指斯里兰卡、泰国和缅甸）发出呼吁。⁵³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西藏政府指示夏格巴不要前往北京，而是负责向联合国提出申诉。拉萨前后两次更改指示都让夏格巴吃惊不小。这一次夏格巴不能确定这封信中的指示的真实性，所以他专程去了锡金甘托克，通过无线电话直接向噶厦求证，⁵⁴然后才确认这个指示准确无误。于是他回到噶伦堡，在11月7日把西藏的申诉书递交给联合国秘书长。这次申诉是下一章的主题。

51. 当采，访问记，1993。

52. 达赖喇嘛，1962: 84-85。

53. 英国外交部档案，FO371/84457，同巴杰帕伊会谈的摘要，引自1950年11月5日英国驻印度高级专员发给伦敦的英联邦事务部的电报。

54. 夏格巴，访问记，1983。

第三章

西藏向联合国申诉

虽然西藏没有什么外交经验，但令人惊讶的是，它向联合国提交的第一份申诉书却是异常老道，极具说服力。它成功地表达了西藏政府对中藏历史关系和 1911 年以来一系列事件的观点。¹

致联合国秘书长的申诉书，

当前，全世界的目光正凝视于朝鲜，一股国际力量正在那里抵抗侵略。相似的侵略行为也在西藏发生，但是谁也没有给予关注。侵略行为不应被听之任之，所有人的自由都应得到保护，这是人类的普遍信条。所以我们承担起责任，要通过您〔秘书长〕将最近在西藏边境附近发生的情况向联合国报告。正如您所了解的那样，西藏的局势在最近发展到令人担忧的地步。这种局面不是西藏自身造成的，而是由中国人肆无忌惮的意欲支配、吞并弱小国家的野心所造成的。长久以来，除了佛教界公认的领袖至尊达赖喇嘛为很多国家的信众赐福并接受他们的膜拜之外，西藏人只是在遥远的山巅过着与世无争的生活。

在 1912 年以前，中国皇帝和至尊达赖喇嘛之间确实有着密切的私人友好关系。这种友好关系本质上是基于共同的信仰而产生的，可以形容为精神导师和其世俗信众之间的关系，其中没有任何政治含义。由于专心于佛法，西藏人很久以前就摒弃了武力，奉行和平与忍让，仅仅依靠天然的地理屏障和不牵涉其他国家事务的原

1. 英国高级专员告诉伦敦，有人曾经很秘密地告诉他说，西藏的申诉书是由印度驻拉萨代表辛哈 (Sinha) 起草的 (英国外交部档案，FO371/84454，1950 年 11 月 14 日英国高级专员致英联邦关系部的信)。夏格巴在和我的一次谈话中确认了这一点。

则来护卫自己的国家。西藏虽然也曾有寻求中国皇帝保护的时候，但却甚少得到这样的保护。但是，骨子里充满扩张天性的中国人却完全歪曲了我们之间曾经存在的友谊的内涵，否定存在于中国和西藏这两个邻国之间互不隶属的关系。他们认为，中国是宗主国而西藏是附庸国。正是这一看法第一次引起西藏人对其独立地位的担心，而这一担心是不无道理的。

中国人在1910年远征西藏时的所作所为，使这两个国家的关系完全破裂了。在1911-1912年，西藏在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庇佑下宣告完全独立。同一时期，尼泊尔也脱离了与中国的藩属关系。而1911年的中国革命迫使最后一位满洲皇帝退位，于是切断了中国和西藏在情感和宗教上的最后一点联系。从此以后，西藏完全依靠其与世隔绝的地理优势、对佛祖智慧的崇信以及偶尔来自印度的英国人的支持来保护自己。毫无疑问，在这种情况下，英国人也可以宣称对西藏拥有宗主权。应当指出，西藏已经有能力维护国家内部的和平和秩序，并在世界上与其他国家和平相处。所以尽管西藏不时地受到来自英国和中国的影响，但是仍然维持着它的独立地位。虽然它继续与中国人民保持着睦邻友好的关系，但是却从来没有接受过中国人在1914年时宣称的所谓宗主权。

在英国人的劝说下，西藏签署了一份条约。这份条约使西藏接受了中国名义上（没有强制力）的宗主权，并赋予中国在拉萨派驻一个使团的权利。但是，这份条约也严格禁止中国人干涉西藏的内部事务。但是中国人没有在这份1914年的条约上签字，所以即便是西藏作为对中国的让步而赋予中国的宗主权也是没有约束力的。所以，这之后西藏和邻国印度、尼泊尔等国保持了独立自主的关系。另外，西藏也没有按照英国的善意提议作出妥协，派军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支援中国。通过这些事实，西藏向世界宣示并且维持了它的完全独立。1914年的条约仍然指导着西藏同印度的关系，但是中国人并没有在条约上签字，而这应该理解为他们放弃原本可以由这项条约获得的权益。因此，西藏恢复了它法理上（*de jure*）的独立地位。

在中国经历了更加深刻的革命而变成一个完全的共产国家之后，原本在1911年革命后存在于西藏和中国之间的脆弱联系变得更为不合时宜了。如今，中国和西藏各自抱持着截然不同的信仰，已经没有任何的亲近和同情可言。

西藏政府预见到将来可能会产生复杂的纠纷，于是在 1949 年 7 月中断同中国的外交关系，遣返了在拉萨的中国代表。从那时起，西藏就再也没有同中国政府和人民有过正式的联系。西藏渴望把高度唯物主义的精神污染拒之门外，但是中国人刻意不让西藏安静地生活。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开始，中国人就叫嚣要解放西藏，并采取卑劣手段威胁和侵害西藏政府。

西藏认识到自己并没有能力进行抵抗，因此同意和中国政府进行友好谈判。但是不幸的是，派往中国的使团没能离开印度。这不是使团成员的错，只是因为英国没有向他们签发途经香港所需的签证。在印度政府善意的干预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意西藏使团同 9 月份到达新德里的中国大使进行初步的会谈。当这个会谈正在德里举行的时候，1950 年 10 月 7 日，中国军队不宣而战，从多个地点渡过长久以来的中藏边界布曲河（Dre Chu）〔金沙江〕进入西藏领土，接连占领邓玛（Demar）、岗托（Kamto）、通噶（Tunga）、扎木（Tshame）、类乌齐戈提乌（Riwochegotyu）、雅卡诺（Yakalo）、芒康（Markham）等一系列重要的战略据点。部署在康区不含任何进攻意图、仅以防卫为目的的西藏边防部队被共产党军队彻底消灭。康区的首府昌都也被他们以强大火力从五个方向包围，不久便沦陷了。西藏政府的一位噶伦现在完全失去音信。但是，外部世界却对这种鬼祟的侵略行径一无所知。中国人在侵略行为开始很久之后才向世界宣布，他们已经命令他们的军队向西藏进军了。

如此突然的侵略行径不仅破坏了西藏的和平，也完全背弃了中国人郑重地向印度政府作出的保证。它使西藏出现了无尽的黑暗，并可能最终剥夺西藏一向珍视的独立。秘书长先生，尽管作为一个致力于和平的国家，西藏几乎没有希望能够抵抗得住从战火中磨砺出来的人们的野蛮侵略，但是我们向您保证，西藏绝不会坐以待毙。我们也知道，不管何时何地发生了侵略，联合国都会努力用行动来阻止。

这次的武装入侵是为了把西藏纳入中国共产主义的统治之下，是最明显的侵略行径。如果中国人能够不理睬西藏人的意愿，以武力把他们变为中国的一部分，那么这将成为以强凌弱的最恶劣事件。因此，我们通过您呼吁世界各国，请为我们对这次事件进行调解，遏制中国人的进攻行动。

事情其实很简单。中国人宣称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但是西藏人认为，无论是在种族上、文化上还是在地理上，西藏人都同中国人截然不同。如果中国人不接受西藏人的这一态度，那么他们大可以采用其他文明手段来确认西藏人民的想法，或者通过纯粹的司法（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他们完全可以通过国际法庭来寻求解决。中国对西藏的占领将只能扩大地区冲突，给其他亚洲国家的独立和稳定带来更大的威胁。

我们这些噶伦们征得至尊达赖喇嘛的同意，在这个紧急的关头将西藏问题呈请联合国最终裁决，冀望世界的良知不会允许以过时的野蛮方式来瓦解我们的国家。

噶厦（西藏内阁）及西藏民众大会，西藏代表夏格巴（于噶伦堡）

藏历铁虎年九月二十七日，公元 1950 年 11 月 7 日于拉萨。²

联合国秘书处立即裁定把接收到的这份电报归类为日常事务中的非政府组织函件来往，理由是西藏不是联合国的会员，³而且这封电报是由身处西藏境外的代表团而不是西藏政府发出的。秘书处同时决定，除非某个联合国安理会的成员国要求签发，或者某个联合国的成员国要求把相关事务提交安理会进行讨论，否则不把西藏的电报作为安理会文件签发。⁴于是，他们把这份申诉书的副本散发给安理会的各个代表团。英国和印度本可以很容易地纠正把申诉书解读为“非政府的”这一错误，因为他们知道西藏由于通信条件的限制有时候会从噶伦堡发出官方文件，但是这两国都没有这样做。

西藏政府又通过夏格巴和土登杰波寻求英国、加拿大和美国为他们的申诉提供支持。下面这封给英国驻印度高级专员的信就表现了这一点：

2. 英国外交部档案，FO371/84454，英国驻联合国代表团致英国外交部的电报，1950 年 11 月 14 日。括号中的文字出现于《纽约时报》登载的版本，在秘书处提供的版本中这些位置是空白的。
3. 有一件事情很有趣，当 1948 年西藏商务代表团到达纽约的时候，一些听了夏格巴宣扬西藏独立的律师鼓动他尝试申请西藏加入联合国。他将此事电告拉萨，但是得到的答复却是：“（对这个提议）不要到处张扬。要集中精力，不要想其他的。做好你的公关工作，然后回来”（夏格巴，访问记，1983，纽约）。
4. 英国外交部档案，FO371/84454，英国驻联合国代表团致英国外交部的电报，1950 年 11 月 13 日。

根据我们通过无线电收到的来自西藏政府的情报，当德里的谈判正在进行的时候，中国共产党于1950年10月7日从多个不同地点向东藏发起了突然袭击。现在噶厦和西藏民众大会已经向联合国提出申诉，要求联合国对北京政府的这种奸诈行为作出最终裁决。兹附上一封申诉书的副本供您了解详情。西藏作为一个宗教国家，在政治和军事上天生处于弱势。因此我们恳请阁下游说您的政府为我们在联合国提供有效的支持，以便使西藏这个热爱和平的国家免于战火的摧残。对于您真诚的建议我们将非常感激。⁵

给美国的信的内容也几乎完全一样。

然而，西藏发现支持其申诉的是一个西藏人最想不到的国家——萨尔瓦多。11月14日，萨尔瓦多代表团主席赫克托·大卫·卡斯特罗（Hector David Castro）致电联合国秘书长，要求依据《联合国宪章》第一条第一项中联合国“维护国际和平及安全”的首要责任，把“外国武装入侵西藏”列入议事日程。萨尔瓦多希望把这项议题直接提交联合国大会讨论，但是秘书处决定先提交给总务委员会，由总务委员会讨论是否应当提交联合国大会。⁶

萨尔瓦多提出的决议案不仅要求谴责中国，还要求设立一个特殊委员会，为联合国的行动提出可行性建议：

联合国大会，

我们注意到，和平国家西藏在没有做出任何挑衅举动的情況下遭到北京政府从其控制的领土上发起的入侵。

为此，我们请求联合国大会：

1. 谴责这种对西藏的无端侵略行为；
2. 设立由（国家名）……组成的委员会，由这个委员会研究联合国大会在这个问题上可以采取的措施。
3. 指定这个委员会研究西藏政府提交给联合国的特殊提案，并向联合国大会提交相关报告，而且要在会期内完成，越快越好。⁷

5. 英国外交部档案，FO371/84454，1950年11月16日夏格巴致英国高级专员的信件，引自英国驻印度高级专员给伦敦的英联邦关系部的电报，1950年11月16日。

6. 总务委员会负责建议应当将哪些事务列入议事日程。联合国档案，A/1534，引自达赖喇嘛办公室编（出版日期不明）。不清楚萨尔瓦多为何要这样做。

7. 同前一注释。

西藏问题现在正由总务委员会进行讨论，如果总务委员会的代表们同意，就会被提交到联合国大会进行讨论。

在国际上，印度、英国和美国现在需要慎重地权衡它们的国家利益和它们与西藏的历史联系，以及在这个关键时期对西藏的道德和法律义务。10月份西藏遭到入侵，11月份西藏政府向联合国提出申诉以及萨尔瓦多对西藏的支持，这一连串事件迫使它们急需作出抉择。

■ 英国和印度对申诉的反应

英国外交部对于如何应对西藏在联合国的申诉犹豫不决。他们开始援引《联合国宪章》第三十五条第二项申诉主体必须是“国家”这一规定来考察西藏作为申诉主体的适用性，⁸ 这在于西藏是否有资格被称为一个国家。英国外交部详细地考察了法律条文之后得出结论：可以认定中国的宗主权是非常形式化和非常表面的，所以中国拥有宗主权并不能排除西藏拥有自己的国际主体身份。在一封给英国驻印度高级专员的电报中，外交部提到支持这一判断的逻辑根据：

中国依据对西藏的宗主权而施加的控制力，其程度在不同时期是不同的。1911年，西藏摆脱中国的控制，驱逐了其领土上所有的中国军队。到1913年，西藏已经独立于中国之外，并于1914年以自己的名义参加一个在西姆拉召开的三方会谈。作为会谈的成果之一，来自英国、中国和西藏的代表拟定了一项条约。这项条约承认西藏在中国宗主权之下的自治，同时明确地禁止中国把西藏变成自己的一个行省，或者在驻拉萨代表的300人护卫队之外再派其他军队进入西藏。根据这个条约，西藏可以同外国建立直接的外交关系，而不需要通过中国。英国和西藏的代表在这项条约上签了字，但是中国的代表仅仅是简单地草签了。随后中国政府拒绝承认他们

8. 第三十五条中规定：“非联合国会员国之国家如为任何争端之当事国时，如若事先同意关于该争端将接受本宪章所规定和平解决之义务，可以将该项争端提请大会或安全理事会考虑”（英国外交部档案，FO371/84454，在一封英国外交部致首席检察官的信中提到，1950年11月25日）。

的代表草签的条约，但是在某些场合他们曾经宣称接受除设定中藏边界之外的所有条款。尽管中国没有签订这项条约，但达成共识的是条约的前提是西藏再次承认中国的宗主权。因此，如果中国完全拒绝承认这个条约（它现在的行动清楚地表明它就是这样做的），那么它对西藏将不再拥有任何权利，哪怕是名义上的宗主权。从1913年开始，西藏不仅完全享有掌控自身内部事务的权利，而且还同其他国家保持了直接的关系。所以根据《宪章》第三十五条第二项，西藏可以被称为国家。

2. 必须要强调的是，西藏享有单独管理外交事务的权力，这使它不同于例如英国下面那些享有内部自治但没有外交权力的保护国。
3. 我们承认中国在1914年之后享有对西藏的宗主权是以中国承认西藏自治为前提的；换句话说，我们承认的这种宗主权是在《西姆拉条约》中规定的名义上的宗主权。而且从1914年开始，我们就承认西藏具有同其他国家建立直接外交关系的权力。⁹

外交部也考察了宗主权的内涵，尤其是宗主国之下的附庸国或领地的地位问题。最终他们得出结论，在宗主关系的名义下实际的情况则千差万别。而附庸国相对宗主国的地位和关系在很大程度上随着具体情况的不同而不同，其中有两个指标尤其关键：第一、对于国际条约，宗主国的缔结是否也意味着附庸国的缔结；第二、宗主国的战争是否也相应是附庸国的战争。基于对以上两个指标的判断，外交部的研究人员得出结论：所有的证据都表明西藏并不仅仅是中国的一部分，而且它还具有其自身明确的国际身份。¹⁰

基于这些报告，英国外交部作出判断，认为西藏有权把它的问题提交联合国，于是在11月10日（西藏的申诉书尚有三天才到达纽约的时候）给英国驻印度的高级专员和英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发去一封电报：

1. 我们正在思考在西藏的申诉书送达联合国时我们应采取的态度。我们已经承诺通过各种方式向印度提供支持，这无疑会对

9. 英国外交部档案，FO371/84454，英国外交部致英国驻印度高级专员的电报，1950年11月9日。

10. 英国外交部档案，FO371/84454，英国外交部东南亚事务部的斯科特（R. H. Scott）的备忘录，1950年11月2日。

他们在成功湖所采取的策略有很大帮助。尽管我们完全赞同在这个问题上要以印度的利益为优先，我们也同意应该由印度发挥主导作用，但是同时我们也认为同他们进行预先的沟通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在联合国讨论西藏问题会对我们与中国的关系产生非常负面的影响。

2. 下面是我们对当前情况的看法，提供给你们作为参考：
 - (1) 我们认为西藏的自治非常充分，这使它可以被冠以《联合国宪章》中所定义的“国家”这一名称。我们紧接着会发一份电报告诉你们我们在法律层面上对这个问题的解读：这些解读暂时也仅仅是提供给你们参考，请不要透露给印度政府。在联合国针对西藏申诉的有效性而进行的初步辩论中我们是否应该支持这种对西藏国际地位的解读，这一点我们现在还没有决定。如果印度采取这种态度，那我们将准备这样做，虽然这样做后患无穷。
 - (2) 如果这种针对西藏地位的观点得到广泛认同，西藏申诉的有效性获得肯定，随之而来的结论便是中国的行动构成对西藏的侵略。于是安理会大概会作出以下两种可能的反应：
 - (i) 安理会仅仅对中国的行动提出谴责；
 - (ii) 联合国可能会要求中国从西藏撤军，恢复西藏以前的状态。
 - (3) 我们应当希望安理会的反应停留在上面的第 (i) 点，而第 (ii) 点正是我们应当极力避免的。它最可能衍生的后果是一项中国不会遵守而必须通过武力实施的决议。而武力实施这么一项决议的任务是我们和印度或者其他国家，例如美国，所不愿意承担的。结果就会使联合国的威信受到损害。¹¹

英国外交部此时倾向于向西藏提供某种形式的支持，以免中国的侵略行为被完全忽视。但是它不想违背印度的西藏政策，因为现在看来对西藏

11. 英国外交部档案，FO371/84454，在伦敦的英联邦关系部致英国驻印度高级专员的电报，1950年11月10日。

负有首要责任的是印度。¹² 而且英国尤其不希望通过一项联合国没有能力实施的决议。

但是，英国驻联合国代表团觉得外交部电报中阐述的立场太强硬。代表团的团长格拉德温·杰布爵士（Gladwyn Jebb）在回复中说，不管人们对中国的侵略行为看法如何，现实是没有人可以给西藏以有效的帮助。他称印度自身也质疑西藏的“国家”身份，因此英国应当修正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他建议在联合国应采取的最佳对策是坚持主张西藏问题是缘于“法理上的模糊”。在1950年11月14日给外交部的电报中他阐述了以上的主张：

……既然印度政府本身对西藏的“完全独立”抱有很深的怀疑，我觉得我们应当努力改正我们在法律层面上对这个问题的解读。如果我们真的坚持认为西藏是完全独立的，那么显而易见已经发生的就是一种侵略行为。在这种状况下，我们将会承受很大的压力，迫使我们在安理会里支持某项后患无穷的决议。而且如果这项决议被否决，整个问题将会被提交到联合国大会，按照刚刚通过的“联合一致共策和平”的决议精神进行讨论。

2. 因此我非常希望，假若印度在安理会上提出这个问题，你们会指示我们遵守一个大的原则：西藏的法理定位非常模糊，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被当作一个完全独立的国家。¹³

12. 英国的表现似乎表明它对这个地区不再感兴趣。对于这一点印度政府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快的，它在一封答复英国政府的请求的信件中表达了这种不快。当时英国需要起草一份声明来答复议会提出的关于把西藏问题提交安理会讨论的迫切性的问题，所以想请印度政府对这个声明提出意见。英国在给印度的信中提及声明的内容：“西藏的问题首先涉及到的是印度政府的利益，所以我们不认为自己在这个问题上需要发挥主导作用。但是，我们会在这个问题上同印度政府保持密切的联系”（英国外交部档案，FO371/84454，在伦敦的英联邦关系部致英国驻印度高级专员的电报，1950年11月10日）。但是印度政府告诉英国，它更希望声明的第一句能这样写：“西藏的情况首先涉及的是印度政府的利益，然而国王陛下的政府对此也相当关注。”印度之所以会提出这种希望是因为它担心英国的声明原稿会建议完全由印度来发挥主导作用（英国外交部档案，FO371/84454，英国驻印度高级专员致伦敦的英联邦关系部的电报，1950年11月13日）。

13. 英国外交部档案，FO371/84454，英国驻联合国代表团致英国外交部的电报，1950年11月14日。

这个反馈意见促使外交部咨询英国首席检察官，要求其对西藏的国际地位作出界定。同时也促使他们设法进一步弄清楚印度政府对西藏申诉的态度，因为它的观点是英国需要优先考虑的。

■ 印度对中国入侵西藏的反应

虽然印度已经认定与中国的友好关系超过从英国那里继承过来的对西藏的义务，但是它最开始也不愿意公开支持中国的主权主张。为了克服这种两难的局面，它努力营造氛围，想迫使西藏接受中国的条件。如果这一努力成功，就可以避免单方面作痛苦的抉择。所以，当中国入侵西藏的消息传来时，德里感到非常吃惊，作为回应，在10月21日向中国递交了一份表达抗议的备忘录。但是这份备忘录的语气非常温和，甚至于没有争论中国的行动在道德和法律上的失当，只是说中国的行动不利于印度帮助中国在联合国和安理会争取获得承认的努力。备忘录上说：

中央人民政府应该了解印度政府在协调中藏关系问题上的看法。我们的目的纯粹是为了和平解决这个问题，这一点我们无需重复。我们也注意到中央人民政府过去一直在努力奉行同西藏当局协商的政策。但是，我们收到的情报说某种程度的军事行动已经展开或者即将展开，而这种行动可能会影响和平协商的结果。

印度政府希望指出，现阶段是处理相关国际事务的敏感和关键时期，对西藏的军事行动将会给世界上那些对中国不友好的国家以反华宣传的借口。中央人民政府必须认清，联合国内的观点已逐渐转向在本会期结束之前接纳中国进入联合国。

印度政府认为，在联合国大会形成决议前夕的军事行动将会造成严重的后果，将会让那些反对接纳人民政府进入联合国和安理会的国家获得强有力的支持。

目前，国际形势非常敏感，任何可能被解读为妨碍和平的举动都可能对中国的国际地位造成影响。印度政府坚定地认为，恢复国际和平的首要前提是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地位，而这和在联合国的努力是分不开的。我们认为，现阶段任何不谨慎的动作，包括在内部事务上的动作，在被外界客观看待之前就会被那些对中国不友好的人利用，来破坏联合国的中国议题。印度政府把解决中国在国

际组织中的代表权问题看得最为重要，也一直在尽一切力量争取妥善地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坚信，在西藏使用武力将会损害中国的地位，那些反对中国进入联合国的人将更有机会曲解中国的和平意图。

印度政府认为时机是非常重要的。西藏不会有严重的军事抵抗行动，也无法拖延整个问题，因此不会影响中国在西藏的利益以及西藏问题的最终妥善解决。印度政府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已经在前面解释过，即仅仅在于确保人民政府进入联合国不会因为可以避免的因素而再一次推迟。同时，如果有可能，请采取和平解决的方式。军事行动会造成印度边境的不安和混乱。¹⁴

印度的这份备忘录很有意思，因为上面没有提及或者质疑中国兼并西藏的权力，而是接受了中国的立场，即西藏问题是中国的内部事务。备忘录也没有提及 1914 年的《西姆拉条约》，在这个条约中印度保留了界定西藏地位的权力。¹⁵

印度没有收到对这份备忘录的任何答复，所以在 10 月 28 日，也就是中国公开宣布他们的军队已经解放昌都之后的第三天，发出了另一份语气稍加强硬的照会。这份照会说，因为中国曾经保证努力追求和平，而且中藏之间的善意谈判也在正在进行，所以中国军队向西藏进军似乎是“最为震惊与遗憾的”，并说印度为这次入侵行动感到痛心。但是为了削减语气上的强硬，照会又说印度过去对中国的忠告一直都是“友好而无私的”。具体内容如下：

我们很遗憾地看到报纸上报道北京的官方声明谓：“已明令人民解放军的部队进军西藏。”

我们并未从你们在此地的大使或我们在北京的大使获得关于此事的通知。

中国政府屡次向我们保证要以和平方法及谈判来解决西藏问题的愿望，最近印度大使与外交部副部长会见时，副部长一方面重申中国政府“解放”西藏的决心，而同时表示愿意继续使用和平手段。

我们通过我们的大使告知中国政府，西藏代表团决定立即前往北京，开始谈判。这一代表团确于昨日（25 日）离开德里。鉴于

14. 卡莱尔，1953: 550-51。

15. 杰恩 (Jain)，1960: 45-46。

上述这些事实，命令中国军队进军西藏的决定让我们大为震惊，也令我们深感遗憾。

我们知道西藏代表团前往北京有所延迟，这一延迟首先是缘于不能获得香港的入境签证，而西藏代表团对此不能负责。

此后，西藏代表团返回德里，因为中国政府的意愿是首先在德里与中国大使举行初步会谈。

由于西藏代表团缺乏与其他国家交涉的经验以及必须自他们的政府获得指示，而他们的政府则又须谘商他们的议会，结果确实又更延迟了。

印度政府不认为有任何与中国敌对的外在势力要对西藏代表团延迟出发负责。

既然中国政府已发出命令入侵西藏，和平谈判就难以同时进行，西藏人自然会恐惧：谈判将在胁迫之下举行。在目前的国际形势下，中国军队入侵西藏不得被认为是可悲可叹的。印度政府经过思考之后作出判断，认为这不符合中国的利益，也不利于维护和平。

印度政府只能表示深切的遗憾：虽然印度政府屡次给予中国政府友好而无私的忠告，中国政府却已决定用武力解决他们与西藏的关系问题，而不用较缓慢但更加持久的和平方法。（翻译参考《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集第一集》，并按照英文原文修改——译注）¹⁶

两天之后，中国用轻蔑和不容置疑的语气针对这份照会发出复照，指出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不管中国做什么都是中国的内政，外国不得干涉。复照还指控印度已经受到“西藏方面与中国敌对的外国势力的影响”，用这样的言词羞辱尼赫鲁和印度。对比印度语气相对温和的备忘录和照会，这份声明的措辞可以说是异常严厉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申明：

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的一部分，西藏问题完全是中国的一个内政问题。中国人民解放军必须进入西藏，解放西藏人民，保卫中国边界，这是中央人民政府的既定方针。

16. 香港友联研究所编，1968: 11-12。

中央人民政府曾屡次表示希望西藏问题能以和平谈判的方式得到解决，以故欢迎西藏地方代表团早日来到北京，进行和平谈判。

然西藏代表团受人唆使，故意拖延来北京的行期，但中央人民政府仍未放弃与西藏地方当局进行和平谈判的愿望。可是无论西藏地方当局愿否进行和平谈判及谈判得到如何结果，均属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内政问题，不容任何外因干预。

尤其是西藏问题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的问题，是两个完全没有关联的问题。

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对于印度政府所认为可悲叹的观点，不能不认为这是受西藏方面与中国敌对的外国势力的影响，而表示深切的遗憾。（翻译参考《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集第一集》，并按照原文修改——译注）¹⁷

这份复照使印度政府很生气，于是在11月1日发出一份非常强硬的照会。在这份照会中，印度清楚地表达了西藏自治（在中国宗主权之下）的起因，强调其上一份照会并非无理干涉中国的内政，而是“一个友好政府的善意忠告，这一友好政府发自内心地希望其邻邦的一些问题能以和平方式解决”。然而，印度还是单方面地放弃了它对西藏的传统权力。印度希望保留其在西藏的使团，也想保留“麦克马洪线”。但是它似乎觉得实现这个目标的最好途径恰恰是否认这些权利所依附的法律基础。

在北京的印度大使已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于十月三十日交给他的照会转给印度政府。印度政府吃惊地读到中国政府复文内最后一段的声明，声明中称：印度政府对中国的建议乃是受敌视中国的外国势力之影响。印度政府绝不接受这一点。

关于西藏问题，没有任何外国势力对印度发生影响。在西藏问题上，正如在其他事件上一样，印度政府的政策一向是完全独立的，一直仅仅旨在和平解决国际纷争，并努力避免任何可能使当前已令人堪忧的国际形势恶化的举动。

中国政府以为西藏代表团延迟赴北京是缘于外界的唆使，也是同样错误的。印度政府在以前几次电文中已相当详尽地解释了西藏代表团为什么不能较早前往北京的理由。印度政府相信：没有外界唆使的可能性存在。

17. 香港友联研究所编，1968: 13。

印度政府曾恳切争取西藏问题以和平谈判来解决，以便调整西藏在中国宗主权范围内自治的合法要求，印度政府对此并无干涉或取得任何利益的愿望。西藏自治是一个事实，这一事实印度政府从来自驻中国的印度大使以及其他一些来源的报告就可以判断出来，中国政府本身曾经是愿意承认并促使其达成的。

印度政府屡次建议：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和西藏自治应由和平谈判得以调解。这种建议，并非如中国政府似乎设想的，以为此乃不正当地干涉中国内政，而是一个友好政府的善意忠告，这一友好政府发自内心地希望其邻邦的一些问题能以和平方式解决。

因为印度政府坚持用和平手段，所以当它知道中国政府亦希望以和平谈判来解决西藏问题时是欢愉的。正因为这个缘故，印度政府曾劝告西藏政府派遣代表团到北京。这一劝告被接受了，印度政府是高兴的。在印度政府与中国政府交换文件的过程中，印度政府曾屡次获得和平解决的保证。

在这种情况下，当印度政府知道中国政府已对一个和平民族采取军事行动的时候，就更加震惊了。没有任何确凿的证据表明西藏方面采取了任何挑衅行为或诉诸非和平的方法。因此，无论如何，对他们采取这种军事行动是没有理由的。这一步包含着以武力达成一种决定的企图，这是不符合和平解决的主旨的。鉴于上述事件的发展，除非中国政府命令他们的部队停止向西藏推进而给西藏以和平谈判的机会，否则印度政府不便再劝告西藏代表团前往北京。

印度政府最近数月来采取的每一步骤都是为了阻止战争导向全世界。在这样做的时候，印度政府常被误解并受到批评，但印度政府不管各大国的不愉快而坚持其政策，印度政府不得不认为中国政府对西藏过早采取的军事行动已经大大地增加了世界的紧张局势，导向大战的趋势。这种大战，印度政府肯定地认为中国政府亦是希望避免的。

印度政府曾屡次申明：印度政府对西藏并无任何政治的或领土的野心，亦不为印度政府本身或其西藏的国民求取任何新的特权地位。同时，印度政府曾指出：某些权利是由于惯例和协定而产生的。这些惯例和协定在具有密切的文化和商业联系的邻居之间是很自然的。

这些关系已表现在：印度政府在拉萨派有代表，在江孜与亚东有商业代表，在到江孜的商路上有邮政及电讯机关，为了保护这一

商路，四十多年以来，一直在江孜驻扎一小队卫兵，印度政府切望这些机构应该继续存在，这些机构对印度与西藏都是有利的，并不在任何方面损害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因而在拉萨使团的人员以及在江孜与亚东代表机构的人员已受命留守在他们的岗位上。

印度政府的基本政策，是为印度与中国的友好关系而努力，两国承认彼此的主权、领土完整及相互利益。

最近西藏的发展已影响到这些友好关系以及全世界的和平利益，印度政府对此深表遗憾。

在结尾时，印度政府只能表示，殷切希望中国政府仍将采取和平谈判与和平解决的方法，而不用强迫与武力的方法解决。¹⁸

当这些交涉正在进行的时候，西藏给联合国的申诉书已经送达成功湖。印度的反应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正如前面所说，英国在某种程度上，包括美国在这个问题上，都惟印度马首是瞻。

在几周的时间里，印度都没有把它的官方态度通知英国。但是似乎在非正式的场合，印度曾向英国暗示会支持西藏的申诉。例如在11月13日，外交部秘书长巴杰帕伊（G. S. Bajpai）说印度会支持西藏的申诉，他希望其他安理会的强国也给予支持。¹⁹ 在11月17日，他又告诉英国，印度驻联合国代表团已经受命询问各国，以确定在超级大国之外是否有国家愿意把西藏的申诉书提交给联合国安理会。巴杰帕伊说，如果没有其他国家愿意，他认为印度政府很可能会准备这样做。²⁰

但是在11月中旬，中国人给印度的新的复照到了新德里，这封发自11月16日的复照非常关键，因为它导致印度政府最终没有支持西藏的申诉。

一九五零年十一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收到潘尼迦大使阁下（K. M. Panikkar）交来印度共和国政府关于西藏问题的照会一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在其与印度共和国政府关于西藏问题的历次来往文件中曾屡次声明：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

18. 香港友联研究所编，1968: 13-16（划线部分为强调）。

19. 英国外交部档案，FO371/84454，英国驻印度高级专员致伦敦的英联邦关系部的电报，1950年11月13日。

20. 英国外交部档案，FO371/84454，英国驻印度高级专员致伦敦的英联邦关系部的电报，1950年11月17日。

一部分，西藏问题完全是中国的一个内政问题。中国人民解放军必须进入西藏，解放西藏人民，保卫中国边疆，这是中国政府的坚定方针。中国政府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所通过的共同纲领的规定，承认中国境内少数民族的区域自治，是在中国主权范围内的自治。

关于这一点，印度政府在其本年八月二十六日致中国政府的备忘录中曾经承认过。但当中国政府真正行使其国家主权，开始解放西藏人民，驱逐外国势力和影响，以保证西藏民族得以免除侵略，实现区域自治和信教自由的时候，印度政府却企图影响和阻止中国政府对于西藏的国家主权的行使，这不能不使中国政府十分惊异。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诚恳地希望中国人民解放军能和平地进入西藏，担负起解放西藏人民、保卫中国边疆的神圣任务，因此，很早就欢迎滞留在印度的西藏地方代表团尽快前来北京，进行和平谈判。但该代表团始终是受到明显的外力阻挠，迟不前来。并且西藏地方当局还利用拖延谈判的时机，在中国内地西康省的昌都布置重兵，企图阻拦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西藏。

本年八月三十一日，我外交部经由潘尼迦大使曾通知印度政府，中国人民解放军即将在西康西部按照预定计划开始行动，希望印度政府协助西藏代表团能于九月中旬以前到达北京，开始和平谈判。九月上中旬，我申健代办、袁忠贤大使曾先后当面通知该代表团务必于九月内赶到北京，否则该代表团应负一切延宕的责任和后果。

十月中，我袁大使又将此事通知印度政府。可是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团依然由于外界唆使，制造各种借口，迟不离印。

中国政府虽然仍未放弃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愿望，但中国人民解放军却不能一再推迟预定的进军计划，而昌都的解放更加证实外国的势力和影响是通过西藏军队阻挠西藏问题的和平解决。可是无论西藏地方当局愿否进行和平谈判，及谈判结果如何，任何外国的干涉都是不容许的，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解放人民也是定了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为表示对印度共和国政府的友好起见，并谅解印度政府愿意见到西藏问题和平解决，曾将我政府在这一方面所做的努力随时通知印度政府，但是中国政府不得不认为极大遗憾的是印度政府竟不顾事实，将中国政府对其领土西藏行使主权的内政问题认为是势将助长世界上可悲的紧张局势和国际纠纷。

印度共和国政府屡次表示它在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与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发展中印友谊，并制止世界走向战争的愿望。中国人民解

放军进入西藏正是为了保障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一切愿意尊重中国领土主权的国家，首先应该在这一问题上表示出他们对中国的真正态度。

同时，我们认为目前威胁着各国独立与世界和平的正是那些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势力。为了维护国家独立和保卫世界和平，就必须反抗这些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势力。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正是维护中国独立、制止帝国主义侵略者将世界拖向战争、保卫世界和平的一个重大步骤。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欢迎印度政府又一次声明它对中国的西藏并无政治的或领土的野心，亦不求取新的特权地位。只要彼此严格遵守互相尊重领土主权及平等、互利的原则，我们相信，中印两国的友谊应该得到正常的发展，中印在西藏的外交、商业和文化关系，也可以循着正常的外交途径，获得适当的互利的解决。

（翻译参考《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集第一集》，并按照原文修改——译注）²¹

虽然这个复照仍然完全否定对中国人进攻昌都的质疑，但是印度政府还是从这份更趋于外交辞令的信件中看到积极的一面，这积极的一面正是关于印度在西藏的商业利益和其对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兴趣。印度外交部秘书梅农（Menon）告诉英国驻印度高级专员，中国的复照没有明确质疑印度保留其在西藏的商务代表处等机构的权力，而且上面还提到通过外交途径讨论印度在西藏的利益问题。梅农评价说这份复照与中国大使先前的声明相比是相当善意的。²² 于是印度政府马上给联合国代表团发去一份没有多大诚意的指令，决定撤回其对西藏申诉书的支持：

- (a) 印度政府不欣赏萨尔瓦多的提案，请劳（B. N. Rau）不要给予支持。
- (b) 需要仔细思考处理西藏申诉书的时机问题。朝鲜问题无疑是最重要的，所以在这个关键的时刻，最好不要说或者做有可能导

21. 香港友联研究所编，1968: 16–18。

22. 英国外交部档案，FO371/84454，英国驻印度高级专员致伦敦的英联邦关系部的电报，1950年11月21日。但是梅农也评论说，实际上只要中国人具备了条件，他们就会将印度人赶出西藏。他也暗示大体同意英国对西藏法律地位的阐述（见前文）。

致与中国的关系恶化的事情。因此，最好不要在此刻对西藏的申诉书作出任何反应。对中国人在西藏的行动进行谴责不会产生什么好的效果，而且现在这么做也一定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²³

■ 联合国关于西藏申诉书的辩论

11月24日，星期五，也就是达赖喇嘛亲政仅仅一周的时候，总务委员会针对是否应当在萨尔瓦多的要求下，将“外国武装入侵西藏”的问题提交联合国大会进行了辩论。联合国简报对这次辩论的记录（使用第三人称）见下文。提出动议要求暂缓对西藏的申诉采取行动的不是别人，正是英国代表荣格（K. Younger），而且他的动议得到印度的强烈支持。现在破坏西藏向联合国寻求帮助的申诉行动的不是其他国家，正是西藏的两个传统伙伴。

辩论从萨尔瓦多的卡斯特罗宣读他的提案开始，过程记述如下：

两周以前，萨尔瓦多的代表要求秘书长提供一份西藏政府给联合国的申诉书的副本。秘书长已经答应了这个请求，但是到现在还没有付诸行动。为了实现《宪章》中的宗旨，联合国不应当把自己孤立起来，不与那些还没有成为本组织成员的政府接触。每一封由非成员国提交给联合国的信函都应当让所有会员国家了解。他〔卡斯特罗〕感到很遗憾，因为秘书长没有把西藏政府的申诉书散发给各个代表团。他要求联合国大会主席尽一切可能确保所有来自非会员国的信函和文件可以同其他来自会员国的一样，散发给那些被召集来参与决策的会员们。中国军队侵略西藏的事实已经被全世界的媒体报道了。因为西藏政府拒绝服从所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命令，后者便决定派军队征服西藏。人们应当牢记，西藏政府一直表现出愿意同所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和平谈判的意愿。在侵略发生的时候它的一个代表团已经准备要前往北京。

23. 英国外交部档案，FO371/84454，巴杰帕伊在同英国驻印度高级专员的谈话中透露的指示内容，引自英国驻印度高级专员致伦敦的英联邦关系部的电报，1950年11月30日（划线部分为强调）。

我们得到的信息很有限，我们所知道的是西藏正被外国军队侵略，但是具体被占领的领土面积还不得而知。

在向总务委员会提交它的提案之前，萨尔瓦多代表团需要面对一个很特殊的质疑，它被问到它的政府在这个问题上是否是受到其他国家的影响而起着代理人的作用。萨尔瓦多政府一直表现出完全的独立自主，而萨尔瓦多代表团也一直与它的政府保持着一致。因此，没有国家可以影响萨尔瓦多政府和萨尔瓦多代表团。接着他〔卡斯特罗〕回顾了萨尔瓦多代表团主席于1950年11月14日发给联合国大会主席的电报和信件（A/1534）。

萨尔瓦多代表团希望能够不经总务委员会讨论而直接由联合国大会作出决议。这是一起国际间的武力侵犯事件，是总务委员会所不能忽略的。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一条第一项，联合国必须“维护国际和平及安全”。当然，西藏不是这个组织的成员，但是联合国维持和平的范围并不仅仅限于成员国之间，而是整个世界。

针对西藏的武力侵犯应该得到大国的特别注意。他回顾过去说，曾经有一个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指责其他的常任理事国在处理问题时总是从自己的相关政治利益出发。这样的指责是没有根据的，但是如果联合国大会拒绝考虑萨尔瓦多的提案，那么指责就不完全是空穴来风了。

杜勒斯先生（Dulles）曾经说，中国的独立和领土主权受到威胁，所以如果联合国大会对此无所作为将会让全世界失望。那么对于这样的一国对他国的武装侵略行为，联合国大会如果以讨论这个问题会使现在的局势进一步复杂化为借口，而漠视这种行为的话，将会同样令人失望。人们也许还要问，这样说有什么依据。联合国成员国的代表经常在联合国大会里发表强硬的声明，对奉行危险政策的政府提出指控。这类声明体现了代表们有完全的自由来表达意见，这比起讨论西藏受到侵略的问题更有可能导致国际局势的复杂化。

有人宣称西藏根本不是完全自治的，它只是中国的一个省，所以中国军队对它的侵犯应该是一件内部事务，应该完全由中国政府自己处理。他〔卡斯特罗〕希望向总务委员会的成员提供某些信息来表明这个论点是没有事实根据的。他接着宣读了摘自《钱伯斯百科全书》（*Chambers Encyclopedia*）（第13卷）的一段话……

……他〔卡斯特罗〕认为，联合国大会不能仅仅以这个隔绝于世界之外的国家很少同外部世界交流为借口，就忽视这种对西藏的侵略。西藏在战略上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高耸的西藏高原是印度的屏障。

西藏政府的代表正在来纽约向联合国大会或秘书长申诉的路上。总务委员会不能在还没有听到他们的申诉的情况下就驳回他们的申诉。

最后，卡斯特罗先生宣读了他的代表团提交的决议草案，并总结道：总务委员会最起码应当对这种针对西藏的无端侵犯进行谴责。²⁴

紧接着是英国代表荣格发言。正如我们前面已经看到的，尽管外交部赞同为西藏的申诉提供某种形式的支持，但是英国代表团却倾向于回避辩论西藏问题。实际上在 1950 年 11 月 18 日伦敦给他们驻联合国的代表发去一份较为明确的临时指令。指令说：

你们应该坚决主张，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三十五条第二项西藏有权提出申诉。这样做的理由已经在英联邦关系部致德里的第 2539 号电文中阐述过〔前面已经讨论过〕。如果这个问题被提出，你们应当阐明，即使中国名义上的宗主权也须以承认西藏的自治为前提。所以西藏提出申诉和呼吁援助的权力并不会因此而失效。但是在这个新的形势下，你们不应当表态是否继续承认中国的宗主权，而应当对中国在没有受到挑衅以及和平谈判正在进行的时候诉诸武力和军事压力表示痛心。如果需要，你们可以根据上面这些原因，支持一项谴责中国的行动的决议。但是除非收到进一步的指令，你们不应当支持任何或明或暗要求联合国动用军事手段进行威慑的决议。²⁵

尽管英国的档案中没有发现抵触这些电文的后续指令，但是似乎英国在这个问题上服从印度领导的总方针，给了荣格足够的理由决定在这个时候不采取任何行动。诚如我们刚刚了解到的，印度希望阻止联合国总务委员会的辩论。因此，当总务委员会的讨论一开始，荣格就说他：

24. 引自达赖喇嘛办公室编，7-10 页（出版日期不明）。

25. 英国外交部档案，FO371/84454，英国外交部致英国驻联合国代表团的电报，1950 年 11 月 18 日。

不认为他应当参加关于西藏问题的一般性辩论。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英国代表团想要逃避自己的责任或者阻止联合国承担完全的责任。总务委员会面对的问题只是程序性问题，真正的问题在于选择讨论西藏问题的最好方式。对问题进行讨论只是设法解决问题的一道工序，并不是最终目的。

总务委员会并不清楚到底在西藏发生了什么，同时这个国家的法律地位也不是很明确。而且我们仍然希望，西藏现在面对的困难局面可以通过当事双方的协议妥善解决。既然如此，如果总务委员会的成员等更了解和平解决的可能性之后再作决定，那将会是更明智的。因此他建议，总务委员会应当推迟对萨尔瓦多代表团的请求作出决定。²⁶

尽管英国外交部此时并不认为荣格在联合国的发言是他们的最终观点，而仅仅视其为程序上的拖延手段，但是这个发言却极大地挫伤了西藏倾西方的领导层。这些人突然发现在所有国家中，说西藏的法律地位并不明确的竟然是英国，这使他们一下子蒙了。²⁷

紧接着荣格发言的是印度代表纳瓦纳加尔邦的贾幕·萨赫布（Jam Saheb）。他发表强硬的发言说，印度作为与此利害关系最大的国家，感觉还是有和平解决的机会，而联合国能给予的最大帮助就是不要讨论西藏的申诉。同一份联合国的官方简报记录了他的发言内容：

他的政府〔印度〕已经仔细研究了萨尔瓦多政府关于把外国武装入侵西藏排进联合国大会议事日程的提案所衍生出来的问题。西藏问题对中国和印度都是至关重要的。总务委员会非常了解，作为中国和西藏的邻国，印度是最关心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国家。这就是为什么印度政府非常盼望它可以通过和平的手段加以解决。

他不想对存在于中国和西藏之间的困难局面发表看法，但是愿意指出，在他的政府最近收到的照会中，北京政府申明并没有放弃通过和平手段解决这个问题的意图。这可以从中国军队在占领离拉萨只有大约 480 公里的昌都之后停止进攻看出来。印度政府确信西

26. 达赖喇嘛办公室编，11 页（出版日期不明）（划线部分为强调）。

27. 因为英国的首席检察官尚未对外交部关于西藏法律地位的论述作出评论，所以按照英国人的观点，其联合国代表团称英国政府认为西藏的法律地位并不明确，在技术上并不是在说假话。

藏问题仍然可以通过和平手段解决，而且这种解决方式可以确保西藏在保持同中国的历史联系的同时享有几十年来一直享有的自治。

他的代表团认为实现这个目的的最好方式是暂时把这个问题排除在联合国大会的议事日程之外。正因为这个原因，他支持英国代表的提议，也认为应当延后考虑萨尔瓦多的要求。²⁸

然而，尽管印度代表这么说，印度政府却完全了解中国人和西藏人此时并没有在谈判，也知道他们的意图相去甚远。而且印度所谓的**确信**会有和平的结果其实并不可信。实际上，英国外交部在一份 11 月 28 日的备忘录中表达了英国人对中国给印度的最后一份复照的看法，他们认为从这封复照里“看不到和平解决的希望”。²⁹

在印度代表发言之后，其他所有的国家都纷纷表示同意。澳大利亚代表基思爵士 (Keith) 说他“赞成英国代表和印度代表的观点。鉴于印度代表发言中所阐述的原因，他愿意毫无保留地支持英国关于延期考虑萨尔瓦多的请求的提议”。³⁰ 另外，苏联代表也表示：

同意英国代表的提案。但是，他希望阐述他的代表团对于西藏问题实质的看法。西藏问题是一个极其简单的问题：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藏问题是中国的内部事务，其他国家无权干涉。

萨尔瓦多的代表引用了报纸上的文章和百科全书的条目，但是他没有引用任何可以佐证西藏是独立的国家以及中国的行动是侵略行为的国际法律文件。中国对于西藏的主权长久以来是受英国、美国以及苏联承认的。

因此，西藏问题本来就属于中国的管辖范围之内。联合国不能讨论这个问题，如果联合国这么做了，就是干涉中国人民的内部事务。中国人民才刚刚从几个世纪的外国势力的支配中解放出来，对他们的干涉是一种犯罪。所以，他的代表团将赞同延期考虑萨尔瓦多代表团的请求，甚至将支持驳回这个请求。³¹

28. 引自达赖喇嘛办公室编，11-12 页（出版日期不明）（划线部分为强调）。

29. 英国外交部档案，FO371/84454，英国外交部的斯科特的备忘录，1950 年 11 月 28 日。

30. 引自达赖喇嘛办公室编，12 页（出版日期不明）。

31. 达赖喇嘛办公室编，12 页（出版日期不明）。

最终，在来自台湾的中国国民党政府代表团发表了长篇的演讲之后，总务委员会一致同意延期讨论萨尔瓦多的提案。表决之后，美国代表欧内斯特·格罗斯（Ernest Gross）紧接着进行了发言。根据这份联合国的简报记载，他说：

他〔格罗斯〕投票赞成延期讨论萨尔瓦多的提案，这是因为与西藏交界并因此有着相关利益的印度政府已经向总务委员会表达了愿望，希望西藏问题能够得到和平和妥善的解决。根据美国的传统政策，在任何其他的情况下，美国都会投票赞成把西藏问题排入联合国大会的议事日程。对任何要求联合国处理涉及侵略行为的国际争端和投诉的提案，他的政府都抱着支持的态度。因为这样，这些问题才能在国际监督下得到公开，受到重视，并最终得到解决。这是美国政府一贯的原则，即使是对美国提出谴责的提案也不例外，不会因为这些谴责所具有的荒谬性和欺骗性而有所迟疑。

但是，在这个案例中，美国代表团支持与萨尔瓦多代表团提案最相关的国家的意见。³²

于是，西藏在联合国的第一次申诉以失败告终。来自国际社会的反应让他们极度失望。西方国家，例如美国和英国，拒绝为西藏的申诉提供支持，甚至不让西藏代表团进入他们的国家。尽管中国在未受到挑衅的情况下侵犯了西藏领土，联合国却没有显示出过多的兴趣，而是将西藏呼吁援助的紧急申诉束之高阁。印度政府一方面在国际上强烈坚持西藏问题最好由中国和西藏单独解决，另一方面拒绝让其领土作为援助西藏的基地或运输通道，它的这些行为起到了帮凶的作用。而这个问题的当事方西藏，它的护法神也被证明是毫无用处的。所以，在1950年冬季开始的时候，西藏的领导层面对的是一个非常暗淡的前景。

32. 达赖喇嘛办公室编，12页（出版日期不明）。

第四章

和北京的谈判

向联合国提出的第一次申诉失败了，其原因并非来自于苏联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破坏，而是来自于英国和印度这样的对西藏友好的民主国家的杯葛。然而，从技术角度来说，西藏的申诉仅仅是被搁置了，联合国并没有把大门完全关上。所以噶厦当局立即想方设法寻求国际支持，准备利用仅有的一点机会提出新的申诉和进行新的宣传活动。但是正当噶厦在向联合国提出新的申诉的时候，中国方面以他们在昌都战役的胜利为筹码展开了对西藏新一轮的争取工作，意图说服西藏派出代表团来谈判。此时的噶厦发现自己现在的处境很窘迫。在收到联合国的答复之前西藏可能有两个选择，要么通过谈判谈出一个不如人意的“和平解放”协议，要么走非常的一步，让达赖喇嘛和他的高级官员一起流亡。但是要等多久才能收到联合国的答复呢？

.....

到了 11 月底，很多在拉萨的官员开始担心解放军会不顾冬天的恶劣天气在不久之后发起新的进攻，并且会迅速彻底地击败其余的藏军，占领拉萨。而且，在昌都的解放军部队并不是惟一的威胁。来自西北局的解放军部队已经到达西藏的最西部。他们于 1950 年夏天从新疆过来，现在已经占领了日土（Rutog）及周边区域。如果他们向东进发占领日喀则和江孜，就可以切断从拉萨逃往印度的去路。于是在 1950 年 12 月，西藏官员形成共识，觉得最稳妥的办法就是把年轻的达赖喇嘛转移到亚东。亚东在与锡金接壤的边境上，这样他就仍然可以待在西藏的领土上，而一旦中国继续向卫藏进军，他和他的高级官员就能轻而易举地逃往印度。¹

1. 对这一时期的详细描述见戈尔斯坦，1989: 737-40。

达赖喇嘛任命了一些官员代替随他前往亚东的官员的职务，之后便于1950年12月18日离开拉萨，并于1951年1月2日到达亚东。现在他虽然没有军队随行，但在那里，中国却是鞭长莫及。与此同时，西藏政府也在尽力保护他们的财产。他们把成百上千驮的黄金、白银和其他贵重物品运到甘托克（锡金首都），那里的锡金藏族王公答应为他们保管这些财富。

当这一切正在发生的时候，中国方面为实现它的真正目标开始行动了。这个真正目标就是要与达赖喇嘛达成和平解放的协议。所以，无论是前面提到的有限进攻之后就停战，还是像对待“兄弟”而不是敌人一样对待俘虏的士兵和官员，所有这些行动都是为了这个目标。此外，他们还对被俘虏的数千藏军官兵进行了一些关于共产党的宗教和民族政策的宣传（中国人称之为“教育”），在遣返之前还送给他们一些大洋作为路费。北京还继续通过无线电广播、宣传册和布告向西藏人民保证中国不会改变西藏传统的社会和宗教制度。1950年11月9日的这样一份布告中说：

我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和人民解放军朱德总司令深切关怀西藏人民长期遭受英、美帝国主义及蒋介石反动政府的压迫，特令本军开入西藏，帮助西藏人民永远解脱此种压迫。

我西藏全体僧侣、人民应即团结一致，给人民解放军以充分的援助，以便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实现西藏民族的区域自治，并与国内其他各民族建立像兄弟一样的友好互助关系，共同建设新中国的新西藏。

人民解放军入藏之后，保护西藏全体僧侣、人民的生命财产，保障西藏全体人民之宗教信仰自由，保护一切喇嘛寺庙。帮助西藏人民开展教育和农、牧、工商业，改善人民生活。

对于西藏现行政治制度及军事制度，不予变更。西藏现有军队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武装之一部分。各级僧侣、官员、头人等照常供职。一切有关西藏各项改革之事宜，完全根据西藏人民的意志由西藏人民及西藏领导人员采取协商方式解决。

过去亲帝国主义与国民党之官吏，如经事实证明，与帝国主义及国民党脱离关系，不进行破坏和反抗者，仍可一律继续任职，不究既往。

人民解放军纪律严明，忠诚执行中央人民政府上述各项政策。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说话和气，买卖公平，不妄

取民间一针一线，借用家具均经物主同意，如有损毁，决按市价赔偿。雇佣人、畜差役，均付相当代价。不拉夫、不捉牲畜。²

被俘虏的拉萨官员也得到尊重。阿沛搬回了朵基官邸，吃的是只有中国高级官员能吃到的罐头。十八军中主要的藏族干部平汪负责同阿沛和他的高级助手崔科（Tsögo）进行谈话，向他们介绍共产党的民族和宗教政策。他详细地解释了大体的政策和中国共产党为西藏开出的条件，并强调武力抵抗中国人是徒劳的。平汪直截了当地告诉阿沛，武力抵抗就像中国人一句古老谚语所说的，“无论鸡蛋碰石头还是石头碰鸡蛋，结果都一样。”³

中国人想要通过协商解决问题的愿望正合阿沛的心意，从一开始他就想同中国谈判，而不是对抗。⁴ 据说他甚至在刚被俘虏时就说：“我们被你们打败了，所以我们现在是你们的阶下囚。不管你们逮不逮捕我们，我都希望我们可以好好地谈谈，谈出一个和平的方案。我只能说这些了。”⁵ 平汪介绍说，接下来：

鉴于改善同阿沛与其他拉萨官员关系的努力产生了良好的效果，所以我们商量了一个办法，觉得可以用他们说服拉萨来谈判。这需要阿沛写信给他在噶厦的同事，解释在他们身上发生的事情，说明现实和机遇，并催促他们答应派代表来。

阿沛答应了。我们觉得信的内容需要字斟句酌，所以先由崔科拟出初稿，再由他、阿沛和我进行讨论，修改了好几遍。然后我把它交给了王其梅，他又和阿沛一起仔细地检查修改了好几遍。最后阿沛和其他西藏官员在信上签了字，并派人送往拉萨。⁶

-
2. 美国国家档案馆，693.93B/11-2250。这份布告的英文翻译收录在美国国务院中国事务部给远东事务办公室的一份备忘录中，1950年11月22日（划线部分为强调）。
 3. 平汪，访问记，2000，北京。对于中国方面早期的一些失策行为的描述见戈尔斯坦、道帛喜饶和司本石初，2004: 143。
 4. 实际上，他的前任拉鲁批评他故意削弱了正常的防御。拉鲁说阿沛实际上已经开始拆除建在山上的工事，因为担心它们会刺激中国发起进攻（拉鲁，访问记，1992，拉萨）。
 5. 霍尔素尔（Horsur），访问记，1992，达兰萨拉。这里是他回忆同他的亲戚阿沛的谈话内容。
 6. 戈尔斯坦、道帛喜饶和司本石初，2004: 142-43。

阿沛对这个过程的描述稍有不同，这个不同之处在于按照阿沛所说，写这封信并非出于命令，而是主动为之。

在昌都战役之后同共产党接触的两个月里，我发现他们非常优秀，他们与拉萨的谣言中所描述的完全不同。就算刮风下雨，他们也不住寺庙和民房，而只住在帐篷里。买东西的时候，他们也非常诚实，不妄取一针一线。他们在行动中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管是干什么，解放军都以为为人民服务为出发点。他们给人们看病，并且还开办了一所学校。他们还帮助在生活上有困难的人们。

因为亲眼看到这些，所以我们主动开了一个会。会上我们在昌都的36位拉萨官员讨论了时局。据说，很多虚假的谣言正在拉萨散播，每个人都变得很害怕，很不知所措。毛主席已经决定解放西藏。如果最终是以武力解放卫藏，自然会有一场大战，人民会遭受战争的磨难。同时，以十四世达赖喇嘛为首的宗教和世俗上层有逃往印度的危险。如果这样，那将是非常糟糕的。因此，与会的所有人一致决定我们应当给达赖喇嘛发一封信，建议他同中央政府举行谈判。信中说，如果西藏能得到和平解放，僧侣和俗人将免于承受战争的痛苦，寺庙和村庄也能免遭破坏，大家可以不用分开，不用承受离散之苦。因为我们已经亲身体会到解放军和中国共产党的善行，所以我们不相信谣言中所说的。我们真诚地建议您同中央政府展开和平谈判。当这封信完成之后，我们派人告知王其梅，他对此表示支持。⁷

为了增强说服力，这封劝和信由阿沛身边的两位官员僧官坚赞平措（Gyentsen Phüntso，孜仲）和俗官桑林（Samling，噶准）带往拉萨。1950年12月5日，这两位官员在没有中国官员陪同的情况下离开了昌都。因为阿沛并不确知谁在拉萨主事，所以在信件的抬头上写了“致拉萨的主事官员”。⁸

这两位官员骑马狂奔，七天之后，也就是12月12日赶到了拉萨。此时达赖喇嘛刚刚亲政不久，再过六天他将离开拉萨逃往亚东。坚赞平措回忆起这段路途和他在拉萨受到的接待情况时说：

7. 阿沛，1989: 4。

8. *Lha sa'i bzhugs mkhan chab srid kyi gan 'kher mkhan gto su yin nas der 'bul rgyu Nga phod* (阿沛，1989)。

阿沛和王其梅给了我们一些路费，王其梅又给了我一支枪……我也有西藏政府发的可在沿途免费征用运输服务的通行证。但是只有一些地方认可这个证件，有些地方什么也不给。过了硕般多（Shopando）有一条我们必经的山路，农奴说：“我们已经被解放了，所以我们不再支马差了。”于是，我们不得不背着马鞍和来复枪徒步走过那条山路。那之后，我们用西藏纸钞买了马（大概 128 桑吉一匹）。一共七个日夜之后我们骑马到了拉萨边上。我们太急于把消息告诉达赖喇嘛和噶厦，所以一路策马狂奔，最后死了两匹马。

拉鲁在嘉黎（Lharigo，拉日廓）。他问昌都的情况怎么样，所以我就告诉他我知道的……我在拉鲁那里待了两个小时。拉鲁从嘉黎发了一封电报到拉萨，说我们来了。

问：你带来的信有哪些内容？

信的主要内容是：同共产党在战场上对抗是不可能胜利的。如果我们打，西藏人民会遭受很大的痛苦，所以最好举行和平谈判。中国人抓住了我，我（阿沛）现在在昌都。如果你们想展开谈判，请派代表来。

我们继续前进，到达 Thomora（仅凭英文地名，无法确认地点——译注），见到一个从拉萨来的政府信使。他马上下马，摘下帽子说：“两位尊贵的老爷扎西德勒”。他说他是政府专程派来欢迎我们的，并且带了一个噶厦的口信给我们，叫我们不要换衣服直接去。所以我们一赶到就直接去找噶厦，那时他们正在祖拉康开会。我们在松曲热（Sung jör，祖拉康南门）下马，一大堆人在那里等着见我们。有些人说：“可怜的人啊（藏语：*nyingje*），他们跑了那么远的路。”另一些人则说：“他们出卖了我们。”当他们这么说的时我并没有生气。

我见到噶伦的时候，然巴、索康和土登饶扬（Thubden Ramyang）在场。平时像我们这种级别的官员是不能就这样进去的，但是这一次他们说：“进来，进来。”我们把信给了他们……然后给他们解释昌都的事件和局势。……噶厦里有两类（噶伦），一类的特点是顽固和好战，另一类则不同。然巴说：“啊，我们的敌人像钢铁一般，但是我们却像糌粑一样；我们该怎样应对这个局面”〔钢铁是坚硬的，但是糌粑可以揉搓成各种形状，即太柔软了〕。他不喜欢这样，他希望去战斗，他是属于好战的一派。我们并没有回答他，只是说：“是，是，是。”索康是个聪明人〔他并没有表

明他的想法]，他说：“哦，你们这段时间太辛苦了，这不是你们的错。阿沛和他的手下全都没事，这非常好。”所以噶伦们告诉我们：“你们两个人放松，去休息几天吧。”⁹

针对阿沛的信的讨论马上开始了。民众大会召开了，会上两种不同的观点发生激烈的冲突。有些人说西藏不应该屈从于共产党，应该继续战斗。但是大部分人觉得西藏应该采纳阿沛的建议，展开谈判。因此，大会同意派两个代表去昌都帮助阿沛同中国人谈判。坚赞平措记得在达赖喇嘛离开拉萨的那一天，他被告知哪些人会作为代表被派往昌都。

上午十一点，我收到命令，要我和桑林在下午四点去噶厦。这一次，夏苏和土登饶扬在那里。他们告诉我们，“达赖喇嘛已经前往亚东避难了，现在两位司曹掌管一切。我们受他们领导。大家已经决定寻求和平谈判，我们正派堪穷土登列门（Thubden Lengmön）和四品官桑颇（丹增顿珠，Tenzin Thundrup）从拉萨出发……你们经历了很辛苦的时期，但这完全是为了保护宗教。所以请跟这两位代表一起去昌都，今天就出发。”……所以我们返回昌都。这次我们花了二十六天的时间〔到达那里〕。¹⁰

桑颇回忆了自己受命作代表的情形以及当时拉萨的大体情况。

当我被告知要前往中国时，我没有考虑太多。拉萨的生活是非常不确定和紧张的，到处充满了谣言。我预期中国人不会伤害我们，因为我们是作为代表前来的。而且我觉得与其担忧地坐在拉萨等着事情发生，还不如做些什么。我父母已经带着我们所有值钱的东西前往印度了〔在1950年7月〕，所以我不担心他们。那时，所有的上层贵族家庭，比如擦绒家和索康家，都已经做了安排，把财产运到印度去。……〔而且〕在那时，人们觉得虽然昌都已经陷落，但是他们并不需要在印度待多久。我和妻子一起匆匆安排了〔前往昌都的〕行程，并安排把我们留在拉萨的剩余财产运到我们的一个庄园去。¹¹

9. 坚赞平措，访问记，1992，拉萨。

10. 坚赞平措，访问记，1992。与此同时，阿沛因为没有收到这两位官员的任何消息，所以又派了两位官员〔嘉仲吉嘉（Jarong Jija）和堪穷洛卓格桑（Lodrö Kesang）〕去拉萨。

11. 桑颇，访问记，1981，拉普（Rajpur），印度。

桑颇和土登列门在1951年2月的第三个星期到达昌都，那一天正好是藏历新年的前一天。

然而，实际上这种对谈判表现出的诚意是虚假的。西藏领导层其实仍然没有准备好被和平解放。他们仍然对联合国抱有希望，而且已经给夏格巴发去一份新的申诉书，要他设法送到成功湖去。派桑颇和土登列门去昌都主要是一种拖延策略，这一点似乎可以从两位代表收到的指令清楚地看出来。

桑颇回忆起他在拉萨刚看到书面指令时的反应。

我扫了一眼列出的五点，很好奇具体的内容是什么。但是当我仔细阅读后，我意识到如果我们依据这五点来执行我们的任务，是不可能成功地完成和平谈判的。所以我想也许这仅仅是作为对外宣传之用，而我们会收到一份不一样的口头指令。我是这样认为的，所以我去见每一位代理噶伦及两位司曹，表面上是向他们告别——但是实际上希望他们会给我另外一些指示。但是他们却丝毫没有提及……

问：这五点分别是什么？

与其说它们是谈判要点，还不如说是针对一些问题的答复。我记得有一点是答复中国国民党所宣称的中国的五个不同种族是同一民族，所有这五个种族必须统一在一起。这一点说我们是西藏人，与中国人不同。我们不知道任何有关其他种族或民族的事……我已经忘了其他的几条，但是记得它们完全不能作为谈判的基础。没有一点是实实在在的，没有一点是我们可以通过谈判进而达成一种妥协的。这是不可能的……他们告诉我们的只有“阿沛将会领导你们，你们必须服从他”这一句话。¹²

当桑颇到达昌都并见到阿沛之后，阿沛向他要了从拉萨带来的指令，然后拿回自己屋里看。没过多久，他返回来对桑颇说：

“这五点什么用也没有。你没有带其他什么口头指令来吗？”当得知没有的时候，他说：“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他们怎么能期望我们依靠这几点来谈判？”我不知道怎么回答。¹³

12. 桑颇，访问记，1981。

13. 桑颇，访问记，1981。

因此，对阿沛来说，按照这几条指令显然不可能达成任何协议。中国共产党已经下决心解放西藏，把西藏并入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是西藏政府仍然坚持过去的思路，认为西藏同新中国政府的关系可以像国民党时期或者清代一样，仍然不接受西藏即将成为统一中国的一部分。阿沛并不知道在联合国进行的新的申诉，所以在他看来，这是拉萨又一次的逃避现实之举。阿沛同其他西藏代表和人员一起深入地讨论了这个问题。最后他们认定，在昌都是无法根据这几条指示展开谈判的。

于是阿沛去找王其梅，建议王其梅带领一个由中国官员组成的小型代表团（由他陪同）去拉萨谈判，这是在1951年2月末3月初。王其梅同意了，所以阿沛立即派手下的两个官员——僧官土登朗杰（Thondrub Namgyal）和俗官顶云索巴（Dingyön Surpa）——通知在拉萨的司曹，告诉他们仅仅根据桑颇带来的指令无法在昌都举行谈判。另外，鉴于昌都和拉萨之间遥远的距离和通信上的困难，他建议司曹允许一个中国代表团到拉萨来举行谈判。他收到了肯定的答复。但是正当他和王其梅即将前往拉萨的时候，阿沛突然收到一份来自亚东（通过在德里的中国大使馆发来）的电报，说：“我们批准进行西藏地方政府同中央政府之间的谈判，所以你和在昌都的代表们应该马上由拉萨出发去北京，凯墨（Kheme）和拉乌达热·土丹旦达（Lhautara）将会经由海路前来。现任命你为五人代表团的首席代表。”¹⁴ 面对这两个相互矛盾的指令，阿沛决定按照来自亚东的指令行事，因为这个指令来自于达赖喇嘛的驻地。此时是1951年3月末。与此同时，西藏政府新的申诉书送到了联合国。

■ 西藏在联合国的第二次申诉

作为对联合国的初步决定的回应，西藏政府又通过辛哈代笔写了第二份申诉书，表达了它对联合国的行为的震惊和遗憾，并强调联合国组织的道德责任就是要维护弱小国家的利益，使之免受强大邻邦的侵害。在这份申诉书中，它邀请联合国派遣一个真相调查委员会，去调查西藏关于“西藏有别于中国的文化与存在”的主张，并说西藏希望派遣自己的代表团到成功湖去，其内容如下：

14. 阿沛，1989。

噶伦堡，1950年12月8日

我们刚刚听说联合国决定搁置讨论我们由于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端侵略而提出的申诉。对此，我们表示严重的关切和不安。痛苦和失望促使我们在这个被侵略的危急时刻向联合国组织寻求帮助，那些由于强大邻邦的侵略威胁而游走在自由边缘的国家更能理解我们的这种心情。我们这个民族由于自然环境的阻碍，长期与外部世界完全隔绝。现在我们已经逐渐认识到，维护国际和平和秩序只能依赖于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共同抵御侵略、明确反对使用暴力来解决国与国之间争端的坚强意志。

因此，对我们来说最令人震惊和遗憾的是，我们惟一信赖的联合国，这个以维护各国的和平幸福为己任的国际组织，在对待爱好和平的西藏的申诉时却是如此冷漠。要知道人口不到三百万的弱小西藏正承受着其强邻的强大军事进攻。而这个强邻是一个拥有四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其资源和财富是西藏所无法比拟的。难道是要我们相信我们的自由被中国的强权凌驾仅仅是缘于我们的宿命？

今天，众所周知的一件事是中国军队采取敌对行动侵入我们的版图，突然之间我们的一大片土地已经被侵略者占领了。我们在很早之前就向世界报告，说中国军队是如何出其不意地使用武力夺取了昌都城，并且还俘虏了我们派驻那里的大部分边防军。那些所谓的解放者从那时到现在并没有大举向前推进，可是他们的武装部队却在我们控制薄弱的西藏东部和西部地区徘徊。正因为如此，这种难以消除的长期威胁像阴云一样笼罩着我们和我们那清贫的家园。因此，为了达到和平的目的，捍卫我们的宗教事业，现在需要竭尽全力来保卫我们的国家免遭暴力毁灭，因为我们民族长期信仰的佛教将面临着致命的打击。我们相信，只有懦夫才会向强权低头。我们不会被他们目空一切的疯狂所压服，我们会拥抱我们的尊严，像勇士一样直面他们。

我们已经表态遵守联合国所倡导的任何一种解决措施。我们并不希望全世界都因为替我们着想而引起一场武装冲突，但是我们希望世界各国对我们如此谦卑地摆在他们面前的问题和请求不要无动于衷，并且我们想奉劝中国人不要耽迷于屠杀以及在我们和平的土地上耀武扬威。现在中国的代表已到达成功湖，这是全面而坦诚地商讨西藏问题及其他相关问题的良机。我们已经作出决定，如果有必要的话，在联合国大会审议西藏问题时，我们将派遣一个小型代表团前去协助。

如果任何一位联合国的代表对我们关于西藏文化的独立性和西藏脱离中国而存在的主张表示质疑或怀疑的话，我们很欢迎联合国派遣一个真相调查委员会到西藏进行考察，以厘清事实真相。

至尊达赖喇嘛在全体臣民的一致恳求下，慈悲地同意于 11 月 17 日亲政，执掌西藏的一切政教大权。正是由于他的赞许和福佑，促使我们鼓足勇气向联合国提交这份新的申诉书。

1950 年 11 月 3 日于拉萨，
西藏代表团，夏格巴（驻噶伦堡）¹⁵

几周之后的 12 月 21 日，西藏政府新任命的联合国使团向英国、美国和加拿大发出求助信，信中透露说他们准备前往位于成功湖的联合国总部，为此寻求各国的支持。¹⁶ 他们在给美国的信中说：

我们想通知阁下，我们三人，外务秘书札萨索康、札萨杰达巴（Gyaltakpa）和堪穷群培土登以及孜恰土登杰波和孜本夏格巴收到敝国政府的指示要前往成功湖去进行宣传，并执行噶厦政府和西藏民众大会向联合国提出的指控中国共产党采取敌对行动入侵西藏的申诉行动。现在我们全都到了噶伦堡。

虽然西藏政府最近才刚刚向联合国提交了申诉书，但大概还没有就进一步的讨论达成任何决议，而且我们也没有收到任何邀请我们参加联合国大会的通知，我们一直在焦急地等待这个通知。

西藏的政府和人民非常希望您的政府能在任何与西藏相关的问题上提供有效的帮助。我们非常真诚地希望您的政府能够帮助我们将西藏问题尽快提交联合国大会讨论。

我们也希望阁下能够提供您宝贵的意见，因为这将非常有助于西藏在联合国的成功。¹⁷

-
15. 英国外交部档案，FO371/84455，联合国 A/165 号文件（西藏申诉书的原稿）的副本，1950 年 12 月 11 日（不同的日期分别是起草的日期、翻译并从噶伦堡发出的日期。而 12 月 11 日是伦敦收到这份文件的日期）。在向联合国提出第一次申诉之后，夏格巴通知噶厦，联合国并不确定这份申诉书是来自西藏政府还是来自一个非政府组织，所以第二份申诉书在最后一句明确地提到这份申诉书是由西藏的统治者达赖喇嘛提交的。
 16. 美国国家档案馆，793B.00/12-2250，美国驻印度大使给美国国务卿的电报，1950 年 12 月 27 日。对此更详细的讨论见戈尔斯坦，1989: 746-57。
 17. 美国国家档案馆，793B.00/12-2650，引自美国驻印度大使馆给美国国务院的电报，1950 年 12 月 27 日。

给英国的信是相同的。伦敦最初指示其在新德里的高级专员用肯定的态度答复西藏的请求：

除非印度政府强烈反对，否则我们希望你用以下文字回应西藏的来信。

……在 1947 年，所有已存在的条约中的相关权利和义务都已经移交给印度政府。但是在这之后，英国政府仍然坚持它以前采取的维持西藏自治的态度。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中藏关系问题上不是寻求通过和平谈判进而达成协议的方式加以解决，而是诉诸于武力，所以总体来说，英国政府准备给予西藏政府在联合国的申诉以支持。¹⁸

但是，英国驻印度高级专员强烈反对作出哪怕是如此温和地表示支持的声明：

我强烈反对在与印度政府的沟通中作出这样的表示，我也强烈建议不要在这个节骨眼上用支持的语气来回应西藏的来信。

2. 〔印度政府的〕外交部长今天早上证实了我们的看法，西藏现在的情况很平静，没有迹象表明中国提早恢复向拉萨进攻。外交部长很有信心地说，潘尼迦最近从北京报告说中国代表和西藏政府代表的谈判正在昌都进行……
3. 至于在联合国方面，外交部长说据他所知西藏代表团仍然在印度，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计划前往纽约。他所持的观点代表印度的观点，也与我们的看法一致。在中国人没有采取进一步行动的情况下，考虑到在成功湖还有许多问题正在讨论，眼下最好不要拿有关西藏申诉的事情来搅局。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在收到信件之后五周左右就给他们回信会被他们解读为鼓励他们在成功湖更加积极地行动。如果这传到中国人的耳朵里，他们当然会把这看成是英国干涉行为的进一步证据。印度政府当然会考虑中藏双方对此可能的反应，也会质疑究竟我们为什么会认为需要作出这样的答复，并且会反对我们

18. 英国外交部档案，FO371/84455，英联邦公共关系部给英国驻印度高级专员的电报，1950 年 12 月 16 日。

的这一做法。顺便说一句，并没有迹象表明西藏人预期会得到我们的答复。¹⁹

英国驻联合国代表团给出了同样的答复，这使得伦敦没有采取任何行动。²⁰ 最终，它给驻印度高级专员作了如下指示：

我们不能向西藏人保证〔英国会协助西藏把申诉书提交到联合国〕，这是因为联合国很多问题正在讨论，我们不认为这是提出有关西藏申诉问题的适当时机。而且，即使不考虑这些因素，我们也不会带这个头，因为印度政府在这个问题上拥有更直接的利益和责任。如果西藏的申诉书真的提交到联合国讨论，总体来说我们当然会予以支持……但是，我们相信此时此刻因为有他们的上一封来信为背景，所以即使像这种程度的保证也很容易误导西藏人，因此我们不应当做任何可能使他们产生过分期望的事情。²¹

然而，伦敦还是指示高级专员可以向前往联合国的西藏代表团签发过境签证。²²

印度政府在同美国大使和英国高级专员的沟通中表现出的态度甚至更加负面。12月18日，巴杰帕伊说印度对于西藏提案问题的态度没有改变，即反对联合国接受西藏的申诉。他说：“印度政府对联合国的西藏提案仍然有兴趣，但是由于印度在促成朝鲜达成停火上的努力还没有成功，所以需要推迟采取行动。印度政府断定，现在在联合国里批评共产党中国会削弱印度对中国朝着停火方向施加影响的能力。”²³ 几周以后，巴杰帕伊向美国列出了同样的理由：“如果印度政府向联合国提出西藏提案，共产党

19. 英国外交部档案，FO371/84455，英国驻印度高级专员给英联邦公共关系部的电报，1950年12月18日。

20. 英国外交部档案，FO371/84455，英国外交部给英国驻联合国代表团的电报，1950年12月7日。

21. 英国外交部档案，FO371/93002，英联邦公共关系部给英国驻印度高级专员的电报，1951年1月2日。

22. 英国外交部档案，FO371/8469，英联邦公共关系部给英国驻印度高级专员的电报，1950年12月9日。

23. 美国国家档案馆，793B.00/12-1850，美国驻印度大使给美国国务卿的电报，1950年12月18日。

中国将会感觉受到孤立，以至于使印度政府失去在朝鲜实现停火等相关问题上对中国的影响力。因此，在印度看来西藏提案必须暂时搁置。”²⁴

但是在这一时期，美国方面却开始对西藏问题关心起来，并开始同情西藏的境遇。12月14日，美国国务院给美国驻印度大使发去如下电报：

国务院非常希望探讨寻求美、英、印在阻止中国共产党进攻西藏问题上形成一致立场的可能性，但是现在看来这个努力似乎停滞了……

在国务院同英国沟通之前，希望你们就以下问题发表看法：(1) 获得印度对西藏提案提供积极支持的可能性；(2) 如果美国秘密地向西藏提供支持，以增强西藏的抵抗力量，印度政府会有什么反应；(3) 对于以上两个方面，你们有什么实施建议。²⁵

韩德逊大使于12月30日答复了电报，内容倾向于建议华盛顿向西藏人提供援助。

我们一直在仔细思考把西藏提案提交联合国讨论可能引发的问题。目前看来，由印度主导这一问题还是更可取。印度政府驻联合国代表不断向我们保证他们准备这样做。现在看起来B. N. 劳和其他一些印度官员的观点很盛行，他们不希望印度在现今的国际竞技场中走得太远，担心那样会冒犯共产党中国。而印度政府也一直很犹豫要不要就西藏问题在联合国发挥主导作用。似乎共产党中国很可能在印度政府决定在联合国发挥主导作用之前占领拉萨，然后牢固地控制住西藏。现在我们似乎有两个选项，要么支持印度之外的其他国家在联合国做发起国，要么继续推迟倾听西藏的诉求，直到自治的西藏不再存在。我们想知道这是否会影响联合国的声誉。联合国曾经让荷兰主权之下的印度尼西亚独立，但是现在却对西藏的呼声充耳不闻，这说得过去吗？比方说，如果仅仅是出于印度的考虑就不给西藏陈述问题的机会，那么以后印度还会把联合国放在眼里吗？此刻我们觉得我们没有能力迅速作出建议，因为我们对错综复

24. 美国国家档案馆，793B.00/12-2550，美国驻印度大使馆给美国国务院的电报中通报的谈话，1950年12月27日。

25. 美国国家档案馆，793B.00/12-1450，美国国务卿给美国驻印度大使的电报，1950年12月14日。

杂的国际局势并不熟悉。然而，我们建议在详细答复西藏代表团之前重新考虑西藏问题。²⁶

四天之后，国务院通知韩德逊可以给那些西藏人签发进入美国的临时签证。尽管美国还没有最终确定对西藏在联合国的申诉的态度，国务院还是“希望西藏代表团在美国的出现可以使相关的国家尽早考虑这个问题”。²⁷ 但是就算到了这个时候，美国也仅仅是告诉西藏派往联合国的代表团他们的请求正在转往华盛顿的途中。饶有讽刺意味的是，正当美国默默地转向更加积极地支持西藏时，西藏人却再次因为缺乏支持和鼓励而感到灰心丧气，开始思考是否到了该放弃联合国这条路而与中国人展开实质性谈判的时候。

在达赖喇嘛及其随行的政府官员到达亚东之前，激烈的争论就已经开始了。争论的内容不外乎向中国妥协的好处与坏处，以及决定不接受成为中国的一部分而让达赖喇嘛流亡国外的好处与坏处。一个争论的焦点是达赖喇嘛能否指望从印度和西方民主国家获得任何实质性的援助。在亚东的时候，这个争论一直在持续。到达亚东两天之后，所有在印度的西藏官员受命向民众大会报告他们在印度与印度政府以及英国和美国的外交官交往的经历，供大会讨论。²⁸ 在这次会议中一些事情逐渐明朗。一方面，对于西藏新的申诉，联合国、英国和美国都没有给予积极的反馈；另一方面，阿沛和他身边的僧俗官员对中国人和他们的动机表示了正面的看法。所以，经过几天的讨论之后，大家断定西藏的最佳选择是同中国共产党开始实质性的谈判。

于是，噶厦立即派两位高级官员——外交局长索康札萨和僧官群培土登——从亚东前往德里去同中国大使商量谈判的地点，并争取他同意从亚东派出其他代表与阿沛一起参加谈判。索康和群培土登以朝圣为名于1951年1月25日到达加尔各答，从那里他们前往德里会见中国大使。中

-
26. 美国国家档案馆，793B.00/12-3050，美国驻印度大使给美国国务卿的电报，1950年12月30日。
 27. 美国国家档案馆，793B.00/12-2650，美国国务卿给美国驻印度大使的电报，1951年1月3日。
 28. 美国国家档案馆，793B.00/1-851，美国驻印度大使馆给美国国务卿的电报，1951年1月8日。



图3：参与谈判的五名西藏官员。左起：桑颇（丹增顿珠）、凯墨（索南旺堆）、阿沛（阿旺晋美）、拉乌达热和土登列门，1951年摄于北京。照片来源：陈宗烈

国大使袁忠贤坚持谈判必须在北京而不是在昌都或拉萨举行。但是对于西藏提出的从亚东派遣其他谈判代表经由印度去北京的请求，他当即表示同意。他还说谈判进行的时候中国会停止军事进攻，如果西藏接受成为中国的一部分，中国将丝毫不会改变西藏的政教制度。索康等两位西藏官员只在德里待了一个星期就返回了亚东。噶厦经过达赖喇嘛同意任命了其他两位谈判代表，他们是藏军总司令凯墨札萨（索康噶伦的叔叔）和仲译钦莫拉乌达热·土丹旦达。他们同达赖喇嘛的姐夫达拉·平措扎西（作为汉语翻译）和桑都仓（仁钦）一起于3月份前往印度，也正是在此时噶厦给阿沛发去前述的电报。²⁹

29. 戈尔斯坦，1989：758-59。

■ 北京谈判

阿沛、桑颇和土登列门从昌都出发，于4月22日到达北京，凯墨和土丹旦达从亚东出发，于4月26日到达北京。阿沛为了表现自己的现代派作风而把长发剃掉了，他的这个举动正揭示了他当时的想法，要知道蓄长发是在西藏政府中任职的先决条件。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新西藏的第一个迹象。³⁰

从亚东来的谈判代表带来一份与以往不同的新指令，包括对内和对外两部分。对此阿沛回忆道：

他们从亚东给我带来一份写有指令的便条。这份便条上一部分是对外的，可以给人看。另一部分是对内的，只能我们自己看。对外的部分说中国和西藏在过去存在一种供施关系，我们希望这种关系能够比过去更加美好。对内的部分说如果你们别无选择，必须接受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的话，那你们可以接受，但是不能接受派兵进入西藏。如果要有五十到一百个中国代表进驻拉萨，那可以，但是他们不能带军队来。对于进驻的代表人选问题，如果他们能派虔诚信仰佛的人来就最好。³¹

从亚东来的谈判代表也从达赖喇嘛那里得到口头的“指令”。达赖喇嘛告诉他们：“有十条。我相信你们不会做任何有损西藏利益的事情，所以去吧，尽你们最大的努力去做。”³² 达赖喇嘛还告诉他们根据局势和环境作出最好的判断，并向在亚东的噶厦报告。这些官员带来一个密码本，这样他们就可以通过无线电和亚东建立联系，当有什么事情出现的时候就可以与他们商量。³³ 我们将会看到，实际上他们并没有这么做。

阿沛和其他谈判代表一起讨论了这些指令。这些指令虽然比从拉萨送过来的要好一些，但是仍然非常不切实际。谈判代表们很沮丧，时至今日这些指令仍然表现出明显的不谙时势。他们觉得要中国人派信仰佛教的代

30. 昌松（访问记，1992，拉萨）回忆他见过阿沛给拉萨噶厦的一封信，信中说：“我们将去中国谈判，然而带着长长的辫子去并不合适，所以我把它剪掉了。”

31. 阿沛，1989；也可见阿沛，1989: 4。

32. 桑颇，访问记，1981。

33. 桑颇，访问记，1981。

表到西藏去实在是很荒谬，因为谁都知道共产党员是无神论者。阿沛也从他在昌都同中国人的交谈以及与他们十点文件的讨论中了解到，拒绝中国军队进西藏是不可能做到的。如果亚东坚持要这样做，西藏代表团将无法与中国人达成协议。³⁴ 结果他给在亚东的噶厦和达赖喇嘛发了一份加密电报，说：“除了解放军派驻到西藏和边境地区之外，其他方面没有多大问题。但是如果我们不接受〔中国军队的进入〕，谈判将完全进行不下去。”亚东给的答复很天真也很让人失望，告诉他们说：“让解放军进驻边境地区是很难接受的。但是如果没有办法〔拒绝〕，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军队改编成共产党的军队，然后把他们派驻到边境地区〔以此满足中国人的解放军驻防边境这一要求〕。但是汉人军队过来是万万不行的。”³⁵

这个答复使阿沛处于一个非常困难的境地。正如前面提到的，甚至在到昌都接替拉鲁之前他就有谈判的意愿。他坚信西藏太弱小了，在没有外部干预的条件下光靠自己根本没有能力抵抗中国的军事进攻。他也深信西藏的最佳选择是向中国妥协，以期找到一种方式，创造出一种从属于中国的现代西藏。在这个现代西藏里，达赖喇嘛的地位和权威以及西藏的宗教和寺院可以得到保留。经过一年和中国共产党人一起生活的时光，他现在很有信心能够达成一个可以满足西藏的真实需要的协议。但是他也意识到，实现这一目标的惟一途径是自己做主，因为没有办法可以使解放军不进入西藏。假如他每一件事都像这样发电报到亚东去请示，没有什么事情能够得到解决，³⁶ 谈判很快就会因此陷入僵局。然而，夏天一天天临近，中国人于是会再次发起进攻。他认为，对于西藏的终极目的来说，达成一个有效协议的意义要比具体使用什么途径重要得多，也就是说忽略指令中与亚东进行沟通的要求也是可以的。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一最关键的问题达赖喇嘛都已经接受，那剩下的问题，比如允许中国军队驻守西藏，相对来说就不重要了。而且无论如何，如果达赖喇嘛不同意最终的协议，他——阿沛愿意背负这个指责，达赖喇嘛也可以以没有征询过自己为理由拒绝承认这个协议。³⁷ 阿沛与代表团的其它成员讨论了这个想法，大家一

34. 桑颇，访问记，1981。

35. 阿沛，1989: 5。

36. 阿沛，1989: 5。

37. 阿沛，1989；也见桑颇，访问记，1981。

致表示同意。³⁸ 于是就这样，在拉萨的司曹和在亚东的噶厦及达赖喇嘛都被排除在这个历史性的谈判之外。

阿沛对他在拉萨和亚东的同僚们的心态的估计无疑是正确的。这也显示出西藏与现实的脱节，完全不明白在如此紧要关头与中国的新关系。当然这给他们带来很大的麻烦。在整个 1920 年代，大部分的西藏精英仍然无法接受世界已经改变的现实。³⁹ 现在东藏已经被占领，人民解放军已经做好向拉萨进攻的准备。保守的宗教和世俗精英在过去半个世纪里的鸵鸟心态使西藏一直在固步自封，已经无法在这个经历过巨变的世界中游刃有余。对阿沛这样的人来说，虽然他们热爱这个国家，但是亦明白改变是不可避免的。形势十分危急，已经到了要作出艰难而大胆的决定时候。

■ 《十七条协议》的签订

《十七条协议》签订于 1951 年 5 月 23 日。就像毛泽东计划的那样，这个协议以中国人的十点文件为基础，内容字斟句酌，满足了中国的核心目的——诱使西藏接受中国的主权和军事占领。另外，作为让步，也允许西藏方面以达赖喇嘛为首的传统神权政体继续存在。《十七条协议》塑造了整个 1950 年代中藏关系的框架，现引用如下：

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

(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三日)

序言

西藏民族是中国境内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之一，与其他许多民族一样，在伟大祖国的创造与发展过程中，尽了自己的光荣的责任。但在近百余年来，帝国主义势力侵入了中国，因此也就侵入了西藏地区，并进行了各种的欺骗和挑拨。国民党反动政府对于西藏民族，

38. 桑颇，访问记，1981；阿沛，1989。有意思的是，虽然达赖喇嘛的姐夫达拉·平措扎西只是代表团的中文翻译，而并非所有的五个谈判代表之一。但是西藏代表团所有的讨论都会让他参加，因为这样他就可以在事后向达赖喇嘛汇报第一手情况（桑颇，访问记，1981）。

39. 对于 1920 年代情况的描述，见戈尔斯坦，1989: 89–139。

则和以前的反动政府一样，继续行使其民族压迫和民族离间的政策，致使西藏民族内部发生了分裂和不团结。而西藏地方政府对于帝国主义的欺骗和挑拨没有加以反对，对伟大的祖国采取了非爱国主义的态度。这些情况使西藏民族和西藏人民陷于奴役和痛苦的深渊。

一九四九年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取得了基本的胜利，打倒了各民族的共同的内部敌人——国民党反动政府，驱逐了各民族共同的外部敌人——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在此基础之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央人民政府宣布成立。中央人民政府依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实行团结互助，反对帝国主义和各民族内部的人民公敌，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的大家庭之内，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各少数民族均有发展其自己的语言文字，保持或改革其风俗习惯及宗教信仰的自由，中央人民政府则帮助各少数民族发展其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的建设事业。自此以后，国内各民族除西藏及台湾区域外，均已获得解放。在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和各上级人民政府直接领导之下，各少数民族均已充分享受民族平等的权利，并已经实行或正在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

为了顺利地清除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在西藏的影响，完成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和主权的统一，保卫国防，使西藏民族和西藏人民获得解放，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家庭中来，与国内其他各民族享受同样的民族平等的权利，发展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事业，中央人民政府于命令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之际，通知西藏地方政府派遣代表来中央举行谈判，以便订立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

一九五一年四月下旬西藏地方政府的全权代表到达北京。中央人民政府当即指派全权代表和西藏地方政府的全权代表于友好的基础上举行了谈判。谈判结果，双方同意成立本协议，并保证其付诸实行。

西藏代表团没有就序言与中国人进行讨论，他们关心的只是协议的具体条款。

一、西藏人民团结起来，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祖国大家庭中来。

这一条结束了西藏事实上的独立。西藏代表团最初否认西藏存在任何帝国主义势力，但是中国方面坚持有，只是西藏人没有察觉而已。最终，西藏代表团同意了这一条，说，“如果真的有，那你就赶他们走吧。”⁴⁰ 西藏代表团了解这一条意味着他们接受作为中国的一部分；但是他们也认为整个协议还是将西藏的内部管理权保留在西藏人手中。

二、西藏地方政府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巩固国防。

西藏代表团不断尝试劝说中国方面不要在西藏永久驻军，只在威胁出现的时候才派兵去，但是没有成功。西藏代表团也讨论了“地方政府”这个词的含义，但并没有对此太多担忧。一方面因为这个词直译成藏语是“一个地方的政府”（藏语：*sane sishung*），因此模糊了“地方”这个词的含义。而另一方面，它包含了藏语中的政府——“雄”（*shung*）这个词。

三、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民族政策，在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之下，西藏人民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权利。

谈判双方讨论了“区域自治”这个用语的含义，但是因为“自治”这个词直译成藏语的意思是“自己管理自己”（藏语：*rang gyong*），所以西藏代表团并没有真正表示反对。另外，应当注意到指代“中央人民政府”这个概念的不是藏语中的“中央政府”（藏语：*üshung*），而是从汉语音译过来的 *zhongyang*（中央），在西藏代表团看来它就是“中国”。

四、对于西藏的现行政治制度，中央不予变更。达赖喇嘛的固有地位及职权，中央亦不予变更。各级官员照常供职。

西藏代表团认为这一条非常重要，所以当然同意。

五、班禅·额尔德尼的固有地位及职权，应予维持。

六、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的固有地位及职权，系指十三世达赖喇嘛与九世班禅·额尔德尼彼此和好相处时的地位及职权。

这两条构成一个主要的争议，这一争议将在后续章节中讨论。

40. 桑颇，访问记，1981。

七、实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的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保护喇嘛寺庙。寺庙的收入，中央不予变更。

西藏代表团对这一条表示强烈的赞同。但是，这一条中的表述最初让僧官土丹旦达很不安，因为这个最初的表述是中央政府不改变“宗教发展延续的根基”，并没有明确收入问题。当土丹旦达提出这一点的时候，中国方面的藏族干部兼翻译平汪建议用可以明确包含藏语“收入”的表述来代替这一表述。于是西藏代表团对中国关于宗教方面的许诺表示满意。⁴¹

八、西藏军队逐步改编为人民解放军，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武装的一部分。

西藏军队的前途问题也经过详细的讨论。在这个问题上，西藏代表团强烈反对解散藏军。中国方面最终同意妥协，在协议中注明西藏军队将会分阶段逐步地并入解放军，并在秘密的附件中特别注明在其他的藏军废除之后，西藏可以继续保留三千人的甲琼（Gyajong）代本团〔即札齐（Trapchi）代本团和警卫团〕。这样就避免公开允许一个自治地区拥有自己的军队，也使中国政府避免尴尬。这是包含有七项内容的一个机密附件的第一项。时至今日这个附件都没有公开过。

九、依据西藏的实际情况，逐步发展西藏民族的语言、文字和学校教育。

十、依据西藏的实际情况，逐步发展西藏的农、牧、工商业，改善人民生活。

对于第九条和第十条没有争议。

十一、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强迫。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时，得采取与西藏领导人员协商的方法解决之。

41. 达拉·平措扎西，访问记，1993，达兰萨拉。

这一条在西藏代表团看来是协议中另一个最重要的条款。在讨论中，中国方面向西藏代表团保证中国政府不会强迫改革。而在西藏代表团看来，中国人**永远**无法促使西藏人民自己提出改革西藏政治制度之宗教本质的要求。于是，他们对传统制度的精髓可以延续感到满意。

十二、过去亲帝国主义和亲国民党的官员，只要坚决脱离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关系，不进行破坏和反抗，仍可继续供职，不究既往。

十三、进入西藏的人民解放军遵守上列各项政策，同时买卖公平，不妄取人民一针一线。

这两条没有争议。

十四、中央人民政府统一处理西藏地区的一切涉外事宜，并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与邻邦和平相处，建立和发展公平的通商贸易关系。

西藏代表团不喜欢这一条，但是觉得必须接受。

十五、为保证本协议之执行，中央人民政府在西藏设立军政委员会（藏语：*magsi uyön lhengang*）和军区司令部（藏语：*magükhang*），除中央人民政府派去的人员外，尽量吸收西藏地方人员参加工作。

参加军政委员会的西藏地方人员得包括西藏地方政府及各地区、各主要寺庙的爱国分子，由中央人民政府指定的代表与有关各方面协商提出名单，报请中央人民政府任命。

这一条的提出引发了非常激烈的争论，几乎使谈判中断。关于这一点将在下文讨论。

十六、军政委员会、军区司令部及入藏人民解放军所需经费，由中央人民政府供给。西藏地方政府应协助人民解放军购买和运输粮秣及其他日用品。

这一条没有争议，西藏代表团接受了。

十七、本协议于签字盖章后立即生效。⁴²

另外还有一份包含七项内容的机密附件，包括中国驻藏部队的规模（一个军）的声明、前面提到过的关于西藏军队前途问题的声明、明确西藏政府会派两个高级官员到新的军区司令部担任副司令员的声明、一份关于停止使用西藏自己的货币的声明。还有一份声明规定，如果达赖喇嘛先逃亡印度，之后又回心转意回到西藏，他可以恢复过去的地位及职权。

《十七条协议》的签订是毛泽东和平解放西藏政策的重大胜利。⁴³ 依据毛泽东的渐进主义策略，协议在表述上经过字斟句酌，并且没有明确完全实施的时间，这使西藏方面觉得他们的政府和社会制度能够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继续存在，而且他们可以控制变化和改革的节奏。但是与此同时，这份协议使毛泽东得到了他想要的东西。

除了西藏在历史上第一次用正式的文件承认中国的主权（第一条）之外，西藏人现在还会帮助解放军的部队和干部和平地占领西藏（第二条）。西藏人也同意放弃对西藏的外交事务、边界防御和通商事务的控制（第十四条）。而且，西藏人同意让西藏的军队逐步地并入解放军，虽说这并没有限定时间（第八条）。西藏人也接受班禅喇嘛回归西藏（第五条和第六条），并且在第十五条里，他们接受成立一个独立于西藏地方政府之外、由中央人民政府直接领导的新的行政机关——军政委员会。这个机构的功能被解释为监督协议的实施，但是在中国人看来，它最终将会成为新的“自治区”政府的核心。

在西藏代表团看来，《十七条协议》赋予西藏大量重要的权利和特权。首先，它赋予西藏一种独特的地位，因为西藏是惟一一个通过与中国共产党政府签订书面协议而得到解放的政治实体。另外，第三条和第四条申明

42. 见戈尔斯坦，1989: 763–70；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1991: 162–65。

43. 这也是印度首相尼赫鲁的胜利。他鼓励西藏人接受成为中国的一部分，并且也努力阻止西藏问题在联合国被国际化。印度曾经在联合国断言双方能够私底下解决他们之间的分歧，现在这成为现实。中印关系也免于受到西藏问题的破坏。英国毫无保留地支持印度的西藏政策、彻底反对美国怂恿西藏人抵抗共产党这一立场，现在也被证明是正确的。但是美国现在发现自己被孤立，它的针对中国的反共主张既没有得到事件受害者（西藏）的支持，也没有得到相关的国际玩家（印度和英国）的呼应。它失去了一个拉拢一位非常重要的佛教领袖来反对共产党中国的绝佳机会。

西藏人有权实行区域自治，北京的中央政府既不会改变西藏既有的政治制度，也不会改变“达赖喇嘛的固有地位及职权”，当然也不会改变其官员的任职。第七条说，宗教自由将会得到保护，中央政府也不会变更寺院的收入。这份协议对于改革的论述在语气上也很温和。例如，第十条说要逐步地发展工商业，但却没有直接提及社会主义改革。第十一条说要改革，但是也规定“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强迫。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时，得采取与西藏领导人员协商的方法解决之。”总的来说，在西藏代表团看来，这个协议体现出来的基本精神似乎已经可以接受。大部分的旧制度可以继续存在，即使不是永远也至少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然而，这份协议自然不是西藏代表团最想要的，因为它意味着成千上万的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和官员将会进入西藏，并且会建立以前没有的军政委员会。但是西藏并没有多少筹码来否决它，抑或是主张一种非常不同的诸如存在于清朝时期的那种关系。西藏代表团在谈判中表现得很积极，并且在很多场合他们或者威胁退出谈判，或者着手制定返回的计划，以这种方式来回应中国人的强硬。例如，他们在班禅喇嘛问题上的强硬立场迫使中国人作出妥协，这将会在下面的章节中讨论。但是，对于一些在中国人看来很重要的议题，例如在西藏驻军的问题上，中国威胁要向卫藏进军，从而迫使西藏代表很不情愿地同意了。

不过总的来说，考虑到西藏现在所处的绝望处境，西藏代表们对《十七条协议》中的条款还是感到满意的。虽然并不是每一样都可以保持不变，那些象征西藏事实上的独立的军队、货币和管理外交事务的机构作为单独的实体将会在某种程度上不再存在，但是代表们关注的是协议的积极方面。西藏政府、寺院制度以及尤为重要的达赖喇嘛的地位将会得到保留。考虑到最初西藏的精英们担心的是中国共产党会摧毁宗教和达赖喇嘛的权威，所以谈判代表们觉得他们已经为西藏做了一件大好事。

因为这份协议是中国兼并西藏的法律基础，所以它的签订对中国方面来说是一件大事。桑颇解释了协议最终签订那一时刻的到来：

他们〔中国人〕说：“我们现在全部同意了吗？如果我们全部同意了，那么我们需要把这些条款写下来，然后我们会在 25 日举行签

字仪式〔实际上是在5月23日〕。”他们说这些话的时间是在那个月的19日或20日。

问：那时，有人问你们是否有权在条约上签字吗？

哦，我刚才忘记说了。其实在那次讨论的一开始，中国方面就告诉我们：“如果你们决定同意这些条款，你们需要签署一份协议。那么，你们有权签署吗？”阿沛说：“我们有权同意并且签署一项条约。”……接着中国人进一步发问：“你可以签‘全权代表，阿沛阿旺晋美’吗？”阿沛说可以。

问：这个讨论是在所有的谈判代表面前进行的吗？阿沛在同意之前与其他的代表团成员商量过吗？

阿沛是直接回答的〔没有同我们商量〕。

问：阿沛真的有权签署协议吗？

应该有。我觉得他这么说的根据是达赖喇嘛的口头指令〔去吧，尽你们最大的努力去做吧〕。⁴⁴

西方和西藏流亡团体经常辩称《十七条协议》的签订是无效的。他们指控西藏代表是在受到胁迫的情况下才签了字，并且中国人伪造了西藏政府的印章。但是事实并不支持这种说法。

中国人确实给每位代表刻了新的印章，但那仅仅是私人印章，上面只有每位代表的名字。除此之外，并没有伪造的政府印章。这种困惑部分缘于阿沛没有使用他随身携带的东藏朵基的印章。⁴⁵但是那个印章并非西藏政府的官方印章，所以不用它并不会减弱协议的效力。

在私人传记中，达赖喇嘛说西藏代表们宣称他们是在“胁迫”之下才签的协议。⁴⁶但如果说这种“胁迫”指的是以个人之人身安全相“胁迫”，那就不是事实。中国人并没有用伤害他们身体的手段来威胁他们签字。代表们可以不签，可以离开北京。他们之所以觉得受到胁迫是缘于中国人一般性的威胁——如果达不成协议，就要对卫藏采取军事行动。但是根据国

44. 桑颇，访问记，1981。

45. 阿沛事后向达赖喇嘛解释了为什么这样做：“我（阿沛）有东藏朵基的印章，但中国人并不看重，所以他们刻了〔另外的〕印章。考虑到将来可能会需要我们说我们同意签字不是出于自愿，所以虽然我有东藏朵基的印章但没有使用”（达赖喇嘛，访问记，1993，达兰萨拉）。

46. 达赖喇嘛，1990: 65。

际法，这并不能减弱协议的效力（例如，美国人用原子弹迫使日本投降）。只要没有针对签署人的暴力（或者威胁使用暴力），那么协议就是有效的。不过，协议的效力是以签署人有全权缔结协议为前提的。然而正如我们看到的，事实却并非如此。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达赖喇嘛是有理由拒绝承认它的。

■ 协议签订之后

回头来看亚东，正如前面所述，协议签订的消息震惊了每一个人。没有人知道讨论的具体内容，也没有人知道电台里提到的《十七条协议》是怎样产生的，比如这些代表是不是受到虐待等等。实际上，协议刚刚签订八天之后的5月31日，达赖喇嘛收到阿沛的电报。这份电报告知了协议的条款，并提及有机密附件的存在，但是没有透露其内容。⁴⁷

亚东噶厦答复阿沛说他签署这个协议太草率了，因为之前给他的指令说明他应该与亚东商量。他们命令他把机密附件的内容通过无线电发给亚东，然后在北京等噶厦详细考察之后再作进一步指示。⁴⁸

但是阿沛和其他谈判代表再一次选择了抗命。一方面，他们已经做到他们所能做的；另一方面，他们完全了解中国人是不会愿意作出让步重开谈判的，因为阿沛已经向他们保证过他有充分的权限来缔结这个协议。他等了很长时间才发电报给亚东，部分原因就是为了避免在签字前又出现什么变故。而且一个精心准备的签订庆祝仪式已经举行，协议也已经公开宣布，甚至连毛泽东本人都已经参加了盛大的庆功宴。所以阿沛很消极地答复说：“北京和亚东直接的电报联系很困难，基于安全理由无法把单独的机密附件内容通过电报传送给你们。所以我们将按计划回去的时候带过去。不过，如果你们这些在亚东的人最终不满意协议的内容而想要再商量的话，你们可以派一个新的代表团来。”⁴⁹

47. 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1990，1951年5月28日和1951年6月条目。

48. 拉乌达热·土丹旦达，1981: 111；乐于泓（1981: 136-37，1951年5月28日条目）说收到亚东发来的电报的时间是5月28日。

49. 拉乌达热·土丹旦达，1981: 111。

协议的公布使噶厦和达赖喇嘛陷入两难的境地。他们不知道在北京到底发生了什么，也不知道机密附件的内容。他们只知道这个协议比他们期望的或者授权的少得多，尤其是在中国军队进入西藏这一条款上。尽管如此，在与代表团的成员协商之前他们很难评估各种动作意味着什么，会有什么后果。公开推翻协议的合法性也许意味着失去他们可以抓住的最好机会，也会造成解放军对西藏的全面入侵。所以毫不奇怪，他们从一开始就选择对此保持沉默，没有发表任何声明。

而中国政府也发觉自己处于一个有些许尴尬的境地。从对北京有利的角度来看，中国官员和军队现在可以“合法”地进入西藏，开始中藏关系新的一页。在国际上，西藏问题、西藏相对于中国的地位问题似乎已经解决。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中国人非常了解达赖喇嘛很可能会推翻协议，选择流亡。实际上，这种可能性是如此真实以至于就像前面提到的，西藏代表团坚持要在《十七条协议》里加上如果达赖喇嘛逃到国外，他也可以回到西藏并恢复他作为西藏领袖的地位这一条。中国方面同意了，只是拒绝把这样的声明放在正文里面（因为这样很容易衍生出有关协议合法性的问题）。这一条最后成为机密附件的内容之一。⁵⁰ 所以说，中国人知道达赖喇嘛也许会拒绝承认协议的合法性，甚至可能命令剩下的西藏军队（和民兵）在拉萨以东组成新的防线，或者开始针对解放军发起游击战，抑或同时采用这两种战术。而此时朝鲜战争正在进行，达赖喇嘛有可能获得美国的帮助来挑战协议的国际法效力，甚至是获得美国的军事援助，并且这种可能性会一直存在。

但是，中国政府决定不管发生什么都会将协议当作经过合法的全权代表签署的法律文件，并马上行动起来，在事实上把西藏并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协议签订两天之后，解放军受命向西藏其余的地区进发。⁵¹ 然而，毛泽东仍然认为实现中国国家长远利益的最佳方式是说服达赖喇嘛接受协议的条款回到拉萨。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立即任命了一位高级军官张经武为中央赴藏“代表”，并指示他尽快出发前往亚东会见达赖喇嘛，⁵² 向达赖喇嘛转交一封毛主席的信以及中央政府赠予的礼物。最重要的是，张经

50. 桑颇，访问记，1981；阿沛，1989；达拉，1995。

51. 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1990，1951年5月25日条目。

52. 中央专门用于指代中国共产党中央，但有时也有“中央政府”的含义。

武需要设法减轻达赖喇嘛对协议及其实施可能怀有的担忧，并说服他接受协议返回拉萨。

然而，通过陆路前往拉萨然后转往亚东需要花上几个月的时间。北京担心这会给那些中国的（以及这份协议的）敌人太多时间来做小动作。因此，张经武建议自己取道香港和印度前往亚东，这个建议得到了批准。⁵³ 西藏代表团的成员返回西藏有两个可选方案，要么和张经武一起取道印度，要么通过陆路。所有人都选择了较快的（取道印度的）方案，但最终中国人决定让阿沛走陆路。从政治角度看不难理解北京的担忧，如果达赖喇嘛决定不返回西藏，那么阿沛作为噶伦和谈判代表团的首席代表是佐证协议合法性和有效性的关键性人物。如果他在印度出了什么事，或者他翻脸不认账，协议的法律效力将会大打折扣。因此最终阿沛和代表团的另一位成员土登列门在解放军的陪同下，带着协议的原件通过陆路返回。而桑颇、凯墨、土丹旦达、达拉和桑都仓·仁钦同张经武一起经印度返回。阿沛用电报通知亚东张经武正在经印度前往亚东的途中，并口头要其他经印度返回西藏的代表转告西藏政府，虽然他在中国人的控制之下，但是在决定接受协议还是选择流亡的时候不要考虑他的人身安危。⁵⁴

选择张经武作为毛泽东和中央政府的代表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问题。张经武是一名经验丰富的军官，也是参加《十七条协议》谈判的中国代表团成员和协议的签署人之一。⁵⁵ 他是湖南人，1906年出生，是经历过长征的老革命，在军队和行政岗位上工作超过二十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1949年，他先任西南军区的参谋长，新政府成立之后，他被召到北京担任军委办公厅主任和人民武装部部长。⁵⁶ 因此在出任赴藏代表时，张经武已不再属于西南局，而是直接任职于中央政府。

张经武一行在北京花了几周时间办护照、签证，注射疫苗以及准备一些供给用品，然后赶往广州，在那里停留了两周时间购置衣物、给养和礼

53. 郝广福，1986: 117。

54. 美国国家档案馆，793B.00/7-951，1951年7月6日夏格巴、撒切尔和次仁的谈话备忘录。

55. 那个时期中国军政官员之间的界限是很模糊的。军职人员会有党内职务，通常会有我们称之为民事行政的职能。

56. 赵慎应，1995: 8-10。

物。⁵⁷ 从广州出发，张经武和其他人坐火车到香港，在那里又停留了七八天，安排礼物和其他物品的海路运输。为了尽早见到达赖喇嘛，张经武同三名工作人员和几名西藏人坐飞机前往加尔各答，中途在新加坡停留了一个晚上，⁵⁸ 于 1951 年 7 月 1 日到达加尔各答。⁵⁹

张经武得到的指示很简单。如果达赖喇嘛决定返回，他就陪他一起返回；但是如果达赖喇嘛选择流亡，张经武仍然要前往拉萨，等待从陆路到来的解放军十八军。⁶⁰ 到达拉萨之后，他再按照既定安排回北京从事原来的工作。⁶¹ 但是由于我们将要在后续章节中介绍的一个原因，张经武最终在整个 1950 年代都留在西藏，成为西藏职位最高的中国官员。

当张经武正准备出发前往亚东的时候，解放军十八军的一部分已经开始从西康向西藏进发，而在青海的西北局的骑兵支队也已出发。十八军于 1951 年 7 月 1 日离开西康的甘孜，7 月 17 日到达昌都。⁶² 西北局的骑兵支队也于 7 月 1 日从兰州出发前往西宁。⁶³ 由于阿沛和藏文原版的协议能够及时到达拉萨是至关重要的，所以阿沛由王其梅指挥十八军的一支先遣支队（五百到六百人的部队）护送前往拉萨。随行的平汪解释了此行的准备情况：“因为张经武没有士兵随行，所以我们的先遣支队就是拉萨的西藏人遇到的第一支解放军部队。我们花了很多心思从十八军的上万士兵中挑选出最好的战士，因此先遣支队的战士都很年轻健康、训练有素且配备了最精良的武器。”⁶⁴ 他们于 7 月 25 日离开昌都向拉萨进发。⁶⁵

57. 乐于泓，1981: 137。达拉在他写的传记中补充说，当他们准备动身的时候张经武拜访了他，建议他留在广州等眼疾好了再走，其他人则直接前往亚东。达拉回绝了这个建议。他说他担心自己会被留在中国，所以坚持即使生病也要和其他人一起走（达拉，1995: 65）。

58. 郝广福，1986: 118；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1991；彭哲（Phündra），访问记，1993，北京。

59. 美国国家档案馆，302 西藏，加尔各答总领馆的威尔逊给驻新德里的大使馆的电报，1951年7月2日。乐于泓（1981: 138）给出的时间是7月8日，但是似乎不正确。

60. 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1990: 5，1951年5月25日条目。

61. 降边嘉措（Jambey Gyatso），访问记，1992，北京；达拉·平措扎西，访问记，1993，伦敦。

62. 赵慎应，1998: 57-58。

63. 范明，1987。

64. 戈尔斯坦、道帛喜饶和司本石初，2004: 155。

65. 次仁顿珠（Tshe ring don grub）和邬金群培（O rgyan chos 'phel），1991: 43-44；赵慎应，1998: 59。

■ 西藏人对协议的反应

协议的公布在亚东和拉萨都引起了激烈的辩论。大家都在争论这个协议对西藏意味着什么，以及如何回应这个协议。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问题很简单：这个协议能否允许达赖喇嘛和西藏的宗教继续存在下去，它会不会使所有这一切很快消失？能不能相信中国共产党会遵守协议的条款，或者能否说当他们的军队到达拉萨时他们就会把协议束之高阁？如果达赖喇嘛不接受协议而选择流亡，中国共产党的主要敌人美国会给西藏多大的帮助？是不惜一切代价拒绝中国的主权要求呢？还是努力在中国的框架下尽量多地寻求自治？这些问题以前就在讨论，但是现在却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紧迫性。

在军事方面，西藏实际上仍然有几千人的军队驻守各地，在拉萨有一千多人。这些军队理论上可以组织起来建立一个新的防御线，或者经过改编，在昌都和拉萨的崇山峻岭中运用游击战术进行抵抗。但是没有人制定过这样的计划，哪怕只是讨论讨论。现在的士气非常低落。

与拉萨来的援军一起来到江达（Giamda）的一位官员回忆说，他们那时想的不是怎么打仗而是怎么逃跑。

我是阿沛手下的一名办事员，……但是我去的时候有点迟，所以当 I 赶过去追随他的时候昌都已经陷落了。拉鲁那时在江达，我被告知留在拉鲁那里。但是，不管是我还是拉鲁都不想留在那里。我的全家，包括老婆、孩子等等，都已经在印度了，我收到很多封家人〔从亚东〕发来的电报，要我去印度。……当我在江达的时候，我们的马都不卸鞍，为的是在中国人突然到来时可以马上逃跑。我们大家都是这样想的。如果共产党来了我就会跑。⁶⁶

拉鲁回忆的情形也差不多。

那时，他们〔西藏政府〕说需要我留在江达，说他们会派更多的军队来，所以我只能留下。但是如果真的和解放军打起来，我们连一

66. 夏札，访问记，1992，拉萨。

天都坚持不了。当人们问我在那里干什么时，我会说我在保卫这个地区。我有一两千军队，但是却经不起哪怕是一场战斗。⁶⁷

而且，从昌都回来的士兵都说别想在战场上打赢解放军。在藏军司令部工作的一名僧官回忆了在他的办公室里进行的一次关于昌都战役的讨论：“人们说中国人先是派五个人来，接着是十个，再接着是一百个、一千个，如果我们还是坚持战斗的话，那么他们就会没完没了地来。”⁶⁸ 所以人们都失去了意志和希望。”⁶⁹

因此在军事方面，西藏政府即使真的拒绝协议却也没有任何动用剩余军队进行反抗的计划。在亚东讨论的惟一问题只能是接受协议或者流亡，没有出现动用军队进行武力反抗这一选项。对于其他两个选项的观点也仍然存在严重的分化。一些重要官员强烈主张达赖喇嘛流亡，继续反抗中国人；但是大部分人反对达赖喇嘛流亡，主张他返回拉萨。然而，此时美国人的干预使决策过程变得不那么简单。美国直接劝说达赖喇嘛拒绝协议，选择流亡。这当然使得流亡派比和平解放派有更强的声势。很明显是作出重大决定的时候了，而且时间非常紧迫，因为中国官员和军队已经根据协议的条款向西藏进发了。

对于西藏人来说，最重要的疑问是，他们能从外部为他们的反抗事业赢得多大程度的实质性支持。西藏政府负责与联合国和印度联络的是在印度的官员夏格巴，他坚称美国十分同情西藏的境遇，将会给予西藏强有力的支持。但是他口头上的乐观遭到主张达赖喇嘛返回拉萨的官员们的质疑，这一点将在下一章讨论。

67. 拉鲁，访问记，1992，拉萨。

68. 这句藏语的字面意思是“如果一百个死了，一千个会站起来”。

69. 洛卓群则，访问记，1993，拉萨。

第五章

美国的介入

■ 初步的努力

1951年3月，也就是亚东派出的谈判代表正在前往北京的路上的时候，时代—生活（Time-Life）出版公司的詹姆斯·伯克（James Burke）带着一个名叫海因里希·哈雷（Heinrich Harrer）的人去拜访美国驻印度大使韩德逊。

哈雷是奥地利人，他于1943年从印度的监狱潜逃到西藏，此后为西藏政府工作了七年，可以接近达赖喇嘛和他的家人。此时他刚刚从亚东返回印度，正在寻求美国人向西藏提供帮助。他告诉韩德逊，达赖喇嘛非常希望获得建议，而且他信任美国多于信任任何其他国家。哈雷说，达赖喇嘛为西藏没能与美国建立紧密的联系而感到失望，他向北京派遣使团是逼不得已的，并且他也担心谈判代表会在中国的压力下屈服。哈雷还说，达赖喇嘛是位年轻的领袖（那时他才15岁），虽然他对返回拉萨的意见怀有疑虑，但是却不断受到身边某些僧侣的压力，这些僧侣坚持要他向中国妥协。哈雷说达赖喇嘛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寻求建议，所以美国的官员应当设法向他表示关注。¹哈雷的说法很对韩德逊的胃口。

那时，冷战正在亚洲激烈地上演着。中国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国家，与其毗邻的社会主义国家北朝鲜已经于前一年（1950年6月25日）向南朝鲜发起了进攻，这促使美国领导的联合国军队出兵保卫南朝鲜。血腥的朝鲜战争演变为美国同包括中国、苏联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阵营之间的代理

1. 美国国家档案馆，新德里邮政档案，标签 58F 95，美国驻印度大使馆给美国国务院南亚事务办公室主任的电报，1951年3月29日。

人战争。当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50年10月中旬也直接加入战争，由彭德怀元帅领导的近二十万解放军跨过鸭绿江。解放军最初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不仅在几周之内把美军赶出北朝鲜，而且还在1951年1月初攻占了南朝鲜的首都汉城（首尔）。然而到1951年夏天，美国／联合国军队已经抵挡住中国人的进攻，并迫使他们退回到三八线以北，至此僵局出现了。在这个背景下，1950年10月解放军对东藏的进攻被看成是共产党于冷战中在亚洲的另一个危险的举动。

在韩德逊大使身上，哈雷发现了一个坚决反共的冷战斗士。韩德逊基本上完全相信哈雷对达赖喇嘛的描述，因为他本来就坚定地认为美国应当在西藏扮演一种更亲密和积极的角色。早在1949年1月，韩德逊就已经建议国务院根据变幻莫测的亚洲局势，特别是中国的内战，来检讨美国的西藏政策，并提议“假如共产党成功地控制了全中国，……无论从什么角度出发我们都应当准备把西藏当作一个独立的国家来对待”。² 为了讨论他的建议，国务院远东事务办公室的卢斯·培根（Ruth Bacon）列出了支持和反对美国在西藏政策上作如此转变的理由，并将其写入一份给中国事务部日期为1949年4月12日的备忘录中：

支持大使馆的建议的理由

1. 如果共产党控制了中国，西藏将成为亚洲大陆上为数不多的非共产党统治的阵地之一。外蒙古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对缅甸的影响很大，并且还在向西康和内蒙古渗透。西藏因此将具有意识形态和战略上两方面的价值。
2. 西藏具有抵挡共产主义渗透的能力——新德里的大使馆似乎是这么认为的——从我们的利益考虑，应该把西藏当作独立国家来对待，而不应当继续把它看作是已经走向共产主义的中国的一部分。
3. 西藏的政府相对稳固。人民天生就很保守并且天生虔诚信佛，出于佛教教义的原因他们生性反对共产主义。达赖喇嘛的权威不仅存在于西藏，而且还存在于尼泊尔、锡金、不丹、蒙古等国信奉喇嘛教的人群当中。

2. 美国国务院，1974: 1065，远东事务办公室的培根（Bacon）给中国事务部主任斯普拉尔斯（Sprouse）的备忘录，1949年4月12日。

4. 中国政府现在无法做到有效地对西藏施加实质性影响，而且从现在看来将来也几乎不可能做到。
5. 西藏人对与外界建立贸易和其他关系表现出越来越大的兴趣。基于我方的利益，我们希望他们的努力是面向西方而不是面向东方。

反对大使馆的建议的理由

1. 承认西藏的决定不仅关系到我们的西藏政策，而且还关系到我们的中国政策。我们的中国政策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尊重中国的领土完整。这个原则尽管没有完全阻止中国的肢解，但是却延缓了这个过程，也帮助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以一个大国的姿态出现。我们不能抛弃这种政策，除非我们与中国的关系永久破裂在所难免，而且我们可以从西藏身上得到一大堆筹码。
2. 苏联现在正努力分裂中国北方的领土，我们采纳这种政策就会减弱我们针对苏联的行为提出反对的效果。对于蒙古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的问题，我们一直坚持不能充分确认其独立性而不能予以接纳。如果我们采纳了这种政策，那么我们的上述立场将会少了一些正当性。
3. 这种政策可能会强化苏联方面把西藏拉进社会主义阵营的努力。如果我们让西藏大体保持现在的情况，共产党也许会愿意让现在的情况继续下去。西藏太遥远了，我们不能向他们提供他们需要的实质性帮助。所以如果我们承认西藏的独立，实际上就等于为共产党吞并这一地区创造机会。
4. 从政治角度出发，西藏在意识形态和战略上的价值都极为有限。因为西藏过于遥远，政府和人民太落后，同外界的接触又很有限，所以我们不能仅仅依靠西藏在意识形态上对西方的向往来维持它的存在。除非我们能向它提供广泛的实质性帮助，否则承认西藏这个行动本身并不能使西藏同西方站在同一阵线上，而且实际上反而会与我们的长远利益相悖。与此相似，开发西藏战略价值的努力也不是那么乐观，如把它作为空军基地或者火箭发射场不仅会遇到地形和气候上的极大困难，也会遭到西藏人的反对，他们会以宗教理由反对飞机在他们的领土上

空飞行。除非在西藏发现稀有矿产，否则军方不认为西藏具有多大的战略意义。

5. 至于能采取什么样的实质性措施，这个问题似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印度，因为它控制着西藏与西方的通道。如果印度同西方合作，西藏在意识形态和战略上的价值将会大大减弱。如果印度不同西方合作，那么把西藏作为西方的堡垒所面临的困难将会急剧增加。

中国对西藏的主权或宗主权

要注意在文件中经常会提到中国对西藏的“主权”或“宗主权”。当然，众所周知这两个术语是有不同含义的，但是很难在它们之间划一条清晰的界线。一般来说，较之“主权”，“宗主权”意味着中国拥有较少的权力，而西藏人拥有较多的自治。因此在有些方面“宗主权”似乎更适合西藏的具体情况。但是“宗主权”含有附庸国的意味，而且美国“宗主权”的概念和英国的用法并不很相符。为了避免“主权”和“宗主权”的争议，建议在将来用中国对西藏在法理上的权力或者其他类似的容易理解的术语来代替。

结论

一、在现在的情况下

1. 不要对西藏在意识形态和战略上的价值抱过多期待。从我们的利益出发，无论在什么时候都应尽可能地把西藏当作一个朋友。我们应当适当地对西藏采取友好的态度，但是要注意不要让中国有侵犯的借口。我们应当尽可能地鼓励西藏倒向西方而不是倒向东方。
2. 现在我们应当避免让别人以为我们要改变在中国之于西藏的权力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比如采取可以表明我们把西藏看成独立国家的行动等等。我们最近已经再次向中国保证我们承认中国对西藏拥有法理上的主权或宗主权。我们改变政策的任何决定都会给中国以抱怨的理由，因此可能需要尴尬的解释，也可能会刺激苏联努力向西藏渗透。而我们在政策上的改变也许并不足以使西藏牢牢地倒向我们一边。但是除了必须的情况，我们应当避免提及中国的主权或宗主权，对于和西藏相关的行动我们也只需知会中国而不用寻求他们的同意，这样就可以使我们

的政策尽可能地保持弹性。韩德逊大使在 1949 年 1 月 5 日同西藏商务代表团首脑的谈话中对我们的政策所作的阐述应该说是照顾到了时局，是比较适当的……

3. 我们关于西藏的情报绝大部分来自于第三方——中国、印度、西藏——情报的质量也受到情报来源一方的动机的影响。为了获得第一手的情报，同时也为了表示我们善意的关注，最好能向西藏派遣一位或几位官员。当然，前提是这种举动不会引起猜疑，不会让别人以为我们可能已经在算计西藏问题了。

二、从长远考虑

事态的发展会影响我们将来在西藏问题上所采取的政策。例如，如果将来共产党完全占领了中国本部，而国民党政府被消灭了的话，我们可能将会面对两个选项：(1) 把西藏当作共产党政府管辖之下的地区——这当然是我们明确希望避免的，(2) 在考虑一切问题的时候都把西藏看作独立的国家。很明显后一项政策对我们将非常有利。不过，如果共产党完全占领了中国本部，但是流亡的国民党政府却得以继续存在，那么我们将不得不部分地根据我们对流亡的国民党政府的政策来确定对西藏的政策。所以问题最终可以归结为：我们是不是应该承认西藏的独立并且支持他们申请加入联合国，以这种方式来强调它的独立性，还是说我们应该避免强调其独立性，而仅仅在不公开改变政策的前提下保持与西藏的直接联系。确定这个问题的答案时需要考虑我们对以下问题的评估：(1) 苏联会不会在我们公开承认西藏独立的刺激下占领西藏；(2) 我们能不能向西藏提供足够的援助，使它有能力和西方保持同一阵线；(3) 中国的分裂是否会保持相当长的时间。³

韩德逊跟进了培根所谓的缺少可靠情报这一问题，于 1949 年 7 月初建议华盛顿派遣一个使团去拉萨，并建议这个使团要在 1949 年 9 月之前到达西藏。⁴ 华盛顿很赞成这个建议，所以在不到一周之后的 1949 年 7 月 8 日，国务卿迪安·艾奇逊 (Dean Acheson) 就针对以下两种具体方式征询韩德逊的意见：

3. 美国国务院，1974: 1065，同上（划线部分为强调）。

4. 美国国务院，1974: 1076，驻印度大使给国务卿的信件，1949 年 7 月 2 日。

- (1) 由杰佛逊·琼斯 (Jefferson Jones) 以私人名义进行最小规模的考察，或许还可以由英国驻新德里高级专员办公室里职位类似的官员作为代表陪同，要立即出发。实际上，时机对琼斯的出发是有利的。考察行程的经费由美国单独负担或者和英国共同负担。这次考察将在拉萨停留两个星期，任务是调查现在的政治情况，并探讨在中国的宗主权不再成为阻碍之后建立领事代表处的问题。
- (2) 由宾夕法尼亚大学资深探险家兼学者舒勒·凯门 (Schuyler Cammann) 带领的探险活动。这样的探险活动声誉很好，而且看起来也很正当。琼斯也可以以休假的名义随同出发，然后提早返回带来初步的报告。凯门可以以科学考察的名义在近一年的时间里留在那里观察政治动向。⁵

但是，没有一种方式的探访最后得以成行。到 1949 年 7 月底，美国驻印度大使逐渐了解到这一年已经没有什么时间来组织这种形式的行动了。而在 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国共产党正式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这样的使团对北京又太具有挑衅意味。

然而，当解放军于 1950 年 10 月中旬占领昌都，达赖喇嘛于 12 月底逃往亚东时，情况开始急剧变化了，美国现在不得不决定如何去应对。虽然它选择不在联合国就帮助西藏的问题承担发起人的角色，但是达赖喇嘛身处流亡的边缘使美国产生了更直接和前摄性的反应。在联合国里承担发起人的角色会在国际上造成严重的纷争，但是说服达赖喇嘛流亡并成为亚洲反共的象征和发言人却是低风险而高收益的。

当然，美国之所以对西藏有兴趣是因为其当时的外交政策聚焦于对抗和遏制共产主义。在美国人的观念中，共产主义已经取代纳粹法西斯成为自由和民主的主要敌人，而西藏则是遭受共产党侵略的弱小并爱好和平的国家的典型代表。韩德逊大使深深地同意，对于达赖喇嘛，“除非有这位年轻人信任的人给他以忠告，否则他就会掉进共产党的陷阱，或者在印度过着没有前途的生活。”⁶ 因此在 1951 年春天，韩德逊认为美国需要行动了。行动的方案是给达赖喇嘛送去一封非官方的匿名信，但同时附上一个

5. 美国国务院，1974: 1079，国务卿给驻印度大使的信件，1949 年 7 月 8 日。

6. 美国国家档案馆，新德里邮政档案，标签 58F 95，美国驻印度大使馆给美国国务院南亚事务办公室主任的电报，1951 年 3 月 29 日。

口信说这封信来自美国大使。为了使这封信即使落到中国人手中也不会给美国惹麻烦，他用了在印度购买的无法确定来源的纸张，并且在信里没有提到任何可以表明它来自于韩德逊或美国的内容。韩德逊为这个行动征求华盛顿的同意，他强调说与其看着“中国共产党成功地用诡计占领西藏并控制住达赖喇嘛”，不如冒冒这个风险。⁷ 韩德逊在给达赖喇嘛表示支持的信里强烈敦促达赖喇嘛同中国对抗，同时寻求到外国避难。信中建议把锡兰作为达赖喇嘛的避难地点，但也提到可以选择美国作为避难地点。虽然阻止西藏谈判代表团前往北京已经太迟了，但是有明显证据表明西藏官方期望得到美国的支持，较之接受共产主义，他们更倾向于流亡。

〔新德里，未注明日期〕一位刚刚访问过亚洲的高级外交官很同情西藏的遭遇，同时也深深地关心达赖喇嘛至尊和他的人民的福祉，故发来如下讯息：

1. 北平共产党政权已经下决心要完全控制西藏，至尊对那个政权的任何妥协都不能改变这种决心。较之武力，中国共产党更愿意用诡计来达到对西藏的控制。因此他们很急切地想说服至尊达成协议，允许他们在拉萨建立一个代理机构。
2. 在拉萨建立北平共产党政权的这种代理机构只会使中国共产党更加方便地牢牢控制整个西藏。
3. 在国际形势发生变化，使得中国共产党不能轻易地占领西藏之前，至尊无论如何也不能返回拉萨，或者把他自己或西藏政府的财产送回拉萨。〔信件的部分内容已经被美国国务院删除。〕任何送回拉萨的财产最终都会被中国共产党夺走。
4. 只要中国共产党仍然有可能通过武力或诡计占领拉萨，至尊就不应当返回拉萨。假如发现中国共产党有任何可能要阻止他逃跑，他就应当离开亚东前往其他国家。
5. 我们建议至尊马上派代表去锡兰。这些代表应当设法与锡兰政府一起安排把至尊的财产立即转运到锡兰去，他们也应当设法获得锡兰政府允许，一旦至尊离开西藏，他和他的家庭可以在锡兰避难。在锡兰政府准许避难之后，至尊应当求得印度政府的保证，如果他和他的家庭离开西藏，可以取道印度前往锡兰。
6. 假如至尊和他的家庭不能在锡兰找到安全的避难地点，他也一定可以在包括美国在内的西半球友好国家中找到一处避难地点。

7. 同上。

7. 如果至尊派遣一个使团到美国去将会起到很好的效果，在那里他们可以直接向联合国提出申诉。据我们了解，至尊已经知道对于前往联合国的西藏使团的成员，他们在申请美国签证的时候将会得到特殊照顾。⁸

在 1951 年 4 月初，国务院批准了韩德逊的这封信，但是一个重要的前提是第七段必须删除，因为国务院最近进行的调查表明联合国成员国中没有国家支持联合国声援西藏的行动。⁹ 较之西藏相对较低的重要性，美国走联合国这条路需要付出的代价实在是太高了。于是韩德逊于 4 月 6 日派人将这封信的多个副本送去给达赖喇嘛。正是美国的兴趣使毛泽东觉得西藏与中国的其他地区不同，需要分别采用长远和短期两种不同的策略。

一个月之后的 5 月 13 日，至少还有一个副本没有送达亚东。因为就在那天，美国大使馆的一秘弗雷则·威尔金斯 (Fraser Wilkins) 似乎在私底下向柳霞出示了这个副本。柳霞是西藏外交局的局长，此时他正在噶伦堡。¹⁰ 威尔金斯受命去会见柳霞，他直接向柳霞表达了美国对西藏的兴趣。在关于这次会谈的一份备忘录中，威尔金斯说他向柳霞保证美国对西藏抱有极大的兴趣，不仅在经济上也在政治上。他告诉柳霞，美国对维持西藏的自治很感兴趣，他们非常同情西藏向联合国提出的申诉，也愿意考虑向计划前往成功湖的西藏代表团签发签证。威尔金斯回忆说韩德逊大使在 1 月 5 日和 11 日写的信的大意就是这样。¹¹

-
8. 美国国家档案馆，791.00/4-451，美国驻印度大使给国务卿的电报，电报号 2673，1951 年 4 月 4 日；以及美国国务院东南亚事务办公室给美国驻印度大使的电报，电报号 1633，1951 年 4 月 6 日。韩德逊将这份文件的副本送给美国驻锡兰大使，锡兰大使回复说他认为锡兰会愿意准许避难并为西藏的财产提供保护〔美国国务院，1983：萨特斯威特 (Satterthwaite) 给韩德逊的信，1951 年 4 月 13 日〕。
9. 美国国务院，1983：马休 (Mathews) 发给韩德逊的电报，1951 年 4 月 6 日。最近出版的一本关于中央情报局 (CIA) 和西藏的书〔康博伊 (Conboy) 和莫里森 (Morrison)，2002：12〕说，这封信的一个副本由海因里希·哈雷带往亚东了。但是这不太可信，因为没有其他证据表明他本人在那个时候去了亚东，而作者也没有说明消息的来源。
10. 美国国家档案馆，793B.00/5-2951，美国驻印度代办给美国国务卿的函件，1951 年 5 月 29 日。根据这份文件，夏格巴说柳霞几天前已经向他出示了那封信，现在柳霞已经带往亚东了。
11. 美国国家档案馆，威尔金斯与柳霞关于西藏和美国关系的谈话备忘录，1951 年 5 月 11 日，包含在 611.93B/5-2451，美国驻印度大使馆的威尔金斯发给美国国务院的信件，1951 年 5 月 24 日。

柳霞对此并没有表现得很兴奋，他圆滑地回答说西藏政府感谢美国的关注，但是根据印度、英国以及美国的提议，西藏政府已经开始同中国人谈判了。他进一步说他的政府担心在这个敏感关头派代表团去成功湖可能会对谈判造成负面影响，所以他们已经搁置了这个计划。¹²

威尔金斯否认美国政府曾经提议西藏同中国人谈判，他建议说西藏派往联合国的代表团在成功湖的出现将会聚焦全世界的注意力，进而可能会对中国人的活动起到震慑的作用。

柳霞的答复体现了一种在西藏精英中盛行的对美国所谓的支持和同情的怀疑，这种怀疑绝非没有根据。柳霞接着澄清了他的论述，说尽管美国没有用大量言语建议西藏谈判，但是在西藏需要援助的时候它和其他西方国家都拒绝给予帮助。他还指出，联合国没有邀请西藏到会提出自己的申诉，这可以被解读为进一步向西藏表明，维持西藏独立的最好方式是与中国谈判。¹³

两天之后的5月13日，柳霞和威尔金斯又会见了一次。这一次，柳霞表达了西藏对北京谈判的一些希望和担忧。威尔金斯记录了这次会见：

外交局长指出，〔如果需要〕他们可能愿意只在内部事务上行使自治，但是西藏真正想要的是保持在中国人入侵之前就已经存在的状态。他希望他们不会被逼到墙角下，但是如果真的到了那一步，他相信他们最后一定会重新主张完全自主地处理自己所有的事务。外交局长回忆说，不论过去的法律状况如何，西藏事实上是独立的。除了没有外国承认之外，其具备所有主权国家的特质。他们希望有一天能恢复他们完全的主权，同时获得外国的承认。¹⁴

但是此刻，当被问到西藏是否曾就从印度或海外获得武器这个问题接触过印度时，柳霞告诉威尔金斯，“他们没有正式地这样做过，而且在现

12. 同上。

13. 同上。

14. 美国国家档案馆，威尔金斯同柳霞和乔治·帕特森（G. Patterson）之间会谈的备忘录，1951年5月13日，包含于611.93B/5-2451美国驻印度大使馆的威尔金斯给美国国务院的信中，1951年5月24日。会谈的翻译是伦珠（Lhundrup），也就是著名官员噶雪（Kapshöba）的儿子。

在这个时期，考虑到他们正同中国人谈判的实际情况，他们不认为采取这方面的行动是明智之举。”¹⁵

不久之后的5月21日，也就是签署《十七条协议》的两天前，达赖喇嘛在一封信里答复了韩德逊（但是这封信送达韩德逊的时间并不清楚）。在答复中，达赖喇嘛很谨慎，并且满口托辞，没有正面回答，但是表现得很友好。他只是说，中国和西藏之间的和平谈判正在北京举行，如果将来西藏不得不再一次寻求美国的帮助，达赖喇嘛希望美国能尽其最大的努力给予帮助。¹⁶

在威尔金斯同柳霞的第二次会谈约一周之后，威尔金斯同夏格巴在加尔各答进行了一次会谈。夏格巴告诉威尔金斯，达赖喇嘛派他来确认西藏究竟可以期望从美国那里得到何种类型的援助。¹⁷这当然是很重要的问题，因为主张流亡的官员知道，如果不能确保可以从外部获得强有力的援助，那么将无法说服保守派精英同意让达赖喇嘛流亡。

夏格巴还通知威尔金斯同中国的谈判在5月13日陷入僵局，并就“当西藏和共产党在北平的谈判破裂的时候”西藏该怎么办这个问题询问美国政府的建议。夏格巴说中国人想控制整个西藏包括军事和外交在内的事务，虽然西藏政府愿意在内藏（金沙江东部地区，那时中国的西康省）让步，但是他们不愿意在达赖喇嘛控制的外藏（政治意义上的西藏）让步。夏格巴继续说，达赖喇嘛坚持不放弃对西藏的防御的控制，如果他被迫要离开西藏，他会立即出发，并补充说柳霞已经返回亚东去讨论韩德逊大使写给达赖喇嘛的信。接下来，他列出了他和柳霞希望得到答复的六个具体的程序性问题。这些问题正中事情的核心：

15. 同上。

16. 美国国务院，1983: 1721，美国驻印度代办给美国国务卿的信件，1951年6月28日。

17. 夏格巴提出这些问题很可能不是受达赖喇嘛的指示，美国对这次会议的报告就暗示了这一点。达赖喇嘛那时还没有很积极地掌控西藏政府。即使不考虑这个因素，夏格巴作为政府官员也应由噶厦或者西藏外交局领导。但是，在这次以及以后与美国人的会谈中，夏格巴频繁地使用达赖喇嘛的名义。很可能夏格巴认定如果使用达赖喇嘛的名义可能会更有效，因为美国人关心的问题是达赖喇嘛将要怎么做。所以很明显，我们不能把美国档案中以达赖喇嘛的名义提出的内容当作是他真的作出了那样的指示。这个问题以后将进一步讨论。

1. 如果现在进行中的谈判破裂了，西藏应不应该向联合国报告？怎样报告？联合国对西藏仍然有兴趣吗？它能提供什么样的帮助？美国会怎么做？美国会同意签发签证吗？
2. 鉴于西藏与锡兰没有官方联系，美国是否愿意就达赖喇嘛及其随行人员寻求避难的问题接触锡兰政府？
3. 美国政府是否愿意为达赖喇嘛和大约 100 名随行人员提供避难？他会受到什么样的接待？以国家首脑的身份吗？美国会负担他们的开支吗？
4. 如果达赖喇嘛离开西藏，美国是否愿意在时机成熟的时候向他提供军事援助和贷款，来帮助西藏团体起义反对共产党中国的侵略？金钱对于鼓励西藏团体起事是非常必要的。
5. 美国是否愿意在噶伦堡设立某种形式的代表机构，以建立美国官方和西藏政府之间的联系。夏格巴强调了这种代表机构的必要性，但这种机构可以是非正式和秘密的。
6. 达赖喇嘛希望他的长兄当采仁波切离开西藏访问印度。当采在从塔尔寺回到拉萨之初就表态反对共产党中国，这使他很难留在西藏面对共产党中国可能作出的责难。如果最终因为同样的原因当采不能留在印度，他及他的仆从能否以非官方的身份前往美国？¹⁸

威尔金斯告诉夏格巴他会立即征询韩德逊大使的意见，并会把这些问题的答复送去噶伦堡给他。在几乎与此同时的 5 月 26 日，中国人公告《十七条协议》已于 1951 年 5 月 23 日签订。

北京发出公告的几天之后，国务院要美国驻德里大使向在噶伦堡的西藏官员求证是否真的达成了这样一份协议，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西藏政府对于接受协议和实施协议有什么打算。¹⁹ 一周之后的 6 月 1 日，夏格巴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只是告诉美国驻加尔各答总领事，西藏政府很急于得到美国对达赖喇嘛提出的六个问题的答复。他还告诉总领事，美国代表可以

18. 美国国家档案馆，793B.00/5-2951，美国驻印度代办斯特莱（L. V. Steere）给美国国务卿的电报，电报号 3398，1951 年 5 月 29 日。

19. 美国国家档案馆，893B.13/5-2651，美国国务卿给美国驻印度大使馆的电报，电报号 2015，1951 年 5 月 29 日。

在天黑之后通过他说的方法在噶伦堡秘密地与他会见。美国人把这看作是一个好的迹象，因为这表明西藏政府仍然在考虑反抗中国人。²⁰

第二天，国务卿迪安·艾奇逊谨慎地答复了西藏人的问题。艾奇逊先对韩德逊表示，国务院在收到关于北京协议的结论性情报之前不会作出最终的判断。他接着指示韩德逊：

西藏不应当被迫接受任何对西藏自治权的侵犯，西藏人民应当享有一定的自决权，就像他们从〔1911年的〕中国革命之后一直享有自治一样。国务院进一步认为，如果能使这种观点获得广泛的支持，那么将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国务院也同意大使的观点，认为美国应当重申对西藏在政治和经济各个领域的兴趣。假设西藏政府不接受北平的条款，他们将会受到政治和军事上的压力，则国务院将接受大使馆电报中的建议。但作为附加条件，美国不应承担为西藏政府提供引导的责任，具体原则如下。²¹

这里所谓的原则是对西藏的六个问题的答复。艾奇逊指示韩德逊可以给当采仁波切签发签证，美国也愿意替达赖喇嘛接触锡兰，而且在噶伦堡建立非正式的联系渠道也是可以接受的。在关键问题上他指示：

〔1. 关于联合国的问题〕

美国认为如果要向联合国申诉，就应当寻找适当的机会使广大的联合国成员都能了解这个申诉，并能引起他们的思考。但是美国重申并非在每个议题中都会承担主要的发起角色。美国承担发起角色的意愿会受其他国家的态度及它们与事件的特殊关系的影响。在这个具体的问题上，印度政府的利益尤其是需要考虑的。尽管美国重申愿意支持对西藏新的申诉进行考虑，但还是认为其他联合国会员国的态度也是很重要的。当然西藏可以考虑向联合国秘书长呈交新的信息，陈述北京谈判的详情和共产党对西藏构成的威胁。但是美国认为，向联合国递交新的申诉书的同时，如果能引起其他重要国家如英国、印度、巴基斯坦、法国、苏联等国的兴趣并得到它们

20. 美国国家档案馆，793B.00/6-151，美国驻印度大使馆给美国国务卿的电报，电报号 3439，1951年6月1日。

21. 美国国家档案馆，793B.00/5-2951，美国国务卿给美国驻印度大使馆的电报，电报号 2051，1951年6月2日。

的支持，那么这可能比先派代表到联合国来更有成效（从时间因素来考虑更是这样）。如果西藏能够鼓动某些有影响力的世界舆论来支持其提案，就可能造成有利于联合国考虑西藏问题的政治氛围。美国将同意向西藏前往联合国的代表签发签证。西藏代表是否到联合国来以及何时前来由他们自己决定……

〔3. 关于达赖喇嘛及 100 名随行人员（以及他们的家属）的避难和经费问题〕

美国不能答应向达赖喇嘛及其随行人员提供经费。应当注意这有很多先例，例如沙俄的流亡人士以及最近的中国副总统李宗仁等都没有得到美国的经费支持。而且还应当注意到，所有报道都指西藏政府拥有包括黄金和白银在内的大量财产。我们认为那些财产很可观，够他们用的了。达赖喇嘛应该会安排把他的流亡政府所需的这些财产从西藏运出来。所以在你的答复中请删去如美国愿意考虑向西藏提供某种财政支持或者美国将“尽最大努力帮助西藏人解决财政资金困难”等内容，但是请向达赖喇嘛建议，如果他留在如印度或锡兰这样靠近西藏的国家，将能更好地为西藏的自由事业奋斗。

〔4. 关于向达赖喇嘛提供军事援助和资金支持，以推动反抗中国人的起义的问题〕

美国准备参考西藏本部的政治和军事发展以及非常关键的印度政府的态度，在轻武器方面向西藏提供有限的援助。但是美国政府认为，只有在西藏内部存在有意愿抵抗并且有能力抵抗的势力时，我们才能够提供援助。如果西藏内部完全瓦解，那么外部提供的政治上的帮助将没有什么意义。西藏政府表现出坚决反对任何侵略行为的态度将会鼓舞世界各国支持其立场。在外藏的任何让步都会导致其他方面利益的丧失。一旦这样，美国将不会承诺提供任何的支持。但是如果西藏境内的抵抗斗争一直坚持，那么我们会根据印度政府的态度来决定我们是否提供支持。西藏人最近是否已经就提供武器或允许货物经过印度运输的问题接触过印度？如果接触过，那么结果如何？

迪安·艾奇逊在最后用以下指示和见解结尾：

国务院同意，在目前这个特殊阶段，美国应当以合作的口吻来回答夏格巴提出的问题，这很重要。所以请表示出同情的态度，暗示美国政府准备采取一切可行的行动帮助西藏维护其自治，但是同时也要指出印度政府对事态的发展所持有的立场是非常重要的。

在考察历史和政治现实之后，西藏人将会理解尽全力争取印度的支持是很必要的。印度政府现在的态度跟它的行动一样，对西藏并没有多少同情，这一点美国政府很明白。国务院重申不建议西藏违背自己的判断而去接触印度政府或接受印度政府的意见。美国本身将根据自己对局势和未来的判断行事。虽然如上面所说美国对西藏的境遇怀有深深的同情，但还是不得不指出印度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既因为其与西藏的传统关系也因为其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西藏人同样不应当抱有幻想，以为可以通过联合国的行动得到军事援助。西藏人需要考虑各方面的因素，并要明确自己的目标是追求自治，用这个目标来指导自己的行动。

此外，以下观点供你参考。西藏的政治组织只有立足于外藏，坚信达赖喇嘛无论如何也不能受控于北平，他们的抵抗才有可能取得预期的效果。美国重申它对西藏的处境怀有深深的同情，并且将给予实际的援助，但是援助的前提是西藏人作出真正的努力，并且要下坚定的决心。²²

美国的新态度中并没有包含更多具体的援助。西藏无法在联合国里获得其他国家的帮助，而美国国务卿却偏偏建议他们先试试从联合国的其他国家着手，所以这种建议虽说谈不上是羞辱，但至少也是很荒谬的。它一方面反映了华盛顿对事态的无知，另一方面也反映华盛顿其实并不太在乎。而且，美国在答复中没有向西藏保证美国会带头要求中国人从西藏撤退。甚至连有限的轻武器援助也是没有多大的意义，因为它的前提是“非常关键的印度政府的态度”，而且还要求在达赖喇嘛和他的高级官员离开之后西藏仍然有政治和军事力量愿意抵抗中国人。对于这样的事情西藏政府根本没有任何后备计划，而且获得印度政府的合作基本上是不现实的，这一点美国本来就知道。因此，很明显美国仍然准备把西藏看作是中国的一个自治地区，而不是以达赖喇嘛为首脑的独立国家。走得太远意味着与在台湾的蒋介石的立场相冲突，作为帮助西藏的代价这是不值得的。

在新德里的美国大使韩德逊派威尔金斯到噶伦堡向夏格巴通报这个答复，同时求证《十七条协议》的情况。威尔金斯于6月7日或8日到达那里。他先解释了美国的立场，然后向夏格巴指出这种立场是以西藏政府不接受、不承认《十七条协议》为前提的。这使夏格巴很吃惊，于是告诉威尔金斯

22. 同上。对于在华盛顿的决策的背景，见克劳斯，2003: 5860。

说他已经收到一封来自达赖喇嘛的电报，上面说他和西藏政府不承认中藏协议，西藏代表团是在压力和威胁下才签的字。夏格巴还告诉威尔金斯，西藏代表团在北京的时候就已经被告知所有重大问题都要请示亚东，因此他们没有权力批准这样一份协议。他进一步推测说在所有的代表团成员都离开中国脱离危险之后，西藏政府就会通知中国人不接受协议。²³ 可能夏格巴只是在说一些好听的话，尽最后的努力掩盖事实以使美国保持兴趣。

当夏格巴和威尔金斯第二天再次见面的时候，夏格巴告诉威尔金斯他刚刚收到一封达赖喇嘛发来的急件，上面说亚东正在讨论一些问题。美国的档案说，夏格巴在介绍急件时提到其内容包括“如果美国愿意提供帮助，你〔夏格巴〕应该立即安排我离开亚东前往印度；如果美国不愿意提供帮助，你应该马上返回亚东”。夏格巴告诉威尔金斯他对美国的答复感到很满意，他肯定达赖喇嘛和西藏政府也会对这个答复感到满意。他说他会马上把美国愿意提供的帮助通知达赖喇嘛，并且认为这可以影响在亚东进行的讨论的结果。²⁴

夏格巴还告诉威尔金斯，西藏政府认为在达赖喇嘛公开拒绝《十七条协议》和到达印度之前，最好推迟进一步向联合国提出申诉的行动。接着他再一次要求美国就允许达赖喇嘛避难这个问题接触锡兰政府，因为西藏和锡兰没有外交关系，绕开印度政府直接同锡兰接触是很困难的，而且可能会让印度觉得受到冒犯，威尔金斯同意了。

然后，夏格巴又老调重弹，说达赖喇嘛和一百到两百个随行人员及其家人更愿意在美国避难，并说他认为在美国的答复中愿意接受达赖喇嘛避难是最重要的一点。他还又一次敦促威尔金斯就军事援助和可能的贷款问题提供更具体的信息。最后夏格巴问威尔金斯美国有没有可能派一个代表在接下来的几周内留在噶伦堡，因为很多重要的问题都可能会出现。威尔金斯答复说他会设法安排，美国大使馆不久就会派加尔各答总领馆副领事撒切尔（N. G. Thacher）带着妻子和儿子以度假的名义来处理与西藏人相关的事务。

23. 美国国家档案馆，793B.00/6-1151，美国驻印度大使给美国国务卿的电报，1951年6月11日。

24. 这封信收录在美国国家档案馆，793B.00/6-1151，美国驻印度大使给美国国务卿的电报，1951年6月11日。在前面的注释中已经提到，这些指示实际上也很可能不是由达赖喇嘛直接发出的。发出这个指示的可能是西藏政府。

夏格巴对美国的答复的评价以及他的西藏必定会反对协议的观点在西藏政府中并不占支配地位，更不是达赖喇嘛的观点。例如，外交局局长柳霞的观点就不同，他在这个时期告诉美国人他对于西藏政府是否会就《十七条协议》表示强烈反对并不乐观。²⁵

几天后的6月15日，撒切尔在噶伦堡会见了夏格巴。这一次，夏格巴告诉撒切尔他暂时还未收到关于达赖喇嘛准备拒绝《十七条协议》的进一步消息。撒切尔于是转告夏格巴由北京来的中国代表最早可能会在6月22日到达西藏，并且强调达赖喇嘛在这之前拒绝中藏协议很重要。²⁶

撒切尔关于那次会谈的回忆反映了在西藏的期望与美国的援助意愿之间存在着落差。在事后接受的访问中，他说在此次会谈中“有些事很荒谬……他们充满希望地谈论美国为他们提供坦克和飞机”。²⁷撒切尔觉得西藏人的希望很荒谬，因为他知道华盛顿并没有兴趣向西藏承诺帮助他们对抗中国共产党争取自由。但是这些西藏人显然还没有搞清楚美国到底愿意为他们做什么。西藏人知道华盛顿希望达赖喇嘛拒绝协议，选择流亡后批评共产党，但是他们想设法弄清楚美国愿不愿意向西藏提供阻止北京进攻所需的援助。当然如果暂时无法阻止北京的进攻，那么美国愿不愿意提供援助最终把中国人赶出西藏。

与此同时，达赖喇嘛31岁的哥哥当采仁波切于1951年6月初到达噶伦堡，随身带了一份达赖喇嘛给美国的密件。前面已经提到，夏格巴已经于5月24日向美国驻新德里大使馆提出允许达赖喇嘛的哥哥在不被印度政府接纳的情况下前往美国的请求。²⁸在6月8日，夏格巴告诉威尔金斯：“达赖喇嘛希望他〔当采〕前往美国。虽然他〔当采〕是以非官方的名义去的，但是他能够代表达赖喇嘛发言。”²⁹

25. 美国国家档案馆，793B.00/6-1151，美国驻印度大使给美国国务卿的电报，电报号3576，1951年6月11日。

26. 美国国家档案馆，793B.00/6-1951，美国驻印度大使馆给美国国务卿的电报，电报号3687，1951年6月19日。

27. 康博伊和莫里森，2002: 14。

28. 美国国家档案馆，611.93B/5-2651，夏格巴同美国驻印度大使馆一秘威尔金斯的会谈备忘录，印度，1951年5月26日。

29. 美国国家档案馆，威尔金斯同夏格巴、次仁之间的会谈备忘录，附于611.93B/6-1451美国驻印度使馆给美国国务卿的急件，1951年6月14日。

美国大使馆马上建议国务院同意当采访问美国，并请求华盛顿允许他以签署宣誓书的方式代替护照入境美国，因为把需要的文件从亚东发过来可能会需要几个月的时间。大使馆也建议应当为当采提供资金支持，因为他不愿意向印度政府申请外汇，同时指出美国政府在当采到达美国之后还会继续向他提供资金。美国大使馆在给国务院的书面建议中写道：“当采仁波切可能将是美国和达赖喇嘛之间重要的桥梁和渠道，通过他美国也许能够同西藏维持紧密友好的关系，这一点会在将来得到验证。”³⁰ 美国渴望向西藏示好，所以在6月18日批准了这个建议。³¹ 给当采的资金最终由中央情报局（CIA）提供，通过由它负责经费的自由亚洲委员会支付给当采。³²

当采所携带的密件的落款时间是5月29日，而且这封信似乎是由达赖喇嘛私人发出的，他的政府并不知情。在信的开头达赖喇嘛请求美国向他的哥哥提供帮助，他说：“我的哥哥当采正要去美国，希望你们能够保护他的周全，希望你们尽你们所能给他以帮助。”³³ 信件的其余部分已经被删除了，但是从国务院讨论这封信的文件可以看出，其余部分是说当采已经被授权为达赖喇嘛代言，他虽然是以普通公民的身份前往美国，但是也可以被看作是达赖喇嘛的私人代表。这封信还提到政治方面的问题。达赖喇嘛说他不仅渴望和美国建立亲密的关系以及从美国得到帮助，而且还有同美国达成秘密协议的想法。当然这个想法在大使馆看来是一个脱离现实的奢望。³⁴ 他们评论道：“尽管这里表达的希望很脱离现实，但是大使馆还是会在当采离开之前告知他达成这样的协议是非常困难的；美国通过

30. 美国国家档案馆，611.93B/6-1451，美国驻印度大使馆给美国国务卿的急件，1951年6月14日。

31. 美国国家档案馆，793B.00/6-1351，美国驻印度大使馆给美国国务院的电报，电报号3616，1951年6月13日；以及同一档案号，美国国务院给美国驻印度大使馆的电报，电报号2194，1951年6月18日。

32. 康博伊和莫里森，2002: 15。

33. 美国国家档案馆，793B.00/6-1651，美国驻印度大使馆的斯特莱给美国国务卿的电报，1951年6月16日。

34. 关于西藏对与美国建立亲密关系并得到美国帮助的渴望，见美国国家档案馆，威尔金斯同当采仁波切、邦达养壁（Yangpel Pandatsang）和乔治·帕特森的会谈备忘录，附于美国驻印度大使发给美国国务院的611.93B/6-1451号急件，1951年6月14日。

当采就可以向达赖喇嘛表达具体的建议和帮助。”³⁵ 当采以这是他弟弟的看法为由要求将这封信作为最高机密文件看待，并说他没有让西藏政府的其他任何官员看过。³⁶ 这似乎是达赖喇嘛及其家人第一次单独或者共同抛开西藏政府，尝试独立地影响美国的外交政策。这不会是最后一次。

但是，现实的情况很令人迷惑。协议公布已经近一个月了，尽管夏格巴和当采仁波切不断地保证他们和达赖喇嘛保持着联络，并且他倾向于拒绝协议，但是美国并没有收到任何可以表明达赖喇嘛计划拒绝协议的情报。鉴于中国的代表即将到达印度，美国人决定比以往更加明确地向达赖喇嘛表示如果他拒绝协议，美国将给予公开的支持，意图以此引诱达赖喇嘛。国务院于6月16日向美国驻印度代理大使传达了 this 决定。

你可以在你认为适当的场合向西藏人表示，如果他们公开拒绝中藏协议，那么作为对这个行动的支持，美国官方将会发表评论以表达对西藏的处境的同情。但是这样一个评论的内容和时机将取决于西藏发表的宣言的内容。

美国政府认为，在西藏采取行动之前，美国政府不应当公开地在联合国引入西藏问题。³⁷

美国也告诉英国，美国并不准备“安抚”印度。如果必要，美国愿意承受同印度关系恶化的代价。美国认为这是出于反对共产党的进攻的考虑。³⁸ 这是美国在认识上向前迈出的重大一步，但仍然还只是停留在口头上，并没有具体的行动支持。

35. 美国国家档案馆，793B.00/6-1651，美国驻印度大使馆的斯特莱给美国国务卿的电报，1951年6月16日。

36. 当采提出的对这封信件进行保密处理的要求归档于美国国家档案馆，93B.00/6-1151，由韩德逊大使发给美国国务卿的电报，1951年6月11日；以及美国国家档案馆，611.93B/6-1451，当采同邦达养壁、乔治·帕特森和威尔金斯的会谈备忘录，1951年6月8日。对于他把这封信藏起来不给西藏政府的其他成员看这一点，例如美国驻加尔各答总领馆就报告说当采没有在1951年6月8日与威尔金斯的会面中向威尔金斯出示这封信，因为当时还有另外一位西藏官员邦达养壁在场（美国国家档案馆，793B.00/6-1751，美国驻加尔各答总领馆的威尔逊给美国国务卿的电报，1951年6月17日）。

37. 美国国家档案馆，793S.00/6-1551，美国国务院给美国驻印度大使馆的电报，1951年6月16日。中国方面的消息说张经武到达加尔各答的时间是6月26日。

38. 英国外交部档案，FO371/92997，英国驻华盛顿大使馆给英国外交部的电报，1951年6月25日。

撒切尔再一次会见了夏格巴，向他传达这个新的消息。夏格巴说他会立刻把这个消息转递给亚东，他还告诉撒切尔几乎所有在印度的西藏官员都已经被召集到亚东参加一个重要的会议。³⁹

6月26日，夏格巴和撒切尔进行了一次冗长的会谈。撒切尔就这次会谈撰写了一份详细的报告。这份报告表明在亚东的西藏人有一些担忧，以及西藏方面在外交和军事上缺乏准备：

同夏格巴和车仁（晋美）的会谈〔后者为翻译〕

我在这天的早些时候打电话给夏格巴，约定他带着车仁晚上到雷金农场（Rinking Farm）来。我先把下午刚从加尔各答发来的消息告诉了他们。这个消息说中国人和西藏代表团的行程由于洪水被推迟了，他们现在还在中国。

接着我把话题一转，告诉他们我们渴望获得尽可能多的来自亚东或拉萨的情报，不管它们是不是非常重要。我告诉他们我们传递给华盛顿这方面的情报越多，我们就越能向他们证明西藏政府是真的想和我们合作，共同抵抗。但是夏格巴声称他还是不知道西藏政府将要怎么做。接着我问他有没有把6月19日我给他的有关美国政府的态度的声明送到亚东去。夏格巴说这个消息已经送到亚东去了。我询问他知不知道西藏政府计划在达赖喇嘛发表声明之前会用什么方式知会印度政府。他说他不知道这方面已经做了什么安排。我问他会不会通过达亚尔（H. Dayal）〔锡金政治专员〕，但是夏格巴并不确定达亚尔是否是适合的人选。我又重复了一遍我们在6月19日会谈中的提议：有必要制定在发表声明之前先知会中国、美国、印度和英国政府的计划，并且要使印度政府意识到中国共产党对西藏的进攻意图。

夏格巴接着提到他收到在亚东的西藏政府发过来的要求他答复的五个问题。我们花了一点时间讨论这些问题，对于某些与我方相关的问题我给出了我的答复。而对于我的每一个答复，夏格巴都说与他已经发给亚东的答复很一致。

(1) 第一个问题：是否认为印度政府会允许达赖喇嘛经过印度领土前往美国？我说我看不出印度有什么理由反对达赖喇嘛取道它

39. 美国国家档案馆，793B.00/6-2851，美国驻加尔各答总领事给美国国务卿的电报，电报号548，1951年6月28日。

的领土前往其他国家。当然我不能断言印度政府会不会允许达赖喇嘛留在印度。但是我还是借这个机会提出我们觉得达赖喇嘛最应该寻求在印度避难，接下来最适当的是泰国，再接下来是锡兰。如果达赖喇嘛不能在以上的国家立足，那么美国政府将很乐意收留他。我指出我们对这个问题采取此种态度是因为我们希望达赖喇嘛住在靠近自己领土的地区，也希望他的宗教地位可以使他受到那个地区居民的尊敬和同情。对于泰国比锡兰更适合的问题，我给出了国务院的理由。我强调我们的观点并不表明我们不愿意或不情愿接待达赖喇嘛，只是我们觉得如果他驻留的地方一方面人们尊重他的宗教领导地位，另一方面离他自己的人民很近，那么他的影响力和能发挥的作用将会大很多。

- (2) 西藏政府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是：美国政府给予的援助是否只针对帮助达赖喇嘛逃离西藏？是否还包括针对未来抵抗的援助？我回答说美国政府当然会在两个方面都给予帮助。但是我强调如果西藏政府能够通过明确的证据证明它以及达赖喇嘛私人的部分财富正在被使用，或者正被努力地转换成可以使用的财产，那么美国政府会更乐于提供帮助。不过，我也指出如果达赖喇嘛有办法自己解决一些问题，但是却希望美国政府承担所有的一切，这种想法显然是不合理的。当然，我们的意图很明确，就是在可以解决的问题上帮助西藏人民。
- (3) 西藏政府询问夏格巴：他认为提供援助的方式会是“公开的还是秘密的”？对于这个问题我回答说，援助会在不公开的情况下运抵达赖喇嘛选择的任何一个避难地点，这一点不难理解。当然，如果没有印度政府的了解和默许，很难想象西藏政府和人民可以得到援助。这让我们再一次回到印度立场的重要性的问题，回到如果没有得到印度的同意，美国政府什么有用的事情都做不了这个问题上来。
- (4) 西藏政府询问夏格巴：如果西藏政府宣布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条款，那么美国还会给予任何援助吗？我说我们把西藏政府拒绝条款看成是打开美国援助之门和使印度认识到西藏问题的危险性的首要并且是最重要的步骤。我不准备说如果西藏接受中国的条款美国就不提供任何援助，但是似乎在那种情况下还提供物质援助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夏格巴说他已经告知西藏政府如果西藏接受中国的条款那么就“没有希望”收到任何援助。

于是我们敞开展论西藏人针对中国的条款的行动。夏格巴说如果西藏政府拒绝中国人公布的条款，必然会非常害怕来自中国共产党的强烈反应以及由此产生的危险。我指出西藏面前有两个困难的选项：一个是全力反抗中国，另一个是尝试同中国合作。我尽量清楚地描述了那些尝试同共产党合作的人物的下场，并强调现在正尝试同中国人合作的班禅喇嘛最终也会被中国人抛开。如果达赖喇嘛留在西藏，那么他将来也会是一样。我认为班禅喇嘛会得到这样一个下场着实让夏格巴吃了一惊。我尽我所能生动地描绘了在已经被共产党控制的地方所发生的事情（指在捷克斯洛伐克、中国、波兰等地的事件）。

我想知道西藏政府是否正在严肃地考虑接受中国的条款，以及在接受条款的背后是否还隐藏着某些反抗方案。夏格巴说他不知道有这样的方案。

(5) 如果达赖喇嘛决定去美国，他会得到怎样的接待？

我再一次强调了我们对于达赖喇嘛应该去哪里的态度——泰国、锡兰等等，但是我也说达赖喇嘛会以伟大的宗教领袖和国家世俗领袖这样的身份被接待，但是不会触及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的相关问题。我们不会在这方面采取任何行动，直到西藏最终宣布完全脱离中国。这使我有机会再一次强调西藏政府应该释放一些准备采取有力行动和抵抗措施的讯号，这是极为重要的。美国政府的政策是只帮助那些愿意帮助自己的人们。

我问夏格巴，如果美国政府突然把 50,000 支来复枪运到噶伦堡交由西藏政府使用，那么会有怎样的结果？夏格巴说它们会被用来进行游击战而不是公开的正面交锋。

最后我询问夏格巴当采和达赖喇嘛的关系。他高度地评价了当采，说他深得达赖喇嘛的信任。⁴⁰

两天之后，撒切尔通知夏格巴中国人和西藏代表团已经于 6 月 26 日到达香港，夏格巴承诺马上把这个消息传递给亚东。⁴¹

尽管达赖喇嘛仍然没有正面地回应美国的交涉，但是此时身处加尔各答的当采仁波切告诉美国总领事，达赖喇嘛本人（1）当然不同意中藏协

40. 美国国家档案馆，793B.00/7-251，关于副领事 N. G. 撒切尔同夏格巴和车仁〔晋美〕在 1951 年 6 月 26 日的会谈报告，1951 年 7 月 2 日（划线部分为强调）。

41. 美国国家档案馆，793B.00/7-2951，摘自 N. G. 撒切尔的信件，1951 年 6 月 29 日。

议；(2) 很可能会在中国人到达印度之前发表拒绝协议的声明；(3) 肯定会在中国人和西藏代表团到达西藏之前离开那里；(4) 更愿意寻求在美国避难。⁴² 他同样提出了夏格巴先前提出的有关美国在达赖喇嘛离开西藏之后准备提供的援助的具体内容这个问题，并且很坦率地谈到在达赖喇嘛身边有很多人反对他离开西藏。⁴³

美国人要当采再一次通过可靠的信使向达赖喇嘛传达美国全面的立场。⁴⁴ 6月28日，当采发了一封加密电报并派人送了一封密函，敦促他的弟弟采取行动拒绝协议。⁴⁵

达赖喇嘛在他的书中回忆到这封信，说：“他建议说如果我选择流亡，那么两个政府〔美国和西藏〕之间就可以谈一些关于援助的安排。我哥哥在信的结尾说我应当尽快前往印度，这非常紧急。并且他补充说中国代表已经到达加尔各答，正在前往卓木（Tromo）〔亚东〕的路上。也就是暗示我如果不马上采取行动，那就可能太迟了。”⁴⁶

与此同时，美国同英国和印度讨论了这个问题。

■ 美国同英国和印度的磋商

美国关于援助西藏的想法并没有引起印度和英国多大的热情。在1951年6月11日，巴杰帕伊非正式地表达了印度的态度，他重申印度之前的立场，即避免任何可能有损印中关系的军事上或外交上的对抗。巴杰帕伊也表示，如果达赖喇嘛决定离开西藏并且向印度寻求避难，印度政府将会

-
42. 美国国家档案馆，793B.00/6-2651，美国驻加尔各答总领事给美国国务卿的电报，电报号541，1951年6月26日。
 43. 美国国家档案馆，793.00/6-1151，美国国务院内部备忘录，1951年7月2日；美国国家档案馆，793B.00/7-951，美国驻加尔各答总领事在给美国国务卿的电报中的评论，1951年7月9日。
 44. 美国国家档案馆，793B.00/6-2651，美国驻加尔各答总领事给美国国务卿的电报，电报号541，1951年6月26日。
 45. 美国国家档案馆，793B.00/7-351，美国驻加尔各答总领事给美国国务卿的电报，电报号13，1951年7月3日；以及美国国家档案馆，793B.00/7-351，美国驻加尔各答总领事给美国国务卿的信，引自美国国务院1951: 7: 1728号档案注释1。当采仁波切拒绝就这些与美国的交涉向我发表看法。
 46. 达赖喇嘛，1990: 14-65。达赖喇嘛也收到一封海因里希·哈雷从噶伦堡发来的催促他赶快出逃的信件。

批准他的请求。但是这种避难将不会是一种“政治避难”，达赖喇嘛将不能作为一个流亡政府的首脑。⁴⁷这种避难只是对个人的“人道主义”关怀，被接纳的个人将不允许在印度从事任何政治活动。印度已不再关心西藏，仅仅准备用遗憾的眼光看待后续的事件。英国高级专员也通报说印度政府强烈反对美国的介入。⁴⁸

英国外交部继续奉行其以印度为先导的政策，并且想劝说美国不要支持西藏。例如在6月18日，作为对美国意图发表声明支持西藏拒绝中藏协议的回应，英国告诉美国国务院它不希望西藏在联合国提出申诉，并希望美国征求印度政府对于美国的计划和立场的意见。英国告诉国务院，如果美国一直无法有效地与印度沟通，它与印度的关系将会进一步紧张，而且甚至可能“导致尼赫鲁在西藏问题上彻底撒手不干”。⁴⁹英国外交部东南亚事务部的首脑斯科特（R. H. Scott）认为美国的建议在西藏人看来无异于镜花水月，解决不了实际的问题，而从美印关系的角度来看则是非常危险的。斯科特挖苦道：“鼓励西藏人拒绝中藏协议的结果仅仅会让美国那些从事宣传工作的人又多了一些宣传素材，但是并不能很好地帮助西藏人。”他认为美国大使馆在开始这场“宣传秀”之前应当同印度政府磋商，而后再小心掂量印度的观点。⁵⁰

不仅如此，英国驻华盛顿大使馆还于6月25日向国务院转达了英国驻德里高级专员阿基比德·莱爵士（Archibald Nye）的看法：“（1）西藏方面的任何抵抗行动都不可能成功。（2）印度政府奉行的一个主要准则是反对任何可能使其与中国的关系恶化的行动。……（4）印度很不乐于见到美国介入西藏问题。（5）印度不认为达赖喇嘛一方向联合国提出申诉会有什么用，因此不会为这样的申诉提供帮助。”⁵¹

47. 对于印度允许达赖喇嘛避难的问题，见英国外交部档案，FO371/92996，英国驻印度高级专员给英联邦关系部的电报，1951年6月11日。

48. 英国外交部档案，FO371/92997，英国驻印度高级专员给英联邦关系部的电报，1951年6月18日。对于印度自1947年独立以来对西藏问题的立场的探讨，见戈尔斯坦，1989；也可见加佛（Garver），2001。

49. 英国外交部档案，FO371/92997，英国驻印度高级专员给英联邦关系部的电报，1951年6月18日。

50. 英国外交部档案，FO371/92997，斯科特对穆雷（J. A. Murray）所做的会议记录的评论，1951年6月21日。

51. 美国国家档案馆，793B.00/6-2551，英国大使馆一秘贝尔驰（R. H. Belcher）同南亚事务办公室代理主任肯尼迪（D. D. Kennedy）的会谈备忘录，1951年6月25日。

美国政府置印度和英国的意愿和态度于不顾，一门心思要支持西藏人，英国外交部的斯科特将美国这一行为的严重后果看在眼里。他在书中写道：“这件事在西藏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如果达赖喇嘛在美国的鼓励下拒绝北京的协议，那么美国当局将因此肩负起沉重的责任。而我们至少应当设法劝说达赖喇嘛自愿地流亡印度，而不是让他在没有印度支持的情况下进行一些徒劳的抵抗。”⁵²

当这一切正在逐渐进行的时候，亚东展开了一场关于达赖喇嘛何去何从的最终大辩论。

52. 英国外交部档案，FO371/92997，斯科特所做的会议记录，1951年6月27日。

第六章

达赖喇嘛返回拉萨

■ 民众大会最终的辩论

为了决定达赖喇嘛是否应当返回拉萨，西藏政府于 1951 年 7 月初在亚东召开了为期三天的民众大会，专门讨论这个问题。

在亚东的大多数官员包括所有僧官都强烈认为达赖喇嘛应当返回拉萨。持这种观点的人得到身在拉萨的司曹和其他上层官员以及三大寺（哲蚌寺、色拉寺和甘丹寺）的堪布们的支持，这些人希望达赖喇嘛回去。俗官昌松（Chabtsom）是拉萨噶厦的书记官（藏语：噶仲，*kadrung*），他回忆了在亚东民众大会之前司曹和噶厦是如何努力促成达赖喇嘛返回的。

达赖喇嘛在亚东的时候，司曹说我们〔在拉萨的噶厦〕应当给达赖喇嘛写信。拉萨的噶厦同意了，所以我们发了好几封信去催促他返回拉萨。我们在信中说：“现在拉萨的局势与您离开的时候不一样了。那时有许多谣言，但是现在我们已经检查了各个地方，可以保证没有一点儿危险。以前，我们没有派遣密探的制度，但是自从您走了之后我们派出了一些密探。我们也收集了很多情报。例如，我们派密探去监视那些从安多〔青海省〕来的喇嘛。”

我们发去好几封这样的信，但是不记得有没有派代表过去。我们也收到一些来自三大寺的请愿。三大寺的僧人跑过来对我们说：“一些政府官员和噶伦堡以夏格巴为首的一伙人正设法让达赖喇嘛去印度，所以你们应当确保这种事情不会发生，让达赖喇嘛返回拉萨。”

所以我们写信给达赖喇嘛，说：“您突然去了卓木〔亚东〕，人民因此很不踏实，所以求求您回来吧。我们会小心地看着〔拉萨

的) 每一个角落, 保证不会出问题。而且如果将来您不得不再一次离开, 您可以再做打算。”¹

除此之外, 三大寺还派出好几个代表团到亚东去, 恳求达赖喇嘛尽快返回拉萨。

当协议签订的消息传到拉萨之后, 拉萨的上层官员又一次敦促达赖喇嘛返回。官员土登桑杰 (Thubden Sangye) 那时正在拉萨, 他回忆了一次由司曹召集的会议。

他们通报说《十七条协议》已经签订了, 协议中有这样那样的条款。接着他们问我们有什么看法。

我们每个人都觉得, 从达赖喇嘛的地位不会被改变而佛事也不会受到影响这两个角度来看, 这个协议是有其可取之处的。但是我们也对解放军进入西藏表示了自己的担忧。不过我们都说, 在谈判代表返回西藏、我们详细了解整个事件之前没有什么可以做。但是我们也发了一封信给达赖喇嘛, 要求他尽快返回拉萨, 并且还分别派了三个独立的代表团去亚东面见达赖喇嘛, 要求他返回拉萨。²

另一方面, 反对协议、主张流亡的人当中也有一些重量级的人物, 其中级别最高的是噶伦索康。其他反对回拉萨的重量级人物还有高级俗官夏格巴和朗色林、达赖喇嘛的卓尼钦莫 (副官长) 帕拉, 以及达赖喇嘛的家人 (如他的哥哥洛桑三旦和当采仁波切)。双方对自己的观点都很坚持, 认为这样一个决定很可能会改变西藏的历史。

在亚东的民众大会像以往一样由仲孜杰 (在一般情况下仲孜杰包括孜康和译仓的八位首脑, 但是这次当然就只能由这八位首脑中正在亚东的人组成) 主持, 通常噶伦不出席民众大会。

孜康的一位首脑朗色林是反对协议一派的主要发言人。他首先对中国人的进攻表示愤怒和怨恨, 接着开始说《十七条协议》是一个无效的协议, 既因为代表在签字的时候没有同噶厦商量, 也因为它包含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一条款。³ 他代表夏格巴、索康和其他一些人表达了如下观点: 一

1. 昌松, 访问记, 1992, 拉萨。

2. 土登桑杰, 访问记, 1991, 达兰萨拉。

3. 他的妻子说他为昌都遭到入侵和溃败的消息感到不安而无法入睡 (朗色林夫人, 访问记, 1994, 达兰萨拉)。

方面，这个协议作出了太多的让步；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现在虽然宣称采用温和政策，承诺让西藏保持以前的模样，但是当他们的大部队到达西藏的时候，他们就会改变姿态，摧毁宗教，让一切都公有化。⁴ 一旦我们答应了他们，那么将没有任何外国能够帮助西藏，达赖喇嘛自己也将身处危险的边缘，得不到帮助。



图4：孜本朗色林（班觉吉美）。照片来源：陈宗烈

4. 在1951年7月20日，达赖喇嘛和哥哥、姐夫（洛桑三旦和达拉·平措扎西）在亚东拜访了中共干部乐于泓。乐于泓写道，在这次会面的过程中，达拉告诉他说索康认为中国共产党起先会很温和，但是之后就会很严厉（藏语：*ngönjamjedzub*），他说索康很担心这一点（乐于泓，1981：142，1951年7月20日条目）。

朗色林还断言，流亡不仅可以反驳中国人所宣称的对西藏的主权，让西藏独立的火焰继续燃烧，还可以使我们能够向美国和其他民主国家寻求援助，并利用他们的援助重新使西藏获得独立。他说，十三世达赖喇嘛在1910–1913年就是这样做的，而且他成功了。我们现在也应该这样做。相比之下，接受协议返回拉萨就意味着西藏作为一个独立政体停止存在了。而且这种停止不是暂时的，而是永远的。⁵

主张返回拉萨（和朗色林针锋相对）的主要发言人是译仓的高级僧官仲译钦莫群培土登（Chömpel Thubden）。他情绪激昂地争论着，说《十七条协议》是一个好协议，因为它使达赖喇嘛的地位得到完好的保留，而且也保留了寺院生活和寺院的收入。他看重的是协议中的第三、第四、第七和第十一条：

- 三、 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民族政策，在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之下，西藏人民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权利。
- 四、 对于西藏的现行政治制度，中央不予变更。达赖喇嘛的固有地位及职权，中央亦不予变更。各级官员照常供职。
- 七、 实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的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保护喇嘛、寺庙。寺庙的收入，中央不予变更。
- 十一、 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强迫。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时，得采取与西藏领导人员协商的方法解决之。

群培土登说：“我们派出了五位杰出的代表去北京，我充分相信他们不会因为一杯啤酒就把整个国家给卖了〔不会出卖西藏〕。我们已经在寻求外国的帮助，并且一直在指望这个。但是我们从我们的求援行动中得到了什么？什么也没有。而且将来可以获得的也不会比现在的更多。达赖喇嘛必须返回拉萨，我们不能让他去外国人的地方。”⁶ 其他人表达了相似

5. 坚赞丹培（Gyentsen Tempel），访问记，1993，拉萨；班丹（Pandena），访问记，1992，达兰萨拉；桑颇·丹增顿珠，访问记，1981，达兰萨拉。

6. 坚赞丹培，访问记，1993。班丹（班丹，访问记，1992）和桑颇（桑颇，访问记，1981）也有提及。

的观点，说“虽然中国人是共产党，但是他们的脸跟我们是一样的。如果同那些白人生活在一起，那真是太糟糕了。”⁷

班丹（Pandemla）是达赖喇嘛的副经师赤江仁波切的一名私人随从，他记得达赖喇嘛的两位非常有影响力的经师也都不主张流亡：“他们大部分人〔僧侣和达赖喇嘛的经师〕认为最好还是回去，因为如果我们去了外国，那么就只能有一个很小的流亡政府，而且他们对于从外国获得援助也不乐观。这就是他们当时心里面想的，我是从〔我听到的〕赤江仁波切和林仓仁波切的谈话中判断出来的。”⁸ 达赖喇嘛在他的自传中也说林仓仁波切坚持认为他不应该流亡。⁹

在主张返回拉萨的人当中，绝大部分官员觉得西藏可以接受协议的条款。他们和谈判代表一样，也觉得中国人发明的“区域自治”这个新的说法听起来还不错，因为字面意思是“一个自我统治的地区／区域”（藏语：*rang gyong jong*）。而且正如前面提到的，协议中有关延续西藏政府、保护寺院和庄园以及最重要的有关达赖喇嘛的地位问题的条款看起来似乎都非常好。这些条款减轻了这些宗教和世俗领导者原有的担忧。他们本以为中国人会摧毁传统制度，实行信仰无神论的共产主义。虽然他们不喜欢被中国吞并，不希望中国的军队和官员最终以西藏人眼中的占领者的姿态进入西藏，但是毕竟现在西藏人孤立无援，而此时中国人温和的条款和渐进的政策却成为一个意想不到的收获，这使得他们忽略了协议中提到的有关改革和军政委员会的内容。而且，在主张达赖喇嘛返回拉萨的人当中还有一些以司曹为首，他们仍然希望在回到拉萨之后可以说服中国人改变一些他们不喜欢的条款，尤其是那条关于大量中国军队留在西藏的条款。¹⁰

朗色林接着站起来反驳群培土登。他强烈表示，除非民众大会在中国人到达之前推翻协议，否则西藏将成为共产党国家，我们将会失去一切，西藏将再也不会会有独立的一天，所以至尊达赖喇嘛必须选择流亡。对此群培土登愤怒地回击道：“我在一个外国〔中国〕待过，我很清楚在外国如果没有人关心帮助你生活会有多艰难。如果印度也是这种情况，那我们该

7. 达拉·平措扎西，访问记，1992，达兰萨拉。

8. 班丹，访问记，1992。

9. 达赖喇嘛，1990: 65。

10. 达赖喇嘛，访问记，1993，达兰萨拉。

怎么办呢？我们已经看到，印度政府一点帮助或支持也不愿意给我们，那你怎么能要达赖喇嘛离开西藏到这样一个陌生的非佛教国度去生活呢？你到底是了解情况？”¹¹

出身著名贵族家庭的四品俗官雪康（Shölkang Tseja）发言支持群培土登，他说：“最初，夏格巴告诉我们印度会用很高的规格欢迎我们。现在我们来到印度的门口，但是却看不到有任何欢迎的迹象。我们向外国寻求帮助，打算依靠他们，但却没有获得什么结果，这还不如依靠中国人。不管你们怎么决定，反正我是要回去的。”¹² 接下来还有人说“事情和十三世达赖喇嘛那时不一样了。过去中国没有现在这样强大。现在中国非常强大，所以我们最好还是待在西藏”这样的话。¹³

雪康是个很有意思的人，因为他喜欢新的、现代的东西，而这些东西也给他造成很多麻烦。四品官擦绒回忆说：

雪康非常喜欢像自行车、摩托车以及足球这样的玩意。后来好像仲译钦莫听说了雪康玩这些玩意……于是把他叫到译仓，大概是责备他，说：“你不能像这样。玩这些东西有辱我们僧官的体统。”他们不喜欢雪康这样，但是雪康很喜欢这些东西，而且他网球也打得很好。在冬天，他也去滑冰。所以之后他们好像又责备了他一次。

在大札摄政的时候，人们是不准踢足球和骑自行车的。虽然大家不敢公开反对这个规定，但是心里是不喜欢这样的。

雪康拍照也惹来麻烦。那一次我和他在一起，是在达赖喇嘛第一次到哲蚌寺去纪念剃度的时候。那时有很长的朝拜队伍，他就给他们拍照。我也拍了，但是我是偷偷地拍的……他可能拍的时候有点招摇。于是我听说大札和那些不喜欢他〔雪康〕的人看到他的所作所为之后，警告他不允许他拍照，并没收了他的照相机。之后，卓尼钦莫……把他叫到达赖喇嘛的秘书处告诉他，“你犯了很严重的错误，因此要罚你在未来七天每天僧官进行早茶礼的时候都要去磕长头。所以他去磕了七天头，还被降级为普通的僧官。因此，我想那个时候他可能很沮丧。”¹⁴

11. 桑颇，访问记，1981。群培土登曾经在西藏政府驻中国的办事处工作过。

12. 桑颇，访问记，1981。

13. 达拉·平措扎西，访问记，1993，达兰萨拉。

14. 擦绒·益西，访问记，1991，噶伦堡。

反印情绪在这个时期非常高涨，原因是虽然印度驻锡金政治专员达亚尔就住在离亚东不到两天路程的甘托克（在锡金），但是对达赖喇嘛的到来他却没有任何表示，甚至连礼节性地拜访一下都没有。要知道一年多以前他去拉萨时可是受到非常热烈的欢迎，所以在亚东的西藏官员觉得受到羞辱。对于这个问题达赖喇嘛是这样说的：

虽然就隔着一个山头，他也不来卓木〔亚东〕。所以在我们看来，这应该能够检验印度政府的〔立场/态度〕。如果事情很简单，那么政治专员一定会过来，因为他要做的仅仅是跨过那个关口。但是他没有来，于是我们对印度的立场很难作出预测。¹⁵

在雪康后面发言的人说，如果达赖喇嘛拒绝协议选择流亡，那么他可能再也回不了西藏，当然也不能用他的地位来帮助他的人民。但是如果他留在拉萨，就可能会有很多机会，他可以用他的影响力来减缓中国人对西藏的占领。¹⁶很明显，那些反对流亡的人们的一个重要的考量是如果达赖喇嘛逃走，那么中国共产党会如何对待宗教和寺院制度。如果达赖喇嘛不在拉萨，那么共产党就会摧毁一切，这是他们最为担忧的。

除了政治和策略上这样的考量之外，在物质方面他们也很担忧没有庄园和经济来源情况下的外国生活。于是，尽管这些精英不信任和害怕中国共产党，并且认为他们是独立于中国的，但是他们还是倾向于返回拉萨，因为如果真的按照《十七条协议》来执行，他们的生活方式就能够继续——至少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能够继续。

经过长时间的激烈辩论后，主张返回拉萨的人明显占了上风，于是民众大会建议噶厦，达赖喇嘛应当返回拉萨。但是索康噶伦坚决反对接受中国的主权及返回拉萨，为了阻止民众大会的建议他使出了最后一招，提议在作最后的决定之前先打卦，因为这样就起码有一半机会选择流亡。¹⁷噶

15. 达赖喇嘛，访问记，1993，达兰萨拉。

16. 桑颇，访问记，1981；坚赞丹培，访问记，1993。

17. 索康其实并不相信这些装神弄鬼的东西。有一次，他的一个家人生病了。一位萨满大师来他家要用一根绳子“吸走”瘟神。他利用这个机会做了一个实验，把原来要系在病人身上的绳子系到楼梯的扶柱上。当萨满大师认为他从病人身上吸出一个血淋淋的象征疾病的東西的时候，这实际上是从楼梯上吸出去的（索康，私人信件，1963）。

厦的同僚们同意了。于是在第二天，大家在护法神拉姆的神像前燃香祷告，然后把写有签文的小球放在钵里摇晃，随后一个糌粑球掉了出来，敲开之后大家看到上面写着达赖喇嘛应该返回拉萨。从西藏人的观点来看，这意味着女神拉姆启示他们应当返回拉萨。索康极度沮丧，也有些怀疑。他要求把钵里剩下的糌粑球也敲开，以防有人舞弊，在两个球里放进相同的签文。但是最终并没有发现什么舞弊，¹⁸ 神作出了她的旨意。

大部分人决定返回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他们认为美国提供的帮助太有限，不足以让西藏承受拒绝协议随之而来的与中国人的彻底决裂。尽管美国是惟一向西藏提供支持的国家，但是它没有给予西藏人阻止中国人占领西藏或者将来重新夺回西藏的希望。美国并不愿意承认西藏所宣称的独立，更不要说提供足够的经济和军事援助来帮助西藏人重新夺回他们的土地。所以他们很担心，害怕他们剩下的日子都要在某个外国流亡终老。西藏人看到，美国已经派出成千上万的军队到朝鲜去遏制共产主义，但是却不愿意作出一个类似的承诺，阻止共产党占领西藏，保护西藏人的“自由”。美国可以做达赖喇嘛的避难所，达赖喇嘛可以在那里谴责中国人的进攻，但是除此之外什么都没有。

关于美国人的援助的第二个局限是他们总是附带条件，要求得到印度政府的配合。美国人不断地提到这些援助只能通过印度政府，这尤其让西藏人恼火，也抵消了美国的立场中的积极因素。因为西藏人认为尼赫鲁是支持中国人的，他不会支持西藏。而西藏人的判断是正确的，关于印度的附带条件让美国所宣称的同情和支持看起来空洞而没有什么意义，或者至少不太可能产生什么实际效果。考虑到印度政府的敌意，毛泽东的“胡萝卜”政策看起来比美国有限的帮助更有吸引力。

美国驻加尔各答总领馆的一位官员回忆了他同西藏驻噶伦堡商务代表邦达养壁的一次谈话。这次谈话发生在几个月之后的9月17日，在这次谈话中邦达养壁清晰地表达了这个态度。

邦达养壁强调，他和很多西藏人觉得在他们努力寻求同中国共产党政府协商解决的过程中，外部世界完全抛弃了他们。他指出西藏政府感到非常灰心，既因为一年半以前它的使者在新德里遭到拒绝，

18. 班丹，访问记，1992。

也因为没能争取到任何国家强烈支持保持西藏的自治。大多数西藏人觉得西藏之所以受到孤立主要是由于印度的缘故。他追溯了最近发生的事件，这些事件让西藏人尤其觉得苦涩，于是坚定了决心，以后再也不向印度寻求任何形式的援助。他指出，假如达赖喇嘛希望离开西藏，印度政府应当收留他，但是印度政府任命的专门负责联络西藏事务的锡金政治专员哈里什瓦尔·达亚尔先生，却没有传达出印度政府有关于此的任何意愿。¹⁹

所以到了最后，所有的官员，当然也包括神，都把达赖喇嘛返回拉萨看成是西藏保持其喇嘛王国的精髓和生活方式的最好选项。但是这个决定并不意味着西藏人准备正式接受协议。由于下文将要介绍的原因，达赖喇嘛和噶厦在这个问题上再一次拖延，坚持说因为很多官员不在亚东，所以只有等回到拉萨他们才能决定这个问题。

■ 中国人到达印度

7月1日，当辩论还在进行的时候，张经武一行到了加尔各答。²⁰两天之后，他们坐飞机到达巴克多格勒（Bagdogra）机场，再从那里开车去噶伦堡。噶伦堡是印度的一个边境小城，也是西藏的羊毛出口贸易中心。7月4日，张经武在噶伦堡的提斯塔桥（Teesta Bridge）受到由噶伦堡西藏商人协会和西藏政府居民代表组成的接待委员会的热烈欢迎。²¹张经武作了简短的发言，总结了协议的内容和共产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强调达赖喇嘛将能保留他之前的头衔和权力。并且他要求接待委员会把这些讯息传递给达赖喇嘛身边的人。²²

19. 美国国家档案馆，611.93B231/9-1751，包含于美国驻加尔各答总领事给国务院的119号急件，1951年9月17日。

20. 美国国家档案馆，302 西藏，加尔各答总领馆的威尔逊给驻新德里大使馆的电报，1951年7月2日。中国方面的一份材料说到达的日期是1951年6月26日。

21. 阿乐群则，访问记，1993，克利夫兰，俄亥俄州。他在访问中描述了欢迎仪式：“在噶伦堡有一个商会（藏语：*tshongpa gidu*），我在商会里面。那时尼泊尔商人正准备欢迎张经武，夏格巴说我们也应当准备欢迎张经武，我们应该准备一些号角和笛子。我和噶哇群则（Gowa Chöndze）站在一个山脊上观看了这个欢迎仪式。夏格巴用铜钹和号角组织了一场盛大的欢迎仪式，他们还设宴款待了张经武。”

22. 郝广福，1986：119。

几天之后，从北京回来的两位西藏谈判代表凯墨和拉乌达热先行前往亚东向西藏政府汇报，而张经武和其他人留在噶伦堡等待给达赖喇嘛的礼物运到。²³ 当凯墨和拉乌达热到达亚东时，返回拉萨的决定已经作出了，雪康（色）·索南达杰（Shölkang Sey Sonam Dargye）〔色（Sey）即色朗巴（Seynamba）的缩写，位于四品官之下的一个官阶。这一官位没有任何职权。本书中如在家族名后加上“色”，即表示其色朗巴官职，以示区分同一家族中的不同成员——译注〕和浪卡·阿旺泽培（Nanggar Ngawang Tsempel）两位官员已经被任命为接待中国人的联络官。雪康（色）被派往噶伦堡会见张经武，并帮助他前往西藏。²⁴

凯墨和拉乌达热向噶厦解释了在中国发生的事情，并大体正面地评价了协议。他们觉得这个协议是西藏所能得到的最好的结果。拉乌达热建议政府接受协议，但是噶厦没有表明态度。²⁵

很有意思的是，拉乌达热和凯墨并没有被允许向达赖喇嘛汇报谈判的第一手情况，相反，他们被告知达赖喇嘛为了准备返回拉萨的行程而过于繁忙，所以要等回到拉萨后才能请求拜见。²⁶ 在亚东的上层官员不允许这两位来自北京的谈判代表亲自向达赖喇嘛解释在北京发生的事情，这表明达赖喇嘛是被隔绝于日常发生的事务之外的。那时，包括噶厦、经师以及达赖喇嘛身边的随扈官员，大家都不希望达赖喇嘛过于深入地介入这些事务。而在另一方面，正如我们将要在下一章讨论的，达赖喇嘛自己也不想介入过深。

噶厦指示凯墨和拉乌达热尽快通知张经武达赖喇嘛准备返回拉萨的决定。于是这两位谈判代表立即打电话给在噶伦堡的张经武，告诉他如果他尽快赶到亚东就可以在这里见到达赖喇嘛，否则他就只有等到了拉萨再见了。²⁷ 张经武决定不等礼物到来马上从噶伦堡出发去亚东，他于7月14日到了亚东。²⁸

23. 桑颇，访问记，1981；达拉，1995: 65。

24. 拉乌达热·土丹旦达，1981: 114-15。

25. 拉乌达热·土丹旦达，1986b: 45。

26. 拉乌达热·土丹旦达，1986b: 45。

27. 彭哲，访问记，1993，北京。

28. 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1990，1951年7月15日条目。

■ 美国继续劝说达赖喇嘛逃离西藏

美国一直希望达赖喇嘛强硬地反对中国共产党。但是夏格巴于7月1日通知美国官员，达赖喇嘛计划在发表声明或前往印度之前同中国共产党代表在亚东展开进一步的谈判。这使美国的希望遭到严重的挫败。夏格巴还暗示中国人在亚东会受到友好的接待。²⁹ 美国驻加尔各答总领事威尔逊（Wilson）只有在危机中寻找最后一丝机会。在写给国务卿艾奇逊的信中，他在指出这个坏消息的同时还说可能有一点回转的余地。他告诉艾奇逊：“这当然是非常严重的打击，虽然我们认为达赖喇嘛在中国代表到达亚东之后仍然有可能做出我们期望的举动。”³⁰

大概就在这段时间（7月2日），达赖喇嘛答复了当采仁波切6月28日的电报，但是内容并非如当采所希望的那样。现在达赖喇嘛建议他不要去美国，因为那会让达赖喇嘛和西藏政府在面对中国人时不好交代。但是当采拒不服从达赖喇嘛的指示，并且又从加尔各答回复了一封电报，敦促达赖喇嘛立即拒绝协议离开西藏。³¹ 在同美国人交谈时，他总是主观地说达赖喇嘛被共产党的同情者和特工包围了，这些人可能完全控制了达赖喇嘛和西藏政府。³² 最终，当采于1951年7月5日离开印度前往美国。

尽管收到的情报令他们很失望，但是美国还是在7月初进行了另一次尝试，试图联系达赖喇嘛并说服他逃离西藏。韩德逊大使发出一封秘密信件，给予达赖喇嘛“有关美国态度的简明、直白的声明”。为了安全起见，这封信件再次没有署名，没有标注日期，也没有提到美国。据传达赖喇嘛于7月6日收到这封信。信上说：

我们两个月前给您送去一封信告诉您与中国共产党打交道的风险。您的一些智囊可能认为他们了解中国共产党，能够同他们讨价还价。但是我们不认为他们了解共产主义或者那些共产党头头们的劣

-
29. 美国国家档案馆，793B.00/7-1251，美国驻加尔各答总领事给美国国务卿的电报，1951年7月2日。
30. 同上（划线部分为强调）。
31. 美国国家档案馆，793B.00/7-351，美国驻加尔各答总领事给美国国务卿的电报，电报号13，1951年7月3日。
32. 美国国家档案馆，793B.00/7-951，美国驻加尔各答总领事给美国国务卿的电报，电报号28，1951年7月9日。从前文可以看出这一点不是真的。

迹。……至尊您是西藏主要的希望。如果中国共产党掌握了西藏，那么您将是公认的领袖，将象征着西藏人民恢复自由的希望。

您是否收到我们关于中国共产党的信，这一点我们很想知道。

因为自从发出上一封信以后，我们从报纸上获悉您派往北平的代表同中国共产党签订了一个协议。我们认为他们签订协议是被迫的，且并非出于您的许可。但是世界开始以为您不反对协议了，因为您没有对它发表任何声明。我们认为您应当尽快发表这个声明，因为中国共产党正派代表经印度前往亚东。如果您在他们到达印度之前发表您的声明，那么就会令中国代表不能轻易地进入西藏。如果您不发表这样的声明，我们认为西藏将永远失去自治。我们到达西藏的惟一通道只有印度。因此西藏很有必要告诉印度现在你们想要干什么，并说服印度为您提供帮助或者允许其他国家帮助您。我们不是很确定印度是否会允许他国帮助西藏，但是我们认为这是有可能的，因为虽然印度近来表现得对中国共产党很友好，但是很多印度人都害怕印度旁边的这个共产党国家。我们现在愿意帮助西藏，也将做以下的事情：

- (1) 在您发表声明拒绝您的代表在北平同中国共产党签订的协议之后，我们将发表一个公开的声明表达我们对你们的立场的支持。
- (2) 如果您决定向联合国提出新的申诉，我们将会在美国支持你们的提案。
- (3) 如果您离开西藏，我们认为您应当依次寻求在印度、泰国或锡兰避难，因为这样您就可以尽量靠近西藏，并且能够组织反抗中国共产党的行动。虽然我们没有询问过印度，但是我们认为它会允许您去印度，因为在去年它曾经这样表示过。³³ 我们也没有询问过泰国和锡兰，但是如果您希望我们同他们接触，我们将会询问他们您能否前去。如果您无法留在以上任何一个国家，那么您可以带上一些随从到我们国家来。
- (4) 如果您离开西藏并组织反抗中国共产党的行动，那么我们准备通过印度给你们送去轻武器。但是我们认为您应当先要求印度提供武器，如果他们不能为你们提供，那么再要求印度允许其

33. 前面提到过，美国已经知道印度愿意接受达赖喇嘛来避难的前提是他会被当作个人难民，而不是一个流亡政府的首脑。

他国家通过其领土给你们提供。如果您不能组织西藏内部的抵抗，那么我们也会考虑向您提供贷款来支持抵抗，提高西藏人的精神士气。若要使西藏继续维持自治或者在以后重新获得自治，您必须在西藏之外寻求避难，这很重要。在您告诉我们谁能够代表您之后，我们将会同他讨论军事援助的计划和项目以及贷款的问题。

(5) 我们已经告诉您的哥哥当采仁波切他可以去我们国家，我们也正在安排他的行程。

我们很乐意做以上这些事情。我们已经给您发去好几封含有这个意思的信件，但是不知道您是否收到。因此我们请求您回信让我们知道您收到了这封信。我们也请求您向我们派来一位您的私人代表，或者写信告诉我们在印度的西藏代表中哪一位是您信任的。³⁴

这封信很有意思，既因为较之以前的信件它上面提出了更多具体的政治和军事援助，也因为美国官方终于询问在所有的西藏人中谁真正代表达赖喇嘛和西藏政府。他们收到的情报与这段时间以来发生的事实差别很明显。从协议公布到现在已经六周过去了，但是华盛顿仍然不知道达赖喇嘛对协议和美国人之前给他的信件的看法。

但是，美国人这封新的信件并没有使达赖喇嘛和噶厦动摇。7月11日，夏格巴通报说他已经收到达赖喇嘛的来信，信中说要他同中国代表见面，并在十天之内返回西藏。另外，噶厦已经指示在噶伦堡的所有西藏官员同中国代表一起返回亚东。在11日这一天，大批官员同张经武一起离开印度前往亚东。³⁵

■ 张经武在亚东

7月15日，也就是张经武到达亚东的第二天，噶伦前来拜会他，同他讨论第二天会见达赖喇嘛的安排。中国方面的一份记录对此描述如下：

34. 美国国家档案馆，793B.00/7-1151。这封给达赖喇嘛的信件收录在美国驻印度大使馆给美国国务院的急件中，1951年7月11日（划线部分为强调）。

35. 美国国家档案馆，793B.00/7-1251，美国驻加尔各答总领事给美国国务卿的电报，1951年7月12日。

7月15日，噶厦的几个噶伦（然巴、索康、绕噶厦、洞波）³⁶等前来拜见，并与张经武商量同达赖喇嘛见面的安排。噶伦们提出，达赖升座，两旁百官侍奉。张经武进去后达赖下座迎接，接毛主席信件后，仍升座。张经武座位设在达赖右下侧。

“升座”是封建式的君臣相见仪式，这种仪式当然不能同意。张经武认为会见仪式和座位不是个人问题，而是体现中央和西藏地方的关系问题，必须正确体现西藏地方隶属于中央人民政府的关系，必须坚持这一原则。鉴于西藏的特殊情况，在顾全大局的同时，可作适当让步……

乐于泓向噶伦们指出：“张经武是中央人民政府的代表，会见时达赖不能升座。张代表上山后，先在帐篷中休息，然后直接到达赖卧室见面，交毛主席亲笔信，进行交谈。”

乐于泓〔进一步〕解释说……如这次西藏和谈代表团到达北京时，朱德副主席、周恩来总理到火车站迎接，毛主席接见代表团时，也平起平坐亲切感人。他一边说，一边指着旁边的西藏和谈代表凯墨、拉乌达热说：“这些，他们都是在场亲身经历过的。”凯墨、土丹旦达都连声说：“是的！是的！”一番话说得噶伦们无话可答，他们表示同意乐于泓的意见。³⁷

张经武的翻译，安多藏人彭哲回忆了当时的讨论。

张经武到达〔亚东〕的那一天，噶伦们来见他，同他讨论与达赖喇嘛即将进行的会面。噶伦们提出，别人介绍张经武的时候十四世达赖喇嘛要坐在他的宝座上。

张经武笑了笑没有说什么，但是随行的乐于泓很生气地说，张经武来是代表毛主席的，所以达赖喇嘛怎么能不〔适当地〕表示一下？对会面程序的讨论进行了两个小时。最后，双方同意十四世达赖喇嘛会在他的卧室里放置两张椅子。会面的时候，他们都坐在各自的椅子上。³⁸

36. 然巴·土登贡钦、索康·旺清格勒、绕噶厦·平措绕杰、洞波·钦饶汪秋。

37. 赵慎应，1995: 19。乐于泓（1981: 139，1951年7月15日条目）对这次会面做了类似的描述。

38. 彭哲，访问记，1993。

双方就这样达成了妥协。中国方面不得不接受地方政府或者达赖喇嘛私人不向中央政府的代表宣示服从，而西藏也被迫接受达赖喇嘛不能高高地坐在法床或者宝座上。

张经武同达赖喇嘛的会面是在 16 日，张经武的传记描述了这次会面：

张经武在帐篷中休息片刻，便到了达赖的卧室。张经武走进达赖卧室时，达赖从坐椅上站起，跨前几步迎接，并让座请他坐下。达赖³⁹和张经武在两把紫檀木椅上入座，张经武和蔼地问候达赖喇嘛身体健康。达赖有礼貌地问候毛主席身体健康，并说张将军路上辛苦啦！

张经武说：“您亲自派代表到北京谈判，签订了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对您这种爱国态度，毛主席非常赞赏，非常高兴。”⁴⁰

张经武递上了协议（包含附件）的副本和毛泽东主席的信。毛泽东在信中明确地提到达赖喇嘛在 11 月写的信，暗示因为现在他已经亲政，所以中藏关系可以如他所愿得到改善。

达赖喇嘛先生：

感谢你经阿沛·阿旺晋美先生带给我的信和礼物。

西藏地方政府在你亲政后，开始改变以往的态度，响应中央人民政府和平解放西藏的号召，派遣阿沛·阿旺晋美先生为首的全权代表来到北京举行谈判，你的这项举措是完全正确的。

现在，中央人民政府全权代表和西藏地方政府全权代表，在友好基础之上，经过多次商谈，已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这个协议是符合西藏民族和人民利益的，同时也符合中国各民族人民的利益。

从此，西藏地方政府和西藏人民在伟大祖国大家庭中，在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得以永远摆脱帝国主义的羁绊和异民族的压迫，站起来为西藏人民自己的事业而努力。

我希望你和你领导的西藏地方政府认真地实行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尽力协助人民解放军和平开进西藏地区。我特派张

39. 中国方面的文件一般用“达赖”来指代达赖喇嘛（也用“班禅”指代班禅喇嘛）。

40. 赵慎应，1995: 20。

经武代表同你的代表们一道前来你处，以资联络。如你有需要我协助的地方，可随时与他接洽。附来礼物，至希收纳！

中央人民政府主席

毛泽东

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四日⁴¹

张经武解释了协议，强调西藏政府可以保持原状。接着他问达赖喇嘛对协议有什么看法，言下之意是想劝说达赖喇嘛公开表示接受协议。⁴²但是达赖喇嘛并没有作明确的表示。⁴³达赖喇嘛在书中对这次会面的描述与中国方面的记录大体上是一致的。

1951年7月16日，中国代表团到达卓木〔亚东〕。一个信使跑到寺里报告说他们马上就要来了。我对这个消息感到既兴奋又担忧，这些人长得什么模样？我有一点相信他们的头上都长着角。我走到阳台上焦急地向亚东前面的山谷望去，用我的望远镜扫视那些建筑物……忽然，我发现有人在移动。一群我的官员正向寺庙的方向走来。我能分辨出同他们一起的有三个穿灰色衣服的人，他们身在穿传统红色和黄色丝绸官袍的西藏人当中很不显眼。

我们的会谈非常客套也非常冷淡。张经武将军先问我是否听说过《十七条协议》。我尽力克制住自己，然后回答说听说过。接着他递给我一份副本和其他两份文件。在他递文件的时候，我发现他戴着一块劳力士金表……

接着张将军问我准备什么时候返回拉萨。我没有明确回答，只是说“很快”，而且我继续尽可能地避实就虚。他的问题很明显地表明他希望和我一同返回拉萨，这样我们就能象征性地一起进城。最终，我的官员设法避免了这种情况发生，他比我晚了一两天出发。⁴⁴

在以后接受的采访中，达赖喇嘛对他在亚东时不愿意就协议发表看法的事实做了详细的描述。

41. 赵慎应，1995: 21。因为达赖喇嘛不懂汉语，所以这封信由张经武的翻译彭哲来翻译。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1990，1951年7月14日条目所概括的内容与此相似。

42. 乐于泓，1981: 140-41，1951年7月16日条目；彭哲，访问记，1993。

43. 彭哲，访问记，1993。

44. 达赖喇嘛，1990: 14-67。

我记得他给我看了副本并询问我的意见。我的回答是我还没有时间仔细地阅读。我很清楚地记得是这么说的，意思是我希望以后再对它进行考虑和讨论。上次我向你提到过，那时在拉萨〔政府〕是由两位司曹掌管的。他们说我们必须对协议和中藏关系进行讨论〔即重新展开谈判〕，他们很强烈地希望这样。《十七条协议》已经在北京签订了，但是我们还没有直接说“好，就这样〔即我们接受它〕”。所以只要考察一下大多数官员当时的想法就会知道，有一部分人在一定程度上仍然认为在某些问题上还可以讨价还价。那时候阿沛还没有返回，所以似乎事情还不是很清楚，还有很多混乱的地方。我大概记得当时是这样想的。⁴⁵

中国共产党同达赖喇嘛的第一次会面对达赖喇嘛的思想也有积极的影响。与无穷无尽的关于中国共产党多么可怕的谣言相反，张经武很理智、谦恭、友好并且温和。达赖喇嘛在书中描述过对他的第一印象：“尽管我事前有种种的怀疑和担心，但是我们的会面清楚地表明这个人虽然应该说是我的敌人，但是事实上他只是另外一个人而已，跟我一样是一个凡人。这个印象影响了我很长时间……现在见过张将军之后，我对返回拉萨的前途有了些许乐观。”⁴⁶

张经武也告诉噶厦需要针对协议发表一项声明，但是噶厦派凯墨和拉乌达热在第二天回复张经武，在回到拉萨见到阿沛和原始的协议并与其他政教官员商量好之前，他们不会对协议发表任何评论。⁴⁷

乐于泓当时试图敦促西藏政府作出回应，说：“我提出协议内容已电告噶厦，这次把抄本也带来了，他们〔噶伦〕见了中央代表和毛主席的信，应表示态度，不一定要等全体噶伦开会。早表态对达赖在全国的威信有好处。接着，张代表又谈到班禅拥护达赖，为了团结，达赖也应表态。凯墨答应转告噶厦。”⁴⁸

45. 达赖喇嘛，访问记，1993。

46. 达赖喇嘛，1990: 67。

47. 关于要求查看协议的原始版本这一点，见乐于泓，1981: 141，1951年7月17日条目。关于要同在拉萨的其他政教官员商量这个问题，见拉乌达热·土丹旦达，1981: 113。

48. 乐于泓，1981: 141，1951年7月17日条目。

所谓噶厦和达赖喇嘛需要等阿沛回来显然只是一个托辞，因为那时正在亚东的谈判代表团成员之一凯墨是索康的叔叔，而另一位成员达拉是达赖喇嘛的姐夫。因此，对协议中各项条款的涵义不可能有什么“困惑”，而且阿沛对谈判过程的说明也不会比这两位更清楚。所以说，一再推迟发表声明的真正原因正是缘于拉萨的司曹的看法，他们认为在所有人回到拉萨之前不应该决定任何事情，这样就可以使中国人感到压力，迫使他们修改协议中的某些条款。

前面已经提到，司曹觉得这个协议没有经过充分的商量，而且西藏谈判代表签订这个协议已经超越了他们的权限，特别是在允许解放军驻守西藏这个问题上。⁴⁹ 俗官夏札回忆了协议签订的消息传开之后他在拉萨参加的一次由司曹召集的会议。

司曹……说，因为这个协议是在对方的地盘上谈出来的，⁵⁰ 所以阿沛不够强硬，而且签订的这个《十七条协议》没有包含西藏政府给谈判代表的指示中列出的条款。这个协议不是我们想要的，所以我们现在必须控制住局势，团结一致发一项声明对它表示反对，我们就应该这样做。会上并没有〔对此〕进行讨论。司曹仅仅是知会我们而已……于是我们给达赖喇嘛发了一封请愿信，说我们对这个协议的条款进行讨论。……他们〔司曹〕的想法是在拉萨重新评估并修改这个协议。⁵¹

达赖喇嘛也记得鲁康娃（Lukhangwa）对这个问题的态度很强硬。

两位司曹一直在思考，他们说在北京签订这个协议是一个大的失误，任何人都不应该在敌人的地盘上缔结协议。他们在协议签订之后送过来的请愿书上说，要是谈判在拉萨进行，那么人民会给我们以支持。那些手上拿着转经筒而不是枪的老人会说“我们的国家是一个小国，所以大量的中国人来会造成饥荒”等等的话。鲁康娃和洛桑扎西（Lobsang Tashi）确实是这么说的，我记得很清楚。⁵²

49. 在阿沛回到拉萨之后鲁康娃也曾经告诉过他：“你给自己的国家带来了黄昏，却给别人的国家送去了黎明”（鲁康娃夫人，访问记，1993，达兰萨拉）。

50. 藏语为：*rang sa mi sa thug pa yin tsang*。

51. 夏札，访问记，1992，拉萨。

52. 达赖喇嘛，访问记，1993。

主张流亡的人本来就不指望能更改协议的内容，更不指望中国人能老实遵守协议的条款。但是他们在是否流亡的争论中已经输了，所以这样停滞下去对他们很有利，因为同美国人的接触正在继续，可能在不久之后有些事情就会出现变化。据说实际上索康已经给司曹发了一封密电，暗示在拉萨还是有很多事情可以做：“面对面同敌人较量无法取得胜利，〔但是〕如果使用聪明的方法，人们〔仍然〕可以达到目的。”⁵³

于是，司曹提出的在所有人回到拉萨之前不作任何表态的要求最终被采纳，作为对协议的“公开”回应。西藏政府采取了欢迎中国人到西藏来但是拒绝公开接受协议的策略。达赖喇嘛也许可以利用流亡作为筹码通过在亚东的张经武直接同中国人谈判，但是他没有抓住这个机会。当然，谁也没有提出过这样的建议，因为西藏政府还没有准备好谈任何事情。因此在7月20日，噶厦请中国人帮他们翻译了一封给北京中央的信。信中重申他们已经口头表述过的话，即只有在阿沛和原始协议到达拉萨之后，他们才能召开会议讨论协议，也只有在开完会之后才能执行协议。⁵⁴

但是，噶厦不仅在接受协议这件事上继续停滞不前，而且在返回拉萨的安排上也坚决不让达赖喇嘛和张经武同行，认为那样会表现得过于团结。因为达赖喇嘛还没有正式接受协议，西藏方面希望让人们觉得中藏关系的准确属性还是一个有待讨论的问题。于是噶厦告诉中国人路况和设施很差，所以达赖喇嘛和张经武最好还是分开走。⁵⁵ 张经武只好无可奈何地同意了。

达赖喇嘛于7月22日离开亚东，两天之后张经武也出发了。⁵⁶ 绝大部分在达赖喇嘛逃离拉萨时离开的人现在也不得不决定要不要回去。而且这里面很多人为了安全起见已经把他们的全部或者大部分可动资产运到印度或者锡金暂存，所以他们也要决定这些财产怎么处理。几乎所有人都选

53. 藏语为：*Dongtug tragbödrowo düil khagbe / nosam thabgi dünpa drubar che*。昌松，访问记，1992。昌松说的这句话源于五世达赖喇嘛。第二行也可以说成：*natsog thabgi dradülwar che*。

54. 乐于泓，1981: 142，1951年7月20日条目。

55. 拉乌达热·土丹旦达，1981: 113。

56. 乐于泓（1981: 142–43，1951年7月21和23日条目）说这两个日期分别是21日和23日。

择了返回，但是决定的过程往往是非常纠结的。一位名叫车仁（Taring）的贵族妇女⁵⁷回忆了她同她的丈夫讨论这个问题时的情况。

当至尊离开〔拉萨〕去亚东的时候，大部分贵族把他们的东西带去噶伦堡。所以当我们返回〔拉萨〕的时候，我们把大部分财产托付给西藏政府在帕里〔在西藏南部〕的官员。但是我们带回了很多东西，比如银器、箱子和其他东西。

当我的丈夫和我在噶伦堡的时候，当采仁波切告诉我们：“大家回去是没有用的。你们想不想和我一起去美国？”我丈夫问我：“你想去哪里？跟当采仁波切去应该不会错。”我回答说：“不管情况如何，至尊都已经回去了，而且我不能离开我的家庭、孩子和亲戚，我不去。你的父母也在那里，你不能就这样一走了之。所以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们还是回去吧。”所以我们决定返回。当我们到达拉萨的时候，中国人已经到了。⁵⁸

但是，并非所有的官员和上层西藏人都决定返回。有一些像夏格巴这样的人选择留在印度，达赖喇嘛的大哥当采仁波切不顾达赖喇嘛让他返回的要求去了美国。达赖喇嘛的母亲也留在印度，还有噶伦索康和其他一些官员，比如宇妥。索康跟随达赖喇嘛前进到江孜，但之后又返回了噶伦堡。表面上是为了治病，但实际上很可能是害怕中国人的报复，因为他在亚东的时候强烈反对协议。他的妹妹宇妥夫人回忆说：“我妈妈让我去江孜设法劝说他〔索康〕返回拉萨，但是他去了噶伦堡。他说他如果返回拉萨就会有生命危险。”⁵⁹

一直跟随在他身边的妻子对此做了更为详细的描述。

萨旺钦莫（*Sawangchemmo*）〔谈到在亚东的讨论时〕说：“我们已经尽力了，但是我们有些官员顽固蠢钝、头脑不清（藏语：*gugpa utsu*）。⁶⁰如果达赖喇嘛待在西藏，那么他在中国人的身边处境会非常困难。中国人很懂政治也很会耍权谋。虽然有这个叫《十七条协议》的东西在那里，但是你等着瞧，他们不会严格遵守的。事情

57. 车仁夫妇都是英语说得很流利的贵族。

58. 车仁·仁钦卓玛（Taring Rinchen Dolma），访问记，1991，拉普。

59. 宇妥·多杰玉珍（Yuthok Dorje Yüdrön），访问记，1994，达兰萨拉。

60. 萨旺钦莫是对噶伦的一种称呼。



图5：1951年7月张经武骑马从亚东前往拉萨。图片来源：陈宗烈

绝不会就这样下去。他们主要的敌人是上层人士／领主、宗教和僧侣，也就是封建的东西。这些东西不会就这样持续下去。因此，我很怀疑〔他们〕将会做什么。”萨旺钦莫很久以前就了解共产主义制度。他从〔在拉萨认识的〕蒙古僧人那里了解了很多事情。

〔当萨旺钦莫回到〕噶伦堡时，他又转去加尔各答看病。这花了大约一个月的时间。接着他〔返回噶伦堡并〕说想留在那里。但是就在那时，一大堆信件从西藏发来。萨旺钦莫的父母告诉他，他应该返回西藏，待在那个地方〔印度〕不行。信一封接着一封地来，上面说了〔拉萨〕现在的情况，似乎看起来中国人不会做出什么不好的事，所以最好还是回去。中国的领导干部也拜会了萨旺钦

莫的父母，对他们说“噶伦索康是能明辨是非的人，为什么要待在别人的国家呢？他应该回来，不应该待在外国。我们只是来帮助你们发展西藏的，我们并不是来制造麻烦的。所以绝对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你是他的妈妈，而且看起来他很在乎你，所以请写信让他回来吧”等等。他们也告诉〔索康的〕父亲〔他的父母离婚了〕要他回去。这样的信接踵而至，〔他们在信中说：〕“父母不会毒害自己的儿子，所以没有必要怀疑。这段时间情况很好。甚至至尊都已经回来了，而且似乎在将来情况也不会变坏”等等……萨旺钦莫仍然说他不去。〔他说：〕“我将会〔从噶厦〕辞职。我身体不太好，而且我所有的孩子都在印度〔上学，同样他的财产也在印度〕。”于是我们发了一封信回去这样解释，但是他们〔家人〕却派了人来陪我们回〔拉萨〕去，有仆人以及马和骡子，什么都全了。于是他回去了。那是在1952年〔2月〕。⁶¹

当达赖喇嘛和张经武正在返回拉萨的时候，中国军队和官员也正在向拉萨进发，或者在为进入拉萨做最后的准备。十八军的先遣支队在王其梅的率领下正同阿沛一起前往拉萨，并将在9月初到达。而张国华率领的十八军的大部将在10月底到达。从西北局第一野战军来的一支骑兵支队在范明的率领下也准备向拉萨进发。那时住在青海省的班禅喇嘛也在做着进入西藏的准备。

而正在这时，美国仍然不愿意接受达赖喇嘛不愿意流亡的现实，更加努力地破坏协议。

■ 华盛顿再一次尝试

在张经武即将到达亚东的时候，美国的官员仍想通过提高价码来劝说达赖喇嘛流亡。在很大程度上，他们是被达赖喇嘛的哥哥当采仁波切影响了。当采一直向他们保证达赖喇嘛是真的反对协议并且想要流亡的。⁶² 1951年7月，国务院的官员在华盛顿会见当采仁波切时口头上开出一个

61. 索康夫人，访问记，1992，达兰萨拉。

62. 他们也受到两个西方人提供的信息的误导，这两个西方人是在印度的海因里希·哈雷和乔治·帕特森。

更加优厚的条件，并且于7月12日派人把相关内容发给在德里的韩德逊大使。新开出的条件说，如果达赖喇嘛拒绝协议并且流亡国外，那么美国愿意在以下方面给予支持：(1) 西藏人的“自决权”，(2) 达赖喇嘛作为自治西藏的首脑，(3) 达赖喇嘛最终返回西藏领导一个非共产党的国家。美国现在也愿意通过西藏在美国的友人为达赖喇嘛和一百名随行人员前往锡兰提供经费，并愿意承担达赖喇嘛在锡兰其他方面的费用。艾奇逊在电报中说，

美国政府认为西藏不应当被胁迫接受有违其自治的协议，并且认为西藏人民应当享有与其一直以来所享有的自治地位相称的自决权。这是美国的一贯立场，因此美国将公开申明其认可达赖喇嘛作为自治西藏的首脑的地位。

对于会有损达赖喇嘛作为自治西藏首脑地位之行动，相应地，美国也会努力劝说其他国家不要为之。

美国将支持西藏人在锡兰寻求避难。它认为会有对西藏有强烈好感和兴趣的美国公民愿意负担达赖喇嘛及其随行人员租用飞机从印度前往锡兰的费用，只要达赖喇嘛要求，美国将尽最大的努力说服印度确保达赖喇嘛及其随行人员能够通过印度转往锡兰。(这里需要指出，从现实考虑，同锡兰政府和印度政府的接触需要立即由达赖喇嘛的代表进行；我们以上的保证是基于一个假设，即达赖喇嘛在锡兰避难；如果达赖喇嘛在印度避难，那么在财政方面的保证将不得不需要再检讨。)

西藏在美国的朋友将会为达赖喇嘛同其家人以及约一百名随行人员在锡兰的避难提供所需的援助，前提是双方都觉得数目可以接受，并且能达到各自的目的。我们希望达赖喇嘛在选择随行人员的时候要考虑政治影响力和作用。

必须把西藏的抵抗运动当作长期的问题来看待。西藏的抵抗运动受到西藏和其相邻地区的具体政治格局的限制，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当然无法掌控。〔此处一个关键的部分从档案中删除了〕我们保证将达赖喇嘛从西藏转移出来的前提是，他公开拒绝接受西藏同共产党的协议，继续反对共产党的侵略，继续表示出同美国进行广泛合作的意愿。当然这里我们应当含蓄地表示美国将帮助达赖喇嘛，在可以实现的、尽可能早的时候，作为自治的非共产党国家的首脑返回西藏，并且建议西藏紧急接触印度政府，正式讨论印度对于达

赖喇嘛离开西藏的态度。在接触过程中应当强烈主张达赖喇嘛寻求经过印度转往他地的权利。美国将通过驻新德里大使馆运用广泛的关系网络支持这一要求。

我们已经向当采表示，我们的态度的基础和延续性与共产党介入朝鲜无关，也不会受到那个地方的变化的影响。

参考加尔各答 7 月 9 日 28 号电文的第五条，也见新德里的 29 号电文，当采已经表示他会准备一封藏文信件给达赖喇嘛，其中包含以上信息，将于 7 月 15 日从华盛顿以外交信函寄出。你将收到有关如何将当采的信件送达达赖喇嘛的进一步指示。同时你应当努力通过最佳途径把这份电报的实质内容转达给达赖喇嘛……

艾奇逊⁶³

在这里美国仍然没有支持西藏的独立，但是却提出了到目前为止最为丰厚的援助。美国人建议当时仍在噶伦堡的夏格巴推迟前往亚东的计划，等那封当采的藏文信件到达之后再走。但是夏格巴说他等不了了。⁶⁴

7 月 13 日，也就是张经武到达亚东的前一天，美国驻加尔各答总领馆收到两封来自噶伦堡的林恩（R. H. Linn）的电报，说夏格巴已经在跟进这项新建议。夏格巴告诉林恩，达赖喇嘛自己同意来印度，但是智囊们希望他返回拉萨。他说达赖喇嘛要求得到更多有关美国与印度进行的关于接受达赖喇嘛避难并提供设施之意愿的情报。由于达赖喇嘛当时已经决定返回，并且已经通过别人转告了张经武，所以不清楚夏格巴所说的话源自何处。但是那些主张流亡的人，比如索康，当然渴望获得新的筹码来扭转返回拉萨的决策。

林恩误解了亚东辩论的情况，他向加尔各答总领馆解释说，达赖喇嘛之所以推迟作来印度的决定，是因为他认为印度不愿意接受他避难，并且担心如果他接受美国的援助并拒绝协议，中国人会采取报复行动。因此林恩建议美国政府应当设法说服印度政府向夏格巴保证，愿意接受达赖喇嘛避难。⁶⁵

63. 美国国家档案馆，793B.00/7-1251，美国国务卿给美国驻印度大使馆的电报，电报号 107，1951 年 7 月 12 日。

64. 美国国家档案馆，793B.00/7-1351，美国国务院给美国驻加尔各答总领事的电报，电报号 108，1951 年 7 月 13 日。

65. 美国国家档案馆，793B.00/7-1451，美国驻加尔各答总领事给美国国务卿的电报，电报号 43，1951 年 7 月 14 日。

国务院同意了 this 建议，指示美国驻新德里大使馆向印方申明，西藏是因为印度支持中国人的态度才不愿意直接接触印度，并敦促印度政府邀请达赖喇嘛去印度。美国在伦敦的大使馆也受命请求英国敦促印度发出邀请。⁶⁶ 但是，当英国外交部向驻印度高级专员询问与印度政府磋商的事宜时，高级专员却答复说外交部应当设法劝说美国放弃所有这些想法。⁶⁷ 伦敦于是告诉美国人，西藏人应当自己去同印度人接触，引用 1950 年 10 月印度提出的避难承诺，询问印度还会不会兑现这个承诺。⁶⁸

在美国方面，林恩和驻加尔各答副领事威廉·吉布森 (William Gibson) 说服了夏格巴在通过锡金前往亚东的路上正式拜会印度驻甘托克政治专员达亚尔。⁶⁹ 7 月 17 日，美国官员在德里会见印度外交部的杜特 (S. Dutt) 时把这个问题提了出来。美国官员非正式地建议，如果印度政府就允许避难这个问题给达亚尔发去指示，那将会起到非常大的作用，因为达赖喇嘛非常关注这个问题。第二天，美国大使馆通知杜特说达赖喇嘛的一名代表准备随时去见达亚尔。杜特答复说已经就允许避难这个问题向达亚尔发出了指示。⁷⁰

但是，当夏格巴在甘托克会见达亚尔的时候，达亚尔说他没有收到任何从德里发过来的有关达赖喇嘛到印度避难问题的指示。此时吉布森为了帮助双方沟通已经到了甘托克，他通过与达亚尔直接交谈确认了夏格巴的说法。一得知这个消息，美国在德里的大使馆立即向杜特通报了此事，而杜特有些尴尬地承认达亚尔直到 18 日晚间才收到关于避难的指示。杜特向大使馆参赞斯蒂尔 (L. Steele) 解释说：“按照国际惯例，〔印度〕在达赖喇嘛不在印度从事政治活动的前提下准备允许达赖喇嘛在印度避难。”⁷¹

66. 美国国家档案馆，793B.00/7-1651，美国国务院给美国驻伦敦大使馆的电报，电报号 335，1951 年 7 月 16 日。

67. 英国外交部档案，FO371/92998，伦敦英国外交部的 J. A. 穆雷给英国驻华盛顿大使馆的汤姆林森 (Tomlinson) 的信，1951 年 7 月 18 日。

68. 英国外交部档案，FO371/92998，英国外交部南亚事务部给英国驻印度高级专员的电报，1951 年 7 月 20 日。

69. 美国国家档案馆，793B.00/7-17511，美国驻加尔各答总领事给美国国务卿的电报，电报号 52，1951 年 7 月 17 日。

70. 美国国家档案馆，793B.00/7-1951，美国驻印度代办给美国国务卿的电报，电报号 269，1951 年 7 月 19 日。

71. 同上；美国国家档案馆，793B.00/7-1951，美国驻加尔各答总领事给美国国务卿的电报，电报号 61，1951 年 7 月 19 日。

在斯蒂尔的建议下，杜特说他会采取措施确保这个信息传递给在亚东的达赖喇嘛。⁷² 那是在达赖喇嘛离开亚东前往拉萨的四天前。但是，印度又一次表明它不愿意在政治上和外交上给予西藏支持。

与此同时，美国驻印度大使馆为达赖喇嘛制定了一系列异想天开的逃跑方案。这些方案依据的是如哈雷、帕特森和当采仁波切这样的约谈对象的奇思异想，即达赖喇嘛本人已经被支持中国的势力包围，所以不能寻求避难。因此，他们让哈雷于7月17日送一封信到亚东，敦促达赖喇嘛在以下三个方案中作出选择：

- (1) 挑选一小队忠心的随从，带着他们秘密地离开。这可能需要在晚上行动，要努力躲过三大寺和拉萨政府派来劝说达赖喇嘛返回拉萨的代表团。
- (2) 命令〔名字从档案中删去了〕带您秘密地前往印度。〔此部分从档案中删去了〕
- (3) 如果(1)和(2)都不可行，请达赖喇嘛派人送信给〔名字从档案中删去了〕，要求〔名字从档案中删去了〕秘密地派哈雷和帕特森以在亚东附近会见达赖喇嘛为理由，按照既定计划带达赖喇嘛离开。关于这个方案的具体步骤也由〔名字从档案中删去了〕转告，他会向达赖喇嘛详细解释。这个方案只能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能采用。⁷³

达赖喇嘛在回忆这封信时说：

当我在卓木〔亚东〕的时候，哈雷从噶伦堡写信给我，告诉我一个经过不丹逃跑的计划。他说不丹有一些美国人，他也会来……大概是要我假装散步，而后会有训练有素的美国人前来接应。对，我们有过这样的通信……我同哈雷和当采仁波切都有过联系。⁷⁴

72. 美国国家档案馆，793B.0-2151，美国在德里的大使给美国国务卿的电报，电报号302，1951年7月21日。

73. 美国国家档案馆，793B.00/7-1751，美国驻加尔各答总领事给美国国务卿的电报，电报号52，1951年7月17日。

74. 达赖喇嘛，访问记，1993。

7月20日，美国驻加尔各答总领馆发出了从华盛顿送过来的、由当采仁波切翻译的美国的建议书。一名不愿具名的人士负责将这封信送达亚东并交到达赖喇嘛的手上。几乎与此同时，美国总领馆收到从亚东发来的加密电文，说达赖喇嘛几天之后就要返回拉萨了。⁷⁵ 我们知道，这个决定的作出已经是一个星期之前的事了。

这个小插曲表明美国对拉萨和亚东的真实情况如此缺乏了解，反映了那些反对西藏对中国妥协之政策的西藏人（以及西方人）滥用达赖喇嘛之名，通过夸张和歪曲事实来试图影响美国的政策，而且这不是最后一次。

最终，美国没能成功地破坏协议，说服达赖喇嘛流亡并从外国公开反抗中国人。这是因为它开出的条件没有毛泽东的诱人。虽然美国是西藏人深处困境时惟一表示支持他们的国家，但是这个支持看起来太微不足道了。它没能给予西藏人阻止中国人占领或者在不久的将来重新恢复他们的独立的希望。在西藏政府作出这个决定的时候，成千上万的美国人为了阻止共产党的扩张而战死在朝鲜，可是华盛顿却丝毫不愿意为西藏的“自由”作出类似的承诺。相反，美国不断强调所有的军事援助（指的是枪，而不是军队）都要通过印度。在西藏同中国的斗争中这个要求即使不是出于恶意，但至少也使这些帮助起不了多大作用。⁷⁶ 就像我们在前面看到的，西藏人认为任何要求争取印度同意的支持都是毫无意义的表面功夫而已。

75. 美国国家档案馆，793B.00/7-2251，美国驻加尔各答总领事给美国国务卿的电报，电报号68，1951年7月22日。

76. 但是，达赖喇嘛的二哥嘉乐顿珠曾经说过印度政府愿意向西藏提供有力的帮助。在一次同肯尼思·克劳斯（Kenneth Knaus）的约谈中，顿珠坚称印度驻中国大使潘尼迦于1949年夏在噶伦堡会见了，告诉他“印度可以作为西藏的基地，并向西藏提供武器”，而在不久之后尼赫鲁向他确认了这个承诺。最近出版的一本书中指出，西藏没有抓住这个机会。在这本书中作者总结道：“顿珠没有收到任何指示要求他跟进印度所作出的这个出奇大胆的保证”（克劳斯，1999: 51）。但是不应该把顿珠的这种说法太当回事，因为在这个时期印度政府的外交档案中没有任何有关于此的明确记录。相反，英国和美国的档案都表明相反的情况，这在前面已经论述过了。而且，这个时期印度高级官员们的记录也不支持顿珠的说法。例如，时任印度外交部英联邦关系部部长的杜特写道：“当印度在锡金的最高政治官员达亚尔在1949年访问拉萨时，西藏人正式向他请求，要求德里提供军火。印度政府并不热衷于介入西藏的内部事务，所以对这个请求没有表现出任何的兴趣”（杜特，1977: 80）。在1950年初，当西藏人派出代表团到德里寻求支持和援助以应对中国的进攻威胁时，杜特评论说：“印度政府建议达赖喇嘛通过和平对话与新

卢斯·培根在国务院 1949 年一份关于西藏的备忘录中敏锐地提出，可以想象如果共产党在中国获得胜利，而一个流亡的国民党政府建立起来，那么美国在决定其西藏政策的时候将不得不考虑其对流亡的国民党政府的政策。她解释说：“那么问题最终可以归结为：我们是不是应该承认西藏的独立并且支持他们申请加入联合国，以这种方式来强调它的独立性，还是说我们应该避免强调其独立性，而仅仅在不公开改变政策的前提下保持与西藏的直接联系。”⁷⁷ 这实际上是华盛顿在 1949 年年底面对的抉择，很明显美国选择了后者。考虑到蒋介石对这个问题的敏感，即使在共产党武力侵犯西藏的时候，美国也没有改变过去的政策来支持西藏独立。美国愿意给达赖喇嘛提供的最好的承诺是一个自治的西藏。

尽管美国所提供的关心和帮助逐渐在加码，但是最终还是过于单薄而敌不过毛泽东的“胡萝卜”的诱惑。毛泽东的渐进主义政策可以让达赖喇嘛（和他的政府）在眼下继续统治西藏，也保留了他们极为重视的社会和宗教制度。西藏的政治精英当然很怀疑中国共产党的诚信和协议的价值，并完全反对大量中国军队进驻西藏，但是较之协议中所包含的某些特定内容，美国所愿意提供的东西并不能让他们选择流亡。

于是，现在达赖喇嘛即将面对的是如何努力应对张经武和他的同僚们，以便不失自己的威严和西藏宗教社会的尊严，尽管西藏已是中国的一部分。其困难在于如何为西藏制定出一套策略，使之能够在从属于中国的前提下更好地继续生存下去。显然，西藏开始了一个新时代，但是它究竟能够以何种最佳方式来达成它的目标还不甚明朗。

的中国政府达成谅解”（杜特，1977: 30）。另外，1950 年到 1965 年任印度情报局局长的莫里克在他的书中记录了 1950 年印度政府的一次关于西藏的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印度军事介入西藏的问题被提出来，但也遭到否决，因为印度并不想进行干预。莫里克在书中说，军方首脑卡里阿帕（Cariappa）“直截了当地说他不能分出任何一支军队来帮助西藏，最多也就是一个营。与巴基斯坦的边界问题以及国内兴起的共产党势力让他分身乏术……他进一步解释说印度军队的装备和训练不足以应付在这么高海拔地区的战斗。而中国的军队都针对高寒地区的战斗进行过训练，并且装备也更好，都是美国当初用来武装国民党的武器。与他们打仗印度会非常吃亏。”莫里克总结说卡里阿帕是对的，“如果印度送一两个营上去也就等于送死”（莫里克，1971: 80-81）。

77. 美国国务院，1974: 1065，这份备忘录的全文见第五章，第 114-117 页。

第二部分

最初的两年

冲突与调整

第七章

初步的接触和策略

在达赖喇嘛到达拉萨的时候，一个紧迫的问题摆在他的政府面前，即是否要采取和解的态度。如果要追求和解，那么西藏方面是否应当尽一切努力同中国人建立友好合作的伙伴关系，以说服他们以有利于西藏的方式来解读《十七条协议》？如果不追求和解，那么西藏是否需要采取更为强硬、更少退让的方式来设法迫使中国方面修改协议的关键内容？下一步应当对中国人施加什么样的压力？或者在更为极端的情况下，是否应当开展积极或消极的抵抗行动，例如鼓励针对中国人和军队的游击战？很明显他们必须对中国方面做一些事情，不论这些事情是好还是坏，因为西藏的将来已经危如累卵了。

.

7月24日，张经武离开了亚东。他比达赖喇嘛晚两天出发，但是在江孜赶上了正在做佛事的达赖喇嘛。¹ 在江孜的时候，张经武再次尝试让达赖喇嘛身边的噶伦发表接受协议的公开声明，但还是没有成功。² 于是他继续向拉萨前进，于1951年8月8日到了那里，比达赖喇嘛早了九天。他是第一个进入拉萨的中国共产党官员。

拉萨表面上风平浪静，但是在深层次里却涌动着忧虑和愤怒的暗流。由于拉萨人之前听说过很多关于共产党的负面传言，所以他们对张经武一行非常好奇也非常担心。每个人都想知道这些红色中国人长什么样子，

1. 彭哲，访问记，1993，北京。达赖喇嘛在白居寺（Pegaw Chöde Monastery）讲授时轮金刚密法（Kalachakra，藏语：堆柯旺清，*düikhor wangchen*）。

2. 乐于泓，1981: 144，1951年8月12日条目。

他们会如何行事。另一方面他们也很愤怒，因为他们的政府未能阻止这一切的发生。虽然西藏境内没有报纸作为宣泄情绪的渠道，但是在如此重要的时期，消息和观点可以通过一些不知名的作者创作的讽刺诗歌——“街头歌谣”——来表达。这些所谓的街头歌谣的主题无一例外是对权贵的辛辣批判和嘲弄。

下面这三首街头歌谣表现了在张经武即将到来、西藏即将开始一个新时代的背景下存在于拉萨各方面的不同观点。第一首讽刺西藏政府在1949年赶走国民党官员时表现得非常强硬，但是仅仅两年之后却无力阻止中国共产党进入拉萨；第二首责备噶厦赶走了温和无害的中国人（蒋介石的国民党），却引来了崇尚暴力、危险的红色中国人。³

强硬地赶走他们，
软弱地引他们进来。
他们要和平还是暴力，
我们等着瞧。⁴

拉萨的噶厦老爷，
请你们看清楚，
你们赶走了和平的白汉人〔国民党〕，
但却引来了暴力的红汉人〔中国共产党〕。⁵

第三首说中国共产党能够不用武力，仅用温文尔雅（和平）的手段就让他们军队和官员进入拉萨，这说明他们比西藏政府聪明多了。

3. 街头歌谣是拉萨流行的一种传统的、辞藻优美的通俗诗歌形式，每年传召大法会时都会出现许多新歌词，为法会背水的妇女会用传统的旋律演唱这些歌词。西藏人认为这些新歌谣是神的启示，也是某种预言，是拉萨主要的护法神班丹拉姆（Be Lhamo）的化身告诉这些背水的人的。实际上，重大事件会刺激精英中的一些人去匿名创作歌词，于是街头歌谣就产生了。见戈尔斯坦，1982，或者见 www.case.edu/affil/tibet/moreTibetInfo/street-song.htm。

4. 藏语为：*yod pa'l dbang gis spid [phud] nas / med pa'l dbang gis khrid byung / zhi dkar drag dmar yod med / ga ler ga ler gzigs dang*。引自《西藏镜报》1951年8月1日第五期。

5. 藏语为：*lha ldan gzhung gi bka' sag / rdo la ngo 'dzin gnang dang / zhi dkar phyi la spid nas / drag dmar nang la khrid byung*。引自《西藏镜报》1951年8月1日第五期。

那“九眼”弹弓，⁶
 是用那羊毛所做。
 射手是北京，
 射中的是拉萨。⁷

张经武进拉萨的时候还算顺利，但也不是什么状况都没有出现。正式礼仪对西藏人和中国人来说都是很重要的，因为它可以反映权威和地位的相对高低。因此，张经武受到什么规格的欢迎就很重要，所以还在亚东的时候张经武就针对这个问题发了一封信给掌管拉萨政务的两位司曹。信中说他是中央政府的“代表”，按照传统，包括西藏政府最高官员（即两位司曹）在内的接待委员会（藏语：培楚，*phebsu*）应当到位于郊区的传统的接官亭去接待和欢迎他。⁸但是两位司曹不同意，张经武不久之后就会了解到，两位司曹心里对这场战争、这份协议、失去的独立以及共产党官员在拉萨的首次出现充满了愤怒与怨恨。所以尽管司曹组织了在拉萨郊外的欢迎仪式，但是他们本人却拒绝参加，以这种方式表达对中国人的不满。但是有趣的是，他们作这个决定依据的却是二十世纪初清朝的旧例。⁹这并不令人意外，因为司曹在思考如何同北京打交道时，看到的是很久以前历史上的中国，而不是现实中的新中国。

尽管受到司曹的怠慢，张经武的欢迎仪式却进行得异常顺利。当时在场的一位年轻贵族记得张经武和他的随员乐于泓都穿着浅蓝色的“毛式中山装”（也就是说没有穿军装），坐骑上配的是上乘的欧洲牛皮鞍。大量西藏人站在路的两旁欢迎他们。当然，这些欢迎人群中的大部分人同这个年

6. 这是一种非常有名的弹弓，上面有九个图案，每个图案远远看上去很像眼睛。

7. 藏语为：'jam po'I bal gyis sles pa'I / 'ur rdo chu mig dgu sgril / pe cing gzhung nas rgyab pas / lha ldan gzhung la babs song。引自《西藏镜报》1951年8月1日第五期。

8. 一般认为到拉萨城外较远的地方去迎接高官和权贵可以表现出对他们的尊敬，这就像在美国人们会去机场接人一样。培楚（*phebsu*）是指西藏政府派官员到城外欢迎达赖喇嘛和一些重要的人物，例如清朝的驻藏大臣。举行培楚的地点离拉萨的远近反映了即将到来的人的地位高低。这种仪式一般是在吉彩洛定（*Gyetseluding*）举行，这个地方位于拉萨以西从哲蚌寺到罗布林卡之间的大道上（见拉萨地图）。

9. 札登（*Drakten*），访问记，1992，达兰萨拉。他的说法是根据和桑却拉（*Samjöla*）的谈话，桑却拉是司曹的助手（藏语：*nendrön*）。

轻的西藏人一样并非出于表示友好和支持，而仅仅是出于好奇。¹⁰但是他们毕竟是来了，而且没有表现出敌意。实际上，这个欢迎仪式非常热烈。这甚至使康区来的商人阿乐群则非常气愤，以至于他开始发动拉萨的普通人为达赖喇嘛的到来组织一场特殊的（更热烈的）欢迎仪式。¹¹

可以说，张经武进入拉萨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重大胜利。到目前为止他们的策略都按计划进行得非常顺利。张经武一行由拉萨政府安排住进原属于贵族赤门（Trimön）家的房子，并在那里开始办公。现在他们已经准备开始把西藏并入中国的下一个阶段。然而，张经武很快就会了解到两位司曹的怠慢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它反映了司曹内心深处的仇恨，也预示着即将发生的事情。

贵族官员鲁康娃是两位司曹中的主要角色。他时年53岁，原来是孜康的四位孜本之一。鲁康娃正直高尚的品格使他得到大家的敬重，他对传统制度的忠诚亦得到大家的一致肯定和钦佩。但是在西藏的官僚体系中，尤其是贵族中，他也是最保守和最刚愎自用的人之一。他几乎完全不了解世界历史和当今的时事，心里有着傲慢并且天真的想法，认为西藏应当处理自己的问题，而不应当去操心别的国家的事情或者依靠别的国家。¹² 俗官昌松是噶厦秘书处的成员（噶仲）之一，他和鲁康娃走得比较近。他描述说：“鲁康娃总是死脑筋并且很顽固。他不听其他人的意见，只想按照自己的方式行事。他打心眼里喜欢过去的那一套东西，并对达赖喇嘛和政府极为忠心和热爱。他就是这样一个没有什么远见的人。”¹³

鲁康娃保守的思维并不局限于政府事务和政治问题。例如，据他的儿媳妇回忆，他在安排家庭事务的时候也采用同样的方式。

那个时候我们家是很传统的西藏家庭，所以没有椅子。当中国官员来拜访的时候，鲁康娃的妻子和儿子〔她的丈夫〕有点担心，所以建议从邻居家里借几张椅子来，但是司曹拒绝了这个建议，说没有必要这样做。他好像说：“我们家有床垫和坐垫。我们可以堆起来给他们坐。如果他们坐那就好，如果不坐那就算了。我们必须按照

10. 谢林·次旺朗杰（Shelling Tsewang Namgye），访问记，2002，克利夫兰，俄亥俄州。

11. 阿乐群则，访问记，1993，克利夫兰，俄亥俄州。

12. 昌松，访问记，1992，拉萨。

13. 昌松，访问记，1992。

我们自己的习惯行事。”……司曹非常古板，不会忍受任何〔新的东西〕。

与此相似，我们家也不让吃新式点心，比如饼干或糖果。我们只被允许吃传统的点心，比如炒青稞和炒扁豆，以及一些核桃等等。我们这些年轻人经常偷偷地〔在外面吃这样的现代食品〕，因为我们家里是不允许保存这种东西的。所以，当中国人来拜会司曹的时候，他要求不要〔像拉萨的贵族中流行的那样〕用糖果和饼干招待他们。

我们也不允许穿〔西式〕皮鞋。司曹说这些是外国的东西，我们不需要。我们是年轻人，想法不一样。所以我们会放一双西式鞋子在给我们看店的农奴家里〔摆在一楼的楼梯下面〕，当我们去城里的时候会先去他们家，偷偷地换上那双西式鞋子。¹⁴

古板到这种程度在拉萨的贵族中是很反常的，一般来说也是很不合群的。而且，鲁康娃不仅是一个极其保守、极其传统的人，也是一个不相信妥协、脑筋不会转弯的人。

另一位司曹洛桑扎西虽然是一名僧官，但是他稍微了解一点世界的形势。因为他在国民党时期曾在西藏政府驻中国的办事处工作过几年，甚至会讲几句汉语。但是他不是一个喜欢拿主意的人，并且无一例外地顺从鲁康娃。一位官员回忆说，在会议中每当鲁康娃问他“难道不是这样的吗？”他总是说“可以，可以”。¹⁵

尽管很多西藏官员对中国人承诺的宗教自由等说法也有所怀疑，但鲁康娃却是决然不相信。据昌松回忆，在达赖喇嘛和张经武从亚东回来之前，拉萨召开了一次会议。会上一些西藏官员不经意地说中国共产党的宗教政策和民族政策看起来还可以。鲁康娃立即愤怒地回应说共产党没有宗教信仰，所以他们所谓的宗教政策只不过是愚弄人民的鬼把戏。他说：“以前在清朝（的时候），中国人虔信佛法，所以如果他们声称有什么宗教政策，我们可能会相信。但是对于无神论者提出的所谓宗教自由政策我们不当相信。”¹⁶

14. 鲁康娃夫人，访问记，1993，达兰萨拉。

15. 昌松，访问记，1992。

16. 昌松，访问记，1992。

也就是说，鲁康娃从一开始就不相信共产党的承诺。而且正如前面提到的，他也不同意亚东噶厦作出的派代表去北京的决定。鉴于拉萨的氛围对西藏的立场会有所帮助，所以他强烈主张在拉萨同中国人举行谈判，并且一直在完善让阿沛和王其梅从昌都到拉萨来谈判的最后计划。所以他觉得在北京举行谈判是一个重大错误，并且误以为这是亚东噶厦的决定，而实际上这是中国方面的要求。

所以毫不奇怪，当鲁康娃听说这个协议的条款时，他不仅觉得愤怒与失望，而且深信：他最担心的在北京谈判的隐忧成为现实。阿沛等人同意让大量中国军人进驻西藏，允许西藏军队逐步并入解放军，还允许建立一个名称很敏感的所谓的军政委员会来实施协议，这超出了给他们的指令。鲁康娃在分析军政委员会的名称时说：“军”（藏语：*mag*）和“政”（藏语：*si*）暗示着西藏会由中国通过武力统治，而传统上的“政”的首脑达赖喇嘛将会被排挤掉。¹⁷ 因此，在他看来“有瑕疵的”《十七条协议》证明了他的观点，即懂得如何更好地同中国人打交道的是他，而不是那些噶伦。但是在张经武到达拉萨之后，他并没有试图采取灵活的交际手段。恰恰相反，他和洛桑扎西开始摆出一种强硬和对抗的姿态，公开向中国人表明，他们这两位西藏政府的最高官员非常痛恨这种侵略行为，对于协议中一些诸如大量“中国军队前来占领西藏”这样的条款，他们并不接受。他们很愤怒，毫无顾忌地向中国人表明他们的态度。

但是，张经武还没有准备开始讨论实施协议具体条款的问题。中国方面不知道司曹的敌意有多深，但是大体上了解他们所要面对的困难，并且已经决定放慢脚步，在阿沛和协议的原始版本9月份到达之后才开始想办法实施协议的条款。因此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张经武仅仅进行了一些普通的公关活动，目标是结识那些拉萨的精英，同时也让精英们认识他们。张经武开始了一系列对西藏上层官员和寺院领袖及喇嘛的拜访活动。在这些拜访中，他们派发了协议的（藏文）副本，同时大概地解释了共产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和协议的内容。大部分这样的拜访都是很有礼貌并且很平淡的，这是因为西藏贵族以高雅的言行著称，即使是面对宿敌也会表现得很优雅。公开的争论以及粗俗的评论会被认为是非常不得体的，所以乐于泓

17. 昌松，访问记，1992。

在拜访高级官员的时候没有遇到什么争论。甚至在拜访司曹洛桑扎西，并给他送上《十七条协议》的副本时，洛桑也没有提出异议。他仅仅说不太懂政治，没有作什么评论就转移到新的话题。

但是拜访鲁康娃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鲁康娃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来搞对抗。例如，在张经武一行刚刚到达不久，两位司曹邀请张经武到大昭寺去接受正式的欢迎。这个欢迎仪式是按照清朝时欢迎帝国特派专员（驻藏大臣）的旧制安排的。两位司曹安排张经武的座位比他们的低，以此表明他们是在座的最高官员。张经武的中文传记说中国人很清楚这是一种侮辱，但是选择不为这件事大动肝火。

到达拉萨的第三天，¹⁸ 司曹、噶伦在大昭寺宴请张经武，而这两个作为主人的司曹洛桑扎西和鲁康娃却狂妄自大，在宴席上自居高座，傲慢无理。张经武考虑到初到拉萨，各方面情况尚未沟通，不要为礼仪上的一些问题因小失大。因此张经武……未作计较。但他预感到今后执行协议的艰难，甚至会遇到大波折。¹⁹

张经武的藏语翻译彭哲对那次会面有非常深刻的记忆，因为那次会面使他陷入非常艰难的处境。鲁康娃的有些话带有强烈的火药味，并且很有侮辱性。彭哲认为如果他正确地翻译出来可能会引起一场争吵，会对中藏关系造成负面的影响，所以他擅自决定不把这些话翻译出来。彭哲总结说：“一句话，鲁康娃似乎想利用一切机会来羞辱中国人。”²⁰

几天之后的8月15日，当张经武、乐于泓去司曹鲁康娃家里进行正式拜会时，整个会面过程没有一丝友好的气氛。对于这次会面没有任何官方的记录，但双方大部分人对这次会谈的描述都很一致。张经武先泛泛地作了带有宣传意味的发言，例如西藏回归祖国是多么好的一件事，解放军现在可以保卫国境了等等。但是鲁康娃马上愤怒地给予回击，直接抨击协议并语带威胁：

对于〔中国〕军队向西藏进军我有很多话想说。阿沛去北京的时候，他的使命是寻求和平，他没有权力讨论军事事务〔即解放军进入西

18. 乐于泓（1981）说是第七天。

19. 赵慎应，1995: 30。

20. 彭哲，访问记，1993。

藏的问题〕。对于《十七条协议》，这是超乎我想象的东西，等阿沛回来告诉我们这些条款的由来之后，我将会和你们商量这些条款。

当我们正在有步骤地〔同你们中国人〕开始和平谈判的时候，我听说了昌都的解放〔即正当我们尝试举行和平谈判的时候，中国攻击了我们〕。西藏是个热爱和平的宗教国家，历史上所有的达赖喇嘛都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来维护和平。十四世达赖喇嘛为了维护和平也正在竭尽所能。虽然人民不怕流血战斗，但是他还是派了一个代表团去北京，诚心诚意要进行和平谈判。西藏是一个宗教国家，在这里宗教得到广泛的传播。因此，较之派军队来，你们不如派一些能干的、有文化的〔非军职〕官员来。

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而且非常强大的国家。因此它的所作所为也必须通过正确的途径，也要适度。如果它不这样，即使沉睡中的〔西藏〕人也会站起来反抗它。……我是一个胡须花白、行将就木的老人。对于西藏人来说，如果受到压迫，尽管他们不是很强大，但是他们可以祈求三宝，这样因果报应就会降临〔中国的恶业将会得到报应〕。²¹

除了对协议的异议之外，他对他所理解的中国人的伪善也很光火。他说中国人嘴上说是朋友加兄弟，来西藏是为了帮助西藏，但是事实上他们却进攻昌都，杀死了许多西藏军人。不知道他是没有能力控制自己的情绪还是根本就不想控制，总之这种方式成为他同中国领导层打交道的特点。

8月17日，达赖喇嘛到达拉萨。这时，张经武又不得不面对另一次羞辱。²² 张经武想要出席欢迎仪式，但是却遭到司曹的阻拦。当时在场的一位贵族官员夏札回忆说：

张经武和乐于泓打算参加〔达赖喇嘛的〕欢迎仪式。但是在安排坐席时却出现了分歧。两位司曹说张经武不能和达赖喇嘛并排坐，达赖喇嘛会面向前，司曹坐在一侧面向另一个方向。〔所以〕张经武必须面向司曹坐下。

21. 乐于泓，1981: 150-51，1951年8月15日条目。达拉1995年的说法一定来源于乐于泓的说法，因为实际上用词是一样的。

22. 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1995，1951年8月8日条目；彭哲，访问记，1993。

但是中国人拒绝这样的安排。他们愿意让张经武坐在西式椅子上而不是垫高了的垫子上〔这样就避免了垫子高度的争议〕，而且坚持张经武必须同达赖喇嘛面向同一方向而坐，因为他是中央政府的代表。但是司曹拒绝了，所以最终张经武选择自己不出席而让他的随员于乐泓代为出席。²³

另一方面，达赖喇嘛的到来也开启了西藏平民组织参与政治的先河。前面已经提到，张经武进入拉萨时受到的欢迎惹恼了阿乐群则，他进而坚信拉萨的“人民”应当（在政府官员和宗教领域组织的传统欢迎仪式之外）组织一个特殊的委员会以欢迎达赖喇嘛的到来。阿乐群则回忆他的想法时说：

张经武受到盛大的欢迎……很多贵族包括雪康·杰炯、玛恰（Maya）和一些普通的俗官及很多尼泊尔人都前去欢迎他。张经武庄严盛大地进入拉萨，我看到这个场景心里非常愤怒，于是同〔拉萨来的〕尼泊尔人争论说：“你们住在这里〔西藏〕却不用交税，你们也不用遵守法律。²⁴你们本该非常感激〔西藏政府〕才对，但是现在你们为什么这样热烈地欢迎中国人？你们最好小心一点。”我确实和他们吵了一架。

第二天，我把嘉经群则（Gyabing Chöndze）等人叫到我家里开始谋划。……我们讨论了中国人的〔欢迎场面〕，并且列出一个单子，上面有适合延揽的康巴人、安多人和卫藏人。那天之后，我们前去告诉他们〔拉萨〕人民应该组织起来，〔在达赖喇嘛回来的时候〕派一个委员会去向他表示敬意。我说：“看看那些中国人受到怎样的欢迎，我们不能像这样〔什么也不做〕。”

在两天时间内，我们去了大约四十个重要人物家里……同他们讨论从人民中派一个委员会去欢迎达赖喇嘛的事。他们同意并签下他们的名字。并且他们很高兴，说这个主意很好，我们应当考虑具体该怎么执行……

第一次会议是在哲索（Tresur）家召开的。恩珠·贡布（Andrug Gompo）〔以后的四水六岗游击队的首领〕也出席了。会上人们有

23. 夏札，访问记，1992，拉萨。

24. 尼泊尔人在拉萨享有治外法权。

不同的意见，提出的意见有“如果我们〔平民〕组织委员会欢迎达赖喇嘛，那在西藏历史上将是头一遭，〔西藏〕政府可能会因为我们私自行动而生气”等。所以〔在会上的〕一部分人说我们不应该这样做。我同他们争论说西藏政府是不会生气的。我说：“这一点我知道。在达赖喇嘛去亚东的时候，桑都仓·诺更敦（Sandutsang Lo Gendün）组织了一队人马陪伴他，我们也组织了一队人。那时我们是去给达赖喇嘛送行，所以如果我们现在迎接他回来也不会有什么问题的。实际上，如果我们走远一点到江孜或者扎什伦布去迎接他会更好。”

接着其他人说我们这样做之前最好先请求达赖喇嘛的卓尼钦莫（副官长）帕拉的允许。那个时候，西藏政府在拉萨的电报局里有一部电话，在曲水（Chushul）、帕尔迪（Paldi）、日喀则（Nangkarste）和帕里（Phari）也各有一部。……他们考察了各项法律，说我们最好先提出一个请求……所以我们通过电话联系了帕拉，他答复说我们的计划非常好，但到江孜来太远了，“那样的话你们会很困难，而且也没有足够的时间。所以在拉萨附近就可以了”。

……委员会的欢迎仪式是在聂当（Nyetang）〔在拉萨以南40公里的一个地方〕的石刻大佛（藏语：*Nyetang lhachenpo*）处进行的。我们可能有一百个人，都是重要人物。……我告诉所有人我们必须穿西藏服饰，必须骑马而不是骡子。

在我们到达聂当之前，〔我们遇见了〕达赖喇嘛的前哨卫队，他们〔从亚东〕来。我们想如果继续像这样往前走可能会在〔不适合举行欢迎仪式的〕狭窄道路上遇到达赖喇嘛，于是停止前进，下马把哈达拿在手上。我知道达赖喇嘛就要来了，便说我们应当磕三下长头然后献上哈达，接着卓尼钦莫或者先于达赖喇嘛到来的一个达赖喇嘛秘书处的助手（藏语：孜仲，*tsendrön*）会把哈达还给我们。之后我们脖子上戴着哈达，骑上马走在达赖喇嘛队伍的前面……

于是我们手拿哈达在聂当的大佛处等着。随后……达赖喇嘛秘书处的助手阿旺饶珠（Ngawang Rigdrol）到了。他看见我们便问：“你们来这里干什么？”我说我们是人民会议（藏语：*mimang tsogpa*）。于是他接过〔我们献上的〕哈达，然后还给我们，这时他们叫停了达赖喇嘛的队伍。我说我们现在应当走在达赖喇嘛的前面，我们中的其他人说不行……接着达赖喇嘛和卓尼钦莫说了几句话，卓尼钦莫告诉我们：“人民的代表应当走在〔达赖喇嘛〕警卫

团的前面。”所以我告诉和我一起来的其他人说：“瞧我说得没错吧，我们走。”所以我们走在了队伍的最前列……

……在赤松（Trisum）桥那里有乃穷寺（Nechung）来的欢迎团体，而且他们已经准备让达赖喇嘛在那里停留三天。……我问帕拉我们应该怎么做，他说：“你们今天前来非常好，但是你们应当先回拉萨，在某某天某某时再前来加入到陪同达赖喇嘛返回拉萨的大队伍中来（藏语：*chibgyur chemmo*）……

几天后，我们按照他指定的时间再回到这里，作为达赖喇嘛队伍的一部分从赤松桥一起出发。这一次我们有三百人，我觉得人越多越好。我问帕拉：“我们人很多，那我们应该怎么做？”他说：“那很好。没有问题，你们都可以走在达赖喇嘛的前面。”于是我们都穿上最好的服饰。所有拉萨人都在吉彩洛定（Gyetseluding）等候，拉萨人看到人民会议在前面带路都非常高兴。²⁵

这当然不是一个正式的人民会议，但是它表明普通人应当参与西藏政治的想法已经产生。在传统的西藏政治体系中，人民是无权对政治事件发表看法的，甚至连公开批评政府都不行。但是时代不同了，而且在以后的章节中我们将会看到，六个月之后一个真正的人民会议会加入到政治博弈中，与中国人发生正面冲突，并几乎使拉萨爆发一起严重的暴力事件。

■ 中国人对西藏的最初策略

迫使西藏地方政府签订《十七条协议》并允许中国军队和官员和平地进入西藏是毛泽东的西藏战略的第一步，毛泽东接下来想要做的是把西藏和谐地整合进共产党中国。正如第一章中提到的，毛泽东和中央对西藏政府和精英们并不抱幻想。很明显他们不想成为中国的一部分，更别说是主张无神论的共产党中国。所以说服他们接受新现实，成为多民族中国的忠诚公民将是异常困难的事。但是从中国的长远利益出发，很明显应当避免使被征服者心生愤怒、痛苦和敌意，所以避免这种事情发生是毛泽东的长远目标。

25. 阿乐群则，访问记，1993，克利夫兰，俄亥俄州。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毛泽东运用了务实的“渐进主义”策略，这个策略的中心是慢慢地把大部分精英，特别是达赖喇嘛，争取过来，然后同他们一起并且通过他们最终把普通西藏人争取过来。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在1950年向在北京的一部分西北局官员扼要地概括了这一点，他说：“把达赖争取过来将是我们最大的胜利。”²⁶ 与此相似，中央（于1951年8月18日）给张经武发去一份类似的指示：“初到拉萨，对达赖喇嘛及拉萨上层主要是设法接近，进行宣传解释，以消除其顾虑，尚不宜采取进一步措施。宣传协助我们进军问题，只一般号召，具体工作待阿沛到后，再〔同他一起〕展开。可发放布施，布施金额不少于国民党的布施数。”²⁷

这种工作思路围绕着北京所强调的、消除几十年来藏汉民族间的敌意这一目标。毛泽东知道光凭宣传还不够，中国共产党不仅需要告诉西藏人中国共产党与他们以前了解的中国人不一样，是“新”中国人，还需要在行动上不遗余力地体现出这一点。《人民日报》在协议签订不久后发表的一篇社论表达了这一想法。

拥护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

(1951年5月26日)

……在西藏人民中，佛教有很高的威信。人民对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的信仰是很高的。因此，协议中不但规定对宗教应予尊重，对寺庙应予保护，而且对上述两位藏族人民的领袖的地位和职权也应予以尊重。这不但是为和解藏族内部过去不和睦的双方，也为使国内各民族对藏族领袖引起必要的尊重。

一切进入西藏地区的部队人员和地方工作人员必须恪守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必须恪守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必须严守纪律，必须实行公平的（即完全按照等价交换原则去进行的）贸易，必须防止和纠正大民族主义倾向，而以自己的衷心尊重西藏民族和为西藏人民服务的实践，来消除这个历史上留下来的很大的民族隔阂，取得西藏地方政府和西藏人民的衷心信任。如果这些部队和工作人员中有违反民族政策和协议的行为，如果他们不守纪律，如果

26. 范明，1987: 26。

27. 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1995，1951年8月18日条目；赵慎应，1995: 31。

他们欺负西藏人民和不尊重与人民有联系的领袖人物，如果他们犯了大汉族主义的原则错误，那么领导机关和领导人员就应负责及时纠正。²⁸

解放军官兵和干部的行为举止及态度对于争取西藏人是极其重要的，这是因为很多西藏人显然对共产党的诚意有所怀疑。北京的领袖在给前往西藏的中国官员的指示中一遍又一遍地强调这一点。例如，在十八军军长张国华即将离开北京前往拉萨的时候，毛泽东告诉他：“签订《十七条协议》仅仅是第一步，下一步要实现协议。……你们在西藏考虑任何问题，首先要想到民族和宗教问题这两件事，一切工作必须慎重稳进（逐步地）。”²⁹ 还有一次，张国华向毛泽东提到一些同志有点不耐烦，认为西藏的工作像乌龟爬山似的，毛泽东则开玩笑地说，“像乌龟爬山还快了。”³⁰ 在另一个场合，毛泽东建议张将军到达拉萨之后在给达赖喇嘛送礼时应该按照西藏人的风俗行磕头的礼仪。张国华稍有迟疑，毛泽东又说：“国华同志，你为革命出生入死很多次，那么为了革命拜一拜又有什么难的？”³¹

这项政策传达给各级士兵和官员。在 1950 年 7 月，西南局的两位领导人之一，邓小平向十八军即将前往西藏的官员传达了这一政策。³²

在少数民族里面，正是由于过去与汉族的隔阂很深，情况复杂，所以不能由外面的力量去发动少数民族内部的所谓阶级斗争，不能由外部的力量去制造阶级斗争，不能由外力去搞什么〔社会〕改革。改革是需要的，不搞改革少数民族的贫困就不能消灭，不消灭贫困，就不能消灭落后，但是这个改革必须等到少数民族内部的条件具备以后才能进行。现在我们民族工作的中心任务是搞好团结，消

28. 《人民日报》，1951 年 5 月 28 日（划线部分为强调）。

29. 张国华，1983: 199–200；平汪，访问记，1991，北京。也可见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1990，1951 年 5 月 23 日条目。这里的“稳”的意思是不要太草率太快。

30. 赵慎应，1998: 50（划线部分为强调）。

31. 平汪，访问记，2000，北京。他说李维汉当面告诉他这件事。

32. 在这个时期西南局的三位最高领导人是邓小平、刘伯承和贺龙，他们分别是第一、第二和第三书记。贺龙也是西南军区的司令，邓小平是政治委员，而刘伯承是第二野战军的总司令和西南军政委员会的主席。整个第二野战军由 160,000 名官兵和人员组成（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科研处主办，1993: 2）。

除隔阂。只要不出乱子，能够开始消除隔阂，搞好团结，就是工作做得好，就是成绩。³³

而在另一个场合，也就是在十八军出发的时候，邓小平告诉十八军的官员：“如果进藏部队带着阶级斗争的框框去，当他们到西藏时就会看不惯西藏农奴主对农奴的压迫剥削，犯急性病，违反政策。因此，为了杜绝这个问题就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³⁴

十八军政治部于1951年1月散发了一份包含34项内容的《进军（西藏）守则》，上面详细地说明了给解放军进藏部队的具体指示。这本守则的目的是确保中国军队在一切场合都对西藏的风俗尤其是宗教习俗表现出尊重，而不是表现得像胜利者或者统治者那样傲慢。具体内容包含：

不论部队机关，一律不准派用“乌拉”。在康藏地区只准按照工委所规定的内容进行宣传，不得宣传土地改革，不得宣传阶级斗争。保障西藏人民信教自由，保护喇嘛寺庙及一切宗教设施，不得因好奇而乱动〔僧侣和寺庙的法器〕，更不得在群众中宣传反迷信，散布诋毁宗教的言论。不住寺庙，不住经堂。如有喇嘛要求参军，概不收留，并应妥为劝说送回寺院。如欲参观，必须先行接洽，在参观时不得随便迫不急待触摸佛像。在寺庙附近，不得吐痰放屁，不得捕鱼、打猎、打鹰雕、宰杀牲畜。要切实尊重藏民风俗习惯，做到与藏民融洽无间，必须克服嫌藏民脏的厌恶情绪。当藏民送上哈达时应回敬哈达。藏区旧有的行政人员可继续任职，如已逃亡，则尽量争取回来。³⁵（翻译参考《白雪解放西藏纪实》，并按照英文原文修改——译注）

但是在到达拉萨仅仅几周后，张经武已经感觉到“争取”拉萨的西藏精英并不是那么容易，所以向中央汇报了一系列有趣的建议，就在进军西藏途中如何对军队进行教育提出他的看法。

1. 进藏部队全体人员要好好研究协议精神，应成为政治宣传队，成为宣传协议、执行协议的模范，继续发扬政策、纪律重于生

33. 阴法唐，1992: 6（划线部分为强调）。

34. 阴法唐，1992: 8。

35. 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1990，1951年1月条目。

命的口号，发扬吃苦耐劳的传统作风；要着重宣传帝国主义侵略、剥削西藏人民的事实及我军巩固国防之重要。

2. 要着重宣传民族平等团结，要特别尊重宗教信仰，多了解宗教情况，不要与信教者辩驳。
3. 宣传方法要多举事实，用说故事的方法，少用政治名词，藏族人民不易懂。
4. 初期不宜强调人民疾苦，因短期不能改革，反招自己于被动，并引起藏政府官员不必要的疑惧。
5. 进城应整齐严肃，并带国旗、军旗扩大影响，与欢迎人员可以交换哈达，不一定要握手，因西藏尚无握手习惯。
6. 购买物资应了解当地情况，与官方大商接洽好再进行。
7. 部队外出应有组织地分成小组，三人一路，防止匪特利用流氓暗害，或挑起冲突。
8. 做调查时亦可征询喇嘛，以示尊重宗教。
9. 对藏军可利用各种方式接近，借以联络感情，从而了解情况，不要表示轻视态度，对其要团结合作，协同巩固国防。
10. 封建制度下的贵族官员自尊自大，重视礼节。干部要耐心、主动做上层统一战线工作，应办事宜尽量通过西藏地方政府，以合理合法的手续办理。³⁶

西南局对他的建议表示赞同，并作了补充：“西藏问题甚为复杂，我们每一步都要做得稳当，才不致出大乱子。所以西藏工作中最重要的是防止‘急性病’，这点要使所有干部都了解。”³⁷

于是，尽管西藏是“封建”得无可救药，但是毛泽东和共产党的领导们还是认定为了实现中国长远的民族利益，需要使西藏积极主动地并入，而不是通过强力威吓使之就范。要想更好地实现这个目标，就必须把达赖喇嘛和精英们争取过来。只有在条件完全成熟并且西藏人自己已经准备接受改革的时候，改革才会以慎重稳进的方式进行。因此，在西藏的干部被要求不得尝试在西藏人民中挑起阶级观念和阶级仇恨。中国官员也被要求对待西藏人以尊重，向西藏人强调他们是“新汉人”，不会像清朝和国民政府那样剥削和压迫西藏人。他们要强调他们这些汉人不是西藏的敌人，

36. 赵慎应，1995: 34-35。

37. 赵慎应，1995: 35。

不想伤害西藏人；相反，他们尊重西藏的文化和宗教，尊重达赖喇嘛，并且希望同西藏人合作改善西藏的生活环境。他们要在行动中体现出这一点。

因此，毛泽东愿意允许人剥削人的封建制度在某一段时间内继续主导西藏的内部事务。封建主可以自由地命令和惩罚他们的农奴，而达赖喇嘛的政府可以继续维持它的法律和经济制度。西藏的生活实际上会和中国人来之前一模一样。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会一直这样下去，但是也没有明确的时间表，因为还不清楚需要多久才能把达赖喇嘛和精英们争取过来，让他们自愿地同意改革西藏。在时间问题上毛泽东并不着急，他愿意等上三年、四年、五年，甚至十年或者更长的时间。在他看来，甚至像乌龟爬山也太快了。毛泽东是在赌博，他让中国共产党的敌人控制一支军队，掌握一种货币和一个政府。他本不必这样做，因为解放军拥有战胜一切的军事实力，只要用疾风暴雨般的军事行动和恫吓就可以很快地消灭旧制度。但是毛泽东心里有更重要的目标，并且认为通过他的渐进主义策略可以实现这个目标。从中国长远的国家利益考虑，最好不要迅速摧毁旧西藏，而是要慢慢地把西藏人争取过来，使他们变成忠诚于新西藏的公民。

但是，毛泽东的放任主义政策并不是完美的。中国方面致力于实施协议，特别是要在西藏建立稳固的供给、通信和运输系统。在以后的章节我们将会看到，解放军从一开始就在这几方面下了大量工夫以寻求稳定的控制。同时，毛泽东也很清楚实施协议并把西藏并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统治不会像在中国的汉区一样一帆风顺，需要对西藏的情况作出仔细的评估，并且要随着事态的发展修正这个评估。《十七条协议》提供了实现这个目标的框架。但是究竟如何实施各项条款，包括某些有点自相矛盾的条款？对此北京并未明确地限定，需要在西藏的中国官员先行作出判断。这一点最终证明是一个失误。

■ 西藏的初步策略

对比中国方面明确的策略，西藏政府的对策显得缺乏一致性，实际上几乎可以说很混乱。在达赖喇嘛刚刚返回的头几周，对于如何应对中国的问题，别说达成共识，就连上层官员寻求共识的政策会议也没有召开过。一方面是因为长久以来一直缺乏系统的决策规划。例如，系统的决策需要

有专人负责提出多种策略选项及每一选项可能的后果，这样才能选出最终的行动方案。但是西藏没有这样的人。不仅如此，在 1951 年的时候，西藏怪异的行政架构造成另一个奇怪的问题，先前从拉萨出逃到亚东的噶伦们返回拉萨后发现他们成了司曹的属下。

任命两位司曹几乎完全是偶然的，那是在几个月前的 1950 年 11 月，当时噶厦很担心达赖喇嘛在拉萨的安全，所以把他和绝大部分其他官员转移到边境小城亚东。前面已经提到，随达赖喇嘛离开的官员的职权需要有其他官员来代行，于是根据 1904 年十三世达赖喇嘛逃往外蒙古时的先例，西藏政府决定任命两位高级官员共同代行达赖喇嘛的领导权。这两位官员被称为司曹，或者“代理”首席大臣。因为那时在拉萨的两位噶伦（然巴和索康）想陪同达赖喇嘛去亚东，所以他们不能担任这个职务。于是噶厦把五个低级官员的名字提交给达赖喇嘛选择。经过打卦，达赖喇嘛的一名私人随从僧官洛桑扎西和另一名俗官鲁康娃被任命为司曹。³⁸

从行政结构来看，两位新司曹取代了噶伦们的权威。但是由于他们以前较低的地位，他们当时的职责只是照看政府的例行事务，而在亚东的全体噶伦则负责所有重要的政治决策。在亚东的噶厦看来，新的司曹只是看守人员，其职责只是当噶伦们在亚东处理重要外交事务时照看国家的日常事务。但是在拉萨的司曹对中藏事务很有一些看法，他们不仅不同意亚东噶厦的决定，而且还认为自己并不仅仅是临时的看守人员。于是当亚东噶厦返回拉萨的时候，两位司曹的地位就变得高于他们了。对于噶伦为什么没让司曹让位从而继续掌控政府这个问题，当时身为噶伦之一的拉鲁给出了解释：

在达赖喇嘛回来的时候，让他们〔司曹〕辞职并不容易。

问：你们能不能告诉他们，“你们干得不错，现在你们的使命结束了”？

哦，噶厦不敢让司曹辞职，因为司曹的地位比他们高。达赖喇嘛又很年轻，对这些问题不是很了解。这就是事情变得复杂的原因，也就是说噶厦不能解除司曹的职务……

38. 夏噶娃（夏苏），1999: 307–8。洛桑扎西拥有高级僧官职位堪钦（*Khenche*），鲁康娃是孜康的四位孜本之一，所谓孜本就是孜康的首脑。夏噶娃是那时任命的留在拉萨的两位代理噶伦之一。

问：噶厦能否绕过司曹直接接触达赖喇嘛？

不行，我们一贯都是通过司曹来向达赖喇嘛提出请求的。

问：你们能否不让司曹知道，私下接触达赖喇嘛？

如果司曹发现〔我们这样做了〕，那就会出现真正的麻烦。只要有司曹存在，我们就必须通过他们。例如，如果噶厦准备了一份文件请求达赖喇嘛批准，〔必须先把它送去给司曹过目，而〕司曹会对这份文件作出修改，之后才送去给达赖喇嘛。所有的事情都要通过他们，他们就像咽喉一样，所有食物都必须通过它。如果没有司曹，那么噶厦就可以直接对达赖喇嘛负责，它的权力也会得到很大的加强。在过去，只要达赖喇嘛〔在拉萨〕就没有设置司曹这个官职的习惯。但是他们是在达赖喇嘛即将前往亚东的时候被任命的，达赖喇嘛返回拉萨后不想立即跟他们说“我们不再需要你们了”，所以他们得以继续坐着司曹的位置。³⁹

因此，虽然在1950年12月西藏噶厦是处于支配地位的政治势力，但是八个月过后，他们却发现自己的权力减少了很多，地位已经低于两名低级官员，而这两名低级官员只是很偶然地、甚至是草率地被任命到司曹这一“临时”高位。如果司曹的观点和噶厦一致，或者司曹同噶厦有密切的交流，那么这个问题就不会是什么大问题。但是司曹并不这样做，他们不信任噶厦，并认为噶伦们错误地主导了谈判。而且在他们眼里，噶伦们对中国人太友好了，所以他们单方面执行着自己的强硬对抗策略。

前面已经提到，司曹反对《十七条协议》中的大部分内容。在他们看来西藏的一切已经很完美了，他们不想让成千上万的中国军队和官员来强制推行改革，特别是改变宗教、西藏政府以及达赖喇嘛的地位。他们认为不需要改革，像军政委员会这样的机构不是他们想要的。他们想要的是上个世纪清朝统治时期西藏享有的被保护地位：西藏将承认中国至高无上的地位，但是中国只在拉萨留驻一个象征性的卫队以及一两个像驻藏大臣那样的代表。而在内部，西藏实际上不需要什么改变，仍然由达赖喇嘛领导的神权官僚体系来统治，其基础仍然是由农奴和庄园支撑起来的庞大的寺院体系。

39. 拉鲁，访问记，1992，拉萨。

司曹把过去清朝时的情况作为将来的模式。这可以从他们用清朝的礼仪来欢迎和会见张经武看出来，也可以从鲁康娃在同张国华早期的一次会面中所作的发言更清楚地看出来。在这个发言中鲁康娃提到著名的驻藏大臣张荫棠。张国华的传记记录了鲁康娃发言的内容：

过去清朝有一个入藏大臣也姓张（指张荫棠），只在拉萨设了一个衙门，没带什么兵，大家喊他“张大人”。现在又来了一个张大人，你何必带这么多军队？阿沛在北京，并未授权谈军事，《十七条协议》很突然，应该修改。⁴⁰

驻藏大臣张荫棠于1906年被北京的清王朝派来调查西藏的情况，他被称作“渡海而来之按班”，因为他最初是经由印度到西藏的。他主张训练西藏士兵，而不是在西藏驻守清兵。1907年他离开西藏去印度谈判商务，之后返回北京。在离开时，他获得很好的名声，鲁康娃暗指的就是这件事。⁴¹

在司曹看来，《十七条协议》应当明确一种类似清朝模式的关系。他们还认为对谈判负有督导之责的应该是他们，而不是阿沛或者亚东噶厦。实事求是地说，较之《十七条协议》，所有的西藏精英更愿意接受清朝的模式。但是中国共产党不是清王朝，司曹认为如果交给他们管，这个目标就可以实现，只能说这种想法既天真又傲慢。然而，不管天真与否，《十七条协议》已经签订了，中国共产党也到了拉萨，西藏政府现在急需形成同他们打交道的策略。

很明显，应当采取的行动本应该是努力同中国方面的领导人建立友谊，获得他们的信任，以此来控制变革的速度和范围。但是我们已经看到，司曹根本不这样想。他们从一开始就拒绝正面地回应中国人，并在会面中用愤怒和对抗的言语挑衅和冲撞他们。在中国的大部队到达之后这种情况变得更糟糕，并且发生了一些很严重的事件，这些事件将在以后讨论。司曹的对抗姿态是如此罕见，以至于印度驻拉萨代表处的长官辛哈（S. Sinha）在他从拉萨发给德里的月度报告中表示：“首相〔司曹〕对中国人

40. 赵慎应，1998: 68–69。

41. 牙含章，1991: 226–39。

所提之意见和建议习惯性地采取反对和厌恶的态度，不管这些意见和建议有没有道理。”⁴²

如果把中国人看成是占领军，那么司曹表现出来的愤怒和敌意也许并不令人意外，而中国人其实本来就是占领军。实际上，他们所采取的对抗态度和他们的宣泄愤怒的行为让很多西藏人钦佩，这些人对中国军队占领他们的国家和首都一样抱有怨恨的态度，并且担心如果听之任之，中国人很快就会摧毁他们热爱和珍视的一切。因此，鲁康娃宣泄愤怒的行为在某种意义上表现了弥漫于整个拉萨的民族主义和敌视中国的情绪，另一方面也使得西藏人有勇气公开表达他们心中的愤懑。前面已经提到过，在西藏的政治制度中，批判时政是非法的，甚至连前面引用的街头歌谣也是不被官方允许的。所以，随着鲁康娃会见中国人的情形在拉萨的精英和中层民众当中传播开来，产生了两方面的效应：一方面，它使西藏人感到自豪，因为他们政府的领导人在中国人面前挺直了腰杆；另一方面，它也向西藏人传达出一个讯息，即反对和抵抗中国人是可以接受的。

然而，虽然司曹的行为在人民当中很受欢迎，但是却不属于更大的政府层面计划的一部分。这个更大的计划的目的是要说服或迫使中国人修改协议。作为政府的首脑，司曹对形成应对中国人的策略负有首要之责，但是他们却没有负起这个责任。达赖喇嘛在一次访问中对此表示了看法，说鲁康娃只是“随性而为，并没有〔运用〕精妙的策略性思维”。⁴³而且在司曹和噶厦一起会见中国人之前，司曹甚至不屑于尝试同噶厦协调一致，更不要说为了西藏同他们一起达成一项总体策略。以下的事件就体现了这一点。

拉鲁回忆了在1951年年末或1952年年初司曹、噶伦同中国方面的领导人举行的一次重要的会谈。这次会谈进行得很不顺利，最终以鲁康娃和中国人之间恶毒的口舌交锋告终。这次交锋使噶伦们处于非常尴尬的境地，因为他们不同意鲁康娃的说法，但又不想在中国人面前违逆司曹。据与会的拉鲁回忆，当时噶伦们非常沮丧。

42. 英国外交部档案，FO371/99659，印度驻拉萨代表处截止1952年4月15日的月度报告。

43. 达赖喇嘛，访问记，1995，达兰萨拉。

在这次〔会议〕之后，我们〔噶伦〕单独开了一次会。会上夏苏说：“一方面我们无法赞同司曹的言论，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支持他们，因为如果我们不支持就意味着我们在中国人面前表现出分裂，就好像我们任由中国人来对付他们。那么，面对这种进退两难的局面我们应该怎么处理呢？”我是最年轻的噶伦〔当时 37 岁〕，所以我很坦白地说：“我们应该做的是建议司曹稍微改变一下他们的方式，不管他们准备在中国人面前说什么，他们应该预先同我们商量一下。等我们所有人在内部商量好之后，我们就可以用统一的口径说给中国人听。假如我们提前进行这样的会面，那么如果噶厦有什么不对的，司曹可以批评我们。如果我们觉得他们做的不对，那么我们也会向他们提出我们的建议。”噶伦们觉得应当这样做，接下来的问题是谁去把这个看法告诉他们。我主动说我去，因为我和鲁康娃在做孜本时曾经共事过。

于是我去找他，告诉他以后不应该突然说这样或那样的话，而应事先同噶厦商量出一个对策。我对他说：“如果您突然说像您刚刚说过的那些话，我们将很难支持你。”听了我的话之后，他真的发怒了，说：“我是〔像〕安多人，我才不管那么多，我是怎么想的就怎么说〔不会考虑将来的后果〕。”所以从这次开始鲁康娃就不喜欢我了。我说这些是为了帮助他，但是他不听，他说：“我是安多人，因此绝不会那样做。”所以从那以后司曹和噶厦再也没有就策略问题进行过任何讨论。鲁康娃在进行愚蠢的行动之前从来不会仔细思考一下，他就是这样的人。⁴⁴

与司曹的想法不同，噶厦更倾向于以协商的战略视角看问题。总的来说，他们也希望中国人尽可能少地在西藏出现。但是他们认为司曹的行为起到了反作用，没有顾及到时的军事和政治现实。尽管在噶厦内部针对变革有不同的观点，但是他们都认为西藏的领导层同中国人保持友好的关系是很重要的。拉鲁解释了最主要的观点：

我们反抗过，但是我们失去了昌都。所以我们〔噶伦〕认为如果我们放弃和平再打一仗，我们还是会输的……〔代理噶伦〕夏苏和土登饶扬是很随和的人，他们希望同中国人建立友好的关系。夏苏曾

44. 拉鲁，访问记，1992。

经说过如果我们友善地对待中国人，他们就会投桃报李，友善地对待我们。如果我们只用很一般的态度对待他们，那么他们也只会用很一般的态度来对待我们。如果我们敌视他们，那么他们就会还以颜色。他总是这么说。但是老实说，我不知道噶厦的同僚们心里到底在想些什么，因为我们从来不会对这个问题做过多的讨论……对于我来说，我在昌都时就已经看到了解放军的军事实力，所以我非常赞同设法与中国人建立良好关系的做法。⁴⁵

正如拉鲁所说的，噶厦没有坐下来对策略问题进行讨论并设法达成政策上的一致。他们所谓的政策只是针对每个具体问题作出临时性决定的累积。⁴⁶

然而，尽管噶伦们认为西藏再也无法回避变革，但是大部分人的态度是应当设法延缓变革的进程，例如，让变革缓慢地进行，拖上很长一段时间。比方说，拉鲁就坦白地表示：“我不认为过去的社会体系可以继续，但是我也不认为它会马上消失。我认为改革需要慢慢地进行，要花上很长的时间。我认为，比方说有五个条款，那么每一条都要花上一年时间来执行，不是所有的都一起执行。我不认为我们应当一次性执行所有的条款。假如我们慢慢地执行，那就不会有什么问题。”⁴⁷ 大部分噶伦的想法都跟拉鲁差不多。但是有些人，比如阿沛和夏苏，他们主张更紧密地同中国人合作，迅速实行改革。因此，大家没能形成一致性的策略。

由于缺乏一项一致认可的政策，所以政府的行动表现出多重的目的性。司曹奉行一种强硬的方式，而噶厦追求的是一种更倾向于协商的方式——两方面都不考虑对方的想法。这并不是说他们一方唱白脸，另一方唱红脸，而是西藏政府上层根本没有战术或策略方面的考量。

除了噶厦和司曹的观点和策略之外，精英集团本身的观点也很不一致。很多像俗官杰杰巴（Gyegyepa）这样的人都赞成鲁康娃的观点，即传统的西藏是很伟大的。

45. 拉鲁，访问记，1992（划线部分为强调）。

46. 张经武来自安多的翻译彭哲的说法印证了这一点：“西藏政府官员全都彼此互不信任，所以他们不敢经常来找我们。甚至他们之间都不互相走动，害怕别人〔产生联想〕。如果他们互相走动，那么大家马上都会知道。于是他们也不经常来找我们”（彭哲，访问记，1993）。

47. 拉鲁，访问记，1992。

协议中提到……很多条款，比如要建立军政委员会这一条，我们认为这样做就会给西藏带来巨变。但是，我认为西藏过去的制度和政府是非常完美的。比如说，我认为政府非常棒，我没有看到在宗谿管治上有什么事情做得不好。所以，尽管我也认为应当把过去的制度同新的想法作一番比较，并且也知道现在作这种比较和评估是很必要的，但是对变革过去的制度我却没有任何热情。⁴⁸

据杰杰巴回忆，大部分贵族认为司曹的行为是正确的，尽管这些人未必公开这么说。杰杰巴说，就他而言，“我也认为从他们的立场出发他们是正确的。”⁴⁹

但是也有一些具有现代眼光和进步思维的人，尤其是一小部分西藏精英，真心地赞成同中国人紧密合作来实施协议并使西藏现代化。即使中国人没有来，他们也一直打算致力于改革，他们把中国人的到来看作是达成这个目标的一种手段。⁵⁰ 这群人中的著名官员和大人物有雪康·杰炯、阿沛·崔科、贡培（Kumbela）、桑林、索索札萨（Sursur）、擦珠仁波切（Tsadrü Rimpoche）、坚赞平措、霍康（Horkhang）、唐倍（Thangbe）、吉嘉·扎西多杰（Jija Tashi Dorje）和江乐金（Janlocen）。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是一场变革运动的延续。这场变革运动开始于1914年西姆拉会议失败之后，那时一群由擦绒领导的年轻贵族官员意识到西藏有一天将不得不面对来自中国的严重威胁，所以寻求建立一支现代、高效的军队。但由于他们对英国的世俗理念过于倾心，他们的行动受到僧侣集团和保守贵族的阻碍。这些保守势力（在1920年代中期）使十三世达赖喇嘛相信他们的变革危害到达赖喇嘛的统治，也危害到宗教，于是十三世达赖喇嘛将他们所有人免职或降职。⁵¹

主张改革最为强烈的一位西藏名人是更敦群培（Gendün Chopel），他曾经是一名僧侣。据阿旺顿珠回忆，他的思想影响了一大批年轻的僧官。

我受了更敦群培的影响，他启发了我们。那时，我们谈论西藏政府的统治方式需要改变，更敦群培强调人从属于人的制度（藏语：*dagpo gyab*）应当改变。

48. 杰杰巴，访问记，1992，拉萨。

49. 杰杰巴，访问记，1992。

50. 达赖喇嘛，访问记，1994，安娜堡，密歇根州。

51. 对此的讨论见戈尔斯坦，1989: 89–139。

问：你们所说的“人从属于人”是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指贵族拥有农奴和庄园，而且他们还拥有人民。例如，擦绒家的农奴离开庄园之前先得获得他们的允许，你了解吧？……而且他们也没有土地。所以我们说应当改革封建制度……更敦群培是一名脱离了寺院的僧人，他说寺院根本不需要有自己的庄园领地。

我于1948年开始〔作为一名僧官〕在西藏政府供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我们建立了一个组织，并且内部宣誓不把我们组织的任何事情透露给其他人。

问：那是哪一年？

那是1946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的第二年，也是印度〔在1947年〕获得独立的前一年。那个时候，我们不能公开谈论更敦群培告诉我们的话。

我们宣誓在进入西藏政府供职之后平等待人，不压迫人民，不收取贿赂。我们有很多改革〔西藏〕的计划。

更敦群培也建议在各处修建公共厕所，并建议应当向富有的家庭征税，让他们拿出修建自己家房子时花的那么多的钱来修建公共厕所……

那个时期，塔钦巴布（Tharchin Babu）〔在噶伦堡〕出版的一份叫《西藏镜报》的报纸让我们受益匪浅。在此之前，我们并不知道外面的世界。但是那份报纸写的全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消息，上面还有地图。从那以后，我知道了印度的独立，并且产生了应该要从西藏外部努力的想法。正是在读了这份报纸之后我遇到了更敦群培。

我们没有给我们的组织起一个类似“青年协会”的名字，但是我们组织的目的是要改革西藏。那时，我们用“修正”（藏语：*sopjō*）这个词来表达改革的概念。现在所用的〔表示改革的〕术语比如居珠尔（*jögyur*）和拉居（*leg jö*）都是后来才发明的。我们说我们必须改变贵族和寺院的庄园制度，工人和农民应该享有权力，并且他们的生活应当得到改善。⁵²

中国人提供的新机会（例如到北京去学习）也让这些富有理想主义信念的僧官们非常兴奋，他们很愿意见到那些身为现代化变革先驱的

52. 阿旺顿珠，访问记，1992，达兰萨拉。

中国人，因为这种变革是西藏长期以来一直需要的。一位名叫土登旺波（Wangpo）的僧官是1952年建立于拉萨的新社会学校（藏语：*jitso lapdra*）最早的几个学生之一，他对这个问题作了如下说明：

〔1951–52年的拉萨〕只有两种想法。一种想法认为革命（藏语：*sarje*）是好的，穷人站起来了，每个人的生活水平都一样了。另一种想法认为革命是很可怕的……年轻人喜欢变革，所以我觉得加入青年协会不会错。有些人想，如果我不加入，那么我就落后了，〔因此〕就加入了。我的想法是如果去中国应该很不错，他们会提供吃的，而且我可以去上学。其实我没有任何长远和深刻的计划，我只是认为那会是很愉快的经历并且会很有用，假如我们不会说、写汉文，以后很难找到一份好差事……

我们想情况在变，中国人将要掌权了，社会将发生变革，所以我去中国一定不会错。⁵³

其他人看到变革和现代化的前景也变得异常兴奋。达赖喇嘛的姐夫达拉·平措扎西（他那时29岁，能说汉语并且认识汉字）⁵⁴回忆说：

我经常见到中国人。例如，他们来了之后建立了一个年轻人的组织，而我有时会去那里。并且他们还组建了一个足球队，不管他们建立什么样的组织，我都会到场。这是因为我们那时在某种程度上被共产党的思想“吸引”住了。年轻人的想法都是这样的，不是吗？……

问：有人把中国人的到来看成是正面的事情吗？

……如果有什么新鲜事发生，那肯定是年轻人干的。只要是新事物，年轻人就会接受。比如说我就是这样，对我们这样的年轻人来说，只要新的事情发生，我们会认为它是好事。年轻人充满了激情。比如，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年轻人总是被征召参军。原因是他们没有什么思想负担，随时准备跳出去全身心投入战斗。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人可能开始思考为什么打仗，并且学着判断是非。中国人带来了现代制度的信息，并告诉人们从事这些新事

53. 土登旺波，访问记，1992，拉萨。

54. 他在青海省长大，小时候上的是汉语中学。

业和新改革是伟大的事，于是年轻人认为这一定是真的。共产党争取他们的方式是强调现代性和变革性。⁵⁵

除此之外，还有一大批精英官员支持西藏需要改革的观点，不是因为长久以来对现代化的渴望，而主要是因为西藏已经被中国共产党控制这个大环境。鉴于此他们得出西藏必须改变的结论。达赖喇嘛解释了这一点。

我想这群希望变革的人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像雪康·杰炯这样的人，他们认为不管中国人来不来，我们都需要变革，需要某种形式的现代化，这类人是发自内心的。另一类人想不管我们喜不喜欢，中国人已经来了，所以我们必须变革……我认为阿沛最有可能属于第一类，他看到了变革的必要性。……贡培、擦绒，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十三世达赖喇嘛也认为变革是必要的。十三世达赖喇嘛在机械制造方面点燃了西化的火苗。⁵⁶

在西藏政府的领导层当中，噶伦阿沛是关键进步角色。他领导了北京的谈判，此时正同十八军的先遣支队一同返回拉萨（见第八章）。他预计会在9月9日到达拉萨。阿沛与鲁康娃表现出强烈的对比。阿沛认为，考虑到当前的环境，《十七条协议》是一份非常好的协议，它让西藏在中国内部享有非常独特的地位：在中国没有其他地方政府能跟中央政府签订这样一份协议。因此他认为西藏最好的策略是努力保持这种中国内部的特殊地位，具体的方式是同中国人保持友好的关系，并迅速向他们表明愿意实施协议，改革西藏。阿沛坚信不能还像过去那样，但是可以调整改革的进程，以这种方式来保留西藏的宗教和文化精髓以及达赖喇嘛领导下的政治自治。为了西藏人民的福祉，封建制度将会逐渐终结，但是达赖喇嘛的地位将会继续维持，而精英们将会为他们失去的封建领地得到补偿。⁵⁷ 西藏必须努力创造一个新的、从属于中国的现代西藏，必须接受中国共产党对西藏表现出的善意。他认为需要和新的中国人建立一种真正的合作关系。

达赖喇嘛在回忆录中对与阿沛第一次会面的描述证实了这一点。据他回忆，阿沛说：

55. 达拉·平措扎西，访问记，1992，达兰萨拉。

56. 达赖喇嘛，访问记，1994。

57. 昌松，访问记，1992，拉萨。

〔协议〕没有让我们得到我们想要的一切，但是它阻止了中国军队的进攻。现在形势很艰难，在这种艰难的形势下您必须仔细考虑应该怎么做。最重要的一点是，西藏政府和中国政府之间有一份协议，这是和所有其他民族地区不同的。我们必须努力落实这项〔特殊的〕权利。⁵⁸

在噶厦里面，阿沛比其他噶伦都要进步，都更支持改革。在其他人当中，夏苏是支持他的。所以毫不奇怪，从一开始阿沛就是中国方面最亲密的盟友，中国人不断地向他请教和求助。因为这个原因，一些西藏人认为阿沛出卖了西藏，类似这样的谣言传遍了拉萨。鲁康娃对阿沛很有意见，他认为阿沛做的事超出了他收到的指令。在一次会议中，阿沛提到有必要实行改革，据说这时鲁康娃直接回应说：“你给别人的国家带去了光明，却把黑暗带给了自己的国家。”⁵⁹

但另一方面，包括最重要的人物达赖喇嘛在内的很多西藏官员都很敬重阿沛坦率的作风。讽刺的是，阿沛是最密切帮助中国人的官员，但同时也是达赖喇嘛最信任的顾问。对此达赖喇嘛解释道：“那时，对于与中国相关的事情，我会咨询阿沛，从他那里获得意见和建议……有时有些其他事情我也会求教于他。可怜的人啊，我和他很熟。他有一点革命思想，并且不忌惮说出自己的想法和感觉（藏语：*khasey dingsey*），所以即使在与中国人无关的事情上我也很依赖他。”⁶⁰

另外，还有两个重要因素也导致拉萨的情况异常复杂，一个是最高统治者的性格和年龄，另一个是热振—大札之争的后遗症。1950年11月，达赖喇嘛在15岁的年纪亲政，比一般预想的时间早了三年，这是为了在中国人占领东藏的情况下在西藏内部寻求一致。（当时）在经过九年的摄政任期之后，由于热振事件和任内的腐败问题，大札在西藏内部造成极大

58. 达赖喇嘛，访问记，1994。

59. 藏文是：“*mi yul 'od kyis rgyang rang yul mun pa sgrib*”（扎西次仁，访问记，1992，拉萨）。鲁康娃的儿媳（鲁康娃夫人，访问记，1993）用词稍有不同：“*rang yul `di, sa rub pa `dra bo bzos mi yul `di nam langs pa `dra po bzos*”（你给自己的国家带来了黄昏，却给别人的国家送去了黎明）。我不确定这些话是当着阿沛的面说的还是在他背后说的。

60. 达赖喇嘛，访问记，1993，达兰萨拉。

的分裂。⁶¹ 把年轻的达赖喇嘛抬上宝座就是为了团结各方面的势力来对付中国共产党。但是即使是在这个非常艰难的关头，达赖喇嘛也还是太年轻了，还没有准备好担负起最高统治者的重任。他对中国、对共产主义或者世界历史一无所知。⁶² 为什么会一无所知呢？因为那些指导他学习的人没有教他任何关于现代世俗社会的知识，比如历史、政治和科学。他所受的教育完全是有关宗教的，主要是传统的佛学和玄学课程。这种教育的目的是把他培养成得道高僧（藏语：格西，*geshe*），而不是伟大的政治家。

他对西藏普通人的生活实际上也没有什么概念。走出他的宫殿和街上的人说话是不被允许的，而且来访者除了在最正式的朝拜场合之外是不能见到他的。他所能接触到的几乎只有一小群僧侣（他的经师和随从），在非正式的情况下或者还有几乎同等数量的在他的宫殿里劳作的普通工人（“清洁工”）。他直到 12 岁之后才能定期探访他的家人，也才可以有一点时间待在他们家在拉萨的房子里（一个月一次或六个星期一次）。⁶³ 但是在 1947 年以后，他与外界隔绝的情况更加严重了。摄政既禁止他探访家人，又减少了他的家人到行宫来探望他的次数。⁶⁴

达赖喇嘛被孤立于西藏人的生活之外，获取外界“实情”的途径非常依赖一小群随从、经师和官员们。这种孤立的程度可以从他的回忆录中了解到。他在回忆录中说，见到普通人并同他们聊天在他看来是一种稀罕的经历。这一经历发生在 1950 年 12 月从拉萨到亚东的路上。为了防止西藏人设法阻拦他离开拉萨，他在旅途中穿着俗人的服饰，这在头两天起到了作用。但是著名的冬季辩经场强贡曲（Jang）的僧侣们看到有高级官员随行的大量车队，所以怀疑达赖喇嘛一定就在车队里。于是他们拦下达赖喇嘛的经师林仓仁波切，恳求他返回拉萨。然而，达赖喇嘛骑马走在林仓仁波切之前，位置在车队的最前部。当林仓仁波切设法安抚这些僧侣的时候，他自己继续骑马往前行。达赖喇嘛回忆了他那次特殊的经历：

61. 对热振事件的详细描述，见戈尔斯坦，1989: 427–521。

62. 达赖喇嘛曾经形容过他在 1950 年所掌握的知识：“我对世界一无所知，也没有政治经验”（达赖喇嘛，1962: 83）。并且他在以后的书中说：“我对中国人几乎一无所知。并且对于共产党，我也几乎没什么了解，虽然我知道他们已经给蒙古人民带来可怕的遭遇”（达赖喇嘛，1990: 54）。

63. 达赖喇嘛，1962: 52。

64. 对于禁止家人探访达赖喇嘛这一点，见达赖喇嘛，1990: 37。



图6：开会中的西藏高级官员，左起：阿沛、夏苏、不知名者、桑颇。照片来源：陈宗烈

我尽量利用这次机会继续往前走，当然仍然假扮俗人，只要一有机会我就停下来同人们聊天。我意识到现在的机会非常宝贵，它能让我了解我的臣民的真实生活是什么样子，所以我设法进行了多次交谈，但是没有透露我的身份。从这些交谈中，我了解到我的一些人民经常遭受不公平的对待，于是下决心当我有能力时将进行一些改变来帮助他们。⁶⁵

所以，乔装逃离的事件使达赖喇嘛能够到他的行宫之外同普通的西藏人交流，但是也只有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他才能得到这种机会。除此之外，达赖喇嘛最多只能站在屋顶上通过一副望远镜远眺布达拉宫之外的生活。

65. 达赖喇嘛，1990：59。

尽管受到制度性的隔绝，达赖喇嘛还是对世界、科学、机械以及前面提到的他的人民的生活——他们在传统庄园制度下承受的艰辛和遭受的不公——产生了强烈的好奇。他在传记中提到这一点。

我一直很喜欢机械的东西……但是我从来不满足于长时间把玩这些东西——我总是会把它们拆散来看看它们的工作原理。……在罗布林卡有一些挺好玩的东西，里面有一样是给电灯供电的带马达的发电机，它经常出问题，于是我用尽借口把它拆成一块一块的。从那台机器里我知道了内燃机是如何工作的。

我对西藏以外的世界发生的事情也充满好奇。自然大部分时候，我的好奇心都没有得到满足。我有一份地图集，我经常把地图展开，想知道在那些遥远的国度人们怎么生活。但是我认识的人当中没有任何人见过他们。我开始根据书本自学英语。……我的经师读一份在印度噶伦堡出版的藏文报纸，上面报道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进展……他们会把这些内容告诉我。在战争结束之前，我就能够阅读这些东西了。⁶⁶

海因里希·哈雷在1948年的偶然出现使达赖喇嘛的眼界得到开阔。哈雷是一名奥地利登山家，他从印度的监狱逃跑之后设法到了拉萨，并在那里获得居留权。⁶⁷从1948年开始的一年半中，他大约每个星期见达赖喇嘛一次。对此达赖喇嘛说：“我能从他身上了解一些外部世界的事情，特别是关于欧洲和最近的战争的事情。”⁶⁸在这段时期，精通英文的贵族官员擦绒·益西为达赖喇嘛翻译了几本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书。此外，达赖喇嘛也能够接触到诸如《生活》和《国家地理》这样的杂志，这些杂志上的说明文字都已经被翻译成藏文。⁶⁹

这种能接触到宗教以外的教育机会非常罕见，恰恰揭示了年轻的达赖喇嘛在当时困难危险的局面下统治西藏是多么的准备不足——他所要面对的问题本质上是国际问题、政治问题和军事问题。人们应当知道，在

66. 达赖喇嘛，1962: 55, 57。

67. 哈雷在西藏待了七年，成为达赖喇嘛的一位非官方老师。他在拉萨的故事在哈雷的著作（1954）中有记载。

68. 达赖喇嘛，1990: 38。

69. 他的儿子班觉·擦绒的私人信件，2004。

1949–50 年间，西藏没有报纸，没有杂志，没有翻译出版任何现代书籍，⁷⁰也没有现代学校。在这个时期，除了少数一些贵族外，西藏人生活在自己建立起来的围墙内，他们对围墙外面的现代世界一无所知，但是现在却不得不同它进行抗争。

达赖喇嘛在回顾 1951–52 年的西藏时想到一件事，这件事体现出西藏对世俗世界是如此无知。达赖喇嘛记得在亚东第一次见到张经武的时候，他的哥哥 18 岁的洛桑三旦和他在一起。他在会面地点旁边的房间里偷窥，他们俩谁都没有见过中国“共产党人”。会面过后，洛桑三旦飞快地跑进达赖喇嘛的房间，吃惊地对他的弟弟说：“‘哦，这些人也没有三头六臂。’这是他见到中国共产党人后的第一反应。”⁷¹洛桑三旦不是目不识丁的乡下人，他在西藏接受的教育属于社会精英，而且下一年就会被任命为僧官系统的最高官员基巧堪布。像这种背景和身份的人居然会有这种想法，这表明西藏的宗教精英和大部分世俗精英是多么的无知。

达赖喇嘛的生活受到他的经师和随员们的控制。正如前面所提到的，所有这些人都是僧侣或者转世喇嘛，相较于发展达赖喇嘛的执政能力，他们更乐于提高达赖喇嘛的宗教知识和宗教地位。比如说，达赖喇嘛返回拉萨的旅途就很有意思。虽然中国人入侵了东藏，谈判代表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在北京签订了一份协议，中国共产党的官员也已经在西藏了，而且成千上万的解放军也即将到达，但是令人奇怪的是，他的归途却是那么从容不迫。达赖喇嘛的经师不认为这有什么大不了的，达赖喇嘛并不需要立即返回拉萨，不需要去监督制定应对这个情况的对策。相反，他的随员和经师更为关心的是加强年轻的达赖喇嘛在西藏人当中的宗教地位，所以把他返回的行程当作传法之旅，让达赖喇嘛在一路上不断地停下来讲经和接受朝拜。前面已经提到，在江孜的时候，达赖喇嘛在白居寺传授了几天时轮金刚密法。⁷²即使在回到拉萨之后，这种活动也没有停止。对于这一点，印度驻拉萨代表处的长官辛哈向德里汇报说：“达赖喇嘛接受了大量的朝

70. 但是在精英中确实有一些人订阅了在噶伦堡出版的名为《西藏镜报》的藏文报纸，而且某些在印度上过学并且懂英文的人有短波收音机，他们用收音机来收听 BBC。

71. 达赖喇嘛，访问记，2004。

72. 彭哲，访问记，1993。

拜，举行了大量的法会，似乎想赢得人民的忠诚和膜拜。为了这个目的，他从印度人手中借去演讲用的器材。”⁷³

在这个时期，达赖喇嘛是唯一可以介入决策过程、协调精英们的不同观点以形成一项统一策略的人。但是他显然并没有将精力集中在政治事务上，他身边的人也不认为他需要这样做。⁷⁴ 而从他的个性来说，他也不想运用他的权力，不想违背那些实际掌管着政府的官员们的意愿。

达赖喇嘛可以借鉴的最近的例子是十三世达赖喇嘛。十三世达赖喇嘛以独立、强硬、亲力亲为著称，在掌控和治理官僚体系的时候他的手段非常强硬，对官员的惩罚完全取决于他的想法，很多人都害怕他。但是十四世达赖喇嘛没有采取那种模式，他告诉我说他的性格不适合采取那种模式。在回答他是否曾经想过像十三世达赖喇嘛那样进行统治时，他给出了解释：

从我的个性来说，我是想到什么就做什么，完全是自发的，从来不会算计。〔我的经师〕赤江仁波切曾经告诉过我，环境起了变化，不仅仅因为中国人，也因为这是一个新的时代，而你的性格非常适合这个〔新的时代〕。在这个新的时代，十三世达赖喇嘛的性格不再适合了，但是在他的时代他的性格是有用的。他〔赤江仁波切〕曾经这样告诉过我。而且即使我认为需要像十三世达赖喇嘛那样做，我也做不来。〔达赖喇嘛问：〕“塔拉（Tarala）〔他的私人秘书处的首脑〕，我有这个能力吗？塔拉，上一世达赖喇嘛是个很严厉（藏语：*sgam po*）的人，而不是一个直率（藏语：*sbug pu*）的人，我可以像他那样做吗？”……一个人的性格是很重要的，如果没有那种性格，是没有能力那样做的。⁷⁵

所以，由于经验、训练以及性格方面的因素，年轻的达赖喇嘛并不倾向于介入政治，不想积极掌控政府事务。据张经武的翻译彭哲回忆，达赖

73. 美国国家档案馆，793B.00/1-2552，1952年1月25日，印度驻拉萨代表处1951年9月16日至10月15日的报告副本。

74. 我怀疑这与大札的支持者在1947年对达赖喇嘛的身份的真实性提出挑战有关，那时正是热振谋划政变的后期（这将会在本章稍后讨论）。对于达赖喇嘛周围的人来说，这种挑战使得通过公开传法和接受朝拜来加强他的地位和神圣性成为当务之急，尽管他的年纪很轻并且也面对着极为严峻的危机。

75. 达赖喇嘛，访问记，2004。塔拉对达赖喇嘛的说法表示赞同。

喇嘛在 1950 年代很缺乏自信，“当张经武想直接向达赖喇嘛通报一些事情时，达赖喇嘛有时候会说：‘好，我知道了，我会告诉噶伦。他们会进行讨论并给你回复。’他〔在单独的情况下〕不会作任何明确的表示。”⁷⁶ 除此之外，正如我们在引言中解释的，在传统上噶厦（和司曹）对于任何问题都通过设法限制达赖喇嘛获得的信息来控制决定过程，只有强势的达赖喇嘛才能克服这种影响并控制最终的决定。与他的前任十三世达赖喇嘛相比，十四世达赖喇嘛的性格和行为方式非常不同。至少在最初的几年，他把主导权都让给了资历比较老的官员。在 1951–52 年间他是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实际上他并没有深入地涉及日常政治事务，也没有兴趣朝着那个方向发展。

最后，另一重要因素——热振—大札冲突的后遗症使精英之间的关系变得复杂化，并且加重了政府的不团结。尤其是尧西（Yabshi）家族（尧西是对所有各世达赖喇嘛家族的统称，在这里指的是十四世达赖喇嘛的家族）和大札及其支持者之间的抵触情绪。这种情绪虽然只是在台面下涌动，但却是实实在在存在的，至少十四世达赖喇嘛的直系亲属深切地感受到了。

■ 尧西家族和大札

在新的达赖喇嘛被认定的时候，他的家人会被接到拉萨受封为贵族，同时获赠与他们的崇高地位相称的财富，包括一所大房子和连带农奴在内的大量庄园，人们称他们为尧西家族。尧西家族受赠的财富数量很大，他们因此成为大贵族之一。当然十四世达赖喇嘛的家族也不会例外，他的家族被称为当采（现在也经常被称为达拉）家族。⁷⁷

但是，达拉家族与西藏历史上最具争议性的人物热振仁波切来往密切，并忠于热振仁波切。这使他们对西藏政府的关系非常复杂，也非常紧张。这个背景有必要交代一下。

76. 彭哲，访问记，1993。

77. 尧西达拉家族获赠六座庄园，分别为：重孜（Drongtse）、察隅（Chayü）、觉拉（Jora）、色新（Seshin）、柳梧（Niu）和嘉措（Gyatso）（达拉，1995: 164）。

十三世达赖喇嘛于1933年逝世时，必须挑选一位摄政在寻访达赖喇嘛的时候进行统治。一般来说，这位摄政会在新的达赖喇嘛到达亲政年龄（一般是18岁）之前一直统治西藏。在当时的情况下，一开始是年仅23岁的转世喇嘛热振仁波切被任命为摄政，进而成为支配角色。热振在寻访新的达赖喇嘛的过程中发挥了主导作用，他根据自己在圣湖里看到的幻象力排众议，认定来自安多的儿童是真正的十四世达赖喇嘛。在他的监督下，这名儿童于1939年来到拉萨，并于第二年坐床。

但是热振为人脾气暴戾、生活腐败，而且最糟糕的是没能守住色戒。⁷⁸结果，当达赖喇嘛要受沙弥戒的时候，一场无声的危机到来了。按照习惯，达赖喇嘛受戒时应由摄政转世喇嘛热振来授戒。西藏人认为自古以来沙弥戒都应当由一位严守色戒的僧侣传给另一位僧侣，这个规矩不能打破。因此，背地里破色戒的僧侣将不能真正地传授沙弥戒，因为他自己已经破了戒。所以无论热振在达赖喇嘛的受戒仪式中怎么说，达赖喇嘛也等于没有受戒。而且因为达赖喇嘛自己一生会给成千上万的僧侣授戒，所以这些人也等于没有受戒，这是万万不能接受的。所以热振受到压力，要求他不要给年轻的达赖喇嘛授戒。但是如何在不公开承认自己破了色戒的前提下回避授戒呢？热振利用神佛之说编造了一个故事，说他做了一个梦，这个梦告诉他有性命之虞，因此他需要从摄政任上退下来，静修三年。所以在热振处于权力巅峰的1941年，他辞职了，同时选择了一位年老的、没有什么名气的喇嘛大札仁波切继任摄政，并主持达赖喇嘛的受戒仪式。热振显然认为在他静修三年之后大札会离职让他重新担任摄政，但是他错了。

大札仁波切对热振一伙破坏戒律和腐败的行为非常不满，开始进行整治。他任命因私人原因对热振不满的拉鲁和索康等人为高级官员，同时开始压制和惩罚那些支持热振的贵族家庭及僧官，其中最重要的一个贵族家庭就是十四世达赖喇嘛的家庭，特别是这个家庭的家长——十四世达赖喇嘛的父亲，因为他同热振的关系非常亲密。

十四世达赖喇嘛的父亲把自己现在的地位很当一回事，开始我行我素，随意推翻衙门的判决，自行惩罚他人。他还拒绝为自己的领地交税，

78. 这一点在戈尔斯坦（1989: 310）及随后的内容中有详细的讨论，更多的信息可以参考那些章节。

并且不经政府允许，擅自征用他人的农奴免费为自己运送货物。而且他在拉萨出行的时候还要求得到闻所未闻的恭敬。例如，所有骑马的人不论品级都必须下马向他致意，否则就要遭到他的仆人的毒打。有一次，一个病人正前往英国代表处求诊而没有下马，他立即没收了那个人的马。⁷⁹ 他的儿子嘉乐顿珠承认父亲有些行为很过分，说：

因为我们是达赖喇嘛的家人，所以拉萨人对我们家表现出极大的尊敬。他们对我们非常好，但我的爸爸却经常占他们的便宜。如果他在街上看上了一匹马，他当场就会强迫马的主人卖给他。他还要讨价还价，把价格压得非常低。受到这样对待的人心里自然很不高兴，开始对达赖喇嘛的父亲有了看法。⁸⁰

在热振当政时期，他可以为所欲为。但是大札一掌权就开始压制他的过分行。因此从大札上台开始，尧西达拉家族和摄政大札的关系就变得很糟糕。这种紧张关系逐渐升级，以至于 1942 年摄政在全藏颁布了一份带有羞辱性的公告来谴责达赖喇嘛的父亲。⁸¹

与此同时，热振在自己的寺院里结束了三年的“静修”，于 1944—45 年间返回拉萨，意图恢复摄政职位。但是大札拒绝辞职，于是热振无计可施，只有回到自己的寺院。之后，他和他的侍从谋划了一场针对大札的政变。在 1947 年，热振的炸弹阴谋暴露，他向国民党求助的事情也被发现。随后热振被捕并死于监狱中，而且很明显他是被毒死的。在炸弹阴谋暴露几个月前的 1947 年 1 月，热振最亲密的支持者之一——达赖喇嘛的父亲神秘地死去了。

下面摘录的是达赖喇嘛的母亲对那个时期的看法，它表明她认为达赖喇嘛的父亲是被毒死的，而大札就是幕后主使。

我们家和热振的关系很密切。在他被捕之前，噶厦想把我的儿子和女婿〔嘉乐顿珠和达拉·平措扎西〕从中国叫回来。他们告诉我应当派一些人把他们接回拉萨。噶厦想把我所有的儿子和女婿都投入

79. 印度事务部档案馆，L/PS/12/4179，驻锡金助理政治专员诺布顿珠（Norbu Döndup，他当时在拉萨）给驻锡金政治专员的信，1942 年 1 月 2 日。

80. 玛丽·克雷格（Mary Craig）访问嘉乐顿珠的访问稿，引自克雷格，1997: 106。

81. 见戈尔斯坦，1989: 370—73。

监狱，但是他们没有办法，因为他们所有人都不在拉萨。⁸²我也听说噶厦想把我和我的女儿送回宗喀（Tsongkha）〔安多〕去，这样他们就可以把我们一家人分开，使我们无法反对他们的权力……

热振仁波切和我的丈夫是很亲密的朋友，他们都喜欢马。如果我的丈夫还活着，那么逮捕和谋杀热振不会这么容易。因为我的丈夫掌握的资源比我多，他至少可以使逮捕和入狱不会这么迅速地发生。这就是为什么人们认为我的丈夫是被毒死的。

大约就在那段时间，到处有谣言说至尊不是真正的达赖喇嘛，说这是一个错误。谣言指我们的儿子是地珠仁波切，而地珠仁波切才是真正的达赖喇嘛。地珠是十三世达赖喇嘛的一个亲戚的孩子。⁸³最后他们决定把两个人的名字放在一个宝瓶中，然后在杰仁波切（Je Rimpoche，指宗喀巴大师——译注）的画像前晃动，看哪个名字掉出来。这个过程进行了三次。我儿子的名字三次都掉了出来，所以大札摄政和噶厦再也无话可说了。⁸⁴

以下是达赖喇嘛的哥哥嘉乐顿珠对那一时期的看法，他对他父亲之死的观点与他母亲一样。

我确信我的父亲是被谋杀的。他只是一个农民，不懂什么政治，尤其不懂两个摄政势力之间的复杂斗争。我们和热振像一家人一样，他和我父亲的关系尤其好。有人告诉我大札势力想废掉至尊，因为他是由热振带到拉萨来的。他们计划铲除热振，但是担心假如以后至尊掌权了，可能会惩罚他们。所以他们想把他〔达赖喇嘛〕废掉，而且他们仍然有时间用他们自己的人选来取代他。他们的人选是一

82. 实际上她身处中国的女婿达拉·平措扎西在1947年返回了拉萨，但是并没有遭受不好的对待。

83. 另外一个被提及的名字是转世喇嘛扎西饶杰（Rapgye），他是大札的侄子。

84. 次仁，2000：124–25。另一位前任政府官员听说了一个类似的说法。噶雪·曲吉尼玛（Chögye Nyima）在热振倒掉之后告诉一些人，噶厦讨论了一下，认为“如果认证的人是这么不堪，那么被认定的喇嘛也不一定准确”（藏语：*ngos `dzin zhu mkhan gyi kha dog `di las med par ngos `dzin zhus pa `i bla ma de yang tan tan yod pa ma red*）。所以其他噶伦说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也许不是真的。噶雪接着说，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我们应当在布达拉宫里当着观音菩萨的面，用打卦的方式弄清楚这个转世灵童是真的还是假的（藏语：*`phags pa lo ka `i sha ra*）。然后，噶伦们前往布达拉宫打了卦，卦象说他是真的转世灵童。于是噶伦决定不向任何人透露此事（匿名访问材料，2000）。

位名叫地珠仁波切的年轻喇嘛。还有我的父亲，如果他活着就会妨碍他们铲除热振的计划，所以他们毒死了他。⁸⁵

尽管这里面的某些指控很明显缺乏根据（例如，西藏政府想把达赖喇嘛的一个哥哥和姐夫都投入监狱），但是这些说法仍然说明尧西家族对大札政权怀有深深的不信任感（至少嘉乐顿珠和他的母亲是这样的），也说明热振的支持者与大札的支持者之间还存在着敌意。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1951年大札的四个忠实支持者控制了政府等级制度中四个权力非常大的职位——基巧堪布阿旺朗杰（Ngawang Namgye）、卓尼钦莫帕拉以及两位噶伦拉鲁和索康。正是这两位噶伦在热振位于拉萨北部的寺院中逮捕了热振。在较低的层级中，大札也有很多支持者。因此，尽管达赖喇嘛在1950年掌权后使反对大札的势力得到一定的喘息机会，也使双方在表面上达成一致，但是暗中存在的敌意仍然在精英的立场和现实政治中体现出来，尧西家族仍然对大札的支持者表现出相当大的仇恨。所以毫不奇怪，达赖喇嘛在1952年让拉鲁隐退，并起用自己20岁的哥哥洛桑三旦取代阿旺朗杰。尽管索康仍然是一位重要的噶伦，但是达赖喇嘛说他和自己并不亲近。我们将会在本卷以后的章节和下一卷书中看到，达赖喇嘛的亲人对西藏政府精英的疏离和不信任是1950年代西藏历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如果以上这些还不够棘手，那么西藏内部还有一个不和深深地影响了1950年代的政治事件，这个不和就是存在于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以及各自的官员）之间的剧烈冲突。这将会在第十章详细讨论。

总的来说，在1951年8月达赖喇嘛到达拉萨之后的时间里，西藏政府需要决定如何同中国人打交道。在上层精英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观点，但是政府却没有组织任何形式的会议来寻求一致的行动策略，甚至连讨论不同策略之优劣的会议也没有举行过。相反，持不同观点的人执行着他们

85. 引自嘉乐顿珠受访的材料（克雷格，1997: 120）。另一位前任政府官员谢林·次旺朗杰（访问记，2003，克利夫兰，俄亥俄州）说在他坐牢的1960年代和1970年代，他听说一个叫卡拉（Kala）的人承认是他毒死了达赖喇嘛的父亲。卡拉本人是达赖喇嘛家族的柳梧庄园的管理人。这很有意思，因为卡拉原来是大札的支持者帕拉家的农奴，而且是帕拉家物产颇丰的重孜庄园的管理人。当热振没收了重孜庄园并赐予达赖喇嘛家时，他就成了达赖喇嘛家的农奴。达赖喇嘛的父亲死的时间是1947年的藏历新年（二月末）。

根据自己的具体理由得出的行动路线。这里很值得引用拉鲁早期对他的噶厦同僚们的评价：“我不知道我在噶厦的同僚们心里到底在想些什么，因为我们从来不会对这个问题做过多的讨论。”这是可能的，因为西藏政府在这个时期是在被动地应付，而没有任何前摄性的作为。每个问题总是在中国方面提出之后才单独讨论，而不是依据西藏方面某项统一的策略作出前摄性的推演。在政府中惟一可以决定统一策略的政治人物是达赖喇嘛，但是他只有16岁，对国际事务和世俗政治没有什么了解，而且还受到来自随从的压力，要他专心学习宗教而不是世俗政府事务。这种情况的结果是两位司曹可以肆无忌惮地追求自己的目标，西藏也因此形成了强硬的政策，这个政策就是反对协议、敌视中国人、主张对抗和顽固阻挠。在这个政策的指导下，西藏开始了它同中国的新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西藏在进入新的时代之后比中国人到来之前更加不团结了。

第八章

解放军先遣支队进入拉萨

9月9日，十八军一支大约六百人的先遣支队在王其梅的指挥下和阿沛一同进入拉萨。¹这是第一支进入拉萨的解放军部队，中国人希望这支部队的入城能给拉萨人留下深刻的印象。随同王其梅入城的平汪回忆了入城时的情景：

我们隆重地进入了拉萨。王其梅和我带着毛主席和朱德的画像站在队伍的最前列，绕着八廓街行进。成千上万的藏族人出来看我们。我当时很吃惊地听到一个妇人在谈论：“这就是我们以前经常听说的共产党军队？但是他们没有什么不同——他们还是中国人。”他们以前听说共产党军队与国民党军队是不同的，甚至认为我们长得都不一样。²

一名当时13岁的西藏人回忆了他那时的反应：“我很害怕。一看到中国〔军队〕，就害怕得跑得远远的，因为别人说那些脸上缠着纱布的人是吃人肉的。那时候有很多这样的谣言，所以我们非常害怕。”³

刚到拉萨的头几个星期，中国军官们像张经武那样礼节性地拜会了西藏的上层官员。对于这些拜会，大部分官员尽管没有表态接受《十七条协议》，但也还是表现得很有礼貌。当然也有例外，这个例外就是鲁康娃。解放军进入拉萨使他的敌意和愤怒增强了。比如在9月18日下午，王其梅与两位司曹第一次见面时，鲁康娃就猛烈地抨击中国人。他不断地打断他们的发言，并且愤怒地说：“应该只有少量〔解放军〕进入西藏，并且

-
1. 对于这次长达六周的行程的描述，见戈尔斯坦、道韩喜饶和司本石初，2004: 154-63。
 2. 戈尔斯坦、道韩喜饶和司本石初，2004: 160。
 3. 洛桑平措 (Lobsang Phüntso)，访问记，2002，拉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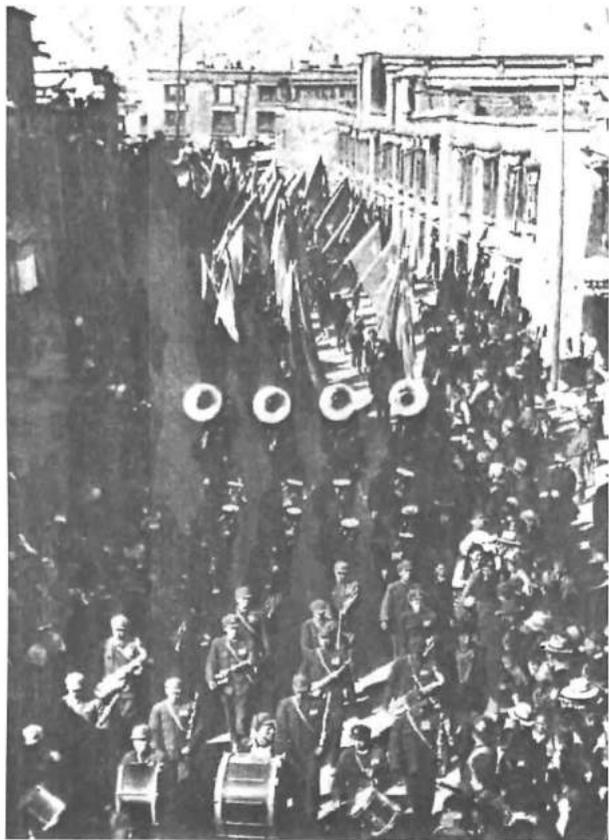


图7：1951年解放军部队进入拉萨后在八廓街附近游行。照片来源：陈宗烈

他们都应该到边界去防御〔而不应当待在拉萨〕。”同时他对西藏人是“新中国人”这个提法不屑一顾。在谈到中国和西藏时，他总是用“一个大国和一个小国”来表达两者之间的关系，极力否认从属关系。鲁康娃还声称《十七条协议》中的某些条款需要重新讨论，他说：“西藏作为一个佛教国家是中立的〔不偏向任何一个国家〕。由于这个原因，过去我们没有想过去掠夺中国人的土地，而任何人想要掠夺西藏的土地也注定会遭到失败。”⁴

平汪也出席了会见。据他回忆，以西藏贵族的标准来看，鲁康娃的表现可以说是相当无礼的。

4. 乐于泓，1985：245，1951年9月18日条目。

当王其梅和包括我在内的一些干部去拜会司曹鲁康娃时，我们确实吃了一惊。王其梅先是说了一些礼节性的话，如“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已经签订了《十七条协议》。今天我们来拜会您，给您带来了这些礼物”。但是鲁康娃却马上愤怒地恶语相向，所说的无外乎过去中国和西藏在历史上保持的是供施关系，所以现在有两个政府，一个是西藏人的，一个是中国人的。“过去你们中国人占领了我们的打箭炉。现在你们又厚着脸皮打着‘解放’的幌子进攻我们，占领了我们的昌都。”⁵他指着王说，“王其梅，你在昌都战役中是主要的指挥官之一。人们叫你‘王副政委’，现在你击败了我们的军队，来到拉萨成了‘王司令员’。但是我们不是那么容易被打败的，抛开其他的不说，你们军队的粮食就支持不了多久。”鲁康娃说这些话的时候情绪很激动。

我着实吃了一惊，因为这样的爆发有违西藏贵族的行为准则。拉萨的精英不会采取这种方式同对方冲突，即使是怀恨已久的仇敌之间的谈话也会很有礼貌，表现得像是老朋友似的。

讽刺的是王其梅却不知道他的话的真正意思，因为我们的翻译塔钦（Tarchin）自作主张，故意译错了鲁康娃说的话，以避免激怒王其梅。如他把鲁康娃话里的“中国”和“西藏”用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来代替，同时删去了挑衅的语言。后来等我们回到驻地，我告诉塔钦他翻译的时候不应该改变别人说的话，而应当直接翻译出来。塔钦说他知道不应该这样做，但是很害怕如果正确地翻译出来，双方都会很生气，可能会因此造成很严重的后果……

虽然王其梅不知道鲁康娃具体说了些什么，但还是从他的表情中意识到他是在抨击自己。我记得王听的时候脸很红，整个会谈的气氛很紧张，但是如果塔钦做了他本来应该做的，情况应该会更糟糕。

5. 1950年藏军在昌都失利。1950年10月19日，昌都人民解放委员会成立，该委员会由北京的政务院（国务院）直接领导，整个昌都地区在它的控制之下进行了重组。《十七条协议》签订之后，昌都没有马上划归西藏政府管辖，而是在行政上单独管理。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56年昌都成为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一部分为止。失去昌都对西藏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1958年的一份中文文件表明，西藏（解放之前属于政治意义的西藏的区域）的总人口为126万，其中昌都有315,742人（占25%），而拉让，也就是班禅管理的区域，则有93,861人（占7.5%）〔《对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未出版的手记）》，出版日期不明〕。

会后王其梅问我鲁康娃到底说了些什么，我据实回答了。他说：“这个人是真正的反动分子。不过至少他是诚实的，心里想什么就说什么。其他的那些贵族在你面前总是说一些好听的，但你永远不知道他们到底在想什么。”我必须承认他说得很对。⁶

前面已经提到，两位司曹对解放军采取不友好态度的消息四处传开了。解放军的到来也给了充满敌意的西藏人一个具体的目标来表达他们的愤怒。在拉萨的大街上，一些西藏人，特别是藏军士兵和僧兵，⁷开始诘问和骚扰他们遇到的中国军人，偶尔还朝他们吐唾沫、扔石头。解放军文工团里一名来自康区的13岁藏族士兵回忆了当时的情况。

最初我们住在朵森格（Dosenge）（在那里住了一年帐篷）。⁸朵森格就在江孜代本团驻地附近。〔解放军〕西藏军区司令部只有很少一些女兵，但是在我们的歌舞团里却有很多女兵。那些藏军士兵真是无法无天，非常可怕。我们歌舞团的团员需要早起去吊嗓子，我可以不去，但是那些女歌手要去。那些藏军士兵就站在他们兵营的屋顶上脱裤子朝着这些女孩子撒尿。当这些女孩子把头转回去时，他们会跑到另一边继续正对着她们撒，通过这种行为来羞辱她们……

问：你是藏族，你会跟那些藏军士兵打招呼吗？

当然不会，我们害怕他们会打死我们。我们也不经常去拉萨，因为我们没有钱，……〔但是〕当我们去集市的时候，这些江孜代本团的士兵会推搡我们，朝我们吐唾沫，或者站在屋顶上朝我们扔石头。

……那时的拉萨市民对我们并没有多不好；对我们最不好的要算僧兵和藏军士兵。那些僧兵在集市上推我们，朝我们吐唾沫。那时我们有一项规定，任何人打你，你都不能还击。任何人辱骂你，你都不能（用相同的方式）辱骂他们。那时解放军的士兵都非常气愤，但也仅止于气愤而已。⁹

6. 戈尔斯坦、道韩喜饶和司本石初，2004: 162。

7. 对僧侣类型的详细考察，见戈尔斯坦（1964）和黎吉生（1986）。戈尔斯坦（1964）见 www.cwru.edu/affil/tibet/booksAndPapers/Study%20of%20Ldab%20Ldob.pdf。

8. 附近也有他们另一个驻地，叫马嘎萨巴（Magar Sarpa），两地之间通过一个小桥连接。

9. 降边嘉措，访问记，1993，北京。

因为这个原因，中国人尽量让所有的部队都留在驻地，但是骚扰事件还是时有发生。这些事件让王其梅的先遣支队感受到威胁。他们的驻地在拉萨南部，背依拉萨河（吉曲，Kyichu），侧翼被藏军驻地环绕着，形势很不利。而且西藏人正在传播煽动性的言论，例如，“要在火焰不大时把它扑灭”，也就是说，应当在中国人只有少量部队的时候把他们歼灭。更严重的是，在拉萨的藏军吹嘘他们用几天时间就可以轻易地消灭这些中国人，¹⁰而且他们真的有可能这样做。

在刚刚到达的那几天，王其梅一度非常担心这种口头上的骚扰，所以他联络了正与主力一同前来的十八军军长，要求他尽快再派一个连过来，因为这里有暴乱的危险。但是张国华认为这是反应过度，于是拒绝了这个要求。张国华在9月16日的复电中明确指示王其梅要保持克制和警惕，说：“从整个形势分析还不至于。特别指出要在提高警惕的基础上以沉着严肃态度处之，并不放弃做好争取工作是对的。我们不应当使用武力。”¹¹



图8：解放军在拉萨河边安营扎寨。照片来源：陈宗烈

10. 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1991：57。在那时，拉萨的藏军人数仍然比解放军多。
11. 乐于泓，1985：243-44，1951年9月17日条目。张国华可能知道王其梅是一个非常多疑的人，和王其梅一同前往西藏的藏族干部平汪详尽地述说了王其梅多疑的性格（戈尔斯坦、道韩喜饶和司本石初，2004：154-63）。

除了对西藏政府的精英进行礼节性的拜会之外，这群新来的中国官员也花了大量精力去拜会转世喇嘛和堪布，并向他们保证共产党不会限制和损害宗教或者寺院的利益，通过这种方式来舒缓西藏宗教界的担忧。实际上，为了证明他们所说的都是真话，他们向拉萨三大寺的两万名僧侣和（1952年初）在拉萨参加一年一度的默朗钦摩大法会（*Mönlam Chemmo*，传大召）的僧侣发放了布施。据政府官员昌松回忆，某日鲁康娃告诉他：“他们给喇嘛和寺院很多大洋，这种做法很聪明。他们发大洋就像给小孩发礼物似的。”¹²

这种做法很聪明也很有效果，因为西藏人对中国人的恐惧更多集中在担心他们会危害宗教，其次才是害怕他们会危害西藏政府的完全独立性这一抽象的政治理念。正如一位僧官明确表示的，

〔西藏〕人民思想很顽固，他们所担心的是中国人即将摧毁宗教或者使宗教的光辉变得暗淡。对于政府的权力是否会被剥夺，他们是不会考虑太多的。他们不太理解什么是政治权力。他们认为，既然他们〔中国人〕来到了我们的国家，那么他们最终会摧毁我们的宗教，让我们的国家变得漆黑一片。所以他们不喜欢中国人的原因主要是宗教方面的考虑。¹³

中国人也立即开办了一家免费的诊所，试图把他们嘴上说的帮助西藏人转化为具体的行动。印度驻拉萨代表处的报告中说这家诊所立刻变得很受欢迎。“中国人在拉萨开办了一家免费的诊所，里面的医护人员服务非常周到。在刚开办的头五天，它就抢走了印度医院一半的病人。”¹⁴ 不过，礼节性的拜会和给僧侣们发放布施所能起到的效果是非常有限的。此时此刻，西藏所有的重要官员都返回了拉萨，成千上万的解放军部队也正在路上，由司曹领导的西藏政府就如何实施《十七条协议》同中国方面展开了较量。

12. 昌松，访问记，1992，拉萨。

13. 札登，访问记，1992，达兰萨拉。

14. 美国国家档案馆，793B.00/1-2552，印度驻拉萨代表处从1951年9月16日至10月15日的月度报告的副本。

■ 最初的几个问题

中国方面最初有一大堆问题想谈，既有重要的问题，也有不太重要的问题。其中，关于确定张经武正式向达赖喇嘛转交中央的礼物的时间及程序问题，是一个容易解决的问题。另外还有两个类似的问题，一个是在拉萨联合组织庆祝中国第二个国庆节（1951年10月1日）的庆典，另一个是让西藏政府派一个高规格的代表团去北京参加即将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¹⁵ 以及达赖喇嘛参加这个代表团的可能性。

除此之外，还有很多重大问题需要讨论。第一个是达赖喇嘛正式接受《十七条协议》；第二个是确定班禅喇嘛返回西藏的事宜；而第三个是一个非常急迫的问题，即要西藏政府制定计划来满足大概会在一个月内到达的解放军主力（大约六千人）的粮食供应问题。

在这些问题上，中国人把阿沛当作他们在西藏政府里的重要盟友，尽量通过他来处理其中大多数问题。比如，通过他把他们关心的一些问题传达给噶厦，或者询问他对某个问题的看法。阿沛同他们在一起待了一年时间（从阿沛在昌都被俘开始），他们觉得阿沛不仅个性坦诚，思想进步，而且赞成《十七条协议》，愿意让西藏平稳地并入中华人民共和国。他给了他们很大的帮助，但是我们将会看到，这并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掌权的是司曹，而司曹是不会轻易让中国人得逞的。

安排送礼的仪式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所以乐于泓在先遣支队到达两周之后的1951年9月23日前去噶厦，同他们商量这个问题。他在他的日记中记述了这次会面。

9月23日——我去噶厦谈……送礼的仪式问题，我说原则是从两点上考虑：政治上尊重中央人民政府，宗教方面尊重地方宗教领袖……他们答应明天讨论，后天答复我们。¹⁶

15.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一个统战组织。它由中国共产党、其他党派、人民团体以及各行各业的名流组成，第一次会议于1949年召开，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重要机构。

16. 乐于泓，1985: 251-52，1951年9月25日条目。



图9：1951年10月张经武在拉萨的某寺院向僧人们布施。照片来源：陈宗烈

两天之后，噶厦作出了答复：

9月25日——晚上，凯墨、柳霞〔两位联络官〕来传达噶厦对《关于几个问题》的答复：关于张代表代表毛主席送礼仪式的问题，同意采用“政治上尊重中央人民政府，宗教上尊重达赖和藏族地方的宗教习惯”。

提出具体方式如下：达赖宝座前设凳子，达赖坐于凳子上，张代表进厅堂内，达赖即起立，接受礼品，之后即升宝座；左首为张代表安设一个高座，要比任何僧俗官员的都高〔但不比达赖喇嘛的宝座高〕。最后张代表以个人身份献哈达（或者曼扎）。¹⁷喝茶、吃米饭后，即由达赖的侍从引导同进达赖寝宫谈话。

这一具体方式，张代表当时表示同意。我即提出张代表高座对面应空着，不设座，司曹等席位应依次排设在张代表高座之下。毛主席像抬进厅堂，达赖应向毛主席像合十敬礼〔以宗教礼仪表示尊

17. 曼扎 (*mendredensum*) 是一种献给喇嘛的宗教供养，代表身体（通过神像）、语言（通过经文）和思想（通过佛塔）。

敬)并以低头表示尊敬。毛主席像应安放在高于达赖宝座的位置。
关于赠礼仪式应由噶厦书面正式通知我们。¹⁸

与此同时，中国方面建议解放军和西藏人联合庆祝中国国庆节，并且那天要在布达拉宫和藏军司令部挂上中国国旗。¹⁹ 这项要求没有得到司曹的积极回应。他们坚决反对放弃任何象征西藏事实上独立的東西（例如，它自己的军队和货币），对于任何象征西藏是中国一部分的东西，他们是能不接受就不接受。因此司曹命令噶厦：第一、庆祝仪式只能是中国人单方面的庆祝；第二、任何西藏的建筑物都不允许挂中国的旗帜。对于这次交涉，西藏人的版本和中国人的版本是一样的，只是在描述的时候加入了己方的立场。乐于泓的日记里是这样描述的：

关于庆祝国庆大会，噶厦考虑不〔联合〕开为宜，怕生事端。他们建议，由军队（指我解放军）单独开，噶厦派代表参加。并下令市内人民群众都要穿新衣服、放花炮、饮酒、跳舞作乐〔以体现这是个节日〕，西藏地方部队游行。

我提出国庆要悬挂国旗。他们〔送噶厦答复来的联络官〕说，新奇的东西少办，慢慢来。他们开口闭口说藏民落后，西藏地方从来只有兵营挂过“藏旗”〔即从来没有在西藏政府大楼上挂旗帜的习惯〕。我就退一步说，那么是否在西藏地方部队兵营上先改挂国旗。凯墨说按协议规定，藏军逐步改编为解放军。张代表〔对我〕说早挂迟挂不是什么问题，我就不讲了。²⁰

此外，张经武的传记里还提到中国方面也要求拉萨居民在国庆节那天手拿小国旗。²¹

最终，中国方面的领导人和两位司曹在罗布林卡举行了一次会谈，讨论国庆节那天挂中国国旗和让西藏军人穿解放军制服的问题。实际上，达赖喇嘛的警卫团穿的是英式制服，唱的歌都是像《天佑女王》(*God Save*

18. 乐于泓，1985: 254-57，1951年9月25日条目。

19. 乐于泓，1985: 254-57，1951年9月25日条目；札登，访问记，1992。藏军司令部位于布达拉宫下面用墙围起来的地方，名为雪村(Shöl)。

20. 乐于泓，1985: 254，1951年9月25日条目。

21. 赵慎应，1995: 38。

the Queen) 这样的英国歌，而且藏军其他代本团的军官也穿着英式制服（虽然他们的士兵穿的是藏族服饰），这让中国人很恼火。²²

对于挂中国国旗的要求，鲁康娃很生气地回应说这是永远都不可能的事。他说：“这怎么可能呢？不行就是不行。怎么能在一座房子上挂上两面旗子？那成何体统？两个人怎么能坐同一把椅子？这是不可能的，永远也不可能。”²³

司曹的态度非常强硬，这可以从他们采取措施确保噶厦不绕过他们向中国人妥协看出来。在这次会面之后，他们把洞波噶伦叫到他们的办公室里，警告他不要在这个问题上犯错：“‘中国人想在布达拉宫和藏军司令部上面挂红旗，这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允许的。因为你是〔庆祝仪式筹备工作的〕负责人，²⁴ 如果中国人骗你说他们已经同我们商量过这件事，你就这样告诉他们：不准做任何改变〔例如说他们误解了〕。’ 这些就是洞波〔同司曹会面〕回来之后说的。”²⁵

西藏政府也与司曹的强硬态度保持一致，拒绝派代表团去北京参加定于 10 月 15 日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对此，乐于泓的日记里说：

9 月 24 日——早上，我到然巴噶伦处谈全国人民政协第三次大会特邀代表与会的问题，这是中央人民政府对藏族的深切关怀，要达赖与西藏地方政府派代表参加。我详细解释了全国人民政协的组织、任务，以及藏族特邀代表名单决定后中央会另电驻印大使给他们办理签证手续（经印度、香港去北京）。

他问特邀代表哪一级职位？我说应该是噶伦和噶伦以上的级别。²⁶

22. 平汪，访问记，2000，北京。在十三世达赖喇嘛的时候，大家决定让警卫团的制服与众不同，所以在考察和比较了不同国家的制服之后最终决定采用英国的制服，包括英式的操练、口令和歌曲，并且决定总司令和其他指挥官也穿英式军官制服（札登，访问记，1992）。这就是 1951 年中国人在西藏见到的。警卫团穿着英式制服一直持续到 1955 年达赖喇嘛从北京回来为止，从那时开始他们才换上了中式制服。但是其他的代本团继续穿着西藏服饰直到 1959 年（达拉·平措扎西，访问记，1994，伦敦）。达拉是警卫团的指挥官之一。

23. 札登，访问记，1992。

24. 西藏政府派了噶伦洞波、藏军总司令凯墨和军官扎西班牙饶（Tashi Bera）去帮助解放军筹备这个庆典。

25. 札登，访问记，1992。

26. 乐于泓，1985: 252-53，1951 年 9 月 24 日条目。

第二天，噶厦的联络官带来了否定的答复：

他们最后说噶厦已经讨论了即将在北京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他们派不出代表。他们说这事要层层请示，会期是十月十五日怕赶不上……我说，……会期要开半个月到一个月，哪怕就是能赶上一个尾巴，对我们西藏地方政府也是有好处的。要他们好好考虑一下。他们〔联络官〕答应去请示噶厦。²⁷

但是西藏政府的态度并没有松动，没有派代表团去北京。

对于送礼的仪式问题，噶厦于9月25日送来一份详细的仪式安排计划。三天之后的9月28日，仪式举行了。²⁸ 送礼的队伍由解放军军乐队引导，后面跟随着一队腰鼓队，成千上万的人站在街道两旁围观。仪式本身进行得很顺利，阿沛事后向中国人通报说中国方面对达赖喇嘛及西藏风俗的尊重给西藏官员留下良好的印象。²⁹ 但是事实上，中国人的要求只得到部分的满足，因为达赖喇嘛并没有双手合十向毛泽东像低头致敬。

张经武的传记里说，在正式的送礼仪式之后，达赖喇嘛邀请张经武进他的寝宫，张经武趁机提出了中国人极为关切的达赖喇嘛接受《十七条协议》的问题。张经武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个国庆日即将到来，这是极宝贵的一天，在这一天，北京将举行盛大的海陆空阅兵典礼。协议已经签订数月，我到西藏也一个多月了。希望达赖喇嘛最好在国庆节前给中央发一个电报，说明对协议的意见。³⁰

我们将会看到这个愿望并没有实现。

中国的国庆庆典（在10月1日）举行了，中国人把这次庆典描绘得很喜庆。

27. 乐于泓，1985: 254-55，1951年9月25日条目。

28. 这些礼物包括：毛泽东的画像、第一届中国政治协商会议的纪念册、一台幻灯片放映机和九组幻灯片、一组中国的图片、多件象牙雕刻工艺品、多件翡翠和陶瓷容器、刺绣、锦缎、一对景泰蓝的瓶子及其他贵重礼物。最终，西藏政府把张经武的座位设得和司曹的一样高（张经武，1995: 45）。

29. 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1995，1951年9月28日条目。

30. 赵慎应，1995: 45。

大清早，张经武等就分别围聚在收音机旁，收听首都天安门前广场上的阅兵仪式和朱德总司令下达的命令。张经武正襟危坐，心潮澎湃。他聆听着首都北京的广播，思考着西藏高原上马上就要举行的庆祝集会。

由于时差，北京时间比拉萨早一个半小时，北京上午八时半是拉萨时间的七时。这时，市内许多老百姓也在收音机旁收听祖国首都的声音。许多穿着红红绿绿节日盛装的男男女女，成群结队，开始涌向布达拉宫前的会场。一些贵族妇女也打着花伞，前往广场。

〔在他们沿着拉萨河安营的地方的〕会场上，一面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在太阳照耀下，五星红旗与〔远处的〕布达拉宫的金顶交相辉映，极为壮观。会场四周悬挂着四幅巨大的标语，用藏汉两种文字写着：“坚决执行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建设西藏！巩固国防！”“西藏人民团结起来，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中国各民族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会场上很快涌来了五六千僧俗人民群众，加上人民解放军和进藏工作人员，这天竟开成了拉萨军民各界上万人的隆重庆祝集会。

十一时，主持人宣布大会开始举行。中央代表张经武神采奕奕地走上讲台，扩音器立即向拉萨、向高原播出他雄壮的声音。

张经武首先说明，在西藏民族团结平等获得良好开端的今天，在拉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两周年这个伟大节日具有重大历史意义。他说这是西藏人民冲破重重困难，回到祖国大家庭来赢得的具有伟大意义的一次庆祝集会。接着他报告了祖国一年来各项建设事业和抗美援朝的伟大成就。他最后重申了中央人民政府的民族政策与和平解放西藏协议的精神，号召入藏人民解放军与工作人员和藏族僧俗人民亲密团结，努力建设西藏。

西藏地方政府的代表四品官赤松平康也在会上讲了话，他说今天拉萨僧俗人民能和解放军一道开会非常好，他赞扬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完全消除了历史上反动统治者造成的汉藏民族间的隔阂。他的这番讲话虽然不是出于真心，但能在这样的会上讲出来，已是很不错了。

先遣支队司令员王其梅在讲话中，着重讲了入藏人民解放军是西藏人民的军队，将永远忠实地为西藏人民服务，尊重西藏人民的风俗习惯，保护宗教信仰自由，坚决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巩固祖国国防……

下午三时，张经武在孜仲林卡举行国庆宴会，宴请噶伦和三品以上的西藏地方政府官员以及大活佛、大堪布，到会六十余人。张经武在桌前和大家碰杯，庆祝节日。宴会前布置了图片展览，其中有〔北京〕和谈照片，有毛主席和班禅、阿沛分别举杯祝贺协议签订的场面。

会场周围的林卡草地上搭起了帐篷，铺上卡垫，整个下午，成千上万的藏族群众提着酥油茶，带着食品，举行野餐，跳舞唱歌，直到暮色茫茫。

余辉中，五星红旗仍在蓝空中飘扬。³¹

实事求是地说，那天进行得确实很顺利，但是并没有中国人希望的那样顺利。司曹再一次回绝了他们的催请，并且如前面提到的那样，迫使中国人接受这是西藏政府参与的中国人的庆祝活动，而不是西藏地方政府和解放军联合举办的庆祝活动。这表明他们仍然不愿意把中国当作是他们自己的国家。

司曹等人对于能够阻碍中国人的行动，并且能够不理他们的要求很高兴，但是他们不知道他们之所以能够得逞是因为毛泽东的渐进主义政策。不管张经武和其他领导人对司曹的态度和行为感到如何失望和愤怒，他们都不能擅自威胁西藏人。我们将会看到，他们偶尔也会在会谈中失去耐心，对着司曹吼叫，但是他们却不能再多走一步，用强力迫使他们就范。因此在这个时期，渐进主义政策不知不觉地壮了司曹的胆。司曹发现他们可以羞辱中国人，给他们设置障碍，却不会产生不好的后果——至少在目前不会。

但是，中国人“尊重”西藏政府的意愿却并没有获得达赖喇嘛正式接受《十七条协议》的回应。从协议签订到现在已经有好几个月过去了，但是始终没有得到达赖喇嘛或者西藏政府接受协议的声明，这让中国方面很恼火也很难堪，这个问题是没有回旋余地的。

阿沛在解决这个问题过程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前面已经提到，在阿沛看来这个协议是个好协议（考虑到军事和国际现实），其他噶伦也知道这个道理，但是他们本身并不愿意为这件事出头，因为司曹反对接

31. 赵慎应，1995: 39-40。

受现在这个版本的协议。但是中国人促请阿沛让西藏政府采取行动，这让他感到很有压力。他也因为西藏方面的拖延战术而很有挫败感，他认为《十七条协议》给了西藏一个有利的法律工具，凭借它西藏可以在中国内部如鱼得水，所以应当尽快接受。最终讨论这个问题的民众大会召开了，噶伦拉鲁回忆了这次民众大会的由来。

噶伦们很聪明，他们没有对《十七条协议》做什么特殊的说明，（司曹）洛桑扎西也没有说什么。鲁康娃也没有说他反对，但是他同样没有作什么明确的表示〔例如他接受它〕。他稍稍暗示了〔阿沛〕没有〔从北京〕发电报给司曹是不对的，是一个错误……

基本上大家都没有争论，没有说接受还是不接受。阿沛说我们必须接受协议，但是〔其他〕噶伦说接受它可能对我们不利，所以最好召开民众大会来讨论这个问题。于是噶厦向司曹呈交了一份报告，说我们必须〔向中国人〕表明我们对协议的态度，我们建议召开一次民众大会来讨论这个问题。³²

在9月最后一个星期的某两天，一个规模较大的缩小版民众大会在罗布林卡的夏布丹拉康（Shabden lhagang）召开。参加会议的大概有六十位代表，他们是从政府不同品级的官员和寺院代表（堪布和卸任堪布）中挑选出来的。³³

阿沛很关心会议的结果，认为他和其他到过北京的人最好能亲自去解释发生的事情，以及西藏为什么应当公开认可协议。³⁴昌松回忆了这次会议的过程。

拉萨那时有许多关于阿沛的谣言，其中最严重的说他是被中国人收买才在协议上签字的。因此阿沛打破了噶伦不参加民众大会的传统，在这个关头连同四位谈判代表一起出席了民众大会〔为他们的行为作解释〕。

32. 拉鲁，访问记，1993，拉萨。但是据阿沛（在1989年）称，司曹说过要召开民众大会来讨论是否要这样做。

33. 乐于泓，1985: 259-55，1951年9月28日条目。

34. 阿沛，1989。

阿沛的发言持续了很长时间，〔他说〕“当我被俘虏的时候我想我的性命不保了。但是别说伤害我的性命，中国人甚至连句不客气的话都没有对我说过，和我一起的官员们遇到的情况也是这样的。”……

他从历史的角度引出他们的论述，说在过去西藏和中国之间有着紧密的关系，但是在十三世达赖喇嘛的时候这种关系受到破坏。他强调他想避免西藏被武力解放，所以通过谈判签订了《十七条协议》，也因此实现了和平解放。接着他解释了协议中的每一项条款。

他说西藏的政教联合政府（藏语：*chösi nyiden*）能够得以延续对于西藏来说是最重要的。正因为如此，达赖喇嘛必须是政治体系的首脑，西藏人也必须保持自己的风俗而不是照抄中国人的风俗。而且重中之重是宗教不必被改变。他说所有这些必要的前提都在《十七条协议》里面获得保证。如果我们让这个协议付诸实施，那么西藏政经体系的延续将会得到保证。封建制度将会被一点一点地改变，但这个改变不会涉及到达赖喇嘛的地位。作为封建领主的我们将会失去农奴，但是我们的生计将会有所提高，而不是降低……³⁵

他说完之后是凯墨发言，随后是拉乌达热，每个人的说法都很相似。另外两位参加谈判的代表桑颇和土登列门没有发言。³⁶

民众大会接着分为不同的小组来讨论协议。所有小组的意见汇集在一起形成一份最终的报告，这份报告对谈判《十七条协议》的代表们的努力表示感谢，同时基本上肯定了协议。报告还特别提到协议中的第四条、第七条和第十二条是非常有利的。但同时也提到对一些问题他们〔民众大会的成员〕保留意见，这些问题主要包括大量的中国军人出现在西藏。报告说最好大部分中国军队不要来，而来的士兵最好驻守到边境地区而不应当待在拉萨。例如，他们建议去亚东的部队应当通过南路直接前往边境，而不经拉萨。

他们表示关切的第二个问题是军政委员会的权限问题。民众大会说既然它是中央政府的代表机构〔即中国政府机构〕，所以应当对中国军队的行为作出严格的约束。同样的，发展西藏以及建设国

35. 阿沛对庄园和农奴问题的看法应该是这样的，但是他不太可能在民众大会的发言中提出这样一个敏感的话题，因为在那时实施改革还不是一项议题。

36. 昌松，访问记，1992（划线部分为强调）。

防的过程中要考虑到西藏的风俗习惯（例如不要在西藏开矿）。他们还说，如果中国人的行为违反了协议，那么西藏政府应当有权干预。

民众大会表达的第三点担忧是，虽然尽快改善人民生活条件和教育条件很好，但是应当小心地进行，这样才不会出乱子，例如，不会造成僧侣数量的下降〔因为有读书的机会〕。³⁷

参加这次大会的一个西藏人很好地概括了精英们的看法：“民众大会的大约六十名代表心里是不喜欢这个协议的，但是没有人会在会上表示反对。”³⁸ 印度驻拉萨代表处的代表在给德里的月度报告中也发表了看法，补充了一些拉鲁没有提到的重要内容。

〔阿沛〕说中国人口头向他保证不会干预西藏的内部事务，他们在拉萨的军政委员会将负责管理中国军队，同时监督中国的利益。在听了阿沛的话之后，西藏权贵决定不向中国人提出重开谈判的要求，但是要求中国共产党保证他们所理解的共识与阿沛的说法相一致。如果中国人的答复令他们满意，那么西藏人会通知中国人他们接受北平协议。³⁹

乐于泓的日记中记录的民众大会报告的内容与拉鲁的描述很接近。

1. 《协议》中第四、第七、第十二条很好；
2. 军队（指我解放军）少来为好；进藏部队行军路线走南路去亚东，不要集中在拉萨。
3. 执行《协议》过程中无法接受的可以提出〔不执行〕（指兵力问题）；
4. 军政委员会的职权应是约束部队，不使部队违反政策纪律；也包括建设西藏。地方建设、国防建设要切合西藏的地方情况（如开矿……），如果在执行《协议》的过程中有违反协议的情况，地方政府在执行《协议》中可加以干涉。

37. 拉鲁，访问记，1993。

38. 昌松，访问记，1992。

39. 英国外交部档案，FO371/92998，印度驻拉萨代表处 1951 年 9 月 16 日至 10 月 15 日的月度报告。

5. 拉鲁派提出昌都解放由于〔阿沛〕不负责、松懈。当时没有参战的“代本”本想打，但阿沛投降了。（阿沛当即提出请组织军事调查组进行调查。）另一个人说（不管是不是阿沛的错），这个问题应当好好地调查调查。
6. 教育直接关系到人民生活的改善，请从速实现；但是兴办学校应注意到影响（即喇嘛的数量不会减少）。
7. 国庆节发电对《协议》表示拥护；
8. 感谢参加和平谈判的代表们的努力。⁴⁰

但是民众大会的首肯并没有导致迅速地公开认可协议，不过它确实使西藏政府展开了行动。9月30日，噶厦交给中国人一份草拟的关于协议的电文，上面说司曹已经同意。中国人做了一些修改之后于当天晚上交回噶厦。在接下来差不多一个星期的时间里，噶厦没有作出进一步的表示。中国国庆节（10月1日）转眼就过，而西藏方面也没有任何动作。

10月5日，张经武到阿沛家里花了两个小时同他讨论协议的问题。这时张经武才第一次知道，西藏政府决定在张经武对一些问题作出书面答复之前不会发出接受协议的电文。阿沛告诉张经武，当司曹看到噶厦草拟的电文时，他们希望中国方面澄清三个问题：一是关于军政委员会（相较达赖喇嘛）的职权问题；二是关于限制进藏解放军人数的问题；三是关于昌都重新收归西藏政府控制的问题。阿沛告诉张经武这是民众大会的意思，并且已经得到达赖喇嘛的同意。⁴¹ 中国方面不想在正式认可协议的电文中提及军队数量的问题，所以建议把这项内容放在另一份单独的电文中。两天之后的10月7日，噶伦夏苏通知中国方面噶厦同意这样做。⁴²

但是司曹仍然没有批准接受协议的最终电文。于是在10月10日，拉鲁前来询问中国人进藏解放军的具体人数。根据中国方面的记录，当张经武告诉他在12,000到18,000之间时，拉鲁显得很高兴，并且说他认为其他噶伦也会很高兴。据中国人说，拉鲁对军政委员会的问题问了又问，张

40. 乐于泓，1985: 259-62，1951年9月28日条目。他说阿沛前来找他，把会议的结果告诉了他。

41. 乐于泓，1985: 271，1951年10月5日条目。但是张经武的传记中没有提到昌都的问题（赵慎应，1995: 45）。

42. 乐于泓，1985: 275，1951年10月7日条目。

经武都一一作了回答。接着中国人请求西藏政府尽快安排粮食和柴草的供应，并提供另外的驻地。⁴³

第二天，噶厦交给张经武一封汉文信，上面再一次说明在他们发出电报之前，张经武必须回答三个问题，但是这三个问题里面加进了一个新的问题：

- (1) 军政委员会、军区司令部的职权问题；
- (2) 全藏统一问题（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提高后），也就是说，昌都地区划归西藏问题；
- (3) 金沙江以东的藏族地区（西康省）回归西藏的问题。⁴⁴

第三点几乎完全是一个新的问题。

10月14日，张经武、乐于泓和平汪前往噶厦去答复他们的问题，并讨论协议相关的事务和驻守西藏的解放军的人数。张经武的传记说，他告诉噶厦大约会有两万名军人前来，这些军队会驻守在江孜、日喀则、阿里和工布等地守卫国防，而只有大约五千名人员会驻守拉萨。⁴⁵ 中国方面也建议同西藏政府一起建立一个联合办公室来监督粮食的购买，并建议设立一家银行。⁴⁶ 对于军政委员会和西藏军区，张经武说：“军政委员会是中央人民政府在西藏的一个代理机构，西藏军区只是一个军事机关，它与西藏地方政府会经常发生关系。军政委员会可以管理（藏语：*dagnyer*）西藏地方政府和人民解放军两方面的事情。拟由达赖喇嘛任军政委员会主席，班禅、张国华任副主席。”⁴⁷

噶伦询问了张经武很多尖锐的具体问题，同他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例如，他们问达赖喇嘛作为军政委员会的主席会有什么样的权力，承担什么样的义务。他们还问这个委员会如何召集，达赖喇嘛的坐席如何设置，委员会在处理事务的时候会不会按照西藏传统的习惯进行，也就是说每一项

43. 乐于泓，1985: 277，1951年10月10日条目。

44. 乐于泓，1985: 279，1951年10月11日条目。

45. 赵慎应，1995: 46。对于这次会议有两种说法，这两种说法都来自乐于泓的日记，一种来自中文版，另一种来自藏文版。张经武传记中的材料在注释中是以中文版为基础的，里面有少量藏文版里没有的内容，但是除此之外两种说法是一致的。

46. 乐于泓，1985: 280-81，10月14日条目。

47. 赵慎应，1995: 46（划线部分为强调）。

事务是否会经由噶厦、司曹一级一级地提交给达赖喇嘛作最后的决定。他们也问达赖喇嘛能不能派一个代表以他的名义参与军政委员会的运作。西藏方面也有人说达赖喇嘛对于就任军政委员会的主席还没有充分的准备，因为他还没有拿到他的格西学位（僧侣的高级学位）。他们说，他是一朵已经开放的花朵，但是果实还没有成熟，所以我们应当等一等。对于是否要在给毛泽东的接受协议的声明电报中加上“西藏人民将会团结起来，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这句话，双方也有不同意见。有些噶伦认为这句话带有攻击性，所以不应当包括在电文中。经过很长时间的讨论，会议最终还是没有达成任何共识。⁴⁸

在张经武于10月18日和19日去色拉寺和哲蚌寺给每个僧侣布施的时候，⁴⁹关于电报的争论还在继续。10月18日，阿沛拜会了中国方面，他说他已经同噶伦讨论了加上“驱逐帝国主义者”这一表述，也讨论了西藏政府向各宗发出遵守协议的布告的问题。但是随后他告诉了中国人一个坏消息：即将到来的藏历九月是个不吉利的月份（藏语：*danag*），一般人认为这个月诸事不宜，所以声明接受协议的电报不得不等到藏历十月才能发出。

此外，对于中国方面提出的建立负责粮食采购的联合办公室的建议，阿沛也带来了负面的消息。他说噶厦认为最好还是让噶厦来处理这项事务。⁵⁰三天之后，当十八军的主力离拉萨还有一个星期路程的时候，乐于泓前去拜访噶伦，催促他们制定采购粮食的计划，并通知他们中国人希望给寺院里的“贝恰哇”（*pechawa*，学者型僧侣）和拉萨的乞丐以及藏医学院的学生发放额外布施。⁵¹另外，他再一次问到电报的事。有趣的是，噶厦的态度似乎有点倒退，他们回答说只有在张经武以书面形式回答了噶厦之前提出的三个问题之后噶伦才会讨论这个问题。⁵²

48. 乐于泓，1985: 280–81，1951年10月14日条目；乐于泓，1991: 14–32。

49. 他给每一个普通僧侣20桑吉，并且按照传统给管事僧侣的要多一些。这应该说是很大的数目了。

50. 乐于泓，1985: 285–86，1951年10月18日条目。

51. 这是一群努力研习佛学的僧侣，他们一般来说都很穷困，因为他们不从事有收入的活动。

52. 乐于泓，1985: 289，1951年10月21日条目。



图 10：中藏官员参加一个庆祝西藏“和平解放”的晚宴。前排左起：阿沛、朗顿、张国华、然巴、拉鲁、绕噶厦。中排左起：不知名者、夏苏、不知名者、基巧堪布阿旺朗杰、大札札萨、洞波、凯墨札萨、霍尔索尔札萨、不知名者。后排左起：不知名者、噶雪、桑颇、杰塔巴札萨、柳霞、洛桑三旦、擦绒、不知名者。图片来源：陈宗烈

张经武到底有没有作出书面答复，这一点并不是很清楚。但是在 10 月 22 日，阿沛来到中国人处，告诉他们西藏政府最终同意在 10 月 24 日发出电报，尽管这个日期仍然是在“不吉利”的月份内。⁵³ 于是在协议于北京签订五个月之后，西藏政府最终以达赖喇嘛的名义用电报的形式作出北京想要的接受协议的表态，包括具有争议的“驱逐帝国主义者”的表述。⁵⁴ 尽管西藏人最初说要针对协议的某些条款重新进行谈判，但是他们没有任何明确的策略，也没有同中国人磋商过这个问题。

这份以达赖喇嘛的名义发出的电报使得协议最终生效，同时表明西藏最终接受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权。

53. 乐于泓，1985: 290-92，1951 年 10 月 22 日条目。

54. 班禅喇嘛几乎是马上就致电给毛泽东（1951 年 5 月 28 日和 6 月 1 日），表达了尊重协议的重要性（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1990）。

中央人民政府毛主席：今年西藏地方政府特派全权代表噶伦阿沛等五人于1951年4月底抵达北京，与中央人民政府指定的全权代表进行和谈。双方代表在友好基础上已于1951年5月23日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西藏地方政府及藏族僧俗人民一致拥护，并在毛主席及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巩固国防，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保护祖国领土主权的统一。⁵⁵

同一天，张经武向拉萨的乞丐布施。也在那一天，十八军的主力到达拉萨河畔。⁵⁶

尽管拉萨发生了这些重大的事件，但是美国却仍然在尝试引诱达赖喇嘛拒绝协议，流亡国外。

■ 美国的另一个动作

尽管美国驻德里大使馆已经收到消息，得知达赖喇嘛已于7月底出发返回拉萨，但是他们仍然觉得还有机会说服达赖喇嘛改变决定。大使馆的消息来源是当采仁波切、夏格巴、海因里希·哈雷、乔治·帕特森等人，但是他们的说法具有误导性。正是基于他们的说法，大使馆的官员得出结论，认为以前的尝试之所以失败主要是因为用了“不可靠的中间人”。⁵⁷ 国务院认为失误在于只向达赖喇嘛派了信使，而忽视了其他有影响力的官员，比如噶伦。国务院怀疑这些噶伦对美国开出的条件一无所知。⁵⁸ 因此，在1951年8月初，也就是达赖喇嘛正在返回拉萨的时候，美国采纳了一系列新的举措。

8月4日，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同意向西藏人发出如下口头信息：

对于使您此刻留在西藏的原因和环境，美国政府感到理解和同情。
但是美国政府希望重申我方的看法，即为了您的人民和国家着想，

55. 英国外交部档案，FO371/92998。

56. 乐于泓，1985: 292，1951年10月24日条目。

57. 美国国务院，1983: 1769，793B.00/8-151，美国国务卿给美国驻印度大使馆的电报，电报号295，1951年8月4日。

58. 美国国家档案馆，793B.00/8-1351，美国驻加尔各答总领事给美国国务卿的电报，电报号114，1951年8月13日。

您应当尽快逃离共产党的控制，并且在您到达安全的避难地点时推翻与共产党中国的协议。当采在美国过得很好很安全，他希望您正面地考虑美国政府此前提出的为您和您有限数量的随员在避难时提供援助的承诺。⁵⁹

两天之后，美国在德里的大使馆请求把这个信息翻译成藏文，通过信使送达亚东，当然之前会删除上面所有指向美国的信息。大使馆还建议这份信息中提到避难的最后部分补充“在印度或锡兰”。8月9日，华盛顿同意了这个请求。⁶⁰

美国人不愿意在书面文件上表露任何官方印记，使西藏人对美国的诚意产生怀疑，极大地减弱了美国所作出的承诺的影响力。甚至在这封信之前，这个问题就已经存在。那是在7月末，当时锡金公主库库拉 (Coocoola) 给她的舅舅绕噶厦送去一封未署名的信。事后库库拉告诉美国人，绕噶厦表示“很怀疑，他不相信美国真的愿意提供帮助却不肯作正式的承诺。他告诉〔姓名删去了〕他坚信，美国若想使为达赖喇嘛流亡提供帮助的承诺产生效果，这封未署名的信是不够的，它不足以说服噶厦。”⁶¹ 绕噶厦还说，这封信具体由谁来署名不重要，只要有人署名并且包含美国政府字样的正式信头。但是他也表示“达赖喇嘛仍然有可能前来印度，但如果是没有署名的信件，他〔绕噶厦〕就无法让内阁〔噶厦〕相信美国真的对西藏感兴趣。”⁶²

8月中旬，也就是达赖喇嘛刚到拉萨的那个星期，美国驻加尔各答总领事威尔逊催促华盛顿的国务院尽快准许签发一份正式声明，因为关于《十七条协议》的最终磋商不久就要在拉萨开始了。他告诉华盛顿达赖喇

59. 美国国家档案馆，793B.00/8-15，美国国务卿给驻新德里大使馆的电报，电报号295，1951年8月4日。

60. 美国国家档案馆，793B.00/8-1351，美国驻加尔各答总领事给美国国务卿的电报，电报号114，1951年8月13日。

61. 同上。在7月末带信给在亚东的达赖喇嘛的另一个人（这个人似乎是达拉·平措扎西）在8月中告诉在加尔各答的威尔逊说，达赖喇嘛表示那封信是没有署名的（美国国家档案馆，793B.00/8-1851，包含于68号急件：美国驻加尔各答总领事给美国国务卿的电报中，1951年8月18日）。

62. 引自美国国家档案馆，793B.00/11-157，“美国对西藏法律地位问题的政策，1942-1956”。

嘛仍然渴望去印度，西藏也仍然可能推翻协议。因此，他说，“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份表明我方态度的正式声明也许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⁶³

但是此时，对此事表现积极的韩德逊大使并不在印度，暂时代理他的职务的是大使馆的首席农业官贺瑞斯·福尔摩斯（Horace Holmes）。福尔摩斯对冷战并没有多大的兴趣，他反对签发署名信件。在一份给华盛顿的冗长的电报中，他针对威尔逊的建议提出一个很有说服力的反对理由。

参考 8 月 13 日发自加尔各答总领馆的 114 号电报，
其中引用新德里的 110 号电报

大使馆非常重视将美国官方署名并带有美国信头的信件转交给西藏防务大臣……目的在于说服西藏官方否认中藏协议，并奉劝达赖喇嘛离开西藏这一计划。

但是大使馆认为转交上述信件的风险要远远超出美国和西藏可能的收获。如果这样一份文件落到中国共产党的手里，可能会被当作美国努力推行帝国主义政策干涉西藏事务、挑拨中国和西藏之间表面上的友谊的证据。甚至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即那些西藏人在同中国共产党的进一步谈判中被逼急之后，也许会用这份文件要挟中国人。

对于这封带有美国信头、由官方署名的信是否能增加西藏对美国立场的理解和信任这一问题，大使馆必须表示怀疑。国务院和总领事知道，以前所有关于美国立场的信件都是通过两三个沟通渠道转交给达赖喇嘛的。这些渠道包括夏格巴、当采和哈雷。

达赖喇嘛周围的重要官员可能在达赖喇嘛收到信的时候就已经被告知详情。哈雷告诉大使馆，达赖喇嘛给了他两封信。在这两封信中，达赖喇嘛确认他收到美国所有的信件，并表示他更想离开西藏，之所以决定返回拉萨是依照“西藏大多数人的看法和意愿”。

因此，总的来说大使馆认为达赖喇嘛和西藏官员很好地了解了美国的立场，而上述给西藏防务大臣的信不会使他们了解得更多，所以不值得冒这个风险。除此之外，引自 8 月 6 日大使馆 507 号电报中修正过的 8 月 4 日国务院 295 号电报的情报……将会向达赖喇

63. 美国国务院，1983: 1776-78，793B.00/8-1351，美国驻加尔各答总领事给美国国务卿的电报，电报号 114，1951 年 8 月 13 日。

嘛和西藏官员提供美国仍然存在兴趣的更进一步证据。这份情报将会由〔姓名删去了〕在离开加尔各答的时候带去拉萨。

眼下大使馆认为，在收到关于拉萨事态发展的某些明确信息之后，可以发出进一步带有鼓舞性的信息。大使馆认为在这样的信息中应当建议达赖喇嘛派出他和西藏官员都信任的私人代表去印度同美国官员进行正式磋商。这个代表应当能返回拉萨去汇报，以确认美国的具体立场。他的汇报内容也更可能成为达赖喇嘛准备采取进一步行动的根据。除此之外，当采也可以利用这次机会给达赖喇嘛写信，说明鉴于他的来信有时无法到达赖喇嘛之手，建议派往印度进行磋商的代表就将来一连串可能的行动同美国官员进行正式的讨论。

前面段落中的建议是基于在拉萨的西藏人同中国共产党的谈判将继续“停滞”这一基本判断。该建议的另一个好处就是避免美国官方文件落入不友好的对象手中。

福尔摩斯⁶⁴

国务院也持相同的看法，不仅因为国务院的官员担心署名信件可能会落入中国人的手中，也因为他们在内部一致认为“对噶厦来说最有用的是美国政府答应采取一系列包括财政和武器援助在内的行动，但是这些行动是不适宜公开去做的”。⁶⁵

然而，因为听信了美国在印度的消息来源提供的说法，美国仍然寻求说服达赖喇嘛逃出西藏。8月15日，威尔逊准备了另一封**没有署名的信**，写在无法追踪来源的纸张上，上面是艾奇逊于8月4日批准的信息（前面已经引用）。这封信通过一个会说英语的匿名西藏人送去给达赖喇嘛。这个西藏人即将前往拉萨，他承诺会亲手把信交给达赖喇嘛。⁶⁶

不到一个月之后的9月10日，也就是王其梅领导的先遣支队到达拉萨的第二天，要求发送一封署名信件的呼声又出现了。这是因为海因里希·

64. 美国国务院，1983: 1786-87，793B.00/8-14511，美国驻印度代办给美国国务卿的电报，电报号 613，1951年8月14日（划线部分为强调）。

65. 美国国务院，1983: 1790，793B.00/8-1351，美国国务卿给美国驻加尔各答总领事的电报，电报号 81，1951年8月15日。

66. 美国国务院，1983: 1791，793B.00/8-1651，美国驻加尔各答总领事给美国国务卿的电报，电报号 121，1951年8月16日。

哈雷告诉在加尔各答的威尔逊，西藏上层官员宇妥札萨急于返回拉萨去说服西藏政府让达赖喇嘛离开西藏。哈雷说，宇妥认为在向噶厦和重要俗官陈述论据的时候，他必须能够发誓曾经见过一份由美国政府发出的、承诺援助的署名信件。⁶⁷ 哈雷建议美国准备这样一封信出示给宇妥，但是不要给他副本。哈雷利用美国人内心的希望，夸张地说了他们爱听的话，即达赖喇嘛仍然极度渴望离开西藏，只是碍于没有从他的俗官中得到充分的支持来克服僧侣（和僧官）持续的反。虽然中国军队正在接近拉萨，但是哈雷估计他们不会在两个月之内到达。因此如果宇妥能够发誓美国人已经作出这样的承诺，那么他就能发挥重要的作用。⁶⁸ 返回新德里任上的韩德逊大使支持这个计划，他请求国务院批准执行这次行动。⁶⁹

国务卿艾奇逊于9月14日批准了这项大胆的行动，前提是这封信不能离开美国官员之手，西藏人只有在美国官员在场的情况下才能看这封信。艾奇逊建议可以发一封类似之前的信给达赖喇嘛，但是内容要有一个重要的不同之处：**为抵抗组织提供援助的部分必须局限于一种概括的表述，即援助的提供将会参考现实的政治和自然地理条件两方面的可行性。**换句话说，援助将会非常少。最后的文字和具体落实由韩德逊斟酌，虽然信中提供的支持仅限于西藏自治而不是独立，但是韩德逊在信中用了很强的语气。⁷⁰

几周之后的9月30日晚，驻加尔各答总领馆里举行了一次最高级别的秘密会面。在场的是中央情报局在当地的首脑林恩和宇妥、哈雷（作为

67. 宇妥是一位很有声望的官员，他曾经在拉鲁之前担任过昌都朵基，他的妻子来自索康家，而索康的妻子来自他家。不仅如此，他的儿子还娶了锡金两位公主之一的库库拉。因此他的说法还是有一定权威性的。

68. 美国国家档案馆，793B.00/9-1051，美国驻加尔各答总领事给美国国务卿的电报，1951年9月10日；以及美国国家档案馆，793B.00/9-1251，同哈雷的会谈报告，包含于117号急件：美国驻加尔各答总领事给美国国务卿的电报，1951年9月12日。

69. 美国国务院，1983: 1803-4，793B.00/9-1251，美国驻印度大使给美国国务卿的电报，1951年9月12日。

70. 美国国务院，1983: 1807-8，793B.00/9-1251，美国国务卿给美国驻加尔各答总领事的电报，电报号128，1951年9月14日；美国国务院，1983: 1815-16，793B.00/10-151，美国驻加尔各答总领事给美国国务卿的电报，电报号185，1951年10月1日。

宇妥的翻译)。宇妥看到一封由韩德逊大使署名的写给达赖喇嘛的信件，他仔细地查看了信件，并用藏文做了笔记。他看完之后，这封信被放进总领馆的保险箱。信上说，

美国驻新德里大使，1951年9月17日

至尊：

美国政府怀着深深的同情注意到您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为阻止中国共产党的入侵使西藏的自治遭到破坏而作出的努力。对于至尊您希望留在西藏，认为这样您就能够为西藏人民免于遭受镇压出一分力，这一点敝国政府也充分理解。但是敝国政府相信，如果您留在西藏，那么您将被〔此处被删去〕或者被迫成为共产党的奴仆。敝国政府认为，如果您留在西藏将可能无法帮助您和人民。

美国政府的观点是，如果您能够设法离开西藏并且在某个类似锡兰这样的国家寻求到庇护，那么您就能够继续您为保存西藏自治和西藏人民自由而进行的斗争。因为敝国政府认为西藏不应当在受到胁迫的情况下接受有违其自治的协议，所以希望尽可能适当地阻止这种冒犯行为的发生。因此，如果至尊希望在锡兰或者其他国家寻求避难，只要您需要，敝国政府准备尽力帮助您安排避难和获得途经其他国家的许可。除此之外，敝国政府准备设法支付您和您的家人及随员的旅行开支。在双方满意和条件允许的前提下，美国政府准备进一步为至尊、您的家人及大约一百名随员提供财政帮助。

敝国政府冒昧地向您表示，如果您决定离开西藏，希望您在挑选随行人员的时候考虑政治效果和影响力。如果您在其他地方找不到适当的避难地点，敝国政府也准备安排您和您的一些随员来美国避难。

敝国政府坚信抵抗共产党对西藏的侵犯必定是一个长期的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必定会受到临近地区政治和自然地理条件的限制。美国当然无法控制这些条件，但是准备在现在和将来支持西藏针对共产党侵略的抵抗运动，并尽可能地提供物质援助。

至尊自然会理解，美国愿意向您提供上述援助和支持的条件是：您离开西藏，公开推翻由西藏代表在胁迫之下同中国共产党代表签订的协议，并且愿意继续就反抗共产党的侵略进行合作。

我们合作的一个重要步骤是美国公开发表声明，支持至尊作为自治的西藏的领袖地位。美国也愿意支持您在尽可能早的现实的时

间，以一个自治的、非共产党国家的首脑的身份返回西藏。美国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是原则性的立场，它不会受到朝鲜局势的发展或者中国共产党介入朝鲜问题的影响。

敝国建议至尊通过非正式渠道谨慎地接触印度政府，以期使印度政府阐明在有关您离开西藏等问题上的态度。据敝国政府所知，印度政府准备允许至尊取道其领土或者在其领土上居住。假如您非常希望，美国政府愿意同印度政府磋商这个问题。

(签字) 卢瓦·韩德逊 (Loy W. Henderson)

卢瓦·韩德逊

美国大使⁷¹

在读了这封信并做了笔记之后，宇妥似乎感到满意。他告诉林恩他会见到阿沛、绕噶厦和其他三四位高级官员，包括两位司曹和达赖喇嘛的哥哥洛桑三旦。⁷² 但是第二天，宇妥似乎对这件事又有了新的想法。他担心在拉萨的重要人物会要求他出示证据，证明美国总领馆不会在他离开加尔各答之后修改这封信，或者甚至销毁这封信，所以他建议把这封信“锁在一个坚固的盒子里，盒子放置于一家当地银行的保险库，只有达赖喇嘛任命的一位代表才能打开”。林恩显然觉得美国这个怪异的计划无懈可击，所以宇妥的建议似乎让他觉得受到羞辱，于是他很不高兴地回答说：“如果〔宇妥〕是如此怀疑美国政府的动机，认为我们有可能在他看了之后篡改大使信件中的语句，那么他就完全误解了美国政府做事的方式。”⁷³

于是宇妥放弃了这个建议，但却提出其他两个问题。首先，他问美国是否也会为达赖喇嘛的随员的家人提供财政支持。他说如果这些人留在西藏，那么将会为共产党提供一种非常有效的施压手段。他说包括家人在内，总数会在 150 到 300 人之间。而且他强调这对西藏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其次，宇妥问如果达赖喇嘛待在拉萨，但是派一小群可信的官员在西藏外部组织抵抗，美国的态度会如何。威尔逊说他不知道如何答复这些问题，但会询问华盛顿，不过他指出前面所有的讨论都是基于达赖喇嘛

71. 美国国家档案馆，793B.00/9-1851，包含于给达赖喇嘛的 1 号信件及 662 号急件：美国驻印度大使馆给美国国务卿的电报，1951 年 9 月 18 日（划线部分为强调）。

72. 美国国家档案馆，793B.00/10-551，美国驻加尔各答总领事给美国国务卿的电报，急件号 157，1951 年 10 月 5 日。

73. 同上。

离开西藏的这一假设。⁷⁴当然，威尔逊是正确的，美国首要的目的是寻求获得一个绝妙的宣传素材，而不是支持西藏的秘密游击战。

宇妥于10月3日离开加尔各答前往噶伦堡，但是在那里他没有立即前往拉萨。⁷⁵这让美国人判定宇妥是不可信的，所以在1951年11月11日把这封信的内容告诉了正在大吉岭的达赖喇嘛的母亲。⁷⁶与此同时，达赖喇嘛的二哥嘉乐顿珠到了美国去看望当采仁波切。

■ 嘉乐顿珠在中国和美国

达赖喇嘛于1939年在中国西部的青海省被寻访到，并于同年和家人一起被接到拉萨。他们来自安多，安多是藏族的聚居区之一，以青海省为中心。但是他们来自安多一个比较汉化的地区，他们村庄里的很多藏族人都以汉语为他们主要的交流语言。对此，达赖喇嘛的母亲解释道：“因为我们来自于宗喀，所以我们说宗喀方言，但是我的父母能说安多方言。这两种方言之间有很大的差别。因为在宗喀有很多中国人，所以年轻一代都用汉话交流，于是经常忘记了他们的安多土话。Guyahu（仅凭英文地名，无法确认具体地点——译注）〔她家所在的地区〕的老人说安多话，而年轻人则说汉话。”⁷⁷

74. 艾奇逊在10月6日答复说，向达赖喇嘛的随行人员提供资助主要是佛教徒的责任，美国保证为150名以内的人员提供财政资助。对于第二点，除非达赖喇嘛逃出来并推翻协议，否则国务院不同意给予援助（美国国家档案馆，793B.00/10-651，美国国务卿给美国驻加尔各答总领事的电报，1951年10月6日）。这个答复似乎并没有传达给宇妥。

75. 美国国家档案馆，793B.001/11-451，美国驻加尔各答总领事给美国国务卿的电报，1951年11月4日。据库库拉说，宇妥被中国人密切地监视着，所以不能把美国的信息转达给两位首相，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52年4月（美国国家档案馆，793B.00/7-252，美国驻加尔各答总领事给美国国务院的电报，1951年7月1日）。实际上，中国人并没有怀疑宇妥是帝国主义的奸细，所以没有密切地监视他（平汪，访问记，2000）。

76. 美国国家档案馆，793B.00/11-157，“美国对西藏法律地位问题的政策，1942-1956”。

77. 次仁，2000: 30。达拉在他的书中（1995: 1: 109）叙述了他们初到拉萨时遇到语言交流的难度。

因此，用汉语交流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1943年达赖喇嘛的父母送嘉乐顿珠去上学的时候，他们把他和他的姐夫达拉·平措扎西〔达拉是安多娃（安多／青海的藏族），和达赖喇嘛的姐姐次仁卓玛（Tsering Dolma）结婚〕送去跟一位姓马的汉人教师学习汉文，而不是让他们在拉萨的私塾里学习藏文。这件事就不能不说是很奇怪了，他们跟马老师（在热振位于拉萨的寺庙里）学习了一年的汉文，直到马老师因为身体原因停止教学。⁷⁸ 此时，嘉乐顿珠（和他的弟弟洛桑三旦）被送到名为札康（Tarkhang）的藏文学校去读书。⁷⁹ 但是让嘉乐顿珠学汉文的想法并没有消失，1945年年中这个想法又冒了出来。那时达赖喇嘛的父亲决定把他和达拉送到中国去学习。嘉乐顿珠那时17岁，而达拉22岁。热振在1944年12月到访拉萨并待了两个月，试图恢复摄政之位，达赖喇嘛的父亲可能在这段时间同热振商量了这件事。⁸⁰ 他在1945年9月让嘉乐顿珠和达拉单独去热振位于拉萨北部的寺庙拜访热振，大概是想在出发去中国之前向热振告别。⁸¹ 国民党驻拉萨办事处的首脑也私下会见了他们俩，⁸² 之后这两个年轻人在1945年底被送到印度，表面上是去做买卖，实际上是去中国。他们前往中国首都南京的行程是由中国驻加尔各答总领馆安排的。1946年4月7日，他们到达南京，就读于中央政治学校。⁸³

那时，送孩子去中国上学在贵族中是闻所未闻的。那些送孩子去接受现代教育（这在西藏是不可能获得的）的家庭都把孩子送去印度，所以尧西家族的决定让他们游离于主流之外。对于围绕这个决定的各种事件，达赖喇嘛的母亲、嘉乐顿珠和平措扎西给出了很有意思的说明。达赖喇嘛的母亲说，她的丈夫认为去中国学习对嘉乐来说会是一次好的经历。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从表面上看中国却是西藏的敌人。

78. 达拉，1995: 1: 164。最近出版的一本书作了更进一步的解释：“嘉乐顿珠现在很想去中国上学。公〔达赖喇嘛的父亲〕起先表示反对，但是他的朋友前任摄政说服了他”，于是嘉乐和达拉开始在私人学校里学习汉语（克雷格，1997: 116）。

79. 这所学校是一位僧官开办的，这位僧官出家前的名字是绒·班楞（Rong Phelung）。但是人们一般叫他札康，意思是电报局，因为他曾经掌管过那个机构（达拉，1995: 1: 167）。

80. 对此次拉萨之旅的详细论述，见戈尔斯坦，1989: 433-37。

81. 达拉，1995: 1: 195-247。

82. 达拉，1995: 1: 195-96。

83. 嘉乐比达赖喇嘛大七岁，那时他19岁。达拉·平措扎西那时24岁。

我们在嘉乐顿珠 16 岁的时候把他送到中国。我不想让他去，因为中国太远了，我是从一个母亲的角度考虑的。但是我的丈夫认为这对他会是一个好的历练，我的儿子也很想去。于是我们家对这个问题讨论了很多次，最终决定让嘉乐顿珠去中国。⁸⁴

她没有说清楚为什么送他去中国接受教育会是一段好的历练，但是嘉乐顿珠解释说这里面涉及前任摄政热振的政治考虑。

那时热振摄政〔前摄政〕和我父亲认为去中国学习非常重要，这最终会对西藏人民、西藏政府非常有用，尤其对达赖喇嘛非常有用……

我们〔嘉乐和热振〕谈论的全都是关于大札和政治，他非常信任我。至于我去中国，我尽力让他理解我去中国的决定，希望他最终可以重新掌握权力。我们也讨论了这样一些话题。⁸⁵

前面已经提到，达赖喇嘛的父亲和热振的关系非常亲密，他们都视中国为热振反对大札的一个潜在支持者。所以毫不奇怪达赖喇嘛的父亲希望他的儿子到中国的首都去上学，这样就能很自然地同中国的重要官员建立联系，形成友谊。当然，他们也如愿了。但是他们这样做并没有征询过西藏政府，而且嘉乐不但被蒋介石和国民党精英包围着，他还和国民党将军朱绶光的女儿朱丹（同时也是他的同学）订婚并于 1948 年结了婚。对西藏政府来说，这个情况非常敏感。

前面已经提到，在送他们的孩子去中国之前，达赖喇嘛的家人没有同噶厦讨论他们的决定（只同前摄政热振一个人商量过），所以西藏政府对嘉乐顿珠在国民党的学校上学并同国民党将军的女儿结婚这件事感到不满。当达赖喇嘛的父亲在 1947 年年初过世的时候，嘉乐成了尧西家族的家长，但是他本人却在中国并有一个汉人未婚妻，这显然会产生政治影响。家人担心他会被中国人利用或控制。因此噶厦向其在北京的办事处发出指令，告诉办事处的官员们尽一切努力说服嘉乐顿珠返回拉萨。但是嘉乐在

84. 次仁，2000: 135。

85. 如前所述，实际上在嘉乐顿珠和达拉·平措扎西即将前往中国之前的 1945 年 10 月，达赖喇嘛的父亲让他们拜访了热振仁波切〔嘉乐顿珠，访问记，1995（划线部分为强调）；达拉，1995: 1: 185–94〕。

某一天拜访办事处的时候偶然看到了噶厦的指令，当时他非常生气。在得知指令的内容后，他同正在玩麻将的办事处官员们发生了冲突。

我走到他们的麻将桌前，所有人突然站了起来，说：“哦，顿珠先生，你来了。……很好。我们有些很重要的事要对你说。”我告诉他们：“不要着急，我们慢慢谈，你们继续玩麻将吧。”他们说：“不不，我们不玩了。”于是他们停止玩麻将，要我到他们的办公室去。我进了他们的办公室，他们坐下来，说很担心我的前途。他们没有提到任何有关电报的事情，只是告诉我如果我在中国待得太久，他们就会对我的前途和利益非常担心和焦虑。我问：“为什么？”他们说因为中国的内战和各种纷争。他们还说我的父亲去世了，说我父亲是公，西藏的公爵，这个爵位需要有人来继承，除了我之外没有人可以承袭他的爵位。他们说，因为我母亲孤身一人，我应当马上回去，去承袭这个爵位。我接着问：“还有其他重要的事吗？”他们回答说：“没有其他事了。”我接着捉弄了他们，从我的口袋里掏出那份电报说：“你们知道的，噶厦的原话是这样的。他们说如果达赖喇嘛的哥哥嘉乐顿珠在那里待得太久，情况就会变得非常非常复杂。从整个西藏、西藏政府和人民的利益出发，这是不合适的。因此不管用什么方法，不管用多少钱，说服他返回西藏。”当时我就是这么说的，因为我自己能看懂藏文。

于是我接着说：“你们这些人在对我说谎。”听了我的话他们吃了一惊，进而非常难堪。于是他们说是的，但是噶厦和西藏政府这样做并非出于恶意。他们希望我回去是因为这一地区的局势现在非常险恶，他们是出于好心，除此之外也没有别的话说。我非常生气，告诉他们让噶厦见鬼去吧，我在中国是来学习的，我是个学生，和政治没有任何关系。噶厦为什么怀疑我？噶厦应该做的是对西藏有益、对国家有益、对西藏的利益和西藏人民的福祉有益的事。不要窝里斗，不要仅凭我待在中国就怀疑我。我在中国是学汉文的，我和政治没有关系。……我和你说，我至今仍然保留着那份电报。⁸⁶

嘉乐顿珠断然拒绝离开中国，但是他坚持要求他的姐夫平措扎西返回拉萨照顾他的母亲。平措扎西同意了，并于1947年返回了拉萨。

86. 嘉乐顿珠，访问记，1995。

然而，由于共产党即将在内战中取得胜利，嘉乐顿珠没能继续在中国待下去。他于1949年离开中国大陆前往香港，之后带着他的妻子一起前往印度。在印度他几乎没有什么现金，于是写信给在拉萨的家人（给达拉·平措扎西）要钱。⁸⁷ 此时，尧西家族的财政被两名西藏政府任命的“监护人”监管着。⁸⁸ 嘉乐很快就发觉西藏政府仍然试图逼他回去，因为他们仍然把他（和他的中国妻子）看作潜在的危险因素或使他们尴尬的人。结果，尧西的监护人收到嘉乐要钱的信后压了差不多一个月没有回信，最后告诉嘉乐他们没有钱给他，并要他尽快返回拉萨，说如果返回的行程需要钱他应该向在印度的人借。他们还告诉他如果他继续待在印度，那么以后他们将很难寄钱给他。⁸⁹ 嘉乐极为生气，并且再一次拒绝遵从西藏政府的命令。他从他所在的噶伦堡的热振拉让商号里借到钱，并接受尼赫鲁总理的邀请，于1949年7月29日前往新德里。离开德里后他又去了加尔各答，在那里他再一次想办法筹钱。这一次是从正好在加尔各答的两位贵族官员夏格巴和邦达昌那里借，但是他们拒绝了。嘉乐的秘书拉姆次仁（Lhamo Tsering）说，这是嘉乐一生中最辛酸的时期，因为他要靠借钱度日。⁹⁰ 在嘉乐看来，这是西藏政府又一次企图操控他。作为尧西家族名义上的家长，嘉乐有权决定怎样使用他的钱，而西藏政府任命的监护人没有这个权力。这种操控进一步加深了嘉乐和尧西家族因为整个热振冲突和达赖喇嘛父亲之死而产生的猜疑和仇恨。

于是嘉乐顿珠决定再回香港，因为他妻子的亲戚正住在那里。嘉乐和妻子准备从那里去美国接受进一步的教育。嘉乐也认为他应当在香港直接接触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⁹¹ 但是他没能获得前往香港的签证，所以再一次改变了计划。现在他要去菲律宾，希望可以从那里前往香港。他于1950年4月21日出发前往马尼拉，但是嘉乐在马尼拉又一次改变了主意，他没有前往香港而是去了台北。在那里，他发现自己又被困住了，因为国

87. 拉姆次仁，1992: 57–58。

88. 因为尧西家族迅速增加了相当多的债务，所以大约在1945年西藏政府任命了两位政府官员（夏苏和洞波）作为尧西家的监护人和顾问（藏语：*tsondzin*）（达拉，1995: 1: 183）。

89. 拉姆次仁，1992: 58。

90. 拉姆次仁，1992: 58。

91. 拉姆次仁，1992: 69。

国民党政府拒绝向他签发出境许可，使他不能去美国看望他的哥哥当采或者去别的什么地方。⁹² 同西藏政府一样，国民党政府更希望他留在自己的土地上。因此他不得不在那里待了一年多时间，直到1951年秋天，台湾在美国的压力下才最终向他签发了前往美国的出境许可。

嘉乐在美国的时候多次拜会国务院的官员。不过很明显，他的哥哥当采仁波切仍然是美国主要的情报来源和联络人。在1951年9月26日，嘉乐会见了国务院中国事务部的威廉·安德森（William O. Anderson）。在这次会面中，美方坦率地向嘉乐表明了美国支持西藏的底线，即“美国既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西藏的宗主权也承认西藏所宣称的事实上的自治”。在同一次会面中美方也告诉嘉乐顿珠，美国对西藏事务的考量会受到美国是否继续承认中华民国政府这一因素的制约。⁹³

我们已经看到，尽管美国提出了上述告诫，但是它仍然对西藏非常感兴趣，也继续对达赖喇嘛流亡抱有一线希望，所以又出现了新的有关再送一封信给达赖喇嘛的讨论，并且赌注又加码了。新的信件与1951年9月在加尔各答出示给宇妥的那封信很相似，但是会加上一个说明，即美国刚刚从印度政府那里得知如果达赖喇嘛向印度政府提出请求，印度政府愿意提供避难或取道转往他国的权力。⁹⁴ 驻新德里大使馆认为这个额外追加的诱惑是如此重要，以至于他们认为美国在通知达赖喇嘛之前不需要等待印度政府的最终确认。有意思的是，大使馆于11月3日致电华盛顿敦促那里的官员采取行动，并且建议他们不要理达赖喇嘛发给毛泽东的表明接受协议的电报：“在大使馆看来，我们应将这一还在讨论中的信息直接传达给达赖喇嘛，而无需等待巴杰帕伊的进一步答复。西藏人极有可能是迫于压力才接受的协议。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这个信息对西藏人来说将会非常重要。”⁹⁵

92. 拉姆次仁，1992: 67-70。

93. 美国国家档案馆，793B.00/11-157，“美国对西藏法律地位问题的政策，1942-1956”。

94. 美国国家档案馆，793B.00/11-1451，美国驻加尔各答总领事威尔逊给美国国务卿的电报，1951年11月14日。

95. 美国国家档案馆，793B.00/11-351，驻德里的鲍尔斯给美国国务卿的电报，1951年11月3日。

11月4日，驻加尔各答总领馆也采取了类似的敦促行动，说因为宇妥仍然没有出发前往拉萨，“这种耽搁是很不幸的，它也表明把印度政府对避难问题的善意态度转达给达赖喇嘛是非常适当的。”⁹⁶

在同一时期，嘉乐顿珠于1951年9月2日在华盛顿又一次会见国务院的安德森。在会面中，他对西藏最近发生的事件作出非常错误的评估，使美国对西藏具体情况的理解更加混乱了。美国人对这次会谈的报告如下：

应他本人的要求，今天我同他和他的妻子讨论了（1）他从西藏得到的最近的消息；（2）美国政府向他提供教育援助的可能性。

嘉乐说大约在〔1951年〕年中他收到一封从拉萨发来的信件，信上说西藏人对中国共产党的反对情绪与日俱增，可能随时都会爆发公开的武装冲突。他说大寺里的僧侣掌握有武器，并且会使用它们。这些僧侣拒绝把武器交给中国人。我问嘉乐有没有读到最近的宣称达赖喇嘛已经接受5月23日那份协议的新闻。嘉乐回答说他和当采的看法相同，根据从西藏收到的私人信件，他们相信北平的报道是虚假的宣传手段。他们的亲人告诉他们，反抗中国侵略的风潮可以和1911年时的相比，那一次西藏人成功地把中国人赶出这个国家。嘉乐和当采认为，在这种环境下接受协议是不可能的事。嘉乐重申了他此前的观点，即现在拉萨的军队不会超过500或600人，⁹⁷所以尽管会有些困难，但是达赖喇嘛仍然能够逃走，而且他很可能会在冬天大雪封路之前逃走。⁹⁸

类似这样的对西藏事件的错误认知是1950年代历史一个惯常的组成部分。应当注意，在这个时期中央情报局没有官员可以说藏语，在西藏也没有探员，所以他们没有独立的情报来源。实际上，直到1957年中央情报局开始向西藏空投藏人时，这些藏人发回的加密信息还是由一名蒙古僧侣（格西旺阶，Geshe Wangye）翻译的。这名蒙古僧侣在拉萨一间寺庙里

96. 美国国家档案馆，793B.001/11-451，驻加尔各答的索兰（Soulén）给美国国务卿的电报，1951年11月4日。

97. 实际上，在这次会谈的时候，十八军的主力（约六千人）已经到达拉萨。

98. 美国国家档案馆，793B.001/11-251，国务院的威廉·安德森和嘉乐顿珠之间的谈话备忘录节选，1951年11月2日。

生活过，所以认识藏文。他在新泽西开办了一所藏传佛教中心，从那里坐火车到华盛顿来阅读并翻译这些情报。⁹⁹

加尔各答的威尔逊在两周之后的11月14日制定了一份计划书。从这份计划书中可以看出美国对拉萨情况的困惑达到什么样的程度，这份提交给国务卿的计划书探讨包括派飞机到拉萨邻近地区把达赖喇嘛空运出来流亡的可能性。现在看来这个计划是再荒唐不过的了，但是加尔各答总领馆却强烈地支持它，认为这“可能是把达赖喇嘛弄出来的最后机会”。

〔名字被删去〕计划在大约两周之后带着信件出发前往拉萨，设法说服达赖喇嘛离开西藏。他们两人对达赖喇嘛愿意离开西藏很有信心，但是也预见到将会存在巨大的阻碍，并意识到首要的困难是达赖喇嘛可能会说如果没有外部帮助他无法逃出来。他们询问美国能否派一架或者多架飞机到拉萨邻近地区。他们认为，一方面行程过长，另一方面沿途多少会有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出现，所以骑马逃离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使用飞机不可行（总领事认为这会遇到严重的困难），他们相信达赖喇嘛可能能够寻求到僧侣的支持。这些僧侣如果武装起来也许可以打败在拉萨的中国人（报道的人数是3,000人）。这样达赖喇嘛就能够撤退到有利的地点，用飞机把他和他的随员运出来。后一种方案将会涉及武器、物资的供应，以及需要美国方面在策划中起主导作用。〔名字删去〕希望在出发之前从总领事那里得到一些信息——关于用飞机帮助达赖喇嘛逃离拉萨的可能性以及我们计划在达赖喇嘛离开西藏之后向他提供的帮助……吉布森强调实施任何计划前要确保达赖喇嘛有意离开西藏、推翻中藏协议并继续反抗共产党，同时要求有准确的沟通、完善的计划和正确的时机。总领事认为若想说服达赖喇嘛离开西藏，美国方面大量的建议和帮助是必须的。

我们希望收到国务院和大使馆对该建议的意见。我们明白执行前述计划困难重重，但是这可能是把达赖喇嘛弄出来的最后机会。今天的新闻说中国军队已经到达江孜。但是国务院可能希望至少要利用这个机会把当采的信交给达赖喇嘛……

威尔逊¹⁰⁰

99. 弗兰克·何乐伯 (Frank Holober)，访问记，1995，华盛顿；当采仁波切，访问记，1993，布鲁明顿。当采说他有时候也协助翻译。

100. 美国国务院，1983: 1847-48，793B.00/11-1451，驻加尔各答总领事威尔逊给美国国务卿的电报，1951年11月14日。

新任驻德里大使切斯特·鲍尔斯（Chester Bowles）也认为达赖喇嘛希望逃离西藏，但是鲍尔斯对总体情况的认识更为现实一些，尤其认为威尔逊的建议有些不着边际。他建议送照相器材和彩色摄像机去，而不是飞机，这可以从下面给国务卿的电报中看到：

尽管达赖喇嘛已于去年7月由亚东返回拉萨，但是大使馆不怀疑他个人仍然保留着离开西藏的意愿。大使馆也认为，虽然印度政府已经确认西藏政府承认协议报道，但是达赖喇嘛个人仍然反对中藏协议的某些条款。……我们没有理由相信达赖喇嘛在这两方面的问题上改变了主意，我们也不应当把这两个事态的发展表面化地解读为达赖喇嘛和他的政府已不再享有自主权，不能认为他们已经屈服于中国共产党军队出现在拉萨和其他地区所形成的压力。在这样的情况下，〔名字删去〕……担心他的安全，希望找到使他获得自由的方法。

但是大使馆相信，他们提出的要求美国公开提供飞机、武器、给养和领导的建议是不可能实现的，在这个时期从政治角度考虑也是不适当的。中国共产党会把美国公开的援助看成是公开干涉西藏事务，这会让中国共产党找到现成的借口来进一步加强对西藏的控制，而且会让美国受到在亚洲实行帝国主义政策的又一波指控。另外，考虑到西藏的地理位置，美国提供的援助需要印度方面完全的合作。但是考虑到其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印度政府极有可能不愿意允许美国的援助通过印度运输或者由它来提供援助。印度也可能会对美国在这个时期向西藏提供台面下的援助表现出不满。

虽然……在这个时期美国的援助从操作角度和政治角度来说都是不适宜的，但是大使馆认为美国至少应当尽最后的努力，通过信件或者口信的方式鼓励达赖喇嘛用西藏政府已知的最好方式来抵抗。大使馆认为由当采发一封信回去最为合适，因为当采从达赖喇嘛那里带过来的文件表明他是经过达赖喇嘛授权的代表。¹⁰¹ 当采的信可以用简单的语言重申美国此前的声明，并且可以包含当采本人

101. 实际上，美国应该已经从自己的文件中得知达赖喇嘛已经在1951年7月指示当采从加尔各答返回亚东；因此，他很明显不是达赖喇嘛授权的代表。美国国家档案馆，793B.00/7-351，美国驻加尔各答总领事给美国国务卿的电报，电报号13，1951年7月3日。

的具体建议。当采了解拉萨的情况，所以他应该通过对马上需要采取的措施提出建议来帮助达赖喇嘛。例如，达赖喇嘛也许可以到西藏的某些圣地去朝圣，从那里他可以向南逃往印度。当然这个具体的建议也未必可行。

国务院也许还可以……给达赖喇嘛送去例如最新式的照相器材和彩色摄像机等礼物，他可能会非常感兴趣。根据以前的经验来看，大使馆认为后一个建议虽然看起来很微不足道，但却是达赖喇嘛和美国友谊的具体体现，会起到它们的金钱成本所无法起到的效果……

鲍尔斯¹⁰²

按照这些在印度的美国外交官的想法，当采最终以藏文信的形式发出新的信息。信上确认了“我们原有的立场——当您出来之后向您提供毫无保留的援助和支持。”信中还说，尽管不可能用飞机把达赖喇嘛从拉萨带出来，但是一旦需要为他的逃离提供帮助，美国会尽最大的努力。1951年11月26日，这封由当采发出的信送到加尔各答总领馆，再从那里发往西藏。¹⁰³ 美国政府把当采和嘉乐以及在印度的哈雷和帕特森等西方人士的话信以为真，认为达赖喇嘛真的仍然意图流亡，所以寄望这个新的信息可以使天平倾向美国一边。现在他们焦急地等待着结果。

与此同时，中国人在拉萨的势力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因为中国军队的主力于1951年10月26日进入拉萨。这支部队大约六千人，来自于十八军，指挥官是张国华将军。一个多月之后的12月1日，另一支来自西北局第一野战军的1,200人部队在范明的指挥下与他们在拉萨会师。这就使解放军在拉萨和卫藏的总人数达到八千左右。解放军现在在人数上超过了藏军。然而，尽管大量军队的涌入给中国方面带来军事上的安全，但是却进一步加剧了与司曹之间的紧张气氛，正如我们将要在下一章看到的，这让中国人在粮食问题上陷入异常困难的境地。

102. 美国国务院，1983: 1848-49，793B.00/11-1551，驻印度大使鲍尔斯给美国国务卿的电报，1951年11月15日。

103. 美国国务院，1983: 1849，驻印度大使鲍尔斯给美国国务卿的电报的注释，1951年11月15日。

第九章

粮食危机

1951年年底的时候，拉萨的人口较少，大约只有三万人。¹ 所以9月到12月三个月内超过八千人的中国军队和官员的涌入，实际上代表了27%增幅的人口急剧增长。在住宿方面，这不会造成大的麻烦，因为西藏政府把市区南部拉萨河（吉曲）沿岸几处大的空旷区域给了中国人，他们可以在那里安营。²

官员的住所和办公场所也没有多大问题。前面已经提到，当张经武刚到拉萨的时候，西藏政府把它拥有的原属赤门家的老宅给了张经武，而这实际上超出了基本的需求。对于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到达拉萨的王其梅和张国华，中国人通过租借和购买房屋来满足他们新增的住房需求。平汪对这个问题作了解释：

随着这些官员的涌入，我们意识到必须要有很多的房屋，所以我受命去租一间或者更多间房子。因为拉萨市中心好的地产都是属于贵族和寺院的，所以不容易找到合适的地方。但幸运的是我设法租到我的老朋友宇妥的房子。那幢房子位于市中心，而且足够大，能容纳张国华、我自己和绝大部分新来的官员居住，并且能够留下足够大的空间来储藏我们的粮食。张经武仍然住在赤门的房子里。

-
1. 拉森（Larsen）和辛丁-拉森（Sinding-Larsen），2001: 15；也见新华社1999年2月23日的稿件。这个数字不包括色拉寺和哲蚌寺（两寺分别距拉萨城3英里和5英里）的大约15,000名僧侣。
 2. 西藏政府把“新代本司令部”（藏语：玛噶萨巴，*magar sarpa*）和朵森格这两个主要地区的一些地方给了中国人。朵森格临近宇门（Yamön），藏军噶当（Ngadang）代本团就驻扎在那里。

此后不久，我们商定要找更多的房子，而且我们认为最好是买房子而不是租房子。于是我再次花了大量的时间去看房，去跟有合适房产的家庭谈。不过，这次并没有花多少时间就买下了康巴大商人桑都仓家一座漂亮的房子……这座房子成了西藏工委正式的办公楼。（因为这座房子是私人所有的，所有我们在购买之前不需要西藏政府的同意。我们直接把房款给房主，然后他给我们产权证明。）在所有的交易中，我们都用大洋付款，因为西藏人不接受中国纸钞。³

然而，中国军人已经有数千，为这些人准备食物就不是那么简单的问题了，处理起来也很不顺利。

■ 筹备粮草

解放军每名士兵每天的口粮定量为 2 斤（2.2 磅），拉萨有大约八千名解放军，口粮需求是每天大约 16,000 斤，每月 48 万斤，每年 570 万斤。另外，中国人有 1,200 匹马和骡子，每匹每天需要 3 斤草料，所以它们每年另外需要 130 万斤草料。⁴ 除此之外，他们还需要各种各样的物资，比如肉类、食用油、茶叶、柴禾以及蔬菜，而且很急需，因为主力部队到达拉萨时食物实际上已经没有剩余了。

北京从一开始就很担心这个问题，这一点并不奇怪。虽然中国共产党占据绝对的军事优势，但是他们“和平”解放的基本政治方针使他们不能简单地通过武力拿到他们所需要的东西。正因为这个原因，他们知道在处理食物问题时可能会很困难，也在设法通过不同的途径来应对这个问题。

北京在这个问题上的长远打算是在中国西部和西藏之间修筑起一个稳固的公路网络。北京也正确地认识到，在这个公路网络修筑完成之前，在西藏的解放军不会有绝对的安全。所以中国人立即展开了修路攻势，修筑

3. 引自戈尔斯坦、道伟喜饶和司本石初，2004: 167–68。但是拉鲁说噶厦同房子的主人商量过（拉鲁，1993: 252）。

4. 乐于泓，1985: 294–95，1951 年 10 月 29 日条目。

两条直通拉萨的公路。一条大约 1,000 公里，从昌都经由江达到拉萨（南线）；另一条从青海经由那曲到拉萨（北线）。

南线于 1951 年 5 月 6 日开工。当时，解放军开始把公路从西康省朝着西藏边界延伸，打算在昌都解放之后延伸到那里。来自十八军 53 师和 54 师的 31,000 多名作战人员和 9,000 多名技术人员及工人一起被分配来修筑的这条公路，就是今天中国人所称的川藏公路。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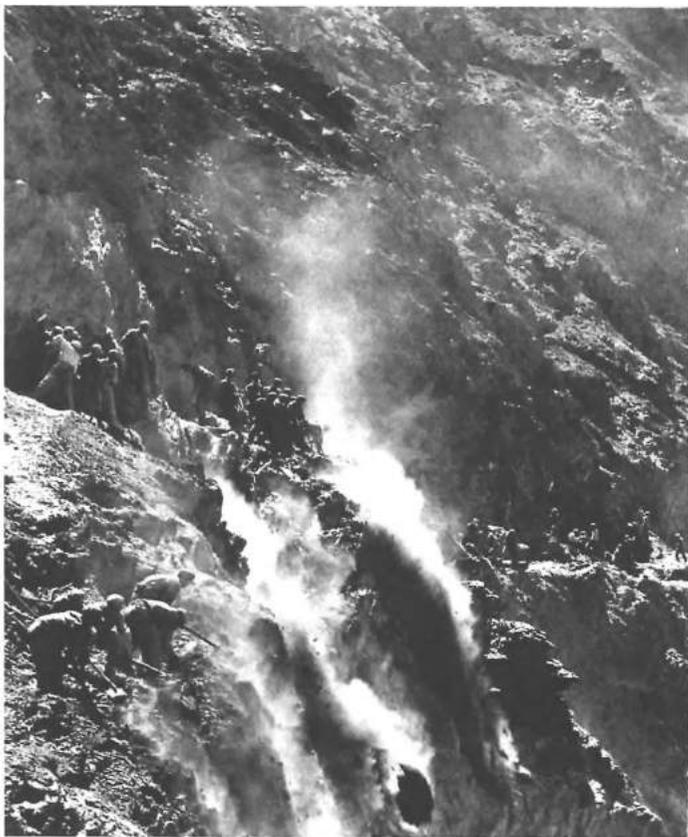


图 11：修建从昌都到拉萨的公路。照片来源：陈宗烈

5. 赵慎应，1998：55-57；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1990，1951 年 5 月条目。

最初，中国工程师认为这条公路可以在1952年年底前修筑完毕。但是高海拔和崎岖的地形使工程的进展比预期要缓慢得多。⁶ 公路的最低点海拔11,500英尺，最高点17,500英尺，而且整条公路穿过六条海拔16,500英尺以上的山脉。⁷ 因此，甚至在张国华的军队到达拉萨之前，对完工日期的初步估计就已经显得很脱离现实了。这促使毛泽东在1951年9月13日下令对战略方针作出重大调整，指示西南局把口粮生产放在和修路同等重要的位置上来抓。

小平同志：我先遣支队已到拉萨，张国华所率部队不久亦可到太昭、拉萨一线。关于这些部队一九五一年的任务是以修筑公路为主，还是以生产粮食解决给养为主的问题，张国华〔1951年〕在京时曾对我说应该是筑路而不是生产。张并认为明年一年即可修通甘孜至拉萨公路。但据后来所得情报，明年〔1952年〕修通是不可能的，也许需要两年至三年才能修通。似此，如果我军不从事生产，则给养将成严重问题，靠政府供给，或靠购买，则对藏民影响不好。因此，请你考虑是否可以定为〔十八军〕生产与筑路并重，即令甘孜到拉萨沿途所驻部队以一部分担任生产，以一部分担任筑路，在生产季节以较多的人从事生产，在其他季节则以全力筑路。此点现在就应确定，以便冬季有所准备。⁸

正如我将要在这一章里介绍的，粮食生产成为解放军在拉萨和其他进驻地区的优先任务。

毛泽东也指示十八军迅速把部队从拉萨分遣到其他地区，以减少对拉萨的食物需求。毛泽东在上面同一份电报中说明了这一点：

此外，关于兵力分布问题，似应在几个月内，在日喀则和日喀则到拉萨的中间地点各派一部分军队进驻，并在这些地方布置生产，使班禅能回后藏，并便于展开工作。原先决定明年〔西南局的部队〕不进驻上述各点的计划似应改变，惟进驻时间可在张国华到拉萨和

6. 比如说昌都部分，到了1952年11月底还没有竣工。

7. 赵慎应，1998：55-57；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1990，1951年5月条目。

8. 《对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未出版的手记）》，出版日期不明；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1995，1951年9月13日条目也提到了毛泽东的这项命令。

西藏政府的关系完全弄好之后，即在三四个月之后为适宜。以上望复。⁹

但是在 1951 年至 1952 年之间，自己生产粮食并不能解决拉萨部队口粮供应的燃眉之急。很明显，一个替代方案是利用牦牛从中国内地诸如四川或者青海等地区运入粮食，¹⁰但这也不是立即可行。从中国内地往西藏运输一个月所需的粮食补给至少需要 5,000 头牦牛，在简陋的小道上走一个来回大约需要三个月的时间，而且这些小道在冬天经常不能通行。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中国人知道在短期内食物和柴禾将必须在西藏购买。为了这个目的，他们用牦牛驮来上百驮整箱的银币大洋。不过，尽管银币的供应几乎无穷无尽，筹措粮食却极度困难。

西藏的经济是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它没有全国范围的粮食交易网络。多出来的粮食几乎完全掌握在一群人数相对较少的封建贵族、寺院领主（和政府）手中，这些人一般会把他们每年剩余的产出储存起来以备后用。因为西藏的气候很干燥，所以谷物可以储存数年（甚至数十年）也不会坏。在拉萨没有自己的庄园的人（即工匠、工人、小商贩、大商人以及僧官）要么直接从领主手中购买，要么从很少的一些商店购买。这些商店从周边的农村地区购得青稞，加工成糌粑拿来出售，但是它们所购有限，不可能满足新来的数千人的中国军队和官员所形成的巨大的口粮需求。

因此中国方面最初寻求西藏政府的帮助，并且在（主力部队到来之前的）9 月份和 10 月份多次向西藏政府提出这个问题，建议设立一个联合机构来监督粮食的征购。但是西藏政府在这个问题上推三阻四。因为在 9 月和 10 月拉萨只有六百名士兵和官员，而且一些像拉鲁、阿沛和擦绒这样的大贵族向他们伸出援手，把自己私仓里的粮食卖给他们，所以那时中国人能够获得他们所需的粮食。¹¹但是十八军的主力一到拉萨，一场危机就迅速发生了，原因是司曹领导的西藏政府仍然在向解放军提供帮助的问

-
9. 《对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未出版的手记）》，出版日期不明。这项调整造成了没有预料到的后果，即造成党内的不合。这一点将会在以后的章节中讨论。
 10. 西藏成了中国的一部分，那么称中国的汉族地区为“中国”就意味着说西藏不是中国的一部分，所以表示内陆地区的“内地”一词就被用来称呼西藏以外的中国。
 11. 在先遣支队与解放军主力部队到达之间的这段时间里，西藏政府仅仅提供了大约 5,000 斤粮食（乐于泓，1985: 294-95，1951 年 10 月 29 日条目）。

题上推三阻四。当然，考虑到司曹的态度这并不令人惊奇，司曹最不愿意的就是让中国军队在拉萨轻易立足。

利用粮食（和柴禾）问题向侵略者——中国——施压，迫使他们在西藏只保留一小部分军队。这个招数西藏方面必定会用，也在历史上用过很多次。中国人对这一点非常清楚，于是在《十七条协议》中明确列入第二条和第十六条，以防备这一招。第二条说：“西藏地方政府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巩固国防。”第十六条更加明确：“西藏地方政府应协助人民解放军购买和运输粮秣及其他日用品。”尽管司曹不愿意积极配合，但他们还是小心谨慎地避免公开拒绝帮助或者命令政府官员不予合作。然而，他们不断地向中国人抱怨，说西藏的粮食产量不足以支持这样一大群军队。而且正如前面提到的，在制定稳定粮食供应的计划时他们推三阻四。一位西藏官员回忆道：“没有人公开说你不能卖给中国人，但是个人看到政府的政策是不愿意卖〔粮食〕，于是就效仿了。”¹² 另一位西藏官员说：“大贵族……有很多粮食，但是他们每次只卖很少一点给中国人。”¹³

对于10月26日到达的数千解放军官兵来说，他们直接面对的问题就是饥饿，因为西藏政府继续在搪塞，而中国人手头的给养一直在减少。10月29日，也就是十八军主力部队到达拉萨三天之后，噶厦通知中国人他们制定了一项计划。根据这项计划，最富有的寺院领主（例如哲蚌寺、色拉寺和甘丹寺，以及三大转世喇嘛功德林、大札和热振）不久会向他们提供粮食。但是这项计划从来没有付诸实施过。

两天之后的10月31日，中国人去找阿沛商讨食物短缺的问题。阿沛带来一些好消息，他说噶厦刚刚命令拉萨附近的十三个地区向中国人提供10,000“克”粮食（大约280,000斤，或者可以满足21天的需求）。¹⁴ 中国人最终是否收到这些粮食，这一点并不清楚。阿沛还告诉他们政府愿意马上从布达拉宫底下的粮仓内取出5,000“克”（大约140,000斤）粮食出售给他们，但是坏消息是这些粮食已经在那里存放了五十年。不过，阿沛

12. 夏札，访问记，1992，拉萨。

13. 昌松，访问记，1992，拉萨。

14. “克”是西藏历史上使用的度量体积的基本单位，所以一“克”不同物品的重量是不一样的。但是一“克”青稞大约等于31磅。

安慰他们说这些粮食中可能有一半仍然可以食用。中国人毫不犹豫马上前去品尝这些粮食的样品，随后在第二天告诉阿沛这些粮食完全不能食用，而**他们自己的粮食存量只能维持三天多的时间**。对此阿沛并不认同，他回答说尽管上面的粮食可能不能吃，但是他们应该回去再尝一尝底部的粮食，因为有人告诉他那些粮食是可以吃的。阿沛还说他们已经召集了一些僧官，请求他们借一些粮食给中国人，直到危机解除。他个人担保偿还这些粮食。¹⁵

与此同时，噶厦再次声称拉萨没有足够的粮食供应一支庞大的军队，所以强烈建议中国人尽快把他们的部队分遣到边境去。乐于泓对西藏人所谓的“粮食短缺”说辞很不以为然，他说：“你们让粮食在粮仓里放了五十年，把其中很大一部分都放坏了。而且一些贵族领主家里有数百万吨的粮食，所以你们怎么能说粮食短缺呢？”¹⁶但是正如前面提到的，毛泽东已经命令解放军分散部署，所以在11月2日，他们通知噶厦他们正把四千到五千人的部队派到拉萨之外的地区去。噶厦立刻同意允许这些部队购买存放在他们要去的地方政府粮仓中的粮食，而且现在也承认如果在拉萨的军队和人员数量不超过四千，那么将有足够的粮食来满足中国方面一年的需求。¹⁷因为拉萨的食物供应极度短缺，所以中国军队的重新部署非常迅速。在11月11日，154团已经到达江孜。¹⁸

除了向西藏政府施压之外，中国人也把食物定额急剧减少到每人每天一斤，也就是原来计划的一半。十八军文工团的一名藏族团员回忆了严重的食物短缺对他这样的普通士兵的影响。

在解放军刚刚到达的时候，我们没有多少粮食，没有大米或青稞吃。那时，阿沛……和擦绒卖给我们黑豆（藏语：*trema*），我们就吃这个。我们没有柴禾来烤这些东西，而且即使能烤我们也没有碾子把它们磨成粉，所以我们吃了半年的煮豆子〔对西藏人来说，黑

15. 乐于泓，1985: 296–300，1951年10月31日和11月1日条目。

16. 乐于泓，1985: 300–301，1951年11月2日条目。

17. 乐于泓，1985: 300–301，1951年11月2日条目。在重新部署之后，大约有两千部队驻守在拉萨，但是随着西北局部队的到达，在拉萨的部队人数增加到大约四千人。

18. 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1990，1951年11月11日条目。

豆是品质低劣的食物〕。这很不好吃，但是令人惊奇的是，我们团里的歌手因为吃了这些糟糕的食物嗓音变得更好了。由于这个原因，我们大家开始称呼她们“沙玛嘉林 (*Trema gyaling*)” (“黑豆簧管”)——尽管吃的是煮豆子，但是她们的嗓音却像西藏的双簧管一样甜美。¹⁹

由于每天的食物是如此之少，以至于中国人要挖野菜来充饥。²⁰ 例如一个叫杨一真的人说：“大家饿着肚子……刨出一些麻芋子。这种植物根部圆圆的，形似土豆，但毒性很大。人饿急了什么都想吃，有的同志便拣起麻芋子吃起来，一吃下去，马上嘴唇麻木，接着咽喉红肿，必须立即送到医院抢救。”²¹ 这让中国官员很愤懑，要知道，这些久经战场的解放军官员习惯于用武力解决问题，当然受不了被这些战败的贵族和僧官羞辱。但是在西藏，他们当然不能使用武力。

西藏的外交局局长柳霞和另一个负责和中国人联络的官员回忆了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反映了中国人的这种克制。

没过多久，〔中国方面的〕所有柴禾都用光了。那时，在罗堆林卡 (Nortölinga) 有很茂密的树林。如果中国人像其他人一样，他们会马上把树砍了〔当柴烧〕。但是中国的士兵很守纪律，所以他们一棵树都不碰，就这样两三天都没有热水喝。开始的时候，他们就像这样。²²

中国人和司曹之间的紧张局面迅速加剧，发生了一系列严重的口角之争。例如在他们的一次会面中，在答复张国华提出的帮助筹措粮食的请求时，鲁康娃说西藏这个国家很贫穷，贫穷得别说几千中国人，就连自己人也没有足够的粮食来养活。接着鲁康娃反问张国华为什么带这么多军队来这里。随着讨论逐渐变得激烈，鲁康娃又一次辛辣地讽刺道：“张司令，饿肚子要比打败仗更难受吧？”²³ 于是，尽管毛泽东一再叮嘱采取温和、

19. 降边嘉措，访问记，1993，北京。

20. 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1991: 202–9。

21. 吉柚权，1993a: 395–96。

22. 对柳霞的访问，1981年10月29日，由达兰萨拉的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新闻办公室进行。

23. 张国华，1983: 212。这句话很有名，而且据西藏官员们说，鲁康娃确实说过这句话。

渐进的方针，但是在主力部队到达之后的几个月里，司曹和中国领导层的关系不但没有改善，反而更加恶化了。

有关粮食危机的一个最重要的疑问是，中国人的粮食需求是否真的像司曹声称的那样超出了西藏政府的供应能力。中国人所要求的每月 500,000 斤粮食看起来是个很大的数目，但是要满足它并没有什么大问题，至少在最初的两三年是这样的，因为他们可以要求贵族和宗教领主把他们**储存的**粮食卖给中国人。这一点似乎是没有没什么可怀疑的，拿谢林这个中等贵族家庭来说，他家有四块领地，每年有 150,000 斤青稞的收成，其中大部分都是用来出售的。他家还在他们的粮仓里储存了 42,000 斤的粮食。²⁴ 拉鲁等最大的贵族家庭每年从他们的领地上收获的粮食大约在 550,000 斤到 850,000 斤之间，他们自己的粮仓里还有比这个数目多得多的存粮。拉鲁在 1951 年年底从他的粮仓里卖了 420,000 斤粮食给解放军。²⁵ 其他很多贵族，比如阿沛，也像他这样做了。但是正如前面提到的，这种事做得太多会受到压力，就像拉鲁说的：“很多人卖了一些粮食给中国人，但是碍于鲁康娃的态度他们不敢卖太多。”²⁶

除了贵族之外，一些大的寺院和八九个转世喇嘛的大型寺院商号（拉让），比如功德林和热振，手上都有大量的粮食，可以轻而易举地卖出比拉鲁多得多的粮食。当然，这还没有考虑西藏政府自己的领地每年的产出和政府分散在各地的粮仓储量。根据拉鲁的估计，那时这些加起来有 2,800,000 斤，而实际上很可能更多。²⁷ 因此从整个西藏来看，现有的剩余粮食似乎完全可以满足中国人的短期需求。所以 1951 年年底和接下来 1952 年发生的严重粮食短缺很明显是人为造成的。假如司曹允许设立联合采购办公室，在大量军队到达之前组织从西藏其他地区购买和运进粮食，那么就不会出现什么问题。即使出现了，问题也不会很大。

中国人严重的粮食问题促使阿沛成功地推动设立一个新的机构。这个机构隶属于噶厦，其职责是更有效地处理中国人的安置和食宿相关的问题，也包括解放军的粮食问题。如果需要新的命令和规章，这个机构会起

24. 谢林·次旺朗杰，访问记，2000，克利夫兰，俄亥俄州。

25. 拉鲁，访问记，1993，拉萨。

26. 拉鲁，访问记，1993。

27. 拉鲁，访问记，1993。

草出来交给噶厦盖章通过。这个机构在 10 月底达赖喇嘛正式接受《十七条协议》之后很快成立。因为它开会的地点不在噶厦，而在大昭寺一个叫索穷（Surjong）的房间里，所以被称为索穷噶厦。²⁸ 索穷噶厦包括三位噶伦：阿沛、夏苏和洞波，其中阿沛是主任委员。阿沛对西藏政府不能有效地同中国人合作有很深的挫败感，而这个机构的出现满足了他一贯的主张，²⁹ 给他提供了一种机制，使他可以迅速地处理中国人的需求，只要这些需求属于常规性需求，比如粮食需求。³⁰

索穷噶厦采取了很多措施为中国军队和官员筹措粮食，比如，它对西藏不同地区政府粮仓以及富裕寺院和上层贵族的存粮情况展开调查。

僧官强基（Changkyim，孜本夏格巴的弟弟）在 1952 年奉索穷噶厦之命筹措粮食，他回忆说自己在政府的粮仓里找到的粮食远远多于在册的数目。

1951 年在帕里的时候，我收到通知说班禅喇嘛将要从中国来，去扎什伦布寺……也会有一些……士兵到日喀则来，所以我们必须给他们提供大量的粮食让他们做糌粑和他们的马的草料。

那时我手上掌管着十三个宗和庄园，上面通知我们〔他和他的副手〕去这些地方检查粮仓存放了多少粮食，我们也要用这些粮食来供应拉让〔这里指的是班禅喇嘛下面的管理机构〕的需要。那时，我们向拉让提供了大约 100,000 “克”（2,800,000 斤）的粮食。上面也通知我们中国人想要多少就给他们多少。中国人说他们会付钱的，但是当时我们只让他们打收条，不知道他们以后会不会付钱。

……上面告诉我〔筹备粮食的〕主要办事机构要设在日喀则。那时我们通过无线电同噶厦联络，为此我们收到一套密码。……上

-
28. 吉柚权，1993a: 267。乐于泓日记（1985: 297）中的 1951 年 10 月 31 日条目提到这个机构，但是其他一些人说它直到班禅喇嘛于 1952 年 4 月到达拉萨之后才开始办公。乐于泓的说法似乎是正确的。祖拉康（即大昭寺——译注）是拉萨主要的大寺，它包括大量的佛堂和觉康（Jokhang），觉康是供奉西藏最著名的佛像的地点。著名的八廓街环绕着祖拉康。除了宗教活动之外，祖拉康也是一些政府机构的办公地点，比如噶厦过去就曾经在这里办公。
29. 夏噶娃（夏苏），1990: 344–45。这个小型的噶厦也包括噶厦的两位贵族官员噶仲崔科和噶准桑林，他们俩都在昌都和阿沛共过事，都觉得变革可以接受，也愿意同中国人合作。
30. 夏噶娃（夏苏），1990: 344–45。

面说，如果〔政府粮仓的〕粮食不够，我要到附近的地区按当时的市价购买。但是库存的粮食多得很，足够供应他们的了。在有些宗，很多粮食库存没有登记在册。我们检查了所有的记录，发现还余下很大一部分粮食。³¹

索穷噶厦于是调查清楚粮食的现状，并在第二年卖给解放军很大数量的粮食。



图 12：几名贵族开会商讨为解放军提供粮食的事宜。左起：不知名的中国干部、平汪、阿沛（站立者）、不知名者、江乐金、然巴台吉、不知名者。照片来源：江乐金家族

对于中国方面来说，粮食危机不仅是一场补给灾难，也是一场公关危机。这是因为它造成的通货膨胀使中国人尽力展现的光辉形象迅速褪色，并且激怒了拉萨的居民。中国方面从一开始就担心他们的到来可能会造成物价飞涨，但是正如我们看到的，他们没有能力说服西藏政府采取措施阻

31. 强基，访问记，1992，达兰萨拉。

止这种情况的发生。于是就在解放军告诉西藏人他们是来帮助他们的同时，拉萨的粮食价格飞涨，生活成本迅速提高。通货膨胀的速度和程度是惊人的。例如，在中国人刚刚到达的 1951 年 8 月，拉萨每“克”粮食的价格大约是 15 或者 16 桑吉，³² 但是到了 1951 年 11 月，这个价格就翻倍到 30 桑吉，接着在 1952 年 4 月又几乎再次翻倍。³³ 印度驻拉萨代表处在 1951 年年末发给新德里的月度报告中提到通货膨胀的影响：“大量中国军队的到来已经扰乱当地的经济。通胀不仅仅影响粮食的价格，也影响酥油、肉类和柴禾的价格。”³⁴

此外，拉萨当时出现的两首辛辣的街头歌谣也对此作出了描述。

青稞卖价五十两，
酥油牛肉无价宝。
毛主席啊毛主席！
我们穷汉如何好？³⁵

毛主席啊解放咱，
酥油变成一百两，
可怜可怜真可怜，
所有东西都在涨。³⁶

中国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缓解通货膨胀，但是没有取得多大的成效。其中一项措施是在部队中实行统一采购制度，要求军队所有的采购集中进行。另外一项措施是禁止中方人员自行在市场上购买物品。³⁷ 十八军文工团的女团员于德华回忆了她的亲身经历。

32. 西藏拥有自己的货币，这种货币一直使用到 1959 年暴动为止。

33. 拉鲁，访问记，1993。印度驻拉萨代表处发给新德里的 1952 年 3 月至 4 月的月度报告同样提到价格从 16 桑吉涨到 60 桑吉（每“克”）（美国国家档案馆，793B.00/6-2752）。

34. 美国国家档案馆，793B.00/2-652，印度驻拉萨代表处发出的 1951 年 11 月 16 日至 12 月 15 日的月度报告副本。

35. 吉柚权，1993a: 385。吉柚权没有提供这首歌谣的原始藏文版本。

36. 藏语：*Maogi jingdrö dangne / marla gyalor chasong / hamba tshando kabo / ngörig gangga pharsong*。合尊·拉让强佐（Lhatsün Labrang Chandzö），访问记，1992，达兰萨拉。

37. 赵慎应，1998: 42。

那时候噶厦卡我们，不卖粮食给我们。野菜也找不到，因为拉萨一到冬天根本看不见一点野菜。我们经常饿得嘴里直流清水，眼睛直冒金星。进入拉萨后，当时女同志因为有特殊情况，一人发两块银元买卫生纸，其他什么钱都不发。我们看见街上有大饼卖，就采取其他办法解决特殊问题，将这个钱节约下来想买一点东西吃。虽然当时纪律严，不准在街上买吃的东西，但我饿得实在无法忍受，有一天便偷偷上街买了一挎包面饼，背着就往文工团跑。边跑边闻着饼的香味直流口水，在路上想吃又不敢吃，怕被上级发现。到文工团打开挎包把饼掏出来正分给大家时，政委来了，问是谁买回来的饼，我承认了。政委把饼没收了（听说又退给卖饼的了），我还因此受了处分。³⁸

然而，中国人确实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开始自己生产粮食。并且他们还制定了有效的计划，从西藏外部，尤其是印度，输入尽可能多的粮食进藏。

■ 解放军开荒

在张国华把队伍分遣出拉萨以缓解食物压力的同时，他得到西藏政府的同意，把拉萨西部一块叫罗堆林卡的荒地开垦出来种粮食。罗堆林卡原来是为罗布林卡的马厩供应牧草的地方，噶厦答应给他们这块地时已经是年底了，但是中国方面不想等到第二年春天，担心如果等第二年春天将会失去 1952 年收获的时机。所以从 1951 年 11 月 25 日开始，解放军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来改造这片沼泽地，为春天的播种做准备。大约 70% 的解放军士兵和干部在这块土地上劳动，在劳动的同时还要经常忍受饥饿。³⁹

前面提到过的解放军文工团的藏族团员降边嘉措回忆了那时的劳动情形：“在 1951 年年末，我们首先要翻耕冰冻的土地，把荆棘除去，施上肥。我们从拉萨的厕所里取来粪肥，也从路边收集骨头烧了之后做肥料。我们收集了大量的肥料。”⁴⁰ 然而，解放军的一些行为确实让西藏人很难接受，比如说他们用大街上收集的人和狗的粪便做肥料。烧骨头的烟也令西藏人抱怨，说这造成污染，冒犯了拉萨的保护神。⁴¹ 一名西藏人说：

38. 吉柚权，1993a: 384–85。

39. 吉柚权，1993a: 393。

40. 降边嘉措，访问记，1993。

41. 扎西次仁，访问记，1993，拉萨。

他们做了一些我们一般不会做的事。〔西藏人和中国人的〕行为方式很不相容。他们说他们是来帮助西藏人民的，但是他们却在拉萨的大街小巷收集〔人的〕粪便施到他们的菜地里，然后说这是在发展西藏。所以不管他们做了什么，我们总是看到他们不好的方面，没有看到他们有什么地方是值得学习的。⁴²

中国人的这些行为引起了众多的嘲弄，例如下面的两首街头讽刺歌谣：

因为有好的柴禾，
我们不需要狗粪。
因为有达赖喇嘛，
所以不需要解放。⁴³

地上如长黄蘑菇，
无人去捡白蘑菇。
因为有达赖喇嘛，
所以不需要解放。⁴⁴

在十七天里，中国的干部战士基本上是三班倒地劳动，开垦了超过2,300亩（153公顷）荒地。⁴⁵ 在第二年的3月份，所有军队几乎全体动员，开垦更多的荒地并播种作物。于是在1952年，解放军耕种了超过3,000亩（200公顷）的粮食和蔬菜。⁴⁶ 中国方面的材料说中国军队1952年在全西藏开垦种植了14,000亩（934公顷）耕地，收获了380,000公斤青稞和大约1,000,000公斤蔬菜，⁴⁷ 估计可以满足他们全部的蔬菜需求和三成的粮食需求。⁴⁸

42. 蒲嘉巴 (Phu Gyagpa)，访问记，1991，达兰萨拉。

43. 藏语：*meshing shagpa shane / kyigya bülong mindu / dale lama shane / jingdrü donglong mindu*。

44. 藏语：*bangle sersha shane / garsha gognyen mindu / dale lama shane / jingdrü donglong mindu*。札登，访问记，1992；降边嘉措，访问记，1993。

45. 一亩等于0.01英亩。

46. 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1990，1951年11月26日条目。

47. 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1991: 194–202。

48. 赵慎应，1998: 70。



图 13：1952 年解放军在拉萨开垦荒地。图片来源：陈宗烈

与此同时，中国人也设法从西藏外部输入粮食。因为从四川和青海通往西藏的传统骡马道既远又难走，所以中国人短期内可以运进拉萨的物资很有限，例如 1952 年的情况就是这样。因此中国人决定设法从中国经印度向西藏运输物资。印度不仅比四川和青海更靠近拉萨，而且还有很发达的骡队贸易，因为西藏大部分的羊毛都是通过印度的噶伦堡出口的。

■ 进口大米

1951 年年末，中国人向印度政府请求通过印度向西藏转运大米。中国人最初建议从中国南部的广东用轮船运输 2,800,000 磅大米到西孟加拉，然后从那里经过噶伦堡和锡金运到西藏。⁴⁹ 一份美国的报告说西藏政府在

49. 李觉，1991: 45。

了解到此事之后要求印度政府加以拒绝，理由是西藏政府仍然希望向中国施压，使他们把军队数量控制在最小的范围内。但是西藏政府提出这样的官方请求的说法似乎不太可信，因为这样做已经严重地背离了《十七条协议》，而且印度代表处的月度报告和中国方面的任何材料都没有提到这件事。⁵⁰ 印度政府自身当然不希望大量的中国军队进驻西藏，但是又确实希望同中国人保持良好的关系，所以最终同意向北京提供方便，条件是中国帮助印度解决其自身的大米短缺问题。中国人答应了这个条件。于是印度政府允许中国人把一部分的广东大米运到西藏，而将剩下的大米出售给印度。

一位印度官员在1952年7月向美国驻加尔各答总领馆解释了整个交易：“刚刚由中国运抵加尔各答的大米已经被分为两部分，一部分1,000吨（大约两百万磅）（实际数字似乎是3,500吨）运去西藏，另一部分6,000吨已经出售给印度政府来满足西孟加拉的需求。”⁵¹ 运往西藏的大米在起运前以一蒙特（maund）为单位分装成包，以方便骡马运输。⁵² 这批大米先通过铁路从加尔各答运到噶伦堡附近的西里古里（Siliguri），然后从那里用畜力运到西藏。

这批大米将会极大地减少中国人对西藏粮食的依赖，从而巩固他们在西藏的存在。这就是这批大米的政治效果，中国人知道这一点。如果能尽快运到拉萨的话，这个效果会更加显著。从1952年4月开始，中国人就着手筹划运输这批大米。他们把西藏南部小城帕里作为从噶伦堡来的大米的转运站。⁵³ 首先用骡子（或者部分用人力）从印度运到帕里，从帕里用马车（通过解放军刚刚修筑好的碎石路）运到江孜，从江孜用牦牛运到日喀则，再由日喀则运到曲水，最终由曲水运到拉萨。⁵⁴ 在中国人的请求下，噶厦同意帮助中国人筹备运输工具（即驮畜）。⁵⁵

50. 美国国家档案馆，793B.00/7-252，锡金公主库库拉和领事索兰的谈话备忘录，1952年6月24日。

51. 美国国家档案馆，793B.00/7-2952，与驻加尔各答的锡金杜巴（Durbar）联络办公室的森（J. K. Sen）谈话的备忘录，1952年7月29日。

52. 一蒙特大约等于82.3磅。大米运输的包装一般情况下都比较大，有二蒙特。

53. 吉柚权，1993a: 414。

54. 吉柚权，1993a: 414。

55. 吉柚权，1993a: 414。



图 14： 1952 年夏第一季萝卜试验田收割。照片来源：陈宗烈

1952 年 6 月，中国人派两名官员去印度接收这批物资。这两名官员之一的李觉回忆了这项任务。

〔西藏〕工委、军区决定派我执行这一任务。1952 年 6 月 18 日，我与罗家镐同志由拉萨出发，途经锡金首都甘托克，到达印度加尔各答。我们与使领馆同志一道，在印度政府的合作下，经过 40 多天的努力，完成了接运任务，并采购了一批油脂、布匹、药品、鞋等物资，以及种牛、种猪、种鸡和苹果树苗，初步打开了中印边境贸易。⁵⁶

运输 1,000 到 3,500 吨大米翻越喜马拉雅山脉是一项巨大的挑战。据一名印度官员估计，一头骡子能驮大约 166 磅，所以 150 头骡子一天可以从甘托克运出 24,700 磅的大米。但是到拉萨的路途单程需要大约十六天，⁵⁷

56. 李觉，1991: 45。

57. 由甘托克到乃堆拉山口（Nathula Pass）需要两天，由乃堆拉到帕里需要四天，由帕里到江孜需要四天，由江孜到拉萨需要八天。如今卡车从江孜开到拉萨大约需要六到七个小时。

所以按照传统的方式一个 150 头骡子的运输队要花上大约一个月时间走一个来回。因此，为了尽可能快地运输大米，需要大量骡子不间断地运输——150 头骡子为一队，一共三十队（6,000 头骡子）交替着运输，使每天货物一准备好就能马上运出去。一般情况下，由甘托克到亚东的小路只有在冬天才能运送货物，因为夏天这一带暴雨成灾，而且流行疟疾。但是因为中国人需要立即把这批大米运出去，所以不得不为劳力和畜力支付很高的工资。美国的一份报告说这些劳力“几乎是把奎宁当饭吃”。⁵⁸

因为到 1952 年 7 月底货物还没有起运，所以这批大米要到这一年初秋才能开始运抵拉萨。英国方面一份 1953 年的报告说，在 1953 年 2 月时已经有 2,000 吨大米运达西藏，其余部分在 1953 年夏天运完。⁵⁹ 张经武在谈到高得难以置信的成本时说：“运费加损耗，确确实实，一斤粮食比一斤银子还贵，我们是在吃‘银子’过日子啊！”⁶⁰

在 1952 年中国人也从四川组织了大规模的运输。根据拉萨西藏工委统计的数据，从 1952 年到 1954 年 5 月，有 28,000,000 磅的食物和物资从昌都通过畜力运进卫藏。昌都地区的数据称在 1951 至 1954 年间运输了 71,000,000 磅的货物，使用了超过 66,900 头牲畜和 15,600 名劳力。⁶¹

从青海也有物资运进。1952 年冬天，中央命令西北局设立一个运输公司运输食物到拉萨。这个公司在 1953 年夏天从内蒙古、宁夏和青海省购买了 26,000 多头骆驼，用这些骆驼从格尔木（位于青海省）向拉萨运输了几百万斤的食物。这些骆驼里面有一半以上在前往拉萨的路上死亡或者受伤。⁶²

然而，尽管付出了最大的努力，在西藏的中国军队在最初的 1951 年冬天和 1952 年春夏几乎完全依赖西藏的粮食供应。在能够从西藏外部运进更多的粮食之前，他们除了挨饿和等待之外别无选择。

58. 美国国家档案馆，美国领事馆 89 号急件，1953 年 7 月 31 日。

59. 美国国家档案馆，793B.00/12-253，驻加尔各答总领事馆的报告。

60. 赵慎应，1995: 85。

61. 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1991: 202。

62. 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1990，1951 年 11 月条目。

■ 西藏商人

除了大规模输入粮食之外，中国人还努力雇佣西藏商人购买和运输其他需要的装备和物资。西藏官员札登（Drakten）回忆了这种贸易。

中国人需要从印度获得大量的建筑材料，例如锤子、铲子、锄头等钢铁制的工具。还有像洗菜盆、洗衣盆那样的金属盆子，苦力们用头顶着带回来。

中国人订下货物，而商人们从加尔各答银行取到钱之后运货物回来。有很多做这种生意的商人，他们的生意做得很好。后来有了学生，这些学生需要诸如笔和本子之类的东西。当然，所有这些中国人需要的东西都是从商人那里订货，由他们带来〔拉萨〕的。⁶³

为了方便这种贸易，中国人设立了一个采购办事处，随后又于 1952 年 1 月在拉萨设立了中国银行的分支机构。贵族和康巴商人家族赢得价值上百万大洋的合同，而且手续也非常简单。因为西藏人可以从位于拉萨的中国银行取得汇票，然后在印度兑现成卢比，兑现的地点可以在噶伦堡也可以在加尔各答的汇丰银行。⁶⁴ 不过很讽刺的是，很多在这种生意上收入颇丰的康巴人后来却成了反中抵抗势力的成员，例如阿乐群则。

一份印度代表处的报告在评价这种贸易时说：“中国人买什么东西都付银元，所以利润很丰厚。……贵族们为中国人提供服务，获利不少。中国官员慷慨得难以想象。……为了获得住房、食物等东西，他们在短时间内花费的金钱数目惊人。”⁶⁵

一份中国方面的材料在评价这种贸易及其政治影响时用共产党的话说：“通过这种贸易，我们不仅买到了所需的部分物资，还有助于把上层人士的利益同祖国的利益联系在了一起。而且，这也有助于让上层人士意识到祖国的强大实力，并开拓了他们同〔中国共产党的〕贸易机构的贸易联系。”⁶⁶

63. 札登，访问记，1992。

64. 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1991: 210。如果支票的金额小于两万卢比，也可以在噶伦堡的一位王先生那里兑现（辛萨·洛桑格勒，访问记，1993，多伦多）。

65. 英国外交部档案，FO371/99659，印度驻拉萨代表处截止 1951 年 12 月 15 日的月度报告。

66. 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1991: 210-11。

当时拉萨街头有两首歌谣对西藏的商人、拉让和贵族们争先恐后地为中国人服务这种行为进行了批判：

中国人从中国来时，
我们称他们为“共产分子，共产分子”。
中国人分发大洋时，
我们称他们为“慷慨的老爷，慷慨的老爷”。⁶⁷

感谢我们的父母共产党，
因为他们挥金如土（或者，大洋像雨一样落下来）。⁶⁸

从消极的方面看，西藏并入中国破坏了西藏大宗羊毛的出口贸易，这是因为美国这个主要的出口市场关上了贸易大门。西藏和美国之间的羊毛贸易规模大得惊人，例如在1950年，西藏向美国出口了4,333,612磅羊毛，价值8,050,218印度卢比（1,690,545美元）。另外553,937磅羊毛出口到英国、意大利和日本等其他国家，价值116,000美元。⁶⁹但是在1951年，这项贸易由于美国财政部立法禁止同共产党中国进行贸易而停止，因为现在西藏已经是中国的一部分。西藏外交局局长柳霞于1951年5月中旬在噶伦堡向美国人提出这个问题，但是没起到什么作用。⁷⁰美国财政部不顾柳霞的抗议和请求，在《十七条协议》签订一周之后禁止从西藏进口羊毛，除非西藏方面能够保证这些羊毛并非来自中国共产党控制的地区。⁷¹美国领事馆说，当大使馆告诉柳霞他们对这个问题无能为力的时候，“柳霞等

67. 藏语：*gyami gyane yongdü / kungdren kungdren sigi / gyami dayan dredü / bombola bombola sigi*。

68. 藏语：*gya kungdren drinjen phamare / ngü dayan sayu rdoyu re*。这首歌谣最初创作于康区，中国人在那里花了大量的大洋在运输和修路上。不过这首歌谣也于1951–52年间在拉萨传诵。

69. 美国国家档案馆，893B.24222/2–1651，美国驻加尔各答领事给美国国务院的电报，1951年2月16日。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西藏人并没有收到这些美元。印度拒绝付美元给西藏人，而是付印度卢比给西藏人（美国国家档案馆，893B.24222/5–1751，驻新德里大使馆给美国国务卿的电报，1951年5月17日）。

70. 美国国家档案馆，893B.24222/5–1751，驻新德里大使馆给美国国务院的电报，1951年5月17日。

71. 美国国家档案馆，893B.24222/5–2251，中国事务部的柯乐博（Clubb）给财政部的迈克迪亚米德（McDiarmid）的电报，1951年5月22日。

人极度怨恨印度、美国和英国”。⁷² 在这个决定公布之后的两周里，美国需求的丧失使西藏羊毛的价格下降了 60%，也使噶伦堡的羊毛贸易陷于停滞。⁷³ 有趣的是，拉萨那些反中的激进分子却把破坏西藏羊毛贸易的责任归咎于中国人而不是美国。事实上，中国人也确实介入了这件事，用高价收购西藏商人的羊毛。中国方面的一份材料说，到 1953 年中国人已经购买了价值四百万大洋的西藏羊毛。⁷⁴

总而言之，解放军在最初的几个月里经历了极为严重的食物短缺。一方面是因为西藏政府不愿意运用权力为解放军筹措给养，另一方面是因为中国人不愿意用强力迫使对方妥协。这两方面共同作用，阻碍了食物的稳定供给。中国人不得不尽可能多地从那些“同情他们的”大庄园主和拉萨的市场上购买粮食。正如双方当初所预见的那样，这造成剧烈的通货膨胀，对中国方面想尽快在拉萨树立起“新中国人”的形象的愿望产生了负面的影响。

另一个在最初的几个月里还没有得到解决的问题是班禅喇嘛的回归，这将会在下一章讨论。

72. 美国国家档案馆，893B.24222/5-2251，驻新德里大使馆给美国国务院的电报，1951年5月17日。

73. 美国国家档案馆，893B.24222/5-2851，驻加尔各答领事给美国国务院的电报，1951年6月28日。

74. 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1991: 210。

第十章

班禅喇嘛和解放军

除了西藏政府内部的分歧之外，班禅喇嘛和达赖喇嘛这两位西藏最大的喇嘛之间长久以来也存在着矛盾和冲突。在整个 1950 年代，这一冲突就像一条危险的激流，将所有事件都卷入其中。而且不仅对西藏方面是这样，对中国方面也是这样，正是这一冲突在西北局和西南局的领导人之间造成一条深深的裂痕。

■ 九世和十世班禅喇嘛在中国

日喀则的扎什伦布寺是班禅喇嘛的主寺。班禅喇嘛拥有大片领地和上万名农奴、牧奴。为了管理他的人民和财产，班禅维持了一套类似政府性质的行政体系，称为拉让·坚赞吞布 (*Labrang gyentsen thombo*)，或者简称为拉让。¹ 这个体系与拉萨的西藏政府相似，也包括俗官和僧官两个方面。最上层的机构是一个称为朗玛岗 (*Nangmagang*) 的行政委员会，² 由两个或者多个被称为札萨的官员组成。在整个行政体系的顶端是班禅喇嘛。

1. 拉让 (*Labrang*) 通常有两种意思，最常用的意思是指掌管某个喇嘛世系的财产的实体，这与西方的公司相似。这样的拉让有财产，有内部的领导结构，可以一直继承下去。但是它们与公司的不同点在于它们的首脑是一个喇嘛，从孩童的时候就开始通过转世制度选出来。拉让在卫藏的另一意思特指班禅喇嘛的拉让。换句话说，如果问班禅喇嘛的农奴：“你的领主是谁？”他们通常会回答：“拉让”，而所有人都能理解他们指的是班禅喇嘛的拉让，而不是什么其他喇嘛的拉让。类似地，西藏人在谈论拉让和雄 (*Shung*) 或者拉雄 (*Lashung*) 的时候指的分别是班禅喇嘛的政府和西藏 (拉萨) 政府 (官方的说法是雄·甘丹颇章·赤列朗杰，*shung ganden phodrang choley namgye*)。
2. 中文材料中通常称之为堪厅或堪布会议厅。

班禅喇嘛和达赖喇嘛在现代的冲突至少可以追溯到1879年。那一年，西藏政府处死了班禅喇嘛的首辅大臣查布英·生钦活佛（Kyabying Sengchen Trulku），并严厉地处罚了和他一起为印度殖民地政府的一次间谍行动提供帮助的其他人。³到1900年代初的时候，达赖喇嘛对班禅喇嘛的仇恨加深了。那时达赖喇嘛正在流亡，拉萨的西藏官员认为班禅喇嘛为巩固自己的地位正在结交他们的敌人（英国人和中国人）。他们的感觉没有错，实际上班禅喇嘛和他的官员正在设法摆脱拉萨的控制以实现自主。

例如，为了在1904年英国人侵略和占领拉萨之后恢复清朝在西藏的权威，清廷在1906年派张荫棠到拉萨担任新的驻藏大臣。⁴张荫棠到达拉萨附近的小城江孜时，班禅喇嘛堪布会议厅的首脑前去向他致意，并就班禅喇嘛和拉萨政府的矛盾向他游说。据张荫棠说，班禅喇嘛的官员“暗示班禅或许可以挑战达赖的地位”。⁵

此后不久，班禅喇嘛给张荫棠写了一封信，信上要求他把西藏分为“后藏”和“前藏”。前者包括藏地，将由班禅掌管，而后者包括卫地，将由达赖喇嘛掌管。

“前藏”、“后藏”的说法最初开始于十八世纪初清世宗皇帝（顺治）时期（1722–35），是着眼于缩小拉萨政府的统治范围（和权力）的政策的一部分。那时，清廷提出把包括日喀则以西和以南在内的广大地区，实际上也就是整个“藏”（tsang）地，赏赐给五世班禅喇嘛掌管，班禅喇嘛婉拒了这个巨大的赏赐。但是当清政府再次提出把藏地的六个地区〔拉孜（Lhatse）、昂仁（Ngamring）、彭措林（Phüntsoling）、杰炯（Jedrung）、宗喀、阿里（Ngari）〕交由他管理时，班禅喇嘛接受了其中的三个（拉孜、昂仁和彭措林）。⁶从那时起，清王朝开始在他们的地图上使用“前藏”和“后藏”的说法。

但是张荫棠并不赞成倒向班禅喇嘛，他严厉地斥责了这一分裂图谋和勾结英国人的行径，直截了当地答复班禅：

3. 夏格巴，1976: 2: 65。

4. 就是第七章中鲁康娃提到的那个张大人。

5. 牙含章，1991: 238。

6. 牙含章，1991: 52。

你应当了解，卫和藏是不能分作两个独立地区的，因为它们谁也离不开谁。……现在外国人不断来藏地收集情报，这是他们吞并藏地的阴谋的一部分，因为这样他们就可以轻易到达阿富汗和克什米尔。藏地面对的威胁不是来自卫地，而是来自这些诡计多端的外国人。此时此刻，哪怕所有西藏人团结一致都有可能抵抗不住外国的侵略，而兄弟之间的争吵更只会让外国人高兴，所以要尽一切可能避免。……我现在再说一遍以前说过的话，你们之间的问题要在达赖喇嘛返回西藏后心平气和地同他谈。⁷

达赖喇嘛此时已自作主张逃到外蒙古去了。

1913年，十三世达赖喇嘛在二度流亡印度后返回了拉萨，班禅喇嘛和达赖喇嘛之间的关系也正是在此时进一步恶化的。事情的起源是达赖喇嘛向包括班禅喇嘛在内的所有领主强制征收一项新的战争税，但是班禅坚称他的领地是中国的清朝皇帝赐予的，拉萨政府无权向他征收新的赋税，所以拒绝缴纳。从本质上说，他所主张的就是他和他的官员并不从属于拉萨。

在拉萨看来，他们从来没有接受过前后藏分治的观点，而且实际上哪怕是清朝在西藏权势最鼎盛的时期，这样的分治也从来没有实现过。拉萨认为，班禅喇嘛之于其领地的权威和其他封建领主之于他们的领地的权威没有什么两样，他不能管辖藏地其他领主的领地和人民。实际上，即使是在班禅喇嘛的家乡日喀则，其地方官也是由噶厦从拉萨的官员中任命的。因此，拉萨坚持认为它有权单方面更改法令，向全西藏所有的封建领主和他们的产业征收额外的税赋，没有一个领主可以例外。由于达赖喇嘛有军队而班禅喇嘛没有，所以当中国人在1913年被赶出西藏之后，哪种观点更占优势就毫无疑问了。班禅喇嘛和达赖喇嘛的关系在1920年代初持续恶化，最终在1923年11月班禅喇嘛作出了出逃中国的决定。⁸ 达赖喇嘛政府试图在他到达中国边界之前逮捕他，但是没有得逞，于是任命了两名拉萨官员来管理班禅喇嘛的领地和人民，从而实现了完全的控制。就这样，九世班禅和他的官员在1924年年初开始了在中国的流亡，他们一直待到了1952年。

7. 牙含章，1991: 237-38。

8. 对这些事件的详细论述，见戈尔斯坦，1989和梅纳（Mehra），1976。

十三世达赖喇嘛政府的意图是迫使九世班禅喇嘛的政府承认它从属于拉萨。与此对应，班禅喇嘛的意图是永远摆脱这种相对于拉萨的弱势和被动的地位。现在班禅喇嘛和他的官员的所有财产都已被拉萨控制，所以很显然，他们如果想返回西藏，最现实的做法就是将希望寄托于中国政府的支持。于是在1924年之后的时间里，班禅喇嘛的官员积极地寻求同中国政府建立亲密的关系，首先是和新的共和政府，到1928年之后是和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早在1929年的时候，班禅喇嘛就在中国首都南京建立了一个办事处，而国民党方面出于自身的目的也向他提供援助，负担了他和他的官员的大部分开支。⁹

毫无疑问，中国国民党非常希望能重新确立在西藏的政治权力，所以他们把班禅喇嘛看作是可以帮助他们实现这个目标的极为宝贵的工具。在1930年代中期，国民党进行了一番努力，试图让这两位最大的喇嘛达成一项协议，这个努力几乎成功了。但是班禅喇嘛坚持要带一支中国军队随行返藏，而此举有违意向中的协议，所以九世班禅最终未能返藏，于1937年因病在青海省逝世。¹⁰

九世班禅逝世之后，他的转世灵童的寻访工作也开始了，这个寻访过程与达赖喇嘛的寻访过程相似。已故班禅喇嘛的官员们最终于1941年在青海省循化县找到一个名叫才旦贡布（Tseden Gompo）的四岁儿童，¹¹并和众追随者一起认定他就是新的班禅喇嘛，把他接到青海的塔尔寺去供养。但是与此同时，拉萨政府也已自行展开对新的班禅喇嘛的寻访，并且在西藏寻访到两个“候选人”。拉萨政府拒绝承认才旦贡布，要求班禅喇嘛手下的官员把才旦贡布送到拉萨，和两个候选人一起做最终的比较认定。考虑到双方之间的仇恨和缺乏互信，毫无疑问班禅堪厅拒绝了这个要求。他们认为他们已经正确地认定了已故班禅喇嘛真正的转世灵童，而且毫无疑问他们也担心拉萨会出于政治目的从其他“不正确”的候选儿童中挑选。最终的结果是班禅喇嘛政府承认才旦贡布为十世班禅喇嘛，但是拉萨政府搁置了决定，没有认定任何人。

9. 降边嘉措，1989: 11。

10. 戈尔斯坦对这个时期有详细的论述（1989: 252-99）。

11. 循化地区居住着很多不同的民族，包括撒拉族、回族、藏族、汉族、东乡族、保安族、蒙古族、土族和满族等。

在这些事件正在进行的时候，班禅喇嘛的官员要求中国国民党政府承认他们所认定的就是十世班禅喇嘛。从1798年开始，清王朝就已经宣称它对班禅喇嘛和达赖喇嘛的遴选拥有最终决定权，而这种权力是通过金瓶掣签制度实现的，所以这项要求符合中国人对西藏历史的看法。但是那时候的中国政府没有马上答应，因为尽管它同班禅喇嘛手下官员的关系很亲密，但这毕竟是一个可能跟西藏政府讨价还价的筹码，它不想放弃，所以没有马上答应承认班禅喇嘛。¹² 就这样，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西藏政府和在中国的班禅喇嘛之间的关系，无论是在政经问题上还是在十世班禅喇嘛的认定问题上，都完全冷淡了。

这种冷淡状态一直持续到中国内战结束，此时班禅喇嘛的认定问题成为中国国内政治的一部分。¹³ 这个时期，班禅堪厅的首脑是哲通·计晋美（Trendong Che Jigme）和拉敏·益西楚臣（Lhamön Yeshe Tsultrim）两位札萨。¹⁴ 主要的决策者计晋美在中国生活了多年，汉语流利并且熟悉中国政治。¹⁵ 他早年供职于班禅驻南京的办事处，曾任国民党代表大会的代表，也是国民政府的立法委员。¹⁶ 1949年，当解放军渡过长江即将占领南京时，他跟随南逃的国民党政府把班禅办事处迁到广州，后来又迁到重庆。¹⁷

但是，随着中国内战的战局日渐明朗，国民党到了战败的边缘，计晋美和班禅喇嘛所面对的问题马上变成是要改换门庭投靠中国共产党，还是要继续保持对国民党的忠诚。

■ 十世班禅喇嘛主动与中共联合

蒋介石和他的政府在以重整旗鼓反攻大陆为名退居台湾之后，试图说服重要的藏族人士跟他们去台湾。在他们要说服的人当中，十世班禅喇嘛

12. 降边嘉措，1989: 10。

13. 对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之间的冲突的更详细论述，见戈尔斯坦，1989: 252-99，以及降边嘉措，1989。

14. 玛仲·米珠拉（Madrong Mingyula），访问记，1992，西藏（玛仲以前是拉让的一名官员）。

15. 很有趣的是，计晋美尽管汉语说得很好，但是却不懂汉字（平汪，访问记，1999，北京）。

16. 降边嘉措，1989: 11。

17. 降边嘉措，1989: 11。

排在第一位。说服班禅跟他们去台湾将具有重大的象征意义，所以蒋介石指示国民党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长高长柱尽一切努力说服班禅喇嘛跟他们走，于是高长柱派国民党政府的一名藏族情报官员洛桑扎西去敦促班禅喇嘛的重庆办事处尽快转移到台湾。¹⁸

在国民党向班禅喇嘛施压要求他前往台湾的同时，计晋美大约在1949年4月或5月坐飞机到了青海，同正在塔尔寺的班禅喇嘛的父母和经师商量这个问题。他从所有的工作人员中选择了惟一的大学生孙格巴顿（Senge Palden）代理重庆办事处的处长，并要孙格从他在大学时的汉族朋友那里尽可能多地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态度和政策，尤其是与民族权益和佛教相关的政策。他还指示孙格搪塞国民党，并把所有了解到的情况通过他们编制的密码用电报发给他。¹⁹

与此同时，高长柱也向孙格巴顿施压。他告诉孙格蒋介石一直非常关心班禅喇嘛的将来，并且向他保证蒋介石是真心想帮助班禅恢复在西藏的权力和威望。他对孙格说，国民党正准备在青海修筑一条小型跑道，以便带班禅和他的主要官员直接飞往台湾。²⁰高长柱还试图说服孙格去台湾为班禅的到来提前做准备，并许诺任命他为蒙藏委员会西藏事务部的部长。

为了影响班禅喇嘛手下的官员的判断，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此时答应正式承认才旦贡布。1949年6月3日，国民党政府跳过清王朝设置的金瓶掣签程序，直接由代总统李宗仁宣布正式承认才旦贡布为十世班禅喇嘛〔他作为班禅喇嘛的法名是确吉坚赞（Cöki Gyentsen）〕。几个月之后的8月10日，高长柱作为国民党政府的专使出席了在塔尔寺举行的班禅喇嘛坐床典礼。²¹

尽管如此，班禅手下的官员仍然没有决定去台湾，所以国民党和青海省政府主席（马步芳）进一步施压。这让计晋美很担心，害怕他们会

18. 吉杓权，1993a: 42。

19. 降边嘉措，1989: 11。

20. 吉杓权，1993a: 42–44。

21. 在《雪狮与龙》（*The Snow Lion and the Dragon*，戈尔斯坦，1997）第104页中，我错误地写到没有西藏政府的官员参加这次坐床典礼。实际上，虽然拉萨没有人来，但是班禅喇嘛身边的人邀请了达赖喇嘛驻南京办事处的负责人，而这位官员也确实来了（并且在典礼上拍了照）。范明（访问记，1993，西藏）说计晋美在谈判《十七条协议》的时候向中共提供了国民党官方关于这次典礼的文件和照片。

单方面采取行动，便把班禅喇嘛从塔尔寺转移到位于青海省中部更为偏远的香日德。

但是，国民党并不是惟一对班禅喇嘛感兴趣的势力。我们已经看到，中国共产党也在寻求赢得西藏外部藏人的拥护，而班禅喇嘛在他们的名单中也排在第一位。西北局负责青海和甘肃地区民族事务的解放军军官范明回忆了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1949年8月上旬兰州解放前夕，我时任西北野战军政治部联络部部长。我们的总部驻在甘肃省榆中县城近郊的一所村庄里。大约在1949年8月19日，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叫我到司令部参加一个会议。当我到达那里的时候，我发现很多重要官员都已经到了……

彭德怀让我们看毛泽东最近发给他的一份电报，内容是关于解放西北〔包括甘青〕的策略问题。毛泽东在电报中强调我们从国民党手中解放兰州的时候务必要小心对待西藏人，特别是班禅喇嘛，因为这对正确地处理西藏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²² 彭德怀说这是毛主席关于准备解决西藏问题的第一个指示。²³

兰州解放之后的1949年8月26日，彭德怀向范明交代了马上就要执行的任务。他重申了毛泽东的方针，说：

第一、要把争取和团结班禅的工作做好；第二、要把甘南〔拉卜楞寺所在地区〕藏军保安司令黄正清〔阿巴·阿洛，Aba Alo〕的工作做好；第三、要把安多地区藏族的工作做好。第四、采取团结教育藏族知识分子，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创办藏族训练班。在这次会议上，〔彭德怀〕拿出了毛主席的电报要我们讨论。²⁴

范明立即开始执行这些方针政策，他从甘肃派了一些官员与新的青海省政府一起给留在塔尔寺的班禅手下的官员做工作。²⁵ 然而，在给彭德怀

22. 毛泽东的电报是在1949年8月6日发出的，电报中说：“班禅现到兰州〔他实际上是在青海〕，你们攻兰州时，请十分注意保护并尊重班禅及甘青境内的西藏人，以为解决西藏问题的准备”（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2001: 1）。

23. 范明，1987: 4；范明，访问记，1993。

24. 范明，1987: 5。

25. 范明，1987: 5。

发电报之前早得多的时候，毛泽东就已经命令中共驻重庆的地下党组织留意班禅喇嘛办事处，寻找机会影响他们。驻重庆的地下党组织安插共产党员刘统座在办事处工作，刘因此能够密切地接触到孙格巴顿。通过他的努力，孙格巴顿对共产党印象深刻，并向计晋美作了正面的汇报。²⁶

与此同时，在青海计晋美经常去见班禅喇嘛的父母和经师嘉雅仁波切（Gyaya Rimpoche），同他们商量应该何去何从。会面在班禅父母的卧室里秘密进行，他们小心翼翼，不让任何人在他们谈话时进入这个房间。有时候这种谈话会持续到深夜。他们甚至不让仆人进去，所以要喝茶的时候会自己出来拿。班禅喇嘛那时年仅12岁，他察觉到这一点，并对这种神秘的会面越来越好奇。降边嘉措在他的书中说，班禅喇嘛在他这个年纪算是很成熟，也很有主见，从不喜欢受到任何人的约束。与达赖喇嘛（时年14岁）不同，班禅喇嘛希望能运用他的权威，这一点可以从发生在某次会面中的一个小插曲看出。降边嘉措说，某天班禅喇嘛的好奇心高涨，在讨论正在进行时突然闯进了那个房间。

计晋美等人不敢说什么，只是沉默不语。班禅的父亲觉得他妨碍议事，挥了挥手，让他出去。班禅偏不出去，他坐在父亲身边，问计晋美：“你们商量什么事？”计回答说：“蒋〔介石〕主席、李代总统、马〔步芳〕主席要我们和马主席一起去台湾，我们在商量究竟去还是不去。”

班禅又问：“他们要谁跟马主席一起走？”“要我们大家，主要是您。”计晋美不经意地随口而答，然后端起银碗，喝了一口酥油茶。班禅“腾”地从坐垫上跳起来，指着计晋美的鼻子说：“我的事为什么不同我商量？你们有什么权力决定我的事？”

计晋美吓了一跳，酥油茶撒在衣服和卡垫（藏式地毯）上，一时竟不知怎么回答。他忠于班禅，但又觉得班禅年纪尚小，不懂政务，所以他一直以班禅的保护人自居，没有想到有事还要同这个12岁的孩子商量。

班禅接着说：“以后有关我的事，一定要和我商量，要不我就不听你们的！”班禅越说越生气。他本来就有些口吃，一生气，更

26. 吉柚权，1993a: 42。

是说不出话来。他结结巴巴，用威胁的口吻说：“你们要是不和我商量就决定跟马主席走，我就留在塔尔寺；你们要是留在塔尔寺，我就跟马主席走！”

“才旦，快坐下，不许对处长无礼！”父亲严厉地批评班禅，一把将他拉到自己身边坐下，一起商量。²⁷

从这次以后，他们就让班禅喇嘛加入他们的讨论，不过仍然很担心他，不断地跟他说不要向任何人透露讨论的内容。²⁸

没过多久他们就作出了决定，在经历了二十七年流亡中国的思乡之苦后，班禅堪厅的领导们只想返回西藏，恢复他们认为的历史上的权力和对自己的领土的控制。但是他们对西藏政府的仇恨和不信任使他们再也不会向拉萨屈膝，直接与西藏政府交涉至多只能算是远期的打算，因为拉萨甚至不愿意承认才旦贡布，更别提其他问题了。另一方面，尽管国民党声称他们愿意支持班禅堪厅，但是他们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却没有这么做，而现在也已经没有能力帮助他们对抗拉萨了。中国现在新掌权的人是中共，所以跟他们联合是最适当的，因为只有他们才有军事实力帮助班禅及其堪厅实现他们返回西藏的目标。但是所有人都知道中共党员是无神论者，而且很多人觉得他们会消灭佛教。然而，中共再三明确地宣布他们尊重西藏的宗教，允许少数民族地区自治。这一点连同从重庆和西宁发来的正面情报汇集在一起，促使班禅喇嘛方面相信他们能够通过和共产党合作实现他们的目标。

最终在1949年8月末或9月初的时候，班禅喇嘛派计晋美去拜会解放军。计晋美发现解放军的官员很通情达理，于是把自己和班禅的将来跟他们绑在一起。不久之后，青海统战部部长周仁山领导的一个小组前往香日德，就财政问题和其他需要立即处理的问题向班禅喇嘛提供帮助。²⁹现在，班禅喇嘛开始受到中共西北局的保护。争取到班禅喇嘛是西北局在中共解放西藏的过程中一项重要的成就。

班禅喇嘛自己回忆了这段困难的时期。

27. 降边嘉措，1989: 13-14。

28. 降边嘉措，1989: 14。

29. 吉柚权，1993a: 42-44。

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突破长江天险占领了国民党政府所在地南京。到秋天，国民党军队在西边节节败退。谣言四起，说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是青面獠牙的恶魔。在青海省解放前夕，我和我的堪布会议厅从西宁迁到了青海省中部的香日德。

香日德有一间寺庙是清朝乾隆皇帝在1780年赐给六世班禅喇嘛的。我们聚集到那里商量我们和西藏的将来，我们没能形成共识。新疆还没有解放，有些人建议我们去那里，然后坐国民党的飞机去台湾。有些人想回西藏，但是其他人建议我们和共产党接触。

头两个建议最终被否决了，但是对于第三个建议我们又有点犹豫。噶厦（拉萨的西藏地方政府）还没有承认我是班禅，所以我不能去西藏。关于共产党有很多谣言，但我也没有亲眼看到过他们。于是我决定派人去接触人民解放军，看看他们到底是怎么样的人。

派去的人回来之后，他告诉我们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倡导国家的统一和各民族的团结。虽然我只有12岁，但是我知道九世班禅从西藏来青海为的就是实现这一目标。我是他的继承人，所以我应当追寻他的足迹。因此在1949年10月1日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那一天，我发了一封电报给北京。³⁰

从班禅喇嘛给毛泽东、朱德和彭德怀的电报中可以看出，计晋美等人已经决定把他们的命运同中共及其解放西藏的目标紧密地连在一起。给毛泽东的电报上说：

北京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钧鉴：

钧座以大智大勇之略，成救国救民之业，义师所至，全国腾欢。班禅世受国恩，备荷优崇。二十余年来，为了〔中国〕西藏领土主权之完整，呼吁奔走，未尝稍懈。第以未获结果，良用疚心。刻下羁留青海，待命返藏。兹幸在钧座领导之下，西北已获解放，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凡有血气，同声鼓舞。今后人民之康乐可期，国家之复兴有望。西藏解放，指日可待。班禅谨代表全藏人民，向钧座致崇高无上之敬意，并矢拥护爱戴之忱。

班禅·额尔德尼叩

1949年10月1日³¹

30. 班禅喇嘛，1988: 10–11。

31. 英国外交部档案，FO371/83325，附于由南京发往英国外交部的急件，1949年12月27日。这份文件摘自南京1949年11月25日的《新华日报》。

班禅非常希望能与西北局领导人建立深厚的友谊，所以他也向彭德怀将军发了一封贺电，更加强烈地表示了对解放西藏的支持。

兹幸在钧座领导之下，西北已获解放，边民同声欢忭，今后人民之康乐有期，国家之复兴可待。即久被忽视之西藏人民，亦莫不引领而望，卜庆来苏。仍恳领导义师，解放西藏，肃清叛国分子，拯救西藏人民。³²

于是，西藏两位最大的喇嘛在对待中共于中国取得胜利的问题上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态度。我们即将看到，与此同时中共的重要官员对待这两位喇嘛的态度也有明显的分别。

班禅喇嘛和西北局迅速建立起来的亲密关系是中共的一次巨大胜利，但也提出了一个新的敏感问题，即中共应该如何对待班禅喇嘛和达赖喇嘛之间的冲突。班禅喇嘛指望的是中共明确地反对拉萨的西藏政府，然而因为西藏尚未解放，共产党如何处理班禅喇嘛和达赖喇嘛的冲突可能影响到中共同达赖喇嘛和西藏政府之间的关系。

中国政府于1949年10月迈出了研拟应对方针的第一步，由李维汉（时任统战部部长）指示中央政府情报部派袁心湖和余凯去西宁建立青海联络站，同时调查班禅喇嘛和达赖喇嘛之间的冲突的历史，然后直接向中央政府汇报。³³ 当他们正在进行调查的时候，毛泽东在1949年11月23日第一次以和朱德联名复电的形式直接致电班禅喇嘛：

接十月一日来电，甚为欣慰。西藏人民是爱祖国而反对外国侵略的，他们不满意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政策，而愿意成为统一、富强的各民族平等合作的新中国大家庭的一分子。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必能满足西藏人民的这个愿望。希望先生和全西藏爱国人士一致努力，为西藏的解放和各族人民的团结而奋斗。³⁴

32. 英国外交部档案，FO371/83325，引自南京1949年11月25日的《新华日报》（划线部分为强调）。

33. 范明，1987: 5；范明，访问记，1993。

34. 英国外交部档案，FO371/83325，引自南京1949年11月25日的《新华日报》；降边嘉措，1989: 9-1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2001: 1。

两个月之后的1950年1月31日，班禅喇嘛给毛泽东发了另一封电报要求解放军迅速解放西藏，并表示他反对西藏政府计划向英国、美国和其他国家派遣使团寻求援助的行动。这封电报将班禅喇嘛心里的想法表露无遗。

西藏系中国领土，为全世界所公认，全藏人民亦自认为中华民族之一。今拉萨当局此种举动，实为破坏国家领土主权完整，违背西藏人民意志。谨代表西藏人民，恭请速发义师，解放西藏，肃清反动分子，驱逐在藏帝国主义势力，巩固西南国防，解放西藏人民。³⁵

可以看出，到1950年初，班禅喇嘛和他手下的官员已经把自己的前途压在中国解放西藏上了。他们相信，中共有能力，也必定会送他们回到西藏。但是，他们相对于达赖喇嘛政府的地位仍然不明确。在经过数十年的流亡之后，他们现在寻求的至少是与拉萨对等的政治地位。但是实现这个目标需要从西北局的领导层那里得到支持，并通过他们得到北京领导人的支持。于是在1950年春天，计晋美请求（青海）西宁负责同他打交道的共产党官员安排他和范明直接会面，而此时范明正在兰州。

范明（根据中文材料）对西藏历史进行过研究，他的研究使他相信计晋美所说的是正确的。所以他对计晋美的观点表示认同，并迅速成为班禅在党内的首要支持者，强烈支持划分前藏和后藏的政策：

在历史上，西藏分为前藏和后藏。达赖的政府叫做噶厦，而班禅的政府叫做堪厅，它们之间并不是一方从属于另一方的关系。它们的结构是平行的。西藏人见面的时候会说达赖和班禅在地上就像太阳和月亮在天上一样。……他们是属于不同统治者的人民……

在那时〔清朝〕的中国地图上，你可以看到前藏和后藏，西藏〔那时〕不叫西藏。西藏这个词是在解放之后才用的。在过去，前藏属于达赖，而后藏则属于班禅。³⁶

35. 范明，1987: 8-19。在同一时期，其他亲中的西藏人如全国政协委员桑杰益西（Sangye Yeshe，天宝）、青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喜饶嘉措（Sherup Gyatso）、甘肃人民政府成员黄正清和杨复兴，以及热振的苏本（*söpön*）益西楚臣等奔走呼号，要求解放西藏，严惩西藏政府“分裂”祖国的图谋（范明，1987: 19）。

36. 范明，访问记，1993。

范明认为，班禅喇嘛世系与达赖喇嘛世系不同，他们在历史上对中国友好，也强烈支持西藏属于中国的观点。他解释说：“班禅集团总是拥护中国的统一。历史上，五世班禅〔洛桑益西，1663-1737〕拥护这个观点。……十世班禅〔1939-89〕也坚决主张祖国的统一。在任何情况下，班禅集团总是主张统一，反对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³⁷

范明对班禅喇嘛和达赖喇嘛之间的现代政治关系也有类似的表述：

当然在〔1923年〕把九世班禅赶出来之后，达赖集团控制了前藏和后藏。但是从法律上以及那时的〔中国的〕地图来看，〔中国〕中央政府并没有承认这一点。那时，中国的地图标出了前藏和后藏。……当然对于班禅集团来说，他们所谓恢复西藏的权力就是要控制后藏。毫无疑问班禅集团在那个时候想的就是控制后藏。³⁸

计晋美于1950年4月26日会见了范明。在会面中计晋美还告诉范明，他希望代表班禅喇嘛到西安去向西北局的领导人致意。在范明安排好之后，计晋美于5月中旬去西安拜访了西北局的高层。然后在范明的帮助下，他向彭德怀寻求支持，并请彭德怀帮助把一份关于西藏前途的建议书转交给毛泽东。³⁹

这份建议书的标题为“解放西藏办法及政教组织方案”。它先是建议解放军同时从四个省——云南、西康、青海和新疆进入西藏，接着就把重点放在班禅喇嘛及其官员最为关心的问题上，即要求中国政府支持班禅喇嘛所主张的相对于拉萨一直享有自主的立场，并呼吁中共将西藏划分为后藏和前藏两个部分。建议书说：“西藏有整块的土地，同一的民族，适合区域自治的条件，〔因此适合〕组织一行政区而将前后藏分别自治。”⁴⁰

除此之外，这份建议书还提出了一系列具体而蕴意深刻的要求，这将在下面讨论。彭德怀同意了计晋美的请求，于是到了1950年5月，西北局尤其是范明成了班禅喇嘛的主张和建议的支持者和拥护者。

37. 范明，访问记，1993。

38. 范明，访问记，1993。

39. 范明，1987: 6。

40. 引自范明，1987: 6。

1950年9月初，班禅喇嘛在党内寻求支持者的活动又取得了进一步的成果。当时，毛泽东在北京会见计晋美并接受了他在建议书中的请求。在解放军进攻昌都两周前的9月23日，毛泽东向参加解放西藏的各单位发出指示，宣布了中央政府对班禅喇嘛的支持。这份指示的标题为“关于班禅致敬团提出的问题 and 要求的指示”，上面提到：

〔班禅喇嘛〕所提西藏政教组织方案的意见很好，是合乎爱国与团结精神的。班禅集团愿意同我们合作，是一件很好、很重要的事情，不管西藏解放形式及达赖集团的变化如何，我们必须积极争取班禅集团和他们所能影响的人民和我们合作。⁴¹

与此同时，毛泽东对班禅喇嘛提出的具体问题和请求（这些问题和请求的具体内容无法获知，但是可以从毛泽东的答复中推断出来）作了明确的答复：

- (1) 确定增加班禅封号的时机，俟西藏代表团来谈判后再定；
- (2) 班禅回西藏是确定了的，回藏时机亦待以后情况决定；
- (3) 同意他们组织民族部队三千至五千名，其中包括班禅卫队五百名。由人民解放军派出得力与又能搞好民族关系的人员，帮助他们组织和训练；
- (4) 同意在塔尔寺附近设立民族学院分院或单独的训练班，帮助他们训练行辕人员和一般干部；
- (5) 同意成立宣传队；
- (6) 同意拨一个医务所；
- (7) 帮助他们成立机关消费合作社；
- (8) 同意拨给一部电台，并配给报务员和译电人员；
- (9) 同意拨给汽车；
- (10) 同意建立北京、重庆、西安、西宁四个办事处；
- (11) 经费，班禅本人每月用费银洋 1,500 元，班禅行辕人员包括眷属 412 名，总计每月发面粉 2,468（44 斤为一袋）袋；
- (12) 发还香日德垦牧地，将来如实行土地改革，依政府法令处理；
- (13) 同意由政府派联络员参加行辕。⁴²

41. 引自范明，1987: 4。

42. 引自范明，1987: 6-8。

就这样，中国中央政府给了班禅喇嘛想要的大部分东西，包括同意他返回西藏，组建他自己的军事力量来保护自己对抗达赖喇嘛，批准他在中国内地的重要城市设立办事处。中央政府也暗示同意他所提出的划分前藏和后藏的新建议。但是与此同时，这份答复并没有对他的地位或者身份的认定问题发表看法，只是说应当等达赖喇嘛的代表团到达北京之后再说。答复中也没有明确说他应该在什么时候返回西藏，只是说这要视情况而定。

个中原因是很清楚的。前面已经提到，支持“进步的”班禅喇嘛可能会给劝说达赖喇嘛接受和平解放西藏这个更大的政治目标带来负面影响。这一点毛泽东必须仔细斟酌，尤其要避免做出一些事情让达赖喇嘛和他的官员认为中国的真实意图是用班禅喇嘛取代达赖喇嘛。十八军军长张国华事后给出了明确的解释：“班禅应该暂缓返藏，以免为反动派提供借口。班禅返藏时机要与达赖谈好后才决定。”⁴³

大概在这个时期，李维汉在青海的调查组完成了调查。其完成的报告对班禅有利，报告的结论说前藏和后藏的划分在历史上是有依据的，分别与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的政治实体相对应。更重要的是，调查组还建议（西南局的）十八军管理前藏（达赖喇嘛的势力范围），而西北局的军队应当管理后藏，如果需要可以在西藏建立两个军区。⁴⁴

于是，到了进攻昌都的1950年10月，中国在策略上按照班禅喇嘛的支持者的想法做了前藏后藏分而治之、西北局控制后藏的计划。范明回忆说要他领军控制后藏的命令也是反反复复、不断变卦之后才最终确定的。

1950年9月下旬，彭总、贾拓夫、徐立清等去新疆返回兰州，我到机场迎接。贾拓夫告诉我：“彭总已决定你担任〔新疆首府〕乌鲁木齐的市委书记兼市长，限你一个星期内到新疆上任。”所以我二话没说，当即着手交代工作准备出发。不料几天后，彭总对我说：“新疆你不要去了，准备进军西藏。”彭总指着西藏地图说：“从西宁、香日德经黑河插到后藏，控制岗巴拉山，⁴⁵切断前后藏的道路，直插后藏首府日喀则，解放后藏。”他告诉我具体问题找张宗逊副司令员。

43. 赵慎应，1998: 46。

44. 降边嘉措，访问记，1993，北京。

45. 岗巴拉山是位于雅鲁藏布江以南的一处山口，卫和藏（前藏和后藏）以它为界。

于是我准备去西藏。但是到1950年10月下旬，西北军区政治部主任甘泗淇又通知我说：“西藏不去了，随彭总去抗美援朝。”我又二话没说，紧张地进行准备工作。没几天，西北军区副司令员张宗逊又通知我说：“你不去抗美援朝了，仍然负责进军西藏的任务。”他们派我去是因为先前我已经做了一些民族工作。⁴⁶

中共中央于1950年11月9日发出一份关于后藏的重要指示。

因在解放西藏的整个作战中，西北人民解放军担负进军后藏和阿里地区〔西藏最西部〕的任务。又因后藏和班禅集团历史关系最深，而现在仍保有相当影响的地区，而班禅的工作则属于西北局，故〔西南局〕刘伯承提议由西北局同时担负接管后藏和阿里地区的政治任务。为此，西北局应立即积极进行有关准备工作。⁴⁷

于是，西北局准备派遣一支骑兵支队进后藏，由孙巩担任支队长。范明将担任西北局西藏工委的书记，他的联络部负责筹备工作。⁴⁸

从以上可以看出，班禅堪厅的计划进行得很成功。在他们决定把自己的命运与中国共产党连在一起的一年之后，他们获得很有分量的西北局的强烈支持，并通过他们获得毛泽东的支持。北京已经承认班禅喇嘛的合法性，也答应把他送回他的势力范围。而且非常重要的是，北京也接受了班禅喇嘛的观点，即西藏有两个政治实体，一个由达赖喇嘛领导，而另一个由班禅喇嘛领导，需要分别动用来自不同局和野战军的部队来占领，由西南局占领前者，由西北局占领后者。例如，范明回忆说：“起先，〔解放西藏的任务〕是分开的。所有事情都分成前藏和后藏。两支部队合并起来后，冲突发生了。”⁴⁹

但是就像范明暗示的，解放军里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同意这样做。当11月9日的电报送到西南局的时候，十八军的两位领导人张国华和谭冠三提

46. 范明，1987: 3。

47. 引自范明，1987: 24。也可见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1990，1950年11月9日条目。

48. 范明，1987: 24。工委是主要的管理机关，下设多个不同部门，包括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民运部、书记处、总务处、研究室、青年委员会和妇女委员会等。此外，还有各种各样的工作队，例如新华社、报社、文工队、摄影队、电影放映队、卫生处、交际处和联络处等。

49. 范明，访问记，1993。

出了异议。而在 1950 年 12 月 14 日，西南局自己的西藏工委同在（西康）甘孜的十八军党委联合召开了一个会议，议题包括把西藏划分为前藏和后藏的问题。会议得出结论认为这样的划分并不适当。下面是他们提出的一些理由：

1. 分而治之，群众接受不了，容易让帝国主义挑拨关系。分前后藏，是达赖、班禅政治势力的划分，宗教是相同的，不宜搞两种政权形式。
2. 前后藏经济联系很深，前藏吃粮要由日喀则解决，噶大克以北牧场多，货物要由亚东出口，若分治问题多。
3. 就与印度、尼泊尔、不丹的涉外事宜来说，也不宜分治。⁵⁰

西南局自己也进行了有关两位西藏喇嘛之关系的研究，同时还有他们的藏族高级干部平汪的直接认识。⁵¹ 这些材料告诉他们西藏从来没有真正地被明确划分成前藏和后藏。达赖喇嘛的政府统治着整个西藏，包括后藏。任何想要把前藏和后藏分开的企图都是没有先例的，这样将会使西藏政府产生巨大的愤怒和仇恨，其代价很可能是牺牲整个渐进主义政策。所以在 1950 年 12 月 24 日散会的时候，会议得出结论认为西藏的前藏部分和后藏部分应当保持为一个整体。会议作出的结论和批评意见以报告的形式上报给西南局和中央。⁵²

然而，北京仍然继续沿着把西藏划分为两个政治实体的道路前进。1950 年 11 月，中央政府给西北局发了一封电报询问筹备工作。而在 11 月中旬，范明被派到西安去拟定一份报告。接着，西北局的副主席习仲勋派了包括范明在内的一群官员去北京向中央政府汇报工作。这群人于 1950 年 11 月 31 日到达北京。李维汉于 1951 年 1 月 3 日在他们下榻的北京饭店会见了他们，并要范明准备一份提纲向中央汇报。在这份提纲完成之后的 1951 年 1 月 30 日，李维汉会见了范明、汪峰（此处英文原文的 Wang Zheng 应为笔误——译注）和牙含章，再次肯定了前后藏的政策：“西北

50. 赵慎应，1998: 46；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1990，1950 年 12 月 14 日条目。

51. 有关他的一生和所处时代的描述，见戈尔斯坦、道伟喜饶和司本石初，2004。

52. 赵慎应，1998: 46；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1990，1950 年 12 月 14 日条目。

的任务是在军事上配合（以西南为主），准备去接收后藏（王震将派部队从新疆进入阿里）。”⁵³

此外，北京的中央军事委员会在1951年2月13日给西北局发去关于入藏准备工作的通知：

1. 今年必须全部解放西藏。西北入藏准备工作必须于三月底前完成一切必要的准备。
2. 确定西北入藏工委一千五百人（包括警卫部队）、家属一千人（这一千人准备明年入藏）、班禅集团一千五百人（包括警卫部队），共四千人，骡马八千匹，在两年内分批入藏。

所有中央允许班禅集团的条件，必须迅速完满地予以实现，给班禅卫队配备干部及配备一个医务所和电台等，责成西北军区迅速解决。⁵⁴

可以看出，在1月末2月初的时候，中央政府很明显仍然延续着让西北局接管后藏的计划。

范明于1951年2月中旬从北京返回西安，向西北局作了汇报。西北局决定西北局的西藏工委由范明、牙含章、张军、吴开章、孙殿才和孙一君等人组成，由范明任第一书记。后来，张军因故不能去西藏，所以由慕生忠代替。几周后的2月27日接中央指示，范明被任命为西北局派驻班禅集团的“代表”，负责护送班禅喇嘛去西藏。⁵⁵

■ 班禅喇嘛在北京

在范明看来，所有事情都进行得非常顺利。他觉得是时候让班禅喇嘛去北京亲自拜会毛泽东和中国其他领导人了，以进一步巩固局面。于是在1951年3月27日，班禅喇嘛（通过范明）发了一封电报给毛泽东请求接见。

53. 范明，1987: 33。

54. 范明，1987: 36；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1990，1951年2月13日条目。

55. 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1990，1951年2月27日条目。牙含章被任命为副代表。

两周之后的4月7日，中央政府秘书长林伯渠肯定地答复了班禅。两天后，范明前往塔尔寺同班禅喇嘛的高级官员讨论此行的细节问题。他发现这些高级官员极为关心会面的礼节安排，担心如果现世的班禅喇嘛受到的待遇比前世班禅喇嘛低，那么就会给达赖喇嘛方面的人发出错误的信号，将来会产生不好的后果。因此在4月12日，范明致电西北局和中央提出了这个问题。中央迅速答复说所有的安排都会和前世（九世）班禅喇嘛的时候一样。



图15：左起：范明、十世班禅喇嘛、扎西（青海省党委书记）。1951年2月摄于西宁。照片来源：陈宗烈

两周之后的4月19日，范明和班禅喇嘛及其随同人员离开塔尔寺前往兰州，从那里他们坐飞机到西安再到北京。像承诺的那样，范明将这次旅程严格按照前世班禅喇嘛所受的待遇规格来安排。⁵⁶

就在这些事件正在进行的时候，中共与西藏政府之间关于谈判问题的僵局被打破了。前面已经讨论过，在1951年1月底，西藏政府的代表在新德里会见了袁忠贤大使，同意派一个代表团去北京谈判。这个代表团于3月底离开亚东。⁵⁷北京过去殷切盼望的和平解放协议已经近在咫尺，现在需要做的是认真评估如何在即将展开的谈判中使成功的可能性最大化。由于这个原因，班禅喇嘛和达赖喇嘛的冲突得到重新评估。在3月或4月的某段时间，毛泽东和他在西藏问题上的主要智囊李维汉在认识上逐渐靠近了西南局的观点，即前藏和后藏的划分在历史上并不是很明确，中共现在这样划分将会是一个战略性的错误。毛泽东相信达赖喇嘛是西藏最重要的人物，也是把西藏成功收入囊中的关键。所以毛泽东异常谨慎以防止由于支持班禅喇嘛而对争取达赖喇嘛造成负面的影响。

范明在他的文章中说直到班禅喇嘛在北京会见毛泽东的前夕他才了解到这一点。

那时计划中的一件事是让班禅喇嘛在五月一日劳动节那天在天安门上给毛主席献哈达，这样全世界就会看到班禅喇嘛是第一位向毛主席献哈达的西藏人。这非常有意义。替毛主席接哈达的人是李维汉，我站在毛主席旁边。……毛主席会见班禅的时候我在一旁陪同。……毛主席在天安门检阅完部队之后首先同班禅举行了会谈。周总理、李维汉、我、计晋美和班禅喇嘛在场。在会谈中，毛主席对班禅集团给予了褒奖。同时……他重点说到全国各民族都要团结，各个民族内部也要团结。我们不像国民党，国民党总是试图拉拢一部分同时打击另一部分。于是那时，我们请班禅和中央一起争取达赖喇嘛……

中央那时已经决定西藏应当是一个统一的西藏，而不应当划分为前藏和后藏。这是第一次作出这样的决定。西藏在内部应当追求内部团结，达赖和班禅应当团结起来。中央政府统一领导全西藏。⁵⁸

56. 范明，1987: 37。

57. 代表团团长阿沛实际上刚刚在1951年4月22日到达北京，只比班禅喇嘛早几天。

58. 范明，1987: 36（划线部分为强调）。

所以到北京谈判开始的时候，毛泽东和中央的策略已经发生转变，对达赖喇嘛的关切要比对班禅喇嘛的更为重要。当然，毛泽东和中央政府仍然很顾及班禅喇嘛的利益。并没有明确的政策说要如何解决班禅和达赖的矛盾，只是说要解决，而且现在又要两位喇嘛在统一的西藏内部合作。尽管如此，毛泽东个人已经接受这个青海男孩为真正的班禅喇嘛，也已承诺帮助他返回西藏恢复他的领土和权威。

但是西藏代表团拒绝参加班禅喇嘛的欢迎仪式，理由是他们不承认才旦贡布是前世班禅喇嘛的真正转世。这件事使中国方面初步预见到前路的困难。西藏代表团的汉语翻译（同时也是达赖喇嘛的姐夫）达拉回忆了班禅仁波切于4月27日到达北京时的情况：

我们到达北京之后的首日，共产党告诉我们班禅喇嘛会在第二天到达，我们所有人都要去火车站欢迎他。

于是阿沛和我们所有人商量了这件事，说：“我们〔西藏政府〕尚未承认班禅喇嘛。按照西藏政府的立场，总共有三个候选人——两个在西藏，一个在安多，这个〔安多的〕候选人在去西藏〔接受辨认〕之前是不被承认的。”

但是中国人坚持要我们去，说我们必须去欢迎他。所以阿沛和我们商量，决定〔主要〕代表阿沛和凯墨不去欢迎班禅喇嘛，由桑颇、桑都仓·仁钦和我三个人〔一个低级官员和两个翻译〕去欢迎他。这是为了表明我们不承认这位班禅喇嘛。⁵⁹

桑颇也回忆了那天的情况：

中国人告诉我们去火车站迎接他，但是那时我们还没有接受和承认他是班禅喇嘛的真正转世。我们内部商量了一下，决定只让我去迎接他。⁶⁰

问：阿沛有没有指示你们如何欢迎他以及如何同他打招呼？

他没有指示，但是我们是像接待朋友那样欢迎他的。我们没有向他赠送哈达，也没有和他握手。中国人实际上希望我们去的时候

59. 达拉·平措扎西，访问记，1994，伦敦。也见达拉，1995：2：40。

60. 他的意思是：他是惟一去迎接班禅的代表团正式成员；另外两个人（达拉·平措扎西和桑都仓·仁钦）是代表团的翻译。

穿整套官服，但是对此阿沛并没有表态，所以我穿了一件普通的藏袍。班禅喇嘛很可能认为我只是一名普通的西藏人。⁶¹

随着谈判即将展开，中国人觉得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所以开始向西藏政府施压要求他们承认班禅喇嘛身份的合法性。桑颇回忆说：

几天之后，在会谈开始的5月2日，中国方面提出了这个问题。当时李维汉询问阿沛有没有收到什么与班禅喇嘛相关的特殊指令。阿沛回答说没有。李维汉说：“怎么可能？这可是西藏人最为关心的事情之一。”阿沛表示同意，但是他再次告诉李维汉他没有得到任何指示。接着李维汉问他：“你们接受他是真正的班禅仁波切吗？”阿沛说他不能接受任何人是班禅喇嘛的转世，随后解释说现在拉萨有两三个班禅喇嘛的候选人，最终需要通过一次打卦（藏语：吐丹，*thukdam*）来选出正确的人。对此李维汉回答说中央政府已经接受这一位是真正的转世了，意思是说阿沛必须在这个问题上作出肯定的答复。

阿沛于是说：“如果你们已经接受这很好，但是我们还没有接受他。”中国人很有礼貌也很聪明，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持续了六七天。中国方面不断提出新的论据试图说服西藏人接受这个青海男孩才旦贡布是班禅仁波切，但是西藏方面毫不客气地拒绝了。⁶²最终中国人以保住毛泽东和中央政府的“面子”为由要求阿沛接受，并干脆拒绝让谈判继续进行。于是最终西藏代表团给在亚东的达赖喇嘛发去一份电报请求指示。阿沛在电报中说：“如果你们不接受那个青海男孩是班禅喇嘛的话，那么将会对谈判造成负面影响。”达赖喇嘛的答复很快就到，说：“经过打卦之后证实，在北京的班禅喇嘛是九世班禅喇嘛的真正转世。”⁶³

这个答复让西藏代表团松了一口气，因为从之前的情况看，谈判似乎还没开始就要结束了。按照西藏习俗，西藏代表团于第二天拜访了班禅喇嘛，向他表示了适当的尊敬，包括磕头三次和敬献曼扎。⁶⁴

61. 桑颇，访问记，1981，拉普。

62. 相关的论据是由范明和计晋美提出来的。例如，他们给阿沛看了达赖喇嘛重庆办事处的负责人出席班禅坐床仪式的照片。

63. 桑颇，访问记，1981。当时在场的达拉·平措扎西也在1992年于达兰萨拉接受的访问中提到这一点；同时在达拉的著作（1995: 2: 40-44）中也有描述。

64. 达拉·平措扎西，访问记，1994；桑颇，访问记，1981。

当然，对中国人和班禅喇嘛来说，正式承认只是需要解决的事情之一。另一件同等重要的事情是西藏政府接受班禅喇嘛返回西藏，恢复他对自己领土的控制。而接受这一点又需要解决有关两位喇嘛之间相对地位的争议。根据阿沛的回忆，这引起了痛苦的争论。

在决定签订《十七条协议》和七项〔秘密〕附件之后，一个新的问题被提出来了。他们说：“虽然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之间的问题已经解决了，但是现在我们需要解决西藏内部的问题。九世班禅喇嘛和十三世达赖喇嘛关系不好，所以九世班禅喇嘛被迫到了内地，并在玉树去世。现在十世班禅喇嘛得到了承认。如果我们不能解决好班禅堪厅和〔西藏〕地方政府之间的问题，那么即使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之间的问题得以解决，也不够完美。”

没有人指示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而且西藏地方政府和班禅堪厅之间的矛盾也不是一件小事，所以我们没有权力〔牵涉其中〕。于是我们坚决拒绝讨论这个问题。我们所有人坚持说，我们接到的命令是同中央政府谈和平协议，我们没有接到要解决地方政府和班禅堪厅之间的事的命令。请不要和我们谈这个问题，你们可以在以后单独谈。

但是中央政府的代表仍然坚持，说：“这样不好。你们必须解决这件事。”于是我告诉他们：“我们确定不接受这一点，因为我们没有收到相关指令；而且我们也没有权力介入这件事情。”

就在那时，中央政府代表团的团长李维汉说：“如果你们不解决内部问题，我们就不能签订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协议。”我们回答说：“如果是这样，那没什么大不了的（藏语：*khyebar mindu*）。我们可以不签协议。又不是非签协议不可。我们不掺和这件事。如果〔中央〕政府坚持说我们必须解决地方政府和班禅堪厅之间的事情，那我们无能为力，因为我们没有接到命令要我们处理这件事。如果你们继续这么坚持，那么我们可以不签这份协议，撕掉它就行了。”

〔阿沛接着补充说：〕“中央政府应当对凯墨、桑颇和其他代表的安全负责，把他们平安地送回西藏。我已经被任命为昌都解放委员会的领导干部，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我归属昌都，我可以待在那里。我不需要返回西藏。如果你们需要我可以暂时留在北京。”我告诉四位代表团成员说：“你们几个应该返回西藏，我会留在北

京或者去昌都。你们是为〔谈判的〕目的来的，所以中央政府会负责把你们安全地送回西藏。”所以这份我们谈了好几天的协议……〔表面上〕是夭折了。

两三天之后，中央政府代表团的一位代表孙志远说想见我，我说行。那次会面的翻译是平汪。我们住在北京饭店，所以我们大约上午九点的时候在饭店见面。其他代表不在场，只有我们俩在谈。

那时，班禅喇嘛大约十二三岁，这个请求大概是他的随从或者班禅堪厅的人提出的，也或者就是中央政府的意思。但无论如何，他们想要的是把卫和藏分开，说岗巴拉山口以南的领土要由班禅堪厅管辖，而岗巴拉山口以北的领土由〔西藏〕地方政府管辖。

我告诉他们：“那不行。不管你们和我说多少遍我都不会接受。自古以来都是像现在这样的，所以你们提出的一些新政策和新条件是不能接受的。”

我们就这样你来我往地谈到了中午，接着吃中饭再休息了一会。在下午两三点的时候我们又开始谈。那一天，我们没有接受他们的观点，而他们也没有接受我们的。所以我们的分歧还存在，打算第二天再面谈。但是大约在下午七点的时候，孙志远说：“对于在协议中如何表述我有了一个办法。〔我们应当写〕对于十三世达赖喇嘛与九世班禅·额尔德尼彼此和好相处时各自拥有的地位及职权我们不干涉。”我告诉他：“……这样说比较合适……所以我们将会接受。但是如果你们提出与这个说法不符的条文，我们将不会接受。”接着他〔孙志远〕说：“那没问题。我〔孙志远〕是中央政府代表团派来的，是代表他们来谈的。”现在我们俩在这个问题上达成了共识，所以我们的谈判可以继续了。⁶⁵

最终，中国方面得以诱使西藏政府承认十世班禅喇嘛，接受他返回西藏，并且同意在《十七条协议》中用含糊的语言注明班禅喇嘛和他的追随者可以恢复他往日的权力。协议中涉及这个问题的两条为：

第五条、班禅·额尔德尼的固有地位及职权，应予维持。

第六条、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的固有地位及职权，系指十三世达赖喇嘛与九世班禅·额尔德尼彼此和好相处时的地位及职权。⁶⁶

65. 阿沛，1989。

66. 见第四章。

此时正在那里为中国代表团担任顾问的范明没有获得他想要的一切，但是对班禅喇嘛方面来说这仍然是一个重大的胜利。新的班禅喇嘛现在得到达赖喇嘛的承认，而且用他和他的官员的话说，他们将能带着自己的军队返回西藏，当然这个军队就是警卫营。

然而，谈判没能澄清造成九世班禅喇嘛逃离西藏的任何问题，双方都不得把这些问题的留待以后讨论。这些条款的所有内容要经过数年才能被双方接受。

■ 两支军队在拉萨合并

毛泽东决定创造一个“统一的”西藏，这就意味着不再需要来自西北局和西南局的两个工委来管理西藏的不同部分。因此，毛泽东指示西北局的西藏工委与西南局的西藏工委合并，而西南局的西藏工委成为统一的西藏工委的主体。⁶⁷

中国方面的文献表明，西南局和中央已经在3月底的时候讨论过这个问题。那时西南局向中央提交了一份有关如何创建这个统一的新西藏工委的计划。

〔西南局〕西藏工委原为张国华、谭冠三、王其梅、昌炳桂、陈明义、李觉、刘振国（以上七人均均为军级干部）、平措汪杰八人组成。张为书记，谭冠三为副书记。为了统一领导，应吸收西北西藏工委同志参加工委组织。但参加方案可以有两个：

一是西北西藏工委成员全部参加，十八军师级主要干部参加，这个方案人数较多，召集会议比较困难。

二是在原有八人外，再吸收西北西藏工委之范明、慕生忠、牙含章三人参加，并增加范明为副书记。

我们认为后一方案较好，便于开会商量问题。但在未会合前，两工委组织均不变。⁶⁸

67. 吉柚权，1993a: 45。

68. 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1990，1951年3月31日条目。

在5月底，签订《十七条协议》两个月之后，范明受命去重庆会见西南局的张国华和邓小平，讨论两支部队合并的问题。他们同意把即将护送班禅喇嘛进入西藏的骑兵部队编列为十八军的“独立支队”（独支）。但是独支会按照现有的组织结构单独进入西藏，并在到达拉萨之前继续接受西北局和西北军区司令部的领导。只有在进入拉萨之后这支骑兵部队才并入统一的西藏军区司令部。这个决定是在1951年5月25日作出的。⁶⁹在1951年6月11日，中央同意了西南局的第二种方案，并致电西南局和西北局告知了这一决定。⁷⁰

随着两支部队都在准备向西藏进发，与班禅喇嘛相关的问题又再次出现了。这是因为他和他的随员（和军队）到底应该什么时候返回还没有决定。最初的安排是他们和范明以及西北局的部队一起返回，但是到了6月末，中央决定班禅喇嘛最好是比范明和部队晚一点出发，这样他就可以在达赖喇嘛从亚东回到拉萨之后到达。

中央复电中还指示班禅入藏则应劝其暂缓，候达赖表示欢迎后再去为有利。范明走后，牙含章应继续留班禅处工作，班禅行辕可派极少数人员随范明先行入藏。⁷¹

范明和他的部队在1951年8月22日出发前往西藏。11月4日，他们到达那曲，在那曲停留了十天，于12月1日到达拉萨。

■ 解放军内部的不和

中央在西藏建立统一领导的决定表面上听起来很合理，但是内部却隐藏着严重的问题。西北局和西南局部队之间的紧张关系在范明到达拉萨之前就已经出现了。两支部队的不和不仅在于对班禅喇嘛的地位和前后藏问题上的分歧，还在于对1950年昌都战役胜利的认识。对于这次战役西北局的部队认为他们没有得到应有的肯定。

69. 范明，访问记，1993。

70. 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1990，1951年6月11日条目。

71. 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1990，1951年6月25日条目。

昌都战役中主要的进攻部队是西南局的十八军，但是范明的部队中由孙巩直接领导的五百人的骑兵支队也参加了战斗。他们配备新式的布伦式机枪，接受了一项关键性的任务——击溃昌都西北边界（类乌齐，Riwoche）的西藏守军，然后南插到位于恩达（Enda）的重要交叉路口切断逃往拉萨的道路。这就会使所有从昌都逃出来的藏军陷入包围，可以在那里对他们进行总攻。孙巩的部队在最后四天不眠不休昼夜前进，到恩达时只比从昌都撤退下来的阿沛早了一点。正如前面已经提到的，在阿沛了解到孙巩的部队出现后，他没有选择硬冲过去，而是后退到附近的一座寺庙里安营扎寨，坐等投降。因此，俘虏了阿沛和跟他一起的其他西藏高级官员的是西北局的骑兵支队。这是此次战役最为关键的一场战斗，因为中国人的整个作战计划就是围绕切断藏军的逃跑路线而使其缴械这个中心的。

西北骑兵支队带着阿沛等人返回已经成为十八军主力军部所在地的昌都。这个时候，西北和西南部队之间产生了摩擦，原因是西北部队认为他们在战役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但是西南局的领导人却没有给他们相应的肯定和荣誉。阿沛手下的一位官员坚赞平措清楚地记得这件事。

随后阿沛和……余下的人被送回了昌都。抓住他们的是来自青海的骑兵，他们从类乌齐过来，是范明的部队，而占领昌都城的是十八军。接着这两支部队召开了一次会议，在会议上争论很激烈。十八军说：“我们解放了昌都。”而范明的部队说：“我们俘虏了阿沛。”这场争论持续了半天。⁷²

范明也谈到过这件事。

西北部队，也就是我的骑兵支队从香日德运动到丁青，绕到阿沛和拉鲁的背后。俘虏阿沛的是我的部队，〔西北局〕第一野战军的骑兵支队，我是它所在师的指挥官。

我们俘虏阿沛之后，在我们〔解放军〕内部有一些争论。从那时起，我们和西南局之间有了一些芥蒂。我们俘虏阿沛时，他的马有一个金马鞍，他也有其他一些东西，包括武器等，都被我们缴获了。对方〔十八军〕跑过来要这些东西。就这样他们带走了俘虏和

72. 坚赞平措，访问记，1992，拉萨。

他所有的东西，包括那个金马鞍。⁷³ 彭德怀的军队总是顾全大局。所以我们把那些东西给了他们。他们〔西南局的部队〕没有得到较高级别的命令，得到的命令只是来自师一级的吴忠。我们把所有的俘虏和他们的财物都交给了十八军。

〔如果阿沛从这条路上逃跑，而我们又没能从侧翼包围他，那么〕我们就不能赢得和平解放西藏的机会，阿沛向我们投降给西藏的和平解放帮了大忙。……阿沛是我们俘虏的，并且通过我们所做的工作，他改变了对我们的态度。……从这个角度说，没有〔我的部队〕那时的战斗就不会有西藏的和平解放。⁷⁴

根据范明和其他人的说法，实际上到现在为止西南局的前任领导人都没有充分承认西北局部队所发挥的关键性作用。因此西北局的骑兵部队觉得受到怠慢，忿忿不平地返回了青海。⁷⁵ 这种怨恨虽然只停留在背地里，但却是真真切切的，将会是使两支部队到达西藏后关系复杂化的一个额外因素。

范明的部队一到西藏东北部的那曲，两支部队之间挥之不去的相恶情绪就开始表面化了。乐于泓在他的日记里说：

〔1951年11月27日〕我和张代表去司令部和张军长、谭政委主要谈当前的思想工作问题。我谈到下面的反应：“独支”到黑河（那曲——译注）后，黑河兵站对“独支”的草料供应没完成份额，“独支”不满；兵站则认为“独支”要求太高，今后进入拉萨后生活要求高，就没法解决。我因此又担心今后工作上的团结问题。张军长对我说，有些下面的同志反映的情况也不一定听得那么确实，能团结别人的人，一定要心胸宽大才行……

三天之后范明到达拉萨的郊外，他向西南局的将领们提出了四点要求。针对他的这四点要求，乐于泓在他的日记中写道：“他为他的部队提出的要求太高了，我认为他将来会遇到麻烦。”⁷⁶

在一次访问中，范明表露出他对两支部队的看法，认为这两支部队非常不同，而他的士兵和官员要更胜一筹。

73. 据平汪（访问记，2000，北京）称没有金马鞍，但是他同意确实发生了冲突。

74. 范明，访问记，1993。

75. 范明，访问记，1993。

76. 乐于泓，1985: 308-9，1951年11月27日条目。

我们初到西藏的时候，西藏人把我们当作两支不同的部队。他们称我“潘”司令〔他们把“范”发成“潘”(Pan)的音〕，而称张国华为张司令〔即范明和张国华地位相同〕。我们的部队全部身着卡其布制服，装备冲锋枪，还有从朝鲜战场上缴获的卡宾枪。西南局的部队装备的武器不够精良。西藏人知道我们的部队是彭德怀的部队。⁷⁷……我的部队全都支持班禅，西南局的部队全都支持达赖喇嘛。⁷⁸

范明于1952年12月1日进入拉萨的时候，西南局西藏工委惟一的藏族干部平汪当时在场。他的回忆与乐于泓的说法较为相近。

甚至在西北局的部队到达拉萨之前，两个局的部队之间就已经产生了一些紧张气氛。随着范明逐渐接近拉萨，他派了一名叫白云峰的官员先行一步来和张经武、张国华谈相关安排。范明对自己的入城早有打算，他想让他的部队排成长长的队伍围绕八廓街行军。在白云峰告诉我们他的想法之后，张国华立即说这样做可能不好。他说：“一方面，你们的士兵和驮畜在经过了漫长的跋涉之后一定很累，因此留给别人的印象可能不会太好。另一方面，我们的主力进拉萨的时候，已经举行了有噶伦和藏军参加的盛大的庆祝仪式，所以不适合再这样来一次。”张国华向他介绍我说：“这是平汪，他是高级干部中的藏族同志，是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我们应当听听他的意见。”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好，但是我诚实地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我说：“我同意张同志的看法。而且除了他所担心的问题之外，我还认为，如果你们把部队带进城，那么将很难找到足够的牧草来喂养你们那好几百头的马和骆驼。”我还补充说，西藏人可能会把另一次大规模地展示队伍看作是中國人在炫耀武力。我说：“我们一直设法给西藏人留下好的印象，让他们把我们当作朋友，而不是征服者。”于是张国华让白云峰告诉范明，不要冒惹怒西藏人的风险沿着八廓街行军。但是范明对张国华的指示置之不理，还是按他的想法游行了一圈。在现在看来，这种事情是1950年代西藏党的领导层内部出现一系列观点冲突的前兆。

77. 此时的彭德怀是中国一位显要的角色，因为他是朝鲜战场上解放军的总司令。

78. 范明，访问记，1993。

范明到达西藏也给部队与西藏政府之间的关系带来了问题，这是因为范明对西藏政府的接待很不满。我告诉过噶厦他们应当按照西藏习俗派官员到城外去迎接范明。他们同意了，但是他们派出的接待团仅仅由一名官阶四品的中层官员带领。而我们方面的领导人中，张经武和张国华也没有参加。仅仅派了较低级的官员——阿乐部长（Alo Budrang）〔乐于泓〕、徐淡庐、陈竞波和我去。

范明把这一切都记在心里。他对这些西藏人非常生气，以至于当为首的西藏人走向他向他献哈达的时候，他很生气地推开了，丝毫不屑于这种礼节。他的行为让我们所有人都大吃一惊。西藏官员纷纷向我表示他们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其实我必须承认我和他们的感觉相似。我不知道范明心里在想什么。他本应该对西藏政府的代表表示尊重，而不是傲慢。他的行为给我留下非常负面的印象，当然也给西藏官员留下这样的印象。⁷⁹

范明因自己所受到的接待而触发的愤怒与班禅喇嘛的首席官员计晋美相似。计晋美跟随范明的部队一起来西藏会见西藏政府，商量班禅返藏的安排。与范明的情况类似，西藏政府规格较低的接待团让他感觉受到侮辱。乐于泓在日记里记录了计晋美刚到拉萨时他同计晋美会面的情况。

我到计晋美处长那里坐谈了半天，……〔他〕身穿中山装，不肯换藏族官员的服饰，说没打算换藏族服饰。他说：“对藏政府应硬一些！班禅、达赖争谁高谁低，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只有天晓得。”

我看团结问题是个不小的问题。⁸⁰

于是从一开始，范明就觉得西南局的官员没有向达赖喇嘛的政府施压，迫使他们向他和班禅的首席官员计晋美表现出尊重。西南局和西北局官员之间的不和会继续下去，而且实际上会在接下来的几年内持续恶化。究其原因范明并不认同毛泽东的渐进主义政策，而是主张迅速实行改革。

79. 引自戈尔斯坦、道韩喜饶和司本石初，2004: 167（划线部分为强调）。

80. 乐于泓，1985: 309–10，1951年11月29日条目。张国华事后（在1954年）做了一个自我批评，说他没有给阿沛施加更大的压力让他们派一位噶伦来迎接计晋美，这是他的错（赵慎应，1998: 86）。

■ 新西藏工委

摆在两支部队面前的第一项任务是解散各自的西藏工委，建立一个新的统一的西藏工委。对于这件事情，平汪解释说：

虽然这样的事情〔范明在欢迎仪式上的事〕很令人遗憾，但是北京给我们的指示是要在西南局和西北局的部队之间建立一种友好的合作关系。因为每支部队都有他们自己的西藏工委，于是我们开始把这两部分官员合并成一个新的统一的西藏工委，由他们为中国方面讨论和决定西藏事务中所有的重要问题。⁸¹



图 16：1951 年 12 月联合庆祝西北军挺进拉萨。左起：慕生忠、范明、张经武、张国华、谭冠山。摄于 1951 年 12 月 1 日。照片来源：范明

按照以前的计划，新的西藏工委包含两支部队的官员，其中第一书记和主要的成员来自于西南局，它就像中国内地一个省份的党委一样。在 1951 年 12 月 5 日，张国华向西南局汇报了统一的新西藏工委的组成，之后西南局于 12 月 12 日将他的汇报内容转达给中央。一周之后的 12 月 19

81. 戈尔斯坦、道帙喜饶和司本石初，2004: 167。

日，北京予以批准。又过了几周，到1952年1月10日，中共在拉萨召开了一个正式的会议，宣布成立统一的西藏工委。在这次会议中张经武宣布了经过中央同意的任名单。第一书记是张国华（西南）；副书记是谭冠三（西南）和范明（西北），其他成员包括牙含章（西北）、慕生忠（西北）、昌炳桂（西南）、王其梅（西南）、陈明义（西南）、李觉（西南）、刘振国（西南）和平汪（西南）。⁸² 因为张经武是作为中央政府的代表来西藏的，并且按计划他会返回北京从事原来的工作，所以他没有被包括在新的西藏工委当中。

因此，在外界看来一切都很顺利。西藏方面对两支部队之间的紧张关系没有什么了解，但是这种紧张关系确实是存在的，而且很快就表现出来。这不仅仅因为范明和张国华在班禅喇嘛的问题以及对待两位充满敌意的司曹的问题上意见不同，而且因为范明对他自己和张国华的相对地位也有很多看法。范明认为他是派驻班禅喇嘛方面的“代表”，与张经武的情况比较相似，尽管他只是西北局派出的代表，而张经武是中央政府派驻达赖喇嘛方面的代表。而且，他对自己的看法很当回事，认为这使他的地位更接近张经武，比张国华和谭冠三要高一些，因为张国华和谭冠三只不过是军官而已。用他自己的话说，

张经武是派驻拉萨负责前藏的代表，而我是派驻班禅堪厅的代表。这两位代表都是受中央政府直接领导的，就像达赖喇嘛和班禅平行地受北京的领导一样。作为派驻班禅堪厅的代表，我受的是中央政府的领导，派驻达赖喇嘛政府（噶厦）的代表和我的情况一样。中央政府对达赖集团和班禅集团都是直接领导。事情就是这样，并不是一个小的代表受一个大的代表的领导，很多人不了解这一点。……所以作为驻班禅堪厅的代表，我是由中央政府任命的，并受中央政府的领导。⁸³

当时在十八军的一位藏族学者进一步给出了解释：

82. 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1990，1951年12月20日条目；吉柚权，1993a。

83. 范明，访问记，1993。

张国华是一名将领，口才不是很好。他说话总是直来直去。范明很有学识，口才很好。张国华的行为举止就是一名军官，而范明则要优雅得多，就像一名国民党官员。例如，当他发表讲话的时候会很放松，会把一只手插在口袋里。范明以前是一名潜伏在国民党内部的地下党，因此那时候所有人都称范明为“大政委”。在军营里，范明的讲话士兵们不喜欢听，但是知识分子喜欢他。他发言的时候会强调他的学识，而且他的书法是西藏最好的。在过去的四十年里，范明的书法和诗词都是最好的。〔除此之外，范明〕得到了彭德怀和习仲勋〔第一野战军和西北局的领导人〕的强有力支持。⁸⁴

范明认为应当由他来领导西藏工委，而张国华应该把精力集中在军区的事务，即军事而不是民政和政治事务。也就是说，范明认为自己本应该掌握所有的权力。⁸⁵

范明和西南局之间的不和迅速浮上了台面，变得非常严重，以至于毛泽东（大概是通过张经武）都知道了。于是在两个月之后的3月7日，中央改变了原来的计划，指示张经武留在西藏任工委第一书记（同时还为他预留了原来在北京的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的职务）。张国华现在成了第一副书记，而谭冠三和范明分别成为第二和第三副书记。当然这意味着现在西藏的第一把手已不再是西南局的官员而是中央政府的官员了。但是张国华仍然是驻西藏解放军部队的最高指挥官。除了这些安排之外，为了安抚范明和西北局，毛泽东给他们精心安排了重要的位置。对此，平汪回忆说：“西北局的官员获得了重要的职位，使他们在日常事务中拥有相当大的权力。例如，范明被任命为统战部的部长。统战部是一个关键的部门，因为它负责处理同西藏人的关系。西北局另外两位重要干部慕生忠和牙含章也被委以重任。”⁸⁶ 范明证实了这一点：“在1958年以前，我负责西藏工作。张国华负责西藏军事工作。……张经武是书记，我在西藏工委，而西藏工委才是掌实权的。实际上，我像是个常务副书记。”⁸⁷ 在以后的章节中将会谈到，范明随后开始执行较张经武和张国华更为强硬、更为左倾、偏向班禅喇嘛的路线，在西藏的党内引起了严重的冲突。

84. 降边嘉措，访问记，1993。

85. 降边嘉措，访问记，1993。

86. 戈尔斯坦、道韩喜饶和司本石初，2004: 167。牙含章是西藏工委秘书长。

87. 范明，访问记，1993。

降边嘉措在访问中说这种分歧是极不寻常的：

张国华和范明在看待民主改革、人民，看待座次安排等问题上往往意见相左。基本上每一件事……他们的看法都不一样。这种看法的不同至今仍然存在。

因为他们两个人关系很僵，所以毛泽东让张经武留在西藏当正书记，让张国华、范明和谭冠三当副书记。这种一个书记三个副书记的情况绝无仅有。那时我们没有意识到里面有争斗的成分，但是过后我从一些材料中了解到这一点。中国有二十多个省份，在所有这些省份中只有一位正书记一位副书记，西藏有四位书记的情况是独一无二的。……这就是为什么要让张经武留在拉萨。⁸⁸

虽然这种解决方式绝无仅有，但是在北京看来却是精明的方式，因为它消除了西藏党内冲突的一个因素。但是关于策略的严重分歧依然存在，而且范明并不打算顺从西南局人员的观点。

88. 降边嘉措，访问记，1993。

第十一章

执行《十七条协议》的前奏

1951年10月底的时候，达赖喇嘛正式接受了《十七条协议》。与此同时，解放军的主力也已到达拉萨。这为西藏工委开始严肃讨论执行协议创造了条件。但是工委现在还需要回答一个问题，即应当先推动哪些条款，具体困难有多大。在拉萨的中方领导人清楚地了解到他们应当回避像土地改革、阶级斗争这类一触即发的问题，但是就算除了这些问题之外，事情也容易不到哪里去。

在1951年的11月和12月，中藏双方仍然保持着分立的行政架构。正因为这个原因，中国人提出的第一个事项就是联合成立两个新的行政机构。这两个机构由中央政府统一领导，由中共官员和西藏政府官员两部分人员共同组成。

■ 西藏军区司令部

两个新机构之一是西藏军区司令部，它最终将会负责监管藏军和解放军。《十七条协议》第十五条对此有明确的规定。

为保证本协议之执行，中央人民政府在西藏设立军政委员会¹和军区司令部，除中央人民政府派去的人员外，尽量吸收西藏地方人员参加工作。

1. 军政委员会的英文有时候是“committee”（委员会），有时候是“bureau”（局）。本文（英文版——译注）中除了在引文部分用“bureau”之外，其他部分用的都是“committee”。

此外，协议的第八条要求藏军逐步并入解放军，归于西藏军区司令部管理。

西藏军队逐步改编为人民解放军，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武装的一部分。²

前面的章节中已经提到，在司曹和其他很多西藏官员看来，藏军问题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他们认为，一支独立的军队是独特政治地位的重要体现。西藏政府那时有自己的藏军司令部，它位于布达拉宫下面一个叫雪村（Shöl）的地方，负责管理藏军的征募、发饷和训练。在履行这些职能的时候藏军司令部不用与中国方面协商，也不受他们干预。当中国人提出相关问题的時候，司曹对所有可能使藏军并入解放军的措施都坚决反对。于是，甚至连更改藏军制服和军旗的讨论也引起激烈的争论。而且这种争论不仅仅局限于西藏和中国之间，也存在于中国内部，原因是在这个问题上范明和西北局干部的态度要比张国华和西南局干部的态度强硬得多。藏族干部平汪回忆道：

我们注意到藏军在操练和庆典游行的时候打出的是一面“雪山狮子旗”而不是中国的国旗。（他们还继续穿着他们自己的制服。）我们的某些领导同志认为这不合适，认为这使西藏看起来仍然不是中国的一部分。持有这种想法的最典型人物是范明。当西藏军区司令部于1952年2月成立时，这种想法引起了激烈的争论。

西藏军区司令部这个新机构将会管理在西藏的所有解放军部队，而且将来也会管理藏军。按照规定，藏军最终是要并入解放军的，但是在1951到1952年间它继续在其传统的领导架构下独立存在。我们中很多像范明那样的干部对此表示了异议，但这是在北京的谈判中商量好了的。然而，中央政府也觉得有必要让新成立的司令部象征性地表现出既是中国军队的司令部又是藏军的司令部，于是（在机密附件中）规定了两位西藏高级官员将会担任它的副司令员。西藏政府遵照这项规定选派了绕噶厦和阿沛担任这个职务。在西藏军区司令部的成立仪式上，他们两人和藏军总司令都身穿解放

2. 见第四章。

军制服。但是，那些参加这个仪式的藏军士兵继续打出他们自己的“雪山狮子旗”，这让范明和解放军中的其他人很气愤。他们认为既然西藏不是一个国家，那么它就不能有自己的国旗。范明觉得我们应当向西藏政府施压，要他们停止他所谓的昭然若揭的反动和“分裂”活动。

在使用这个旗子的问题上出现了严重的争论，但是代理首相（司曹）鲁康娃拒绝让步。他的理由是那个旗子根本不是“国旗”，而只是藏军的军旗。他举证说，西藏政府的大楼上从没有挂过这面旗子，而事实也正如他所言。对于这个问题我们没有牵涉其中，所以我对事情的经过和争吵的情形记得不是很清楚。但是老实说，很多解放军军官和士兵看到藏军打出他们的雪山狮子旗时的气愤之情我是能够理解的。

在这个问题上，张国华和张经武对范明的观点表示反对。毛主席和中央政府给十八军的基本指示清楚地指出我们必须慢慢来，要尽一切努力争取达赖喇嘛和精英阶层。张经武和张国华把这看作是根本方针，认为强迫西藏人停止使用他们的“军旗”会产生不好的后果。他们觉得不值得为这个微不足道的象征性问题吵得天翻地覆。我在西藏工委干部会议上对他们的观点给予了支持，因为我比其他入更懂得我们应当慎重稳进，把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长远目标上的道理。为了最终说服西藏人主动开始改革，我们必须设法使西藏精英们相信我们不是他们的主人或敌人。当然，范明强烈反对。我想，在他心中旗子并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他想一劳永逸地终结藏军和西藏政府的独立性，不管这会对中藏关系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所以他坚持认为不能对这个行为听之任之。我常常和我的藏族同事开玩笑说范明的个性像性急的康巴人，冒进而且好斗，而西南局的官员们则更像谨慎老道的拉萨人。

幸运的是，张经武和张国华的观点取得了胜利，西藏工委没有抓住这个问题不放。实际上，一直到1958年，也就是我最后离开拉萨的时候，藏军仍然打着他们的军旗，尽管那时他们也会同时升持国旗。旗子问题是西藏工委内部出现的第一个重大的意见分歧。当然它不会是最后一个。³

3. 引自戈尔斯坦、道韩喜饶和司本石初，2004: 174-76。



图 17：1950 年代打着军旗的藏军部队。照片来源：平汪的收藏品

由这个问题造成的对立情绪可以从一次火药味十足的会面看出来。在这次会面中范明告诉司曹：“如果你们不挂国旗，那么我们〔中国方面〕将会把它插上你们的司令部。”鲁康娃愤怒地回应道：“不管你们插上去多少次，我们都会把它扯下来。”于是范明怒斥鲁康娃和洛桑扎西在中国人和西藏人之间制造麻烦，说他（范明）要向达赖喇嘛告状，要达赖喇嘛把他们撤职。但是鲁康娃并不让步，他告诉范明：“如果你们中国人命令我们辞职我们是不会服从的，但是如果达赖喇嘛要我们赴汤蹈火，我们会毫不犹豫地去。”⁴

4. 夏苏，1999：361-62。

然而，中国方面从他们和噶伦们的会晤中了解到，对这个问题的反对情绪不仅仅局限于司曹，在社会中也已经深深地蔓延开了。于是他们作出让步，藏军没有并入解放军，制服也没有换，西藏的旗子也继续挂着。但是西藏方面任命两位噶伦担任1952年2月10日成立的西藏军区司令部的副司令，算是让中国人赢得一个很小的胜利。⁵这算是中国人取得的一项进展，但是它太微不足道了，只具有象征意义。这是因为两位噶伦并不在军区司令部工作，而军区司令部对藏军也没有任何的权威。同时，中国人也为这个成就付出代价，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产生的激烈争吵加剧了拉萨紧张和愤怒的情绪。这出乎毛泽东的预料，在他预想的执行他的渐进主义策略的过程中是没有包含这种情况的。

■ 西藏军政委员会

另一个行政机构是西藏军政委员会，协议中也明确提到了它。前面已经提到，在中国的其他部分，军政委员会是在人民政府成立之前由军队控制的一个过渡性的行政机构。但是在西藏，军政委员会将会起到稍为不同的作用，因为它不会取代传统政府，而是同政府共存，至少在某段未加限定的时期内会是这样。此外，西藏的军政委员会还有一个很大的不同点，即西藏工委不愿意在没有得到达赖喇嘛和他的政府的允许下单方面成立它。

在西藏成立军政委员会的想法从北京谈判开始就一直受到西藏人的强烈反对，而且正如班禅喇嘛的问题一样，军政委员会的问题也几乎导致北京谈判的破裂。对于这一点，平汪回忆道：

在正式的会议上提出〔军政委员会的〕问题之前，李维汉邀请阿沛和我到他的住所去。李维汉是想给阿沛一点时间，让他和他的代表一起商议关于那个机构的问题。那天晚上，李维汉先说了几句客套话。他说：“事情进展得很顺利，我们都很努力。尽管我们有一些分歧，但是其中绝大部分都已经解决了，而且也已达成了共识。但是，我们还需要讨论最后一个问题。”他停顿了一下，说：“我们

5. 杨一真，1987：58-60。

需要在西藏设立一个军政委员会。它将是中央政府的一个行政机构，达赖喇嘛将会是主席，中央的代表和班禅喇嘛将会担任副主席。”当他解释完这些，仔细倾听的阿沛礼貌地表示要走。他和我走回了我们的饭店。阿沛对李维汉的建议没有发表任何看法，但是紧接着发生的事让我们所有人都大吃一惊。

三天之后，李维汉觉得已经给西藏代表团充足的时间来消化这个消息了，于是召集了一个会议。他首先介绍了在西藏设立军政委员会的建议，当西藏代表团听到这些细节之后，他们表现得非常愤怒和震惊。

他们所理解的协议会允许达赖喇嘛的传统政府继续在西藏内部存在，这也是他们喜欢这份协议的原因。但是当听说这个新的条款时，他们感到很气愤，因为在西藏设立军政委员会的想法可能会损害传统政府至高无上的地位。他们认为中国人似乎是在偷梁换柱。当李维汉介绍细节的时候，我听到凯墨小声地说：“真是怪了，这个谈判没完没了。真是糟糕透顶。”

很显然，这是他和其他所有人第一次听说这个建议。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情况变得越来越糟糕。我猜想李维汉大概是准备说“我想阿沛和你们都商量过这个问题了吧”这样的话了，但是还没开口就被僧官拉乌达热打断了。拉乌达热脸色铁青，他卷起袖子，气愤地挥着拳头说：“你们这些人怎么能这样？中央政府每天都有新议题提出来。我们讨论各种各样的议题已经好几个月了。现在我们以为事情快要结束了，但是你们却又提出一些这样的新议题！”阿沛什么话也没有说，他静静地坐在那里。其他西藏人都对李维汉的建议感到很吃惊。在听了西藏方面说出更多愤怒的话之后，李维汉发火了，他说：“如果你们真是这么认为的话，那么你们可以收拾东西回家了。”当然这句话的含意是解放军会用武力解放西藏。

事情似乎急速失控了，于是我决定设法让双方冷静下来。我站起来说：“今天会上每一个人都有怒气。大家说了很多过激的话语，互相之间也有很多误解。李维汉的意思是让我们全部返回北京饭店。所以今天就到此为止吧，等以后我们再心平气和地思考和讨论这个议题。”我自作主张这么说是为了消减李维汉话中的威胁意味，让大家以为他的意思是要西藏人返回饭店而不是返回西藏。

中国代表团可以说是措手不及。他们没有预料到这会是一个困难的议题，不仅仅因为他们猜想阿沛已经预先做了准备，也因为军

政委员会是全国各地都会有的机构，并不是什么我们要强加给西藏人身上的特殊的東西……

因为在李维汉告知阿沛之后我们没有收到西藏方面任何的反馈，所以我们认为他们已经同意了。当我们回到饭店的时候我直接去找西藏代表团，试图向他们解释中国方面的建议的具体含义。凯墨对我说：“平汪（拉），这个机构讲不通，就好像让一个人骑到原本已经在马上的人的脖子上一样。”凯墨心中很不安也很不高兴。我尝试从另一个角度解读，首先强调成立军政委员会是中国政府的一贯政策，并不是专门针对西藏设计的。我解释说中央政府已经在新中国的四五个大区内成立了这样的委员会。在所有的情况下，它们都是作为一个代表中央政府的临时性行政机构，当更具有代表性的永久性机构成立时它就会停止存在。在西藏的这个委员会只会是这样的临时性行政机构，它不会高过西藏政府。并且我提醒他们，达赖喇嘛将会是骑马的人，即他会是这个委员会的主席，因此能够掌控这个委员会。所以他们没有必要担心它。

我也间接地告诉凯墨和拉乌达热这个问题并不是突然提出来的，其实李维汉已经在较早的时候向他们方面提出了这个问题。但是我没有特别提到阿沛，因为我觉得这对他们来说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像这样谈了一会儿，之后凯墨和僧官拉乌达热说：“哦，我知道了。现在我们懂了。”我于是问凯墨，明天继续针对这个问题进行会谈怎么样？他说：“行。如果是这样，那没问题。”

在我们努力解除西藏代表团的担忧的同时，中国政府的代表们正做着最坏的打算。他们真的以为西藏代表团可能会因为这个议题而打道回府，而这将会是一个很尴尬的局面，很可能意味着战争。

我立即打电话给李维汉说我想见他。他开口第一句话是“你们的人要收拾东西回西藏？”我高兴地说他们没有。我说：“事情又回到了正轨，因为我解释了军政委员会的真正含义，使他们相信它将是临时性的，不会降低达赖喇嘛政府的权威。”李维汉先是有所怀疑，觉得难以相信。“真的？”他问，“你确信？”我告诉他是真的，于是我记得他接下来做的事是拿起电话打给毛泽东，说：“平汪刚刚告诉我问题已经解决了。我们明天就可以和西藏代表团谈。”因为房间里很安静，所以我可以清楚地听到毛泽东的声音，他非常高兴。而且很显然李维汉也很高兴，以至紧紧地握住我的手。第二天早上大家的火气消了之后，双方继续讨论。

我到现在也不知道为什么阿沛不提前把这个议题告诉西藏代表团。我从没有和他谈过这件事，但是在李维汉问我为什么他一提这个问题西藏人会如此吃惊时，我告诉了他我的想法。我说我认为阿沛之所以不把这个信息告诉别人是因为他是被俘虏的，有很多谣言说他被中国人收买了，所以他可能会觉得如果他告诉别人曾经就这样一个敏感问题和中国人进行了单独的会面，那么将会使这些怀疑更加加深。经过这个最后的危机之后，谈判很快就结束了。⁶

现在再说拉萨这边，成立这样的机构对西藏政府来说是更加不可接受的，对司曹来说更是如此。在商量达赖喇嘛接受协议与否的讨论中两位司曹不断地提到这个机构。现在中国方面耐心地向西藏政府解释说，军政委员会的职能范围将会局限于新职能，包括协议的执行过程或者其他现代化的努力，例如建学校、修路等等。因此西藏政府的行政职能将会分成传统领域和新的领域，传统领域由达赖喇嘛的政府管理，而新的领域由军政委员会管理。当然，达赖喇嘛也将会是军政委员会的首脑——主席。中国方面希望借此说服西藏政府接受军政委员会。另外，中国人也允诺将昌都地区的行政权归还给新的军政委员会（但不是还给西藏地方政府）。

但是司曹强烈反对军政委员会，而且实际上所有的政府精英都表示反对。在军政委员会的名称中，“军”和“政”一起用，让人形成一种印象，即中国人的军队管理民间事务，最终也包括管理佛教。这让西藏人产生担忧，害怕达赖喇嘛会失去权力，西藏政府会被架空。⁷于是，西藏人引用协议的第四条进行反驳。第四条为：“对于西藏的现行政治制度，中央不予变更。达赖喇嘛的固有地位及职权，中央亦不予变更。各级官员照常供职。”⁸

但是中国人仍然继续推动，争辩说既然军政委员会是在《十七条协议》中明确规定了的，那就必须执行。在开始的时候，他们取得了一些进展。在1950年11月20日，掌管索穷噶厦的三位噶伦来见张经武。张经武要他们从西藏政府中列出一份提名名单，为军政委员会做准备。乐于泓

6. 引自戈尔斯坦、道韩喜饶和司本石初，2004: 148-51。

7. 昌松，访问记，1992，拉萨。在1951年年底前昌松的职务是噶仲，但是之后他成了日喀则宗的宗本。

8. 见第四章。

在他的日记中说，三天后噶厦叫他去，在那里讨论了军政委员会的提名人选。⁹ 但是面对包括司曹在内如此广泛的反对声音，噶厦没法再继续推动这一提议。为了回避责任噶厦选择把这个问题提交民众大会，在11月25日和26日进行讨论。民众大会建议达赖喇嘛应当拒绝担任军政委员会的主席，当然这个结果并不在意料之外。¹⁰ 在12月及接下来的1月和2月里，中国方面继续向西藏政府施压要他们同意，但是西藏人一直拖延，拒绝采取任何进一步的措施。

在这些问题提出后得不到执行的同时，中国方面提议开设新式学校。《十七条协议》中的第九条说：“依据西藏的实际情况，逐步发展西藏民族的语言、文字和学校教育。”¹¹

■ 拉萨小学和解放军干部学校

在1923年和1944年，西藏政府曾先后两次雇用一位英国校长，在西藏开设一所现代学校。由于僧侣和保守派的反对这些尝试均告失败。所以在1951年的时候，西藏全境没有任何一所现代学校，在拉萨和其他城市也只有少量的私塾。那些私塾基本上只教学生们读写书面藏文。¹² 想让自己的孩子接受现代教育的精英们会把他们的孩子送到印度的大吉岭和噶伦堡去。

中国人致力于改变这种现状，想为西藏人建立一种新的教育体系。他们认为这在政治上是很重要的，因为他们希望使西藏人有机会接受现代教育，这样就可以培养出一群受过教育的年轻人，而这些年轻人会倾向于现代化，倾向于社会主义和中国。

9. 乐于泓，1985: 306–7，1951年11月20日和23日条目。

10. 英国外交部档案，印度驻拉萨代表处11月16日至12月15日的月度报告，包含于美国国家档案馆，793B.00/2–652。

11. 戈尔斯坦，1989: 767。

12. 对于开办现代学校之尝试的讨论，见戈尔斯坦，1989: 121，419–26。需要指出的是，1940年代国民党在拉萨开办了一所小型的“现代”学校教授中文，但是绝大部分学员是在拉萨的中国穆斯林。这所学校随着1949年国民党人员被驱逐出西藏而关闭。

类似地，张经武和谭冠三觉得教他们自己的干部学藏语对成功地执行毛泽东的渐进主义政策也是很重要的。他们做的第一件事是为解放军开办一所藏文学校。西藏工委内部对此有一些反对意见，因为某些干部，尤其是那些从西北局来的干部，觉得学习藏语是浪费时间，他们争辩说藏语作为一种语言没有汉语和英语那么完善。但是大部分人批评这种说法是大汉族主义。¹³ 最终，西藏工委开办了一所藏文学校，授课对象是他们的年轻士兵和干部，特别是解放军中的藏族成员，因为这些人被认为是将来西藏发展社会主义的潜在骨干。¹⁴



图 18：为去西藏的解放军教授藏语。上面的句子意为：“我们是人民的军队。”“到藏区去为人民服务。”照片来源：陈宗烈

13. 乐于泓，1986: 303-5，1952年1月12日条目。

14. 降边嘉措，2001: 116。

谭冠三是这个学校的校长兼党委书记。他们得到噶厦的允许，用位于拉萨河边与中国军事基地相连的名为仲吉林卡（Trungjilingka）的大块空地作为校址。学校总共有四十多位教师，这些教师是从跟随部队入藏的藏族人员和拉萨的知识分子人群、僧俗官员中挑选出来的。¹⁵ 这所干部学校于1952年1月12日开班，当时有超过八百名学员。¹⁶ 贵族车仁夫人是藏语教师之一，她谈了自己的经历和感受：

中国领导人希望他们所有的士兵都懂藏语，所以在1952年开办了一所部队学校。为了提供教学场地，侵略者们征用了河边俗官们的夏季马场仲吉卓康（Trungji Trokhang）。……八百名中国军队的学员席地而坐。¹⁷

当时，中国人来了很多次，说我们要教他们的年轻士兵藏语。他们告诉西藏政府他们需要一些高官的妻子充当教师，教这些男男女女的士兵，于是西藏政府派了我们五个〔妇女〕去当老师。¹⁸ ……我在这所中国人的学校里教了大约两年，在这两年里我很努力。那些孩子对〔西藏的〕境遇没有责任，我很喜欢他们，而那些孩子也很喜欢我。¹⁹

中国人把课程安排得很有效率。上午八点上课，下午五点下课，每周五天，每天中午有一个小时的休息时间。所有的课都是在室外上的，初春的时候还很冷，但是这些学生不得不坐在光秃秃的地面上。他们大部分人藏语学得很快，一天能学一百个词语。每个月的月末他们要进行一次测验，需要读写一百个句子。这些学生一有能力进行简单的交流，就会有其他人替换他们。但是那些很聪明学得很好的人会继续学完所有的课程，他们中的很多人成为官方的翻译，取代那些从巴〔巴塘〕来的藏语不是很熟练的翻译。

15. 这所学校被称为干部学校（藏语：*leje labdra*）或者藏文训练班（藏语：*pögi geyik jongdar dzindra*）。

16. 这些人是从那些连长和排长级别的人当中挑选出来的。

17. 车仁，1986: 206。

18. 这五个人是唐麦·贡却贝姆（Tangme Kunchok Pemo）、车仁·仁钦卓玛、江乐金·央金（Janglocen Yangjen）、桑林·索班（Samling Söpal）和崔科·德扬（Tsögo Deyang），她们全都来自“进步”的西藏贵族家庭，并且事前都向噶厦请示过，也得到了批准。

19. 车仁·仁钦卓玛，访问记，1992，拉普。

……在课间的十分钟休息时间，他们会给我端来一杯热水，而我会往里面加入一点咖啡、糖、奶粉之类的东西。我的学生是十六到十八岁的小姑娘，她们经常说：“您很像我的妈妈。”她们中的一些人已经有三四年没有见到她们的父母了，尤其是第一批来的人，经受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思乡期，因为从昌都和西宁到拉萨的公路要到两年之后才修好。

我很认真地教我的学生，把句子耐心地重复很多次，这让这些女孩子很感激。同这些中国人在一起让我产生了轻松愉快的感觉，我们曾经是那么害怕他们，但是现在我们在给他们上课。我牢记他们也是人，不应该用仇恨的眼光看他们。大环境是如此的可悲，他们又能做什么呢？他们的心中也是充满恐惧的。……我在这所学校里教了大约七百名当兵的学生，其中有男的也有女的。²⁰

然而，比这所干部学校更加重要的是为西藏人开办西藏第一所小学的计划。

■ 拉萨小学

负责创办新小学的王汪回忆了他和西藏工委的想法：“我强烈感到势在必行的几件事情之一是在拉萨开办现代教育。……从一开始我们就在西藏工委里商量提供公共教育的必要性问题。……我们认为学校将会是培养进步西藏青年的基地，这是创造一个现代西藏的第一步。”²¹

新学校的重点将主要是教授藏文，但是也会教授数学、地理等现代学科。中文不会正式教授，但是会通过歌谣的形式非正式地介绍给学生。²²

在具体操作上，中国方面认为很有必要让这所学校成为中国和西藏联合创办的学校，而不单单只是西藏工委的学校。于是他们招揽了西藏各个阶层的重要人士。²³ 他们首先召集了一个大型会议来讨论这个想法，有大约五十名重要的西藏人参加了这个会议，包括阿沛、擦绒、噶雪、桑颇、

20. 车仁，1986：206-8。

21. 引自戈尔斯坦、道韩喜饶和司本石初，2004：178。

22. 乐于泓，1986：308-9，1952年2月16日条目。

23. 戈尔斯坦、道韩喜饶和司本石初，2004：178。

索康堪穷、达拉·平措扎西、擦珠仁波切、凯墨札萨和江乐金等等。会上每个人都很热情，所以在会议最后乐于泓和阿沛整理出一份名单，由他们组成这所学校的筹备委员会。²⁴ 当这个名单被通过之后，具体的工作马上展开，²⁵ 各项任务被分派下去。例如，擦绒和噶雪负责购买簿本，另一些人制做课桌和椅子。于是学校要在（1952年）4月正式开课的说法传了开来。²⁶

1952年2月，达赖喇嘛的家人答应把他们在色新（Seshin）的房子以八千“秤”的价格卖给解放军。因为这个房子位于市中心，所以很适合开办学校。²⁷ 准备教学内容的工作也展开了，当然这项工作更加敏感，因为西藏工委的基本要求是教学内容必须与党的政治路线保持一致。实际上就是教学内容未经中央政府的批准不得更改。²⁸

然而，教学内容的问题引起了波折，很快创办学校的整个想法在噶厦内部遇到困难。阿沛非正式地向中国人解释说，尽管所有的噶伦都表示赞成开办一所小学，但是有些噶伦说教学必须由西藏政府控制，并且有必要在教学中补充一些宗教修习。阿沛本人不同意这个看法，认为这会造成严重的问题。所以他建议中国人不应当再同噶厦谈这个问题，言外之意就是他们应当自己来办。

于是在接下来的几星期里，中国方面在没有寻求噶厦同意的情况下自行设计了政治教育方面的课本内容。中国方面也让中央政府负担学校的开支，于是解决了资金的问题。但是随着开办学校的计划逐渐广为人知，拉萨的反对声音也急剧地增长了。3月27日，乐于泓在他的日记中记录说中国方面已经听说拉萨人签署了一份反对这所小学的请愿书，而刚刚从印度返回、地位很高的噶伦索康也是这份请愿书的签署人之一。²⁹ 这是不大

24. 他们中有九个人来自西藏方面（索康堪穷、噶雪、桑颇、擦绒札萨、达拉·平措扎西、邦达昌、擦珠仁波切、江乐金和阿沛），有四个人来自中国方面（林亮、李觉、平汪和乐于泓）。

25. 乐于泓，1986: 310，1952年2月18日条目。

26. 乐于泓，1986: 313-15，1952年2月20日条目。

27. 乐于泓，1986: 323，1952年3月6日条目。

28. 乐于泓，1986: 315-16，1952年2月22日条目。

29. 乐于泓，1986: 339，1952年3月27日条目。达赖喇嘛的二哥嘉乐顿珠在一次访问中（1995，香港）对我说，中国人告诉他那时索康在帮助他们，说索康会在晚上

可能的，因为索康很主张现代教育，而且他所有的孩子都是在印度上学。但是反对的声音的确在增长，这些声音来自于僧官系统，同时也来自于一个新兴的自称“人民会议”的政治集团。西藏人因为军队的争议、军政委员会的设立以及很高的通货膨胀已经非常愤怒了，他们认为中国人在试图改变西藏社会。在这个时候推动开办一所小学进一步激发了西藏人的怒火，进而在拉萨造成一个极度危险和动荡的局面。下一章将会介绍这个动荡局面的情况以及中国人的应对措施。

去找他们，告诉他们噶厦的事情。的确有很多上层官员拜访中国人，但是乐于泓的日记似乎表明嘉乐的说法并不正确，中国方面把索康看作是他们的敌人之一。第十二章中引用的大量中国方面的电报也表现了对索康相同的看法。实际上真正令人吃惊的是，阿沛私底下向中国人透露了噶厦中争论的情况所达到的程度。

第十二章

西藏人民会议

传统上，西藏的政治是一小群僧俗精英们的特权。¹ 没有平民民主的概念，没有政党和政治上的言论自由，公开反对政府及其政策是不被允许的。西藏的传统政治信条很简单也很直接：政府的统治决策与被统治者无关。但是，《十七条协议》的签订和成千上万中国官员及军队的到来在西藏历史上第一次导致一个拉萨非精英居民组织的出现。这个组织叫做米茫春都（*Mimang Tsondu*，人民会议/议会），² 其目的是独立于政府之外对政治事务发挥影响。这个组织不仅反对中国人，反对共产主义，还对西藏政府持批评的态度。在他们看来，西藏政府在同中国人打交道时过于软弱无能。这个组织的活动几乎使中藏双方在1952年春天爆发冲突。

实际上，普通民众积极参与西藏政治的想法已经在社会中沉淀了很多年，这部分源于十三世达赖喇嘛数十年前播撒下的种子。十三世达赖喇嘛在1932年，也就是圆寂的前一年，写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常常被称为“政治宣言”或者“临终遗言”。他在这篇文章中警告说共产党将会威胁西藏，要求所有的西藏人为了共同的利益一起努力。这篇文章的内容如下：

当今的时代蔓延着五种形式的堕落，首当其冲的是红色的意识形态。在外蒙古，寻访哲布尊丹巴（*Jetsun Dampa*，库伦（*Urga*，后称乌兰巴托）的大喇嘛）的事业被禁止了；寺院的财产和供养都被没收了；上师和喇嘛被迫参军；佛教遭到了破坏，再也找不到佛的影子……

1. 对于重大问题，拉萨周围三大寺（哲蚌寺、色拉寺和甘丹寺）的堪布（以及卸任堪布）也会发挥作用。他们是通过参加一些为了处理棘手和严重的问题而临时召集的会议（见引言中关于民众大会的介绍）来发挥作用的。
2. 它在藏语里有很多相近的名称，如 *mimang tsondu*（米茫春都）、*mimang tsogpa*（米茫措巴）、*mimang thrösog*（米茫珠措）或者 *Chundru mimang thrötso*（春都米茫珠措），所有这些词最基本的含义都是人民会议或者议会。

在我们这块土地上，政教联合的〔政治〕制度是非常宝贵的。但是在将来，这种制度必定会受到来自内部或者外部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没能守住我们的土地，包括“佛王父子（原文为‘the triumphant father and son’——译注）”〔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在内的圣洁的上师们将会被清除，不留一点痕迹；活佛和寺院的财产连同那些敬献给佛教的供养全部都会被夺走。不仅如此，我们源于祖孙三法王的政治制度将会遭到破坏，只剩下空名；我的官员的财物和祖产将会被剥夺，内心承受恐惧和痛苦，度日如年。这样的时代一定会到来！……

我所有的臣民，不论僧俗、不论阶层，都有责任为了促进和平提升大众福利而统一思想，团结合作……

很明显，如果你们不为国家献身，继续沉溺于钻营自己的利益，行事带着门户之见，那么我们长远的共同目标将无法实现。到那时已是无药可救，后悔莫及了。³

可以看出，前一世达赖喇嘛不仅预言了外部的威胁，还预言了精英们自私自利的行为所造成的危险后果。在1950–51年的拉萨，很多人觉得他的预言应验了。

在十三世达赖喇嘛1933年去世之后的这段时期里，他曾经提及的内部堕落成了社会的标志。前面已经提到，在热振摄政时期（1933–43），渎职、贪污和道德沦丧在整个官场中蔓延。当热振从摄政的位置上退下之后又试图重新担任摄政时，冲突爆发了，西藏内部的不团结在这个时候到了危急的地步。当新任摄政大札（1943–50）采取对抗姿态后，拉萨色拉寺杰札仓的僧侣于1947年发动叛乱支持热振。以索康和拉鲁为首的噶厦在得知热振仁波切正寻求国民党中国（蒋介石）的帮助之后逮捕了热振，并命令藏军进攻在色拉寺发动叛乱的热振的支持者们。藏军轻易地击败了这些僧侣，平息了这场暴乱。但是当热振仁波切神秘地死在布达拉宫的监狱里时，他的支持者和其他很多西藏人都相信他是被谋杀的。⁴一位高级转世喇嘛（大札）与另一位高级转世喇嘛（热振）相斗，一座大寺的僧侣对

3. 阿乐群则，1958。根据洛桑哈勒巴（Lobsang Lhalungpa）的翻译，当中做了少量修改。

4. 对此事的详细论述，见戈尔斯坦，1989: 486–91。

抗西藏政府，而且很有可能现任的摄政喇嘛暗杀了前任摄政，这一系列肮脏的丑闻使很多西藏人的内心受到伤害。

十三世达赖喇嘛在其政治遗嘱中说每一个西藏人都有责任为了国家的利益而思考和行动，这就为非精英西藏人参与政治打开了大门。实际上，1950年代中期拉萨杰出的民众领袖阿乐群则说他牢记这些话，在热振事件中和其他一些俗人一道进行调解，试图说服双方实现和平解决。

我是个商人，和政治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在1947年政府与色拉寺进行内战的时候，民众很伤心，于是我们……成立了一个商人团体充当调停者。……僧侣们占据了色拉寺的山顶，而政府也做了各项准备。政府计划要摧毁这座寺院，但是色拉寺的僧侣决心同政府战斗。于是我们请求甘丹寺的堪布（甘丹赤巴）出来要政府不要开战。另一方面，我们召集了一些〔色拉寺杰札仓的〕带头的僧侣到色拉寺下面的沙地来商量。我们建议他们不要同政府作战，因为政府有很多军队，僧侣一方会输的。我们对他们说，请听我们“人民”一言。……但是这些僧侣拒绝了，……〔他们说〕赞年朱古（Tsenya truku）已经问过他们的护法神娘惹界清（Nyare gyejen），护法神让他们不要害怕，说他们一定会胜利的。⁵

所以我们离开那里去了藏军位于札齐的驻地，见到在那里掌管军队的噶伦噶雪。我们告诉他，如果他一定要（对这些僧侣）开战，请不要摧毁寺院札仓〔的经堂〕。⁶

调解争端在西藏是具有悠久历史的传统，但是这样的政治争端却不是“普通百姓”该管的事。所以，虽然这些西藏人没有什么政治主张或者政治属性，保守地说他们甚至连组织都算不上，但是他们却把十三世达赖喇嘛的预言带入公众的视野，正是十三世达赖喇嘛的预言表明了他们的行为的正当性。

不过，热振政变的失败和色拉寺叛乱的平息并没有为西藏带来团结和稳定。热振的支持者坚信热振是被谋杀的，因而非常愤怒。而大札的统治因为贪污腐败而逐渐走下坡路，变得很不受欢迎。并且，它没能通过外交

5. 在西藏，请示神灵需要通过神汉（传递神谕的人）。这些神汉首先会进入出神状态，让神灵附体，随后神灵就会回答别人向他或她提出的问题。

6. 阿乐群则，访问记，1993，克利夫兰，俄亥俄州。

或军事手段阻止中国共产党进入西藏。就像阿乐群则所说的：“西藏政府〔先是〕严苛地对待自己的人民，〔此后〕在中国人面前却表现得软弱无能。”⁷ 民众参政的另一个先兆在第二章已经提到过，它出现在1951年8月。那时，阿乐群则觉得人民需要在达赖喇嘛从亚东返回拉萨的时候为他组织一个欢迎委员会，以此来表达他们的拥戴。

这些零星的民众参政事件在1951年11月至12月串联起来，在这段时间一个有组织的普通民众团体成立了。这个团体特地在其名称里用了“人民”一词，以体现其属性。藏语中“人民”这个词是米茫 (*mimang*)，它是中国共产党把汉语里的“人民”这个词翻译成藏语后创造出的新词。像汉语的“人民”那样，米茫是由两个传统的藏语词汇组合而成的——“茫” (*mang*) 是形容人的“普通”或者“大众”，⁸ 而“米” (*mi*) 的意思是“人”或者“人们”。创造这个词是有必要的，因为藏语里没有一个词语可以描述作为一个整体的“人民”。自从被创造出来以后，这个词在拉萨变得人尽皆知，因为一方面《十七条协议》里在明显的位置提到它，另一方面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名称中也包含有这个词语。人民会议的一名成员解释了选择这个词语作为他们的组织名称的一部分考量。虽然他所论及的中国人的劣迹过于夸张，但是这些评论确实反映了那个时期很多西藏人的感受。

中国军队……来了，不管他们〔在宣传里〕是怎么说的，他们的真实本质已经在昌都表现出来。中国人就这样从四面八方赶来，一个月左右之后，他们的行为越来越恶劣。……他们开始放话，比如说他们要在布达拉宫和祖拉康挂旗子。之后他们又说：“……一个国家不能有两支军队，所以藏军必须并入到中国的部队里去，要穿中国的制服。”情况就是这样，〔人民觉得〕虽然协议上写着〔达赖喇嘛的地位权力不变〕，但是实际上达赖喇嘛的权力〔现在也有疑问了〕。……哪怕是〔刚开始的时候〕他们就在做这样的事情，这就是事实。这一事实〔让我们感觉〕这个国家以后将会一无所有。所以尽管〔西藏〕政府确实同他们谈过这件事情，但是他们〔中国人〕还是做出了各种各样协议中没有真正规定的事情。从长远来

7. 阿乐群则，访问记，1993。

8. 例如，根敦茫 (*gendün mang*) 指的是寺院里的“普通僧侣”，与“领导者”相对应。

说，这对这个国家和人民是有害的。所以人民觉得既然他们〔中国人〕不听政府的话，那么人民就应当有所作为。那时两位司曹在拉萨，他俩给了他们〔中国人〕很多忠告，但是中国人充耳不闻。⁹

另一名参与这场运动的西藏人在回忆那段时期时的说法相近。

一些〔西藏人〕和中国人走得很近。……〔但是〕从人民的角度看，只要有人觉得存在着敌人，那么这个敌人就应该是中国人。人民非常担心中国人会摧毁佛教，担心至尊的权力会被剥夺，中国人会强势地统治西藏，而且不管从什么角度看这种担心总是挥之不去。因此，人民从来不寄望于中国人，更别说是喜欢中国人了。从这个观点出发，人民对〔西藏〕政府官员采取了批判的态度，说：“如果你们〔当官的〕有什么行差踏错，那么西藏就会像油一样被纸吸干。”他们还说，当中国人刚刚来的时候政府没有采取适当的措施，以致于我们现在落到这步田地，并且……他们说即使到现在西藏政府仍然在按中国人说的做，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那将会很糟糕等等。走到哪里都是这样的议论……

〔另一方面，政府觉得它〕必须非常小心，达赖喇嘛也一样非常小心，尽最大的努力按照《十七条协议》行事。但是中国人把《十七条协议》当作欺骗我们的工具。在刚刚到来的时候，他们表现得很守纪律很友善。随后他们渐渐变坏，慢慢地掌握权力，最终事情变得失控了。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我们的政府变得非常强硬，破坏与中国人的关系，中国人也已经带着大量的军队来了。由于担心镇压，我们的政府尽量运用外交手腕。……无论如何，政府是这么想的，但是人民并不认同。

人民希望中国人按照他们嘴上说的那样做。他们说他们是来帮助和发展西藏的，说《十七条协议》规定如果有什么正在做的事情人民不赞同，中国人会停止进行。人民觉得中国人需要按照他们宣传的那样做。因此，虽然西藏政府和人民对根本性问题的态度没有什么两样，但是对如何处理这些问题他们却抱着不同的观点。政府总是希望和中国人建立良好的关系，而人民则认为应该要有所作为，不能什么也不做，任由时间推移而使中国人变得越来越强大。¹⁰

9. 合尊·拉让强佐，访问记，1992，达兰萨拉。

10. 朗杰旺堆（Namgye Wangdü），访问记，1993，达兰萨拉。

一位以前的西藏贵族官员更深刻地回忆了当时的情况。

这是关键的时期，人们别无选择，只有从政治上考虑。我回顾过去……如果中国人不做任何〔关于政治〕的说教，那也没什么，对吧？〔这样人们就不会太在意“人民”这个词。〕但是只要他们发表讲话，开口闭口总是“人民”这样，“人民”那样。无一例外的是即使人民要他们赴汤蹈火，他们都会去。在他们心目中，人民就是这么重要。……于是当我们需要挑战中国人时，这个词就成了我们最合适不过的选项。这就是使用“人民”这个词的原因，确实是这样。中国人认为人民是最宝贵的，说他们是来为人民服务的，说人民这样，人民那样。因此，如果人民反对他们，〔笑〕如果他们认为是很宝贵的东西反对他们，那么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呢？他们会怎么说呢？

另一方面，如果上层人士这样〔批评他们〕，〔中国人〕会有很多帽子可以往那些上层人士头上扣；类似地，如果宗教人物和僧侣反对，也会有很多帽子可以扣。但是既然他们总是开口闭口说“人民”，那么就让他们口中所说的非常宝贵的东西反对他们。那时我们觉得这是最好的策略，我们的想法就是这样，也付诸了行动。这样做本身是很自然的。确实……是因为中国人使用了“人民”这个词，而并非因为想要〔开启〕民主进程。¹¹

中国方面的材料记载这个组织成立的时间是1952年11月。¹²这个时期正是通货膨胀剧烈的时期，同时司曹针对中国人改革西藏军队、设立军政委员会的企图所作出的激烈抗议也激起了广泛针对中国人的仇恨情绪。

然而，尽管他们给这个组织戴上了“人民”这项漂亮的帽子，但是组织的创建者和领导者并不是真正的普通百姓。实际上，就他们不属于僧俗政府精英这一点来说，他们是人民的一部分，但是他们也不属于共产党眼中的无产阶级。在1951年，西藏社会阶层的等级划分并不是很明确。在社会等级的顶端是精英上层，由几百名贵族政府官员（以及他们的家人）

11. 玛恰 (Maya)，访问记，1991，达兰萨拉。

12. 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1991：61。这个组织的藏语名称里通常包含有“水龙年”字样，而那一年开始于1952年2月下旬。这个差异是由于前一个日期依据的是这个想法产生和初步讨论的时间；后一个日期依据的是具体的召集成员和提出请愿的时间。

和相同数量的僧官构成。还有少量（不到二十个）拥有大量财产并在拉萨拥有寺庙的大转世喇嘛，例如功德林、策确林和策墨林。这些精英阶层加在一起大概只有几千人。

在引言中已经阐述过，他们以下几乎所有的人口都世代代从属于贵族、寺庙或者政府本身所拥有的领地。尽管这一巨大的社会群体内部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例如，有些人拥有土地，而其他人则没有——但是他们都有一个相同的特征，即他们世代代依附于他们的领主，不能单方面改变这种依附关系。

在精英和“大众”之间有一个人数很少的群体，这个群体在藏语中有时被称为“处在中间的人”（藏语：*badzalaga*）。这个中间阶层是由管理者和经营者组成的，他们私下为寺院、活佛拉让、贵族精英家庭等精英群体工作，¹³ 甚至有时候也为政府机构工作。他们中很大一部分人是世俗僧侣或者还俗僧侣。这些人在出家的时候已经学会书写和管理技能。西藏的大寺院是主要的经营实体，掌握着大量的土地，借出大量的粮食和金钱，所以在特定的时期他们需要成百上千名僧侣来管理他们的财富。有些时期，这种简单的寺院“经营”工作以一种所有年轻僧侣必须承担的“新喇嘛差”的形式交由僧侣们轮流承担。但是较高层次的管理工作一般是由对这种工作感兴趣，并且有特殊资质特别是那些聪明的、能写会算的僧侣来承担。从本质上说，许多这样的僧侣成为有文化的世俗僧侣。他们依然要立誓保持独身，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仍然是僧侣。但是他们不再住在寺院里，或者不再参加寺院的诵经等活动。而实际上这里面也有些人没能保持独身而结了婚。但是他们所有人总体上还是保持着对自己的寺院和西藏传统佛教制度的热爱和忠诚。

这些管理人才在就业市场上很受欢迎，这是因为政府的精英官员们不愿意离开拉萨去收税、收债或者进行贸易活动，也因为缺乏能够培养大量具有类似技能的俗人的教育体系。所以，有很多这样的管理人才为精英们工作，同时他们也与社会上特别是僧官阶层内部有影响力的人物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于是，在拉萨的非精英阶层当中形成一个规模很小的个体阶

13. 绝大部分拥有庄园的贵族家庭从他们庄园的农奴中招募一些年轻人，把他们带到拉萨来接受教育，以便以后从事庄园的管理工作。早期流亡政府里的噶伦之一旺多（Wangdor）就是索康家族通过这种方式培养起来的一名管家。

层，这个阶层中的人特别关注政府的举动和名流们的动向，并且和精英阶层保持着重要的私人关系。¹⁴

人民会议的创建者就来自于社会中的这部分人。司曹在中国将军面前口头拒绝合作的消息已经通过口耳传遍了拉萨，人民会议的创建者非常了解司曹强烈反中的态度。除此之外，人民会议的创建者还知道人民对于共产党的重要性。他们看到，西藏政府中有一些人最终站在西藏人和他们的宗教立场上，正面地对抗中国人。因此，在1951年年底的时候，他们中的一些人觉得西藏人是时候站出来，向中国人传达西藏人民的声音了，以此来声援司曹。¹⁵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们开创了拉萨社会中与政治无关的人群大规模涉及政治的先河。虽然西藏传统上是不允许有政治异见的，但是司曹公开与中国人作对这件事为这种形式的抗争扫清了思想上的障碍。

这个组织公认的领袖是唐曲索南（Thamjō Sonam）。他是一位有文化的还俗僧侣，其实严格地说他仍然是一名僧侣，只是现在的身份是色拉寺麦扎仓的一名管理者。其他上层领导者包括哲蚌寺洛色林（Loseling）扎仓的加央达娃（Jayan Dawa）、做过色拉寺麦扎仓察瓦（Tshawa）康村秘书的僧侣察·仲译拉（Tsha Trunyila），以及来自郭莽（Gomang）扎仓的噶美群则（Kamika Chöndze）和珠托拉（Drubthola）。¹⁶ 他们全都是处于管理阶层的僧侣或者还俗僧侣，他们的具体目标是以人民的名义向中国当局呈交一份正式请愿书。在这份请愿书上，一方面他们将明确地告诉中国人：西藏人不希望成千上万的中国军队和官员驻扎在拉萨；另一方面他们将提议采取一种比完全独立有所让步的形式，即回到与清朝时期存在于西藏和中国之间的那种关系相类似的关系。当然，司曹总体上也是这么想的。

-
14. 除了这些中层僧侣和还俗僧侣之外，在城市环境下社会中层也包括一小类俗人。这些俗人从拉萨三四家私塾中的某一家学会了书写，他们一般是前面提到的还俗僧侣的孩子、政府僧官的亲人，或者拉萨成功手艺人或者办事员的儿子，甚至有一些是城郊富裕村民的儿子。这个阶层也包括少量为政府机构工作的办事员、少量的店员、大小商人以及藏军和警察部队中的土官。
15. 朗杰旺堆，访问记，1993。
16. 察·仲译拉也被称为强仲·洛卓平措（Chagdrung Lodrö Phüntso）。噶美群则（Kamika Chöndze）是绰号，因为他是桑耶嘎梅（Samye karme），也就是负责为桑耶寺点灯征收酥油税的喇嘛，所以有了噶美群则这个绰号，他也被称为卡贡·平措扎西（Kargang Phüntso Tashi）。

因为这种请愿是代表西藏人民而不是代表政府的，所以这个组织需要吸收大量的普通人充当自己的成员。他们的想法是吸收大约二十到三十个高层次成员充当核心成员，这些人负责计划和决策。接下来是人数大得多的外围成员，他们将会偶尔讨论由核心成员提出的建议。到了1952年春天的时候，六十到一百名拉萨居民正式登记为成员，参加了在拉萨召开的人民会议。需要注意的是，这种会议不是秘密召开的，原因是唐曲索南和其他领导者有意把这样的聚会塑造成是评估西藏人民的观点并将其传达给中国人和西藏政府的会议，而不是组织反对中国人的活动的会议。

一名前人民会议成员解释了拉萨的甜茶馆是如何被用作招募基地来运作的。¹⁷

在甜茶馆里通常有各种各样的谈资。例如，如果有四五个人在那里，那么他们会〔谈论与中国人有关的情况并且〕建议各种各样的方法来应对这些情况，但是他们都无一例外地想挑战中国人。于是有人可能会在甜茶馆里对一些信得过的人说：“到我的房子里来，那里很方便，请务必来。”就这样一个人来了，接着来了两个，然后是三个，越来越多。我们会聚集在唐曲索南那里或者加央达娃那里。我们的老师强仲·洛卓平措的房子或者噶美群则的房子也是我们聚会的地点。¹⁸

色仲旺阶（Setrong Wangye）是被邀请来参加聚会的人之一，他来自拉萨周边的一个富裕家庭。他和他的家人实际上是政府的农奴（藏语：*shungyupa*），但是他们家拥有大量的土地，也拥有自己的农奴。他和他的兄弟们在拉萨的私塾接受教育，当时政府任命他们为所在地区上部的收税官。因为这个缘故，旺阶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都住在拉萨。他回忆了别人是怎样尝试拉他入伙的：

我不喜欢旧社会，因为我们不是贵族。政府官员并不忠实地按法律办事，很多人都是这样觉得的。但是我也不相信中国人嘴上说的新

17. 在英属印度的影响下，拉萨人喜欢上喝混有牛奶和糖的红茶。这种茶端上来之前就已经混合好了，也叫做恰安莫（*cha ngamo*，甜茶）。很多茶馆专门卖这种茶（而且直到今日也还有很多）。

18. 强佐·阿旺天巴（Chandzö Ngawang Temba），访问记，1993，达兰萨拉。

社会，所以我和他们走不到一块去。在人民会议开始活动的时候，它的一名成员洛桑钦列（Lobsang Trinley）试图拉我入伙。洛桑以前是色拉寺的一名僧侣，是我从小玩到大的老朋友。

我问他这个组织里面都有些什么人。他回答说：“都是像你我这样的人”，也就是会读会写、既同底层的百姓关系很好又与政府官员有交道的人。带头的就是像这样的一些人。当我问他具体有哪些人时，他说了几个社会上很有名气的人，比如唐曲索南……洛桑钦列力劝我加入，说：“我们所需要的就是像你这样又有见识又能干并且能分清是非黑白的人。”

我冷静地问他谁为这个组织提供经费，他回答说是拉萨的下密院。¹⁹接着我问他建立这样的组织的主要原因是什么。于是他就跟我大谈特谈中国人在西藏做了这样那样可怕的事情，以及十三世达赖喇嘛如何在他的遗嘱中说共产党很邪恶，应当阻止他们。也就是说他给我的理由是把中国人赶出西藏。他说，我们的领袖正在发动和动员人民，之后我们就能和他们一道把中国人赶出西藏……

那天晚上我回家同我的两个哥哥商量了这件事，……在闲聊中，我告诉他们我打算加入。我的大哥立即激动起来，说这事万万不可，以后会后患无穷。他说我应当明白这一点，因为我和那些共产党〔实际上只是中国人〕有过一些直接接触，知道他们有多厉害。

他指的是我去云南三爨（Sadam）做买卖的那一次，那是在〔1949年中国〕解放之前。那里有一个地区叫丽江，国民党的指挥部设在那里。我在那里的时候碰巧是国民党的节日，所有的士兵都去参加节日游行。那个场景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那时我想仅仅是那一个地区的国民党士兵就比所有的藏军都强。他们的重武器和大炮全部是美式的，步枪是德国造的，但是子弹是美国造的。我从他们手上买了一些枪，不过我还是认为藏军的实力连国民党的这一支部队都比不了。所以如果共产党连国民党都能打败，那西藏怎么能对付得了？从那以后，我的哥哥总是不断地告诉我中共太强大了，没有人能够对付得了他们。所以他坚持认为参加这样的组织〔人民会议〕不会有什么好果子吃。他说，1949年的时候我们可

19. 藏语叫举麦札仓（*gyümed tratsang*）。另一名成员补充说：“人民会议的领导人常常会在会议上说某某喇嘛同意提供资助，某某贵族家庭也愿意提供资助。……很多人前来向会议提供资助，所以开头事情进展得很顺利”（朗杰旺堆，访问记，1993）。

以轻易地把中国人赶跑，但是现在不可能了。他也不认为这个协会能够把大众动员起来，因为绝大部分普通人都非常贫穷，而中共一直在告诉他们中共会让他们的生活好起来。所以如果中国人真的做到了，那么这个组织将没有办法动员起普通人。²⁰

人民会议也有成员来自藏军。江孜代本团（江孜代本团作为警察部队驻守在拉萨）的一名士兵叙述了他参与的情况：

因为人民会议反对建立紧密的中藏关系，所以军队没有公开地给予支持。但是在私底下，很多代本团都向他们提供支持，并且也参与了组织的行动。

我加入人民会议就是一个例子。我并没有明确地听说人民正在串联，但是我们代本团的军官似乎已经悄悄地和人民会议的领导者搭上线，于是决定从团里派一个代表去。因为派〔较高级的官员比如〕上尉（如本，*rupön*）或者中尉（甲本，*gyagpön*）去未免太引人注目，所以派了一个叫旺丹·拉巴俄杰（Wangden Lhakpa Gojey）的中士（协敖，*sheyngo*）去。我受命陪同他去，并辅助他工作。我很年轻〔大约 18 岁〕，派我去就是因为要帮助他工作。于是我去了喜德林（Shide）〔人民会议总部所在地〕，在那里待了一个多月〔一直到请愿书交上去为止〕。早上我做抄写信件等工作，我也送过信并且在拉萨各地张贴过告示。²¹

另一名士兵也叙述了他们参与的情况：

藏军里有一种想法，即“人民”做了这么多的事，所以我们也必须设法做点什么，然而我们又不能公开站出来做。但是如果我们不给予他们〔人民会议〕支持，我们是不会心安的，这就是我们的想法。于是在这种想法的驱动下，他们〔藏军的代表〕去了那里〔参加会议〕，并告诉那里的人：“我们将通过各种方式支持你们。”……

我没有参加那个会议，但是他们回军营时带回一封信，信上说我们要宣誓〔加入人民会议〕。于是我们宣誓：“我们赞成你们的观点并且支持你们。”……每一个人宣誓完都说我们必须做些什么，现在我们不能继续像这样待着了。²²

20. 色仲旺阶，访问记，1993，拉萨。

21. 朗杰旺堆，访问记，1993。

22. 甲本格占（Gyagpön Kedram），访问记，1992，达兰萨拉。

人民会议的领导者存在的理由即是以人民的名义向中国人发出强有力的宣言，所以他们决定不仅要在拉萨，而且要在全西藏招募成员。因此他们除了给他们的朋友写信之外，还派代表到他们有联系的西藏其他地区去，以征集一份长长的名单支持这个请愿。他们告诉地方官员他们正在制定一份给西藏和中国当局的请愿书，这些地方的人们都必须给予支持。通过这种方式他们迅速征集到成千上万个签名。²³ 一个西藏人解释说：

大约在这个时期我一直在藏西（藏语：堆阿里，*Tö ngari*）做官，……所以我在那里有很多人脉。于是我派人去那里为人民会议征集签名。……那里的人〔传统上〕以部落（藏语：学卡，*shoga*）的形式聚居，每一个部落有自己的头人。所以派出去的人要对头人做工作，头人再派人带着信件去问每个区域有多少家庭多少人口。这些派出去的人会带着那些家庭的姓名和签章回来。²⁴

通过这种快速的征集方式，人民会议得以迅速地将他们的成员人数扩充到上千人，尽管这些人里面绝大部分都不是活跃的成员，甚至连请愿书都没有看过。他们主要是各个地区汇总记录里的名字而已，充其量他们只知道人民会议是为了保存宗教和反抗中国共产党而建立的。

很有意思的是，寺院的领导层没有出现在这个名单中。尽管那些从事管理事业的僧侣和还俗僧侣在这个组织中发挥着主导作用，而且很多普通的僧侣也牵涉其中，但是在这个组织中却没有来自色拉寺、哲蚌寺和甘丹寺这三大寺的官方代表。实际上，这些寺院已经决定不支持人民会议向中国人递交请愿书的计划。在他们看来，中国人既没有干涉寺院生活也没有干涉寺院的庄园及其借贷活动。中国人已经向寺院领袖保证他们绝不敌视佛教，并且通过向所有僧侣布施证明了这一点，所以这些寺院拒绝同人民会议结盟。例如，哲蚌寺甚至不接受这份请愿书，把它退还给人民会议。²⁵

人民会议的领导者拟好请愿书时已经是藏历年底了（1952年2月下旬），而一年一度的传召大法会（默朗钦摩）即将召开，于是人民会议的领导者将提交这份请愿书推迟到法会结束。但是他们在市里张贴传统的墙报（藏语：*yiggyur*），让每一个拉萨人都知道他们的计划。他们在墙报上说：

23. 朗杰旺堆，访问记，1993。

24. 合尊·拉让强佐，访问记，1992。

25. 朗杰旺堆，访问记，1993。

我们西藏人希望表达我们对西藏幸福事业的关心。²⁶ 但是这个问题现在不能谈，因为藏历十二月就快要过去了，新年就要来到，一月的大法会也即将开始。在大法会会期里从事与大法会精神相抵触的政治活动是不适当的。所以我们将会在默朗法会结束和措曲法会开始之前的时间〔在四月中旬〕递交我们的请愿书。²⁷

那时，中国人宣称（他们现在还是这么认定的）这个组织实际上是两位司曹的杰作，而不是人民发自内心的声音，因此总是把它称为“伪”人民会议。尽管很难证明是司曹组建了这个组织，但是让人民出面迫使中国人放弃在西藏驻扎大量军队似乎正是他们想法中的一部分。对此，达赖喇嘛解释说：

两位司曹认为最终的协议应当在拉萨缔结，他们一直这么想也一直这么说，他们从没想过在北京签订协议。他们说：“我们不能在北京签协议”，因为北京是敌人的地盘，“最终协议应当在拉萨签”。所以虽然协议已经签了，但是在请愿书里还是提到了这一点。他们说在北京签协议是一个巨大的错误，应当在拉萨签。“如果在拉萨，在谈判进行的时候，西藏的人民，那些手上没有枪而只有转经轮的老百姓，会站出来我们是个小国，如果大量的中国人来的话，将会出现饥荒。”我清楚地记得鲁康娃和洛桑扎西是这么说的。在达赖喇嘛之下就是他们两人了，你清楚吧？也就是说他们从来没有想过会在北京签协议。²⁸

很多西藏人也相信人民会议和司曹有关系。例如，色仲旺阶说：

像唐曲索南那样的领袖……全都和政府官员有着很好的关系。他们主要的支持者是两位司曹。……如果司曹不在背后支持人民会议，

26. 藏语是：*rgya bod zung `brel thog la bod yongs kyi bde sdug cig zhu yag yod*。

27. 措曲法会 (*Tsong jö*) 从藏历二月十九日持续到三十日。对照公历它大约开始于4月14日。合尊·拉让强佐，访问记，1992。噶伦拉鲁对这个事件的回忆很相近：“在1952年传召大法会之前，有人在祖拉康的正门（藏语：*Shingra shunggo*）上贴了一张抗议的海报。拉萨朗子辖（*Nyertsang*，即拉萨市政府）把它撕下来交给噶厦。海报上说：‘当默朗和措曲结束的时候，我们将有事情公告’”（拉鲁，1981: 351）。

28. 达赖喇嘛，访问记，1993，达兰萨拉（划线部分为强调）。

人民会议就无法维持。司曹的想法是保留过去的制度，拒绝新制度。这和人民会议的观点相同，也正是这一点使得鲁康娃想留下他们。

实际上，鲁康娃是拉萨下密院的“监护人”，所以这个寺院不管有什么涉及金钱的行为，都会提前请示他。²⁹ 在鲁康娃成为司曹之后，下密院变得富有了，他们全部十八处领地都盖了新房。所以他们对鲁康娃言听计从。一天，鲁康娃告诉下密院说共产党将会消灭宗教，而你们是宗教的基石，所以你们应当为人民会议提供一些财政上的帮助，要这样做才对。于是，下密院私底下给了人民会议与两千“克”青稞等值的金钱。如果他们直接给粮食，那就太引人注目了，人们就会知道，所以他们给钱——并且尽量秘密地给。……这是洛桑钦列告诉我的。³⁰

合尊·拉让强佐（Lhatsün Labrang Chandzö）也和色仲旺阶一样，认为在人民会议和司曹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说：“事后有种说法说是两位司曹在煽动民众，所以中国人坚持要他们辞职。那时，我们既有负责思考的大脑也有负责行动的四肢，上层的人（*lama-pombo*）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所以坦率地说，这里面确实有一些联系。”³¹

西藏贵族官员玛恰也表达了相似的观点，他的一名随从是人民会议的成员。

人民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和两位司曹没有牵涉进去这两种说法都是政治上的托辞，除了这么说以外别无选择。……但是，如果不是有人向人民指明道路并且发出命令，人民是不可能聚到一起去的，这是我的看法。〔如果没有上面的指示〕即使他们真的聚到了一起，也会有人说向东有人说向西——不会出现团结的局面。……必定是有人出来指明了方向。³²

所以虽然没有具体的证据表明司曹直接告诉这些从事管理工作的人去创建这个组织，但是几乎可以肯定他们确实在思想上激励了这个组织。但

29. 只要有任何重要的事情发生，比方说出现了争端，作为监护人（藏语：*gtso`dzin*）的鲁康娃就会向这座寺院伸出援手。

30. 色仲旺阶，访问记，1993。

31. 合尊·拉让强佐，访问记，1992。

32. 玛恰，访问记，1991。

是，在西藏很多事件的发生都是通过私人情谊和供施关系网络促成的，这件事可能就属于这种情况。身为僧官的司曹可能会对一个僧官说西藏人民应当要有所作为，接着这个僧官可能会对唐曲索南说需要人民出把力，这样的几句话很容易就能起到触发的效果，并在此后静静地起着支撑的作用。然而，不管这是不是事实，或者唐曲索南和其他人只是按照自己的主意行事，事情最终的结果终究是遵循了司曹的想法，即利用西藏人民的声音来迫使中国人就他们在西藏存在的规模和方式问题作出让步。

这个新组织的领导者在追求他们的目标的过程中似乎也受到朗色林等重要官员的鼓励和帮助。朗色林和其他一些人领导一个由敌视中国人的西藏政府官员组成的秘密组织，我们可以简单地称之为朗色林派。

■ 朗色林派

那些不相信中国人的管家们认为面对中国官员和军队的不断增大增强，他们必须有所作为。像他们一样，很多政府官员也把中国人看成是一支占领军，尽管现在说得很好，其真实目的是要毁灭西藏。一些这样的官员开始在非正式场合谈论这个问题，发展到后来就逐渐决定订立生死同盟，为时局做一些事情。

1951年11月12日，也就是十八军主力部队到达拉萨十七天之后，一小群僧俗政府官员正式立誓要尽自己所能反抗中国人的占领。他们只有一个直接目标，即取得和创造一切适当的机会来反抗中国人，不论是用暴力手段还是和平手段，只要适当就行。³³简单来说，他们的目标是要激励大众起来反抗中国人，阻止各阶层的西藏人被中国人通过他们认为的花言巧语和物质上的好处拉拢或者争取过去。他们致力于私下的努力，因为他们明白如果政府本身（噶厦）试图这样做，那么它和中国人之间的关系将会遭到破坏，而受害者将会是西藏人。³⁴

最初，这个组织是由一名僧官堪穷洛桑坚赞（Lobsang Gyentsen）、两名俗官扎西班饶（Tashi Bera，拉萨札齐代本团的代本）和朗色林（孜康

33. 朗色林，1988: 70。

34. 札登，访问记，1992，达兰萨拉。

的四位孜本之一)组成,由朗色林领导日常活动。³⁵一位和他们关系密切的重要政治人物是达赖喇嘛的卓尼钦莫(副官长)帕拉,帕拉出身于一个与朗色林有关系的重要的贵族家庭。帕拉强烈支持达赖喇嘛流亡,因为他也不相信共产党的宣传。³⁶一位以前的俗官札登阐述了这些官员的动机,他依据的是帕拉在他们一起流亡国外之后告诉他的话。

他们决定团结起来,甚至如果有必要牺牲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他们想换一种思维方式,他们同意让噶厦继续同中国人打交道,因为政府公开地同中国人对抗会导致西藏的毁灭。但是他们发誓在噶厦之外秘密地展开行动。他们的想法是如果失败了,固然可能会使自己丢掉性命,但是政府不会陷进去,死的只会是他们自己。

这个组织是极其秘密的。朗色林的妻子告诉我说朗色林和帕拉关系很好,而且他们两人似乎在处理组织内部的事情。据她回忆,不久之后当游击队的司令恩珠仓〔在1956–58年那段时间〕向帕拉和朗色林求教时,她总是站在〔会面的房间〕门边守着,不让任何人进去。她也负责端茶倒水,而且是自己一个人进进出出去拿东西,连仆人都信不过。没有其他人知道这件事情,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事情是多么的隐秘。³⁷

这个组织在幕后参与了1952年人民会议的活动,很可能在人民会议的策略制定和请愿书的准备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朗色林的妻子解释说:“是的,我的丈夫似乎也在那个组织中。唐曲索南那时经常来我们家,而我的丈夫经常去见司曹和帕拉。”³⁸色仲旺阶的看法和她相近,他也回忆了他们之间的接触:“〔1952年的〕一天,我正站在我〔在拉萨〕的房子前面给我的马喂草料,洛桑钦列来了。我问他从哪里来,他说他去见了朗

-
35. 朗色林,1988:70–71。其他人说它也包括孜仲格桑阿旺(Kesang Ngawang)、孜恰坚赞拉(Gyentsenla)和孜仲洛卓格桑,但是他们在一开始时并没有参与进来,因为朗色林在他的书中并没有提到他们。
36. 朗色林和帕拉是表兄弟(朗色林的妈妈和帕拉的爸爸是兄妹)。札登,访问记,1992;帕拉,访问记,1983,西藏著作档案馆,达兰萨拉。
37. 札登,访问记,1992。朗色林夫人在另一次访问中确认了这件事(1994,达兰萨拉)。
38. 朗色林夫人,访问记,1994。

色林。朗色林是人民会议的支持者之一。接着洛桑钦列从口袋里拿出一份文件说：‘我把这个拿去给朗色林看了。’”³⁹

人民会议的出现进一步加剧了拉萨针对中国人的仇恨情绪，令 1951 年 11 月到 1952 年 3 月这段时间里各种事端都增多了。这些事端包括贴标语、传播街头歌谣、推搡中国人、散布不利于中国人的谣言等等。中共西藏党史一个 1951 年 11 月末的条目对此进行了描述：“〔解放军〕进入拉萨后，上层反动分子以鲁康娃为中心。下层群众被煽动制造事端，叫嚣如：‘解放军，先别急着走，先饿一饿再走’。”⁴⁰ 据中方的材料记载，一些稀奇古怪的谣言开始在拉萨散播，如毛泽东和朱德已经在朝鲜战争中被美国人抓住了，共产党就要倒台了，美国军队已经在印度登陆，准备进攻西藏赶走共产党。⁴¹

敌视中国人的活动越来越频繁，也越来越严重，这使得中国人要面见达赖喇嘛，试图说服他制止这些行为。达赖喇嘛在他的自传中回忆了这件事：

最终的结果就是我与张将军一次特别幽默的会面。一天，他来看我，要求我颁布一个告示禁止任何批评中国人的行为，不管是通过歌谣还是通过标语，因为这些行为是“反动”活动。尽管新的法令禁止反对中国，但是谴责中国军队待在西藏的海报又出现在街头上。一种广泛的抵抗运动形成了。⁴²

然而，西藏政府没有作出任何努力来掌控人民会议以及他们支持的抗议行为。到三月中旬的时候，中国人既愤怒又紧张，于是开始巩固他们在拉萨的阵地。中共西藏党史 1952 年 3 月 11 日的条目记录了以下情况：

反革命组织“伪人民会议”在拉萨制造骚乱，以西藏地方政府两个代理司伦（即司曹）鲁康娃和洛桑扎西为首的上层反动分子，趁我军立足未稳之际，一方面进行粮食封锁，企图“饿走”我军；一方面早在一九五一年十一月间就拼凑了一个以商人和无业流氓为骨

39. 色仲旺阶，访问记，1993。这份文件大概是准备交给中国人的请愿书的草稿。

40. 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1990，1951 年 11 月 25 日条目。

41. 吉柚权，1993a: 400。

42. 达赖喇嘛，1990: 73。

干、纠合各种社会渣滓的反革命组织——伪人民会议，有计划、有步骤地制造骚乱。三月十一日，这个反革命组织起草了一份“请愿书”，反对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要求撤走解放军。同时在拉萨进行示威，一时市内秩序混乱，商店关门。⁴³

当时在拉萨的一位中国官员所做的记录对当时的情况做了相似的描述。

在司曹鲁康娃、洛桑扎西及“伪人民会议”的煽动下，拉萨地区不断发生切断电话线、夜间枪击解放军驻地和哨兵、袭击解放军外出人员、打骂解放军卫兵、在街上拦阻解放军、抗膀子、吐口水、侮辱女同志、偷盗解放军物资等事件，每天都有。据统计，仅三、四月份，上述不法行为即发生一百余起。⁴⁴

一名江孜代本团的士兵，同时也是人民会议的成员，对这段时期有类似的回忆。

在人民会议建立的时候，包括三大寺在内各个地方都涌动着怒潮。僧侣们换上俗人的衣服带着枪和刀偷偷地混进拉萨。于是那时到处是各种各样的人混在一起，甚至有人说我们应当去张经武的住处。

因为聚到那里的人太多了，以至于中国人起了疑心，于是发出警报。所有他们住的地方都筑起了工事，似乎战争随时都会爆发。在这些事件发生的同时，各个藏军代本团无法当没事发生，他们也不得不戒备起来。在那几天里，拉萨几乎没有商店开门。因为有这么多人来了，大家觉得战争也许随时都会爆发。⁴⁵

时局变得如此危险，以至于中国人觉得有必要暂时关闭他们的藏语干部学校（藏干校）。对此，一名学生回忆道：

他们向藏干校担任藏语文教师的爱国人员发递恐吓信。信中骂他们是妖魔，要他们“当心脑袋！”一些不法分子在街道上向他们吐口水、打石头，要他们立即停止到藏干校教课。记得有一天，在大树下给我们上课的藏语文老师噙着眼泪说：“同学们，今天我万分难

43. 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1990，1951年3月11日条目。

44. 杨一真，1987：75。

45. 朗杰旺堆，访问记，1993。

过！我不能和同学们一起学习了。因为往返途中很不安全，只能暂时不来校教课。”……藏干校被迫暂时停了课，我也回到了军区司令部。⁴⁶

解放军里一名年轻的藏族士兵也说在这所学校关闭之后他回到中国人的军事基地，构筑防御工事。他说他和其他的战友都是穿着衣服睡觉的，这样就可以随时应对袭击。⁴⁷

双方都做了军事方面的调整。在西藏方面，政府命令日喀则的炮兵团召回他们的士兵，这些士兵都在前一年被分遣回家了。⁴⁸ 中国人误解了这件事，以为司曹已经命令炮兵团从日喀则赶往拉萨。⁴⁹ 他们把这一事件看作是极端的威胁，作为应对，于是从西藏南部的隆子（Lhuntse）召回 155 团一营，命令他们昼夜兼程迅速赶往拉萨。与此同时，中国人不仅巩固了他们的阵地，还挖掘了连接司令部、政治部和后勤部的交通壕，并禁止士兵离开基地，以减少发生冲突和争端的风险。⁵⁰ 除此之外，中国方面的任务部署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是继续增加粮食和柴禾的储备。一份中国方面的材料说：“在 1951 年的 2 月和 3 月间，拉萨部队真正的粮食存量只够三天吃的，再怎么省也只能吃上七八天。有时他们不得不定量供应柴禾，有时柴禾少得只够烧热水喝，没有热水用来洗脸和做其他用途。”⁵¹

在传召大法会结束之后的 1952 年 3 月 30 日，人民会议的领导者终于开始行动向西藏政府递交他们的请愿书。他们挑选了噶厦和司曹讨论问题的一天，因为他们希望能同时见到双方。⁵² 人民会议代表的请愿对象既包括中国政府也包括西藏政府，因为他们不想让西藏政府觉得他们是有意要绕过他们，同时他们觉得这样会增加中国人严肃看待这个问题的可能性。⁵³ 人民会议的代表团由二十人组成，包括其主要的领导者。

46. 杨一真，1987: 75-76。

47. 降边嘉措，访问记，1993，北京。

48. 拉鲁，访问记，1992，拉萨。

49. 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1991: 66。这支藏军是恰当（Chadang）代本团。

50. 杨一真，1987: 76。

51. 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1991: 199。

52. 朗杰旺堆，访问记，1993。

53. 合尊·拉让强佐，访问记，1992。

这些代表一到噶厦的办公室就立即把请愿书交给噶伦。拉鲁回忆了这件事，他记得当时噶厦很害怕同他们打交道。

〔当〕噶厦在布达拉宫碰面的时候，我们收到一份请愿书。这份请愿书是一份西藏卷轴，其标题为“西藏人民之请愿书”。主要内容是在拉萨的解放军应当遵守清朝皇帝的军队定制〔即不在西藏待得太久，只能保留一个象征性的卫队〕。

我们对这个请愿有点担忧。在昌都我们输了战争，而拉萨又很可能爆发骚乱和冲突。因此我们认为如果我们〔从这些代表手上〕收下这封信，那么非常严峻的局面就会出现。我们希望同中国人维持友好的关系，所以我们把这份请愿书交还给人民的代表，告诉他们我们不能收下它。

但是让我们大吃一惊的是，他们说：“我们已经把这份请愿书给两位司曹看了，是他们说要噶厦收下它。”我们告诉他们我们不知道司曹是不是真的已经看过这份请愿书，所以我们需要进一步弄清楚，我们在向司曹报告后会给他们一个答复。

随后我们看了这份请愿书，并把它带给司曹看，但是司曹并没有明说他们是否事先看过这份请愿书。鲁康娃只是简单地告诉我们这份请愿书表达了西藏人民的真实意见，所以噶厦应当收下并把它交给张经武。实际上这个问题是需要请示达赖喇嘛的，但是他没有这样做。他当场就作了决定，告诉我们收下这份请愿书。⁵⁴

于是噶伦们返回噶厦，收下了这份请愿书。人民会议的代表们很自然地觉得他们的想法确实和司曹的完全一样。

当他们〔代表们〕到布达拉宫去的时候，噶伦和司曹们似乎对这份请愿书表示了肯定，特别是鲁康娃。他说：“你们现在做的事非常好。”而且他告诉他们必须坚持到底。此外，还有其他人对这件事表示了肯定，而朗杰札仓的僧侣还给他们提供了一餐米饭和红薯。……所以他们在返回的路上非常高兴，说那些上层人和他们想的一样。⁵⁵

54. 拉鲁，访问记，1992。拉鲁也在他的书中记录了这次事件（拉鲁，1981: 351-52）。

55. 朗杰旺堆，访问记，1993。

第二天，噶厦派人给张经武送去一份请愿书的副本，并且在桑都仓老宅〔同时也是张经武的住处〕的西藏工委总部里安排了同人民会议代表的会面。中国方面的材料说有一群手持武器的暴民在中国人的房子外面叫嚣：

荷枪实弹的人员布满街头巷尾。他们在张经武门前高声吼叫，向张经武提出“解放军立即撤出西藏”，“西藏的会议制度不能改变”，“修改《十七条协议》”等要求，要张经武立即答复。⁵⁶

噶伦拉鲁进一步叙述了事情的发展。

第二天我们〔噶伦们〕前往张经武的住所，人民会议的代表已经到了那里。……

人民会议的代表把请愿书交给张经武的时候只是说：“我们的主张都在这份文件里，请看一看。”张经武把它递给我，要我来读一读，所以我当着张经武和其他噶伦的面读了一遍。然后张经武把“伪”人民代表叫了进来，给他们拍了照，之后他们就离开了。⁵⁷

人民会议的一名成员也回忆了这次会面。

我们在大约下午四点钟的时候到达那里。在噶伦们和中国人讨论这件事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人招呼我们，我们大约十六个人。〔随后他们〕过来查看我们，看我们身上有没有特殊的印记，比如脸上是否有伤疤，是否有金牙，以及有没有受伤。他们把这些都记了下来，接着他们从正面和侧面给我们拍照。当我们来回走动的时候，他们就从远处拍。到我们递上请愿书的时候太阳已经下山了。⁵⁸

人民会议的代表似乎很满意他们自己的表现。在拍照的时候，他们排队摆着姿势，手上长长的念珠垂了下来。⁵⁹

中国方面对这次历史性会面的记录如下：

56. 吉柚权，1993a: 401。

57. 拉鲁，访问记，1992。

58. 合尊·拉让强佐，访问记，1992。

59. 辛萨·洛桑格勒，访问记，1993，多伦多。他回忆说他看到了他们的照片，因为他是事后审问他们的调查委员会的成员。

“人民会议”推荐加央达娃等三个代表走进张经武的院内，向他提出请愿。张经武请他们坐下后，立即派人去邀请西藏噶厦政府的几位噶伦，一道接见“人民会议”的三位代表。当着噶伦们的面，张经武本着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对“人民会议”的代表严正指出：这次骚乱是有人在背后唆使的，参加骚乱的群众是不明真相而被人利用的，他们没有责任。张经武责成噶厦政府要立即妥善处理这一事件，否则，因此而引起的严重后果由西藏地方政府承担。然后张经武又对“人民会议”的代表耐心地逐条解释《十七条协议》，讲共产党的宗教政策、民族政策。让他们把请愿书留下来听候答复。

“人民会议”的代表们虽然对张经武的解释一点都听不进去，但为了给噶厦噶伦们、给西藏地方政府一个台阶下，他们假装听进了张经武的劝解，动员包围张经武住所的人群于当天下午散去，但仍留有少数武装人员对桑都仓进行监视。⁶⁰

请愿书包括六点，其文笔非常精彩。为了避免表露出对中国人的敌意和仇恨，它用了非常老道的修辞。信头用了清朝时期的体例，目的是想表达如果中国人和西藏人双方都返回到清朝的模式，那么他们的关系将会很顺畅。实际上，信中还就很多事情对中国人表示感激。有意思的是，为了表现出“进步性”，它还批评了西藏政府和传统封建制度的弊端，并表示他们会就如何改正这些弊端提交一份计划书。最重要的是，它没有**要求**任何东西。恰恰相反，它“请求”中国人**帮助**“人民”，并且在提出请求的时候用了一个敬语：嘉举（*gyamju*）。这个敬语通常是下层的人对官员、喇嘛和其他他们想要寻求帮助或者借钱的人说的。从这份请愿书精雕细琢的程度可以看出，人民会议的领导者很可能得到了学识渊博、久经世故的政府官员的帮助。例如，他们很可能得到了朗色林派的帮助。

请愿书开头是按照清朝时惯用的格式撰写的抬头：⁶¹“西藏僧俗百姓同声伏祈皇帝陛下并中藏的施主、上师及老爷们”，⁶²接着是它的六点内容。

60. 吉柚权，1993a: 401-2。

61. 请愿书里的用语很华丽，而这里的译文是直译过来的，所以看起来可能有点生硬（指的是英文——译注）。

62. 藏语是：*gong ma mchod yon gyi mnga` bdag rgya bod lha dpon lhan rgyas mchog gi zhabs pad mngon mtho`i drung du gus` bangs bod ljongs mi dmangs ser skya spyi mgrin nas*。

第一点

佛教是幸福和快乐之源。过去，佛祖预言达赖喇嘛将会是佛教的掌教之人，并特别指定他为西藏的保护神。他是所有向佛之人心中的宝石，是西藏僧俗人民当前和将来生活的依靠和支柱。在协议中，有“现行制度不予变更”的条款，而这正体现了中国人和西藏人之间友谊的实质。西藏政府得以保留，任何事务不管是民事还是军事都得以通过向至尊达赖喇嘛提交计划寻求其同意的方式加以解决，这就使得政府的职能像初生的月亮那样欣欣向荣。这一点我们是非常支持的。

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正打算和西藏建立友好的关系，并派官员和军队到西藏来。〔而根据《十七条协议》，〕达赖喇嘛的权力和头衔不会被改变，所以还是和以前一样独立。因此，我们西藏僧俗人民对此非常满意也非常高兴，我们需要对此表示感谢。

第二点

西藏佛教的基石主要是〔拉萨周围的〕三大寺以及其他大大小小的寺院机构。这些地方是所有向佛之人积累功德的地方。所以，为了发展和恢复这些寺院，施主们把庄园、牛羊、土地、房屋和人口布施给它们。而金钱和青稞也被捐出来作为宗教基金以为延续经常性的宗教仪式之供养。中央已经说过它会保护寺院，寺院的收入不会被改变。所以，我们请求这种政策能够永远持续下去。

第三点

西藏政府的管理对于宗教和政治的重要性就像水的源头，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由于向佛之人所累积的功德有限，我们无比感激的十三世达赖喇嘛在水鸡年〔1933〕五十八岁时离我们而去。他的臣民就像站在平地中央的盲人一样不知所措。至尊十四世达赖喇嘛作为西藏向佛之人的衮主来到人世间，但是他直到铁虎年〔1950〕才接掌政教大权。在这之间的十九年里，完善西藏政府政治体系的工作没能很好地进行。由于这个原因，政府和臣民经历了一段非常艰难的时期。政府官员和人民了解造成这种情况的因由，它导致人民的境遇被忽视，就像一个病人被医生不管不顾。

中央已经说得很清楚，它不会改变西藏的政治体系。所以我们别无选择，只有自己来治疗〔西藏政治体系中的〕疾病。我们不需要从其他地方寻找治疗这种疾病的药方。我们需要的是所有的人都

集思广益，思考发展西藏政府政治体系的方式，以使所有臣民都能受益。为了尽快使西藏政府的组织更加合理并且更加兴旺，我们随后将呈交一份附带有具体计划的请愿书。

第四点

关于西藏政府领导下人民的总体生活水平的问题，西藏人民在历世达赖喇嘛的慈悲之下一直感到很幸福、很和平。例如，即使是要饭的也都享受着充分的自由，没有任何的担忧，在中国人到来之前他们享有纯粹的自由。而现在，可能是因为〔因果报应的〕原因，出现了作物歉收、战争，以及无法无天的中国人和西藏人。另外，相当多数量的人的到来也造成食物和衣物的价格一天比一天高。某些富裕的国民把他们自己的需求〔摆在第一位〕，进而造成大多数人民的基本福利完全被损害，以致于不能维持生计，面临无法忍受的困境。但是那些富裕的人总是为所欲为，对人民的死活不管不顾。所以毫无疑问，西藏政府必须进行一些改进。人民的生活水平一天比一天差了。这是因为中央〔允许〕邪恶之人从〔西藏的〕上部（藏语：堆，*tö*）和下部（藏语：麦，*me*）逃进来，拉帮结伙，打家劫舍。〔最后一句的意思不是很清楚。〕

当人民〔跟中国人〕说你们应当解决这个问题时，他们回答说他们将会与西藏的领袖商讨之后才决定怎么做。如果你们不能采取具体措施使人民从贫穷的痛苦中解放出来，那么中国人和西藏人之间不睦的消息将会传遍全世界。因此，我们请求（藏语：嘉举，*gyamju*）你们帮帮我们。

我们必须按照所拥有的土地支付大大小小的税项，除此之外我们别无他法。但是我们请求〔西藏政府〕减免民政和军事上的实物税和差役，比如马和其他驮畜的差役以及人力差役，因为这些差役的数量已经超过我们按照拥有的土地所应支付的税额。除此之外，还有利加利、利滚利的高利贷，那些〔债主〕用残忍严厉的手段收贷，随心所欲地用武力夺走土地、房屋、财物以及抵押的物品。因此，贫穷和低贱的人失去了生活的保障，只有远走他乡。那些未能向自己的主人缴纳足够租税的人被迫遭受残酷的拷打和折磨。为了惩恶扬善，我们将会就这个问题提交一份由生活在〔西藏〕上部和下部的人提出的请愿书。我们请求你们根据这个国家的风俗习惯适当地加以解决。

第五点

对于西藏的防御力量问题，在过去中国人和西藏人之间的关系是上师和施主之间的关系〔在清朝的时候〕，那时西藏只有很少量的军队。而在十三世达赖喇嘛统治时期，我们开始训练一支部队来保护我们上部和下部的领土，所掌握的武器只够保护我们自己的土地。我们根据自己的经济状况采购了一些枪支，我们从不打算同外面的人打仗。我们的国家西藏是以佛国著称的，西藏人只知道佛法 and 供养。我们西藏人没有什么力量，没有技术和财富，也没有其他国家所掌握的那种知识。我们只是一群对所有人都持友好态度的普通人。这就是我们为人处世的方式。

但是现在，如果你们要改革藏军的行为规范以及士兵们的制服和操练方式，人民会非常失望。中央说过〔西藏〕应当拥有保护或改革当地传统和宗教信仰的权力。所以我们请求允许让地方的传统保持不变。

我们必须保护好我们自己上部和下部的领土。而一个大国的制度并不适合一个小国，如果强搬过来只会百害而无一利。所以，为了能让人民过上快乐的生活，根据以前的惯例，除了少量的中国官员和部队〔留在西藏〕之外，剩下的人应当撤回。⁶³ 我们请求您考虑这一点，并帮助我们向〔你们的〕上级请示，以给我们一个明确的答复。

第六点

众所周知，我们在直接利用自己的自然资源之外还把西藏剩余的产品，比如羊毛、牦牛尾、麝香、鹿角以及植物药材等出口出去，从而可以从印度、英国和美国等国家购买钢铁、黄金和白银。在进行这种类型的贸易时我们一直按照宗教信仰，遵守诚实公平的原则。实际上……通过陆路、海路以及航空运输的数项商品贸易协定已经达成，而中国人和西藏人也已各自征收关税。

到了今年，在中藏友谊的托辞下，羊毛贸易被停止了。如果继续像这样下去，已经运到印度的羊毛将会沾染灰尘〔而腐烂〕。而在西藏的人们也不会有动力来收集整理羊毛，商人将承受无法挽回的损失。我们请求你们大发善心，让我们像过去一样继续进行羊毛

63. 藏语是：sngar lam dpon dmag phran bu tsam las de byings 'phral du phyir 'then yod pa。

贸易。否则，西藏政府的财政、三大寺的经济状况、进行佛事的基金以及富人和臣民/农奴（藏语：米赛）的福利将会遭到破坏。所以我们请求你们帮帮我们。中央说会根据西藏的具体情况帮助西藏发展农业、牧业、手工业以及商业贸易，以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但是事实上，禁止羊毛贸易已经影响了西藏政府的收益、寺院的供养以及人民的生活。每个人都看得清清楚楚，所以中国人应当解除贸易禁令。⁶⁴

由此可以看出，这份请愿书试图把《十七条协议》定位于清朝时期（以及之前的蒙古皇帝时期）的供施关系的框架下，同时试图向人们传达出一种感觉，即只要沿着正确的道路——清朝时的方式——西藏人就能和中国保持良好的关系。这份请愿书在用语上非常有礼貌，它对中国人继续让达赖喇嘛掌权以及承诺保护寺院和它们的经济来源表示感谢，同时表示人民会议对改革传统的封建庄园制度是拥护的。但是它要求中国人改变他们在西藏的策略，让藏军保持不变，只在拉萨保留一小部分中国官员和军队，允许西藏人改革他们的社会和税收制度，并且重新恢复羊毛出口贸易。假如中国方面接受这些要求，那么一种在某种程度上跟 1913 年以前的西藏相似的“保护”关系就会确立起来。西藏将继续是中国的一部分，但是它也会有自己的政府体系和制度，自主地运作，只有少量的中国军队和官员在拉萨监督各项事务。而这正是司曹的想法。

噶伦们从代表手中接过这份请愿书，告诉他们随后会联系他们，并要他们在等候答复的时候不要制造麻烦。与此同时，中国人命令所有的部队保持戒备，并用沙袋等物品加固阵地。一个西藏人回忆说：“那个时候，中国人从卖棉布的尼泊尔人和其他商人那里购买所有能买到的东西，制做了大量的袋子，然后装上沙子在他们的门前、窗户上和屋顶筑起了屏障。所以尼泊尔人和穆斯林发了大财。”⁶⁵ 但是与此同时，中国军队严令禁止开第一枪。他们的计划是全力反击，而不是先发制人。⁶⁶

64. 人民会议请愿书，1952（划线部分为强调）。实际上，羊毛贸易的禁令是美国禁止向共产党国家购买产品造成的。

65. 合尊·拉让强佐，访问记，1992。

66. 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1991: 194。

人民会议的领导者不知道派代表去见张经武时会得到什么回应，所以先想好了后着，一旦中国人把代表们逮捕起来，他们就会按计划营救他们。这份营救计划包括攻击中国人的建筑，所以他们给每名成员发放了武器，告诉他们聚集在中国人的司令部门口。⁶⁷ 中国方面的记录证实有大量西藏人在张经武的住处和其他地点来回走动：“这时，反动〔武装〕分子两千多人，秘密包围中央代表住所（中共西藏工委驻地）和我外事处、人民银行。鲁康娃、洛桑扎西还指挥藏军和三大寺喇嘛制造骚乱，向我方挑衅。”⁶⁸

当人民会议的代表离开张经武的住处时太阳已经下山了，噶伦们和中国官员随后又讨论了一会儿形势。在中国人看来，他们得到的情报似乎表明局势随时都有可能发展成暴力冲突。因此当噶伦们说要回家时，张经武对聚集在他住所外的人群表示极大的担忧，说他怀疑这些人计划在晚一点的时候制造麻烦。⁶⁹ 据平汪回忆，张国华警告这些噶伦说：“我们不会开第一枪，但是如果我们开枪了，那么我们就不会轻易让他们跑掉。”噶伦们回答说情况不会那么糟糕。⁷⁰ 虽然这样，张经武还是要求噶伦们留在他的司令部过夜，以便在冲突发生后平息局势，这些噶伦同意了。⁷¹ 拉鲁回忆了那天晚上的情况：“我和阿沛留在了那里。张经武说我们俩必须留下。我想可能会发生冲突，所以我们一夜都没有合眼，只是坐到天亮。如果有人来，我们会出去告诉他们都散开，都回家去。但是没有事情发生，所以第二天我们离开了。”⁷² 平汪也在那里，他回忆说他们玩麻将打发时间，不过据他回忆，索康也在那里。⁷³

67. 安多桑珠 (Amdo Samdrup), 访问记, 1994, 达兰萨拉; 强佐·阿旺天巴, 访问记, 1993。

68. 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 1990, 1952年3月31日至4月1日条目。

69. 范明 (访问记, 1993, 西安) 说中国方面已经收到有人计划制造骚乱的消息: “阿沛给了我们一些我们需要的情报, 我们也有自己的情报系统。”

70. 平汪, 访问记, 2000, 北京。

71. 拉鲁, 访问记, 1992; 拉鲁, 1981: 353; 吉柚权, 1993a: 401。

72. 拉鲁, 访问记, 1992。

73. 平汪, 访问记, 2000, 北京。赵慎应 (1995: 71–72) 和吉柚权 (1993a: 401) 也说索康也在场。

尽管张经武的住所没有发生什么事情，但是在其他一些地点还是出现了一些情况。例如，中国人相信阿沛的住所响了几枪。我们将会在下章中看到，随着紧张局势的加剧，中国人为了恢复社会秩序，现在决定绕过司曹直接求助于达赖喇嘛。

第十三章

向达赖喇嘛求助和撤销司曹职务

眼前不断恶化的局势使中国人坐立不安。他们认为造成这种局面的正是司曹，所以他们直接求助于达赖喇嘛，希望他能进行干预。在（1952年）3月31日至4月4日之间，张经武就这个问题（通过噶厦）给达赖喇嘛送去三封信。3月31日送出的第一封信叙述了两件事：

1. 这两天以来，在拉萨市我们亲眼看见，有很多色拉寺和哲蚌寺的不正当喇嘛化装成老百姓，携带枪支，并纠集一部分藏军和流氓，开会宣誓，进行反动活动，企图向人民解放军发动袭击并抢劫群众，以致造成了拉萨市秩序极端混乱的现象。
2. 今天我正式接到噶厦派秘书（藏语：噶仲）送来的通知，说有什么所谓人民代表向人民解放军和噶厦请愿，要求我去参加。经我们调查了解，这些所谓人民代表是假借民意的假人民代表，是有幕后人物支持的，他们企图用请愿和骚乱的办法达到破坏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以及民族团结的阴谋。〔因此〕请您即刻下令，〔对他们的活动〕予以有效制止。¹

同一天晚上，达赖喇嘛的哥哥洛桑三旦来到西藏工委，说达赖喇嘛将于次日会见两位司曹，讨论局势。²

次日，张经武又发出第二封更加明确的信，要求达赖喇嘛取缔人民会议、平息骚乱。信上说：

1. 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1991: 196。也见赵慎应，1995: 70-71。
2. 赵慎应，1995: 71。

全体噶伦转尊贵的达赖喇嘛先生：

……昨天（3月31日）在拉萨市所发现的反动组织和活动，经我们调查了解和朗子辖³米本等官员的证明，得知参加该项反动组织的分子，其中有化装喇嘛和拉萨的流氓外，并且还有全副武装的藏军参加，组织反动的所谓拉萨解放大队秘密地前往并部署在我们的驻地桑都仓周围，企图武装反叛。此时，我们解放军部队遵循良好的政策，仅仅采取军事防范策略，保持了高度的忍耐。同时在全体噶伦的协助下，得免流血事件发生，这是好的。

但我必须指出，这些反动分子团体及其活动决不是偶然的（不是自发产生的），而是有重要的幕后人物有计划、有组织地暗中组织。这种阴谋活动不仅完全违背达赖喇嘛的主张，也同民族团结、建设新西藏的意志相抵触。是破坏和平协议、反对祖国统一的罪恶行为。若不立即予以有效制止，势必给西藏人民造成严重的不良后果。为此，请您按照如下所述运用您的权威，迅速有效地下达命令，解决这个问题：

1. 立即命令所有西藏地方部队（包括你的警卫部队在内）从即日起各回各营，严加约束，不得任意外出，参加任何非法活动。并立即实施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对人民进行民族团结教育并严禁教唆。您也应当训令西藏人民不得敌视解放军，不得阳奉阴违。
2. 立即命令三大寺（包括其他寺院）在拉萨的所有喇嘛和化装喇嘛，即日各回各寺，并责令各寺堪布严加约束，不得任意外出，惹事生非。您应当命令寺院保证予以接受。
3. 立即命令解散所谓伪人民会议。所有参加人员若各回各家（各地），将不予追究，但人民会议代表可留住噶厦听候接见。我们拟会同全体噶伦听取一切意见，加以讨论，并予以正式答复。
4. 请立即命令噶厦向西藏军区商榷，联合负责，发出联合布告，严禁一切破坏民族团结与和平协议的非法活动。对所有非法行为应当加以强有力的制止。并保证维持拉萨治安，保护商民等恢复正常营业，以安人心。⁴

3. 朗子辖即拉萨市政府。

4. 《对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未出版的手记）》，出版日期不明，14-16。也见吉柚权，1993a: 404。

中国方面负责安全工作的徐淡庐带着两名警卫送这封信去噶厦，此时噶厦正在布达拉宫开会。中国人对这次会见的记录上说：

徐淡庐在噶伦们对面坐下，拿出张经武的信，把它交给索康，要他转交给达赖。之后他向噶伦们通报“人民会议”的破坏活动仍在继续，如无当权者作有力后盾，他们的气焰没有这样嚣张。暗示噶伦们必须同那些胡作非为的人断绝关系，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首席噶伦然巴发言，他表示怀疑共产党所掌握情况的真实性。他说他认为事情不会像他们宣称的那样严重，应该化大事为小事。然巴的态度显然不大在乎。他的话说完之后，徐淡庐严肃、从容地举出一连串事实，坚定、鲜明地要求噶厦必须立即采取措施，否则后果由噶厦负责。噶伦们表示同意，表示他们将会调查情况，向张经武报告。⁵

4月1日同一天，中央给西藏工委发去一封警示电，告诉西藏工委的成员要警惕危险，并就藏族人对西藏政府的忠诚度及工作方式问题对他们进行教育。这封电报是毛泽东对西藏工委领导人的独立判断能力失去信心的开始。电报中说：

你们〔1952年〕三月三日及三月十八日电悉。西藏地方政府过去曾长期地和祖国对立，汉藏民族关系目前只是初步的改善，而帝国主义迄今未放弃侵略及在西藏挑起战争的阴谋。这一阴谋最近由于嘉乐顿珠及索康·旺清格勒与达赖母亲返回拉萨，⁶可能有新的发展，需要密切注意，随时警惕。

另一方面，西藏地方政府虽为西藏人民所不满，毕竟是西藏民族现时的地方政府，又由于它是达赖的行政机关，仍能维系西藏民族的感情。现在西藏人民虽然拥护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承认西藏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但如我们对噶厦的态度不妥当，他们也会有反感。

你们在西藏地区工作，既须坚持既定协议的执行，又须了解各种情况，从具体情况出发，经过许多必须经过的步骤和曲折，以达稳步执行协议的目的。对支持靠近中央的分子（如阿沛等），争取

5. 吉柚权，1993a: 404。

6. 他们已经于2月中旬回到拉萨。

中间分子，孤立顽固分子（如两司曹），尤须进行长期的、有系统的工作。

你们对上述方针已经注意了，但中央仍希望你们更有意识地在每一步骤中都注意到，特别是因为我们目前在军事、政治上都未能完全控制西藏地区，拉萨等地物价高涨，康藏公路短期难通，军队生产尚难自给，我们对西藏人民的物质福利一时尚难有所改进。总之，我们在西藏的基础在目前和今后一年至两年内还是不稳固的。因此我们在政治上必须采取极端谨慎的态度，稳步前进，以待公路修通、生产自给、并对藏民物质利益有所改善之后，方能谈得上某些较大的改革。

目前要西藏地方政府帮助的事情，可由经武提交噶厦，请他们办理，并于提出前先与噶伦协商、解释，争取大多数人的同意，也要与司曹协商。必要而有利时可采取座谈会的方式，由经武（以中央人民政府代表资格）或国华（以西藏军区司令员资格）出面。经武、国华等不宜直接出席噶厦会议，尤不宜在他们的会议上形成我们与他们之间的僵局。经武系中央代表身份，出面同各方接触时要有更多的准备，在座谈会等会议上的主张，要预期获得多数人的拥护，少数人不敢公开正面反对；否则宁肯预先多做说服解释和个别斗争的活动。此外能与达赖保持一定的直接联系是必要的。

望你们注意了解情况，随时报告西南局和中央。

中央

一九五二年四月一日⁷

次日，包括索康和然巴在内的多位噶伦前往中国方面的驻地讨论治安问题，并一致同意在拉萨实行宵禁。拉萨“市长”（朗子辖米本，*mipön*）立即颁布命令在晚上八点到早上五点之间实行宵禁，同时禁止人们散播谣言或者煽动他人为非作歹，禁止一切秘密集会和其他不轨行为。⁸

但是，达赖喇嘛又一次对张经武提出的更为重大的问题置之不理，而且街头的情况也没有丝毫好转。中国人觉得，人民会议的成员连同一些喇嘛和士兵仍然在不断地骚扰他们。4月2日，中国方面称人民会议在（布

7. 《对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未出版的手记）》，出版日期不明。

8. 杨一真，1987: 72-73；吉柚权，1993a: 404。中国方面的材料说这个宵禁并没有得到遵守。

达拉宫前的)雪巴康(Shöl Parkhang)举行公开的集会,有一百多人参加。会上他们决定继续他们的活动直到达到目的为止,他们还组织了一些人继续包围张经武的住所。⁹

于是在4月4日,张经武又派人给达赖喇嘛送去另一封信。这一次他要求达赖喇嘛召集司曹和噶伦开会讨论阻止进一步骚乱的措施。这个会议是召开了,但是效果很不好,究其原因是司曹支持人民会议。下面的叙述对此给出了说明:

两位司曹说:“我们的政府有它自己运作的法则,关心自己处境的人民其请愿的方式是符合传统的,他们请愿的时候是谦恭的〔字面理解就是手上托着哈达,面颊点地,也即磕头〕。我们的臣民正在诉说他们生活上的困难,说他们遇到了这样或者那样的难处。他们说:‘为了解决这些困难,请怎样怎样做。’当人民说这些话的时候,我们必须倾听。倾听之后,如果真有冤屈并且真有需要政府考虑的地方,那么我们将会告诉他们:‘你们对某某事提出了请愿,而政府将会怎么怎么办。对于这几件事情,你们说得有理。但是对那几件事情,你们作出了这样或那样的要求,但是考虑到政府的政策,这是不可能实现的。’我们必须像这样答复他们。仅仅发号施令,说要逮捕谦卑地参加请愿的人们是万万不可的。”

鲁康娃这么说的时侯,〔中国人〕并没有直接地回应,只是说:“有人在幕后搞鬼,有人在幕后搞鬼。”¹⁰随后他们突然站了起来,说这是白费唇舌,说完就走了。……〔他们说〕“有人在幕后搞鬼”是指司曹是这些人的后台。¹¹

西藏政府没有满足中国人提出的用行动抑制人民会议活动的要求。对此,北京在1952年4月6日发出复电。在电报中,它向西藏工委作出新的重要指示,其内容甚至比4月1日的电报更加谨慎,更加克制。此刻北京指示他们搁置推动藏军改革和设立军政委员会。从本质上说,北京给他们的指示是停止执行协议中的这些重要条款。

9. 杨一真,1987: 72-73。

10. 藏语: *yöle gyabla mi du*。

11. 札登,访问记,1992,达兰萨拉。他说他的消息来源于司曹洛桑扎西一个很亲近的密友夏孜拉(Shatsela)。札登说夏孜拉曾经告诉过他,洛桑扎西对自己说过这件事。

我们基本上同意西南局、西南军区〔1952年〕四月二日给西藏工委和西藏军区的指示电报，¹²认为这个电报所采取的基本方针（除了改编藏军这一点外）及许多具体步骤是正确的。只有照此做法，才能使我军在西藏立于不败之地。

西藏情况和新疆不同，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西藏均比新疆差得多。我王震部入疆，尚且首先用全力注意精打细算，自力更生，生产自给。现在他们已站稳脚跟，取得少数民族热烈拥护。目前正进行减租减息，今冬进行土改，群众将更拥护我们。新疆和关内汽车畅达，和苏联有密切经济联系，在物质福利上给了少数民族很大好处。

西藏至少在两三年内不能实行减租，不能实行土改。新疆有几十万汉人，西藏几乎全无汉人，我军是处在一个完全不同的民族区域。我们唯靠两条基本政策，争取群众，使自己立于不败。

第一条是精打细算，生产自给，并以此影响群众，这是最基本的环节。公路即使修通，也不能靠此大量运粮。印度可能答应交换粮物入藏，但我们的立脚点应放在将来有一天万一印度不给粮物我军也能活下去。

我们要用一切努力和适当办法，争取达赖及其上层集团的大多数，孤立少数坏分子，达到不流血地在多年内逐步改革西藏经济、政治的目的；但也要准备对付坏分子可能率领藏军举行叛变，向我袭击，在这种时候我军仍能在西藏活下去和坚持下去。凡此均须依靠精打细算，生产自给。以这一条最基本的政策为基础，才能达到目的。

第二条可做和必须做的，是同印度和内地打通贸易关系，使西藏进出口趋于平衡，不因我军入藏而使藏民生活水平稍有下降，并争取使他们在生活上有所改善。只要我们对生产和贸易两个问题不能解决，我们就失去存在的物质基础，坏分子就每天握有资本去煽动落后群众和藏军反对我们，我们团结多数、孤立少数的政策就将软弱无力，无法实现。

西南局四月二日电报的全部意见中，只有一点值得考虑，这就是短期内改编藏军和成立军政委员会是否可能和合适的问题。我们的意见是，目前不要改编藏军，也不要形式上成立军分区，也不

12. 我没有得到这封电报。

要成立军政委员会。暂时一切照旧，拖下去，以待一年或两年后我军确能生产自给并获得群众拥护的时候，再谈这些问题。

在这一年至两年内可能发生两种情况：一种是我们团结多数、孤立少数的上层统战政策发生了效力，西藏群众也逐步靠拢我们，因而使坏分子及藏军不敢举行暴乱。

一种是坏分子认为我们软弱可欺，率领藏军举行暴乱，我军在自卫斗争中举行反攻，给以打击。以上两种情况，无论哪一种都对我们有利。

在西藏上层集团看来，目前全部实行协定和改编藏军，理由是不充足的。过几年则不同，〔那时〕他们可能会觉得只好全部实行协定和只好改编藏军。如果藏军举行暴乱，或者他们不是举行一次，而是举行几次，又均被我军反击下去，则我们改编藏军的理由就愈多。看来不但是两司伦〔司曹〕，而且还有达赖及其集团的多数，都觉得协定是勉强接受的，不愿意实行。

我们在目前不仅没有全部实行协定的物质基础，也没有全部实行协定的群众基础，也没有全部实行协定的上层基础，勉强实行，害多利少。他们既不愿意实行，那么好吧，目前就不实行，拖一下再说。时间拖得愈久，我们的理由就愈多，他们的理由就愈少。拖下去，对我们的坏处并不大，或者反而有利些。各种残民害理的坏事让他们去做，我们则只做生产、贸易、修路、医药、统战（团结多数，耐心教育）等好事，以争取群众，等候时机成熟，再谈全部实行协定的问题。如果他们觉得小学不宜办，则小学也可以收场不办。最近拉萨的示威不应看作只是两司伦等坏人做的，而应看作是达赖集团的大多数向我们所作的表示。其请愿书内容很有策略，并不表示决裂，而只要求我们让步。其中暗示恢复前清办法不驻解放军一条，不是他们的真意。他们明知这是办不到的，他们是企图用这一条交换其他各条。在请愿书内批评了十四辈达赖〔这指的是请愿书中对差税和高利贷的评论〕，使达赖在政治上不负此次示威的责任。他们以保护西藏民族利益的面目出现，他们知道在军事力量方面弱于我们，但在社会势力方面则强于我们。我们应当在事实上（不是在形式上）接受这次请愿，而把协定的全部实行延缓下去。

他们选择在班禅尚未到达的时机举行这次示威，是经过考虑的。班禅到拉萨后，他们可能要大拉一把，使班禅加入他们的集团。如果我们的工作做得好，班禅不上他们的当，并安全到了日喀则，那时形势会变得较为有利于我们。

但我们缺乏物质基础这一点一时还不能变化，社会势力方面他们强于我们这一点一时也不会变化，因而达赖集团不愿意全部实行协定这一点一时也不会变化。我们目前在形式上要采取攻势，责备此次示威和请愿的无理（破坏协定），但在实际上要准备让步，等候条件成熟，准备将来的进攻（即实行协定）。你们对此意见如何，望考虑电告。

中央

四月六日¹³

在拉萨的西藏工委虽然收到这份令人意外的电报，但是仍然担心局势会失控。于是他们认定有必要做一些事情来平息动荡的局面，使拉萨恢复控制。在经过很长时间的讨论之后，他们得出结论，认为只要司曹在位就不可能缓和拉萨的紧张气氛。这需要的就不仅仅是表面上的“攻势”，还需要撤销司曹的职位。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中国人开始劝说或者向达赖喇嘛施压，要他撤销鲁康娃和洛桑扎西的职务。这种咄咄逼人的策略是他们到目前为止一直在试图避免的，但是现在他们认为是时候要作出改变了。

然而，西藏工委在4月7日先给中央发了一封电报。在电报中他们汇报了他们要求达赖喇嘛撤销司曹职务的计划，并请求指示。中央在次日给他们发了电报，但是这封电报并不是7日所发电报的复电，因为7日的电报中央还没有收到。相反，中央这次发出的又是一封令人意外的电报。在这封电报中，中央批评了西藏工委的冒进，并对决策过程做了重大改变，直接控制和西藏方面相关的一切事务的决策。毛泽东仍然完全热衷于他的渐进主义策略。他已经认定，拉萨的形势是如此复杂和敏感，以致于不得不对西藏工委干部的行为施加更为直接的控制。拉萨现在不得不就每件事都提出请示，并且不是像以前一样向西南局请示，而是直接向北京请示。毛泽东的这封电报是1952年4月8日发出的。

西南局、西藏工委：

四月七日十一时西南局来电收到。同意西南局意见拉萨骚乱事件由中央直接处理。中央并决定嗣后关于我方和藏方发生的政治、军事、外交、贸易、宗教、文化等交涉、商谈和处理事件，均集中

13. 《对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未出版的手记）》，出版日期不明（划线部分为强调）。

由中央解决，西藏工委直接向中央作报告，同时告知西南局。西南局对这些问题的意见向中央提出。

关于西藏党和军区的内部事宜，包括编制、部署、整训、生产、修筑、支援等项仍由西南局和西南军区主管。西藏工委凡关与藏方发生交涉事件及对印度、尼泊尔等国的外交事件，均应每事报告请示，方能办理。

最近在拉萨创办小学一事没有报告和请示，是不对的。此外似乎还有一些事也未事先报告和请示，此点务请工委严格注意。必须认识藏族问题的极端严重性，必须应付恰当，不能和处理寻常关系一例看待。

中央

四月八日下午九时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¹⁴

西藏工委没有收到任何关于司曹问题的指示，于是在4月10日¹⁵发出另一封电报给北京，上报寻求撤销司曹职务的具体计划。

西藏工委致中央并西南局关于对付拉萨反动分子的计划

〔四月十日晚上九点〕

关于对付拉萨反动分子的具体安排，决心以政治斗争〔而不是军事斗争的〕形式出现，公开向达赖提出撤销两司曹职务，坚持实现我们四月一日所提四点〔见前文〕。如此做法估计可能发生以下三种情况：

第一、达赖和噶厦可能顺利同意撤职。

第二、两司曹可能孤注一掷，发动军事反抗，〔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则予以坚决的军事回击，在“有理、有利、有节”¹⁶的原则下，争取获得军事上和政治上的胜利。

第三、两司曹可能躲藏在布达拉宫，操纵达赖，拖延时间，向我方讨价还价，或阴谋继续组织力量，进行反抗。如此则抓住噶厦，请求达赖迅速下令解决，撤职查办。

1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西藏自治区文研会；中国藏学研究中心，2001: 65（划线部分为强调）。

15. 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1991: 196）上说，4月8日张经武和达赖喇嘛进行了一次会谈，要求他发布一项公告说解散人民会议，但是这似乎并不正确。

16. 这是周恩来提出的著名原则。

具体工作：

- (1) 十一日召集三大寺堪布会议，以拉萨市治安混乱为理由，坚决要他们停止四月十四日起〔在拉萨祖拉康举行〕的“小召”仪式，改为各寺自行举行，我们则分别到各寺发放布施，并适当进行宣传。另一方面则通知噶厦〔对这些布施进行〕备案。
- (2) 十三日由张经武用中央代表名义，将要求撤职的决定，用书面送给达赖，要求于十四日午前宣布命令并出布告。
- (3) 召集噶厦会议，说明中央政策和态度，并分头争取僧俗贵族及西藏和谈代表。同日召集贵族军官会议，讲明政策。
- (4) 军事部署十二日前准备完毕。¹⁷

4月11日，中央答复了他们后来收到的那份发于4月7日早些时候的电报。

西藏工委并报西南局：

在收到并已答复你们四月十日二十一时的电报以后，接到你们四月七日关于张经武同志参加噶厦会议经过情形的电报。据此完全可以看出，不但达赖等中间派，而且两司曹这样的反动派，都不敢承认此次叛乱及所谓“人民会议”是合法的。

因此你们四月十日二十一时电所取方针，撤掉两司曹，解散“人民会议”，追究主谋分子（即你们所谓帝国主义侵略分子，亦即鲁康娃、洛桑扎西、索康等人），是完全必要和完全适当的。经武在噶厦会议上指出“人民会议”为非法的三条理由（举行叛乱，破坏团结，反对达赖），并指出除主持此次叛乱事件的帝国主义侵略分子及国民党特务分子以外，一律不予追究，以安定多数人，都很正确。所谓帝国主义侵略分子，应即是指鲁康娃、洛桑扎西、索康等反动集团的首要分子，亦即过去达扎反动派的重要分子，其人数可依事情逐步弄明去作决定，不要自缚手足。

中央

四月十一日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¹⁸

17. 引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西藏自治区文研会；中国藏学研究中心，2001：67-68，中央4月11日给西藏工委的电报注释2。

1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西藏自治区文研会；中国藏学研究中心，2001：69-70，中央1952年4月11日给西藏工委和西南局的电报。

就在第二天，中央澄清了它先前关于《十七条协议》的指示，命令西藏工委在危机解除之前不提妥协，以免让西藏人误以为他们是在示弱。这一电文说：

西藏工委并报西南局：

四月十一日电悉。中央四月六日电所说妥协政策目前不要提，需待目前的政治斗争得到确定胜利后看情形再决定。目前你们只做政治斗争，对改编藏军、成立军分区、成立军政委员会等事〔上的妥协〕根本不要谈。否则可能被反动派认为我示弱。

中央

四月十二日下午三时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¹⁹

同一天，西藏工委把计划送给达赖喇嘛的信件的草稿发给北京。在这封信中，西藏工委说鲁康娃和洛桑扎西正在破坏《十七条协议》，所以应当被撤职。²⁰与此同时，拉萨的中国人正在制定反击进攻的军事计划，给他们的部队颁布了作战预令。在预令中对局势的分析如下：

西藏军区作战预令

(1952年4月11日于拉萨)

A. 情况

1. 自3月31日拉萨市之帝国主义侵略分子及国民党特务分子和西藏少数上层反动分子，纠集藏军及流氓喇嘛商人各一部，组织反动的所谓“人民会议”、“拉萨解放队”，进行请愿，企图以暴乱手段撕毁协议，这一阴谋活动仍在继续发展中。
2. 现任拉萨市区之藏军共约2,150人，其兵力布置图详情见三号通报。

B. 情况

为了有力地进行自卫，坚决打击拉萨市帝国主义侵略分子及国民党特务分子所组织的暴乱，保证和平解放西藏办法协议的实现，

1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西藏自治区文研会；中国藏学研究中心，2001: 71，中央1952年4月11日给西藏工委和西南局的电报。

2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西藏自治区文研会；中国藏学研究中心，2001: 73，中央1952年4月13日给西藏工委和西南局的电报的注释。

我们的作战方针是：首先让敌人向我驻地进攻，先让敌人打响第一枪，我们任何部队不准先开枪，使其在政治上无理，我们则取得政治上主动，当敌人来攻时我各防御部队务须坚决固守，不准后退一步，必须给进犯者以杀伤，而后我攻击部队即坚决猛烈地实行反击。

首先以迅速动作歼灭敌人有组织的武装力量，并夺取其武器弹药及粮食仓库、电信设备、药王山要点等，并保护达赖喇嘛，严守城市纪律政策、保护喇嘛寺庙的政策和俘虏政策，严禁乱拿商人民财物、破坏寺庙、枪杀俘虏及无辜群众等违法行为，违者严惩。

此令

司令员	张国华
政治委员	谭冠三
副政治委员	范明
第二副政治委员	王其梅
参谋长	李觉 ²¹

4月13日，张经武会见了噶伦、仲孜杰、堪布以及三大寺的代表。张经武回顾了过去四五个月的局势，接着第一次明确地说西藏工委将要求达赖喇嘛撤销两位司曹的职务。但是那时天色已经很晚，所以双方同意由噶伦对此作出答复，并在次日把他们的想法告诉张经武。

同一天（4月13日），中央给张经武发去了一系列很有意思的指示，要张经武在即将送给达赖喇嘛的信中使用较为平和的语气，并且告诉张经武如何在批评司曹的同时**暗示将作出妥协**。

西藏工委并报西南局：

（一）四月十二日二十一时电所告中央代表给达赖的通知收到。这个通知是基本正确的。如已送出，即照那样。如未送出则请你们略加修改。

即在叙述两司曹罪恶事实的三条中，第二条说两司曹反对成立军分区、反对改编藏军及说解放军把藏军打得头破血流等语应删去，而改为“不执行协议规定。他们对协议中几项重要规定例如改编军队等都持反对态度，他们完全不了解全部协议条文都是对西藏民族和西藏人民的前途和幸福有利

21. 吉柚权，1993a: 409–11（划线部分为强调）。

的。他们也不是对协议中某些条文的实行步骤和方法提出建设性的意见，而是根本反对实行协议”。这样写法较能争取多数，也埋伏一笔我们可能在某些条文的实行步骤和方法上接受合理的意见。

- (二) 在张经武同志和达赖见面时，在你们和阿沛及其他人员谈话时，暂时均不要说妥协政策的话。目前只举行政治斗争，准备军事反击，将来是否要提妥协政策及何时提出、如何提出，均待看清楚此次政治斗争的结果之后再由你们报告中央作具体决定。但目前也不要强调军队马上要改编、军政委员会和军分区马上要成立。如果他们问什么是“实行步骤和方法的建设性意见”，你们可告以请大家想一想，凡是有利于汉藏团结和妥善执行协议的意见都是建设性的意见，如果有这类意见，我们愿意听取，也愿意磋商；但不要轻易表示自己的具体意见，以免陷入被动。
- (三) 看样子，拉萨的藏军恐非逐步加以改革不可。其他地区的藏军可以慢点改革。并且要一部分一部分地做，不要同时一起做。改革的步骤，是在阿沛等爱国派当政后，逐步撤换一些最反动的军官，而将其余的军官分批调出受训，逐步使藏军中有靠拢我们的军官，用这种办法逐步达到改变藏军的目的。

中央

四月十三日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²²

第二天，中央就噶厦于13日提出的建议作了答复。在答复中中央向西藏工委明确强调，撤销司曹职务的方式必须表现得是西藏政府的决定，而不是缘于中国方面的压力。

西藏工委并报西南局：

四月十四日十二时的电报收到。

- (1) 你们还没有将中央代表的书面通知送到达赖，先由经武向达赖和噶厦作口头通知，详细说明对两司曹撤职查办的理由和我们的意图，是很适当的。

2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西藏自治区文研会；中国藏学研究中心，2001: 72-73，中央1952年4月13日给西藏工委和西南局的电报（划线部分为强调）。

- (2) 达赖既然尚在犹豫，还没有下令撤掉两司曹的决心，同时噶厦又将为此事召开会议，则我们应当等候噶厦会议的结果，然后再定是否将通知书交给达赖。如果他们〔噶厦〕决定采取辞职的方式使两司曹下台，则要求撤职的通知书就不要送出，两司曹的撤职布告也用不着了。
- (3) 充分使噶伦及其他文武官员及三大寺喇嘛明了两司曹的罪大恶极，军事叛乱行为及非法“人民会议”不能容许，并经过噶伦去影响达赖，使他造成撤掉两司曹的决心（如果两司曹不辞职，就应撤掉他们），是很必要的，这就需要几天甚至更多的时间。横直我们已集中了军队，不管反动派用文的和武的方法和与我们作斗争，我们都能战胜他们。因此通知和布告这两个文件暂时都不拿出去。

如果将来要出布告，最好让达赖一人出面。可由噶伦拟稿，我们加以修改，然后说服达赖取得同意，然后发出，较为自然，而不使达赖及藏府中各中间派分子感到是一种屈辱。这点很重要，请加注意。

中央

四月十五日早上四时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²³

与此同时，噶厦在拉萨会见了中国人，同意取缔人民会议。但同时噶厦也辩称，由于司曹在社会上有广泛的支持，所以中方应当收回撤销司曹职务的要求。噶厦向中国人保证司曹没有在背后搞鬼，并说司曹虽然有些话可能说得不对，但是他们一向都是这么说话的，不管是对西藏人还是对中国人。换句话说，噶厦提出了一个折中的方法：取缔人民会议，但是不解除司曹的职务。西藏方面保存的一份关于这次会议的备忘录中记录了他们的发言内容。

人民会议都已预先给中国人和西藏人送去了一封信。你们应该记得这期间中国人和西藏人之间进行的一系列具体讨论的内容。但是今天，噶厦和仲孜将会就这件事给你们一个交代。

2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西藏自治区文研会；中国藏学研究中心，2001：74-75（划线部分为强调）。

人民会议在中国人和西藏人之间造成了无谓的争端，他们的动作很小但是造成的伤害却很严重。同时，一小撮歹徒打着人民会议的旗号到处造谣，妄图制造骚乱、欺骗他人，使群众不能安居乐业，危害巨大。所以，从今日起禁止人民会议活动。

为了不使所有百姓有所疑惑，给他们严肃和明确的教诲，同时也为了答复人民会议错漏百出、误入歧途的请愿书，我们决定颁布一项政府公告（藏语：*bugdam dzatsig*），并会抄送一个副本供你们审阅。之后我们将告诉〔人民会议的〕代表我们将会颁布这个公告，这是一件好事。我们将会详细地向〔人民会议的〕代表解释我们的看法，告诫他们事情的利弊，并且严正地告诉他们以后不得再集会。以上就是我们的方案，希望你们中国方面多多指教。

我们已经详细地讨论了要取缔造成中藏之间无谓的隔阂的人民会议，而如果我们真将人民会议连根拔起，那么你们也没有必要怀疑谁在背后支持他们了。尤其是司曹，他们并不是人民会议的后台。我们已经在私下里集体向你们保证他们并没有在背后给人民会议撑腰。司曹和噶伦会面的时候，他们已经把这一点说得很清楚了。因此，你们不必再怀疑。但是如果你们的疑心没有消除，那么我们所有人可以担保〔真的是这样，即担保他们在将来不会有什么行差踏错〕。

至于你们提及的司曹在会见中国人的正式场合和私底下所做的五条越轨言论，〔我们想说〕两位司曹素以公事为重，尤在言谈中心直口快，不管是对待自己人还是对待外人都是如此〔并不是故意针对你们〕。所以他们说的话可能的确有些许不妥之处，但是我们中藏双方已经签订了一份协议，所以可以说是兄弟之间，犯点小错误应当是可以容忍的。因此，〔当出现这样的错误的时候〕你们应当在私底下向我们提出。我们希望你们息怒，不要动气。今后双方应按照协议所说的，要把加强中藏友谊作为第一要务，继续进行协商……

备忘录（藏语：*nyeljang shogle*）〔会议中西藏方面噶伦的发言〕²⁴
（参考《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九辑中文版的相关内容进行翻译——译注）。

24. 《西藏文史资料选辑》（CHMC），1986b: 282-84（划线部分为强调）。

于是在毛泽东的亲自指导下，中藏双方在如何处理司曹的问题上开始讨价还价，这个过程很有意思也很能说明问题。紧接着在 15 日下午五点，西藏工委给北京发了一封电报，解释他们打算如何处理人民会议的成员和他们认为给人民会议撑腰的人。西藏工委采取了一种非常平和的姿态。它建议除了要把司曹排除出政治舞台之外，不实施广泛的处罚：

根据西藏的情况，决定对所谓“人民会议”的处理采取“扶持爱国主义者进步势力，争取团结中间势力（包括稳定动摇分子），完全孤立反动分子”的方针，在这次政治斗争中，只坚决打击两反动司曹，把他们打下政治舞台。对其他分裂主义的头子，如索康等，暂采取麻痹态度。

对所谓人民代表，则采取宽大的方法，彻底清算其亲帝分裂主义、举行武装叛乱、反对和平协议、反对汉藏团结的反动言论和行动，并要趁机向西藏地方政府和人民解放军履行登记手续，写悔过书，悔过自新，免于惩办。

公开出面代表及个别重要头子，如卸职基巧堪布等，则交政府看管，或是分别处理，随传随到，以便追寻帝特线索和反动组织的内幕，作为一件重要反动案件来处理。对被迫、受骗参加的人员，一律宣布不予追究。²⁵

在同一天，西藏政府的高级官员会面讨论了取缔人民会议的决定。在西藏工委于 4 月 15 日发给中央的电报中，西藏工委报告了西藏方面在这次会议上作出的决定，即一同去找张经武，设法说服张经武允许司曹留任：

今日，全体高级官员在布达拉举行紧急会议。噶厦官员首先见两司曹，将十四日〔原文如此，实际上是十五日，见上文〕噶厦会议的两项结论性意见向他们提出：“汉藏是要团结的；协议是要执行的；人民会议是非法的，是要解散的。”噶厦商定，用达赖的名义出布告，取缔人民会议。报告中还说：“全体官员一致通过，明天上午，全体官员到我们驻地来讲情，要求不要撤两司曹的职，人民会议可以解散。”²⁶

25. 引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西藏自治区文研会；中国藏学研究中心，2001：76-77，中央 1952 年 4 月 16 日上午六时给西藏工委和西南局的电报注释 2。

26. 引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西藏自治区文研会；中国藏学研究中心，2001：79，中央 1952 年 4 月 16 日上午八时给西藏工委和西南局的电报注释 2。

因为西藏方面仍然试图回避撤销司曹的职务，所以最终张经武在4月15日派人给达赖喇嘛送去一封信，要求他立即下命令撤销鲁康娃和洛桑扎西的职务。在这封信中，张经武对达赖喇嘛施加了更大的压力，说从即日起他们不会再承认鲁康娃和洛桑扎西的职位，因此也不会再同他们商量任何事务。张经武要求达赖喇嘛给噶厦一道命令，告诉他们从即日起要直接接受达赖喇嘛领导（而不是在司曹之下），并要直接同张经武接洽各项事务。信中列出了司曹的几点劣迹，其中包括很多夸张成分：

1. 坚持“西藏独立”的分裂主义立场；
2. 不执行协议规定，对协议的几项重要规定，如改编藏军等，都持反对态度；
3. 假借民意，主持非法的人民会议；
4. 不经西藏军区司令部批准，擅自将国防要地日喀则驻军炮兵代本调回拉萨，阴谋军事政变；
5. 不尊重达赖喇嘛的亲政权力，屡次违背、抗拒达赖喇嘛的命令，破坏达赖喇嘛的政教威信。²⁷

第二天（4月16日）早上六点，毛泽东把同意西藏工委对人民会议成员的斗争建议的决定通过电报告知了西藏工委。很有意思的是，毛泽东再一次在电报中提醒西藏工委成员，他们所有重要的决定都必须请示北京。

西藏工委并告西南局：

- (1) 四月十五日十七时的电报收到。你们处理所谓“人民会议”的方针、步骤和办法，我们认为是适当的。
- (2) 在处理“人民会议”的过程中，必会发生许多新情况，请你们在采取每一个具体步骤时随时向我们作报告，其中重要者须得中央批准，然后执行。你们已经有了确定的总方针，在采取具体步骤时就需要又坚决、又慎重，才能准确地打中敌人的要害，争取广大的群众。因此，宁可花费一些时间和中央交换意见以后再去动手为有利。

27. 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1991: 197-98；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1990，1952年4月15日条目。

中央
四月十六日上午六时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²⁸

两个小时之后，毛泽东发出了第二封电报。在这封电报中他通报了刚刚作出的一项重大的决策，即要西藏工委考虑同意让司曹辞职而不是撤职，以此作为和西藏政府交换的筹码。

西藏工委并告西南局：

四月十五日二十四时的电报收到。

- (1) 十五日布达拉会议决定取缔“人民会议”，并由达赖出布告。如果能实行，这是一个很大的胜利。在达赖出布告以前，你们及噶厦应向“人民代表”的多数及文武僧俗官员先行揭露两司曹及帝特分子的反动罪恶经过，使布告一出，能得多数人拥护，而不感到突然。布告由达赖一人署名，经武不要联名。
- (2) 在噶厦官员们到你处为两司曹说情请求不取撤职办法而由两人自动辞职的时候，同意你们的意见“耐心揭露两司曹的罪恶，说服他们一致同意，要达赖下命令撤职”。这是因为中央代表的书面通知刚才〔于15日〕送去，不好马上改口的原故；也是因为撤职较辞职打击为重，对于惩治反动、影响群众更为有力的原故。

但是请你们注意达赖及噶厦多数的态度，如果他们再三再四地请求以辞职方法使两司曹下台，而觉得撤职办法他们接受不了的话，你们应当准备同意采取辞职的处置。因为他们已在“人民会议”问题上同意了我们的意见，向我们作了一个很大的让步，我们如果一定要取撤职办法，则可能引起达赖及中间派不满，显得我们整得太过分了。

此事请你们和阿沛、计晋美、平措汪阶(杰)〔平汪〕三人详商，究以何种方法为妥，并告我们为盼。

中央
四月十六日上午八时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²⁹

2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西藏自治区文研会；中国藏学研究中心，2001：76-77（划线部分为强调）。

2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西藏自治区文研会；中国藏学研究中心，2001：78-79（划线部分为强调）。

4月16日，二十位西藏高级官员如期来到张经武的住处为司曹说好话，请求让他们继续留任。这个会面直到晚上十点才结束，但是中国方面并没有让步，仍然坚持达赖喇嘛应对司曹予以撤职。³⁰ 有关会面情况记录在当晚发给中央的一份电报中。毛泽东在第二天（4月17日）很明确地答复了这封电报，重申他此前的指示，即西藏工委不应同意让司曹留任，但是如果西藏人坚持主张让他们辞职而不是撤职，那么西藏工委可以接受他们辞职。

西藏工委并告西南局：

四月十六日二十四时的电报收到。说情的人们没有说两司曹辞职的话，说的还是挽留两司曹的话，只说解散“人民会议”，意在以解散“人民会议”交换两司曹不辞。因此，你们在几天内还不要松口，仍然坚持一要解散“人民会议”，二要将两司曹撤职。等到达赖的布告已经发表，“人民会议”已经解散，然后再看说情的人们是否提出以辞职换撤职。如果他们不提辞职，则你们仍坚持撤职。如果他们提出辞职，则你们就可以看势转弯同意辞职。西藏贵族们是善于政治斗争的，你们也要学会这一套。也许他们要将交换条件（即两司曹留任或辞职）讲妥才出布告，你们应主张解散〔人民会议〕和撤〔两位司曹的〕职同时做，也可以先解散人民会议后再撤两位司曹的职。如果他们一定要以留职和解散相交换，则你们应采坚决不同意态度。如果他们以辞职和解散相交换，则你们可以和他们妥协，同意辞职办法。望相机处理。

中央

四月十七日十二时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³¹

但是让中国人意外的是，在4月17日和18日两天，西藏方面不管是对人民会议的问题还是对司曹的问题都没有做出什么具体的行动。实际上

30. 这个讨论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西藏自治区文研会；中国藏学研究中心，2001: 81，中央4月17日给西藏工委和西南局的电报注释3；也见乐于泓，1986: 355。

3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西藏自治区文研会；中国藏学研究中心，2001: 80（划线部分为强调）。

据乐于泓回忆，他在18日听说晚间可能会发生骚乱，所以非常紧张以至于睡不着觉，看书看到后半夜。³²

于是，西藏工委认为张经武作为中央的代表应当打破僵局，直接面见达赖喇嘛。西藏工委里很多人质疑需不需要这样做，因为他们担心西藏人会杀掉张经武。但是张经武认为这个可能性不大，于是决定前往。西藏工委设想了三种可能发生的结果，并且制定了应对方案。

1. 鲁康娃和洛桑扎西等有可能下毒手，将张经武杀害。如果这样，我人民解放军就可以借这个机会一举歼灭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和“人民会议”的所有不法分子。³³
2. 鲁康娃和洛桑扎西等将张经武软禁在布达拉宫，同时向驻拉萨解放军发动进攻。这样，我解放军也将要进行自卫反击，也要达到第一种情况的最后目的……
3. 达赖喇嘛接受撤销鲁康娃和洛桑扎西职务的要求，这样“人民会议”分子在拉萨掀起的骚乱即可和平解决。³⁴

一名参与此事件的中国官员回忆了张经武去布达拉宫那天早上的情况：

1952年4月19日早上，张经武出发前往布达拉宫。³⁵……张国华司令员、谭冠三政委、王其梅、李觉在军区司令部新建好的作战室里等候。这时他们突然接到了一个电话说张经武带着翻译和两位保卫干事、一个警卫班，已离开〔他的住处〕去布达拉宫了。

李觉把我叫来说：“张经武已经出发去了布达拉宫，现在交给你一项重要任务：马上带上一副望远镜和一支信号枪，到军区司令

32. 乐于泓，1986: 355–56。

33. 有趣的是，中国人回顾过去发现历史上只有一起驻藏大臣被西藏人杀死的事件。那是在1750年，当时驻藏大臣在拉萨没有自己的军队。西藏工委因而觉得尽管张经武要冒一定的风险，但是可能并不会真的出问题（杨一真，1987: 79–80）。

34. 吉柚权，1993a: 408；杨一真，1987: 79–81。夏加（1999: 104–5）在他的书中错误地写到，这是对张经武于3月31日会见噶厦和司曹表示担忧。但是他所引用的材料（杨一真，1987: 80）清楚地说张经武是就1952年4月19日拜访达赖喇嘛说的这段话。

35. 夏加（1999: 110）错误地把日期说成是4月25日，并且错误地说是张国华而不是张经武去了布达拉宫。一些中国方面的材料，例如赵慎应（1995）说这个历史性的会面发生在4月8日，但是这肯定也是错误的。

部南面的小河边去。从那里秘密观察布达拉宫的情况。我们事先已经同张经武约定，如果他在布达拉宫发生意外，他就会从布达拉宫顶上朝南的窗口里伸出一面红旗或发射三发信号弹。这时，你要马上发射三发信号弹。我们一看到就会发起进攻。事关重大，希望你认真观察，千万不可疏忽大意！”所以我一刻也不休息地盯着布达拉宫。当张经武出现在山的东边时，他把警卫班留在山下，自己带着翻译和两位保卫干事上了山〔去布达拉宫〕。³⁶

关于张经武和达赖喇嘛的会面没有明确的记录，但是中国方面的材料全都说张经武最终说服达赖喇嘛撤销司曹的职务。受命监视布达拉宫的中国干部回忆了他在张经武离开布达拉宫时的心情。

〔下午两点的时候，〕突然从布达拉宫东门内走出一个身影，接着又走出了三个人，于是我知道那是张经武和其他三个人，我感到非常高兴。所以我跑向作战室，边跑还边喊张经武已经安全地离开了布达拉宫。对此，每个人都感到很高兴。……张国华说：“张代表回来了非常好，但拉萨的问题是怎么解决的，我们还不得而知，所以我们必须继续保持戒备。”一小时之后，张经武从桑都仓打电话到西藏军区司令部，说：“我和达赖喇嘛之间发生了言语交锋，但是最终达赖喇嘛同意将司曹鲁康娃和洛桑扎西撤职。”³⁷

达赖喇嘛没有提到过他和张经武的会面（这个会面当然发生过）。他只是在书中写道：

不久之后，我收到一份中国人给我的书面报告。在这份报告中，中国人说很明显鲁康娃是帝国主义反动派，他不希望改善中藏关系，所以中国人要求撤销他的职务。我也收到内阁〔噶厦〕给我的口头建议，说最好是我要求两位首相〔司曹〕辞职，这让我很伤心。他们两人是如此忠心和可靠，如此老实和真诚，如此热爱他们为之服务的人民。³⁸

36. 吉柚权，1993a: 409；杨一真，1987: 58。

37. 吉柚权，1993a: 409；也见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1991: 66 及后页。

38. 达赖喇嘛，1990: 73 及后页。

而在一次访问中他说：

最终，中国人希望〔撤销他们的职务〕，而噶厦也建议我最好是让他们辞职，因为如果他们〔在位〕我们就不能和中国人建立良好的关系。所以我告诉两位司曹：“从我们的角度来说我方对你们没有抱怨，但是这样的局面已经出现了。”可怜的人，他们都说不出话来。他们说重要的是不让达赖喇嘛“为难”，而且不管怎么样他们也没有什么遗憾。可怜的人。³⁹

达赖喇嘛在一次访问中进一步叙述了噶厦是如何来找他，向他建议撤销司曹职务的。

全体噶厦成员都来了。我记得不是很清楚了，印象中主要发言的人是阿沛，我想这也是符合逻辑的。接着可能夏苏也说尽管噶伦们都欣赏他们的坚毅和忠贞，但是让他们留下来不再有什么用。

问：他们给出具体的理由了吗？

他们一直在和中国人冲突。而且如果我们让他们留下，那么我们将无法向中国人交代。⁴⁰

拉鲁回忆了参加这次会议的情形。

我们全体噶伦立即前往拜见达赖喇嘛，向他禀明〔张经武要求达赖喇嘛撤销司曹职务的〕情况。达赖喇嘛回答说：“解放军首长同司曹之间关于协议的分歧，如同破裂开的瓷碗裂痕已经无法粘合一样，目前很难和解。所以，我们只有保留其封号和薪俸，叫他们辞去司曹职务。”

接着他叫我们一起去向司曹传达他的旨意。我们都去了，由噶伦索康·旺清格勒用一种很恭敬的方式向他们详细传达了〔达赖喇嘛的〕旨意。洛桑扎西只回答“是、是”（藏语：*la les la les*）。而鲁康娃接着说：“解放军已经把我们包围了。例如他们已经在芝布山（Trib）空旷的地方搭建了帐篷，要住在那里。今后我们会和你谈这件事。但是现在我们俩将会服从命令，放弃我们的职权。至于官印等，我们俩会〔亲自〕退还给达赖喇嘛。”⁴¹

39. 达赖喇嘛，访问记，1995，达兰萨拉。

40. 达赖喇嘛，访问记，1995。

41. 拉鲁，1981：353-54。

然而，很明显达赖喇嘛实际上已经知道司曹过于强硬，一直在和中国人闹矛盾。

阿沛在一些场合告诉我两位司曹有点过于顽固（藏语：*trag tra*）了。最终，中国人正式要求我让司曹辞职，之后全体噶厦也一致劝说我，应该让两位司曹辞职。无论如何，他们说的是对的。……对于司曹我是毫无保留地信任，也百分之百地依靠他们。有时候我也发觉他们有一点死脑筋，但是我没有这么告诉他们。我觉得没有必要，我对他们非常信任，而他们也非常尊敬我、爱戴我，那时的情况就是这样。⁴²

可怜的人〔司曹〕，他们是百分之百可以信赖的人。他们完全是自我牺牲，这很让人感慨。他们某种程度上是有点死脑筋，并且太过于执拗（藏语：*gyongdrag*）。

阿沛和夏苏……内心深处和司曹是一样的，但是现实环境使他们有了不一样的想法。他们可能也同情过司曹，但是他们意识到司曹的立场不会带领西藏走出困局，他们这样做是不会有好结果的。中国人已经来了，这种简单的冲撞不会有什么用。所以他们，甚至夏苏，现在都说两位司曹的态度过于极端了，对我们不会有好处。我们必须和中国人建立亲密的关系。阿沛是这么认为的，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他是站在中国人那边的。⁴³

那时的情况是我们已经在他们的股掌之中了，因此应该做的是尽量讲究策略，尽量友好，顽固对抗是不会有好果子吃的。两位司曹非常顽固，这一点我记得很清楚。那个时期司曹、噶厦有时会一起会见中国人，有时是噶厦单独〔会见中国人〕。当两位司曹和噶厦一起会见中国人时，最后总是以某种程度上的争吵告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张经武于1952年提出两位司曹必须辞职。⁴⁴

虽然达赖喇嘛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或者通过阿沛之口，很了解两位司曹的不足之处，但是他却拒绝在初期加以干预，而这再一次体现了他缺乏对身边发生的重大政治事件进行干预的意识。他是统治者，但却选择做一个消极的统治者，把所有重大事务都放任给政府作决定。在一次访问中，他向我部分地解释了他那时扮演的角色：

42. 达赖喇嘛，访问记，1994，安娜堡，密歇根州。

43. 达赖喇嘛，访问记，1995。

44. 达赖喇嘛，访问记，1993，达兰萨拉。

当司曹在位的时候我也刚刚亲政，对吧？没错吧？一直到1952年，司曹还担负着主要的责任。所以司曹在位的时候，我完全依赖他们。

不管是和中国人的关系问题还是其他的事务，噶厦负责制定计划，然后把计划呈交给司曹，接着再由司曹呈交给我。对于他们能够决定的事务他们就会自己决定，对于他们不能决定的事务他们会和我讨论，会向我提出建议，说：“我们认为最好要这样做。”于是我再根据他们的提议作出决定。⁴⁵

但是，在张经武于4月19日会见达赖喇嘛以及噶厦拜访张经武之后，西藏方面仍然没有立即付诸行动。直到一周之后，在4月25日的下午，噶伦们到张经武的办公室去讨论撤销两位司曹职务的相关问题。他们通知张经武达赖喇嘛愿意在以下几项前提下撤销两位司曹的职务：（1）不处罚司曹；（2）司曹仍然由西藏政府支付薪俸；（3）保留他们在仪式上的坐席。在西藏人看来，这等同于他们辞职或者退休。这一次，张经武根据毛泽东先前的指示表示同意。⁴⁶于是在4月27日，达赖喇嘛发布命令解除了鲁康娃和洛桑扎西的司曹职务。

据鲁康娃的儿媳说，虽然鲁康娃不再担任司曹，但是他的礼遇和座次仍然得以保留。

自从卸下了工作，他只待在家里诵经念佛，从不去别的地方。像郊游踏青这样的事，他从来都不参加，只待在家里。但每当重要仪式的时候他都会参加，而且会穿上他的品级所对应的官服。在卸下他的工作之后，他继续领着薪俸，因为在西藏政府看来，他不应该受到任何惩罚。⁴⁷

在司曹离开之后，噶厦和中国人现在要处理人民会议的领导者了。在措曲法会结束前三天，即藏历二月二十七日（4月底），一个联合调查委员会成立了。⁴⁸这个调查委员会西藏方面为首的是桑颇札萨和哲通堪穷（Trendong）。在他们下面是两名秘书，一个僧官一个俗官，分别是崔科（色）

45. 达赖喇嘛，访问记，1995。

46. 吉柚权，1993a: 416。

47. 鲁康娃夫人，访问记，1993，达兰萨拉。

48. 合尊·拉让强佐，访问记，1992，达兰萨拉；辛萨·洛桑格勒，访问记，1993，多伦多。

(Tsögo Sey) 和辛萨·洛桑格勒 (Shingsar)。中国方面的主要官员是林来 (为 Lin Lai 音译——译注)。辛萨回忆了调查的过程：

这个调查是在祖拉康的东边、孜康的楼上进行的。我们碰面讨论哪些人应当被传唤的时候，中国人拿出了一份名单。于是我们便照着名单传唤，……非常容易。在拉萨，只要政府派人去叫人们到某某地方来，人们就会来。第一个来的是加央达娃。

他是个沉着的人，给出的答复是令人满意的。我们不是按照我们西藏的方式审问的。中国人已经列出了一些问题，如：谁最先介绍你（加入人民会议）？你去那里的时候都有谁在？你盖章了吗？谁写的请愿书？谁在请愿书上盖章等等。加央达娃的答复很恰当。他说没有人告诉他要加入，他们全都是自愿加入的。他还说我们的国家遭受饥荒，每一个人都面临着困难，所以“我自愿加入……”。有这样的说法，说某些‘人民’在聚会，所以我就去寻找这样的聚会并且找到了。”

中国人在某种程度上接受了他的回答，在第一个回合的审问结束时，林来给了加央达娃一些忠告，说这种活动是非法的，也是没有先例的。但是，他说这些话的时候很平和。于是西藏方面马上意识到不会出现很难对付的情况，中国人并不准备要求严厉的处罚，因为如果是严厉的处罚，一定会引起西藏人强烈的抵制。

加央达娃之后，其他的成员一个一个地被带来接受调查。但是这个调查并没有严格按照西藏的审判模式进行，因为接受调查的人可以站在调查室门外，这样他们就可以听到前一个接受调查的人被问的问题以及他的回答。一般情况下，西藏的调查手段是仔细对比〔经由隔离审查得出的不同人的〕不同口供。但是这一次，每一个人都仿效加央达娃给出口供，所有的口供都很相似。

……比如〔他们〕会说：“在中国人来了之后，日用品变得匮乏，人民受了不少苦……。在我们的国家里，我们必须表达我们的关切，以免最后被饿死。即使是在《十七条协议》中，似乎也说人民要有表达意见的地方，所以我就是在表达我的意见。”⁴⁹

经过几天的调查和讨论之后，噶厦和西藏工委于 1952 年 5 月 1 日会面宣布判决。所有“被告”都到场，同时在场的还有中国的高级官员和

49. 辛萨·洛桑格勒，访问记，1993。

噶伦。噶厦告诉被告他们的组织不符合所有现有的风俗和传统，因此将被取缔。噶厦命令人民会议的领导者每人提交一份书面保证书，保证他们将来不会再参加这样的活动。在提交这份保证书之后，这些领导者就会被释放。这些人全都交了保证书，所以事情就这样结束了。不管是西藏政府还是中国人，他们都不打算施加严厉的处罚，因为这样会进一步激起不满的情绪。所以，简单地取缔“人民会议”并让被告提交不再组织类似活动的保证书就已经足够了。⁵⁰

同一天，噶厦派人给西藏所有的宗谿送去一份取缔人民会议的布告。

给各宗关于取缔伪人民会议的命令

中国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特别委派的代表于去年在北京签订了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并作为今后藏汉双方共同遵循的施政方针而公布于全世界，向世界宣告双方将会遵守这一协议。嗣后，中国的代表张经武经由印度〔来藏〕，解放军官兵及其他文武官员由陆路相继到达拉萨，他们会见达赖喇嘛，赠送了中国政府的礼物等等，并同西藏人民建立了良好的关系。这是全藏人民人所共知的，受到全藏人民的赞颂。

解放军从普通战士到文武官员，个个遵守《十七条协议》。因此，不论是穷人阶级还是资产阶级，不管高低贵贱，都丝毫未曾发现解放军有任何违反协议的行为。尽管协议中所有的条款都是必须执行的，但是中央政府按照避免使用强力、防止急躁的方针，从西藏的实际情况和西藏人民的心声出发来执行。

然而，在拉萨有少数心怀不轨的人，煽动了一批破产商人、还不起钱的穷人、不劳而食的懒汉以及不交赋税、为非作歹的社会渣滓。总之，他们把所有这样的人聚到一起，告诉他们为了佛教和〔西藏〕政教制度，为了人民的福祉〔他们必须要努力〕。在这样的面具掩饰下，他们表面上要草拟所谓的“六条请愿书”，而背地里发誓立约，准备在适当时机采取或文或武的行动。他们还到拉萨邻近地区的各个乡村去〔招募成员〕以扩大其规模。通过造谣中伤，他们建立了破坏中藏之间和谐关系的基础。

正因为这样，拉萨老实守法的人非常担心，以致于卧不安席、食不甘味，加之市场上食物价格突然上涨，贵族和臣民们很不开

50. 辛萨·洛桑格勒，访问记，1993。

心。二位司曹不能执行达赖喇嘛的旨意，未能迅速解散正在进行非法活动的人民会议，阻止其非法活动，维护好拉萨治安。尤其是他们一贯抵制协议，严重危害中国人和西藏人之间的友好关系。因为这个原因，达赖喇嘛别无选择，只有撤销他们的职务。

人民会议的骨干分子接受了调查。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样的非法组织，所以他们应当受到严惩。但是如果将来没有再出现这样的劣迹，我们将把这当作一时之失。这个组织中那些愚陋无知而被跟外国帝国主义分子混在一起的人所蒙蔽的人，只会受到很轻的处罚。对于人民会议的那些代表，中央政府和西藏政府将共同对其进行教育，指出其错误。命令其焚毁“立约”，保证将不再重犯。

我们已经给拉萨和“雪”地的人民送去由噶厦颁布的法令（藏语：*Gadam dzadzi*）。而在此之前，达赖喇嘛本人也给拉萨和“雪”地颁布了一项法令（藏语：*Bugdam dzadzi rimpoche*）。⁵¹ 在达赖喇嘛仁慈的庇佑下，可以预料今后这样的坏组织不会再出现；但很难排除这个组织中的坏人又以保护宗教为借口，流窜到各乡村造谣生事。达赖喇嘛犹如爱护自己的两个眼珠一样，为西藏的佛教和民众的福利劳心劳力，他也一直在思考和明确阐述《十七条协议》的各项条款。他正打算缓慢地实施这些条款。所以全体僧俗民众一致相信，在达赖喇嘛仁慈的庇佑下，各项政教事务将会有条不紊，全体僧侣民众都在享受这个福果，这一点是不需要赘述的。

但是少数人对内外政策一无所知，甚至始终连自己的生活都不能自理，岂能奢谈什么“参与国家和政府的大事”。全体人民能看清楚这种人的行为将是利大于弊的，应该不会步他们的后尘，睁着双眼投堕悬崖。但是，如果有人再敢加入像这样的非法组织，将根据国家法律严惩不怠。

你们〔各宗的长官〕应当向民众传达有力的命令和指示，使他们在对错和利弊问题上作出正确的抉择。同时，要用各种手段在这些人内部和外部随时随地对他们进行秘密监视。

今后，如果在所属地区出现任何有违政教福祉、有可能引起这种非法集会复燃的不负责任的行动，那里的人民也包括你们这些宗谿的长官和领主将会受到严厉的处罚。

51. *Gadam dzadzi* 是噶厦盖在布告上的印章的名字。*Bugdam dzadzi rimpoche* 是达赖喇嘛盖在布告上的印章的名字。

这一决定绝不停留在口头上，而是将严厉执行。所有人都要牢记，不要违反这项法令。此文件各宗政府登记存档。

水龙年（1952年）月日。⁵²

于是这样一个原本很艰难的过程就如同走过场一样敷衍过去了，甚至没有一个参加示威的人或者其领袖受到哪怕是轻微的肉体责罚。但是，包括请愿活动在内的整个事件影响非常重大。一方面，这一事件加深了针对中国人的愤怒和敌对情绪，并且迫使中国人在七个月的时间里处于守势；另一方面，这一事件使中国人暂停推动军队和军政委员会相关的改革。

这一事件也表明毛泽东本人已经直接掌控西藏事务，并体现了他对实用主义和渐进主义的西藏政策的热衷。毛泽东强烈认为，在西藏人没有取得共识之前不能实行重大的改革。因此，随着这些事情的发展，毛泽东逐渐认识到他在拉萨的官员在如何推进改革的问题上没能作出正确的判断。于是他进行了干预，命令与西藏相关的所有决定都必须先向他和中央请示。他还直接指示他在拉萨的官员在司曹“辞职”的问题上作出妥协，不惩罚或者监禁人民会议任何一名领导者，当然暂时也不再讨论军事改革的问题。中国人在毛泽东的指导下小心并且克制地处理了这起事件，设法结束了混乱但又不至于激起西藏人比以前更为强烈的情绪。

人民会议的解散和司曹的辞职是有效的行动，拉萨很快恢复了平静。在1955-56年的时候，人民会议在新的领导层领导下又出现了，但是这已是后话。实际上从此时开始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人民会议的成员都暂时没有试图继续和中国人作对。他们已经成功地把他们的请愿书交到中国人的手中，所以这些领导者似乎已经很满意了。

在西藏方面，司曹的辞职使政府的控制权回到噶厦的手中，同时也消除了西藏最高领导层内部的不团结因素。从此以后，噶厦更为温和更为现实的观点将会为中藏的互动设定出坦诚合作的基调，使《十七条协议》的实施得以缓慢地向前推进。当然，这之所以变得相对容易是因为请愿和示威活动使毛泽东搁置了有关军队和军政委员会的争议性问题。这一点是西藏方面所不知道的。

52. 译自《西藏文史资料选辑》藏文版，1986b: 285-89（划线部分为强调）。

然而，这次事件也使范明更加坚持要对西藏政府和达赖喇嘛采取更强硬和对抗的态度。不久之后，他将会不顾毛泽东的适度策略，提议改变中共的西藏政策。

但是不管怎么说，流血冲突的危险到1952年5月确实是消除了，西藏又恢复了平静。西藏又得到一个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部重新定位的机会。

■ 达赖喇嘛、美国和达赖喇嘛的哥哥

随着这些事件在拉萨逐渐发生，美国和西藏的关系翻开了另一页，并且再一次造成一种疑惑，即那些和达赖喇嘛关系最密切的人，尤其是达赖喇嘛的哥哥，是否在达赖喇嘛不知情或者没有允许的情况下用达赖喇嘛的名义跟美国人打交道？

在1952年2月，当时正住在美国的当采仁波切告诉美国国务院他刚刚收到一封达赖喇嘛给美国政府的信。这大概是对美国在1951年年末通过各种渠道送给达赖喇嘛恳求其出逃的信件的回信。根据国务院的说法，当采提供的信件上没有日期也没有署名。我没有得到这封信的副本，但是国务院1952年2月12日的备忘录中引用了它的部分内容。这份备忘录中的这部分内容在开头注明“最近一封由达赖喇嘛送给当采的秘密信件的有关情况”的字样。⁵³

大概是为了解释达赖喇嘛为什么不选择出逃，这封信对拉萨的情况作出较为正面的描述。上面说：“中国人没有公开表示希望急速地改变西藏的状况，也没有表现出要伤害西藏人的样子。既然中国人非常小心翼翼没有犯错，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最恰当的做法是用相同的方式对待他们。”⁵⁴

但是这封信的用词也很谨慎，以维持美国对西藏的兴趣。它说西藏在美国“官方的朋友”不应当为此感到焦虑，因为西藏的政策没有改变，将来也不会改变——这所谓的政策大概就是指反共。据说这封信还指示当采

53. 美国国务院，1985: 9，安德森（中国事务部）和当采在1952年2月13日谈话的备忘录（611.93 B/2-1352）的注释对这封信进行了讨论。

54. 美国国务院，1985: 9。

继续同美国人保持联系，不要让美国和西藏之间出现误解和不信任。⁵⁵ 言外之意是中国人“行为的正确性”可能会发生改变，西藏将来可能会再次需要它的朋友——美国。

美国一直在接收着较为负面的情报，所以这些对中国人的正面评价在一定程度上让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约翰·埃里森（John Allison）大吃一惊。但是他还是用同情的语气对当采说：

美国完全理解达赖喇嘛自身所面临的困境。对于达赖喇嘛在面对强大的压力时作出的临时性调整的决定，美国并不焦虑。而且，美国希望再一次向达赖喇嘛保证美国的同情会继续。他说美国没有改变他的前任鲁斯科先生（Rusk）所声明的态度。埃里森先生强调处理当前的困难需要勇气和耐心，并指出美国对西藏人民失去他们传统的宗教和政治自由表示真诚的同情。埃里森先生请当采把这个态度转达给他的弟弟达赖喇嘛。……〔埃里森先生〕向当采保证美国的友谊和同情将会继续下去。他用日本的柔道高手来比喻西藏，借以表达他的希望，说西藏将会像日本的柔道高手那样，倒向共产党是为了再一次站起来并且赢得最终的胜利。⁵⁶

在这次会谈的结尾，埃里森询问当采美国怎样做才能帮到西藏。对此，当采回答说美国应当继续通过他和达赖喇嘛保持联系，而不应当“在此刻通过公开的声明引起对西藏不适当的关注”。当采还向埃里森保证西藏人民一直维持着在以后采取行动的希望，而来自美国的持续的友谊对这种希望的延续是至关重要的。⁵⁷

虽然我们不知道整封信到底是怎么写的，但是从这些摘录的少量片段可以看出，这封信本身是合情合理的。但是整件事情却有另一个不太合理的方面，即信的真实来源。达赖喇嘛断然否认给当采发过这封2月份的信件。⁵⁸ 诚然，他有可能会记错，或者他可能担心承认这一点会对他现在和中国的政治谈判有影响。但是，如果达赖喇嘛没有说错，那么很明显在达

55. 美国国务院，1985: 9。

56. 美国国务院，1985: 9，安德森（中国事务部）和当采在1952年2月13日谈话的备忘录（611.93 B/2-1352）的注释。

57. 美国国务院，1985: 9。

58. 达赖喇嘛，访问记，1995。

赖喇嘛和西藏政府之外，某人（或者某几个人）在利用达赖喇嘛的名义寻求和美国的关系。在这一章稍后的部分我们将会看到，这并不是一起孤立的事件。

正是在这封信到达的同时，发生了另一件和当采相关的奇怪事情。当采有一段时间一直在和中央情报局密切合作，目的是让美国政府为西藏举办一场大型的公关活动，其中包括由总统或者国务卿发表一项声明。但是现在当采突然改变了主意，要美国取消这项活动。下面摘自国务院内部备忘录的一个片段记录了他一夜之间令人困惑的转变：

出现这个有些令人难堪的局面的原因是，当采的态度在2月11日下午到2月12日下午这一天里发生了逆转。

此前，他和中央情报局强烈要求从两个方面向西藏人作出宣示：1. 由埃里森签发的给当采的秘密声明；2. 由国务卿或者总统签发的公开声明。因为中国事务办公室很久以前就已表示这两方面的宣示是有必要的，所以在是否应当满足这个既有要求的问题上我们没有遇到什么反对。但是当采突然改变主意让埃里森本人的观点得到加强，而康纳斯（Connors）在了解到这一点之后也改变了他先前的主张。对于当采，他对埃里森的秘密声明是感到高兴的，但是他也越来越担心一个公开的声明可能会危及他即将返回拉萨的母亲的安全。在我看来，这不会引起很大的不同。⁵⁹

归根结底，很明显直到目前为止，当采在美国的主要努力是为西藏寻求美国的支持以反抗中国。考虑到这一点，当采的这个突然决定很令人困惑。在最终获得美国政府最高层官员的支持之后，当采却突然予以回绝，这是很难捉摸的。当采给出的理由是担心这样的活动会增加他母亲受到伤害的风险，但是这个理由是站不住脚的。首先，如果这些活动对西藏很重要，那么他的母亲可以推迟几个月返回。如果是真的担心这些活动会影响他的家人的话，难道对他在拉萨的弟弟洛桑三旦和达赖喇嘛就没有影响了吗？为什么说美国的公关活动给他母亲造成的风险要比给他的弟弟们造成的大呢？此外，达赖喇嘛的母亲和她的其他孩子从1951年开始就一直住

59. 美国国家档案馆，F810001-1885，缺标题和日期（大概是1952年2月）（划线部分为强调）。

在噶伦堡或者大吉岭而没有去过美国，所以没有理由把美国发生的事情和他们联系在一起。而且考虑到中国人一直在催促她返回拉萨，所以很显然她的到来会让她们喜出望外，而不会考虑美国所说和所做的一切。因此，即使当采亲自接受采访和发表演说，这样一场公关活动会给他的母亲造成什么样的危险也根本是没谱的事。但是，其他一些人或者一些事情却可能会因此而承担一些风险。

达赖喇嘛的母亲在2月中旬动身返回拉萨，同行的还有她的其他孩子，包括24岁的儿子嘉乐顿珠。⁶⁰ 嘉乐在过去的五个月一直住在美国，他原本打算去上大学，但是却突然改变了主意，于1952年2月初迅速离开美国，同他的母亲一起返回西藏。这个转变很突兀，因为美国政府刚刚在他明确的要求下为他安排了去斯坦福大学上学。⁶¹ 他已决定涉足西藏政治，试图在这个敏感时刻影响西藏的历史进程，似乎这正是他行为的根源。若美国政府在他刚刚离开美国之际立即进行一场支持西藏的大型公关活动，很可能会对他在中国共产党心目中的可靠性和声望造成负面的影响，他们很容易就会认为他插手了这件事。所以，当采的反复或许还可以解释为嘉乐和当采觉得最好还是阻止美国的公关活动，以便为嘉乐赢得一个更好的时机影响西藏事务。⁶² 总之，不管当采行为反复的真正原因是什么，一个让美国政府为西藏进行一场大型政府公关活动的机会泡汤了。

嘉乐虽然很年轻，但是自认为比西藏政府那些较少接触世界的领导者更了解现今的情况，对于西藏应当如何应对中国人他有着更加鲜明的看法。从1940年代后期在南京上学开始，他就认为西藏需要进行政治和社会改革。例如，他坚信为了改善农民的生活水平进而赢得他们的忠诚，西藏必须立即结束封建制度。他担心如果西藏不主动拥抱改革，中国人会

60. 她的女儿次仁卓玛和最小的儿子阿里仁波切也一起返回了拉萨。

61. 美国国务院，1983: 1849，驻印度大使鲍尔斯给国务卿的电报注释，1951年11月15日。

62. 这整件事给美国政府留下不好的印象，这可以从当采的经历看出来。此后不久，他前往日本参加世界佛教友谊会（Buddhist World Fellowship）时，发现他的印度身份证明文件和自由亚洲委员会给予的主办者身份已经失效。让他大吃一惊的是，当他向美国政府申请入境时却被拒绝了，所以在此后的三年里他都困在了东京（康博伊和莫里森，2002: 19）。

通过亲自实行改革赢得农民的忠诚。⁶³ 嘉乐在拉萨见到双方的重要政治人物。他回忆了自己向司曹阐述当时的想法。

根据我自己在国外的经历，也根据中国的形势和共产党的思维方式，我告诉他们〔司曹〕，在达赖喇嘛、两位司曹和噶厦领导下的西藏政府必须在土地改革问题上采取主动。我们西藏的土地制度很古老，从来没有真正改变过。不仅仅是因为要改善西藏人的生活条件，也是因为我察觉到如果我们不采取主动，中国人就会用土地改革问题来干预我们的事务，这是很危险的。如果〔我们〕完成了土地改革和土地分配，中国人就不会有多少借口来干预我们的事务。我告诉两位司曹他们必须改革土地制度。他们说所说的非常重要，他们会给予适当考虑。⁶⁴

但是，这两位过分保守的司曹对改革没有什么兴趣，更不用说关系重大的土地改革。而且因为中国人正奉行渐进主义的政策，所以他们也没有感觉到改革的压力。在他们看来，民众已经通过人民会议的形式给予他们支持，所以他们并没有把嘉乐的建议当回事。他们一定认为西藏人民是不可能背叛宗教和达赖喇嘛而转向共产主义的，事实上他们的看法没错。毛泽东和司曹至少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是一致的。就这样，司曹对嘉乐的劝告置之不理。

嘉乐也见到了达赖喇嘛，并把宇妥上一年在加尔各答做的有关韩德逊大使给达赖喇嘛的信的笔记转交给达赖喇嘛。嘉乐说他试图说服达赖喇嘛按照美国的安排及提供的方案出逃进而流亡，但是仍然被拒绝了。在他当年早些时候从印度发出的一封信中，他向美国国务卿解释了西藏的情况。

我向至尊解释并同他讨论了您〔国务卿〕和我在美国时讨论过的重要问题，也告诉他应当再一次制定离开西藏到国外去的计划。我尽了最大的努力去劝说他。但是当下的形势最为险恶，而他也不能采取迅速大胆的措施，因为拉萨有大量共产党的军队。他是非常谨慎和警觉的人，如果这样一个计划稍有泄漏，那么他的生命安全将会面临很大的危险，人民也会遭受很大的痛苦。所以如果要想实现这

63. 拉姆次仁，访问记，1992，达兰萨拉；嘉乐顿珠，访问记，1992，达兰萨拉。

64. 嘉乐顿珠，访问记，1992。

个〔让达赖喇嘛离开西藏流亡的〕目标，我们就应当想出一个万全的办法，以确保彻底成功，不用承受任何损失。但是说到底，设计这样的行动是非常困难的。⁶⁵

嘉乐很快发现中国人并没有把他在司曹和人民会议问题上的建议当回事。因此，在拉萨待了一个月之后，由于中藏双方的领导人都没有对他的观点和设想给予足够的重视，嘉乐感到十分失望和伤心。在一次访问中，他解释了他对中国人和西藏政府的看法，尽管这些看法相当夸张：

我之所以在1952年从拉萨去印度，主要是因为我对中国人在拉萨的领导层的行为和政策很失望。张经武将军和张国华……简直骇人听闻。……我从美国返回的时候预期共产党政府可能会以较为妥当的方式对待西藏人。但是在我待在那里的几个月里我真的吃了一惊，非常失望。……中国军队像对待敌人一样对待西藏人……

除了达赖喇嘛或许还有（在摄政时期的）一两个摄政以外，所有的西藏政府官员都是不应该拿中国人的钱的。但是在1952年，达赖喇嘛之外的所有人都拿中国人给的钱，甚至连我的姐姐和姐夫也在内。西藏政府官员都在忙于数大洋，很多人一个月拿到一两百或者三百或者六百个大洋。所以说中国人从某种程度上讲就是在贿赂。情况很糟糕，我从没想过中国政府会做这样的事情，尤其是共产党的政府。他们的行为很卑劣。政府官员完全被钱、被中国的大洋收买了，完全投向敌人的怀抱，社会完全沉沦。于是，人民开始怒吼抱怨了。⁶⁶

另一方面，嘉乐在拉萨也没有受到很好的接待，很多西藏人怀疑他的动机和对西藏的忠诚。对于这一点，他长期的秘书兼助手拉姆次仁在书中写道：“因为嘉乐顿珠以前在中国上学，所以有些〔西藏〕政府官员深深地怀疑他。于是尽管他掌握着真理并且心中充满激情，但是却只有很少一些人支持他。而且不管嘉乐顿珠多么努力，也不管他取得什么成果，总有人说他比红色中国人更加红。”⁶⁷

65. 从拉姆次仁的著作（1992: 153-59）的藏语内容翻译过来。

66. 嘉乐顿珠，访问记，1995，香港。原版中英文访谈内容未加校准。

67. 拉姆次仁，1992: 122。

两方面都不受重视让 24 岁的嘉乐十分沮丧，于是他迅速决定秘密返回印度，试图在那里进行反抗中国人的活动，以便对西藏的局势施加影响。在同一次访问中他描述了他的想法。

我同我的另一个弟弟洛桑三旦商量的这件事。他是〔西藏〕政府的基巧堪布。我的母亲、洛桑三旦和我一起商量的这件事，我们认为我们和外面的世界保持某种形式的联系是非常必要的，这样外面的人就可以知道中国人正在做什么，西藏人遭受了什么样的痛苦。所以我去印度的主要目的是组织某种形式的西藏团体，并设法鼓动国际舆论。……我想或许我可以通过印度政府说服中国人放慢他们某些活动和行为的节奏。于是我私下制定了离开的计划，除了我的母亲和我的弟弟之外我没有告诉任何人……

我打心眼里认为待在西藏已经没有用了。我不能帮助西藏政府，不能帮助我的弟弟，也不能帮助西藏人民。即使我帮助他们，即使我实话实说，中国人还是不会听我的，他们会怀疑我。⁶⁸

在另一次访问中，他说：

1952 年我在拉萨的时候，我家里的某些人认为我应当秘密地到印度去，和印度政府建立某种形式的联系。……主要原因是西藏当时的局势非常严峻，因为大部分人都很反对中国占领军。你知道米茫〔人民的〕运动，那时西藏政府和西藏人民同外部的联系完全被切断了，完全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失去了同外部世界沟通的渠道，特别是没有人知道西藏正在发生的事情。于是我们意识到非常有必要让我们中的某个人到印度去建立和印度政府的联系，设法让印度政府对西藏有某种程度的了解，设法告诉印度政府和其他国家政府西藏正在发生的事情，中国人正在做的事情。所以我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去印度做这些事情。⁶⁹

嘉乐的母亲（也就是达赖喇嘛的母亲）也对此作了说明：

当嘉乐顿珠和我们一起〔在 1952 年〕返回拉萨的时候，他就已经认定西藏不再是一个安全的地方，因此打算再一次离开。除了我

68. 嘉乐顿珠，访问记，1995。原版中英文访谈内容未加校准。

69. 对嘉乐顿珠的电话访问，1994。

以外没有人知道这件事。他不同意共产党的某些观点，于是有些中国人有点儿生气地说他应当被再教育，这是一种间接的威胁。我的儿子告诉我有一天中国共产党可能会试图“说服”他去改造他的思想。他恳求我让他回印度去，我很不情愿地答应了。……在回来的三个月之后〔他出发前往印度〕。知道他离开的人只有我的儿子洛桑三旦和我，我们没有告诉至尊。洛桑三旦说至尊还太年轻，如果中国人问他知不知道他哥哥的下落，他可能会因为撒谎而脸红，从而露了馅。⁷⁰

和2月份给当采的那封信的情况一样，达赖喇嘛曾经说过他当时对嘉乐秘密离开西藏的计划一无所知。

一直到1956年之后，三旦才告诉我嘉乐顿珠同他商量说不能再留在拉萨了，说要以访问察隅〔在西藏南部〕为由到印度去。在讨论中他们提到不应当把这件事告诉达赖喇嘛，因为当中国人直接询问达赖喇嘛时，如果达赖喇嘛知道，就可能不能守住〔这个秘密〕。于是他们故意向我隐瞒了这个秘密。⁷¹

洛桑三旦在有些问题上会对我隐瞒。事后他会告诉我：“那时发生了什么什么事，但是我不敢告诉你。”⁷²

因此，考虑到达赖喇嘛在直接面对中国人的时候可能保守不住嘉乐出逃的秘密，所以他的家人有意识地不让他参与到决策中。很有意思的是，达赖喇嘛在2004年接受我的访问时告诉我说，他本性较为直接且不太精于算计也不太喜欢受约束，可能他的家人对他的这个性格特点很了解。⁷³但是实际上，担心中国人能从达赖喇嘛的表情中看出什么的说法很牵强，因为达赖喇嘛几乎连西藏官员都见不到，更不用说中国官员了。所以更令人奇怪的是为什么要对这件事如此保密。

嘉乐给人的印象是中国人不愿意让他离开西藏，但情况似乎并非如此。中国人并不限制西藏人来往印度的旅行，而且既然嘉乐的妻子正在大

70. 次仁，2000：135–36（划线部分为强调）。应当注意，对达赖喇嘛的母亲访问是在1979–80年进行的，当时还没有出现像现在这样的政治压力。

71. 达赖喇嘛，访问记，1995，达兰萨拉（原版中英文访谈内容未加校准）。

72. 达赖喇嘛，访问记，1994（原版中英文访谈内容未加校准）。

73. 达赖喇嘛，访问记，2004。

吉岭，那么他可以很容易地声称他的妻子病了，需要他返回印度去照顾。考虑到毛泽东的渐进主义政策，中国人是不会拒绝他的请求的。所以，为什么需要以保密的名义瞒着达赖喇嘛呢？

我认为真实的答案是，嘉乐顿珠和洛桑三旦正在谋划创建一个反抗中国人的秘密流亡组织，而且他们不想让西藏政府和达赖喇嘛知道这件事。这个组织成功的关键是嘉乐得到夏格巴的协助，夏格巴是在印度的最有名的反对中国人的政府官员。前面提到过，夏格巴在1951年坚决反对达赖喇嘛从亚东返回拉萨，而当达赖喇嘛返回之后夏格巴继续留在了噶伦堡。

但是嘉乐和夏格巴并不熟识，所以洛桑三旦给夏格巴写了一封信。这封信的内容包含很大的风险。在信中，洛桑三旦告诉夏格巴继续留在印度，帮助嘉乐秘密地同美国政府和印度政府建立联系。同时，洛桑三旦也要夏格巴和嘉乐就如何反抗中国人和如何处理西藏政府的黄金提出建议，例如，是否应当把这些黄金转移到美国的银行保管？因为嘉乐会随身携带这封信，所以秘密逃离的决定似乎是为了避免他在边界检查站被拦下接受例行的搜身，虽然说这种可能性非常小。嘉乐和洛桑正在进行一场危险的游戏，因为如果这封信落到中国人的手中，达赖喇嘛和传统政府将会被拖下水，而中国的温和政策也将会终结。这封亲笔信（原始藏文手稿见附录一）的译文如下：

尊贵的神灵的耳目，

我想告知您我的哥哥嘉乐顿珠有事要暂时离开〔西藏〕。他将会告诉您事情的详细情况，所以您古敖孜本（Kungo Tsipon）〔夏格巴〕最好能暂时留在〔印度〕。

此刻，我向三宝起誓，红色中国人正在用花招压迫西藏政府、达赖喇嘛和僧俗藏人。西藏政府暂时除了友好地和中国人周旋之外别无选择，而政府也确实在这么做。

西藏人民正在表现出对中国官员和士兵的强烈厌恶。将来，如果红色中国人像现在一样继续留在西藏，那么佛国西藏的佛教、达赖喇嘛和僧俗人民将会承受强烈的痛苦，度日如年。

因此，我认为您和我的哥哥嘉乐拉应当仔细谋划，并及时〔不要太迟〕把你们关于应当如何应对的看法秘密地通过电报（如果方便的话）告知我们。总之，你们在那里必须精诚合作，思考将来的路怎么走。

对于去年由西藏运过去的黄金和白银，⁷⁴ 到底应当如何处理，是让它们就这样放着，还是把它们运回西藏，或者如果印度有美国银行的话，是否应当把它们秘密地存到美国银行里。请就这个问题告诉我们你们的看法。

现阶段，你们必须秘密地同美国政府和印度政府建立友好的关系。⁷⁵ 你们应当想〔西藏〕政府之所想。我将会通过电报向你们提供更多的情报。

〔达赖喇嘛的〕私人随从代理基巧堪布（堪曹，*Khentsab*）洛〔洛桑三旦的简写〕发自拉萨。

吉祥之花常开。

〔藏历〕水龙年四月五日〔1952年6月中旬〕。⁷⁶

这封信并不是由噶厦发出的官方信函，但是因为持有这封信的人是达赖喇嘛的一个兄长，而发出这封信的是西藏最高级别官员之一基巧堪布，同时也是达赖喇嘛身边最亲近的兄长，并且信中属上洛桑的官衔，所以夏格巴应该会以为这封信是经过达赖喇嘛同意的。他绝不会把这封信看成是19岁的洛桑三旦的私人信件。倘若这封信落到中国人手中，中国人也不会这样认为，而且即使他们真的相信达赖喇嘛不知情，也会认为达赖喇嘛的家人正在印度密谋反对他们。当然范明可能会因此突然跳出来证明了他的观点，即设法争取达赖喇嘛和他的精英是徒劳的。

但是对于嘉乐顿珠和洛桑三旦来说，直接或间接地让人以为这已经得到达赖喇嘛的同意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假如缺少达赖喇嘛的同意，没有人会在如此重大的问题上把一个19岁和一个24岁的年轻人的观点当回事。嘉乐顿珠曾去印度驻拉萨代表处拜会其首脑以寻求在印度居留的许可，我们可以从这次会见的过程中清楚地看出这一点。以下是嘉乐告诉我的情况。

74. 这批金银一部分属于西藏政府的财产，另一部分属于达赖喇嘛的私人财富，暂时由锡金国王保管。中国人知道这些贵金属已经被运出西藏，也一直试图说服西藏政府把它们运回拉萨。

75. 藏语：*snga`phros a ri gzhung dang rgya gar gzhung so sor gsang ba`i thog nas nang don mthun lam chen po zhig nges par tu thugs zab thog*。

76. 这是从夏格巴的私人物品中的原始藏文信件翻译过来的（划线部分为强调）。

〔首先〕我通过印度驻拉萨的领事馆接触了印度政府，询问他们我能不能去印度并在那里居留，因为我不能继续留在西藏。……于是辛哈〔代表处的代表〕发了一封加密电报给尼赫鲁先生，几天之后收到复电说欢迎我前去。……之后我开始积极地做离开的打算，我同我的母亲和弟弟洛桑三旦讨论了这件事，此外没有告诉其他人。⁷⁷

但是在印度方面 1952 年 6 月的官方月度报告中，辛哈给出一个完全不同的描述。他告诉德里说，嘉乐声称达赖喇嘛已经同意他离开。

他〔嘉乐〕觉得选择逃离是明智的。他完全了解其中的风险，但是在达赖喇嘛积极的帮助和支持下他已经仔细地制定了计划。……当中国人得知他的逃离之后，达赖喇嘛会表现出很吃惊的样子，说他的哥哥嘉乐顿珠一直是一个不负责任的莽夫。⁷⁸

在印度政府同意这个请求之后，嘉乐告诉中国人他必须去查看他家六个庄园的经营情况，于是在没有引起怀疑的情况下到达印度。因为他家的两个庄园位于西藏南部靠近印度边界的边远地区，一旦到了那里，就很容易穿过边界到达印度的阿鲁纳恰尔邦。⁷⁹

当我就这件事询问达赖喇嘛时，他像回答前面的那些问题一样坚决否认他知道给夏格巴的信，说我读给他听时他才第一次知道这件事。我觉得他的说法是可信的，⁸⁰ 我倾向于认为这是事实。如果这是事实，那么是否就意味着这两个年轻人此时完全是在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呢？达赖喇嘛的一个哥哥带着一封由达赖喇嘛身边最亲近的哥哥署名（使用他完整的官方头衔）的信，而信的内容是要一位在印度的反对中国人的西藏高级官员和达赖喇嘛的哥哥一起开展反对中国人的活动。这件事情是非常危险的，很容易激怒解放军，使他们降罪于西藏政府和达赖喇嘛。他们是否真的敢自作主张这样做呢？

77. 嘉乐顿珠，访问记，1995。

78. 英国外交部档案，FO371/99659，印度驻拉萨代表处发给锡金政治专员的截止 1951 年 6 月 15 日的月度报告（划线部分为强调）。

79. 拉姆次仁，1992: 123；嘉乐顿珠，访问记，1995。

80. 达赖喇嘛，访问记，2004。

洛桑三旦比较贪玩、对政治问题也没有什么兴趣，因此他可能很容易被他的哥哥嘉乐影响，而我们已经看到嘉乐是强烈地热衷于涉足中藏政治的。年轻人身上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和身为达赖喇嘛家族成员的傲慢可能让他们以为，他们有权做任何在他们看来最有利于西藏的事。我就这一点询问了嘉乐顿珠。在得知我已经知道这封在此之前仍然是秘密的给夏格巴的信时，他表现得很吃惊，拒绝明确回答是否还有其他人牵涉其中。当我进一步追问时，他含糊地说希望我在记录历史的时候按照事情表面的情况来写，即只有洛桑三旦和他牵涉在里面。他说他将来写自己的书的时候会详细地解释所发生的事情。⁸¹

但是，假如有其他人牵涉其中，那些人会是谁呢？因为嘉乐并不信任噶厦，所以他自然不会同噶厦讨论这个计划。另外，司曹已经被免职，又因为他没有同达赖喇嘛讨论过这件事，所以其他的重要官员也被排除了。剩下的我们可以想到的群体就只有那些直接围绕着达赖喇嘛的官员和随从，他们有一个正式的名称叫森穷格塔果（*simjung gi thakor*，“那些达赖喇嘛卧室周围的人”）。在这些人中最有可能的人物是卓尼钦莫（副官长）帕拉或者达赖喇嘛的副经师赤江仁波切，或者两人都是。我不知道洛桑三旦和嘉乐是否真的同他们或者达赖喇嘛周围的其他任何人商量过这件事，但是无论如何，在1952年夏天的时候达赖喇嘛的哥哥确实正在策划一场独立于西藏政府和达赖喇嘛之外的针对中国人的反抗运动。

在1952年5月初，大概是在司曹—人民会议事件结束和嘉乐顿珠打算逃往印度的同时，达赖喇嘛的大哥当采在华盛顿再一次拜访了国务院和中央情报局，拿出一大堆让他们应接不暇、据他说是刚刚收到的最新的信件。和2月份的情报不同，这一次他描绘了一幅怪异的反中图景。他明确地告诉美国人不仅达赖喇嘛自己正在寻求秘密的反中抵抗策略，而且中国人的主要支持者班禅喇嘛也即将背叛共产党，秘密同达赖喇嘛联手反抗中国人。美国关于这次会面的备忘录如下：

这份报告收到的日期为5月13日，它以当采最近收到的信件为基础，表达了以下信息：

81. 对嘉乐顿珠的电话访问，2005年12月8日。需要指出，不管是嘉乐还是洛桑三旦都不善于撰写政府文书，所以他们在写这封信的时候一定得到其他人的帮助。

1. 当采确定达赖喇嘛正在制定长期计划，此计划依当采所述与当采离开西藏时的一样；也就是说达赖喇嘛只是表面上装作和中国共产党合作，实际上背地里正在静静地组织抵抗中国共产党的活动。
2. 最近，拉萨的西藏人在僧侣们的鼓励下已经秘密立下新的誓约，要效忠达赖喇嘛和三大寺。此外，他们同时收回了向当今的世俗内阁〔噶厦〕效忠的誓言，明确表示将持续地反抗中国人。
3. 班禅喇嘛已经秘密表示，尽管他表面上是共产党的傀儡，但是已经计划背叛共产党，和达赖喇嘛一起为组织抵抗运动这一共同事业而努力。⁸²

这份文件中没有提供当采的情报来源，但是第一点似乎源于当采自己的直接认识。当采印象中一直认为达赖喇嘛有一个台上和中国人维持友谊和合作，台下致力于组织抵抗中国人运动的策略。我们已经知道达赖喇嘛在那时较少涉足政治事务，另一方面他的家人也决定对他隐瞒诸如嘉乐返回印度这样的消息。考虑到这两点，说他真的在西藏组织秘密抵抗运动似乎不太可信。

美国明确意识到它没有办法独立地评估当采的新情报的准确性，但是却仍然信以为真，认为西藏在达赖喇嘛的领导下正在组织一场抵抗运动。

尽管很难评估现有情报的准确性，但是中国事务办公室（CA）却觉得当采的报告“大概是真的”，没有怀疑的理由。CA认为（1）中国共产党本身在西藏的行为给自己制造了非常多的麻烦；（2）西藏局势的发展在印度政府中起到我们希望看到的效果；（3）当采坚持认为美国此时公开表达对西藏的兴趣会给印度政府和西藏尚处于初级阶段的抵抗运动造成我们所不希望看到的效果，所以CA建议国务院继续回避就西藏问题发表公开的声明，并在此刻避免接触任何据说正在初步组织开展反抗共产党的抵抗运动的西藏人。⁸³

一个月之后的1952年6月24日，美国驻加尔各答总领事收到另一份据说是达赖喇嘛发过来的信息。但是这个信息是口信，是通过达赖喇嘛的

82. 美国国务院，1985: 51-52，中国事务部代理主任伯金斯（Perkins）给远东事务办公室助理主任埃里森（Allison）的备忘录，1952年5月14日（611.93B/5-1452）（划线部分为强调）。

83. 美国国务院，1985: 51-52。

姐夫达拉·平措扎西告诉给锡金的库库拉公主的（大概是在嘉乐顿珠仍然在拉萨的时候），库库拉随后告诉了驻加尔各答总领事。驻加尔各答总领事撰写的报告如下：

- (1) 达赖喇嘛非常感激美国政府对他本人和西藏人民的同情；
- (2) 他真诚地希望当从中国人手上真正地解放西藏的时机到来的时候，美国将会觉得可以并且适当地向西藏政府提供物质援助和道义支持。
- (3) 西藏人没有变，他们并不支持中国人，他们自始至终都是西藏人。
- (4) 他希望不久之后能够收到一份“书面”反馈。⁸⁴

这个信息又一次暗示达赖喇嘛正在秘密地致力于把中国人赶走。达赖喇嘛不再像2月份的信中那样谈论中国人的对和错，现在他在寻求美国人的帮助，以从中国人手上解放西藏。

然而，达赖喇嘛再一次强烈否认他曾经指示过平措扎西向美国传达上述几点信息。⁸⁵ 当我向平措扎西询问和这个信息相关的问题时，他小心翼翼地避免透露达赖喇嘛是否知情，但是他明确地说达赖喇嘛的卓尼钦莫（副官长）帕拉知道这件事。

问：我很想知道有关〔你传递给美国的〕答复的事情。达赖喇嘛有没有说“像这样说”？或者是不是他通过噶厦告诉你的？

这个答复并没有通过噶厦。

问：帕拉知道吗？

他大概知道。〔停顿〕他知道。如果通过噶厦，后果不堪设想。

〔这暗示噶伦们并不可信。〕⁸⁶

84. 美国国家档案馆，1952年7月2日收到的加尔各答发来的5号急件的1号附件（划线部分为强调）。

85. 达赖喇嘛，访问记，2004。

86. 达拉·平措扎西，访问记，1997，伦敦（藏语：问：*yid bzhin nor bu rang gis "o`o`di`dra gsung rogs gngang" ser`di`dra bzo`dra cig red yang min na bka`shag brgyud nas skad cha bshad pa red`?`答：bka`shag brgyud nas rtsa ba nas yog ma red. 问：dper na, pha lha mkhyen gyi yod red pas`?`答：pha lha shes kyi yod kyi red / pha lha shes kyi red / bka`shag de tshos byas pa`i sgang la gnas tshul ga`dra yin min shes kyi ma red`）。*

这个信息的来源是否是洛桑三旦或者卓尼钦莫（副官长）帕拉，抑或是他们两人共谋？这一点我不知道。但是达赖喇嘛的家人，也可能包括其他接近达赖喇嘛的人，很明显是在利用达赖喇嘛的名义设法保持美国对西藏人的事业的兴趣，同时还在境外组织反抗中国人。而且他们正在做的事似乎是独立于达赖喇嘛的，当然肯定是独立于噶厦的。以后的章节将会对此作出更多的阐述。

.

司曹对待中国人的方式是欠缺考虑的。如果他们的目的仅仅是发泄他们对中国人侵略和占领西藏的愤怒，他们当然成功了。但是如果他们有些许想引导中国人把他们绝大部分的军队和官员送回去，他们的行为却起到了反作用。从反对和抵制中国人的角度来说，司曹的爆发让很多西藏人很高兴，但是这些行为却没能迫使中国人对协议的重要方面再进行协商。实际上，要不是毛泽东决心坚持他的渐进主义政策，司曹的行为也许已经造成范明那样的干部迅速而成功地摧毁旧制度。

达赖喇嘛已故的姐夫达拉·平措扎西敏锐地分析了司曹短暂的统治时期：“两位司曹人很好，很诚实也很坦率。在〔西藏〕政府和人民看来，他们俩是英雄（藏语：巴乌，*pawo*）。我个人的观点是他们的勇敢是毋庸置疑的，但这种勇敢并不适合现实的情况。他们我行我素地做着一些不应当做的事。”⁸⁷

司曹—人民会议事件暴露出西藏政府内部缺乏凝聚力。最重要的两个机构司曹和噶厦遵循着不同的战略战术，而至高无上的统治者达赖喇嘛却表现得非常消极，听任局势变化而不施加号令。所以尽管司曹选择向中国人展现出愤怒和对抗的一面，噶厦却试图向他们展示出友好和合作的一面。没有人尝试建立一种一致的政府策略，任何决定都是针对所发生的事情临时作出的。而且在噶厦内部，尽管阿沛和夏苏更为进步，也试图遵守协议向中国方面提供更多帮助，但是其他的噶伦却不大热衷改革。于是，当出现类似人民会议那样的严重事件时，存在的分歧令政府瘫痪，直到达赖喇嘛被迫给予关注和干预。

87. 达拉·平措扎西，访问记，1992，伦敦。

然而，人民会议的活动确实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尽管中国人不愿意返回到清朝时的模式，但是人民会议的请愿还是使中国人在一些西藏人反对的问题上作出妥协。这些问题包括藏军并入解放军以及设立军政委员会的问题。

司曹和人民会议的这段时期也表明，拉萨的中国官员在有效执行毛泽东的渐进主义政策时遇到很大的困难。正如我们看到的，毛泽东和中央最终在 1952 年 4 月从西南局手上接过直接监督的权力，此后直接管理西藏事务。从那时开始，在拉萨的西藏工委被要求在作任何影响西藏社会文化的决定之前都必须得到中央（毛泽东）的批准。西藏改革的控制权现在直接掌握在北京的手中，这种情况一直维持到现在。

第十四章

班禅喇嘛的回归

在达赖喇嘛返回拉萨之后，中国人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确保班禅喇嘛返回西藏恢复其地位及职权。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他们坚持在《十七条协议》中列入这一条。但是尽管如此，毛泽东和中央还是决定把西藏作为以达赖喇嘛为首的统一体来对待。为此，毛泽东拒绝了班禅喇嘛和范明所鼓吹的前后藏分治的模式，小心翼翼地避免让班禅—达赖之争在不知不觉中干扰他旨在争取达赖喇嘛的渐进主义策略。因此，毛泽东从一开始就把促进班禅喇嘛和达赖喇嘛之间的团结看作是中国的利益所在。

具体的表现之一是毛泽东决定班禅喇嘛应当在达赖喇嘛回到拉萨之后再返回西藏，这样的话达赖喇嘛就能为班禅准备一个正式的欢迎仪式。毛泽东认为，这样可以避免达赖喇嘛方面的人误以为中国人正试图用班禅喇嘛取代达赖喇嘛，同时也会给所有的西藏人发出一个明确的信号，即达赖喇嘛欢迎班禅喇嘛返回西藏。¹ 因此，班禅喇嘛直到1951年12月中旬才离开青海省，而这已是达赖喇嘛回到拉萨四个月之后了。

实际上，班禅喇嘛和达赖喇嘛的直接联系最早发生在《十七条协议》刚刚签订的1951年5月30日。当时，班禅喇嘛给达赖喇嘛发去如下贺电：

在您亲政之日，……派遣了自己的代表来同中央人民政府谈判，并达成了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这是西藏僧俗人民的伟大胜利，班禅愿竭绵薄，精诚团结，在中央人民政府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协助您和西藏地方政府，彻底实行协议，为和平解放西藏而奋斗。特电致贺，并衷心地表示我们对您的敬意。²

1. 范明，1987: 45。

2. 引自牙含章，1994: 349–50。降边嘉措（1989: 32）也引用了这段话。

几周之后，达赖喇嘛复电班禅喇嘛，明确表示对班禅喇嘛的身份的认可，并欢迎他返回西藏。

5月30日来电接悉。甚慰。……至于此间我卜卦所得良好征兆，您确系前辈班禅化身。我已经将此告知扎什伦布寺讷，并已去电知照北京西藏代表阿沛噶伦矣。现在希望您即速启程回寺，所经道路决定后希先来电为荷。³

藏历九月五日（1951年11月初），达赖喇嘛通过电报告知班禅喇嘛，他已派两名政府官员和三大寺的代表一起到青海去拜见他，迎接他返回西藏。⁴另外，他命令一支由一百名藏军官兵组成的武装护卫队到那曲去迎接班禅，并命令各地在班禅返藏途中向班禅喇嘛提供人役和畜役。

班禅喇嘛立即回电表示他的感激，并通知达赖喇嘛他将于藏历十月十七日（12月19日）出发返藏。⁵班禅喇嘛在电报中说，

来电接悉。为了建设新西藏，您促我早日返藏，为我筹备一切，并令第五代本候命保护，这些盛情厚意，使我万分感谢。……并以至诚向您保证：这次返藏后，在毛主席、共产党与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进一步加强我藏族的团结，并与国内各兄弟民族人民亲密合作，为迅速彻底实现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建设一个繁荣幸福的新西藏而共同奋斗。⁶

12月18日，也就是班禅喇嘛一行出发前往西藏的前一天，习仲勋（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来给班禅喇嘛送行。习仲勋向班禅转达了毛主席和中央最诚挚的祝福，和习仲勋一起来的还有牙含章。在范明不在的情况下，牙含章将作为西北局的副“代表”陪同班禅返藏。⁷班禅喇嘛为习仲勋举行了一场盛大的欢迎会，并在会上发表讲话，表示对中共的高度依赖。

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与中国各兄弟民族的热诚帮助，西藏和平解放是根本不可能的，我们返回西藏亦是不可能

3. 引自牙含章，1994: 350。降边嘉措（1989: 32）也引用了这段话。

4. 这位僧官是梅朵嘉色（Metok Jangse），俗官是益西卡纳（Rimshi Kharna）。

5. 降边嘉措，1989: 32-33；牙含章，1994: 350。

6. 引自降边嘉措，1989: 32-33。

7. 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1990，1951年12月19日条目。

的。因此，我们说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是西藏人民的大救星，是我们的大恩人。我们只有跟着共产党和毛主席走，只有同祖国各民族紧密地团结起来，西藏民族才能得到彻底的解放，别的道路是没有的。⁸

习仲勋依照毛泽东的方针嘱咐班禅喇嘛：“你回西藏后不要急，要照顾全局，首先要搞好藏族内部的团结，这样西藏各方面的工作才有希望。”习仲勋特别强调“西藏一切工作都要贯彻慎重稳进的方针，条件不成熟的事不要办，上层爱国人士和领袖人物不同意的事不要办。西藏工作要以反帝爱国统一战线为主。”⁹

班禅喇嘛于1952年3月到达那曲，当时人民会议事件正处于高潮。张经武担心班禅到拉萨会进一步加剧动荡的局势，同时也考虑到班禅的人身安全，所以要他留在那曲直到事态平息。于是班禅喇嘛一行以休整为名在那曲逗留了一个多月。在那曲的时候，班禅喇嘛给达赖喇嘛发去一封电报，强烈批评人民会议的活动并向达赖喇嘛提出忠告，说要“以大智大勇之精神，大慈大悲之佛光，消除这些行为，妥善处理，而安民心”。¹⁰达赖喇嘛没有复电。

到4月中旬的时候，司曹和人民会议的危机已经消除，拉萨的生活恢复了平静。于是张经武发了一封电报告诉班禅喇嘛一行继续前进。班禅一行于1952年4月28日到达拉萨，在拉萨东郊受到盛大的欢迎。参加欢迎仪式的有以噶伦为首的众多政府官员和中国方面的所有主要官员。欢迎仪式后，班禅喇嘛前往历世班禅在拉萨时的驻锡地祖拉康。¹¹

■ 在拉萨停留期间

对西藏政府来说，班禅喇嘛在离开二十九年之后的回归是一件极为敏感的事件。不仅仅因为两位喇嘛身边的人之间存在着深深的仇恨，也因为

8. 引自降边嘉措，1989：33-34（划线部分为强调）。

9. 降边嘉措，1989：34。

10. 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1991：198。

11. 牙含章，1994：356-57。

班禅喇嘛的立场是支持中国人的，在政治上比较进步，支持彻底实施协议。还因为班禅喇嘛坚定地抱持着后藏不从属于西藏政府的西藏历史观，而班禅身边的人将会设法利用中国人获得对达赖喇嘛的优势。因此对达赖喇嘛和噶厦来说，以一种互信团结的正面基调开始新的关系显然是符合他们和西藏的利益的。达赖喇嘛回忆了他当时的想法：

当年轻的班禅喇嘛将要到来的时候，大家说应当让我们之间的关系重新开始。我们都是安多娃（青海人——译注），所以大家都说我们必须尽力好好相处，所有上了年纪的人都这么说，很多官员也这么说。很多人这么告诉我，就我自己而言，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班禅喇嘛第一次到拉萨的时候，他很单纯，人很好。我告诉他：“过去的已经过去了，现在是非常关键的时期，我们必须好好相处。”我们谈得很愉快……

〔首先，〕班禅喇嘛很年轻。其次，我们都是安多娃。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都希望好好相处。每一个人都希望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之间能好好相处。每一个人都对前世班禅喇嘛时期糟糕的关系感到遗憾。没人会希望这样。¹²

但是，开始一种新的正面关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仅有太多与税收、权力相关的纠纷需要解决，而且对两位喇嘛相对地位的不同理解也让协商变得很困难。很快，在这两位最大的喇嘛正式会见的安排问题上，这种困难就首次表现出来。他们两个人的会面将会为将来的关系定调，所以在整整几周的时间里，双方针对应当如何安排进行协商和争论。但是这些协商和争论都不欢而散，当然这并不奇怪。

范明认为西藏政府正试图利用仪式来贬低班禅喇嘛的地位及职权。他对与这次会见相关事件的描述虽然很明显带有对西藏政府的偏见，但是却体现了在拉萨的西北局官员们的看法：

班禅返回西藏，在拉萨与达赖会见的仪式问题上发生了争执，演变成严重的政治问题。具体有磕头的问题、座位高低的问题、班禅与达赖献礼品的问题。

12. 达赖喇嘛，访问记，1993，达兰萨拉。

实质上，争执的核心在于按照协议恢复和维护班禅的固有地位呢，还是损害和压低班禅的固有地位。达赖方面竭力找借口企图把班禅的地位和影响压低，提出在达、班会见时，要班禅向达赖磕头、班禅的座位比达赖低两格、班禅给达赖朝贡、不让班禅驻锡大昭寺等。

这些意见转达给班禅后，堪厅官员很生气。他们提出要是这样，干脆不进拉萨返回日喀则，双方坚持不下。

对此问题工委开会进行了讨论，也发生了不同意见的争论。一种意见〔张经武和张国华〕认为班禅在历史上是受噶厦领导的，为了争取达赖，班禅可以向达赖磕头；一种意见〔范明〕认为历史上达赖和班禅都是受中央政府直接领导的并列关系，而不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在宗教上则是一个是太阳，一个是月亮，两个互为师兄弟。他们之间，只有在达赖为班禅的师父，或者班禅为达赖的师父而成为师徒关系时，才行磕头的礼节。在互相没有师徒关系时，见面互相碰头，而不行磕头礼。¹³ 因此，达、班此次会见仍应按历史上的惯例办理，而不能偏废。

最后工委认为这个问题关系重大，我们不宜插手过问，可建议达、班双方派代表谈判。同时将工委对此问题的两种不同意见一并上报中央请示。

中央复电指示，同意噶厦与堪厅举行直接谈判，但工委必须注意掌握：一方面要说服班禅作些让步，另一方面维护班禅的固有地位，不能把班禅统一到达赖方面去。

工委根据中央指示精神说服了双方同意直接谈判。于是噶厦派出阿沛、柳霞为代表，堪厅派计晋美为代表，双方经过多次谈判还是争执不下，谈判没有结果。

工委又开会讨论，提出一个折衷的办法：论年龄，班禅比达赖小几岁，虽然不是师徒关系，但是达赖年龄大，从这一点出发，达赖与班禅初次见面时，班禅可以给达赖行磕头礼，然后两人再行碰头的平等礼；……座位问题，历史上达赖是班禅的师父时，座位可以高一个垫子，这次达赖与班禅见面应以两人平座为好；将向达赖朝贡改为达赖、班禅互赠礼物。

13. 碰头礼（藏语：*udu*）是地位差不多的喇嘛之间的礼节，可以用来代替一位喇嘛向另一位喇嘛磕头。

经过反复研究，初步作出了四条决定：班禅给达赖磕头，达赖站在宝座前；班禅与达赖互换哈达；班禅与达赖互相碰头；班禅与达赖的宝座一般高。

工委决定根据这四条原则，派国华同志做阿沛的工作，派我去做班禅及堪厅官员的工作。经过一整夜的工夫，班禅方面才勉强同意了，但提出要我们保证，不再变更。我向他们拍了胸膛，说了硬话，作了保证。回过来，我又找国华同志谈堪厅的意见，国华说阿沛也表示同意作出保证。¹⁴

但是，这个商量好的方案还是出现了很多变数。达赖喇嘛回忆了这些事件：

可能扎什伦布方面主张座位应当保持相同高度，而我方则说这不行。于是有人提出另一种方案，即达赖喇嘛应当站在他的宝座〔前的平台上〕。例如，当萨迦达钦（Sakya Dakchen）〔萨迦派的教主〕到拉萨来的时候，达赖喇嘛会站在宝座前，因为萨迦达钦的地位公认是非常高的。所以这时大家说……当班禅喇嘛来的时候，也许我应当站在我的宝座前。这一点我记得很清楚。

布达拉宫里东西两边分别有一间会议室。西边的那一间天花板比较低，所以如果我站在宝座前就需要弯腰。大家认为如果班禅喇嘛进来的时候我弯腰站着会不太好，所有大家觉得这个会见应该在东边的会议室里举行，因为东边房间的天花板很高。这我记得很清楚。

对于座位安排的问题，达赖喇嘛的宝座一般是设在一个高台（藏语：*ding ja*）上的。因为摆宝座的时候一般需要那样的高台，所以那个会议室里有这样的一个高台。在〔高台〕下面，班禅喇嘛的宝座设在摄政的宝座摆放的位置。所以上面是高台，下面靠右的位置是摆摄政宝座的地方，班禅喇嘛的宝座会摆在那里。

当班禅喇嘛进来的时候，我没有坐在我的宝座上，而是起身站在我的宝座前面。班禅喇嘛来了，事后有争论他到底磕没磕头，但是实际上他是磕了的。于是我站在我的宝座前面，而班禅喇嘛走过来向我磕了头。随后我们互相交换了哈达，各自入座。我记得的就这些。¹⁵

14. 范明，1987: 133-34。

15. 达赖喇嘛，访问记，1993。

但是范明回忆的版本非常不同。

4月28日下午，达赖与班禅在布达拉宫会晤。但当班禅给达赖磕头时，达赖不站起来；而且把达赖、班禅互换哈达变成班禅献达赖接；把班禅的座位不仅压得很低很小，而且摆在旁边。对此，班禅方面的人很气愤，纳旺金巴（Ngawang Jimpa）把他的棒都要举起来了，班禅警卫营去的卫士气得几乎要开枪。幸有刘旭初同志作了制止，才未酿成大祸。事后，班禅方面的人痛哭流涕，说是我们〔中国方面〕欺骗了他们。¹⁶

要弄清楚仪式中发生的所有事情是不可能的，但是有些方面是很清楚的。中国人给仪式的开头摄了像，并在后来的一部影片中选用了它的部分片段。这部影片显示班禅喇嘛正向一个高台走去。这个高台大约4英尺高，其上设有达赖喇嘛的宝座。班禅喇嘛走向高台的时候达赖喇嘛正站在这个高台的前部，所以当班禅喇嘛走到这个高台前时，达赖喇嘛显得比班禅高很多。于是，班禅在送象征性礼物（例如，曼扎）给达赖喇嘛和行碰头礼时不得不踮着脚探着身子，而达赖喇嘛为了和班禅行碰头礼也不得不深深地弯腰。这部分的互动很明显正如范明所言——班禅喇嘛只是把东西交给达赖喇嘛，而达赖喇嘛只是接受这些东西，并没有进行交换（见图20）。班禅喇嘛宝座所在的位置在影片中没有出现，也不清楚他有没有坐在上面，当然也不知道班禅喇嘛进入房间的时候，达赖喇嘛是先坐在宝座上然后才站起来，还是一直就站着。其他的材料显示班禅喇嘛在进入房间之后磕了头，但是这部影片仅仅包含班禅喇嘛走向达赖喇嘛的宝座的画面。所以很明显，原来的“方案”没有得到严格遵守，而且达赖喇嘛站在很高的台子上也使得班禅喇嘛看起来像地位低很多似的。所以班禅喇嘛方面的人非常生气是很容易理解的。

达赖喇嘛也记得在座位安排问题上存在着争议，但是他澄清了译仓的角色，说：“译仓和这事无关。卓尼钦莫（副官长）与基巧堪布和这事有关，是他们和阿沛等人共同商量的这件事。但是和班禅喇嘛的堪厅接洽的是阿沛，而不是卓尼钦莫（副官长）和基巧堪布。阿沛〔随后〕再同卓尼钦莫（副官长）和基巧堪布商量。我清楚地记得这件事是有波折的。”¹⁷ 所以

16. 范明，1987: 134-36。

17. 达赖喇嘛，访问记，1993。



图 19：1952 年班禅喇嘛第一次正式与达赖喇嘛会面。达赖喇嘛居上，从他的法座上弯腰俯视，班禅喇嘛居下，正抬头仰望。照片来源不详



图 20：1952 年 2 月达赖喇嘛（左）与班禅喇嘛（右）在拉萨会面。照片来源：陈宗烈

要么是卓尼钦莫（副官长）和基巧堪布欺骗了阿沛，要么是阿沛知道实情但是不想冒取消这次历史性会见的风险事先把实情告诉班禅喇嘛的人。但是不管事情的原因是什么，后果很明显，即班禅喇嘛的官员觉得他们被欺骗了，同时一个以正面基调开始新关系的机会也泡汤了。

■ 在拉萨的协商

班禅喇嘛在拉萨的时候，两位喇嘛的官员就前世班禅喇嘛时期有关土地税收等很多悬而未决的棘手问题展开了协商。从理论上说，《十七条协议》是协商的框架。但是实际上，协议的条款很模糊，并不容易操作。协议中说：

第五条、班禅·额尔德尼的固有地位及职权，应予维持。

第六条、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的固有地位及职权，系十三世达赖喇嘛与九世班禅·额尔德尼彼此和好相处时的地位及职权。

在拉萨首先讨论的问题是究竟应该把历史上哪个时间点作为两位喇嘛和好相处的基准时间。范明叙述了噶厦和班禅官员之间会谈的情况：

工委……要求双方应以互相尊重、互相让步为基础，查档案找根据，确定十三世达赖喇嘛和九世班禅和好的年限。经过双方调查研究，决定以公元1897年为和好的年限。¹⁸年限确定后，双方就根据档案找出那个时候班禅的地位及职权是什么，按当时的地位及职权予以恢复。¹⁹

根据1897年的定制，会谈解决了涉及人役税（藏语：乌拉，*ula*）、马役税（藏语：达乌，*tawu*）和诉讼罚金等悬而未决的问题。决定班禅喇嘛的人民不用再遵守西藏政府后来对1897年的税赋规章做出修改后的法令，因此他们不用再负担这些法令中规定的税赋。²⁰

但是对于重大的军用粮饷税问题，情况就不一样了。尽管这是十三世达赖喇嘛1913年从外国流亡回来之后新课的税赋，但是西藏政府坚持每个人都应当缴纳，宣称这是西藏抗击外国人的花费（具体是在1888年和1903—04年的藏英战争以及1912—13年与中国人的战争期间产生的），所以班禅喇嘛必须缴纳他的份额。²¹班禅方面直接拒绝了，给出的理由跟九

18. 即清朝光绪皇帝二十三年一月；藏历是火鸡年（1897年）一月十五日。那一年十三世达赖喇嘛21岁，九世班禅喇嘛14岁。

19. 范明，1987: 138—39。

20. 这些法令指的是火蛇年法令（1917年）和水猪年法令（1923年）。

21. 见戈尔斯坦1989: 110及后页。

世班禅喇嘛在1923年逃往中国之前给出的理由相同。会谈再次陷入僵局，这时中国方面介入了。西藏工委预见到达成协议的努力面临失败的危险，而这将会是巨大的挫败，所以他们说服中国中央政府出面承担这部分“军事”费用。²² 一个重大的障碍就这样跨过去了，虽然还有很多其他的问题存在，但是这些问题将会在以后的协商中慢慢解决。双方在1952年6月16日签订了一个初步的备忘录。

在这期间，十世班禅喇嘛于6月9日结束他在拉萨的逗留，出发前往日喀则。那里有他的主寺扎什伦布寺，他于6月23日到达那里。陪同的有牙含章、一个连的解放军和代表西藏政府的僧官噶伦然巴。在九世班禅喇嘛秘密逃往中国二十九年之后，十世班禅现在公开地回来了，受到成千上万西藏人的热烈欢迎。²³ 据牙含章所述，后藏首府日喀则的气氛和拉萨有着极大的不同。

〔班禅喇嘛〕于六月二十三日到达扎什伦布寺，在那里受到数万僧俗群众隆重而又热烈的欢迎。日喀则宗及其附近的人民组织了各种腰鼓队与歌舞队，唱着吉祥歌，跳着吉祥舞。在日喀则市区居民房顶上，在扎什伦布寺僧舍房顶上，插遍了五星红旗。在扎什伦布寺的僧舍内，都供了毛主席的照片，充分显示了僧俗群众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中国共产党、对毛主席的发自内心的热爱与感激的心情〔感谢他们为班禅的回归所做的工作〕。²⁴

.

总而言之，班禅喇嘛返回拉萨的过程是西藏政府的一次惨败。正如达赖喇嘛所说，这一结果是希望避免的。西藏政府又一次没能达成并执行统一的策略。虽然会见的安排是符合历史的，但是如果他们的目的是像达赖喇嘛所说的在正面的基调上开始和班禅喇嘛的新关系的话，那么这个安排在策略上就是短视的。建议和批准这个安排的人更关心的是象征性地宣示班禅喇嘛比达赖喇嘛低一等这一历史命题，而不是采取新的措施创造

22. 范明，1987: 138-39；牙含章，1994: 358。

23. 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1990，1952年6月23日条目；牙含章，1994: 358。

24. 牙含章，1994: 358（划线部分为强调）。

让两位喇嘛合作的友好氛围。拉萨的官员已经在对抗的基调上开始了同中国人的关系，现在他们又在和班禅喇嘛的高级官员之间复制这种关系，加剧了已经存在的敌意和仇恨，使班禅阵营成为拉萨政府永远的敌人。西藏两位最大的喇嘛之间将不再有机会建立共同的阵线来应对中国方面的进一步威胁。这是不到一年时间里西藏政府的第二个重大决策错误，也是年轻的达赖喇嘛又一次没能在制定战略决策时发挥积极的作用。

与班禅喇嘛到达拉萨相关的一系列事件也加剧了西藏工委内部的分裂。范明和他的西北局同事在这个问题上强烈地反对张国华和张经武，几个月之后他们将会提出一项策略，试图把西藏一分为二。当初把两个局的共产党官员合并为新的统一的西藏工委时就已经遇到的问题，现在变得更加严重了。

第三部分

合作与改革

第十五章

改革之风

现在西藏方面噶厦已经掌握了实权，而中国方面毛泽东也直接控制了政策的制定并决意采取温和的政策，于是一个友好合作的时代开始了，有关中国人要摧毁宗教和旧的社会制度的恐怖预言破灭了。除了剧烈的通胀之外，生活大体上还和解放军到来之前一样。中国人尊重西藏人的风俗制度，并尽力避免在群众中挑起阶级仇恨。而且至关重要的一点是，毛泽东命令西藏工委不要纠缠于建立军政委员会和藏军并入解放军这些争议性问题。所以，尽管很多西藏人仍然把解放军看成是一支占领军并且反对改革，但是西藏的未来比几个月前看起来要光明得多。对一部分精英来说，这是可以审慎乐观的，他们觉得自己的生活方式可以像这样继续下去，而不用出现大的变动。对精英阶层中那些一直想让西藏成为一个现代化国家的人来说，各种新的想法和活动不断涌现的情况让他们感觉异常幸福。对他们来说，中国人的到来提供了一个打破旧模式的机会。司曹已经离开了，双方现在正小心翼翼地前行，开始在西藏建立新的机构和组织。最初的几个尝试之一是在拉萨开办西藏第一所现代小学。

■ 色新学校

开办小学的计划是西藏人民会议和其他很多人反对的问题之一，也是毛泽东在批评西藏工委过于冒进改革时特别提到的问题。但是现在的气氛已经得到改善，所以西藏工委在噶厦的协助下迅速地实现了这项计划。1952年8月15日，这所学校开学了。¹

1. 赵慎应，1998: 76。

尽管这所学校的课程设置是由中国人控制的，但是它在形式上是西藏政府和西藏工委联合创办的实体。学校有二十八名校董，其中绝大部分人来自西藏的上层。张国华是这所学校的名义董事长。来自青海的藏族干部多杰才旦（Dorje Tsenden）参与了学校的筹备工作（并且也是学校的一位老师）。他回忆了他参与的情况：

我于1952年5月4日或5日回到拉萨〔之前在拉萨周边从事向农民发放免息贷款的工作〕见到了张国华。他告诉我他正在拉萨创办一所小学，问能不能把我借调去一年参与这项工作，因为他听说我曾经在〔青海〕师范学习过。我说：“如果你要创办一所藏语学校，我作为藏族感觉非常好，所以如果我的上级批准，我可以留下来。”于是我请示了国家民委，他们发了一封信给我说我可以留下来为这所学校工作一年半。所以在6月1日，我到色新开始了筹备工作……

在这所学校得到核准之后，我们敲定了几位校长人选。包括三位校长——第一校长是赤江仁波切，第二校长是噶伦绕噶厦，第三校长是拉乌达热，我是副校长之一。……我们从西藏政府的僧官部门里物色了七八名藏文老师，而在俗官中，我们找了玛恰和卡纳代本（Kharna）……

学校的主要课程是藏文书写，但是对于一些从印度回来的年轻人……我们开设了一门特殊的课程。其次最重要的课程是算术，然后是自然科学和地理。

三位藏族校长说，按照西藏风俗每天开始上课的时候应当念经，于是我们每天开始上课的时候都会念二十分钟《文殊颂》（*Gyamdro*）。

问：你们在学校里教共产主义相关的东西吗？

我们简要地介绍了毛泽东和朱德的思想。如果我们教太多政治的东西，这些孩子会学不懂的。

问：学校里教汉语吗？

不教，但是对于一些在吉堆巴（*Kyitöpa*）学校〔国民党在拉萨的学校〕上过学、会一点汉语的学生，我们有一门特殊的汉语课程。但是对于其他人则不教。……

问：开始的时候学校有多少个学生？

大约340人。其中大约有十个孤儿。我们给孤儿提供食宿、衣服等等所有东西。学校成立之后，我们派了两名汉族老师到每一个

学生的家里去调查他们〔经济等方面〕的情况。……我们以此为依据决定对每个人提供什么样的经济资助。有些学生每月领到七八个大洋，有些领到十二三个，还有些每月领到十八到二十个。

问：这三百多个学生中有多少人领到钱？

大概三分之一。（因为这个缘故，）那时候僧兵和藏军士兵常常称这个学校为“大洋学校”。²……

问：学校共有几个年级或班级？

有七个班级（年级）。第一个班专门学习字母表（藏语：嘎卡，*ka kha*）。……我们根据学生藏文水平的高低把他们安排到各个班去。

问：你们是怎么教藏文的？

我们像旧时一样用姜舍（*jangshing*，木制薄板）教。从四年级开始，我们也教藏文文法（藏语：松大，*sumtag*）。传统的藏文学校〔私塾〕不教这个。在七年级的时候也教诗歌（藏语：年阿，*nyengag*）。

问：那些最穷的孩子呢？你们能让他们来上学吗？

如果他们的父母把他们带来交给我们，我们会接收他们。但是我们不特别争取他们来上学。……那时有许多孩子从西藏私塾转学到这所中国人的学校来。

问：为什么？

那些西藏私塾不教文法和数学，而且他们经常打学生。于是很多学生都转学到中国人的学校里来了。在色新学校里也有音乐唱歌课。一开始我们就听说人们议论新的政府学校（色新）和私塾之间会出现激烈的竞争，一段时间之后，我们的学生数量增加了而私塾的学生数量减少了。你看看现在的高级官员就会发现，那些藏文和汉文都非常好的干部绝大部分都是从色新学校里出来的。³

色新学校是一个巨大的成功。该校的学生喜欢现代的东西，而学校本身则成了现代化在现实生活中的生动象征，是培养了解并同情社会主义理念的年轻人群的第一步。不久之后的1952年年底，面向青年和成年人的第二所学校成立了。这所学校被称为社会学校（藏语：*jitsa lapdra*），表明

2. 它也被贬称为“*doley lapdra*”，或者贪婪的学校。

3. 多杰才旦，访问记，1993，北京。

它设立的目的是为了教育社会大众，而不仅仅是小孩子。学校最初位于仲吉林卡，也就是现在的西藏大学所在地。所教的课程多种多样，包括初级汉语。和色新学校一样，它为一些西藏的年轻人打开了新的视野。

这些西藏年轻人当中有一位当时是西藏政府专门培养僧官的学校（藏语：则拉扎，*Tselabdra*）的学员。后来他去了北京，在那里继续学习，成为一位著名的藏语教授。以下是他对那个时期的回忆：

我是 1952 年最早进入社会学校的三个人之一。最初这个学校并不叫社会学校，每天只是在帐篷里上两个小时的课，地点挨着西藏干部学校。它里面有一位很好的汉文老师，教我们汉文。在人多了之后，学校开始改叫社会学校。……我们想世界现在正在改变，中国人就要掌权，社会将会出现变革，所以我觉得我们应当〔学习汉文并〕到中国去。……

问：是西藏政府的译仓派你们去这所学校的吗？

不是。到中国人的学校去上学被认为是很恐怖的想法。他们绝对不会让你去，我是自己去的，我去中国的时候也是秘密去的。那时我没有家，我的父母已经死了，我和亲戚住在一起。我参加了青年联谊会，通过青年联谊会秘密地去了中国。我从墨竹工卡（*Medrogonggar*）〔位于拉萨东北面的一个宗〕给我〔在拉萨的〕叔叔写了一封信说我已经去了中国。我的叔叔对我不好，如果我的父母在世、收入很好的话，我可能不会去。……

问：你是怎么知道这所学校的？

我有一个朋友叫洛卓拉（*Lodola*），他来自拉隆索吉（*Lhalung Surje*）家。他说：“有一个中国老师，他的藏语很不错，正在教汉文，我打算去。如果你想要学汉文，你也可以去。”于是我和他一起去了。没有人告诉我到那里去，中国人也不邀请人们去，我是自己悄悄去的。

问：那里发薪水吗？

我去的时候没有发，后来肯定是发了。我不想成为一名僧官，占据着高位，把人生交给旧政府。我觉得最好是参加“革命”，所以从一开始我就走上了这条路，我通过青年联谊会的参观行程去了中国。……〔在这次参观的结尾，〕他们说如果我想回去我可以走，如果我想〔在中国〕上学可以留下。⁴

4. 土登旺布，访问记，1992，拉萨。

它设立的目的是为了教育社会大众，而不仅仅是小孩子。学校最初位于仲吉林卡，也就是现在的西藏大学所在地。所教的课程多种多样，包括初级汉语。和色新学校一样，它为一些西藏的年轻人打开了新的视野。

这些西藏年轻人当中有一位当时是西藏政府专门培养僧官的学校（藏语：则拉扎，*Tselabdra*）的学员。后来他去了北京，在那里继续学习，成为一位著名的藏语教授。以下是他对那个时期的回忆：

我是1952年最早进入社会学校的三个人之一。最初这个学校并不叫社会学校，每天只是在帐篷里上两个小时的课，地点挨着西藏干部学校。它里面有一位很好的汉文老师，教我们汉文。在人多了之后，学校开始改叫社会学校。……我们想世界现在正在改变，中国人就要掌权，社会将会出现变革，所以我觉得我们应当〔学习汉文并〕到中国去。……

问：是西藏政府的译仓派你们去这所学校的吗？

不是。到中国人的学校去上学被认为是很恐怖的想法。他们绝对不会让你去，我是自己去的，我去中国的时候也是秘密去的。那时我没有家，我的父母已经死了，我和亲戚住在一起。我参加了青年联谊会，通过青年联谊会秘密地去了中国。我从墨竹工卡（*Medrogonggar*）〔位于拉萨东北面的一个宗〕给我〔在拉萨的〕叔叔写了一封信说我已经去了中国。我的叔叔对我不好，如果我的父母在世、收入很好的话，我可能不会去。……

问：你是怎么知道这所学校的？

我有一个朋友叫洛卓拉（*Lodola*），他来自拉隆索吉（*Lhalung Surje*）家。他说：“有一个中国老师，他的藏语很不错，正在教汉文，我打算去。如果你想要学汉文，你也可以去。”于是我和他一起去了。没有人告诉我到那里去，中国人也不邀请人们去，我是自己悄悄去的。

问：那里发薪水吗？

我去的时候没有发，后来肯定是发了。我不想成为一名僧官，占据着高位，把人生交给旧政府。我觉得最好是参加“革命”，所以从一开始我就走上了这条路，我通过青年联谊会的参观行程去了中国。……〔在这次参观的结尾，〕他们说如果我想回去我可以走，如果我想〔在中国〕上学可以留下。⁴

4. 土登旺布，访问记，1992，拉萨。

这两所学校的成功迅速促成了一所中学在拉萨成立。

所有这些学校的创办都需要噶厦同意，而噶厦也都同意了。究其原因是因为它们满足了传统政府未能满足的一种需求。它们不仅给精英也给社会中层甚至一些底层带来了新思想和新机会。

■ 青年和妇女组织

类似的一项以开拓精英和中层的视野、为共产党争取同情和支持为目标的举措是在拉萨建立两个“群众组织”：青年联谊会和妇女联谊会。⁵ 在中国，这两个组织的功能是培育爱国主义精神、寻求广大人群的支持和参与，在组织上直接或间接附属于共产党。但是在西藏，这两个组织主要是作为西藏人进行社交娱乐、体验新生活方式的场所，而不是一个传播社会主义思想的工具。青年联谊会把男女精英和中层青年聚到一起举行晚间联谊会，联谊会上有唱歌和跳舞（既有西式的狐步舞也有西藏舞蹈）等活动。这是他们第一次可以在这样的社交场合互动，他们很喜欢这样。

那时的贵族青年谢林·次旺朗杰的经历说明西藏精英面对这些变化时产生了复杂并且经常处于矛盾状态的情感。一方面，这种联谊会是新的东西，很让人兴奋也很有意思；另一方面，它们却是反传统的，是拥护中国人的，因此受到很多人的厌恶。

大概在 1951-52 年的时候，中国人建立了西藏青年联谊会。……我记得为首的主要是雪康·杰炯和一个叫马波杰（Ma Boje，此处为音译——译注）的回民。那时我大概 15 岁，我喜欢去那里只是因为他们教大家唱新歌，有时候大家也会跳舞。

我们对共产主义制度不感兴趣，因为我对它没有什么明确的概念，而中国人也没有对政治做太多宣传。他们只是设法把人民聚集到青年联谊会里，教唱新的歌曲，如：“天空蓝又净，白云很美丽，西藏人民得解放。”⁶

5. 分别叫循努措巴 (*shünu tshogpa*) 和普莫措巴 (*pöme tshogpa*)。

6. 藏语：*nam mkha` sngo la dwangs shing / sprin dkar lang long kha dog mdzes / bod ljong mi dmang bcing bkrol thob*。

在几个星期里，我大概去了那里几个晚上。有一天晚上我在那里待得很晚，直到半夜。那天我的大哥索南多杰（Sonam Tobgye）在家，我妈妈过世之后他成了我们家的一家之主（他那时34岁）。那天夜里他对我发了火，说了一些我永远不会忘记的话。“我们〔我们家〕世代靠着西藏政府的福荫生活，所以你不应该走到西藏政府的对立面去参加共产党的青年联谊会。”于是从此以后我不再去那里了。后来当社会学校成立的时候，我的哥哥不在拉萨（他去了西藏西部），所以我到那里去了几个星期。但是随后我想起哥哥的忠告，于是不再去那所学校了。⁷

新的“社交生活”的巨大成功甚至在共产党内部也造成问题。藏族干部平汪回忆起一件小事，说谭冠三非常生气，因为他领导的干部学校里的西藏人去参加青年联谊会和妇女联谊会组织的广受欢迎的聚会，而没有去干部学校上课。

体育运动是共产党提倡的另一类非常流行的活动，在拉萨还出现了对足球小规模的热狂。历史上，除了足球以外，西藏人没有进行过其他西方体育运动。足球是英国人在1904年占领拉萨时引入的。1923年，足球在短命的江孜英文学校里也流行过一阵子。此后1936年英国代表处（通常被称为德吉林卡，Dekyilingka）在拉萨成立的时候，足球又流行了一番。1936年，英国代表处举办了其职员和拉萨居民的足球比赛。参加这个比赛的拉萨居民中有一些是西藏政府的官员。拉萨人的球队叫拉萨联队（Lhasa United）（而且他们有自己的队服），英国人的球队叫土拨鼠队（Mission Marmots）。最终，这项赛事的规模发展到有十四支球队参加，并且一直延续到1944年。那一年宗教机构说服摄政禁止足球运动，理由是踢足球就像踢佛祖的脑袋一样邪恶。⁸

然而，在1952年足球再一次流行。开始是因为谭冠三希望使干部学校更加吸引年轻士兵，所以决定把体育运动列入课程设置。谭冠三的传记解释了他的想法。

7. 谢林·次旺朗杰，访问记，2004，克利夫兰，俄亥俄州。

8. 拉萨联队和土拨鼠队的照片见哈里斯和夏加，2003：58-59。对1950年前拉萨的足球运动的描述，见麦凯（McKay），2001。

拉萨的一些贵族青年爱踢足球，谭冠三心里一亮：……可是足球也没有卖的。原来〔拉萨的〕那些足球都是贵族子弟自己从印度带回来的。谭冠三了解到雪康·杰炯老师爱踢球，就动员他把家里的球拿到学校来。

当时拉萨没有一个足球场，部队里也没有几个人踢过球。谭冠三就请雪康当教练，教学员们踢球。后来又从中选拔一些人，组成校队。雪康得意地说：“我们是绝对冠军，无敌于高原。”因为没有人与他们对抗，谭冠三让雪康把那些贵族青年组织起来，组成拉萨青年队，与干部学校队进行友谊赛。⁹

西藏人的拉萨队既有贵族也有僧官，并且他们绝大部分人也是青年联谊会的成员。像贵族绕噶厦和谢林家的孩子盘着正式的发髻（藏语：*pachog*）参加比赛，而像阿旺孙格（Ngawang Senge）和益西云丹（Yeshe Yönden）这样的僧官也加入了球队。拉萨青年队每个月至少聚在一起练习一两次，并且每月大约参加一次比赛。他们想了很长时间球队的名称，最终一致同意使用“兄弟队”（All Kinsmen，藏语：*günche*）这个名称，以表示他们就像兄弟一样。他们的比赛吸引了一两百名观众，这些人观看他们的比赛并给他们鼓掌加油。¹⁰ 对于拉萨很多年轻的藏族精英来说，这是个激动人心的时刻。

大约在青年联谊会开始的同时，初创时期的妇女联谊会也在拉萨成立了。不久之后车仁夫人就成为其高级干事之一，她回忆了围绕妇女联谊会成立的事件。

后来政策开始改变，而妇女联谊会也成立了。所有高级官员的家眷，如至尊的姐姐，擦绒、桑颇、阿沛、索康、夏苏的妻子以及他们的女儿都收到邀请去参加一个大型晚宴。在晚宴上，这些人被鼓励建立一个妇女的联谊会。……我们答复说这样的组织以前从来没有出现过，所以我们需要得到达赖喇嘛和〔西藏〕政府的批准。他们说：“如果他们批准，我们就会建立一个这样的组织，但是此刻

9. 降边嘉措，2001: 117。

10. 谢林·次旺朗杰，访问记，2004，克利夫兰，俄亥俄州。谢林回忆说，他在1959年之后蹲监狱时，中国人非常想知道这个组织有没有开始涉及政治。但是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们涉及过。

我们确实不能答应你们。”当时，张经武的妻子〔杨岗〕和其他领导人〔中国人〕的妻子也在宴会上。她们说请示达赖喇嘛的想法很好，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换个时间再见面商量。

于是这些妇女中一些噶伦〔阿沛和夏苏〕的妻子拜访了噶厦，汇报了这件事，噶厦说可以。所以我们在孜本夏格巴夏天住的房子里举行了另一次会议。……达赖喇嘛的姐姐〔次仁卓玛〕被任命为主任，大约五位妻子被任命为副主任，包括桑颇、阿沛、绕噶厦等人的妻子。……那时我被任命为副主任。此外，唐麦（Tangme）和我也被任命为联谊会的秘书。从那时起，西藏妇女联谊会成立了，而我正是为它工作。¹¹

车仁夫人后来成为流亡印度的著名人士，对这个新的组织她还有过另外的评价：

中国人待人的方式很聪明，他们提供晚宴和派对。很多人觉得也许我们可以让事情按照他们在《十七条协议》中写的那样发展下去。我想很多人都认为中国人会继续很友善地对待我们。妇女联谊会和青年联谊会很相像。……〔开始的时候〕每个人都不信任中国人，但是这一点慢慢地发生了改变。……在我们妇女联谊会里，有些妇女真心认为如果我们扔掉老派的东西，中国人就会友善地对待我们。有些成员非常喜欢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例如，唐麦夫人就是这样的妇女。到后来，妇女们完全改变了对中国人的态度……因为中国人改变了他们的政策。当然，妇女联谊会中有些像桑林那样的妇女没有改变对中国人的态度，而是继续对中国人友好。¹²

车仁夫人的评价反映了在最初的几年里，较年轻的精英群体在面对现代变革时所涌动出来的热情。新的事物正在涌现，但是这些事物并没有威胁到既有的生活方式。平汪的回忆佐证了这一点：“绝大部分贵族的妻子都很进步。她们参加派对、跳舞，并且化妆。她们非常活跃。”¹³

这个组织的另一名成员，索康噶伦的妻子也记得有些贵族的妻子在政治上采取进步的态度，说她们对正在进行的社会变革充满热情。

11. 车仁·仁钦卓玛，访问记，1991，拉普。

12. 车仁·仁钦卓玛，访问记，1991。

13. 平汪，访问记，2000，北京。

桑林〔夫人〕和崔科〔夫人〕以及其他这种类型的人很反对我们的旧社会，她们说旧社会陈腐不堪。……她们说今天有太多值得我们妇女欣赏的东西。共产党给了妇女平等，我们可以在一个办公室里见面本身就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她们总是说这样的话，她们希望妇女得到尊重，得到平等的权利，希望妇女可以召开会议，在会议上可以有所作为。她们很勇敢。……她们说在过去的日子里西藏妇女毫无希望，甚至是在上学的问题上，妇女都被认为不需要接受教育，只能待在家里。今天妇女和男人平等了，也可以接受教育了，并且有了展示自己的机会。¹⁴

然而，尽管这些观点在一个有相当规模的贵族精英人群中很流行，但是仍然属于很小众的观点。绝大多数西藏人憎恶和反对这些变革，把这些“进步的”西藏人看成是共产党和中国人的同路人。一名藏军士兵解释说：

这个妇女组织以及其他类似的东西——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真的喜欢中国人，但是绝大部分“人民”把他们看成是中国人的走狗。因为事实就是这样，所以僧侣们抓住他们中的一些人，狠狠地揍了他们。

问：僧侣们是不是也对学生、妇女联谊会以及青年联谊会的成员放话了？

是的。有一次在仲吉林卡的一个会上，好像唐麦夫人说了一大堆话，于是僧侣们等着“伏击”她，用棍子狠狠地揍了她一顿。此外，类似的还有雪康·杰炯这样的人。他没有落到他们的手上，但是如果他被他们抓到，他们一定会好好地伺候他一顿。虽然人民不能肯定他们是不是真心喜欢中国人，但是他们的行为让我们“人民”深深地厌恶他们。¹⁵

但是，尽管存在着这样的态度，对于一个有相当规模的年轻精英群体来说，新的组织很令人兴奋也很受欢迎。这对中国人来说也是一个巨大的成功。逐步争取精英的策略终于在一个重要的西藏精英群体中取得成功。

14. 索康夫人，访问记，1992，达兰萨拉。

15. 甲本格占拉（Kedramla），访问记，1992，达兰萨拉。

■ 粮食采购局

粮食问题在 1952 年仍然是一个主要的问题。正如在前面章节里介绍的，中国人采取不同的手段来稳定粮食供应。在司曹倒台之后采取的一个新举措是重新提出设立正式的联合粮食采购局（藏语：*drurig dagnyer legung*）的建议，¹⁶ 而新掌权的噶厦迅速同意了 this 建议。在 1952 年秋天，这个新的机构接替了索穷噶厦的工作。平汪积极地参与了 this 新机构的设立。他回忆说：

这些〔新提议〕中最为重要的提议之一是稳定粮食供应和价格、结束价格飞涨。我们认为关键是要建立一项制度，通过这项制度可以系统地获得存放在西藏其他地区的粮食。为了实现这个想法，我们向西藏政府建议成立一个新的联合粮食机构。这个粮食机构的董事局为首的是我的老朋友索康，他在噶伦里面权力最大。阿沛、朗顿和我是副董事。¹⁷

我们开了很多次会议讨论细节问题。我了解西藏上层的传统，所以我确保在会议过程中招待甜茶和小点心。我们的会议变得很受欢迎，大部分和这个机构有关的政府官员实际上都参加了。拉萨人开始开玩笑地说现在政府各个部门都空荡荡了，因为大部分官员都去参加粮食机构的会议了。

我们从贵族和寺院边远的庄园收购粮食，然后利用西藏政府的差役运输系统运送到拉萨储存和出售。中央政府给了我们十万大洋的经费来执行这项任务。我方把这项重要的任务交给了我，这让我很高兴。在西藏政府的帮助下，我们得以迅速地实现了我们的目标。¹⁸

然而，平汪的说法太正面了。实际上食物短缺继续发生，只是情况没有先前那么严重而已。通货膨胀继续危害穷人和社会中层的经济状况，这种情况一直要到通往中国本部的两条公路在 1954 年年底修通之后才得到改善。

16. 第九章已经提到这个机构最初叫“*shungdru jidzökhang*”，但是最终它被改称为“*drurig dagnyer legung*”。

17. 成员中的四位西藏官员是：噶雪、江乐金、贡培和邦达昌·索巴（Pandatsang Surpa）。

18. 戈尔斯坦、道帛喜饶和司本石初，2004: 177。

■ 赴内地参观团

中国人也热衷于邀请西藏人去中国参观，所采取的形式是到北京参加会议，或者只是到中国东部地区参观。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尝试利用教育影响西藏人的另一策略。中国人觉得，让西藏人用自己的双眼看到西藏和中国在社会发展与现代化上的差距，会形成一种积极的印象及对在西藏实现现代化的热情。

从 1952 年到 1954 年，西藏工委组织了来自社会各行各业数百人去参加会议或者参观，组建和派出了一系列的代表团。有些代表团是政府官方代表团，目的是参与特殊事件；而有些是青年、僧侣活佛的参观团。在这一时期，总共有将近一千人通过这种方式访问了中国。¹⁹ 一名第二次参加这种参观团的进步西藏人一语中的地说：“其目的是展现中国的东西有多么好，这样年轻人回来后就会告诉其他人中国有多么伟大。”²⁰

这些参观团中最重要的一个是由西藏政府外交局局长柳霞带队的西藏政府官方代表团。这个代表团于 1952 年出发去参加国庆节（10 月 1 日）的庆祝活动，并向毛泽东敬献哈达。²¹ 其成员分别来自西藏政府、班禅堪厅和昌都政府，他们在中国内地待了近一年。

这个参观团的访问非常重要，因为柳霞见到了毛泽东，而且他所看到和听到的确实让他印象深刻。他在参观的最后发表了一个广播讲话（这次讲话在拉萨的广播里播放，并被印成一份小册子），在讲话中他谈到他的行程和毛泽东关于宗教、土地改革、经济援助和军政委员会的谈话。毛泽东利用这个机会重申，尽管《十七条协议》必须全部实施，但是什么时候实施和怎样实施取决于西藏人。柳霞说毛泽东告诉他：

1. “共产党对宗教采取保护政策，信教的和不信教的，信这种教的或信别种教的，一律加以保护，尊重其信仰。今天对宗教采取保护政策，将来也仍然采取保护政策。”
2. “分地的问题与宗教问题有所不同。在汉人区域已经分了土地，这里对宗教仍然是保护的。少数民族地区分不分土地，由

19. 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1991。

20. 土登旺布，访问记，1992。

21. 因为这个原因它也被称为“致敬团”（藏语：*denbul tshogpa*）。

少数民族自己决定。西藏地区，现在谈不上分地，将来分不分，由你们自己决定，并且由你们自己去分，我们不代你们分。”

3. “成立军政委员会和改编藏军是协议上规定了的，因为你们害怕，我通知在西藏工作的同志，要他们慢点执行。协议是要执行的，但你们害怕，只好慢点执行，今年害怕，就待明年执行，如果明年还害怕，就等后年执行。”
4. “西藏地方大、人口少，人口需要发展，从现在二、三百万发展到五、六百万，然后再增至千几百万就好。还有经济和文化也需要发展。文化包括学校、报纸、电影等等，宗教也在内。过去的反动统治者，清朝皇帝、蒋介石都是压迫剥削你们的，帝国主义也是一样，使得你们人口不得发展，经济削弱了，文化也没有发展。共产党实行民族平等，不要压迫、剥削你们，而是要帮助你们；帮助你们发展人口、发展经济和文化。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就是要执行帮助你们的政策。开始进去的时候不会有帮助，三、四年之内也不可能有多帮助，但以后就能帮助你们，那是一定的。如果共产党不能帮助你们发展人口、发展经济和文化，那共产党就没有什么用处。”²²

另一位西藏官员辛萨·洛桑格勒也是这次最重要的参观团的成员之一，他回忆说：

大概有十八九位官员参加，我们的团长是柳霞。……如果要用一句话概括，那就是我们到处参观，到学校、工厂等等各种各样的地方去参观。每天我们都要跑好几趟〔到不同的地方去〕，这很不轻松。当我们去工厂的时候，工厂的领导会发言说国民党时期的情况是多么多么的糟糕，而经过了共产党的革命之后现在有了怎样怎样的改善等等。总之都是这样的话。似乎他们是希望我们返回〔西藏〕之后告诉别人在国民党统治之下情况很糟糕，但是现在他们的情况很好。概括起来就这几句话。他们说他们有什么有什么，但是我们并不知道他们之前就有还是之前没有，对吧？似乎他们是希望我们返回西藏之后传播这样的信息。……中国人告诉我们的全是好的事情。在访问的最后，他们询问我们的看法。我们基本上是在复述他

22. 柳霞的讲话收录于1952年11月22日的《人民日报》，引自香港友联研究所编，1968: 42-46。

们告诉我们的事情，因为我们不知道过去的情况是什么样的，也不知道现在的建设项目有哪些、生产数据怎么样。我们说的话最后形成了一份报告。²³

但是这个策略是有效的，让西藏人印象深刻。就像辛萨回忆的：“于是人民感觉到所有的东西都是好的。中国人正在做好事。甚至连柳霞也在某天晚上对我们其中之一说：‘这里有宗教自由等等，所以不好吗？’”²⁴

但是，这些参观有时候也引发了一些质疑。1953年第二个政府参观团的一名成员回忆说，他发现他们在一处宗教场所的参观只不过是为他们安排的一场表演而已。

通常来说，就国家〔中国〕的发展看……人民可能会觉得西藏以后也会出现这样的发展。很难说别人怎么想，但是我个人认为以后是会发展出工厂等东西来的。

然而，就宗教自由的问题来说，我们看到的仅仅是一种伪装。真正的宗教自由根本不存在。……我可以给你举个例子，在上海的时候我患了肠道疾病，于是他们不得不给我做手术。因为这个原因我无法随团到广东去，所以我先于其他人到了 Hamru（仅凭英文地名，无法确认地点——译注）。到那里我一看到寺庙便觉得它们修得很好。我在 Hamru 的时候，参观团还没有到，有几个指定的中国陪同人员负责照顾我。他们建议说：“我们散散步？”于是我说：“好。”……我们到了一座佛殿，里面供奉着都松桑杰（Düsum Sanggye）〔过去佛、现在佛和未来佛〕。但是，我的天呀！佛像非常破败，有鸟在上面拉屎。佛殿外有几处放牧人留下的灰烬堆，一些孩子在佛殿前面玩耍。这个建筑根本不像一座佛殿。

后来，当整个团到达的时候，他们带我们……去了同一座佛殿。这座佛殿被整修得如此漂亮。佛像是如此干净，闪闪发光。各面墙都垂着织锦。佛像前，灯烛燃起，供养之物放置整齐。佛殿里有四名僧侣，各人手持檀香。我想这真是一座非常漂亮的佛殿，可当我稍微走远一点时，我发觉以前到过那里。然后我回想起在佛殿的下面有两座石狮子，上一次我们在那里停下来吃过水果。我还把水果皮扔在两个石狮子中间。于是我四处张望，发现那些水果皮仍

23. 辛萨·洛桑格勒，访问记，1993，多伦多。

24. 辛萨·洛桑格勒，访问记，1993。

然在那里。所以我恍然大悟，明白了原来这里只是一个为了我们的参观才修起来的旅游点。……所以我开始怀疑所有的地方都是像这种情况，而似乎事实正和我想的一样。于是我觉得这些东西〔宗教自由〕绝对不存在。²⁵

除了这些参观团之外，中国人还努力把西藏人带到北京送入民族学院学习，因为从长远来看，通过这种方式受教育的人很可能会成为社会主义新西藏的领导者。在 1952 年到达的第一批学生包括一些年轻的僧侣和贵族官员，他们中有一些人属于受更敦群培影响的那一小群人，至于更敦群培，在第七章里已经提到过了。

起初，更敦群培给我们制定的计划是去印度〔去了解发生的一切〕，但是在它〔这个计划〕还没有得到批准之前中国人就来到了西藏。于是更敦群培告诉我到中国去，去学习汉文。他说：“你不应当待在自己的家里，你应当知道敌人的情况。”

另一方面，中国人宣传说他们要发展〔西藏〕，这也是我们想要的。而且他们还说他们并不想“吃掉”西藏，说他们会返回中国的。

所以最初他们来的时候看起来非常友善，他们只是待在新修的营房区域……不到八廓街来，行事也很小心翼翼。所以我心中产生了某种希望，并和其他一些人一起自愿到中国去学习。

索索晋美（Sursur Jigme）也在我们之中，他的父亲索康札萨认识更敦群培。他也告诉我们到中国去，说我们应当〔给西藏〕带来改变。²⁶

我们之中也有三位僧官，其中之一是阿旺孙格。……我和他做过同学，所以很早以前就认识他。……那时，专为和中国人打交道的索穷噶厦已经成立了……于是我们通过这个机构告诉达赖喇嘛，既然没有人去中国，那么我们愿意去。……至尊吩咐他们送我们去中国，并给我们每个人发了二十五秤。²⁷

25. 拉乌达热孜仲，访问记，1992。

26. 索康札萨在 1920 年代是和擦绒一伙的进步军官之一，后来成为西藏政府的两位外交局长之一。他也是索康噶伦的父亲，只是他在几十年前就从索康家族分出来独立门户，建立了被称为索索（Sursur）的分支家族。

27. 阿旺顿珠，访问记，1992，达兰萨拉。

中国方面非常想给人留下一个正面的印象，所以西藏学生享受到很多特殊的照顾。例如，按照西藏风俗，肮脏的东西是不应该放在人们佩戴的护身符上面的，故西藏人不想让任何人睡在他们上面，所以西藏人可以睡上下铺。此外，他们也有专门的藏族食堂，在那里藏族学生可以单独就餐。²⁸ 在随后的几年里，中国人从日喀则和非精英背景的群体中招收西藏人。开始的时候这些人被送到北京学习，到后来也被送到专门为西藏人设立的位于西安附近的咸阳民族学院学习。

■ 外交事务的合并

现在要做的一项重要的结构性变革，是将西藏政府外交局并入中国外交部驻拉萨办事处。这个新的中藏“联合”机构叫做西藏外事处。与军区司令部不同，指派到这个机构里任职的西藏人虽然仍是西藏政府的官员，但他们确实发挥了作用。西藏外交局局长柳霞解释说：

《十七条协议》中注明西藏政府的外交部将要并入中国外交部。我去中国的时候〔1952年〕噶厦已经决定让这两个外交部合并了。待我从中国返回之后噶厦告诉我：“我们已经把我们的外交部和中国人的外交部合并了。有一位叫杨公素的中国官员，你要和他商定如何建立〔新的〕外交部。”

在我和杨公素商量时，他说他们已经准备把这个机构设在松柏（Sombö）家的房子里，并说我们基本上已经可以开始工作了。随后，噶厦和全体中国官员前来祝贺这个机构成立。我没有多少工作要做，拉萨有印度领事馆和尼泊尔领事馆。当他们需要商谈边界问题的时候，有时他们到我们这里来，有时他们邀请我们到他们那里去。²⁹

另一位在那里工作的西藏官员补充说：

我们加入进去后……中国人划分了三个小组，分别是第一小组、第二小组和第三小组。每个小组有一名中国人和一名西藏人。在这两

28. 阿旺顿珠，访问记，1992。

29. 柳霞，访问记，1981年10月29日（由达兰萨拉的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新闻办公室进行）。

个人下面大部分是中国的人员，但是也有一些西藏人。第一小组负责同印度的关系。……第二小组负责同尼泊尔的关系，而第三小组负责内部事务，例如，收集和保管档案文件等。……

这些领域都是关于西藏的，所以文件都是藏文的，需要经过翻译。举个例子，我属于第一小组，参与管理同印度的关系。需要材料的时候我们西藏人要设法寻找，进行考察，然后再让人翻译成汉文。西藏人了解和印度代表处的关系，知道相关事务以前是怎么处理的，所以他们会说：“以前是那样办，所以现在应当这样办。”³⁰

然而，外交局的合并并不是一点问题都没有，桑都仓·仁钦的例子就表明了这一点。他是屈指可数的几位在印度接受教育、能说流利英语的西藏官员之一。他的家庭原是康巴商人，后来才被提升为贵族，所以虽然他家不像传统的贵族那样有庄园领地，但是他仍然能担任政府的俗官。他是1951年谈判团的英文翻译，具体的任职部门是西藏外交局。他叙述了他在这个新的联合西藏外事处成立之后遇到的麻烦。他遇到的这些麻烦体现了中国人对这些在印度接受教育的西藏人的猜疑。

〔在西藏外事处，〕开头中国人很和善，但是随后他们开始对我表现出一种不好的态度。我在外国接受的教育，会说〔英语〕，所以我们〔这样的人〕很自然会同德吉林卡〔印度领事馆〕和尼泊尔人有些交道，对吧？尤其是锡金人和印度人所在的德吉林卡。有时会有一些接触，因为他们有发报机，这你知道吧？此外，那里有一些我们早先在印度认识的人。但是当我们同他们接触的时候中国人非常不高兴，所以他们不断地告诉我们他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他们有时会把工作人员召集在一起，告诉我们如何同外国打交道，手续是什么样的。事实上他们的意思是不允许同尼泊尔人和德吉林卡打交道，他们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我还是像原来一样，但是随后有一天他们就批评了我。他们没有直接告诉我，但是告诉了柳霞：“桑都仓·仁钦一直同德吉林卡和尼泊尔人打交道，这样不太好。如果他这样做，就不能在外事处工作。”

于是有一天柳霞叫我去他的房子，我去了。他说：“现在中国人既然这样说了，那么似乎是有一些事情做得不太对。”我说：“我并不是同他们接触政府事务，那些事是办事处的事。我在那里有认

30. 拉乌达热孜仲，访问记，1992。

识了很久的朋友和熟人，我有权继续维持这些关系，这是我的意愿。他们没有理由阻止我这么做。……如果中国人这么说，我不想再在那里工作了。另外，对于我在外事处的职务，我是西藏政府任命的人，不是中国人给我工资让我在那里工作的。我不是那样的雇员，我也根本不想在那里工作。……所以老爷，请把我这件事提交给噶厦，告诉他们情况已经这样了。……我受命担任政府的仆从，所以无论把我任命到哪里，我都会在那里为西藏政府服务。如果没有任命，那也没问题，我就待在家里做生意，反正我再也不想做这种为中国人服务的工作了。”于是他（柳霞）把这个请求提交给噶厦，噶厦把我任命到一个管理通信事务的部门去了。³¹

中国人对此无计可施，因为桑都仓·仁钦是西藏政府的雇员，而西藏政府对自己的官员仍然可以想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绝大部分内部事务都是这样的，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59年。

■ 修筑公路

我们在第九章已经看到，修筑从中国内地通往拉萨能通汽车的公路从一开始就是优先的政策。从甘孜到昌都445公里公路延伸线的修筑工作在1951年5月6日就开始了。整个路段于1952年11月20日完工，也就是解放军占领昌都一年之后。³²但是昌都距离拉萨仍然有一千多公里，而且沿途都是难以通行的高山。两地之间的公路修筑在1953年1月1日得到毛泽东的批准，目标是在1954年完工。³³这条公路被称为南线或者康藏线，因为修建另一条从青海省西宁市到拉萨的北线公路也得到了批准。张国华和张经武在收到批准的消息后，立即把修建南线公路的工作分为东西两部分，从两头同时开工兴建。东面由在昌都的十八军后方筑路部队负责协调承担。张国华和张经武同西藏政府协商成立了一个联合筑路委员会，来承担从西面（拉萨）开始的筑路任务。谭冠三担任这个委员会的主任。

31. 桑都仓·仁钦，访问记，1989，噶伦堡，印度。

32. 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1990，1952年11月20日条目。此刻十八军后方支援司令部已经搬到昌都。

33. 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1990，1953年1月1日条目。

(1953年)2月17日，昌都方面开工了。昌都方面动用了16,000个民夫和技术人员以及大约31,000个士兵，³⁴几乎所有的工人都是中国人。西藏人被招募来主要是提供驮畜。因为这个原因，拥有大量牦牛的精英赚得了巨额的金钱。

西面于两个月后的4月20日从拉萨开工。中国的档案记载，除了成千上万的解放军外，到1954年为止，有来自48个宗的8,061名西藏人受雇承担了主要的体力工作（例如，劈石和挖土）。³⁵

拉萨和其他城市的筑路工作在社会最穷困的群体中创造出西藏第一代新工人阶级。西藏社会的乌拉制度仍然有效，所以西藏政府命令各地区派遣劳力。但是中国人不想给人民增加任何新税赋，所以他们用大洋支付给这些劳力可观的薪水。³⁶经历过这件事的一位中国官员高平说，平均每一名西藏劳力每月大约能赚到八十个大洋。³⁷对于这些贫苦农民中的大多数人来说，这实际上是他们从小到大第一次拥有可观的现金。

来自昌都的孤女的故事揭示了贫穷的西藏人是如何被单纯的物质利益吸引到中国一边，而不管什么政治或者阶级的大道理。这个女孩在14岁的时候从她的姑姑家跑出来，开始徒步走去拉萨，因为她听说拉萨是个好地方。

当我〔在1951年〕从康区来的时候，我只是一个孤儿。……我一个人来，沿路要些糌粑。

问：你最初是在哪里看到解放军的？

我在林芝（Nyingtri）的八一镇〔在工布地区〕见到了解放军。那里有一个解放军的大部队正在伐木、锯木料。其中有一个巴巴〔来自巴塘的康巴人〕翻译，他问我在干什么。我告诉他我是从康区跑出来的，正要去拉萨。他问我有没有亲戚在拉萨，听我说没有

34. 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1990，1953年2月17日条目。

35. 高平，2001：126。

36. 因为把成千上万的大洋运到工地很困难，所以有时西藏官员会参与进来，把这些大洋兑换成西藏纸币，再用纸币给工人们发工资（平措多杰（Phüntso Dorje），访问记，2000，拉萨）。

37. 高平，2001：128。有意思的是，高平在书中说中国人很快发现他们付给西藏人的钱被一些西藏上层收走了，这些上层用他们的权力向他们的属民收钱。于是中国人改变了策略，或者发实物（衣服、茶等东西），或者发大洋，但是在发钱的现场设一个商店，这样工人们马上就能买到东西。

之后，他告诉我应该到他们团去〔给他们工作〕。我没有能力干重体力活，所以他们让我待在厨房里，告诉我：“如果你擦擦桌子洗洗碗，部队是不会亏待你的。”

第二天，指导员来找我谈话。我把我的孤儿身世和我的经历告诉了他。他问我有没有亲戚在拉萨，我告诉他我没有亲戚，但是我听人说拉萨是一个充满幸福的地方，因此我要到那里去。他问我愿不愿意待在团里，听我回答说愿意之后他说：“我们不会让你干你干不了的事情，你应当学一点文化。”我想他的意思是我应当学一点汉语，随后他们给我发了毛巾、肥皂、衣服、裤子和被褥。他们让我和一个从工布来的妇女住在一间卧室里，这个妇女的工作是喂猪。他们要她照顾我。他们告诉我只要士兵们在吃饭我就可以和他们一起吃。

就这样过了一年又一年。那时，士兵每月领到三个大洋。我也得到相同数目的大洋。我是一个孩子，从来没有接触过钱，因此我非常非常高兴。

问：你是怎么花这三个大洋的？

我只是把它们放起来，我不需要买任何东西。像洗漱用具和食物等，我需要的都会发。

后来，指导员和翻译告诉我：“我们要到拉萨去，如果你想去拉萨，我们可以带你去。如果你想去上学，我们会送你去上学。如果你想在那里参加解放军，你可以参加。如果你想就这样继续下去，也没问题。一切由你自己决定。”我告诉他们我想去拉萨，于是他们说我可以跟他们一起去。……

我运气不太好，没有去上学。我待在司令部里……被分配到接待处看门。有两三个中国人和西藏人在那里上班。我就这样过了两年，工资并不高。实际上，〔中国〕政府负担了我的生活。

后来，我遇到一些同事和朋友。他们和我说：“你不应该像这样在团里待着，虽然团里给你吃喝。假如你到人民医院附近的木材加工厂去锯木料，每锯一公方，他们会给你十元钱。你（一天）可以挣二十元钱，所以和我们一起去看那里吧。”

我向团里请假。那时指导员不在，所以我对翻译说：“我要去锯木料。别人说如果锯木料的话我可以多挣点钱。”他说这由我自己决定。“我们不希望你去看，指导员为了把你介绍到这里来〔向领导〕说了很多好话。但是如果你想去看，我们也不能拦你。如果你在那里不顺利，你回来就是了。”

于是我跑去锯木料，和我一起干活的是一些康巴人。那时我很年轻也很有力气，每天能锯两公方，因此挣了很多大洋。后来我就一直在那个加工厂工作。³⁸

像她一样在修路工地、军事基地和建设项目上为中国人工作过的众多西藏人，正是 1959 年叛乱过后新任用的成千上万名藏族地方干部的来源。

为了组织劳动力同时安排因为修路而失去的土地的赔偿，西藏政府派出官员同中国人一起工作，玛恰是这些官员中的一个。他在紧挨着拉萨东北面的墨竹工卡宗工作，他详细地解释了他工作的情况。

当时，通巴（Thönpa）堪穷和我被（噶厦）派去参加公路建设。这个工程涉及到墨竹工卡地区各方面的土地，包括寺院、贵族以及政府的庄园。所以各种人等被指派到墨竹工卡去见宗和庄园的长官。……于是有一天大家碰到了一起。……中国军人和我们两个人在那里，我们主要的工作是征召（筑路的）工人。……

问：中国人筑路需要的东西是直接向你们提出请求的吗？比如说工人等等。

是的，他们告知我们他们需要多少人，我们和村庄的头人商量从每个地方派多少人。另外，我们商量支付多少工钱和为筑路而失去的土地支付多少补偿。补偿或者是现金〔由中国人提供〕或者是新的土地〔由西藏政府提供〕。

那时，工资是按照当时的行情支付的。……工人们按照十个人一组组织起来，按照他们完成的路段长度获得工资。工钱是尽量两个星期一发，如果有困难也会一个月一发。……

因为我们不知道怎么测量，也没有钱给工人发工资，所以我们要做的事就是把人叫过来，没有多少工作量。但是如果我们不发话，那些西藏人是不会听别人的，你明白吧？他们确实不听中国人的。甚至连穷苦的农奴也不听中国人的，……实际上这确实很奇怪。所以说他们真的很需要我们〔西藏政府的官员〕，给我们分配卫兵，为我们做了很多事情。

……我有很大面积的区域需要照看，包括工布和塔波（Dakpo）的六七个宗。噶厦告诉我们每个宗要征召的工人的数量，同时也已

38. 白马德吉（Pema Dikiyi），访问记，2001，拉萨。

经给这些地方的每个宗发去了相关的命令。……如果有人不按照指定的时间来〔干活〕，我们就需要到他们那里把他们叫过来。在有些地区，比如波（Po），人口比较少，劳动力缺乏，所以他们很不情愿派人来。我只能对他们说他们是会得到报酬的，他们这样做只有好处没有任何坏处。我也说这些路将会修在他们自己的地方，以后他们也会受益，因为这会使得他们不再需要用驮畜支乌拉了〔因为有公路了〕。我不得不像这样到各个地方去花精力说服、动员。……这项工作开始于1953年，整个1954年间都在做。……1954年达赖喇嘛去中国的时候，我们仍然在修这条路。……

问：在这个时期他们有没有谈政治以及社会主义相关的东西？

起先他们没有。他们只是专注于筑路。他们不断地说公路修通以后，衣服和食物会源源不断地从北京运过来。现在他们还不得不哄骗人民，是吧？他们总是把群众挂在嘴边，说群众将会得到好衣服和丰富的食物。那时他们就像这样只是说工作，不说其他的。……

问：既然这些西藏工人是按照所筑公路的长度得到工资的，那么他们工作是不是很勤奋？

是的。因为是按照工作量付工资，所以很容易组织。你不需要说诸如“哦，你做的工作不够”或者“你怎么无所事事”这样的话。那时的情况是他们都拼命地干！而且那时中国人鼓励竞赛，并给予绩效奖励（藏语：*paysang*）。他们通常挑选妇女作为工人模范。……于是在特别的一天，他们会开个会，摆好桌椅，分发一些点心和茶。他们会说：“这个叫央吉（Yangki）的姑娘很好，工作很勤奋。”……当他们表扬妇女的时候，男人们会觉得惭愧，所以他们会迫使自己更加努力地工作。男人们会说：“天哪，像这样用女人做例子太让人难堪了。”所以说中国人很擅长驱使人干活。一方面他们提供奖励让人们互相竞赛，另一方面他们按照人们干活的多少发工资，这和我们组织工作的方式完全不一样〔笑〕。你不需要说：“干这个！”或者“你这个家伙，不要睡觉了。”……根本不用说这些话，所有的任务都完成了。这些家伙——这些事对人民是不利的，但是他们却很擅长让人民帮他们做这些事。³⁹

39. 玛恰·次旺多杰，访问记，达兰萨拉。

在南线公路动工修筑后不久，北京当局也批准了动工修筑起始于青海省的北线公路。一个负责青藏公路建设的办公室于1953年夏天成立。1953年11月，这个办公室派了一支测量队伍驾着马车跨越昆仑山和唐古拉山口，对路线进行测量。1954年1月23日，这支测量队伍到达那曲。之后在1954年5月11日，整个公路建设从格尔木开始了。⁴⁰



图 21：川藏公路，1954 年 12 月通车。照片来源：陈宗烈

最终，两条公路都在1954年12月25日通车。参加这两条公路工程建设的军队和民夫总人数达到111,000人。在工程建设的四年时间里，超过3,000人死亡。⁴¹康藏公路的建设包括架设大小桥梁597座，修建涵洞2,860个。⁴²然而，为了赶在毛泽东设定的1954年完工，某些路段的质量甚至连中国最低等级的道路都比不上。同时，西藏公路的维护也成了—

40. 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1990，1954年5月11日条目。

41. 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1990，1954年12月25日条目。

42. 高平，2001：136。

大问题。⁴³ 尽管如此，这两条公路的开通最终解决了可靠的食物供给问题。中国人因此在西藏获得了他们梦寐以求的安全和稳定。

.

虽然司曹倒台之后西藏政府的目标实现了较大的统一，但是在噶厦成员之间还仍然存在着重要的分歧。阿沛是从噶厦恢复全部权力这件事中得益最多的人，因为他最热衷于和中国人紧密合作及改革西藏。他认为西藏现在已经牢固地成为中国的一部分，西藏政府应当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部找到适合自己的角色，而不应当试图抵抗中国人，幻想保持不变。他觉得《十七条协议》给了西藏政府一个独特的发挥主动性的机会，可以与中国共产党一道开展改革，使西藏实现现代化。他的立场很强硬，因为达赖喇嘛对他信任有加。达赖喇嘛喜欢他的率直、他对变革和现代化的渴望，也喜欢他坚信西藏从属于中国能拥有光明的前途的乐观态度。⁴⁴ 当然，他也有中国人无条件的支持。中国人视阿沛为他们在西藏政府中的关键盟友，他们经常同他讨论问题。这一点我们已经从前面开办小学的筹划过程中看到了。阿沛大踏步地前进，主导了一个西藏政府的改革计划，这将是后续一章的主题。和阿沛紧密合作的是代理噶伦夏苏和一些进步贵族，比如桑林、崔科、桑颇、霍康、雪康、哲通、江乐金、唐本（Thangpön）、唐麦、乃多（Nedö）、穆甲（Muja）、强俄巴（Changöba）和玛恰。

噶伦索康的观点从某个角度看和阿沛的很相似，但是换一个角度看却非常不同。前面已经提到，索康是在1952年2月中旬不太情愿地回到拉萨的，那时正是人民会议活动逐渐展开的时候。和阿沛相似，索康赞成改革和发展西藏；但是和阿沛不同的是，索康不相信共产党会让西藏维持过去的样子，也不认为西藏精英的生活方式能够持续多长时间。他觉得他们迟早会消灭宗教和世俗精英阶层以及支撑他们的制度。但是他从内心来说也是个实用主义者，在人际交往方面也很世故。在和他人面对面打交道时他从不坦露自己的真实想法，而且他很喜欢用客套的语言含糊其词，他的这些特点尽人皆知。自从决定返回以后，他就认为噶厦和中国人保持良好

43. 高平，2001: 137。

44. 达赖喇嘛，访问记，1994，达兰萨拉。

的关系是很重要的。他也愿意把这看成是一场赌博，看看时间长了会发生什么。因此和阿沛一样，他在私人场合和正式场合总是友好地对待中国方面，同时也赞成现代化。但是中国方面的人知道他和他们并非意气相投。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中国人认为他是人民会议的主要支持者之一，也是中国人在噶厦内的主要敌人。⁴⁵

其他噶伦在想法上更接近索康而不是阿沛，因为他们不信任中国人并对中国人的动机深感忧虑。然而，他们也意识到冲突会产生反效果，而变革始终都会来到，只是他们希望变革来得越慢越好。他们希望同中国方面维持良好的关系，但同时试图掌控变革，以使核心的政治和社会制度保持完好。政府精英中相当一部分人持有这种观点。

但是应当记住几乎所有的精英都认为西藏是被占领的，而不是被“解放”的，所以他们认为解放军首先是一支占领军。尽管如此，到1952年年底的时候，解放军所表现出来的尊重和温和作风使精英中的很多人感到吃惊甚至感动，于是这些精英变得愿意合作，想看看解放军的尊重和温和作风能否持久。然而，也有很多人执拗地从各个方面反对中国人。这些人认为阿沛是倾向中国人的，所以不信任他，并且也因此不信任噶厦。他们希望中国人离开西藏，并渴望找到方法反抗他们。

当然，达赖喇嘛是最高统治者，假如他真的很重视这个角色的话，他本应该实行新政策。但是恰恰相反，整个这段时期他一直在政治上扮演着消极的角色。正如司曹危机时那样，他在受到巨大的压力之后才不得不对危机。他个人倾向于改革和现代化，而且在西藏进入1952-53年的后司曹时代，他变得较多地参与到政治事务中去了。但是尽管如此，他仍然无意扮演一个积极的、事事亲力亲为的角色。

与此同时，在西藏政府不知情的情况下，范明与在拉萨的西南局官员之间的矛盾在1952年下半年公开爆发了，⁴⁶而这正是下一章的主题。

45. 我找不到任何确凿的证据支持中国人对索康的指控，同时我也怀疑他在人民会议活动中扮演重要角色这一说法的真实性。

46. 达赖喇嘛，访问记，1994。

第十六章

在西藏的共产党内部矛盾

正当中国方面同西藏政府和当地藏人的关系得到改善之际，西藏工委内部的党内团结却出现问题。西北局和西南局官员之间的意见分歧在班禅喇嘛的地位以及西藏改革的策略问题上爆发了。

班禅喇嘛方面在拉萨的会见仪式上遭受的挫败，更加强化了数十年来班禅喇嘛的官员对拉萨政府的仇恨，也加剧了西藏工委内部西北局和西南局官员之间的分裂。范明和他的西北局同僚认为党本该坚持要求达赖喇嘛平等地对待班禅喇嘛。但是张国华、谭冠三和张经武对此并不赞同，他们把中央的指示解读为要他们视达赖喇嘛（和他的政府）的地位高于班禅喇嘛。西南局的这个观点占了上风，但是范明和西北局的官员认为这种做法曲解了中央的意图。我们将会看到，这个问题不仅涉及班禅喇嘛，也涉及如何更好地加速开展西藏的民主改革，同时还涉及主要官员的相对声望和权力。

范明在事件平息之后从西北局的立场解释了所发生的事情。在他的叙述中，他强烈地抨击了西南局支持达赖喇嘛的政策，说正是这种政策导致西藏的局势转向。¹他说：

那时候班禅已经回到了西藏〔日喀则〕。藏军和班禅的警卫营在1952年举行了一场马背射箭比赛，²……于是他们发生了冲突。不久，十八军驻守在日喀则的部队也同班禅的部队发生了冲突。这是因为我党内部对于班禅和达赖的地位问题存在着不同看法。有一伙人企图压低班禅，想把班禅置于噤哑之下，这项政策很有问题。他

-
1. 他认为如果他的策略得以执行，那么就不会发生1959年的叛乱，达赖喇嘛就不会逃往印度，西藏问题就不会再次国际化，也不会出现现在的民族冲突。
 2. 那是日喀则一个重要节日的一项庆祝活动。

们把班禅的警卫营归由十八军军长张国华指挥，³ 同时撤除了班禅和计晋美的卫队。这是一个内部问题，我没有必要掩饰。这是西北局和西南局之间的问题。党内团结出现的问题影响了部队。十八军支持达赖，而西北的部队支持班禅。

群众的问题就是我们的问题，我们在西藏犯了一个大错误。正因为这个原因，西藏才出现了以后的变故，所以说有因必有果。党内从一开始就有分歧，但是没过多久这就成了“派系主义”，或者是特定集团的观点——西北局的观点和西南局的观点，达赖的观点和班禅的观点。在党内出现达赖和班禅之争后，党被分为西北和西南〔两个派系〕。那时我仍然是派驻班禅堪厅的代表。当这个问题在群众〔非党员〕中出现时，西北军就维护和支持班禅，而十八军则支持达赖。我们之间的划分也是这样的。因为你可能不知道问题的真正所在，所以我要告诉你这些。

错误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实际上，造成我们内部问题的重要因素是党在政策上的一大错误，这是非常典型的。中央的方针非常清楚：建立爱国反帝统一战线，以争取达赖喇嘛集团为主要任务，牢固团结班禅爱国集团。中央的政策是非常正确的，中央坚持要我们通过和平的手段把西藏统一起来，这是西藏工作的基本方针。

中央在西藏政策上是很明确的。它认为班禅不受噶厦领导，但是仍然受中央领导。中央对待达赖和班禅的方式是相同的，这些都是中央决定了的。当班禅撰写报告等文件的时候，他并不通过西藏工委或者达赖，而是直接把写的东西交给中央。他是一个小宗教领袖，而达赖是一个大宗教领袖。〔他们之间的差别〕就是这么回事。那时，党内在西藏和平统一的问题上出现了争论和意见分歧。他们〔党〕后来说在西藏犯了错误，而错误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我们西北方面以我为首。我们在民族工作领域拥有更多经验，有很多年的具体实践，但是他们〔西南局〕在这个领域没有什么经验。对于西藏的和平统一政策，我们认为我们应当利用日喀则和昌都这两个进步爱国地区来影响达赖喇嘛集团，促使他进步爱国，并帮助他的集团成为爱国的集团，而不是一个支持独立同国家作对的

3. 最初，计划驻守日喀则的部队是西北局的部队，但是食物短缺迫使中国人在范明的部队到达拉萨之前分遣了他们自己的部队，所以最终驻守在日喀则的是西南局的部队。

集团。我们认为，通过中央的领导和两个进步地区〔日喀则／藏和昌都〕的影响，我们能够把达赖集团和噶厦改造成爱国的集团。这样我们就能把日喀则和昌都同拉萨地区统一起来，把西藏统一成一个整体，〔创造〕一个新西藏。以上就是我们的想法。

但是，以张国华为首的人听从了阿沛等人的意见，以为要以和平的手段建设一个统一的西藏我们就必须把班禅集团和昌都地区置于噶厦之下，达赖集团之下。那就意味着把班禅集团和昌都统一给不爱国、支持独立的噶厦，牺牲〔班禅集团的〕利益来交换在达赖之下的西藏的统一。这是整个问题的根源。党内出现了争议，而这个争议在短时间内没有得到解决。⁴

然而，范明在统一问题上的观点并非只是简单地支持班禅喇嘛，他的观点代表的是一种不同的西藏政策。在范明看来，达赖喇嘛和他的官员反动得令人绝望，他们绝不会同意实行社会主义改革。由于《十七条协议》说开展改革必须得到**人民群众和领导者**两方面的同意，所以让达赖喇嘛做统一的西藏的领导者就意味着改革无法进行。而在另一方面，班禅喇嘛和他的官员是“进步的”。范明知道他们将会支持尽快实行社会主义改革、打破旧制度。因此，范明的策略是同班禅喇嘛的官员一起在他们的地盘上实行改革。当达赖喇嘛的西藏政府管理下的农奴看到班禅喇嘛地区的封建制度终结后，他们会向达赖喇嘛的政府要求相同形式的改革，而达赖喇嘛的政府将别无选择只能同意。所以说，范明把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之间的统一问题看成是整合西藏的两种模式之间的真正较量。在他的模式中，中国将会先利用班禅喇嘛在《十七条协议》的指导下迅速开始社会主义改革，之后再实现真正的统一。他所构想的计划直接和西南局的政策相抵触。西南局主张按部就班地设法争取达赖喇嘛，说服他同意改革。⁵

范明接着说：

就在这期间的1952年12月〔实际上是8月末和9月〕，达赖喇嘛的藏军和班禅的警卫营发生了冲突，而解放军的十八军也卷入其中。情况万分紧急，中央和毛主席给我发了一封电报，要我火速赶

4. 范明，访问记，1993，西安（划线部分为强调）。

5. 范明，访问记，1993。

往日喀则，越快越好。我和一个班的士兵花了六天时间赶到日喀则，平息了这场冲突。事情返回了正轨，回到和平宁静的状态。但是当我在日喀则的时候，他们——张国华和张经武——用西藏工委的名义给我发了一封电报。在电报中他们要我和副代表牙含章〔是他陪同班禅喇嘛从青海前往日喀则的〕劝说班禅无条件向噶厦屈服。……

当我们到日喀则的时候，我们召集了班禅的官员，同他们谈爱国主义、〔中国的〕统一、西藏人内部的统一、同达赖集团互相尊重等。我们解决了这场冲突，一切又恢复了平静。随后他们给我发了这封电报，敦促牙含章和我劝说班禅为了西藏的统一无条件向噶厦屈服，电报的原稿还在。我们认为班禅只能和爱国的噶厦统一，而不能和一个支持独立的噶厦统一。如果我们把这两个进步的地区〔昌都和班禅喇嘛的地盘〕给这个支持分裂的噶厦，那么我们实际上是在帮助他们〔这些分裂分子〕，让亲者痛仇者快。我们不同意这封电报的内容，于是我们给中央发了一封电报，并将他们的电报一同附上。⁶

他们发给拉萨的电报很清晰地表达了他们的看法。

日喀则分工委致西藏工委并请转报中央西南局：

西藏工委九月十日关于“查明班禅减免差役及分治思想”致牙〔含章〕并日喀则分工委并报中央西南局电示敬悉。兹分复如下：

〔这封电报首先总结了西藏工委的电报中提到的两个较小的事件，接着提出关于统一和分裂分治这样一个争议性话题。〕

……3. 工委来电称：“班禅集团返回后藏，对于恢复固有地位职权、要求分治的思想很深固，与中央对西藏行政统一的方针（现在的西藏地方政府或将来的西藏自治区政府）是相违背的，在中央代表机关西藏军政委员会未成立前，有关西藏行政统一的问题，望多加注意。并在适当的时机，遇到的具体问题，对班禅所属干部多加进行统一的思想教育，逐渐克服分治（实际上是分裂的思想）。”⁷

6. 范明，访问记，1993（划线部分为强调）。

7. 《对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未出版的手记）》，出版日期不明。

指责班禅集团有意阻挠西藏的统一是一项严厉的指控。这项指控惹恼了范明和他在（由西北局干部控制的）日喀则分工委的同僚。因此，分工委在答复中反驳了这项指控，陈述了他们对这些事情的认识。这封由范明拟定的电报说，既然班禅喇嘛已经拥有分治的权力，那么他就不应该在新的政府军政委员会成立之前放弃这种权力。范明通过这个巧妙的论据反驳有关西藏统一的指示，争辩说中共现在支持班禅自治实际上将更有利于军政委员会成立时的总体团结。

我们对上面的指示不甚了解：

1. 如果所指的是这次组织赴京参观团这一具体事实，⁸ 我们认为要求班禅在“行政”上“统一”于“现在的西藏地方政府”，也是有问题，这在目前也是办不到的。班禅赴京参观团在未出发前，我们同计晋美、拉敏〔班禅喇嘛堪厅的两位首脑〕等人个别谈过，以后又召集全体团员开了会。我们曾向他们提出：“你们到拉萨以后，可能要到达赖方面组织统一的西藏参观团”。他们当即表示：如果把他们合并⁸在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团之内，那他们是不可能接受的，如双方人员共同组织西藏参观团（不用西藏地方政府的名义）他们没有意见，但要求最好设两个团长（达赖方面一人，班禅方面一人）。这一要求如达不到，则至少要求班禅方面有一副团长。我们曾将他们的要求转报工委（请查阅原电报）。

2. 如果〔西藏工委给我们的电报中〕所指的“西藏行政统一”是指广义的而言，那就更值得考虑。

班禅集团不但有很深的分治思想，而且有分治的事实，这是满清统治阶级对西藏阶级采取“分而治之”的反动政策所造成的结果。康熙五十二年，“钦差赴藏赏赐金册，内注明将札〔扎〕什伦布各庙宇地方赏与班禅管理，不许别人侵占”（见《卫藏通志》卷五）。

从康熙五十二年⁸起，以迄民国十二年班禅逃亡内地时为止的二百余年中，达赖、班禅两个各自管理自己的土地和人民，形成了“分治”局面。自民国十二年班禅逃亡内地时起，以迄一九五一年西藏和平解放协议签字时为止的约三十年时间，从表面上看：达赖集团统一了整个西藏地区，扫除了“分治”局面，但实际上以班

8. 这指的是1952年第一次去北京的西藏参观团。具体的争议是班禅喇嘛的人是要被并入达赖喇嘛的代表团，还是要作为一个和达赖喇嘛的代表团分立的代表团。

禅为首的这一集团仍然存在。原来属于班禅的百姓依然倾向班禅，达赖、班禅两人之间的隔阂不但没有消除反而加深。

北京举行和平谈判时，班禅集团提出了恢复班禅固有地位及职权问题，中央和西藏地方政府都同意了他们的要求，并在和平协议第五、第六两条里面作了明文规定。所谓恢复十三世达赖与九世班禅彼此和好相处时的地位及职权，实际上就是恢复到满清时的“分治”的局面。

这并不是说我们党也采取了满清对西藏的那种“分治”的政策，而是为了首先解决西藏民族内部的团结问题，为了达赖、班禅恢复和好，必须采取这样一个道路，为今后西藏内部行政统一创造先决条件。

拉萨谈判恢复固有职权问题获得基本解决后，班禅集团去年曾提出今后的领导关系问题，当时他们说如要他们隶属于西藏地方政府是不能接受的。

后经中央批准在西藏军政委员会未成立以前，班禅这一摊子直接归中央人民政府张〔经武〕代表领导。当时中央也并未指示班禅集团在“行政”上“统一”于“现在的西藏地方政府”。

西藏内部行政上是要统一的，应该统一的（是真正的统一），但如何达到统一，则需要经过一个较长时间的过程（因为分治局面已有三百年的历史），〔我们也〕需要创造一些利于统一的准备条件。具体地说，必须等待西藏军政委员会成立了，达赖、班禅双方的负责官员都能参加进去，才能逐渐达到政策、法令以至地方行政的统一。如果今天就提出“行政统一”问题，特别是要班禅集团在“行政”上“统一”于“现在的西藏地方政府”，我们认为不但为时过早，而且会出乱子。班禅不但不会接受，反而会认为我们偏向达赖集团，压迫他们向达赖集团屈服。其结果是不仅要搞坏我们和班禅集团之间的关系，而且会加深达赖、班禅两大集团之间的隔阂。

因此我们请工委、中央西南局对中央关于西藏行政统一的方针、现在的西藏地方政府或将来的西藏自治区政府给以合理的解释，我们下边好办事情，否则是会犯一系列的原则性错误的。妥否指示。

日喀则分工委

一九五二年九月十五日⁹

9. 《对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未出版的手记）》，出版日期不明（划线部分为强调）。

范明还以自己的名义从日喀则（于9月27日）发出一封电报，要求在藏地建立一个以班禅喇嘛为首的单独自治区域。我没有找到这封电报的副本，但是西南局干部平汪记得这件事和范明的电报。他解释了范明推动讨论班禅喇嘛问题的主要动机，他截然不同的说法揭示了事情的细节。

〔班禅在政治上分立于拉萨政府的看法〕不是毛泽东或者周恩来的观点，也不是像张国华那样的西南局干部的观点。张国华等人认为西藏是由达赖喇嘛和他的政府统治的，同意中央优先看待达赖喇嘛的政策。我和张国华及西南局的看法一致。我知道在政治上所有的西藏人是（过去也是）受拉萨的西藏政府统治的。藏地（也就是所谓的“后藏”）有很多地区是直接受拉萨政府统治的，而其他很多地区也必须向拉萨纳税。整个地区都是在由拉萨任命的总督的管辖范围内。满洲〔清朝〕的“前藏”和“后藏”概念仅仅是一个虚构的故事。……

范明仍然在日喀则（和班禅喇嘛在一起）的时候，拉萨西藏工委突然收到一封来自他的电报。范明在电报中建议我们在藏地成立一个以班禅喇嘛为首的自治机关。他的建议让张经武和张国华大吃一惊，立即召集（在拉萨的）西藏工委会议，详细讨论这封电报。大多数人都反对这个建议。大家的想法是这样做会加剧存在于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之间的矛盾，把西藏政府推到对立面，并且在拉萨的西藏人中造成强烈的仇恨。最为重要的是，这会完全破坏毛泽东的渐进主义策略，使争取西藏精英的长远目标变得不可能了。

我是领导层中惟一的藏族干部，所以大家自然会询问我的看法。我强烈认为给班禅喇嘛一个分治的区域不仅在政治上是一个可怕的观点，而且它的历史根据也是站不住脚的。历史上，班禅喇嘛的政府很明显是附属于达赖喇嘛的。而且，创造一个自治的区域有违《十七条协议》，因为《十七条协议》说“将来要在西藏建立一个自治机构”。协议没有说任何关于西藏两个自治机构的事。所以，拉萨的西藏工委完全拒绝了范明的建议。¹⁰

到这个时候，去北京的参观团的问题已经决定。最终，西藏工委支持了西藏政府，也就是说将会只有一个西藏代表团，这个代表团包括西藏的

10. 引自戈尔斯坦、道帛喜饶和司本石初，2004: 181-82（划线部分为强调）。

各个方面（不包括昌都解放委员会下面的地区），团长是西藏外交局局长柳霞。班禅方面取得的最大收获是副团长由班禅喇嘛堪厅的人出任。

但是关于深层次的自治（和开展改革的策略）的争议无法忽略，于是拉萨的西藏工委在1952年10月8日发了另一封电报给日喀则的分工委，表明它的态度：

关于西藏统一方针问题

日喀则分工委九月十五日电及范明同志九月二十七日电均悉。关于统一西藏的方针问题是重要的原则问题，我们必须建立明确的概念，才能在执行协议过程中，顺利解决达赖与班禅集团的团结和工作中所遇到的许多具体问题，才不致迷失方向。

我们认为中央政策是和平统一西藏的方针，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签订的协议是包括班禅集团在内的，是要使达赖和班禅由分裂走到团结，由“分治”走到统一，由落后走到进步。不是分裂分治和保守的方针。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现已实现，我们必须巩固它，必须认识和平统一西藏的中心关键在于争取达赖集团及搞好达赖集团和班禅集团的内部团结问题，否则西藏问题是不能很好地得到解决的。

中央原则上同意昌都划归西藏地方，下放管辖也是为了争取达赖集团并考虑西藏地方政府曾经统治昌都地区近三十年的历史及民族关系，在条件成熟后解决统一西藏问题。

关于根据协议恢复班禅的固有地位职权问题，我们应该保证实现，但不是承认过去满清所规定后藏的扎什伦布寺所管辖的地区有高度自治权利，我们就把它看成班禅后藏分治政府，这是不对的。

即根据西藏历史扎寺所管辖地区仍须向噶厦负责，而西藏政治、行政在形式上还是统一的。十三世达赖统治时期更加统一了。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

而班禅返藏后，按旧规旧例除恢复其过去的固有地位职权外，不能以后藏名义去统治全后藏，这点必须划清明确的界限。根据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的纲要，后藏也无实施区域自治的理由。从目前达赖集团情况来看，亦不能设想以班禅集团管辖地区首先实行区域自治，来推动达赖集团的进步。

你们认识了统一西藏的条件是统一于西藏军政委员会（即中央代表机关），统一执行协议和统一于进步方面，目前按照旧例凡班

禅集团的固有地位职权由中央代表〔张经武〕直接管理，也是为了将来的统一，是对的。但你们未认识到西藏民族内部的团结和统一的重要性，（你们也未认识到）将来还是要要有西藏地方政府的政权或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的。要达到这点，就必须首先解决达赖集团与班禅集团的团结问题。现在达赖集团的情况是怀疑和顾虑中央抬高班禅压低下达赖，怀疑中央是采取民族分裂政策。达赖集团内部虽有亲帝分子对执行协议曾发生动摇，但还是必须确保继续大力对其进行政治争取，而不能像班禅集团一样主观地认为达赖集团是不可争取和不能进步的。班禅集团返藏后的情况是，爱国、拥护中央的进步的一方面必须肯定。他们业已胜利返回后藏扎什伦布寺，与达赖集团恢复团结，巩固它和发展它，但必须看到班禅集团也是封建贵族阶级集团，今天虽然拥护中央，也还包含自私自利、落后的坏的一方面，尤应防止其利用中央势力进行争权夺利、与中央和平团结统一西藏方针相违背的方面。

就是说班禅集团与中央的方针政策是有一定距离的，只能要求“大同小异”。大的必须同，小的可以异，对其进步方面估计过高或过低都会在工作中犯错误。例如中央要达赖做军政委员会的主席而班禅做副主席，但是计晋美不满意。他认为中央派〔高于这两位喇嘛的〕人当主席为好，其实是想把班禅与达赖平列看待，甚至说班禅爱国革命三十年应比达赖地位高。他们不了解中央只派第二副主席，也是为了争取达赖解决统一西藏民族问题。

西藏军区成立时计晋美要求有班禅人员任副司令。收购羊毛问题要用后藏名义派代表。据罗家镐反映，他与班禅商谈时是经过分工委同意的，现罗已答应，而噶厦不同意。此事使我们处于被动。

〔班禅集团〕不愿组织统一的西藏致敬团，一定要保留团长的名义，不愿任副团长。按照〔达赖和班禅之间的〕宗教政治关系，班禅返拉萨应向达赖磕头。计晋美接到通知很久不与噶厦提出，而临时要中央代表出面，结果还说中央代表似乎是看他们力量较弱所以压迫了他们。

以及他们口头上同意班禅警卫营归军区建制及委派四品官以上官员报告中央代表指示，但在执行时又发生了些变化。

这种保守与深固的“分治”思想是必须逐渐克服的，如班禅集团要求分治不承认达赖的领导地位，就不可能搞好达赖与班禅的团结，不团结就不能真正统一西藏。对这些保守落后和“分治”思

想和与中央方针政策相违背的坏的方面，必须进行适当的教育和批评。故工委于九月十日电提醒日喀则分工委注意，在适当的时机遇到具体的问题，对班禅集团干部多加进行统一的思想教育，逐渐克服分治（实际是分裂）的思想，我们认为正确的。

至于如何巩固和发展中央与班禅的团结，搞好达赖与班禅的团结，以达到统一西藏的策略的步骤问题〔我们认为〕：

第一、实事求是地恢复班禅的固有地位职权。但这问题很复杂，因为历史很长（如后藏地区的人民班禅所辖的负担为十分之三，而达赖萨迦所辖人民负担较重）。班禅离开西藏近三十年又有许多变化。西藏噶厦增加了收羊毛皮革税，过去是没有的。同时满清所规定的也不完全合理，还需适合现在情况和照顾将来情况等，故中央不采取硬性决定，同意由他们双方派出小组进行协商，遇事时了解具体情况，报告中央决定后，再由中央代表出面调解。

第二、要团结争取班禅集团与中央方面一道争取达赖集团。你们应该认识争取达赖的重要性（不要说达赖比班禅高，只说两位藏族人民领袖应该团结一致）。思想上承认由达赖与班禅出面统一西藏民族的领导地位，巩固和发展班禅爱国进步的方面，耐心教育和适当批评、克服其保守落后的方面，以主动团结和进步的措施去影响和推动达赖集团的进步。不能用“分治”的刺激形式影响达赖集团进步。即意味着一切进步的改革措施还须注意照顾西藏全局。

最近噶厦拟召集会议讨论减轻债务与减免乌拉的问题，决定邀班禅的代表和所有宗的代表（班禅所辖四个宗亦在内，要派代表参加）一起讨论，联合实施改革。等噶厦用书面正式呈报中央代表后，再详告你们。希望班禅能派代表出席与会，并在会上推动全藏进步。¹¹

为了公平合理地解决尚未解决的恢复班禅固有地位职权的问题，望范明同志于检查工作完毕后，邀计晋美等一道来拉萨，以便继续与噶厦商谈，求得更进一步地、更好地解决达赖与班禅之间的团结问题。

上述意见是否正确请西南局和中央指示，以便遵行。

西藏工委

一九五二年十月八日¹²

11. 这指的是改革大会和改革局。第十七章中将会介绍。

12. 《对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未出版的手记）》，出版日期不明（划线部分为强调）。

不清楚范明是否通过日喀则分工委间接或者直接地答复了这封电报，但是三个星期之后，毛泽东和中央进行了干预，决定支持达赖喇嘛至高无上的地位。在10月27日，他们给拉萨发去如下电报：

同意西藏工委关于西藏统一方针的意见

西藏工委十月八日电及转来日喀则分工委九月十五日电均悉。中央认为西藏工委的见解是正确的，望即本此精神进行工作。

在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之下西藏（指前藏后藏和阿里地区，在条件成熟时还可包括昌都地区）地区的统一，对于建设和发展西藏，对于争取团结全国的藏族都是有利的。统一是有困难的，因此需要慎重、稳步实现，不可急躁，日喀则分工委注意到这点是好的。但决不可采取先分治后统一的步骤。采取这样的步骤，无论对目前和将来，都是不利的。因此，统一的西藏自治区，是不可动摇的方针。

西藏内部的统一有赖于达赖和班禅间的团结，这已经不只是一种看法，而且是经过两年来的事实所证明了的。但是在团结达赖和班禅，即谋求和平统一西藏内部时，一方面固然要估计到班禅方面在一定范围和一定程度上的进步性，并善于推进和运用这种进步性。但同时必须认识和估计到达赖的地位和影响，不仅在西藏地区，而且在整个西藏民族中都比班禅为高的事实。

因此在争取和平解放西藏、和平统一西藏及和平解放西藏后我们在西藏地区的各种工作的政策，都不能不以争取达赖集团为首要任务。凡有利于这一任务实现的事情，应坚决去做（这里包含团结和斗争两个方面，但斗争是为了团结，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例如对“人民会议”的斗争）。凡不利于这个任务实现的，即不应当做，或暂不做（例如军政委员会和改编藏军就是暂时不做的例子）。我们在班禅方面的工作，也必须照顾和服从这个首要任务，因此对班禅方面也不能只有团结而无必要的批评与斗争。

争取达赖集团是一件长期的和复杂的工作，但经过争取、教育和必要的斗争，经过他们内部的分化，是一定能够而且必须达到这个目的的。因此，对于以争取达赖集团为首要任务的方针，不可有所动摇。

各项具体问题例如班禅与达赖之间的争执等，你们在处理时，可随时报告中央，请示中央。

中央

一九五二年十月二十七日¹³

虽然这个决定看起来很明确，但是范明没有就此罢休，西藏工委内部的矛盾继续恶化。回到拉萨之后，范明继续推动同等对待班禅喇嘛和达赖喇嘛，现在的理由是中央提倡统一的西藏，强调争取达赖喇嘛但并不排斥同等对待班禅喇嘛和达赖喇嘛。因为他们两人都是在中央政府统一领导下的，并非明确意味着班禅喇嘛的地位要次于达赖喇嘛的政府。他还尽量避免提及以上的指示，而是更多地把焦点放在毛泽东对张国华敌视班禅喇嘛的行为的批评上。他在一次接受访问中说：

毛主席严肃地批评了张国华在没有得到毛主席允许的情况下解散班禅警卫营的行动。班禅的警卫营是由中央政府创建的，所以张国华怎么能简单地解散并把它并入自己的部队？这样做无组织无纪律，是不对的。毛主席非常严厉地批评了张国华，从那时起他们〔西南局的官员〕就打心眼里恨我们了。每一次分配武器和娱乐物资等东西的时候，他们会把班禅集团看作是达赖集团的一部分，而不是由中央直接领导的平行的集团，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了。¹⁴

■ 北京的西藏工作会议

拉萨持续的矛盾导致中央在1952年11月指示西藏工委召开一次解决内部混乱的会议。这个会议未能奏效，于是中央采取了进一步措施。在1953年10月底，中央把事件的主要当事人叫到北京参加一个重要会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主持了这个会议。被叫来参加会议的人有西南局的张国华、王其梅以及西北局的范明和牙含章。¹⁵他们在三个多月的时间里会面59次。¹⁶从一开始讨论就很激烈，双方在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之间的关系以及如何对待他们各自的立场问题上表现出巨大的分歧。

-
13. 《对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未出版的手记）》，出版日期不明（划线部分为强调）。
 14. 范明，访问记，1993（划线部分为强调）。
 15. 赵慎应，1998: 84-85。慕生忠（西北局）最初参加了这个会议，但是他只开了八次会就离开了北京。
 16. 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1995，1954年2月10日条目。

这次工作会议的一个关键是牙含章的观点。李维汉曾经指示他详尽地调查班禅喇嘛和达赖喇嘛问题的历史依据，尤其是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之间的相对权威。¹⁷ 牙含章虽然来自西北局，但是他最后却支持了达赖喇嘛政府和西南局的观点。牙含章报告说他们的宗教地位没有什么差别，但是就政治权力而言，达赖喇嘛更大一些，中国反复提及的前后藏的说法从历史上看并不正确。在西藏内部和边界上的所有军队都是西藏政府（噶厦）派出的，班禅喇嘛的堪厅没有任何军队。¹⁸ 牙含章的报告弱化了范明主张的历史依据，因而惹恼了范明。于是他说牙含章是内奸，并讽刺他应该叫牙含奸而不应该叫牙含章。¹⁹

这个小范围的会议在北京的民族工作领域名声很不好，这是因为与会者的言语非常辛辣和刻薄，也因为双方的立场都很强硬。一天，邓小平对与会者提出批评，嘲讽说他们的会议可以和结束朝鲜战争的尖刻谈判相比：“这简直要开成北京的板门店会议了。”²⁰

最终，这场争论由于外部压力而平息了。这个外部压力源于整个中共党内一场更大的冲突，即 1954 年整肃高岗的运动。高岗是一位很有权势的高级干部，当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他是一个喜欢争权夺利的左倾分子，反对刘少奇和周恩来的较温和的经济政策。1953 年 6 月在北京召开的一次经济会议上，他攻击薄一波是刘少奇的代理人，随后毛泽东认定他在党内搞派系。在 12 月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撰写了一份要加强党内团结、警惕在同志中造成不团结的个人主义和骄傲自满的指示。这份指示虽然没有点名，但却是针对高岗的。随后这份指示作为一项决议在 1954 年 2 月召开的中央四中全会上公布，决议名称为《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上面虽然没有提及姓名，但是指出高级干部已经破坏了党内团结，正试图夺取党的控制权。随后，中央召开了一次针对高岗的非正式会议。在这次会议的第三天，高岗自杀未遂。但是在 1954 年 8 月 17 日，高岗再次自杀，这一次他成功了。²¹

17. 降边嘉措，访问记，1993，北京。

18. 李维汉的秘书赵范参加了这个会议并作了笔记。后来他写了一本关于这个会议的书，但是中国政府至今没有允许这本书出版。

19. 平汪，访问记，2000，北京。

20. 赵慎应，1998: 84-85。邓小平（西南局）当时已经被调到北京出任中共中央秘书长。

21. 见泰维斯（Teiwes），1993b: 130-65。

西藏工作会议的参加者注意到这件事，因为邓小平带了一份决议的文本到会上，要他们仔细学习，认真领会中央精神。²² 党内的个人主义和不团结问题现在成了高度危险的问题，这起事件对范明产生了特殊的冲击，因为高岗在政治上是跟彭德怀和西北局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现在范明重新检讨了他的不妥协态度，极不情愿地接受了达赖喇嘛比班禅喇嘛地位高的政策。

北京的西藏“板门店”会议提出一份冗长的报告。报告总结了争议和结论，否定了范明关于班禅的策略和观点。平汪回忆说：

经过几个月的激烈争论（我不在场）之后，毛泽东亲自决定在西藏达赖喇嘛的地位要比班禅喇嘛高，从而解决了这个问题。毛泽东用很形象的方式说明了这一点。他横向伸出食指和中指（其余指头弯曲），说达赖和班禅不是这样的。然后他把这两个手指竖起来，说他们就像这样〔一个指头比另一个指头高〕。换句话说，达赖喇嘛是在班禅喇嘛之上的。也就是说，毛主席决定西藏应当是一个以达赖喇嘛为首的统一的西藏。²³

这份总结是关于这场冲突和应当推动的政策的一份重大声明。它尖锐地批评了西藏工委官员的个人失误和自大，以及把个人利益凌驾于集体利益之上的行为。同时，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独特的窗口，使我们得以了解党内的不和在最初的两年半里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伤害了党的西藏工作，因此值得全文引用。

西藏工作讨论会议向中央的总结报告

自从“和平协议”签订，人民解放军和党政工作人员进入西藏以后，在西藏工委领导之下，两年多来，在一个少数民族的陌生的艰苦环境中间做了许多工作，基本上执行了中央对西藏地区的方针和政策。驻藏部队和工作人员，在筑路生产、运输补给、统战、财

22. 赵慎应，1998: 85。

23. 引自戈尔斯坦、道韩喜饶和司本石初，2004: 182。降边嘉措也曾谈到毛泽东用手指对这种关系做的生动描述（访问记，1993）。另外，赵慎应（1998: 88）也提到毛泽东的手势，但是他说这发生在决定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赴京行程的待遇问题的时候。这一行程将会在后面介绍。

经、贸易、卫生、文教，以及外交、公安、情报等工作方面，均是有成绩的，而且成绩是主要的。这些成绩的获得首先是由于中央和毛主席的正确英明的领导，同时是与西南局、西北局和西南、西北军区的正确领导分不开的。

两年多的事实证明，中央对西藏工作的指示是完全正确的和及时的。

但是西藏工作中，是有缺点的，而且是有错误的。主要的是西藏工委的党委制和集体领导不够健全，西藏工委内部存在着不团结的现象。对西藏基本情况的分析，统一西藏步骤问题，统一战线问题，改编藏军问题，以及一些财经政策问题，工委内部发生了带有原则性的分歧意见。这些分歧意见长期没有得到解决，因而也影响了工委内部的关系。

一九五二年十一月，中央注意到上述情况，指示西藏工委召开委员会议，把问题摆到桌面上，求得一致的意见和改善同志间的关系。工委会议在个别问题上取得了一致的意见，而在其他问题上则仍然没有消除分歧。

中央鉴于上述情况的严重性，指定中央统战部组织在京西藏工委负责同志张国华、范明、慕生忠、王其梅、牙含章等开会，讨论西藏工作（慕生忠同志因事离京，只参加了八次讨论会）。

讨论从分析基本情况，检讨方针政策着手，然后进一步检讨党的团结问题，求得打通思想，分清是非，统一认识，会议共计举行了五十九次。

对西藏的基本情况与党在西藏的全面工作，展开了热烈的争论和互相批评，这是必要的。但是西藏工委内部长期存在的同志间的关系不够正常的情况也反映到这次讨论会上。（争论中还带有不同程度的个人意气用事的成分，不够客观冷静，互相帮助的精神还不够，这是会议中一个时刻表现出来的缺点。）

会议进入讨论党的团结问题时，有了很大的进展。中央政治局向十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稿），提高了同志们的警惕，因而迅速克服了意气成分，于是分歧的争论最后获得了基本上一致的意见，同志间的关系在首先进行自我批评的基础上，也获得了比较满意的改善。从整个会议的过程来看，虽然走了一些曲折的道路，但最后的结果是比较圆满的。

会议对于西藏目前基本情况的估计，反帝爱国统一战线问题，达赖与班禅两集团的关系问题，财经工作问题，党内团结等问题，均已取得了基本上一致的认识。兹分别报告如下，请中央审查批示。

(一) 西藏目前基本情况的估计与总的方针任务：

西藏和祖国很早以来就存在着密切不可分离的关系，是伟大祖国的领土的一部分。但从辛亥革命以后，西藏的统治者在帝国主义控制和指使下，脱离了祖国而投靠了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控制着西藏，签订了不平等条约，取得了许多政治、经济、军事上的特权，并且占去了西藏边境的若干领土。由于全国人民反帝斗争的发展，由于西藏民族内部反帝力量的存在（其中包括一部分上层——贵族和活佛），因而帝国主义一直未能把西藏完全征服。在这期间西藏处于半殖民地状态，而对祖国采取“独立自主”的态度。

和平协议的签订，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以后，西藏形势已起了划时代的根本性的变化，半殖民地状态已经结束了（帝国主义残余势力和影响还是存在的，不容忽视）。西藏民族回到了祖国大家庭的怀抱，实现了祖国对西藏的统一。西藏地方政府成为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的一级地方政权。西藏地方政府与中央人民政府的关系目前还不正常，但这种不正常的状态也在逐渐改善中。

西藏已经成为祖国大家庭的组成部分。两年多来，西藏内部的爱国力量，在党的组织和进藏部队的领导支持下，正在逐渐增长着，逐渐地对西藏的政治起着重要的以至于决定性的作用。另一方面，公路尚未完全修通，生产自给尚未达到，上层对我们还有很大顾虑，民族隔阂还很深，因而我们在西藏还未站稳脚跟，还没有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同时，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在西藏还保持了潜伏势力和相当的影响，对他们的挑拨破坏作用，绝不能放松警惕。但只要西藏工委坚决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不犯重大错误，即可帮助西藏民族逐步地肃清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影响和潜伏势力，而使爱国力量逐步壮大起来，取得主导和决定性的地位。

在考虑西藏全盘工作的时候，对西藏民族问题的几个重要情况必须予以十分注意。这些重要情况就是：

一、西藏民族和汉族之间存在着很深的民族隔阂，再加上帝国主义的挑拨离间，他们对今天的新中国和中央的政策也还存在着怀疑和顾虑。

二、喇嘛教对西藏民族给以严重的损害，但它又是在整个西藏民族间有着根深蒂固的信仰。中央在一九五二年十月二十六日致西藏工委的电报上明确指出：“必须充分估计到佛教在西藏民族的悠久历史，及其深入人民的传统影响，以及达赖、班禅在各阶层人民中享有很高的宗教信仰。同时充分认识到宗教问题是具有长期性、关乎国际关系的，而且西藏地区怎样对待佛教问题在政治上具有重要意义（宗教问题需要我们花上很长时间来处理）。”

三、西藏民族今天还处在农奴制度的封建社会中。虽然社会主义的经济力量已有输入，但那里的农奴制度，今天基本上还是原封未动，这种农奴制度的上层建筑是政教合一的僧侣贵族专政，它今天（既）统治着西藏民族，又还能代表西藏民族。

经中央批准的中央统战部与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提出的“关于在少数民族地区是否宣传及如何宣传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意见”中指出：

过渡时期在民族问题方面的总任务是，“巩固祖国的统一和各民族的团结，共同来建设伟大祖国的大家庭。在统一的祖国大家庭内，保护各民族在一切权利方面的平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在祖国共同事业的发展中，与祖国的建设密切配合起来，逐步地发展各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逐步消除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各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使落后的民族得以赶上先进民族的行列，共同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党在民族问题方面的这个总任务，是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一个组成部分。”上述的总方针和总任务，对西藏民族工作来说是完全适用的。

为了完成西藏民族逐步改造成为社会主义民族的这一历史任务，必须根据西藏的具体情况，大体上要分作如下几个步骤：

从和平解放开始到今后若干年之内，基本是以逐步实现《十七条协议》为主要任务。《十七条协议》就是目前党在西藏地区团结西藏民族的纲领。《十七条协议》的基本任务，就是反帝爱国，争取达赖集团，团结达赖、班禅，培植西藏民族中的爱国主义思想和爱国力量，实现统一的区域自治。这为第一步。然后在适当时机进入第二步，实行土地改革，消灭封建剥削，变农奴制度的西藏为人民民主的西藏。西藏民族的土地改革，必须由西藏人民自己去进行。并要采取“曲折迂回的步骤和更为温和的办法”。……

在土地改革基本上完成以后，西藏民族即转入有计划的经济、文化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阶段，逐渐向着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必须指出：教育西藏民族的劳动人民逐步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和培养西藏本民族共产主义干部，是完成这一历史任务的重要关键。

(二) 反帝爱国统一战线问题：

巩固和扩大反帝爱国统一战线，是目前党在西藏的主要任务之一。中央在一九五二年八月十八日致西藏工委电报中说：“你们今后在一个较长时期的工作，应围绕取得上层的支持，首先是争取和团结达赖和班禅及其上层集团的大多数，以便争取时间，解决生产自给和运输问题的主要任务。其他的工作均应服从这一任务。”因此，西藏地区的反帝爱国统一战线，在一定时间内是上层的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的纲领，在一定时期内基本上就是《十七条协议》。而我们在西藏地区的党的组织和人民解放军，则是反帝爱国统一战线的领导力量。对这种统一战线的参加者不能要求过高，除了帝国主义走狗和国民党特务分子外，都应成为统一战线的对象。凡是反帝爱国的人，不论其程度差别如何，凡是在不同程度上接受《十七条协议》而愿意和我们或多或少合作的人，我们都积极地争取或团结他们。

统一战线内部，可按照他们对反帝爱国的态度，区分为左、中、右三派。左派是反帝爱国比较坚定的，中派是有怀疑和动摇的，右派则是对协议有抵抗情绪的，甚至具有亲帝思想，对祖国有分离思想的，还会包含一部分政治面貌暂时弄不清楚的分子在内。把反帝爱国统一战线内部区分为“爱国派”、“中间派”和“顽固派”（顽固派又分亲帝、分离、旗子三派），是不恰当的。当然统一战线内部势必还会有隐藏的帝国主义走狗和国民党特务分子在内，绝不可放松警惕。

在反帝爱国统一战线内部，毫无疑问我们应该扶植左派，但同时必须尽力争取中派，否则我们和左派都要陷于孤立。只有争取了中派，才有利于壮大左派（左派即有同盟者，并且中派的部分也是可以左转的），才有利于分化和争取右派（右派处于孤立地位）。对右派也必须耐心地进行教育。特别对其中影响较大的分子，必须做到仁至义尽。至于隐藏的帝国主义走狗和国民党特务分子，在处理时必须依据确凿证据，并要看时机是否成熟，如果本人作恶不多或危险性不大，在上层中还有影响，也不可急于打击。对那些逃往国

外的分子，也应不放松争取。不管过去政治态度如何，只要他们愿意脱离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回到祖国土地上来，我们仍应表示欢迎。

达赖、班禅两集团里面，都有左、中、右三派。也都会有隐藏的帝国主义走狗和国民党特务分子，不应看作是整体。达赖和班禅在阶级本质上没有区别，从现在的政治态度来看达赖属于中派，但有可能向左转化，而班禅则是属于左派的。认为达赖属于左派中的“顽固派”，是不恰当的。在策略上对我们也是不利的。达赖属于中派，班禅属于左派，这是他们当前政治态度上的一个原则性的区别，否认这种区别，也是不恰当的。

达赖、班禅是西藏民族的两面旗子，但现在都还年轻，都被某一派的力量所影响和掌握。我们必须尽一切可能争取他们，这对党在西藏的工作有很重大的意义。

(三) 达赖集团与班禅集团关系的问题：

如何正确处理达赖、班禅两集团的关系问题？中央在一九五二年十月二十七日致西藏工委电报中，早做了明确指示：“必须认识和估计到达赖的地位和影响，不仅在西藏地区，而且在整个西藏民族中都比班禅为高的事实。因此在争取和平解放西藏、和平统一西藏及和平解放西藏后，我们在西藏地区的各种工作的政策，都不能不以争取达赖集团为首要任务。凡有利于这一任务实现的事情，应坚决去做（这里包含团结和斗争两个方面，但斗争是为了团结。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例如对“人民会议”的斗争）。凡不利于这个任务实现的，则不应当做，或暂不做（例如军政委员会和改编藏军就是暂时不做的例子）。我们在班禅方面的工作，也必须照顾和服从这个首要任务。”

两年多来，西藏工委也是基本上按照这个指示的精神去做的。但有一些急躁情绪，表现在急于想要成立军政委员会、军分区，以及改编藏军方面。

达赖、班禅两个集团在阶级本质上来说，是相同的。都是西藏的封建贵族和僧侣中的上层分子所组成的。在宗教方面来说，达赖、班禅在西藏人民心目中都有很高的信仰地位，藏人喻之为“太阳月亮”。但从历史上、政治上、实际力量上加以分析的话，则两者的区别是很大的。达赖及其集团在西藏处于优势地位，和班禅及其集团比较起来，他所统治的地区很大，人口很多，力量很强，占据着西藏的政治宗教中心。在解决整个西藏问题上，起着决定性的

作用，因而达赖集团和西藏地方政府具有全藏代表性。甚至我们今天也不能不以争取达赖集团向中央靠拢为当前重要任务，这是党在西藏目前工作中具有决定意义的关键。但是达赖不能替代班禅，班禅拉让也不隶属于噶厦，为了照顾达赖、班禅两集团的团结，避免争执，在有关全西藏的问题上，尽可能争取以达赖、班禅两个人的名义出面，是比较适合的。

两年来的事实证明，达赖集团是逐渐向我靠拢，而不是逐渐向我疏远；是逐渐向好的方面发展，而不是逐渐向坏的方面发展。为了稳定和争取达赖及其集团的大多数更向中央靠拢，成立军政委员会与改编藏军应有意识地拖到公路通车到拉萨后再作考虑。这样做对我有利。改编藏军的方式也应该是“和平”（藏军叛变则是例外）而不采取“武装（强制）改编”的方式。

班禅在西藏民族中，在喇嘛教里，有和达赖几乎相等的威信。因而历史上满清政府和英帝国主义者，都曾企图利用班禅以对付达赖，挑拨、分化西藏民族内部的团结。结果造成了达赖和班禅的分裂与班禅的逃亡。但是班禅集团没有投靠帝国主义，而是投靠了旧中国的统治者，因而保持了和祖国的关系。西藏和平解放以后，又是由我们送他回藏，并支持他基本上恢复了固有的地位和职权，所有这些决定了班禅集团和中央比较亲近的态度，并在反帝爱国方面表现较为积极。党的团结班禅集团的方针，是确定不移的；另一方面，班禅集团又不甘心自己弱小，想扩大自己的势力（如曾要求成立三个基巧，堪厅〔藏语：朗玛岗〕扩大为八个局等），想和达赖集团并列起来。为了取得中央方面对他们的支持，他们必须表现出一些比较进步的姿态；做出一些比较进步的措施，所有这些都是很自然的。

达赖集团今天对中央还有若干怀疑和顾虑，历史上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统治阶级曾经想利用班禅代替达赖，因而即使到今天，达赖集团还经常害怕我们也许会采取扶植壮大班禅集团以代替达赖的政策。因此，我们在团结扶植班禅集团及利用其进步性方面，必须谨慎。凡不利于争取达赖集团，不利于西藏今后统一的措施，都应说服班禅，放弃这种做法。例如班禅集团曾要求成立三个基巧，堪厅扩大为八个局等，应说服他们不做。

党在西藏的方针是使西藏逐渐走向统一，成立统一的自治区，而不是先分区自治，而后走向统一。认为“班禅地区将来可以考虑

先搞区域自治，以便促成早日实现统一的区域自治”，是不恰当的。因为这是不利于争取达赖集团和西藏今后统一的步骤的。但把这种意见和其他的一些意见批评为“党内分治思想”和“立场问题”，也是不恰当的〔这指的是对范明的批评〕。

班禅地区的进步措施，在适当条件下，也可允许多做一些，但不宜过于突出，影响到对达赖的争取。

应注意向班禅集团做工作，逐渐说服他们承认达赖集团在西藏实际上的领导地位，要他们善于对达赖集团让步和等待，并和我们一同争取达赖集团。同时也应向达赖集团做工作，说服他们尊重班禅的地位。

从现状来看，达赖、班禅两个集团是两个摊子。并且彼此之间不团结，隔阂还很深。因此，西藏工委一九五三年二月五日总结报告中关于说服班禅集团统一于现在的西藏地方政府的检讨是恰当的。达赖、班禅两个集团都应待将来条件成熟时，统一于军政委员会，以后再发展为统一的自治区。至于把说服班禅集团统一于西藏地方政府的意见和其他的一些缺点批评为“为了争取达赖不惜牺牲班禅利益”也是不恰当的。

对于班禅的固有地位与职权，从现在材料来看，基本上是已恢复了，如果还有些固有职权尚未恢复，不恢复也可以过得去，勉强恢复反而有害于达赖、班禅间的团结时，也可以不予恢复。如果双方还有争执的问题，我们应采取调解的态度，说服双方互相尊重让步，协商解决。

(四) 财经问题：

西藏的财经工作方针，中央在一九五二年四月六日的电报中，已做过明确的指示：“第一条是精打细算，生产自给，并以此影响群众，这是最基本的环节。公路即使修通，也不可能靠此大量运粮，印度可能答应交换粮物入藏，但我们的立足点应放在将来有一天万一印度不给粮物我军也能活下去。……第二条可做和必须做的，是同印度和内地打通贸易关系，使西藏出入口趋于平衡，不因我军入藏而使藏民生活水平稍有下降，并争取使他们在生活上有所改善。”两年多来，西藏工委基本上是执行了上述指示的。但在执行当中是有缺点的，主要表现在采购运输当中，未能及时调整价格和大批牦牛死亡，损害了一些基层群众的当前利益。粮价的问题迄今也未能很好解决。这两个问题关联到的群众是相当多的。

西藏地域辽阔，交通不便、人口稀少、生产落后、剥削惨重，人民生活十分痛苦。因此对西藏的总财富宁肯低估，尽量不取。毛主席过去指示：“进军西藏，不吃地方”。

按中央一九五二年四月六日指示的精神，也都是要我们在西藏生产自给。但是过去两年多来，由于生产自给还未能做到，内运粮食未能接济上去，因而在西藏地区不能不采购部分粮食和牛羊，也就不能不影响到物价上涨。采购运输又不能不通过上层，加上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因而对基层群众的利益损害了一些，已引起群众的普遍不满情绪（后来加以检查和赔偿，群众中的影响已有改变）。但不应把这些缺点看成是“单纯的财政观点”。

要从根本上改变上述情况，只能从下述四个方面加紧努力。即一、迅速修通到拉萨的公路；二、积极生产，争取自给；三、开辟内外运输道路，除了西藏运输线外，去冬又开辟了北运输线，加强向印度购物和推销土产；四、紧缩开支，精简机构，过去已经这样做了，但还不够。除了必须要留的武装部队和工作人员之外，其他人员暂时一律送回内地，学习或另外分配工作。一切方面都要贯彻一个“紧”的精神，咬紧牙关，熬过最艰苦的两三年。

党在西藏的财经方针的基本精神，是保证军供、兼顾民需。因而我们尽量做到不取西藏人民的粮食物资，而且尽量给人民做点好事，给人民一些物质利益。物价上涨和采购运输价格问题，应由西藏工委与西藏地方政府进行协商予以适当处理。至于我们在西藏地区创办农场和牧场问题，也要和西藏上下层协商处理，在不与西藏人民的利益冲突的原则下，是可以办的。

西藏市场狭小，物资缺乏，在财政开支上采取“紧”的方针是必要的。今后仍应贯彻下去。西藏财政工作上是有缺点的，但不是财政上的“保守一点”。

藏币问题，这是关联到西藏地方政府与中央的关系问题，同时也关系到西藏人民的切身利益的问题。从过去的情况来看，“不理不问”的方针，是适当的。今年如果能够取得西藏地方政府的同意，采取补助西藏地方政府行政经费的办法，把发行和印铸权收回来，是有利的。

（五）党内团结问题：

西藏工委内部曾经存在着比较严重的不团结现象。主要表现在党委制不够健全，集体领导没有很好形成，工委内部存在的政策观

点上的分歧长期没有得到解决，以及工委负责同志之间的关系不够正常等方面。由于这些现象的存在，以致对党的工作起了一定程度的妨害作用。并且由于负责同志没有作出团结的表率，对下边干部也造成了一些不良影响，甚至对上也造成了若干不良影响。

西藏工委内部产生不团结的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

第一、这是由于工委同志对党的团结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对集体领导的重要性认识不足，还加上工委同志对自己所担负的严重的政治责任认识不足而来的。应该了解，西藏地区是一个工作条件极其复杂的少数民族地区，西藏工委担负着严重的政治任务，承担着党中央全国人民的寄托。应该承认：工委委员们本身的政治水平和思想水平是不高的，马列主义的修养是不深的。只有在中央领导之下团结一致，兢兢业业，才能胜任这一任务。而工委内部相反还发生了不团结的现象，工委同志把一部分精力花在内部问题上，抵消了本身的力量，造成党的工作一些不应有的损失，这是一件很痛心的事情，应深刻地引以为戒。

第二、这是由于工委某些负责同志还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个人主义思想，缺乏谦逊的态度与自我批评的精神，计较个人得失，自负，有些傲气，对别的同志不很服气，互相不很尊重，互相帮助不够，强调个人威信和自尊心，不耐烦倾听不同意见和批评，以及争论当中带有个人意气成分，强调个人意见正确等，由于这些错误思想的存在，因而在个人与集体的关系方面，就发生了不很对头的想法。把个人摆到组织之上，或者没有尽到个人在集体中应尽的一分责任，这就是党委制不够健全与集体领导还未能很好建立起来的思想根源。也是负责同志间的关系没有搞好和争论的问题长期没有解决的思想根源。

至于责任问题，主要责任应该放在西藏工委的几个主要领导同志身上。至于会师没有会好，对党内团结也有影响，在这一方面由于十八军入藏部队是主力，居于领导地位，又是先进去的，所以十八军的领导机构的责任应该是多一些。

从这次会议上检查揭发的问题和个人检讨当中，更深地体会到西藏地区党内的团结也是西藏工作成败的关键。正如十届四中全会关于增强党的团结决议所指出的：“党的团结是党的生命”。今后西藏地区党的组织，尤其是党的领导机关，必须根据中央指示和西藏地区党组织的自身经验在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百倍努力地

巩固和加强党的团结。因此下面的几条重要的经验教训是应该经常记取的：

第一、应该经常记取党的团结和利益高于一切。应当把拥护和巩固党的团结作为指导自己言论和行动的标准，即有利于党的团结的话就说，不利于党的团结的话就不说；有利于党的团结的事就做，不利于党的团结的事就不做。“党的团结必须是也只能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团结，在正确的政治原则和组织原则的基础上的团结”（这是七届四中全会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的要点）。西藏工委今后应该坚持执行中央上述决议，努力增强党内团结。

第二、坚决反对个人主义和分散主义。今后处理任何党内问题，都要把出发点搞对头，也就是立场搞对头。

从党的集体利益出发，而不夹杂任何个人主义的成分进去，这样团结就一定能搞好。七届四中全会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指出：“反对把自己领导的地区和部门当作独立王国，反对把个人放在组织之上，反对不适当地过分地强调个人的作用，反对骄傲情绪和个人崇拜”。这对西藏地区党的组织更加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第三、严格遵守民主集中制与集体领导原则，这是“党的团结的重要保证之一”（十届四中全会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要做到这一条，必须把自己放在集体当中的适当的位置，尽到自己在集体当中应尽的责任，做到这一点，就不致强调个人的作用，不致发生骄傲的情绪。

第四、对于党委内部的不同意见和争论，必须实事求是，服从真理，采取及时的开诚布公、诚恳坦白的态度，把问题提出来，互相交换意见，摆到桌面上，加以解决，真理要依靠集体的力量和集体的智慧才能发现。所以必须贯彻党的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这样做了，还不能解决问题，就要依靠中央，依赖中央，请示中央，就可以得到真理。党委内部在工作上发生争论是允许的，但是西藏工委过去这种争论，既未能及时采取适当办法求得解决，也没有及时报告中央，以致影响了党的团结，引起了工作上的某些损失，这是很不好的，应该引以为戒。工委内部的争论，在未经工委许可前，不宜在下面干部里面交谈，特别是对中央的指示如有不同意见，更宜及时向中央报告。

第五、发扬党内民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加强党内团结的不可缺少的武器。凡涉及到同志与同志间关系问题时，首先要批评

自己，求其在我，然后再去帮助别人。也只有把自己错误的东西抛弃了，才更便于帮助别人。

为了西藏工委和西藏党组织今后内部的团结，如何做好这次会议的传达，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应该采取如下的办法：首先在西藏工委内部依据十届四中全会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及中央批准西藏工作讨论会议向中央的总结报告的指示进行传达。使工委委员先领会会议精神，取得认识上的一致，然后再召开高级干部会议，进行传达。由工委负责同志先在会上进行自我检查，作出团结的表率，启发下边的同志同样去做，西藏党的团结才有保障做好。

参加这次会议的同志们都认为为了党的事业，自己必须努力学习，改正自己的错误和缺点，加强团结，做好工作，完成党给予我们的任务。

一九五四年二月十日²⁴

在这个重要的会议报告提出来的一个月之后，中央将其广泛下发。随着报告一起发出的这份严厉的批评电报明确地表达了中央的不悦。

中央批准西藏工作讨论会议向中央的总结报告的指示

一九五四年三月十一日发西藏工委并西南局、西北局并告各中央局、各大军区党委：

西藏工作讨论会议向中央的总结报告，已经中央政治局讨论，中央批准这个报告。

几年来，西藏工委基本执行了中央关于西藏工作的方针政策。我党我军以及我进藏工作人员，在陌生的艰苦的环境中，为了党的事业，为了祖国各民族的团结以及西藏民族的解放和发展，做了很多工作，获得了很大的成绩。

但西藏工作中是有缺点、有错误的。最严重的是西藏工委的几个主要负责同志，因个人主义的滋长而产生的不团结现象。这次西藏工作讨论会议揭发和批评了这种不团结的现象是好的、完全必要的。

但是必须指出：过去西藏工委几个主要负责同志之间的不团结，已经发展到一种严重的程度。他们对工委内部的团结问题和对西藏

24. 《对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未出版的手记）》，出版日期不明（划线部分为强调）。

问题上的许多原则性的分歧意见长期争论而未能解决，并表现出无力加以解决。更严重的是表现在有关西藏工作的方针政策上的争议，虽然中央早已有了明确指示，但工委本身也仍然未能消除分歧。

党内争论是允许的，但西藏工委某些负责同志因为骄傲自负，计较个人得失，闹个人意见等，致争论和分歧长期不能解决，则是不对的。他们争论的问题本身，表面上看来是原则性的问题，而实质上这个争论是在为个人的利益作辩护，个人利益掩盖了党的利益。为了争执一个原则问题，却破坏了另一个马列主义的根本的原则——党的团结的原则。西藏工委几个主要负责同志的主要错误就在这里。为了个人意气及个人利益而坚持争论，却抛弃了一条大原则——党的团结这一最高原则，因而就不能不犯了一个损害党的不团结的大错误。西藏工委几个负责同志在所犯错误中应得的主要教训也就在这里。这是应该永远记住并深刻引以为戒的痛苦教训。

西藏地区直接受着帝国主义的威胁，并且帝国主义在西藏的潜伏势力和反革命分子现仍未消除，如果我们党内不团结，个人主义得到发展，即我们不仅无力去改善西藏的情况，战胜内外敌人，进而彻底改变西藏的面貌，而且敌人会利用我们的不团结的现象来破坏我们，会在我们内部寻找他们的代理人，来瓦解我们，使我们在西藏的工作归于失败。所有这些，中央要求西藏工委同志加以严重的注意和警惕。

西藏工作讨论会议开会的时候，正值中央举行十届四中全会。四中全会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建议而通过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直接教育并警惕了参加讨论会的西藏工委同志。讨论会所一致同意的向中央的报告，就是在批评个人主义、提高了党的团结的觉悟的基础上获得的。这说明依靠党的团结和中央的领导，是可以纠正任何错误并克服任何困难的。西藏工委参加这次会议的张国华、范明、牙含章、王其梅等老同志，曾一致向党保证，回西藏后要改正自己的错误和缺点，增强党的团结，做好工作，坚决实现十届四中全会的决议和西藏工作讨论会议向中央的报告，这是好的。中央欢迎他们能够实现自己的保证，中央认为西藏工委全体同志都应该下定决心这样做。

西藏工委委员以及武装部队的高级负责同志，均应根据四中全会决议的精神，配合着西藏工作讨论会议的传达，负责确保关于西

藏工作讨论会议的报告完全实现，以便团结西藏地区。我党、我军全体人员坚决地做好西藏工作，从而团结西藏民族，战胜内外敌人的任何破坏阴谋，准备长期建设新西藏。为巩固和发展祖国大家庭的团结，为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而奋斗。²⁵

回到拉萨后，西藏工委在1954年7月7日到17日举行了西藏工委扩大会议。张国华传达了工作讨论会“总结报告”的内容和中央的观点。²⁶当然，他表示完全拥护中央的指示，并保证在今后的工作中认真贯彻执行。²⁷但很有意思的是，为了与中央指示精神一致，他于7月10日在工委扩大会议上做了很有启发性的检讨。检讨共分三个部分：一、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二、关于党内不团结问题的检讨；三、关于个人思想作风的检讨。虽然下面的检讨来自一份关于他的发言的报告，而不是他的发言原稿，但是它对理解张国华和范明之间的这场冲突是非常重要的。

他就党内团结问题说道：“工委内部的不团结以及西北、西南两支部队未能搞好团结工作，从总的方面来说，我是应当负主要责任的，因为十八军进藏是主体，又居于领导地位。同时在会师和会师以后许多具体工作的处理上，也有毛病，在物资分配上照顾也不是很周到，加上个人作风上不够耐心和民主，无疑也会妨碍了党委制的正常生活，影响党的团结。”

他说：“会师没有会好，我有下列的缺点：欢迎‘独支’（即从西北入藏的十八军独立支队）进拉萨，虽然要王其梅同志数次去阿沛处劝说，为了团结，噶伦应当去欢迎计晋美。由于这一工作做得不够，引起‘独支’同志的误会，我们是没有尽到责任的。……在物资分配上，十八军的分配机构是有照顾不够的地方的。

在采购统一问题上，我事先机械地执行了‘统一采购，统一财经物资’的方针。从今天来检查，为照顾‘独支’初到本身的一些困难，执行采购统一政策时，实行‘独支’分散采购的政策是可行的。在统一处理财经物资问题上，从今天看，当时交给‘独支’向工委负责的办法是可行的。而我机械地统一处理，结果在这中间发

25. 《对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未出版的手记）》，出版日期不明。

26. 张经武和范明不在拉萨，他们已经陪同达赖喇嘛出发去北京了。

27. 赵慎应，1998: 86。

生的问题最多，尤其三十亿旧币²⁸货物的处理，影响团结更大，因此我的责任也就更大，因为我是专管财经工作的主要负责人。”

“西藏工委的党委制没有健全起来，工委本身的不团结，主要表现在我同范明同志的不团结，我们之间的分歧最多，分歧意见虽然许多是带原则性的，但其中也带有一些个人意气之争，因此认为范明同志在处理班禅集团的问题上是有偏见的，立场上是有问题的。由于看问题时，有时带有某些个人意气成分在内，因此在研究问题时，必然不会有耐心地去帮助同志和持虚心学习的态度，这样也就使问题往往难以解决，时间越久，积累的问题也就越多。”

关于个人思想作风上的检讨，他说：“自己思想上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个人英雄主义的自负情绪，往往表现在常常认为自己的见解是正确的，不虚心、耐心地听取相反意见，不知道从不同意见中吸取正确的东西，因而妨碍了党内意见完全真正的一致，妨碍了党内民主生活的正常开展，妨碍了党内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开展，而最后妨碍了党内的团结。”²⁹

所以，范明和班禅喇嘛的官员创建自治区域的企图失败了。毛泽东和中央毫不含糊地声明，指导原则是必须以达赖喇嘛和他的政府为西藏的主要政治实体，班禅喇嘛为次要政治实体。我们将会在后面的一章中看到，这一指导原则最终在1954年安排达赖喇嘛访问北京的事情上得到公开。

中央也否定了范明对班禅喇嘛的判断，对班禅及其官员的“进步性”提出质疑，说他们实际上是一群和拉萨的精英一样的封建精英，他们在行动上的进步是为了在政治上获得相对于拉萨的优势。尽管这场痛苦的关于政策和原则的争论被毛主席平息下去而没有再被提出，但是关于西藏改革速度快慢的潜在分歧仍继续存在着。不到两年之后，范明将会着手努力在西藏进行社会主义土地改革。

这次事件也是具有启发意义的，因为尽管毛泽东已经在中国本部推行了左的路线，但是他在西藏仍然继续争取达赖喇嘛和精英的策略，而不是推动实行快速的社会主义改革，其西藏政策仍然保持适度和“右倾”。

28. 旧币指的是中国在1955年之前使用的货币。一万元旧币等于一元新币，所以这些旧币等于三十万元新币。不清楚张国华报告中的这个三十亿旧币指的是什么事。

29. 《对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未出版的手记）》，出版日期不明，关于张国华1954年7月10日在中共西藏工委扩大会议上的自我检讨的报告。

在中国人正设法纠正他们在西藏的领导层内部的问题时，没有卷入这起事件的西藏政府开始把注意力转向自身，在受传统封建制度压迫最严重的某些方面开始了改革。这将会在下一章讨论。

第十七章

开始迈向社会经济改革

司曹离职使阿沛处在一个很有权势的位置，于是他利用这个位置开始从内部改革西藏。正如前面已经提到的，阿沛认为从长远来说，作为中国一部分的西藏将不能再保留庄园和农奴。但是他也深信对西藏来说，最好的选择是由西藏人自己主导对当前的制度进行改革。一位西藏官员回忆说，他听过阿沛在司曹倒台之后召开的一次讨论改革的会议上表达自己的看法：

如果〔我们〕能进行一些改革就好了。一顶定做的帽子戴上去会很合适、很舒服。但是如果你〔不要这顶帽子，〕非要戴给别人定做的帽子，那么就算感觉不舒服也于事无补了。所以我们最好进行一些改革，我们的米赛（农奴）处境真的很糟糕，所以我们应该检讨检讨米赛的事情。……而且虽然《十七条协议》是说过〔改革需要得到精英和人民的一致同意〕，但是他们〔中国人〕绝不会任由这个事情一直这么下去的，他们一定会〔实行改革〕的。所以如果我们让别人来裁布料〔做这顶帽子〕，那么〔适不适合〕就由不得我们了。¹

所以阿沛坚决主张，不管西藏官员是否会出于道德考虑希望改造农奴制、改善农民的生活，改革都是无法避免的。西藏人应当自己制定改革，以使它尽可能地符合西藏的价值观和利益。这样做要好过等中国方面施加给他们中国版本的改革。他认为这样做也可以让中国人看到，西藏政府是可以与其一道把西藏和西藏人带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流的好伙伴。

1. 札登，访问记，1992，达兰萨拉。

在司曹倒台之后，阿沛之所以能够推动这些观点，部分由于其他噶伦们在政治上保持着现实主义的态度，部分由于他的观点很符合达赖喇嘛的看法。达赖喇嘛自己较倾向于改革和使西藏现代化。在他的第一本自传中，达赖喇嘛说他察觉到西藏人不想批评他们的社会制度的原因是他们认为这是天生的（是人力无法干预的）。因此，西藏人没有把西藏的制度和标准跟外面的世界进行比较的习惯。然而，达赖喇嘛说尽管如此，他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认识到西藏的制度里存在着他所谓的“错误”，比如巨大的贫富差距。²在一次访问中他更为详细地表达了他早期的想法：

可能从小的时候开始我就认识到需要改革。一方面可能和我从小就开始喜欢机械的东西有关。例如，我过去经常阅读大量的书籍，像战争画册。我有十三世〔达赖喇嘛〕留下来的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书，后来我喜欢上这些书并订购了一整套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书，大概有八、九本。所以从这个角度说我很能跟上西方的脚步。我从小到大老想着汽车、更便捷的通信方式之类的事，但是像什么法国大革命之类的书，我就没什么兴趣。

另一方面，在我小的时候，我的玩伴是那些〔在布达拉宫里〕扫地的人，他们经常告诉我城市里正在议论的各种话题等等。那时摄政在位，我小的时候是热振仁波切，后来是大札仁波切。那时人们经常说统治者不公平，噶厦干事不老实，译仓也一样。或者某某人收受了贿赂，拿了金银财宝，那时他们不断地告诉我这样的事情。

〔布达拉宫下面的〕雪勒空有时会用各种刑罚折磨犯人。那些犯人就关在雪的前面，可怜的人啊！冬天我住在布达拉宫的时候，常常拿着望远镜眺望他们。于是他们抬头看见我，认出我来并向我磕头。我们没有近距离接触过，但是通过望远镜我看到了他们这些犯人，可怜的人啊！类似地，我经常听说很多关于税赋、乌拉差和高利贷这样的事情。可怜的人啊，因为这些扫地的人都来自乡村，所以我小时候常常听到这些事情。而我又对现代的科技、现代的机器感兴趣。

2. 达赖喇嘛，1963: 58。藏语为：*nga lo na son mtshams chos kho na'i thog nas lta dus nor`khrul ji`dra yod spyi btang bod mi`i bsam par / bod kyi spyi tshogs`gro stang de ni rang bzhin gyi byung ba zhis yin par ngos`dzin byed pa las / gzhung gzhan dag gi`gro lugs la bsam gzhigs gang yang mi byed pa rnams mthong gi`dug / rgyu nor dbul phyug ma snyoms pa chen po de ni sangs rgyas kyi chos dang mi mthun pa zhis yin。*

说到机器，擦绒在十三世达赖喇嘛时期开办了一家用电的铸币厂。像这样的事情我经常听说，相同的还有札齐。当我的前世〔夏天〕住在罗布林卡时，那里的许多房间都用电灯，所以有一定数量的电池。于是我常常对这些东西感兴趣。由于这两种因素的共同作用，我从小时候开始就渴望现代化。³

前面已经提到，达赖喇嘛也尊敬和信赖阿沛，并定期和他见面，就广泛的问题征求他的建议。据达赖喇嘛回忆，阿沛正是在这样一个场合敦促他建立现代教育体系：“我们从他〔阿沛于1951年〕刚从北京回来就开始讨论进行一些改良，而改良的方向主要是教育领域。我非常赞成这件事。一天在祖拉康的觉康，在一些例行汇报之后我们花了更多的时间一直聊。〔他说〕我们需要一个更加现代的现代化规划，并且我们最需要的是现代学校。”⁴

在噶厦内部，阿沛关于改革的观点得到另一位噶伦索康的支持。索康很有远见，他也认为社会和经济改革不可避免，所以主张实行改革。索康的父亲在十三世达赖喇嘛在位的1920年代曾是和擦绒一起支持改革的一派，⁵而且索康自己的孩子全部都在噶伦堡和大吉岭的英文学校上学。夏苏和绕噶厦也赞成现代化，也都支持阿沛关于改革的观点。其他噶伦的看法比较中立，但是他们也意识到某种程度上的改变是有必要的。因此，在司曹倒台之后的新形势下，他们同意了阿沛所主张的由西藏自主实行改革的计划。于是在1952年9月，噶厦经达赖喇嘛批准，公告在下一年年年初召开由政府官员和寺院领袖参加的民众大会来讨论改革事宜。这个大会后来被称为改革大会（藏语：*Legjō Tsondu*）。⁶

■ 改革大会

阿沛认为改革议题非常重要，所以尽管有噶伦不参加民众大会的传统，但是阿沛还是作为噶厦的代表直接出席了这个会议。大会开始先由

3. 达赖喇嘛，访问记，1993，达兰萨拉（原版中英文访谈内容未加校准）。

4. 达赖喇嘛，访问记，1993。

5. 见戈尔斯坦，1989，第三章至第六章。

6. 但是功德林（2000，第一卷）称它为 *Legjō Jitso*（改革会议）。似乎两个名称都曾用过。

大约六十到七十位代表举行某种形式的全体会议，几天之后再召开由大约四十五位代表参加的小范围会议，定期每周召开一次或两次。在接下来的1954年，来自译仓和孜康的一位僧官和一位俗官⁷领导成立了一个“常务委员会”。这个常务委员会通常被称为改革局（藏语：*Legjö Leygung*），由他们每天碰面讨论。改革局大约由三十个人（包括工作人员）组成，主要的任务是制定改革的具体方案并寻求改革大会的批准，批准后再提交给噶厦和达赖喇嘛。⁸

尽管某些西藏人和西方人士宣称中国方面在1950年代阻止西藏政府的改革，但是现有的证据并不支持这种说法。中国方面是赞同这项改革行动的。而且我们在上一章已经看到，西藏工委在1952年10月7日给日喀则分工委发了一封电报，要求他们劝说班禅喇嘛的官员派代表参加即将召开的改革大会并支持噶厦的提议。

改革大会于1953年开幕，取得了多项成果。对阿沛和那些主张改革的人来说，能够召集一次民众大会来讨论改革，这本身就是一项胜利。但是考虑到大多数精英尤其是那些堪布和僧官们的保守观点，要为实施主要的改革获得共识可不是件容易的事。

引言里已经介绍过了，贵族、喇嘛和寺院的收入绝大部分来源于庄园。在这些庄园里劳作的是世代依附于庄园的农奴，而且这些农奴还承担着差税义务。这很像中世纪的欧洲，社会制度赋予庄园主阶级永恒不变、随时待命并且成本为零的劳动力。这些劳动力为他们种地，为他们放牧牲畜，为他们捡拾柴禾，为他们创造财富。甚至政府里大多数本身不拥有庄园的僧官也强烈拥护庄园制度，因为他们认为它是寺院体系的经济基础，而寺院体系正是这个国家的伟大和独特之处。于是当有人提出土地改革的问题时，很多人都表示强烈反对。

出席民众大会的贵族官员桑颇和达拉·平措扎西回忆说，只要一提到土地和税收改革，堪布们就强烈反对，说这些改革万万使不得，因为

7. 这两个人是本唐·群培土登（*Bumdang Chömpe Thubden*）和孜本朗色林，合称为仲孜译（*trungtsinyi*）。

8. 功德林，2000: 1: 128–37。功德林说改革局开始于1954年，但那似乎指的是正式成立的时间。他在他的书中列出了所有的成员（131–35）。

它们会损害宗教，而且广大普通僧侣也会积极反对。⁹ 人民会议成员毕苏（Bisu）回忆的情况也很相似：

改革局的工作不很顺利，有很多反对的声音和争论。虽说贵族拥有庄园，但是他们却比实际上没有庄园的僧官更倾向于改革。僧官是最反对改革的人，他们和三大寺的代表说：“我们绝对不能接受这样的改革。”¹⁰

因此很明显，在初期支持改革封建庄园制度的人太少，所以注意力转向了较不激进的改革。经过大量的讨论之后，大家最终就开展温和的改革达成一致。这次要改革的是一项事关农民福利的重要问题——农村家庭背负的巨额债务负担。民众大会与会者功德林回忆说：

对西藏的很多农村地区而言，借贷是家常便饭。不仅是婚丧嫁娶这样的特殊情况，歉收……也经常使务农家庭缺少果腹及作种子的粮食。……因为西藏没有银行，所以农民家庭向领主尤其是寺院和拉让借钱，于是寺院和拉让成了西藏事实上的主要的债主。另外，放贷出去利润非常可观，因为西藏没有固定的利率，而包括寺院在内的大部分债主索要很高的利率——从最低的一成到最高的两成半。¹¹

但是问题不仅仅在于高利息，更令人发指的是普遍存在的年代久远的债务，也就是各个家庭从祖宗那里继承来的债务，是“利加利、利滚利”（藏语：*gyela gye gya*）的结果。

春天借的债务到秋天庄稼收获的时候到期。因此，到秋天的时候寺院和其他债主会派人到西藏的各个乡村地区去收账。没有能力还债的农民有时候会被允许只偿还利息，有时候债主只带走一头家畜或者拿一块土地去种几年来抵债，但是一般的情况是允许农民把利息加到本金上。由于这种

9. 桑颇，访问记，1981，达兰萨拉；达拉·平措扎西，访问记，1992，达兰萨拉。

10. 毕苏，访问记，1991，拉萨。毕苏也列出了一些主要寺院的代表：色拉寺的堆巴堪布（Töba），哲蚌寺的阿巴（Ngagpa）、洛色林（Loseling）和杰巴堪布（Gyeba），以及甘丹寺的两位代表，一个叫洛桑达娃，另一个绰号叫 Abra（仓鼠）。功德林（2000: 1）详细地讨论了这件事。

11. 功德林，访问记，1992，德拉敦，印度。

情况一代接一代地发生，所以很多债务的本金数额变得非常巨大，以至于背负债务的家庭只能寄望于偿还每年到期的利息。我曾经问一名收账的僧侣，村民们看见他们来是什么反应。他笑着说他们就像老鼠见到猫一样跑得远远的，这毫不奇怪。

于是很多家庭都有祖祖辈辈传下来的巨额债务，有时这些债务是向很多不同的债主借的，而且经常年代久远以至于他们都不知道到底是谁最早借的这笔债。不管他们多么努力，都无法从这种债务负担中解脱出来，单单是利息就足以让他们世代受穷。这样年代久远的债务很明显是西藏农村社会中最容易导致贫困的因素之一。因此要改善农民的生活，毫无疑问首先就要改革这个问题。这就是改革大会提出来的第一项议题。¹²

■ 关于债务改革的法令

噶厦在 1953 年颁布的第一项法令是改革中下层贫民，尤其是属于政府庄园的贫民的债务及利息的法令。此时噶厦仍然控制着西藏的内部事务，所以不需要为此寻求中国方面的正式同意，但是西藏工委很赞赏这个行动，没有表示反对。法令的介绍部分直白地宣示了噶厦的改革逻辑。

根据改革大会先前提提交的计划，债务问题是需要实施的各项改革之一。贫穷的农奴为了尽交税和派夫〔承担乌拉差役〕的义务，以及为了应对最困难的农作物和牲畜的歉收问题，不得不向政府、贵族和寺院的庄园借贷以筹措口粮和播撒的种子。他们〔经常〕不能在秋天的时候还债，于是就造成年复一年的利上加利。

而且欠债的人不得不向很多债主还债，于是债务数额超出了还债人的能力。这就像谚语说的：“镰刀太小山太大”〔镰刀太小而无法割光山上的草〕。¹³即使他们能够偿还一代一代传下来的〔利息〕，也不可能偿还债务〔本金〕，这样就造成他们家庭的破裂。所以，贫穷的纳税家庭在他们整个生命中都要遭受身体和心理上的苦难。

12. 实际上，债务改革（藏语：*bünshib*）曾经由西藏政府和个别几位领主在较小的范围内针对他们的属民实验过（擦绒·益西，访问记，1991，噶伦堡）。

13. 藏语：*ri zor ga `dzol*。

因此，至尊达赖喇嘛作出了深刻的指示，告诉我们不能再这样下去，必须实行改革，以减轻人民的痛苦。而我们唯有遵从这些深刻的指示，尽早实行改革。¹⁴

这项法令对属于寺院、贵族和政府的债务分别采取不同的处理方式，同时也考虑了债务借出的时间长短和债务人目前的经济状况，对债务的本金和利息也分别进行了考虑。举个例子，我们考察一下政府债务的规定：所谓政府债务指的是由某个政府机构或者宗政府借出的债务。

被划分为中层农民的债务人当中，那些生活条件较好的人，他们在1949年之前向政府借的债务的本金可以得到10%的减免；中层农民中生活属于中等水平的债务人可以得到12.1%的本金减免；而中层农民中最穷的债务人得到的本金减免是20%。这些债务减免之后的本金按每年10%的利息偿还。

被划分为赤贫农民的债务人得到更多的减免，他们的本金减免达50%，减免之后的本金根据数额的大小按照每年1%到10%不等的利息偿还。背负其他类型债务的债务人也获得减免，减免的额度根据一系列的复杂因素确定。¹⁵这份法令接着详细地讨论了很多不同类型的债务人和债务情况。不过，实际上它仍然留下很多不易操作和模糊的地方。例如，如何判断属于何种经济状况。尽管如此，它确实代表着向前迈出了一大步。

农民们背负的第二项沉重负担是繁重的“马匹和运输徭役”，藏语叫做达乌开玛 (*tawu khema*)。西藏有一个巨大的驿站（藏语：萨茨，*satsig*）网络，货物通过这个网络由农民以支乌拉的形式进行运输。承担这项义务的家庭需要无偿地把货物按要求从他们地区的驿站送到邻近的下一个驿站，再由另一群等候在那里的农奴把这些货物运送到下一站。然而，由于持有政府通行证的人随时都有可能到来，所以农民们不得不保持一定数量的驮畜时刻待命。

改革大会认识到这是农民背负的另一项沉重负担，但是却不能完全废除这项负担。因为代表们担心如果把它改成自愿的（立足于市场的），大

14. 噶厦，1953，译自印度达兰萨拉的西藏著作档案馆收藏的原创藏文木板法令（woodblock edict）。这项法令作为附录二全文引用。

15. 噶厦，1953。见附录二。

部分农民只会选择不参与，结果会导致运输体系的崩溃。但是改革大会还是向前迈进了一小步：一方面要求向农民支付运输费用；另一方面减少了马和驮畜的需求数量。同时也提高了通行证的发放标准，通过这种方法大致减少了需要提供运输的人的数量。¹⁶

实行这两项改革产生的结果有好有坏，但是它们的确让一些贫困的村民受益。下面这个白朗（Panam）宗的故事就体现了这一点：

〔在 1955 年〕……他们进行了一次债务调查。我不太肯定这是由于〔中国人的〕革命才这样，还是纯粹是老政府自发的行动。当时，他们调查了〔我们欠的〕陈年旧债。……那之前，这些债务的利息是 20% 和 14%。他们降低了利率，并且重新安排了欠贵族和寺院的本金的偿还方式。年长的人都说这个债务调查非常好，因为它减轻了压在我们孩子身上的负担。我们的债务原定是要在四年内偿还，但是在还清之前〔1959 年的〕革命就开始了。¹⁷

然而，尽管西藏政府取得了某些这样的成功，但是却没能广泛地实行这些改革，因为落实这些改革的机制并不具备，对寺院和贵族领主的农奴来说更是这样。这是一个开端，但却是一个保守的开端。

改革大会还制定了第三项重要的改革措施，即改革宗的行政。西藏由大约两百个宗组成，每个宗由政府任命的一名俗官和一名僧官掌管，任期三年。这些宗的首脑（宗本）从他们的宗里属于政府的庄园及其他有纳税义务的领主的庄园里收税，同时也负责调解纠纷和收债。

宗本是非常有利可图的职位，因为他们只需要按要求运送一定量的粮食和税收到拉萨就行了，剩下的东西他们都可以收入囊中。这种收入对僧官来说尤为重要，因为他们没有庄园，薪水也不高，所以他们很落力地压榨农民缴纳额外的税赋，或者强迫农民以低于市价的价格把货物卖给他们，然后他们再拿到市场上高价出售，把利润据为己有。更有甚者，西藏政府有时候会把宗的管理大权出租给并非政府官员的私人，这些租回来的宗本必须扣除租金才能开始盈利，于是在这种情况下的压榨行为就更令人发指了。因此，改革局制定了一项新的法律来终止这种形式的剥削：（1）

16. 功德林札萨，访问记，1992，德拉敦。

17. 多耶（Doye），访问记，2002，白朗，西藏自治区。

要求政府将所有租出去的宗“国有化”（收回），然后派自己的官员去管理（这种国有化被称为 *shungdzin* 或 *shungzin phumpa silu*）；(2) 要求宗本把从农民那里征收来的所有东西都全数交给拉萨的政府。

作为补偿，政府会支付更高的薪水给宗本，并向他们提供足够的津贴以携带仆从随行。政府官员札登解释说：

于是……这两位〔宗的〕官员……得到了固定的薪水。如果他们所在的地区十分偏远，那么政府允许他们携带更多的仆人，每个仆人都可以得到大约七十“克”〔粮食作为津贴〕。官员们自己得到的〔每年〕从一百“克”到两百“克”不等。对于偏远地区来说，更多的仆人是必要的。而如果没有这些〔津贴〕，一个人的生活肯定维持不下去。如果一个人要在羌塘（Changdang）〔藏北草原〕走很远的路，那么他就必须携带武器并且要有人陪同。因为即使是那些农民一个人也对付不过来，那里不乏一些很坏的人。¹⁸

在这种制度下，送到拉萨的粮食比以前增多了，最后改革局在给各个部门送去所需数量的粮食之后还剩下大量余粮。由于改革局之前没有规定如何处理这些粮食、酥油等，所以它想怎么用就怎么用。¹⁹ 据改革局的另一位官员霍康回忆，改革局开始用这些新的收入资助拉萨官员们大量的聚餐活动：“这样的派对或者聚餐常在仲廓林卡（*trunggo linga*）一类的地方进行。过去的情况是每年〔每个〕部门的两位官员〔从他们自己的收入中〕拿出钱来负担这些庆祝活动的开支，但在当时改革局用自己的通用基金负担了这项花费。”²⁰

改革大会的这些成就就是一个重要的开端，其动机是改善乡下农民的生活，减少腐败和剥削。但是正如前面提到的，人们对于更为重大的针对世袭庄园制度本身的改革仍然欠缺共识。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寺院和很多贵族不愿意以自己的庄园归政府所有来换取薪水。此外，对宗的改革的巨大成功也给改革本身造成一些麻烦。大量剩余的粮食流入改革局使得官员们花费越来越多的时间处理这些粮食，而花在思考新的改革上的时间

18. 札登，访问记，1992，达兰萨拉。

19. 札登，访问记，1992。

20. 霍康，访问记，1992，拉萨。

自然就少了。到 1955 年的时候，这个变化已经使阿沛心灰意冷，进而丧失了积极性，觉得改革局是在浪费时间。²¹ 于是早期的动力失去了，关于农奴制、差税制度和农民的权益等更根本的问题始终没有被提出来。对此，一个西藏人用一句西藏谚语解释说：“木头锯子锯不了木头。到后来，它〔改革局〕实际上就不起任何作用了。”²²

21. 达赖喇嘛，访问记，1994。

22. 藏语：*shing gi sog le shing la `gro gi ma red*。毕苏，访问记，1991，拉萨。

第十八章

在印度发生的事件

■ 一个西藏流亡抵抗组织的发展

达赖喇嘛 24 岁的哥哥嘉乐顿珠于 1952 年 6 月下旬抵达印度，在大吉岭与他的妻子会合；他的妻子在他去拉萨期间一直待在那里。前面已经提到，嘉乐因为在西藏受到忽视心中非常失落，现在他要到印度去把他所认为的西藏“困境”告诉给外界。此外，他将要同印度、美国或许还有台湾发展关系，寻求他们对西藏事业的支持。与此同时，他希望能联系到夏格巴和其他身处西藏外部的活跃人士，例如库库拉、达多仁波切（Thando Rimpoche）、哈勒巴、达当（Dadang）以及彭康（色）（Phünkang Sey），建立一个组织从外部反抗中国人在西藏的活动。

然而，这并不容易，因为印度政府禁止流亡人士从事政治活动，并密切监视在噶伦堡和大吉岭的西藏人。实际上，嘉乐在离开西藏之前就知道这个情况，因为印度驻拉萨代表处要求他保证不从事反抗中国人的活动，并保证不在噶伦堡或者大吉岭居住。但是嘉乐很快就打破了这个协议，他选择住在大吉岭并写信给艾森豪威尔总统（Dwight D. Eisenhower）、蒋介石和美国国务卿（如下）。¹ 印度政府察觉到这个事实，于是在几个月之后的 1953 年 1 月小心地警告他说，既然他是印度的客人，那么就应当避免从事反抗中国人的活动以及同诸如美国这样的外国建立联系。² 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对嘉乐和其他住在噶伦堡或大吉岭的西藏流亡人士来说，在印度组织反抗中国人的活动是很危险的，哪怕只是进行一些公关活动，因为他们一直面临着被驱逐出境的威胁。实际上，夏格巴在他几年后写的

-
1. 嘉乐在一次访问中提到了这些信件（对嘉乐顿珠的电话访问，1994）。
 2. 拉姆次仁，1992: 159–60。

一份备忘录中特别评论了这一情况。他说：“因为印度政府和中国的关系很好，所以我们担心假如我们做出哪怕只是很小的政治动作，我们所有人都有可能被驱逐出印度。因此，我们没有进行任何形式的〔政治〕活动的计划。”³

印度政府奉行这样的政策并不令人意外，因为它正试图与中国维持良好的关系，并且正和中国商谈一份重要的协定。因此尼赫鲁反对任何可能引起与中国发生摩擦，或者可能使中印之间原本平静的两千英里边境线变得不平静的行为。在印度看来，允许西藏流亡人士在印度从事反抗中国人的活动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挑衅行为。

与此同时，尼赫鲁和他的情报局首脑担心中国军队在西藏的存在对印度来说是一个潜在的威胁。印度控制着西藏边境上多个中国／西藏宣称拥有主权的地区，而中国在站稳脚跟之后在边境地区制造一些纷争也并非不可能。于是在1952年3月，尼赫鲁授权印度情报局开始制定收集西藏／中国方面的情报的方案。⁴在这个行动展开之后，印度情报局将会日渐积极地同西藏流亡人士合作，但这仍然是两年之后的事情。

嘉乐同美国建立联系的尝试最初也并不顺利。他于1952年9月6日第一次在印度亲自接触到美国官员，这位美国官员是驻加尔各答总领事加里·索兰（Gary Soulen）。当时索兰刚访问完锡金，拜会了库库拉（库库拉是美国有关西藏情报的一个来源），正取道大吉岭返回加尔各答。⁵但是索兰关于这次会面的报告很令人吃惊，因为报告提到虽然嘉乐离开西藏没几个月，但是却没有实质性的东西通报，并且他说的很多东西都不准确，例如对土地改革的评价是：“他……宣称达赖喇嘛对人民的影响力和号召力正在增加，但是很多官员靠不住。西藏的食物供应很紧张，政府已经把粮食库存的三分之二分发给人民，而达赖喇嘛也已减少税收并且不顾贵族的反对把领主的大量财产分配给人民，以共产党的方式战胜共产党。”⁶

3. 夏格巴写给印度政府的信件的藏文手稿，1954，由夏格巴的家人提供。

4. 莫里克，1971: 179–80。莫里克是1950到1965年间印度情报局的局长。

5. 康博伊和莫里森，2002: 23。对于美国和锡金的联系的概括性描述，见此书21–24页。

6. 美国国务院，1985: 96，驻加尔各答总领事（索兰）给国务院的信件，1952年9月10日（793B.11/9–1052）。

那时，美国已不再有兴趣积极涉入西藏事务，但是它仍然有兴趣知道在西藏到底发生了什么，而嘉乐似乎有可能在这方面提供很好的情报。因此，索兰和他的会面在美国政府内部引起了讨论，讨论的主题是是否应当将他列为这类情报的来源之一。但是到最后这个讨论都没有得出任何结论，因为大家一致认为在不引起印度政府关注的前提下同嘉乐进行经常性的接触几乎是不可能的。⁷

嘉乐没有收到任何与这次会面相关的后续信息，于是他绕过在印度的美国官员直接联系美国国务卿，给国务卿发了一封信，信上的日期是1952年11月12日，他在这封信中建议在西藏流亡人士中组建一个游击类型的抵抗组织。这封信很好地体现了嘉乐在那个时期的想法。

在我离开美国的这七个月里，我时时牵挂您的身体，一直在诵经之时为您祝祷。当我在美国的时候，我经常向您请教求助，而您也对我关爱有加，尤其是当您看到西藏人民面临危险的时候更是如此。这些事情我一直牢记心中，西藏人民也希望对您的爱护和同情表示感谢。没能在美国上学我感到很遗憾，但是我之所以这样选择是缘于我的思维方式，也是缘于西藏人民境遇的变化和我内心紧迫的责任感。

我在印度短暂逗留了三、四个星期，在那里见到了家人，此后我返回了西藏。在拉萨逗留的三个月里，我拜见了至尊，这之前我们已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见面了。我也和其他家人见了面，同包括至尊在内的家人进行了毫无保留的轻松的讨论。我向至尊汇报了您和美国政府的态度，他说：“美国政府对西藏人民表现出极大的关心和良好的祝愿，对此我希望表达我的谢意。我知道美国政府在我身处亚东的时候承诺将给予我援助，同时也尽了所能为我离开西藏到外国去提供帮助。但是考虑到当时的局势、困境和过去的错误等因素，〔我们〕没能作出适当的决定。因此，它〔美国的帮助〕没能发挥作用。”⁸ 我想告诉您关于那个时期的另一些事，那时至尊返回拉萨是非常必要的，因为他需要照顾到他的人民的期望，他返回西藏不是因为他赞同共产主义制度。

7. 美国国务院，1985: 96，驻加尔各答总领事（索兰）给国务院的信件注释3，1952年9月10日（793B.11/9-1052）。

8. 藏语：*skabs de'i gnas stang dang / dka` tshogs byed phyogs nor`khrul sogs thag gcod`ol`tshams ma byung ba`i rkyen gyis phan thog ma thub pa*。

在他返回之后由共产党统治的一年里，达赖喇嘛和他领导下的西藏人民完全了解了共产党政府的政策，知道了他们对人民的侵害和实行的恐怖统治，完全认识到他们正在用诡计和武力剥夺人民的自由。现在，人民正处于极端困难的境况中，所以至尊掌握了政教大权。也正因为这样他别无选择，只能对这个困难的境况作出应对。

我向至尊解释并同他讨论了您〔国务卿〕和我在美国时讨论过的重要问题，并且告诉他应当再一次制定离开西藏到国外去的计划。我尽了最大的努力去劝说他，但是当下的形势极为险恶，在拉萨有大量警觉性很高的共产党军队，所以他不能采取迅速果断的行动。因为假如这样的行动稍有泄漏，那么至尊的生命安全将会面临很大的危险，而人民也会遭受巨大的痛苦。所以如果想要实现这个〔让达赖喇嘛离开西藏流亡国外的〕目标，我们就应当想出一个万全的方法，以确保绝对成功而不致遭受任何损失。因此，设计这样的方案是非常困难的。

当前，人民在达赖喇嘛的正确领导下坚定地团结在了一起，他们对达赖喇嘛的爱戴和尊敬是前所未有的。我们有足够的信心能够阻止共产党的侵略，但是之所以我们没有公开地抗争，我认为是由于我们的政策是基于以前的情况制定的。我们将沿着发动人民、努力自我解放的路线，设法改善人民的生活，增强人民对〔西藏〕政府的信任及同政府合作的意愿。我们将在达赖喇嘛和西藏人民之间建立稳固的联系，并且计划以此为基础，组织西藏人民〔在全西藏〕展开全面的抗争。……从共产党开始侵略西藏到现在，他们还没能在人民中广泛传播他们的主义。与此同时，他们没能用武力控制住西藏人民，他们也没能在人民中播下仇恨与不和的种子，有很多因素使他们不能牢固地建立起他们的统治。

然而，虽然红色中国人面对如此强大的阻力，但是他们仍然坚持在西藏推行他们的计划。他们妄图腐化人民的邪恶动机已经显现。他们正在利用西藏人民，但是由于人民对宗教的热爱，所以他们不得不绞尽脑汁。他们计划尽早成立一个叫军政委员会的机构。〔西藏的〕各项事务在达赖喇嘛的领导下一直得到很好的组织，现在红色中国人正试图进行控制，但是这遭遇到巨大的困难。

我认为，在军政委员会建立起来之后，西藏政府的权力和西藏人民的权益将毫无疑问会被这个机构剥夺。这个机构是由中国中央人民政府直接领导的，其首脑将会是达赖喇嘛，其成员中有一半将会是中国人，而另一半会是西藏政府的人。中国人命令它干什么，

它就会干什么。在这种情况下，西藏政府将会被接管。在这个机构的领导下，中国人将会强力推行改革，把西藏转变为共产主义社会。达赖喇嘛将只是一个傀儡，整个国家将会前途尽失，陷入无尽的黑暗中。这就是红色中国人针对西藏政府及其人民的邪恶图谋。

我个人的想法是想请求美国政府建立一个特殊的调查机构来研究西藏问题。鉴于外藏和内藏〔西藏本部和青海、甘肃、西康的藏族地区〕都有很强烈的反抗红色中国人侵略的意愿，所以应当从各个方面建立一个组织从边境地区向内发起进攻。首先，要挑选身处西藏之外的西藏人，对他们进行秘密活动的训练，使他们能够进入西藏，让人民了解反抗运动，并鼓励人民向反抗运动提供支持。如果我们的行动进展顺利的话，我们就能建立一个军事指挥中心，这就是我的想法。如果您的政府支持这个想法的话，我将会送上我的详细计划并就这些计划同你们进行讨论，然后将它们付诸行动。正如前面提到的，这个行动不仅能极大地帮助西藏人民，也有利于阻止中国人秘密地渗透进印度、尼泊尔和不丹。我热切地期盼您对此的看法。⁹

这封信给华盛顿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但是美国并没有跟进，没有任何记录表明国务院给予了答复，也就是说嘉乐顿珠没能引起美国的关注。虽然这种情况很快就会改变，但是在嘉乐到印度的头一年，华盛顿对他或者西藏确实没有任何兴趣。

然而，嘉乐从台湾收到一个较为正面的答复。他说蒋介石愿意给他真正的援助，但是要求把这种援助纳入国民党反攻大陆计划的框架下（西藏要作为国民党中国的一部分）。嘉乐说他不愿意在这个前提下接受他们的援助。

蒋介石将军很同情西藏，他派了多位使者来见我，并总是承诺要什么给什么，既包括物资援助也包括训练方面，他们愿意倾其所能。但是，当时我们的争论总是基于要求他们改变他们的宣传内容，承认这是西藏大众的自发行动，而不关乎国民党的领导，也不关乎国民党所宣扬的所谓西藏人为了让中国国民党回归大陆而同中国共产

9. 引自拉姆次仁著作中（1992: 153-59）的藏文内容（划线部分为强调）。拉姆次仁是嘉乐的秘书兼助手。

党进行的战斗。那些年我们一直在争论这些问题，假如这个问题没有取得一致，事情就会停滞不前。后来我们没有同中国国民党达成任何协议，我觉得（上述原因）是他们跟我们之间主要的分歧。正因为如此，我们也从来没有接受过中国国民党的援助。¹⁰

然而，印度方面的情况很快出现了转机。嘉乐顿珠有段时间一直在设法安排和印度情报局局长莫里克见面，于是莫里克在 1953 年将要前往大吉岭的时候询问尼赫鲁是否应当会见嘉乐。尼赫鲁同意他见嘉乐，并指示他“和达赖喇嘛的哥哥以及其他所有西藏难民保持接触，并尽可能地向他们提供帮助”。¹¹ 但是，这些并不包括帮助他们组织力量反抗中国人。对于这一点尼赫鲁解释说：“这样的接触也可以直接有利于我们阻止他们在印度领土上进行任何针对中国人的图谋。”¹² 然而，尼赫鲁的首肯却为印度情报局同嘉乐顿珠和夏格巴的直接接触打开了大门。

但是在西藏流亡人士方面，在印度创建一个抵抗组织的计划一直到 1954 年才出现真正的进展。对此起到重要催化作用的事件是当年四月底新的中印协定的公布。

■ 中印关于西藏和印度之间通商和交通的协定

在《十七条协议》签订的时候，印度在西藏仍然维持着从英国那里继承过来的特权。这些特权最早是由英国人通过 1903–04 年侵略西藏的战争获得的，包括在江孜和亚东等几个城市设立商务代表处、在贸易站派驻卫队以及贸易特权、治外法权等权利。除此之外，英国人于 1937 年在拉萨设立了一个代表处，后来也被印度人继承了。在 1951 年《十七条协议》签订之后，这些特权立即变得不合时宜了。于是到 1952 年年底，中国政府和印度展开了谈判，目的是根据新的现实情况调整印度和西藏之间长久

10. 嘉乐顿珠，访问记，1995，香港（原版中英文访谈内容未加校准）。

11. 莫里克，1971: 180。克雷格（1997: 172）引用嘉乐的话说这件事发生在 1952 年 10 月，并说莫里克告诉过他，“〔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所以从 1952 年 10 月开始我经常同印度情报局接触，而尼赫鲁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是我认为他所说的日期不准确。

12. 莫里克，1971: 180–81（划线部分为强调）。

以来存在的商贸、朝圣和外交关系。这个谈判的结果是在1954年4月29日签订了一个关于印度和中国西藏地方之间的商贸和交通协定。接着在第二天，双方又以互换照会的形式对中印双方不愿意放在协定中的问题进行说明。

从政治角度来看，这个新协定的文字加强了印度对中国之于西藏的主权的认可。协议讨论“中国西藏地方”，并声明是基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即：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既然西藏现在是中国的一部分，那么和西藏的所有关系都将由中国政府来管理。因此，印度同意不再同西藏进行直接的联系。因为这一点，参加谈判的没有西藏政府的官员，参加协定签字的也没有。半世纪以来印度－西藏之间的直接联系就此终结。

这个协定（和照会）废除了印度在西藏享有的所有特权。它允许印度政府继续在三个地方设立“商务代理处”，但是作为交换，中国将会有史以来第一次在德里、加尔各答和噶伦堡设立对等的商务机构。与此同时，印度同意把所有印度政府的驿站以及邮政、电报和电话等企业交给中国（条件是中国以“适当的价格”对印度作出补偿）。在拉萨，印度政府的代表处将会变成印度政府的总领馆，而和它直接打交道的将会是中国政府的新外事处，而不是西藏（地方）政府。作为对等条件，中国将会在孟买设立一个领事馆。¹³

这个协定的签订以及印度正式放弃它与西藏的直接关系的消息让嘉乐顿珠极为震惊。在1954年4月30日，也就是这个协定公布的当天，嘉乐立即坐出租车到噶伦堡会见夏格巴和刚刚抵达印度的西藏僧官堪穷洛桑坚赞，同他们商量对策。

洛桑坚赞是西藏政府派来的新的驻噶伦堡贸易代表。¹⁴他曾经是反中的朗色林派（在第十二章中讨论过）的成员。¹⁵甫一到印度，他就去见嘉乐顿珠和夏格巴，敦促他们利用和外国打交道的经验，协助自己把中国人占领西藏的情况公之于众，同时设法组织抵抗力量。

13. 协定和照会的全文见香港友联研究所，1968: 63–73。

14. 洛桑坚赞在一段由达兰萨拉西藏著作档案馆于1983年录下的访问中说，他来印度是在1953年，应该是那一年的最后几天。

15. 朗色林，1988: 70。

他们三人一致认为新的协定对西藏极为不利，因此他们决定设法改善同印度政府的关系以便影响印度的政策。5月17日，嘉乐顿珠连同夏格巴、洛桑坚赞一起邀请锡金政治专员到他的宅邸茶叙，表达他们对西藏局势的看法。接下来的一段时期，三人借口聚餐开始谨慎地会面，制定从印度领土上反抗中国人的策略。¹⁶这三个人按照他们名字的缩写被称为：坚堪孜松（*Jenkentsisum*）（前三个字分别代表哥哥、堪穷和孜本）。

很有意思的是，达赖喇嘛对这个协定的反应非常不同。他回忆说，考虑到过去四年已经存在于西藏的现实，他不认为这是什么重大的事件。“我们已经签订了《十七条协议》，并且我们也不能说是被胁迫才签的字，所以我们必须遵守它。因此，印度和中国之间的协定并不是多大的事。”¹⁷然而，依据国际法法条，这个协定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协定，因为惟一和西藏有着特殊合约关系的国家现在同意放弃这种关系，并且在作这个决定之前没有同达赖喇嘛和西藏政府商量。

很明显这个新协定对生活在噶伦堡和大吉岭的西藏人造成严重的威胁，尤其在印度政府是否要驱逐所有西藏人的问题上更是如此。印度政府知道这个协定很敏感，所以在1954年派莫里克到噶伦堡—大吉岭去评估当地对它的反应。莫里克对此行的回忆如下：

1954年5月，我再度访问了大吉岭—噶伦堡—甘托克地区，去评估当地的印度人、锡金人和西藏难民对1954年中印协定的反应。我发现西藏人非常震惊和悲伤，他们觉得尽管他们很信任印度，但是印度却辜负了他们……西藏人虽然感到痛苦但是也看到了印度的难处，只是希望印度能够作出一些保证以使他们可以保持斗志。首先，他们希望西藏难民能够自由进入印度，而且不会因为中国人提出要求就把他们转交给中国人；其次，他们希望西藏人能够把他们的金钱和贵重物品转移到印度存放，而不受外币、关税、所得税规定的限制；第三，他们希望印度领导人能够发表一项声明，强调印度和西藏之间的文化联系和纽带是永恒的，不会因为中国人占领了西藏而改变；第四，印度应当公开对中国人违反跟西藏签订的《十七条协议》的行为提出批评；第五点是达赖喇嘛驻噶伦堡的采购使团

16. 拉姆次仁，1992：165-66。

17. 达赖喇嘛，访问记，1995：达兰萨拉。

〔商务办事处〕应当继续作为一个独立的实体存在，而且应当获得与中国的商务代理处同等的地位。西藏人非常想继续他们针对中国的反抗活动，他们知道他们将不能从印度获得任何物质上的援助，但他们认为即使是道义上的支持也将会对他们的斗争有所帮助……

我回到德里后向政府汇报了这些反应。几天之后总理派人来找我。……总理接着说，西藏人仇视中国人，绝对不会向他们屈服。这个国家独一无二的自然环境造就了其人民的坚毅与顽强，这使得中国人无法在这个国家殖民。但是西藏人采取武装抵抗活动是不明智的，因为中国人会迅速、有效、无情地给予镇压。总理接着指示，应当向各阶层的西藏难民保证，即使中国提出了引渡难民的要求，他们也不会被交给中国人。对于难民的财产问题，总理的观点是可以豁免他们的关税、货币税和所得税，难民们可以像众多随身携带财物的尼泊尔人那样自由携带黄金、白银和外汇。对于在道义上支持西藏的抵抗运动的要求，总理的观点是即使知道他们在帮助西藏内部的同胞，只要他们的行为不过于公开，印度政府也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会理睬中国人的抗议。不过他建议最好的抵抗形式应当是非暴力的，极力争取保护西藏的文化和地区自治，而不应当采用武力，因为这会给中国人提供借口用武力去镇压那些可怜的西藏人。他指出，由于我们的军事力量很薄弱，所以不太可能给予西藏军事上的援助。¹⁸

所以，新的中印协定最终没有给在印度的西藏人带来任何变化。而且正是在 1954 年，尼赫鲁开始对反抗中国人的活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这些活动很谨慎地进行。于是，坚堪孜松和印度情报局的关系实际上已经开始进入积极合作和提供资助的阶段。

在此期间的 1954 年 7 月 7 日，拉萨以南富饶的藏地农业地区（和城镇）江孜发生了水灾。这次水灾是西藏历史上最为严重的水灾之一，170 多个村庄被水淹没，16,000 多人受伤，690 多人溺亡。西藏工委、西藏政府和班禅堪厅设立了一个救助机构管理救灾事务。同时，北京的国务院先行拨发了 180,000 多大洋给水灾灾民和在这一地区驻守的中方人员，其他部门也拨发了救灾粮食和衣物，各类军队人员捐款超过十万元。1954 年 10 月

18. 莫里克，1971: 181–83（划线部分为强调）。

13日，中央同意另外拨发三百万大洋修建江孜到亚东和江孜到日喀则的公路，超过四千名西藏人通过参与公路建设获得收入。¹⁹

在印度，由于中国政府在水灾初期没有发布消息，所以坚堪孜松直到7月29日才得知这件事。于是他们立即开始组织在印度的西藏人向水灾灾民提供救济，不过，他们也把这看成是成立他们图谋已久的政治组织的绝好机会。8月5日，他们在噶伦堡碰面，公开成立了目的是为水灾灾民募集救灾资金的西藏赈灾委员会（藏语：*pögyob tshogpa*）。与此同时，他们秘密成立了致力于西藏独立的政治组织——西藏福利协会（藏语：*pö dedön tshogpa*）。²⁰

这个政治组织的成员在众多护法神像面前宣读声明，立誓不惜一切代价为组织的事业而奋斗。所宣读的声明先大段地介绍历史，列举中国人的种种压迫行为，内容中最重要的几点如下：

1. 我们愿意牺牲我们的生命和财产，不怕困难不惧挫折，直到我们实现我们的独立。我们将会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坚持不懈，哪怕要花一生的时间也在所不惜。
2. 应当设法尽快使至尊回到西藏的首都。〔达赖喇嘛当时正在前往中国的途中。〕
4. 所有讨论内容都应当保密，不允许向外界透露。任何人被目睹或者被听说抑或证明泄漏了秘密将会遭到极严厉的惩罚。
10. 我们的主要政治目标是使至尊保持他对政教合一政府的领导，确保所有卫、藏、朵康（Dokham）、安多和果洛（Golok）的人民在国家的管理上都享有平等的权力，包括教育、健康、人民生活得到改善、言论自由、防卫、信仰各种教派的自由。要采纳一切好的东西，避免那些阻碍发展的活动，这样才不至于让人民失望。必须取缔共产党和无神论者的所有活动。²¹

19. 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1995，1954年7月17日条目。

20. 拉姆次仁，1992：173。

21. 英文版的油印件（找不到这份文件的藏文原稿）（油印件存在语法等错误，本书英文原版中没有加以更正，翻译成中文时根据理解做了更正——译注）。这份文件是夏格巴的家人为本课题提供给班觉·擦绒的，在附录三中有全文引用。英文版的油印件说这个宣誓仪式发生在两周半之前的1954年7月14日，但是我认为拉姆次仁给出的时间可能是正确的。

这份声明很有意思，因为它明确要求的不仅是老的西藏政治制度覆盖下的西藏的独立，而且还包括大藏区即四川、青海、甘肃和云南等地所有藏族地区的独立，**所有这些地区都享有平等的权力。**

另外，尽管嘉乐顿珠是达赖喇嘛的哥哥，但这个组织却是在达赖喇嘛不知情的情况下成立的，也是和他的观点相左的，这一点很有意思。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在当时的拉萨，中国人和西藏政府的关系很友好，而且似乎西藏正逐渐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部找到自己的位置。那个时期在印度的抵抗运动虽然很节制，但是其目的却恰恰和拉萨相反，致力于把中国人赶出西藏，不妥协，不接受中国人的共产主义。

夏格巴利用水灾的机会接触了美国驻加尔各答总领馆，敦促他们向西藏的水灾提供援助。他觉得美国的援助将会是一个针对共产主义的很好的宣传素材，因为如果中国人接受这些援助，那就意味着他们没有能力应付这场灾难；而如果他们拒绝这些援助，那就说明他们的态度过于僵化。²²总领事的建议是美国不应对西藏赈灾委员会的请求作出反应，这与在德里的美国大使馆的建议不谋而合。国务院最终同意了它们的建议，并在内部给出理由说中国人已经以他们自己应付得来为由两次拒绝了国际红十字会的援助。中国政府也拒绝接受西藏赈灾委员会送来的任何援助。

西藏流亡人士能够在印度自由行动，这导致几个月之后的 1954 年 10 月 4 日，噶伦堡出现了一场大游行。在这场游行中，西藏福利协会举办了一个仪式，祈祷达赖喇嘛从中国安全返回。超过四千名西藏人参加了这个游行，并且有史以来第一次在印度公开打出雪山狮子旗。²³

然而，在坚堪孜松看来，它当时的活动主要是做给印度政府而不是美国看的。坚堪孜松和印度政府的联系在 1954 年产生了实质性的内容，这一点可以从下面摘录于夏格巴在 1954 年年底或 1955 年年初给印度政府的信件片段中看出：

简而言之，中国人残酷地折磨西藏人民，使西藏成了人间地狱。因此，所有由色拉、哲蚌、甘丹三大寺领导的寺院，所有有头脑的僧俗政府官员和人民都从内心深处把他们的希望寄托到我们身上。他

22. 美国国家档案馆，美国驻加尔各答总领馆，急件号 100，1954 年 8 月 20 日。

23. 拉姆次仁，1992: 176-77。

们不断地捎话或者写信过来，要求我们请求印度政府等势力采取一切适当的、或武力或和平的手段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从倒下的地方爬起来。如果印度政府不采取行动，那么我们会孤掌难鸣，就会无所作为，只能保持沉默。

最近，印度情报局的官员如玻色先生（Bose）和莫里克数次告诉我们西藏应当通过和平的手段重新获得自由，而且印度政府也会采取一切适当的、或武力或和平的手段给予支持。

因为印度政府和中国政府有着非常良好的关系，所以我们怀疑我们哪怕只是稍微有一点动作就会被驱逐出印度的领土，因此我们没有进行任何形式的活动的计划。但是由于玻色先生和副局长麦琴达尔先生（Majumdar）经常对我们说那样的话，也因为德里的局长告诉我们，我们最近所做的是符合尼赫鲁总理的意思的，所以我们所有的人都从心底里相信〔印度政府〕了。

由于西藏和中国在民族、语言、文化、宗教以及意识形态上完全格格不入，因此我们通过信使和西藏建立起联系，与那些在西藏的重要人物建立友谊，这些信使一个月往返七、八次。……我们也在尽最大的努力，在西藏内外利用不同的手段把所有的西藏人都聚拢到某个组织里去，渐渐地我们将形成一个大型的藏人的组织，然后再设法帮助西藏。

为了在思想上争取西藏人，我们将为江孜水灾的灾民募捐，并帮助西藏解决吃饭和穿衣的问题。我们已经公开声讨中国人，我们还将尝试通过发行藏文报纸向西藏人宣传。为了复兴西藏的佛教以预防潜在的破坏，我们建立了一座有关宗教和历史的图书馆及一所教授藏语的学校。所有的西藏人不论僧俗都将给达赖喇嘛发电报和陈情书，促请他尽快〔从中国〕返回西藏。

为了更迅速地了解西藏的消息，我们已经设立了一个培训项目，来训练使用〔由印度政府提供的〕加密无线电设备（藏语：*sangwe lungdrin*）。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进行了很多行动。将来，我们将尽最大的努力通过和平的手段使西藏重获自由，但是最终〔如果这不能成功〕我们将会设法通过武力使西藏获得自由。我们别无选择，只能不停地尝试，直到获得完全独立为止（藏语：*rangtsen tsangma*）。

紧接着是整封信的核心：一份具体的针对军事手段和平手段的援助请求列表。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在经过一年的时间之后，坚堪孜松和印度政府情报部门的关系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

我们请求你们在以下几个方面提供援助：

1. 如果西藏实行的政策发生了改变，如果他们〔中国人〕改变了达赖喇嘛的权力和地位，如果中间派左右了事件的走向，如果他们妨碍了佛教，或者如果所有这些情况都直接或间接地发生了，那么在西藏的人民将会挺身而出，开始行动〔做一些事情〕。如果出现那种情况，我们请求印度政府向全世界公布并向联合国报告。
2. 扎什伦布拉让〔班禅喇嘛的政府〕和中国人是同路人，可以说是“一丘之貉”。²⁴ 如果他们诱使邦达多杰和德格（色）这样的人把卫、藏和康分裂开来，制造内战，请问印度政府愿意向我们提供多大的帮助？²⁵
3. 前面已经提到，噶伦堡是印度和西藏之间一个非常重要的边境地区，所以我们正设法在人民和寺院中展开行动，以避免在这个地区受到任何共产党的影响。因此我们请求印度官员、特工和警察能够保持一致，同我们进行闭门磋商，同时思考改善状况的方法。
4. 我们已经征募了一些人来学习如何使用无线电设备，另外还有一些学生会逐渐从西藏赶来〔学习〕。所以请出售给我们十五到二十部简单易用、质量可靠并且可以用电池的无线电设备。
5. 我们得知印度政府将会支付教授无线电的老师的薪水和〔培训地点的〕房租，对此我们非常感激。请每月按时借给我们四千卢比作为经费，将来西藏重获自由的时候我们将会连本带利还给你们。
6. 和我们以前的请求一样，请为我们安排如何使用炸药的培训，并且请尽快卖给我们可以爆破中国人的武器、物资仓库以及公路和桥梁的器材。

24. 藏语：*khijang kharis jiggyur*。

25. 邦达多杰和德格（色）是康区非常有名的藏族头人，他们都在和中国人合作。

7. 为了在将来当我们的行动有所扩大而需要军事援助的时候，能够得到所需的资金支持，请先行和我们签订一份协议，这样我们才能安心。像前面提到的那样，我们将会在西藏获得独立之后偿还这些钱。
8. 和我们以前的请求一样，如果红色中国人试图强行取走西藏政府放在〔锡金〕甘托克的黄金和白银，那么我们绝不会交给中国人。我们将把它转移到某家适合的印度银行，所以我们请求你们私下帮助我们把这些黄金和白银转运过来。
9. 对于那些携带自己的黄金、白银和铸币以及贵重物品和圣物到印度来的人，我们请求印度政府不要加以阻拦并且不要对他们课税。
10. 由于〔西藏〕食物的价格很高，所以很多西藏人要到印度来，我们请求印度警察和边境管理机构不要阻拦或者为难他们。如果他们到印度修路的话，那么很多人会在炎热的季节患上疾病甚至死亡，我们无法承担这样的责任，所以我们请求印度政府给他们适量的土地，这样他们就可以从事农业同时合法地居留。我们也请求〔向他们〕提供种子和金钱上的援助。
11. 对于开设在噶伦堡的藏语学校和图书馆，我们请求印度政府按年向我们提供经费支持，这样它们就能得到发展而不致衰败。²⁶

印度情报局同意了这些请求中的大多数，但是不包括训练使用炸药。

1955年8月18日，坚堪孜松碰了头，开始进行下一步的活动——在西藏建立一个基地。堪穷洛桑坚赞被指派负责向拉萨派遣秘密特工，并主要负责和西藏联系。²⁷到1955年年底的时候，印度经常性地向坚堪孜松提供经费，并同他们一起制作秘密的身份卡片，以使从西藏来的人可以在边境上不被阻拦。²⁸

正当这个反中抵抗组织在印度得到发展的同时，西藏内部发生了一件重大的政治事件——中央邀请达赖喇嘛访问中国。这将是下一章的主题。

26. 夏格巴亲笔写的未署名、未标明日期的藏文笔记，由夏格巴的家人向本课题提供（日期是从所提及的事件推断出来的）。

27. 拉姆次仁，1992: 184。

28. 夏格巴日记（藏文手稿），第一册（这份文件是夏格巴的家人为本课题提供给班觉·擦绒的）。

第十九章

达赖喇嘛前往北京

■ 邀请

1954年春天，中央决定在9月举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里程碑事件，因为新的人大将会产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部宪法，同时选举产生国家领导人。所以中央政府决定邀请达赖和班禅赴北京出席会议，为这个1950年代最重要的事件之一捧场。由于西藏的工作进展得很顺利，因此中国第一次有机会和达赖喇嘛直接沟通并对他的态度和思维施加影响。

6月初，邓小平发电报向西藏工委通报了决定，并要求他们“争取达赖、班禅参加会议”。¹ 电报决定，在拉萨由张经武征询达赖喇嘛和西藏政府，在日喀则由西藏工委日喀则分工委书记梁选贤通知班禅喇嘛。² 班禅喇嘛迅速接受了邀请，但是关于达赖喇嘛是否应当去，以及潜在的好处和风险等问题在他的官员中引起了激烈的争论。

噶厦和对达赖喇嘛很有影响力的副经师赤江仁波切认为应当去，但是有很多西藏精英反对，包括译仓和色拉、哲蚌、甘丹三大寺的堪布及达赖喇嘛的正经师林仓仁波切等。达赖喇嘛的哥哥，同时也是基巧堪布的洛桑三旦也倾向于反对。在缺乏共识的情况下，噶厦召集了民众大会讨论这个邀请。与会的功德林札萨回忆了两派在会议中的立场。

有些人说至尊有可能会回不来，说他们〔中国人〕也许会给他一个大的头衔，然后坚持要他留在那里。……是的，如果发生那种情况

1. 李威海，1996: 3。
2. 李威海，1996: 4。

我们是不能接受的。其他人说，如果至尊去了并见到他们〔中国的领袖〕，假如他们说难听的话，至尊只能忍受，这对我们来说就是损失。与其那样，不如让他待在这里，从这里发表讲话。接着有人说，如果至尊只是以一个人民代表的身份去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那么达赖喇嘛的地位将会被矮化。持类似观点的人很多。³

功德林没有提到的另一个重要的关切点是，人们担心达赖喇嘛在长时间访问北京的过程中暴露于新事物之中，令他的态度和观点受到影响，而这些影响是保守分子和传统派不愿意见到的。前面已经讨论过，西藏政治体系固有的一个组成部分就是对达赖喇嘛所看到和体验到的东西进行严格控制。

但是功德林也记得有些人强烈认为达赖喇嘛应该去。

接下来发言的人说〔达赖喇嘛〕应当去。他应该出席并参与讨论，听听他们说些什么并告诉他们我们是怎么想的。而且，他也应当到处看看。不仅仅是我们，还有很多头头也要去，所以应当去见见他们，了解了解他们，并同他们商量商量。他们觉得与其待在角落里想我们有多伟大，还不如出去看看。我们不能像这样和他们〔中国人〕打交道。⁴

最终，民众大会中远远超过一半的人觉得达赖喇嘛不应当访问中国。尽管如此，对噶厦来说就这样把这个看法作为最后的决定，风险实在太大了，张经武一直向噶厦和阿沛强调这是中国历史上非同寻常的事件，达赖喇嘛能够出席并会见中国的领袖是极为重要的。这些话很有分量，所以噶厦又叫来所有民众大会的代表，试图说服他们改变态度，在这个尝试失败之后，噶厦向达赖喇嘛报告了这个僵局。

尽管达赖喇嘛了解反对者的担忧，但是和大多数宗教人物不同，他本人是倾向去的。他用英语解释说：“〔我〕作为一名年轻人当然一直渴望去看看新的地方，看看更多新的现代的东西。但是那时，三大寺的代表在民众大会上非常非常反对我访问中国的想法，并且我想很多西藏高级官员

3. 功德林，访问记，1992，德拉敦，印度。

4. 功德林，访问记，1992。

也非常非常担忧这个行程。不过，另一方面，阿沛和少数其他人则非常强烈地认为我应当去中国，应当把握住这个机会。”⁵

功德林也记得达赖喇嘛说：“我们起初和中国人谈判的时候，他们说他们要来好好地帮助我们发展西藏。但是到现在为止，我们都只和在西藏的一些领导人谈过，还没有和那些主要负责人比如毛泽东见过面，所以我觉得去比不去要好。”⁶

但是两派人都不愿意改变己方的观点，而达赖喇嘛又不愿意自己作决定，于是西藏政府在罗布林卡的益西贡布（Yeshe Gompo）神像前打卦，再一次把决定权交给了神仙，而打卦的结果是赞成去中国。所以，在1954年6月10日，西藏政府通知西藏工委达赖喇嘛会去北京，但是前提是要满足他们一系列的条件，这些条件旨在减轻那些反对此次行程的人的担忧。中国方面的材料对这个经过描述如下：

下午5时，西藏工委门前来了不少衣着华贵的藏人——他们是全体噶伦、仲译钦莫、孜本、三大寺现任和卸任堪布、各级僧俗官员的代表，他们是专程来向张经武呈递关于达赖喇嘛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的通报书。……

宾主坐定后，〔噶伦〕索康·旺清格勒首先讲话，他说他代表噶厦、译仓和三大寺的僧俗官员一致同意达赖喇嘛赴京开会，并正式报告张代表。

张经武听罢当即对达赖赴京开会表示热烈欢迎，对僧俗官员拥护、支持达赖赴京表示感谢，并请他们放心，对达赖一路的食、宿、行及健康，中央早有安排，不必为此担忧。

张经武讲完后见众代表你看我，我看你，欲言又止，似有难言之隐的样子，就劝慰他们说：“各位有话只管讲，不必有什么顾虑。”在他的一再催促下，索康·旺清格勒向张代表提出三个请求，请张经武务必答应。……

“第一个请求，就是请中央和张代表要绝对保证达赖喇嘛的安全。”

5. 达赖喇嘛，访问记，1995，达兰萨拉。

6. 功德林，访问记，1992。

张经武见第一条是要保证达赖的安全，这是不成问题的问题，上自中央，下至沿途各级地方政府，都把保证达赖安全作为首要工作，做了周密细致的安排，便说：“各位尽请放心，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是毛主席、中央人民政府请去的贵宾。达赖喇嘛的安全问题不仅各位考虑到，中央人民政府对此更为重视。已给沿途各地政府和驻军发了电报，除布置安排达赖喇嘛的生活问题外，特别强调的就是要绝对保证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的安全，〔这一点〕请各位放心。”

众代表听了张经武一番解释十分欣慰，点头称是。……接着大喇嘛又提出第二个请求：达赖喇嘛此次赴京开会时间最好不要超过十个月，无论如何也不要超过一年。

张经武听后觉得让达赖一年内回来的请求完全可以答应。张经武说：“我可以答应达赖喇嘛一年内回来，但各位知道，从拉萨到北京远隔千山万水，交通又不便，谁能料到途中会发生什么事呢？天气变化、交通受阻、达赖喇嘛的身体情况等等这些因素不是我们能预先想到的，如果真要晚回来几天怎么办？晚回来一些时候你们又想干什么？！”……

另一位堪布说：“张代表，我们只是一种愿望。只要张代表答应，我们回去就好做工作了。当然，遇到特殊情况和实在克服不了的困难另当别论。我们怕的是达赖喇嘛在北京和内地滞留太久，拖而不回，恐怕会在僧俗群众中引起种种猜测和不安，这对西藏和中央的工作都不利。”

张经武边听他们的话边在心里盘算，……完全有把握在一年之内让达赖返回拉萨。想到这儿，他说：“好，我答应一定让达赖喇嘛一年之内返回拉萨。我作为中央政府的代表是言而有信的，你们应该相信我。”……

“好，好，”众代表高兴得笑了。

“那你们最后一个请求是什么呢？”张经武主动问道。

“达赖喇嘛饮食有一定习惯，希望到内地仍能按在西藏的习惯予以照顾，”索康·旺清格勒说。

“这条好办，达赖喇嘛到内地后的生活完全按照他个人的生活习惯，中央早有安排。中央指示我和其他人陪同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赴京，也是为了对他们的生活等方面给予特殊照顾，各位尽请放心。”

众代表点头称谢，可又像还有什么话要说。张经武说：“有什么话各位尽管说，不必有什么顾虑。”

在张经武的鼓励下，代表们说：“我们要求达赖喇嘛这次去北京不要坐飞机。”

“这是为什么？”

“飞机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十分不安全。万一有个闪失，我们可承受不起呀。”

……张经武笑了起来，“各位坐过飞机吗？”

众代表你看我，我看你，又一齐看着张经武摇头说：“没有，没坐过。”

“各位没坐过飞机怎么知道它不安全呢？”张经武和颜悦色地说：“飞机是最快速、最方便、最安全的现代化交通工具，几百里路用不了一个钟头就到了。刚才各位说一定让达赖喇嘛在一年之内回来，可是又不让他坐飞机，这个请求恐怕有些不尽情理了吧。达赖喇嘛如要坐飞机，我会和他坐同一架，有我的安全，达赖喇嘛的生命安全就有保障，各位不会有什么顾虑吧！再说达赖到了内地，他要坐飞机恐怕也是各位和我所不能阻止的。你们谁能做得了达赖喇嘛的主呀？”

但众代表仍坚持请张经武转告中央不要让达赖坐飞机。

一时间相持不下，张经武灵活地说：“这样吧，我先答应你们，到内地后听从达赖喇嘛的意见和看情况再定，你们看这么好不好？”

事已至此，代表们的要求张经武基本都答应了。众代表满意地一致向张经武表示感谢，离开了工委。⁷

邀请达赖喇嘛去北京还产生了另一个结果，即人民会议的复活。人民会议的新领导者之一阿乐群则回忆了他和其他人是如何强烈反对达赖喇嘛去中国以及“人民”是如何开始再一次参与政治的。

我们这些人民会议的成员和帕拉〔达赖喇嘛的卓尼钦莫〕有联系。帕拉告诉我们说，达赖喇嘛要去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会议。达

7. 李威海，1996: 21。

赖喇嘛已经答应去了，因此你们人民会议的成员应当尽力阻止他去。帕拉是背地里告诉〔我们〕这些事的。⁸

问：你是怎么见到帕拉的？

我和他有私交。他邀请我去参加聚会，我们也一起打麻将。

几天以后，我们人民会议的成员带了一条哈达去见帕拉，要他代表所有西藏人请求达赖喇嘛不要去中国。几位代表到达赖喇嘛的秘书处去见帕拉。……我们没有携带文书，只是口头上请求。我们送上了一条哈达和雪恰 (*shog ja*)〔用纸折成的传统式样的套子，里面包着钱币〕。……帕拉告诉我们过几天他会给我们一个答复。

几天之后，我去看有没有答复。帕拉告诉我达赖喇嘛说他访问中国是最终的决定，为了营造良好的中藏关系他必须去。于是我离开他家，召集了一个会议，会上我们决定为达赖喇嘛举办一场长寿法会（藏语：丹书霞甸，*denshu shabten*）。

接着我们去找阿沛。⁹他是站在共产党一边的，但是我们觉得他是个老实人，于是派了三、四个代表去找他。……我们要阿沛告诉中国人不要带达赖喇嘛去中国出席会议。阿沛回答说：“达赖喇嘛去中国是他自己决定的，不是中国人决定的。你们人民会议可以为他办长寿法会，但是这个行程是按照达赖喇嘛自己的意愿决定了的，也是已经安排好了的。”

长寿法会在罗布林卡举行。首先是〔僧侣〕诵经，接着由我们向达赖喇嘛献上哈达〔和曼扎〕，然后是礼物。很多人都去了，有上师、普通僧侣、贵族以及人民会议的成员。所有的花费都是由人民会议里的有钱人赞助的。……

在仪式之前我们开了一个会，会上人民会议里的康巴人说我们应当在长寿法会上磕长头，并喊：“达赖喇嘛，请不要去中国。”但是如果我们真这样做，就成了进行非法请愿（藏语：*dongshu*），

-
8. 但是达赖喇嘛回忆说帕拉是赞成去的。他说他不认为帕拉会前脚告诉他应该去，后脚却告诉阿乐群则设法阻止他。他说：“和我这么说，但却和米茫（人民）那么说，他大概不会这么做。实际上他是个很聪明的人，有时候也会耍一些小把戏。但是对达赖喇嘛这么做，我认为他不会”（访问记，2004，达兰萨拉，原版中英文访谈内容未经校准）。另一方面，帕拉是反对中国人的，所以他可能只是想利用这次机会挑起人民重新反对中国人。
9. 阿乐群则在他的书中说，是帕拉告诉他到噶厦去设法阻止达赖喇嘛的行程，所以他去找了阿沛（阿乐群则，1983: 420–21）。

这样的话事情就严重了。康巴人不懂〔西藏〕政府的法令，于是其他人进行了解释，最终他们并没这样做。¹⁰

于是，在拉萨的人民会议成员都参加了这场长寿法会。在法会上达赖喇嘛说：“我去中国参加的这次会议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同中国建立良好的关系非常重要，这是由打卦决定的。……今天人民会议为我举办长寿法会，这很好。你们担心我的安全，这一点我不应该怪罪你们。我将会去中国，但我一定会在一年之内回来。到现在为止你们行事都很谨慎，我离开的这段时间，你们也不能惹是非。”也就是说他承诺在那里的时间（至多）不超过一年。¹¹

新的人民会议的出现让中国方面很不悦，他们原以为这个组织在1952年就已经永久解散了。虽然它仍然处于萌芽状态，但是中国人还是这样描述它的重新出现：

伪人民会议分子组织所谓“献礼”的阴谋活动。达赖喇嘛宣布去北京参加全国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以后，以阿乐群则、阿南拉（Ananla）等为首的伪人民会议分子，指使江孜、日喀则等地的反动组织，以给达赖念“消灾长寿经”为借口，继续对我进行诬蔑；他们在拉萨以向达赖“献礼”为名，煽动三大寺喇嘛及部分群众向达赖请愿，企图阻止达赖赴京。¹²

但是最后，达赖喇嘛和噶厦还是如愿了。在1954年的夏天，达赖喇嘛开始了他对北京的第一次访问。

■ 达赖喇嘛出发

对拉萨人来说，达赖喇嘛的离开是一个伤心的时刻。一位西藏政府官员回忆了当天拉萨市的气氛。

10. *dongshu* 字面意思是“面对面的请愿”，指的是不通过大卓尼而直接向达赖喇嘛请愿的做法。具体做法是某人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走到达赖喇嘛的仪仗前或者在法会中向达赖喇嘛磕头请愿。这是一种让达赖喇嘛听到诉求的手段，但是需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因为要罚鞭笞一百下。

11. 阿乐群则，访问记，1993，克利夫兰，俄亥俄州。

12. 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1990，1954年7月条目。

至尊出发去中国的时候，他从罗布林卡的大门动身，先到雪，再到拉萨，最后到达古崩岗（Kumbumthang），¹³ 从那里坐牛皮筏〔过拉萨河〕。这段路很长，从罗布林卡开始〔到河边〕沿路挤满了人，都在巴望着能到达赖喇嘛一眼。每个人都磕头，磕完爬起来再沿路跑很远的距离希望能再看一眼，然后再爬起来又继续跑。人们满布在从罗布林卡的大门到终点的整条路上。当他上船的时候，〔人们〕就像一片巨大的树林，简直可以用人海来形容。河边全是人，连一块空地都没有。很多人撕心裂肺地哭着。

在那个时候，达赖喇嘛的仪仗经过时的情况和现在〔在印度〕不一样。那时警卫会鞭打人民，所以很多人很害怕。年老的妇女快晕倒了还要大声喊：“嘉华仁波切〔至尊〕！求求您不要留在那里超过一年。求求您立即回来！”（*Gyawa Rimpoche! Lo chik le mashu ro nang. Namgyang pheronang!*）即使冒生命危险他们仍然不断地哭喊着他们的诉求。……

当〔达赖喇嘛〕到达河的对岸时，所有在这边的人都哭了。一些年老的妇女昏了过去，听说需要人抬着离开。我甚至听说有一个人死了，但是我没有亲眼看见。情况就是这样，在达赖喇嘛去中国的时候人民根本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他们只是想中国人一定会对他不利，中国人是说他们要好好地安排，但是不管中国人说得再怎么动听，西藏人打心眼里就不认为中国人会干好事。¹⁴

另一位西藏官员的回忆很相近：

在拉萨人的心中，大家都担心中国人可能不会好好对待〔达赖喇嘛〕。每个人都担心这一点，很多人都哭了。……然朵仁波切（Radö）和我在那里。〔达赖喇嘛的〕两位经师也在那里，于是我过到〔河〕对岸去帮助达赖喇嘛。……一些年老的妇女大声喊着“求求您不要走，您不能走啊”这样的话，人群中喊声震天。每个人都很担忧，认为至尊真的不应该去，认为“他们”〔中国人〕可能会〔对达赖喇嘛〕不利。¹⁵

达赖喇嘛本人描述那天的情况时说：“我离开拉萨的时候有非常非常多的人在哭。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拉萨河（吉曲）上没有桥。当我们坐牛

13. 渡口实际上叫做拉东香卡（Lhadong shenka），古崩岗是它前面的一块平地。

14. 札登，访问记，1992，达兰萨拉。

15. 然朵强佐（Radö Chantsö），访问记，1992，达兰萨拉。

皮筏渡河的时候，在河这一边的岩石上有非常多的人在哭，甚至有些人好像都要跳进水里了。”¹⁶

班禅喇嘛和达赖喇嘛一起去中国，这使得与双方如何看待他们各自的地位及职权相关的各种棘手问题又浮上了台面。这意味着必须界定好他们的地位，然后再在礼节安排上加以反映。这个问题在去北京的前一段路途中不是很复杂，因为班禅喇嘛及其随行人员会自行前往西安。达赖喇嘛（由张经武陪同）于7月15日离开拉萨沿着西南线去北京，而班禅喇嘛由范明陪同于次日出发沿西北〔青海〕线去北京。¹⁷然而，在最后一段路程，中央坚持要西藏各部分的代表一起上路。这时候体现出相对的地位就很重要了。



图 22：左起：班禅喇嘛、牙含章、范明，1954年5月摄于西安。照片来源：范明

16. 达赖喇嘛，访问记，1995。

17. 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1990，1954年7月条目。

班禅集团在 1952 年拉萨的会见仪式中受挫，破坏了开启班禅—达赖关系新一页的机遇。我们已经看到，那个时期班禅喇嘛的官员的恨意非常深。达赖喇嘛说，他注意到班禅喇嘛在 1954 年的行为举止已经变得没以前那么友好、比较喜欢争胜了。

那时我们将要去中国，我们两人在罗布林卡见了一面。……班禅喇嘛来拉萨的时候，他的态度发生了一些变化。现在他有点想一较高低的样子，有些人察觉到了这一点。我们在拉萨短暂地碰了面，然后他沿北线走，我们在西安碰面。当我们在西安第一次见面时，他像西方人那样和我握手。我的卓尼钦莫〔帕拉〕和我的随从们说：“哦，这太奇怪了”〔达赖喇嘛大笑〕。……他给我留下的印象就是这样。¹⁸

然而，正如在前面一章已经指出的，中央已经认定达赖喇嘛拥有较高的地位及职权，这就意味着在此次行程的各个方面必须以比班禅喇嘛高的规格来对待达赖喇嘛。平汪当时在北京，事后他回忆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

这是达赖喇嘛第一次访问中国，因此中央政府非常想安排得尽善尽美，以使这次访问在争取达赖喇嘛的工作中发挥重要作用。因为班禅喇嘛也要来，接下来必将会涉及到班禅喇嘛的自治等问题。又因为最近〔1954 年 2 月〕在北京召开的“板门店会议”已经决定要把达赖喇嘛当作主要的、把班禅当作次要的来对待，因此我们决定利用这个机会在行动中清楚地体现这一点，使西藏和中国所有的官员都能亲眼看到，同时也能帮助西北局和西南局官员解决他们之间的矛盾。¹⁹

北京仔细准备了访问的各个方面。毛泽东批准了一份由国家民委主任、统战部部长李维汉拟定的接待章程。这份文件指出达赖和班禅的接待工作是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其中的每一步骤都要按照“章程”办。它也指出，不管他们去哪里也不管他们参加什么活动，达赖都应当是正的，而班禅应当是副的。²⁰

18. 达赖喇嘛，访问记，1993，达兰萨拉。

19. 克雷格（1997: 177–78）在书中错误地说，自从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双双出发去北京，“中国人抓住一切机会来宣示这两位西藏最重要的喇嘛享有同等的地位”。实际情况当然恰恰相反。

20. 平汪，访问记，1999，北京。

实际上在8月2日，也就是两位喇嘛还在路上的时候，中央给各省发去指示电，明确指出他们的不同地位和背景。这份指示电要求官员们尽最大努力改善两位喇嘛之间的关系，但是也规定在任何条件下都要把达赖喇嘛看作第一位，把班禅喇嘛看作第二位。

关于接待达赖、班禅的招待、宣传方针

达赖、班禅来京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西藏进一步靠拢祖国和中央的表现，在政治上有很重要的意义。但汉藏间的民族隔阂仍然很深，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匪帮仍在尽力挑拨西藏同中央的关系（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捏造中央扶班禅、压达赖，并且准备以班禅压达赖），而达赖、班禅两集团间很不和好，并且彼此都怀疑中央的偏袒。因此在有关达赖和班禅之间的关系问题上，我们必须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尽可能做得恰当，避免刺激他们任何一方，避免引起他们的猜疑，并且适当地促进他们之间的团结。

达赖和班禅是西藏的两位宗教领袖。他们在西藏人中享有崇高的声誉和广泛的影响力。历史上他们互为师徒，但是他们在西藏的地位是不同的。达赖的宗教影响力要比班禅的大，达赖是第一位的，而班禅是第二位的。更重要的是，在整个西藏，班禅只控制了后藏的一小部分地方和大约一成的人口。达赖控制了前藏、阿里全部、后藏大部分地方和大约九成的人口。噶厦是由达赖领导的，而在很长时间里，它一直是西藏的统治机构。换句话说，它就是西藏地方政府。它曾经控制着西藏的军事和外交权力，并且代表着整个西藏。这意味着达赖和达赖集团占据着西藏的领导地位。

十三世达赖和九世班禅之间的不和导致了双方对对方的深深仇恨。由于班禅的特殊宗教地位，班禅堪厅成为班禅控制地区的管理机构。迄今为止，班禅集团尚没有承认达赖的领导地位。他们一直试图扩大自己的权力，想和达赖平起平坐。达赖集团也不愿意承认班禅应有的权力，并强调西藏只能有一个领袖，而达赖喇嘛就是这惟一的领袖，只有达赖才能代表西藏。中央的方针是在西藏地区逐步地实现统一的区域自治，在达赖第一，班禅第二，达赖为正，班禅为副的原则下，把达赖、班禅两方面的爱国力量和其他爱国力量团结起来，建立统一的西藏自治区。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们需要经历多年的复杂和困难工作。在过去几年里，我们已经做了一些事情，但是还存在巨大的困难，其中之一是双方都对中央有所怀疑。

由于以上情况，在达赖和班禅在北京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期间，中央的各个部门、地方党委和政府都要按照以下规定安排欢迎会、娱乐活动、会见领导和发布新闻。

〔具体规定省略〕

中央

一九五四年八月二日²¹

平汪见过并且提到过上面这份指示（及规定）：

两方面对这份文件的反应揭示了他们的不同观点。张经武答复说〔要求优先对待达赖喇嘛的〕章程是完全正确的，是符合西藏的情况的。他说他会百分之百地按这份指导方针办。范明的答复则较为含糊。他的电报说，有些同志（西藏工委日喀则分工委书记和班禅堪厅的副秘书长）不赞同这个决定，比如梁选贤。我能看到这些电报是因为我当时正在北京的国家民委工作。我立刻意识到真正不赞同的是范明，因为梁选贤是从西北局来的，所以范明怎么说他就怎么做。我把我对范明的电报的看法告诉了刘格平和其他领导，他们表示同意我的看法，但是说这不要紧，因为毛泽东已经亲自批准了这些指导方针。于是我们就严格按照这份关于接待问题的文件安排接待工作。²²

平汪进一步回忆说所有的东西包括两位喇嘛的床的尺寸都做了不同的安排。

这次访问很重要的一点是各个方面的安排都受到领导人仔细的监督。例如，习仲勋和邓小平都亲自前来检查了两位喇嘛的住宿安排。习仲勋是属于西北局的，所以和班禅喇嘛集团的关系亲近。当他看到给班禅喇嘛的安排规格不同时他摇了摇头，但是什么话也没有说。另一方面，属于西南局的邓小平表扬了我们，说一切都安排得恰如其分。²³

21. 《对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未出版的手记）》，出版日期不明（划线部分为强调）。具体的规定没有找到。

22. 戈尔斯坦、道伟喜饶和司本石初，2004：187-88。

23. 戈尔斯坦、道伟喜饶和司本石初，2004：187-88。

随着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到达北京的时间日益临近，关于到底应该由谁去火车站迎接他们的争论出现了。这个争论很好地体现了规划此次行程各个方面的谨慎程度。平汪解释说：

在国家民委内部，负责接待〔这些西藏人〕的是我们三人：赵范（民委主任李维汉的秘书）、Peng Sika（蒙古族，民委办公厅副主任。中文名不详——译注）和我，我们收到通知说高层已经决定由周恩来去迎接他们。我对这个安排不太满意，于是在我们分委员会里作了表示。在阿沛于1951年来北京谈判《十七条协议》的时候，是周恩来去迎接他的。但是阿沛在西藏只是一个噶伦，地位要低于达赖喇嘛。所以如果还让周恩来去迎接达赖喇嘛，（那些非常在意礼节的）西藏官员会觉得是对达赖喇嘛缺乏适当的尊敬。我们都同意这个看法，于是赵范把它汇报给我们的上级李维汉。李维汉答复说周恩来总理是国务院的最高领导，同时也是党的最高领导人之一，让周恩来去迎接两位喇嘛是再合适不过的。但是他也说，既然我们的观点有分歧，“我会告诉毛主席和周总理，让他们决断。”

第二天早上，李维汉把我们叫到他的办公室，告诉我们中央政府同意我们的看法，决定让朱德也去火车站。朱德是解放军的总司令和政治局常委，在那个时期他的画像是挂在几乎所有建筑物上的两幅画像之一，另一幅是毛泽东的画像。这对于向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展示中央政府的特殊尊敬是非常适当的。²⁴

于是，两位喇嘛在北京火车站受到周恩来、朱德、李维汉和其他一些共产党领导人的欢迎。一个有可能改变中藏关系的关键性访问开始了，这将是下一章的主题。

24. 戈尔斯坦、道伟喜饶和司本石初，2004: 188–89。

第二十章

达赖喇嘛在北京

达赖喇嘛和他的高级官员于 1954 年 9 月 4 日到达北京，他们的到来为中国领导层打开一道大门。争取达赖喇嘛是毛泽东的渐进主义策略的核心，但是到目前为止中国人和达赖喇嘛的接触都非常有限，而现在中共获得一个难得的宣传中国、中共和社会主义的机会。在 1951 年和 1952 年有很多问题被搁置下来，比如军政委员会的问题，藏军、藏钞和班达矛盾等问题。达赖喇嘛的到来也给中国人提供了一个重新讨论这些问题的绝好机会。

.....

中国人立即展开了旨在争取达赖喇嘛的一系列活动。在达赖喇嘛到达北京的第二天，朱德亲自举行宴会，欢迎他和班禅喇嘛的到来。¹接着在 9 月 11 日，毛泽东在中南海这个中国最高领导人发号施令的院落里会见了他们。藏族干部平汪被指派陪同达赖喇嘛并担任达赖喇嘛的翻译，他回忆了毛泽东和达赖喇嘛的第一次谈话。

在达赖喇嘛到达的三四天之后，我们安排了达赖喇嘛、班禅喇嘛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和邓小平等最高领导人的会见。我是翻译。这是达赖喇嘛第一次见到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同时这也是这些最高领导人第一次见到达赖喇嘛。有意思的是领导人中只有毛泽东一个人说话。毛泽东告诉达赖喇嘛，中央政府对于他能够访问北京感到非常高兴，他们欢迎他的到来。他说中国人和西藏人之间的关系是很重要的，中央政府将来会花大力气支持西藏的发展。

1. 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1991: 209–17。

达赖喇嘛回答说他很高兴来到北京。他说以前不知道中国的真实情况，所以去了和印度交界的亚东，想到国外寻求庇护。但是自从张经武来了之后，他逐渐认清了大势，现在他很高兴有机会见到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

达赖喇嘛令人印象深刻。他只有十九岁大，但是说话的时候很自然，没有表现出丝毫的紧张。毛泽东很和善也很坦率，他没有表现得像一位统治者，说起话来像朋友一样随和……

这次会谈持续了大约一个小时。随后，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把达赖喇嘛送出房间，毛泽东还亲自为他开车门。这次会见似乎让毛泽东很高兴。他握着达赖的手告诉他：“你到北京就像到你自己家里一样。什么时候来北京，尽管告诉我。我的地方你想什么时候来都可以，不要不好意思。如果你有什么需要的就直接告诉我。”当达赖和我坐上车回住处的时候，达赖也非常高兴。他兴奋得拥抱了我说：“平汪拉，今天的事情很顺利。毛泽东和其他人不一样，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我也非常高兴，因为这个关键性的首次会面进行得如此顺利。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对西藏的希望全都维系于此。²

西藏政府代表团对和毛泽东的首次会面也很满意。代表团中很多人原来担心中国领导人会不尊重达赖喇嘛，或者嘲笑西藏的服饰和风俗，现在他们的担心消除了。中国地位最高的领导人之一朱德到火车站迎接他们，并举行了大型的欢迎宴会；而在旧西藏官员眼中等同于中国“皇帝”的毛泽东不仅在会见中表现出友好和热情，而且还展现了极为尊重的姿态，把达赖喇嘛送到车边并帮他开了车门。在西藏人看来，主人送客人“出门”的行为代表了对要离开的人的尊敬。所以从一开始，毛泽东和其他最高领导人对待他们的态度就让达赖喇嘛及其随行人员喜出望外、印象深刻。

9月15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第一次会议。在接下来的两周里，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作为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主要讨论中国的宪法问题。9月16日，达赖喇嘛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发言。他总结了过去四年来的情况，特别提到少数民族实行自治的权利，同时也评价说存在着一些错误。他说：

2. 戈尔斯坦、道伟喜饶和司本石初，2004: 189-91。



图 23：达赖喇嘛（右）和班禅喇嘛（左）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投票。1954 年 9 月摄于北京。照片来源：陈宗烈

主席、各位代表：

今天在祖国的首都——北京举行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将要庄严地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是符合全国各民族利益的事情。

关于少数民族方面：宪法草案总结了几年来执行毛主席的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政策的_{成绩和经验}。特别是宪法草案上规定了各民族可以按照它的发展特点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以充分行使自治权利。

此外，宪法草案又明白地规定：“国家在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过程中将照顾各民族的需要，而在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上将充分注意各民族发展的特点。”

这都是非常正确的，我们西藏全体人民热烈地表示拥护。

西藏在过去很长的历史时期中受着国内历代反动政府的压迫，特别是由于外国帝国主义的挑拨离间，以致于和祖国的关系曾经有一个时期疏远了一些。

但是，自从1951年签订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中央代表、进藏人民解放军及工作干部先后到达西藏后，执行了中央的民族团结政策，遵守和执行了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十七条协议》，这些正确的政策和其他各项措施，都是可以清楚地看到的。

与此同时，由于三年多以来，先后从西藏地方派出了几个参观团、致敬团来到祖国内地，他们回到西藏后，将所了解的祖国内地的情况作了宣传解释，因而逐步解除了西藏人民的疑虑。

中国各兄弟民族，特别是汉藏民族正在日益走向亲密团结之中。班禅·额尔德尼能返回西藏和我相会，也进一步加强了西藏内部的团结。根据毛主席的各民族间与民族内部应该团结的政策，在西藏业已出现了新的、和平友爱的气象。

关于宗教方面，在敌人的各种挑拨离间中，主要的一项，就是造谣共产党、人民政府毁灭宗教。西藏人民具有很浓厚的宗教信仰，这些谣言曾经使他们疑虑不安，但是现在“共产党、人民政府毁灭宗教”的挑拨离间的谣言，已经全部破灭了，西藏人民已经切身地体会到了他们在宗教信仰上是有自由的。

关于西藏的经济、文化建设方面：西藏过去因为交通不便，进行经济、文化建设都很困难，但是在中央的大力帮助之下，三年多以来，开辟了不少荒地，建立了人民银行，对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发放贷款，高价收购难以外销的羊毛，因此促进了西藏经济的发展。

其次，又建立了学校、医院，以培养藏族干部，发展文化。

在进行经济建设上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中央拨了巨额经费，修筑康藏公路，筑路人员在崇山峻岭及流水急湍的河流上不顾一切危险，努力地进行工作。这条公路预计在今年年底就可以通车到拉萨。这不仅是建设繁荣新西藏的基础，而且在保卫国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

最近后藏一部分地区发生了水灾，中央得知后立即拨款80亿元救济灾区人民。最近我国和印度签订的中印两国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完全反映了西藏地区人民的意愿，获得西藏人民的拥护。所有这一切，都具体地表现了中央对西藏和西藏人民的深切关怀，同时也显示出我们祖国的强大。

目前在西藏，根据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西藏地方政府和僧俗人民大力帮助人民解放军购置粮食，支援交通运输等，《十七条协议》正在实行之中，以便使西藏的政治、经济进一步走向良好发展的道路。但是由于历史上多年反动统治时期施行民族压迫政策所造成的民族隔阂的残余尚未消除干净，西藏人民大众对祖国的情况还不够熟悉等所引起的一些缺陷，已在不断地改进中。进藏人民解放军和工作干部的大公无私的一切措施，归根到底，都是为了藏族人民的利益，这是我们所深切了解的。但是个别细小问题上，主要是由于语言的隔阂，以及不了解风俗习惯等原因而发生的一些微小的错误，说明情况后当即改正了。

今后我们彼此将要毫无顾虑地进行批评讨论，特别是在先进的汉民族的帮助之下，在我们各民族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之下，我们有坚强的信心，遵守宪法，执行《十七条协议》，逐步把西藏建设成为一个政教昌盛、繁荣幸福的地方。

最后让我祝贺：出席大会的各位代表的健康！祝贺大会的胜利和圆满的成功！³

在接下来的那个星期中的9月27日，随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即将闭幕，达赖喇嘛被光荣地选举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副委员长。虽然这个职务没有实际的政治权力，但是它使达赖喇嘛在中国政府的领导层中获得很高的地位，同时也使他和班禅喇嘛明显区隔，因为班禅喇嘛只是被选为常务委员会的委员。⁴

西藏代表团随后参加了国庆（10月1日）典礼。但是在这个活动结束后，中国人马上切入“正题”，重新商讨解决前面提到的那些问题。实际上，毛泽东在首次会见达赖喇嘛的时候就提到军政委员会的问题。⁵他告诉达赖喇嘛，全部执行《十七条协议》所有条款的时机仍然不成熟，而且已经不再需要设立军政委员会了。这让达赖喇嘛吃了一惊。毛泽东说这些“委员会”是在人民政府成立之前的过渡性机构，在所有大的地区它们都已经停止存在。因此他建议西藏跳过这一阶段，直接成立以达赖喇嘛为主席、班禅喇嘛为副主席的西藏自治区。毛泽东说，一个自治区对西藏人

3. 新华社文章，收录于英国外交部档案，FO371/110228（划线部分为强调）。

4. 在后来的12月，班禅喇嘛被选举为政治协商会议的副主席。

5. 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1995，1954年9月条目。



图 24：1954年北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前排左起：李维汉、黄炎培、张澜、宋庆龄、班禅喇嘛、毛泽东、达赖喇嘛、刘少奇、李济深、郭沫若、陈叔通。后排左起：平汪、次仁措姆（达赖喇嘛的母亲）、阿沛、不知名者、范明、赤江仁波切、张经武、林仓仁波切、汪锋、不知名者、班禅喇嘛的父亲、计晋美、不知名者。照片来源：陈宗烈

来说要更好一些，因为它符合新宪法。按照新宪法的具体规定，少数民族地区将会行使自治权。

实际上，根据中国的新宪法达赖喇嘛担任西藏自治区的首脑是存在一些法理问题的，因为自治区的首脑应当是由选举产生，而不是任命的。毛泽东于几个月前在宪法起草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一次讲话中提到这个问题，明确阐述了忽略这个问题在策略上的必要性。

西藏自治区的具体形式由西藏大多数人民的意愿决定

(一九五四年三月二十三日)

为了照顾少数民族特别是西藏的情况，在〔宪法〕草案第六十一条中写了第三款，即：“各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的具体形式，按照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大多数人民的意愿规定。”

现在西藏是达赖管事情，如按第六十一条第二款办，就要开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人民政府。这样办，恐怕达赖不干。他可以搬出我们和他订的《十七条协议》，质问我们。怎么办？可以按照第三款办事。搞人民政府不行，可以搞别的具体形式。达赖是活佛，是活神仙，不是人民选出来的。现在想马上选又不行，究竟搞个什么形式，由那里大多数人民的意愿决定。他们信达赖、土司比我们厉害得多，你要动他是动不得的。好吧！就按照大多数人民的意愿办事吧！不这样，又有什么办法？

我对西藏代表团说过，我们不强迫你们，你们搞不搞土地改革，搞不搞选举，由你们决定。《十七条协议》不实行可以不可以？不可以，一定要实行。但其中哪一条你们现在不愿实行，可以暂时不实行，可以拖，可再拖三年。三年过去后，还可拖三年，拖它九年也可以。

不能干人家反对干的事情，要等待人民的觉悟。我们相信人民一定会觉悟。我们曾发表过社论说：汉族干部不能干西藏人民所不愿干的事，要按大多数人民的意愿办事。第六十一条第三款，是否可和人民的意愿并列加个少数民族领袖人物的意愿？不加也可以，反正他们是绝对拥护他们的领袖的，认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宪法中如加上，看起来就不那么冠冕堂皇，所以没有加。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讲话记录稿刊印。⁶

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西藏自治区文研会；中国藏学研究中心，2001: 104-5。

毛泽东的实用主义和渐进主义策略也使他断定成立自治区不能一蹴而就，需要深入规划和大量时间来选拔训练人员。因此第一步应当要为成立西藏自治区设立一个“筹备委员会”。⁷

达赖喇嘛在一次访问中叙述了毛泽东关于成立西藏自治区的建议，部分翻译如下：

主要问题是《十七条协议》中规定要建立军政委员会。我在北京的时候，毛主席建议我说，现在西藏的情况经过过去几年的发展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所以已经不需要建立军政委员会，应该代之以成立自治区。为此，应当建立筹备委员会。

在我们看来，西藏自治区〔藏语：*pö ranggyong jong*，字面上的意思是“西藏，一个自治地区”〕的名字要比军政委员会好听得更多，所以我们很喜欢，立即同意了……

问：中国人是如何解释它的功能的呢？西藏政府还在，而现在又要出现一个西藏自治区。他们是如何解释这两个机构在工作上的差异的呢？

对于如何解散西藏政府我记得不是太清楚了。但是对于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他们说所有重要人员都应当是西藏人。他们用乌兰夫做例子，说他既是内蒙古自治区的主席，也是〔中央政府的一名重要官员〕。……也就是说当它成立的时候将会以我为首，而班禅仁波切将会是副的。⁸

来到北京的噶伦召集所有北京的西藏高级官员举行一次小型民众大会来讨论这项建议。⁹正如一些人预料的，在这个问题上出现了不同的意见。一部分持负面观点的人担心西藏政府的未来，西藏自治区的成立是否意味着西藏政府的终结？还是两个行政实体可以以某种方式继续同时运作？如果这样，它们将各自拥有什么样的功能？这些问题中国人没有具体说明白，而西藏方面也没有寻求明确的回答，但是很明显，西藏自治区的成立给他们所谓的西藏政府的前途带来了变数。

7. 《对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未出版的手记）》，出版日期不明；达赖喇嘛，1990: 89。

8. 达赖喇嘛，访问记，1995，达兰萨拉。

9. 功德林，2000: 161。功德林列出了以下的参加者：索康、阿沛、洛桑三旦、阿旺顿珠、柳霞、功德林札萨、希堪钦莫（Simkhen Chemmo）、帕拉、孜本古桑子、达拉·平措扎西。赤江仁波切可能也参加了。

另一部分持负面观点的人认为，中国方面的西藏自治区的概念涵盖了西藏三个相区隔的部分：达赖喇嘛的政府、昌都解放委员会和班禅喇嘛的政府。这三个部分在 1950 年之前一直是组成西藏政府的部分，但是现在需要同意它们在政治上是明显区隔的主体，这一点是有难度的。

但是最终达赖喇嘛很渴望和毛泽东合作，同时阿沛也强烈主张改革并同中国人合作，因此其他官员很难不同意。¹⁰ 西藏已经输掉了战争并接受了《十七条协议》，其中包括设立军政委员会的条款。过去，它一直抗拒执行这项条款，反对军方参与管理西藏。现在毛泽东建议成立自治区取而代之，所以他们就没有明显的反对理由了。正如前面达赖喇嘛所说的，自治区的名称听起来像是西藏人要自己管自己。鉴于达赖喇嘛将是总的首脑，所以一个由达赖喇嘛和西藏人掌管的自治区政府对西藏人的生活方式似乎没有多大坏处。此外，因为先会成立一个筹备委员会，所以在几年内事情不会发生极大的变化。于是在友好的气氛下，达赖喇嘛和他的官员同意放眼未来而不是死抱着过去不放，尽管很多人心中仍有疑虑。

西藏政府原则上接受这个建议之后，来自四个方面（西藏政府、班禅喇嘛政府、昌都解放委员会和中共）的代表组成了一个小组，开始集中讨论如何组建运作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¹¹ 从 11 月开始，这个筹备小组举行了多次会议和私下协商。到 1954 年 12 月 30 日，筹备小组联名提出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具体方案的工作报告，国务院于 1955 年 3 月 9 日批准了这份报告。¹²

筹备委员会将包括 51 名委员，其中九成为西藏人。在 51 名委员中，29%（15 名）来自西藏政府，20%（10 名）来自班禅喇嘛的政府，20%（10 名）来自昌都解放委员会，10%（5 名）来自在西藏的中国干部。其余的 21%（11 名）将会从全自治区的重要人士中产生。关于它的领导，达赖喇嘛是主任委员，班禅喇嘛为第一副主任委员，而张国华为第二副主任委员。阿沛是秘书长，副秘书长分别来自昌都解放委员会和班禅堪厅。¹³

10. 噶伦的讨论稿通过电报发给拉萨，在拉萨的其他噶伦〔夏苏、噶章（Gadrang）、绕噶厦〕也同小型的民众大会讨论了相关情况（功德林，访问记，1992，德拉敦）。

11. 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1991: 209–17。

12. 这份报告收录于梁乃民（Liang Nai-min），1968: 141–43。实际上，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正式成立的时间是 1956 年 4 月，但是直到 1966 年西藏自治区才最终成立，这离 1959 年的叛乱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13. 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1991: 209–17。

在行政上，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由国务院领导，国务院也对筹备委员会的人事任免拥有决定权。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下设以下办事机构：办公厅、财政经济委员会、宗教事务委员会、民政处、财政处、建设处、文教处、卫生处、公安处、农林处、畜牧处、工商处和交通处。¹⁴ 这些办事机构将会逐渐扩大规模扩充职能，到一定时候形成西藏自治区的行政架构。

在这项计划制定完成之后，针对藏钞和藏军的磋商开始了。前面章节已经提到，根据《十七条协议》，这两方面都要逐步终结，但是西藏政府在 1951-52 年间一直拒绝这么做。

西藏人已经预料到中国人会在北京提出藏军的问题，所以为了避免争执，他们在达赖喇嘛临行前告诉中国人他们计划将藏军的数量减少到 1,500 人。但是出乎意料的是，这却使西藏工委产生担忧。他们（于 1954 年 7 月 5 日）给中央军事委员会发去一封电报，表明他们不想给人留下他们背着达赖喇嘛（即达赖喇嘛在北京的时候）缩减藏军的印象。¹⁵ 毛泽东表示赞同，于是他们最终说服噶厦推迟实施这项计划直到达赖喇嘛结束他的访问。

但是军事议题在北京确实被提出来。中国人主张既然他们承担了守卫边界的全部责任，就不再需要一支独立的藏军。噶厦已经愿意缩小藏军的规模，所以他们很轻易就接受了进一步缩减的要求，但是仍然完全反对彻底解散藏军或者将它并入解放军。最终他们在这个议题上获胜，在同意把藏军人数缩减为 1,000 人之后，中国人就不再纠缠这个问题了。在缩减之后的 1,000 人中，500 人是达赖喇嘛的警卫团，其余 500 人是拉萨的警察部队，拉萨以外不驻藏军。¹⁶ 此外，中国政府同意负担这些军队的开支和薪水，并向那些即将被解聘的士兵提供帮助。不过，这仅剩 1,000 人的军队仍然由西藏政府负责管理。

在藏钞的问题上，由于达赖喇嘛的敦促，在北京的西藏官员同意了一项终止使用藏钞的计划。中国中央政府将会回收所有未兑换的藏钞，代之以中国的纸币。鉴于西藏政府不再印刷自己的货币，所以北京同意按年向达赖喇嘛的政府提供经费。

14. 西藏自治区党史办公室，1998: 39-42。

15.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科研处主办，1993。

16. 甲本格占，访问记，1992，达兰萨拉。

当时在北京的功德林回忆说，他的理解是这些“决定”需待官员们从北京返回之后根据西藏人民的意见最终确定。¹⁷不清楚中国方面的记录对这一点是如何描述的，但是一份中央文件似乎肯定了这一点，因为它在提到藏军和藏钞的协议时用了“试行”一词。¹⁸

大多数西藏人仍然不愿意放弃这些象征他们独立的政治地位的标志，但是随着西藏逐渐成为一个自治的地区，像阿沛和索康那样比较务实的领导者觉得这些东西显然已不再有意义。时代已经改变，达赖喇嘛和寺院体系是否能继续繁荣，西藏人是否能享受真正的自治，这全都取决于西藏和中国之间的关系有多么亲密友好，而和西藏人是否有一两千自己的军队无关。在这些领导者看来，西藏正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现在西藏需要做的是积极地参与到它的建设中去。

出乎意料的是，在北京需要解决的大多数棘手问题并非中藏当局之间的问题，而是存在于西藏政府和班禅喇嘛之间的痛苦纷争。西藏政府愿意接受自己从属于中央和中共，但是却不愿意接受班禅喇嘛所谓的他的堪厅和西藏政府地位对等的说法。尽管阿沛认为所有这些问题在西藏自治区开始工作之后都会变得无足轻重，并以此为理由敦促西藏政府官员让步，但是西藏政府官员仍然拒绝就范。尽管在1952年于拉萨举行的会议上，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的很多冲突点都得到了解决，但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

前面已经指出，毛泽东认为这个西藏内部的敌对状态是一个大问题。它已经产生了溢出效应，在西藏工委内部造成严重的分歧，并且有可能阻碍即将成立的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和西藏自治区的顺利施政（和运作）。但是毛泽东也知道中共不应当强推解决方案，因为不管强推的方案如何，必有一方会不满意，这样的话冲突和仇恨就会继续。因此，北京坚持要双方自己坐下来，面对面谈出一个最终的解决方案。

对此中国人指望阿沛来操刀。实际上，毛泽东告诉阿沛，最重要的是把握现在，不要拘泥于历史。阿沛表示赞同并首先会见计晋美，就悬而未决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在他们两人达成谅解之后，双方再各自选派两名官员组成小组，对具体的问题进行磋商。¹⁹

17. 功德林，访问记，1992。

18. 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1990，1951年3月11日条目。

19. 这四个人是阿沛、柳霞和两个拉让的代表：哲通·晋美札巴（Drakpa）和丹伦·次仁班觉（Denlhün）。

考虑到这已经是西藏并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四年之后，所以在某种程度上他们争吵的问题似乎很难以置信。有一些涉及派差役的权力，少量涉及对被西藏政府没收的庄园的控制权。令人惊奇的是，还有一个问题涉及要原属于班禅喇嘛但是被置于新的领主（例如农业局或者是归属达赖喇嘛的私人财产）之下的农奴重新回到他们原来的领主即班禅喇嘛的名下。由于这样的农奴有可能已经同其他领主的农奴结婚，所以最后达成的协议需要申明班禅喇嘛的庄园应当设法避免拆散这样的家庭，要么同意农奴获得“米波”身份（即农奴向农奴主缴纳一定费用来换取工作的自主权，但农奴主仍然保留对该农奴的所有权——译注），要么允许他们送其他人来顶替自己。²⁰

因为达赖喇嘛和中央都希望解决这些争议，所以西藏政府在大量问题上作出让步，于是双方在1955年1月19日达成一项协议。

■ 达赖喇嘛的参观之旅

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休会之后，达赖喇嘛前往天津等城市进行参观。中国方面不仅想利用这个时机用中国的现代化和工业发展影响达赖喇嘛，也想对他进行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教育。在西藏，中国官员没有这样亲身接触达赖喇嘛的机会，因此这一次共产党指派了两位资深官员平汪和刘格平陪同他访问。平汪回忆了中国人的想法：

刘格平和我陪同达赖喇嘛。……刘格平是回族（穆斯林），是一位重要官员，同时从中共早期时起他就是一名活跃分子。我们商量了即将开始的参观行程，一致觉得这是一个对达赖喇嘛进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政策教育的好机会。因为刘格平是一名老党员，所以我们决定由他和达赖喇嘛谈党的历史。我将会给达赖喇嘛介绍苏联的民族政策和马克思列宁主义。达赖喇嘛很渴望了解共产党的各个方面，而我想我们确实对他的思想产生了影响。即使是今天，他有时都会说他一半是佛教徒，一半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他也很现实，知道〔就社会主义而言〕在实践中事情有时和理论不一样，这正如

20. 噶厦，1953。

每一个佛教徒遵守佛的教诲的方式不同一样〔也就是说共产党干部的思想也并非总是相同的〕。²¹

这次旅行和讨论对达赖喇嘛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曾经在大量的访问和传记中叙述他在中国的情况，²² 说他在中国体验到巨大的思想启蒙和对所了解到的社会主义相关知识感到兴奋。在这次旅行中，达赖喇嘛逐渐认清了西藏的落后程度以及改革和现代化的必要性。他说：

1954年，我去了中国并多次见到毛泽东。当我继续行程的时候，不管到哪里，和共产党员谈话是最轻松的。当他们提出某个观点的时候似乎说的还真是那么回事。……他们习惯说“同志”，而且他们看起来好像真的志同道合似的，这有点奇怪〔但这是指好的方面〕。当非党员说话的时候，他们似乎过于客套，说话没有一点儿实质内容。

我从小就有一种想帮助穷人的强烈愿望。所以从这个角度说，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似乎很对我的胃口，很容易引起我的共鸣。

我也喜欢他们主张的无国家和民族之分、所有人类全都平等的国际主义。在国际运动中，穷人成了国际性的无产阶级。所以从这个角度说，我喜欢这种观念，也喜欢社会主义之下所有人享有的平等。当共产党员互称同志的时候，看起来他们真的互相信任对方，也真的是愿意为理想献身的人。我是1954年去的北京，1955年回来的。那时我非常喜欢〔社会主义道路〕。我满怀希望，认为只要中国人给我们一些帮助，我们就能够使西藏进步。²³

这些经历对达赖喇嘛的影响是如此巨大，以至于实际上他提出希望加入共产党。

问：至尊您多次提到想成为一名党员，是吗？您这个想法告诉过谁？

21. 戈尔斯坦、道韩喜饶和司本石初，2004: 195。

22. 达赖喇嘛，1990。

23. 达赖喇嘛，访问记，1994，达兰萨拉。

是的。因为党员的身份有很多吸引我的地方，不是〔因为〕权力。我想是因为平措汪阶〔杰〕和刘格平的影响吧。此外，还有在中国六七个月的旅行中，每到一个地方我都会见到像书记那样的党员，……和这些党员的谈话总是非常有启发。而那些非党员总是过于客套，有时候都不知道在说什么。他们总是很礼貌，一直谈天气。西藏冬天刮风、夏天多雨什么的，都是些废话，纯粹是在浪费时间。

但是党员工作很努力，领导人民，进行改革。我记得在江苏的时候，有位副省长是参加过长征、负过伤的老党员，他的嗓门很小。我很清楚地记得他的声音和长相。我们只是随便聊聊新年，我提到西藏拉萨的某些庆祝活动，总是长时间地庆祝。于是他告诉我改变这些老的庆祝活动不可能一步到位，每一次可以减少一个小时。就这样，他们总是谈为革命奉献，如何改革，如何进步，所以给我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当然那时还有彭德怀，他非常直率，话不多。洛桑三旦给他起了个绰号叫僧兵（*Dobdo*），也称他为古里（*Guri*）〔光头〕。还有陈毅、刘少奇、朱德、邓小平，所有这些党的领导人和领袖说话总是头头是道，但是非党员……全都有很高的地位，但是打起交道来就会觉得他们只是一个名字，让人觉得非常肤浅。

而通过由刘格平讲授、平措汪阶〔杰〕担任翻译的几次课，我真的对马克思主义革命产生了兴趣。所以我仍然说自己是一半马克思主义者一半佛教徒。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我仍然保持着一些钦佩和赞同……

这就是我的动机，我希望加入党组织。但是刘格平告诉我这样不好，最好是再迟一点。平措汪阶〔杰〕和刘格平大概都告诉过我，说我可以以非党员身份参加党的会议，这样就够了。……所以我觉得平措汪阶〔杰〕是一名康巴革命者，而我是一名安多革命者。²⁴（以上引用的英文原文未更正达赖喇嘛的英文错误，翻译时根据理解做了一定的更正——译注）

达赖喇嘛于1955年1月底返回北京。在北京他举行了一场盛大的宴会庆祝藏历新年（洛萨，*Losar*），邀请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中央政府领导人。所有人都接受邀请参加了宴会，再一次传达出尊重西藏人的清晰信号。这一点所有西藏人都注意到了，也非常感激。

24. 达赖喇嘛，访问记，2004，达兰萨拉。



图 25：1955 年庆祝藏历新年。左起：周恩来、班禅喇嘛、毛泽东、达赖喇嘛、刘少奇。照片来源：陈宗烈

毛泽东在当天会见了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很有意思的是，毛泽东向他们强调，他们回西藏之后都不应当试图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去冒险得罪较为保守的精英，草率改革。

毛主席同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的谈话

一九五五年二月二十三日（藏历一月一日）

主席：庆祝你们这个民族的节日。你们在北京过藏历年，我们很高兴，全国人民都高兴。我们汉人也有两个年，一个是阴历年，这是历史上很长时间内保留下来的习惯，到现在绝大多数人还过阴历年。另外一个为阳历年。

达赖：我们今年在内地过了三个年。

班禅：我们已经去了东北参观，我不久将要去华东参观。在东北参观中，看到了许多重工业的建设，感到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会很快地建设成，感到无限的高兴。

主席：我们的国家是一个落后的国家，工业很不发达，有许多机器我们自己还不能制造，我们没有大量的钢。但这不要紧，我们可以建设，再过五十年，我们就可以建成一个像样子的国家。我们的国家过去是常受人欺侮的国家，欺侮我们最可恶的是美帝国主义。我们的国家本来是地大物博，人口众多，

自然条件及气候也好，只是过去由一些坏人在这里领导，政治上不好，因而各方面比一般的先进的国家落后一百多年。

在我们的国家里，许多地方还很落后，西藏也是落后的，这是应该承认的。我们承认落后是有好处的，我们可以向先进的国家学习，向苏联学习。这样，我们向先进的民族和国家学习，在我们内部各民族互相学习，亲密团结，共同建设，那么我们各民族都有希望，全国都有希望。

达赖：我们到每个地方参观的时间虽然很短，但由于是亲兄弟般的关系，所以在很短的时间内相处都很融洽。正如主席指示的，我们西藏各方面的条件都很落后。但我们可以向主席保证，在您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一定做好西藏的各项工作，不断地提高。

主席：落后不要紧，在汉人地区也有许多落后的地方，和西藏一样，将来都要搞好。

班禅：过去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和帝国主义的压迫，西藏是很落后的，但是我们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有信心团结西藏人民，发展西藏的各项建设事业，使它进步。

主席：我有信心。在你们两人的领导下，西藏的事情一定会做好，但不要急，慢慢地来，做事情要取得大多数的同意。固然在三五年之后，做好事还会有人反对，但反对者不是老百姓，而是贵族、官员、头人和寺院的堪布等。你们应该像老师一样地去教育他们，要耐心地团结他们。

你们根本不前进，我们是不赞成的。我们欢迎你们进步，但是你们应该根据实际情况，和大家团结一致地搞工作，不能因在内地看到了一些建设发展情况而着急。过去有些共产党员去苏联参观，看了苏联的先进情况，回来后也有些着急，想一下办很多事，但条件不成熟，好事办成了坏事。

做事情应广泛地和大家商量。比如藏钞问题，起初噶厦不同意，你们向他们解释，征求他们的意见，这样做很好，你们很会办事。我们在中央办事也经常征求地方政府的意见，和你们商量，请你们放心，我们不会强迫你们办任何事情。

达赖：对于藏钞等问题，起初有些人不了解大局，所以不同意。经过我们同他们谈了之后，他们很多人改变了看法。

值此藏历新年之际，我们专程前来向主席祝贺新年。另外，我们刚从他处参观回来，又从主席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现在主席又给了我们很多宝贵的指导。我们感到很受教育。²⁵

同一天，毛泽东私下拜访了班禅喇嘛，巧妙地表示了中央对他的政府的兴趣和支持，同时强烈鼓励他同达赖喇嘛合作。他也对领导干部是否在学藏语表示关心，就这个问题直接询问参加会见的张经武和范明，问他们个人学习藏语的进展。以下是这次会谈的谈话稿：

毛主席同班禅·额尔德尼的谈话

一九五五年二月二十三日

主席：你身体好吧？听说你以前身体不大好，现在怎么样？

班禅：现在完全好了。

主席：你这次准备到上海参观吗？

班禅：这次本来计划到上海、杭州去，奉主席指示现在还要到广州去参观。

主席：很好。你们到广州去，一定要到虎门〔在广州以南，是销毁英国人鸦片的地点〕去参观，这个地方很有历史意义。你们问他们，他们会给你们介绍的。

班禅：今天主席特别到这里来，对我们很关心，我们特别感谢。

主席：你们要走了，我来看看你。

班禅：我们过去几十年没有回到西藏去，这一次能够回到西藏主要是由于毛主席的领导。

主席：这不是我个人，这是由于共产党的领导，解放军的帮助，同时也是由于你们自己的努力，西藏人民的欢迎而来的。事情要慢慢地来，拉萨政府和你们中间有些问题，不是这次都解决了吗？

班禅：我回到西藏后，达赖喇嘛也很关心我，虽然我们相互之间有些问题，但是这次在首都都获得解决了。

主席：你们的任务很大，你们要拥护他们，他们也就拥护你们，这样团结就会搞好的。

2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西藏自治区文研会；中国藏学研究中心，2005: 117-20。

班禅：是的，我们一定要根据主席的指示，这样去做。

主席：你们过去有点不放心，怕我们光要前藏不要你们。

〔继续对在座的张经武和范明说〕：你们在西藏不要说毛主席万岁，这样不好。不光要挂毛主席的画像，也要挂达赖和班禅的画像，因为这是西藏人的习俗。每个民族都有它自己的领袖，西藏人有像达赖和班禅这样的领袖是非常好的。例如，金日成是朝鲜的领袖。当你们想在朝鲜做工作的时候，你们应该尊重他。

〔对班禅说〕：你们的政策搞对了，你们能主动地拥护他们，主动地让步，能让达赖喇嘛当主任，你当副主任，计晋美能主动提议让阿沛当秘书长，这是很好的，比我们共产党来提出要好多。这样今后的事情就好办了。

拉萨有好多官员，也有好多寺庙，其中有许多人，对一些问题不一定都同意达赖喇嘛的意见，因此你们办事，要照顾到他们的困难，慢慢地来，不要急，一切事情，慢慢地搞通再办是有好处的。

你们怕拉萨，西藏人怕汉人，总是小的怕大的，这个不奇怪。由于过去汉人的反动统治阶级统治你们压迫你们，造成了不好的影响，所以产生了对汉人害怕，印象不好。因此，我们今后必须很好地多办些好事，才能使西藏人民慢慢相信汉人是帮助他们的，不是搞他们的。

过去我同张经武、范明都谈过，要他们对我们的干部讲，我们进藏是诚心诚意帮助的，不是代替的，而且帮助还要帮助得好，不能让人家不舒服。同时我也对他们讲，要以这两条来考验我们的干部。虽然这样，但是你们也应该对他们进行帮助，随时提出意见，不对的要改正，如果不改正，你们可以提出意见，把他们调回来。

〔对张经武和范明说〕：过去在日喀则出了问题。他们有没有提意见？

张经武：〔回答删去了〕

主席：你们改正错误了吗？

张经武：〔回答删去了〕

主席〔对计晋美说〕：警卫营还是由你们领导吗？

班禅：〔回答删去了〕

主席：警卫营里的军官呢？都是他们的军官吗？

张经武、范明：〔回答删去了〕

主席：汉族干部的数量应当逐渐降低。我们应当训练他们的〔西藏的〕干部。警卫营的制服不需要和解放军的统一。他们可以穿自己的制服。

班禅：〔回答删去了〕

主席〔对班禅说〕：警卫营的问题是一个例子，你提出批评他们听了，他们必须改正他们的错误。

班禅：〔回答删去了〕

主席：你说的对，以后还会出问题。

班禅：〔回答删去了〕

主席：是不是出过什么问题？

张经武、范明：〔回答删去了〕

主席：那个问题解决了么？

张经武、范明：是的。

主席：不能只说汉人帮少数民族的忙，少数民族同样是帮助汉人的。你们和我们合作也花了很大的成本。西藏有这样大的一块地方，又有很多资源，西藏民族和汉族很好地团结和互相帮助，我们的国防线就不再是金沙江而是喜马拉雅山脉，所以你们受到祖国各方面的欢迎。我们人民解放军进了西藏，给西藏人民做的事情还不多，修通了两条公路，办了两个小学，给藏民打了一些防疫针。但也给你们带来了三个问题：物价上涨，牦牛在运输中有死亡，一个时期采购不等价。

班禅：过去虽然有点问题，物价上受点影响，但是对我们的帮助是很大的，例如开办人民医院，发放各种贷款。就是从运输上来说，既给运费，牦牛死了又给赔偿。尤其在经济上，我们西藏主要产羊毛，过去从牧区运到农区，农区运到印度，不但得不到合理价格，反而遭受哄骗或卖不出去，但自解放后，中央以高价进行收购。以上这些，对我们的帮助是非常大的。

主席：这些帮助只能说是才开始，不过今后会逐年扩大起来的。西藏地方蕴藏有很多物资，就从经济上来说，也不单是汉人帮助西藏的，是互相帮助的。就像你们喝的茶，你们不是免费得到的，需要用羊毛来换。

班禅：西藏解放几年来，国家对我们的帮助确实是很大的。

主席：应该帮助。这种帮助和苏联对我们的帮助是一样的。你们发展了对国家有好处。比如新疆有稀有金属，内蒙古有森林、铁矿等，对国家都是有好处的。有些矿产在我们汉人地区没有的，但是在你们少数民族地区有。汉族不能离开少数民族。所以你们只说汉族帮助少数民族是没有说出全貌。

班禅：我们西藏听说也有铁矿和其他矿产，有些地方没有人居住，还是很大的荒地，现在唐古拉山附近已经发现了煤矿，将来还会发现许多矿产。

主席：你们很有希望，应该有信心。

班禅：对西藏的建设，我们是有信心的。今天在国务院开会，对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成立，以及我们内部悬案问题的解决，对西藏建设事项的帮助等，都通过了决定或批复，问题解决了。这对我们西藏今后的团结统一和发展都是有很大好处的。

主席：这些问题都解决了。这些问题的解决，和平协议起了很大的作用。达赖过去害怕我们。你们过去也是害怕的，不然你们也不会跑到香日德。

班禅：我们过去受了反动派的欺骗宣传，我们不了解真实情况，是有些害怕。

主席：是的。昨天我和达赖喇嘛谈话时，达赖说他的哥哥在外国不回来怎么办？我说：你不害怕，你回来了，这是对的。他害怕，不回来也可以；他不害怕了，回来也好。有些人对我们不了解，他们还要十年、八年地看我们。这需要我们做好工作，而且长期地做好工作。你们十二号离开北京，要回到西藏还得很长时间吧？你们回去路上收不收礼、收不收钱？

计晋美：过去我们来时，沿路老百姓送的礼，有的退还，有的给了寺庙，让他们做点好事。

主席：是不是收一点，表示一下？还是采取收两块赏三块的办法好？你们今后有些开支，国家可以帮助。你们如果不收礼，老百姓既能见佛爷又能不花钱，这样老百姓会对你们更好。

〔旁白〕：汪锋向毛泽东汇报达赖、班禅曾给拉卜楞寺写信劝止〔寺庙和人民〕送礼和准备铺张欢迎达赖、班禅的情况。

主席：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这样做很好，这样的问题和他们商量一下就能很好解决了。〔对班禅说：〕你们两位和代表团的很多人来，出席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会议，又在各地

进行了参观，以后恐怕你们四年要来一次。现在路通了，三个月能打一个来回，既能开会又不耽误工作。如果像这次你们来回要一年的时间，那会就很难开。

班禅：我这次和达赖喇嘛来北京开会，这是从前没有过的，对我们内部团结和整个工作来说，都是有好处的。今后路通了我们还要多多来的。

主席：将来香日德那边有了飞机场就好了。

班禅：是的。

主席：你们的地方是猴子变成人的地方。为了生存，猴子通过体力劳动慢慢变成了人。你们相信这个吗？

班禅：〔回答删去了〕

主席：所以说你们黄教和其他的教派是不同的，其他教派不相信这个。

主席：你这次来是第二次吧？

班禅：是的，五一年来过一次。

主席：五一年你多少岁？

班禅：十四岁。

主席：你今年是十八岁了，你家在哪里？

班禅：是循化县。

主席：是不是拉卜楞寺那里？

班禅：不是，离拉卜楞寺很近。

主席：你这次要到拉卜楞寺去吗？还回循化吗？

班禅：是的。

主席：回家看看很好。西藏小学课本是用什么文字？

班禅：完全是藏文，汉文和英文是选修科。

主席：这样很好。〔对张经武说：〕过去我说过你们进藏以后，要学习藏文、藏话，你们现在学得怎样？

张经武：我们大家都学，但是抓得不紧，只是参加了训练班的学习得可以。

主席〔对范明说〕：范明，你学得怎么样？我今天要考考你。不仅要学藏文而且要学藏话。

拉敏·益西楚臣这次没有来，以后有机会要来。这次你们回去代我问他好。²⁶

26. 《对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未出版的手记）》，出版日期不明，会见的谈话稿（划线部分为强调）。

毛泽东在另一次会见达赖喇嘛的时候，出人意料地提到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即旗子的争议，这个争议是司曹时期争论的一个主要根源。当天担任翻译的平汪回忆说，他听到毛泽东说这个问题时大吃一惊：

一天，毛泽东出人意料地到达赖喇嘛的住处看他，时间大概是晚上八点。在他们的交谈中，毛泽东突然说道：“我听说你们有一面国旗，是吗？他们不让你们用，是不是？”在我翻译完毛泽东的话之后，达赖喇嘛问我：“他说的‘他们’指的是谁？”虽然我知道“他们”指的是谁，但还是把这个问题翻译给毛泽东。毛泽东直接回答说“他们”指的是张经武、张国华和范明。

因为毛泽东是在没有告知要讨论的话题的情况下问的这个问题，所以达赖喇嘛只是回答说：“我们有一面军旗。”我觉得这个回答很巧妙，因为它避免了说西藏是否有一面国旗。毛泽东察觉到达赖喇嘛对他所提的问题有点担忧，于是马上告诉他：“这没有问题。你们可以保留你们的国旗。”毛泽东确实说的是“国”旗（藏语：*gyedar*）。他说：“将来我们也会让新疆和内蒙拥有自己的旗子。除了那面旗之外是不是也能挂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呢？可不可以？”达赖喇嘛点点头说可以。这是毛泽东告诉达赖喇嘛的事情中最重要的一件，我听的时候很吃惊。

我的脑子不停在转。我不知道毛泽东是同政治局里的其他领导人讨论过这个问题，还是自己单方面这么提的。我一直很关心苏联处理民族问题的模式，所以我感到很兴奋，因为我认为毛泽东说西藏可以使用自己的旗子意味着中国正在思考至少是对这三个大的少数民族采取苏联的“加盟共和国”模式。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它具有新意并且非常重要。

那天晚上我去见张经武，把这些话告诉了他。张经武听了之后问我：“毛主席说的‘他们’指的是哪些人？”我回答说：“他明确地说是你、张国华和范明。”接着他问我除了提到他们的名字之外，毛泽东还有没有说过其他什么事。我说他没有，只提到了名字。这让我感到很奇怪，因为张经武关心的是毛泽东提到了谁而不是这个问题本身。

过了一段时间，我私下向刘格平提到毛泽东说的话。他马上意识到其中的深意，并且反应也和我一样。他不关心“他们”指的是谁，他感兴趣的是这个问题本身。他说：“按照这个说法，将来西藏、

新疆、内蒙等少数民族地区有可能会采取和苏联一样的模式，而其他较小的民族地区则会得到‘自治’。”他认为这样很好。我们都认为既然毛泽东这样说了，那么中央政府就一定有这样的打算。但是在随后的几年里，我从党的文献中寻找这个关于旗子的谈话的记载，但是从来没有看到它被提起过。²⁷

■ 动身返回拉萨

1955年3月初，达赖喇嘛动身返回西藏。他已经收到西藏人发来要他返回西藏的信，例如在1954年10月，他收到下面这封由坚堪孜松以印度西藏人社区的名义发来的请愿信：

我们恳请至尊体谅在西藏和印度的西藏人由于您长期不在西藏而产生的忧虑之情，请求至尊为了消除人民的担忧迅速返回祖国。我们颂祷您尽速安全地返回，并希望您能经由印度返回，这样您就可以访问印度的圣迹。详细请愿如下。

印度西藏人社区

孜本夏格巴于噶伦堡夏格巴商号

〔三个印章〕〔第一个不明〕，菩提伽耶藏传大乘寺 (Tibet Mahayana Monastery in Buddha Gaya)，西藏人协会 (Tibetan Association)²⁸

坚堪孜松也于同一日给毛泽东和即将前往中国访问的尼赫鲁总理发去请愿信。给毛泽东的请愿信中说：

27. 戈尔斯坦、道伟喜饶和司本石初，2004: 194-95。一份中国方面的毛泽东在1955年3月8日会见达赖喇嘛时的讲话稿〔《对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未出版的手记）》，出版日期未明〕表明毛泽东的确曾提起旗子的问题，但是就像平汪说的那样，重要的部分都被省略了：

主席：……〔对张经武和汪锋说〕他们还在用西藏的旗子吗？

张经武：是的。那是一面军旗。

主席：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旗子，有西藏的旗子吗？

达赖：是的，它只挂在藏军的军营上面或者在藏军行军的时候才打出来，没有其他的旗子。

28. 这份文件来自于孜本夏格巴的私人档案集，所注时间是1954年10月14日。

北平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电

至尊长期远离祖国，这让人民忧虑。因此我们衷心颂祷，希望您能为至尊尽速返回祖国提供便利。希望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返藏行程都能安排经由印度，以避免陆上旅途的劳顿。请愿书如下。

印度西藏人社区

孜本夏格巴于噶伦堡夏格巴商号

〔三个印章〕〔第一个不明〕，菩提伽耶藏传大乘寺，西藏人协会²⁹

前面已经提到，达赖喇嘛在离开拉萨之前向西藏人保证不会逗留超过一年，而且中国人也答应了。所以在3月中旬，国务院开完一次关于西藏的会议之后，他返回西藏的筹备工作就开始了。

3月8日，也就是达赖喇嘛离开北京的前几天，他要求拜访毛泽东向他道别。当毛泽东得知之后，他一时兴起决定自己主动去向达赖喇嘛道别。中国官方对这次会见的记录再一次表现了毛泽东的深谋远虑和温和的态度，也表现了达赖喇嘛对现代化及成为中华民族一部分的热情。

毛主席同达赖喇嘛的谈话

一九五五年三月八日（御河桥）

主席：你就要走了，今天我来看看你。你们走的事情都办好了吗？
还有些什么需要我帮你解决的问题吗？

达赖：我们准备在十二日由这里出发，去西北各地参观后就回去。现在走的准备工作已经做好了，再没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如果临时还有什么需要，我一定提出来。

主席：……我们要向先进的国家和民族学习，学习对本民族有用的东西，但不是所有的方面都要学别的民族，而要保持本民族的特点。……一个民族能在世界上在很长的时间内保存下来，是有理由的，就是因为有其长处及特点……

我们的国家是很落后的，落后于先进的国家约一百多年。帝国主义常欺侮我们，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大量的钢，没有大量的机器，自己还只能造很少的汽车，飞机也只能造一

29. 同上。

两架教练机。但是经过三个五年计划之后，我们就能在工业方面打下一个底子。

听说你去东北参观后，对苏联帮助我们的工业建设很满意，是这样吗？

达赖：过去我只听说苏联给我们的国家许多无私的援助，但实际上怎样，没有见到，只能凭想像。这次亲眼看到了苏联对我们的真正无私的帮助，想去苏联大使馆致谢。

主席：我听到这一点之后，感到你的眼光大，不光是看到西藏，而且看到全国的事。全国有好事你就喜欢，这就是说在你的思想上不光是想着西藏。你很有希望，比我年轻。我们要将全中国都搞好，再把眼光放大，要把全世界都搞好。佛教的教义也有这个思想。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是代表当时在印度受压迫的人讲话的。他主张普渡众生，为了免除众生的痛苦，他不当王子，创立了佛教。因此，你们信佛教的人和我们共产党人合作，在为众生（即人民群众）解除受压迫的痛苦这一点上是有共同之处的。当然有许多不同之处。在内地有一个观音菩萨，人们将她的像塑得很美丽、庄严、慈祥，人们对她十分信仰，认为她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神。西藏也有观音菩萨吗？

达赖：西藏有观音度母（goddess Tara），塑像也很美丽、慈祥，像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女。

主席：关于那天你所提的把在西藏工作的汉族干部当成自己的干部的观点是对的。在西藏工作的汉族干部是去帮忙的，不是代替的。实行区域自治是真正的自治，主要是依靠西藏自己的干部。但为了取得汉民族的帮助，我们可以向自治区内派少数的汉族干部去全心全意地帮忙。我们曾对派去西藏工作的汉族干部强调说，要全心全意地去帮忙，为了帮忙，性命也可以放弃，要把忙帮好，不准帮坏。但在这一点有些人的思想上还不通，不愿在那里工作，天天喊叫要回来，这还是为汉族打算，而没有为藏族打算，给东西时也设法少给一些等等，都是为汉族打算。有些人主观主义严重，很急躁，觉得别人落后，看不惯人家，实际上他们忘了自己也落后过。现在汉族较进步一些，也是从落后过来的。但是两千年之后的人看我们，那我们又很落后，就像我们现在看孔夫子十分

落后是一样的。孔夫子没有见过汽车、飞机，当然更不会开汽车和飞机，也不会开人民代表大会。可是我们就进步了，我们现在能坐汽车和飞机，也会开人民代表大会。两千年之后，那时的人们也会觉得我们落后。社会总是不断进步的。

你们这次解决了许多具体问题，很好。你感到怎么样？

达赖：我们在这里的人都很满意。但是噶厦由于对情况了解得不清楚，还有些怀疑。

主席：很好，你们回去后应该将情况向他们讲清楚。将来自治区成立时，他们还会有一些怀疑，主要是怕对他们的利益有损害。两个司曹现在怎样？在筹委会中能不能将他们放进去，或者将来在全国政协委员安排一个位置。开会时他们愿来，我们欢迎，不愿来就算了。总之，我们不能忘记他们。

今天因为你快要走了，我来看看你，最后还有一句话告诉你：凡是派去西藏工作的汉族干部，有和你们搞不来的、团结不好的，你告诉我，我们就调回来。

达赖：主席突然到这里来，我像是在做梦。经过和主席的几次见面谈话，我的内心起了极大的变化。我回去之后，一定把这些指示变成实际行动，有什么事一定向主席直接报告，同时也请主席给我各方面的指示。回去后有张国华等人在那里工作，我一定打开以往难以应付的局面，真诚地互相帮助，共同努力工作。

主席：我们对西藏民族寄予的希望很大，将来会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这点要说清楚，民族之间的帮助是互相的。西藏民族在政治上给我们的帮助很大，民族团结搞好了，事情就好办。这次你们来到北京和去各地参观，汉族人民对你们很重视，在招待、欢迎各方面都表现了我们是团结得很好的。比如拿国防来说，西藏对我们的帮助也是很大的。如果你们选择和帝国主义者合作，和我们以金沙江为界，以我们为敌，那我们将非常困难。现在我们统一了，事情就容易多了。这就是为什么全中国的人都很看重你。全世界的人也会很看重你的。因此不要想你没有资本，你有资本，你有很多资本。将来在经济上西藏也会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你们那里过去是一片大海，这是几千万年以前的事。现在我们用的石油是由几千万年以前海洋或湖泊里动物死后在地下慢慢变化来的，

因此，在你们那里可能有大量的石油，同时还有各种矿产，将来开采后对国家建设很有用。³⁰

达赖喇嘛像毛泽东在第一次见面时为他做的那样，把毛泽东送出门上了车。³¹

达赖喇嘛对这次会面的回忆与这个记录相似。

1955年我从中国返回的时候，我的心情非常好。……毛泽东本人告诉我……，“由于现阶段你们很贫穷，所以我们帮助你们，但是过二十年之后你们生活改善了，那我们就会撤回来。那时你们就要帮助我们了。”毛泽东本人是这么告诉我的，他经常和我说这样的让我吃惊的话。他说：“过去西藏是个强大的国家，西藏军队到中国来赶走中国的皇帝，皇帝只能逃跑。今天你们已经衰弱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帮助你们。”³²

在后来的一次访问中，达赖喇嘛补充说：“毛主席赞扬了释迦牟尼和观音度母，说他认为释迦牟尼是一位伟大的革命者。”³³

第二天，也就是3月9日，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参加了国务院第七次全体会议，听取了关于西藏的报告和在北京商定的问题的决定，³⁴包括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决定以及交通运输、建设事项的决定。

关于公路和交通运输的决定规定成立西藏交通局来领导青藏公路和康藏公路的维护和管理的工作，并批准在1955–56年间两年内购置汽车750辆，并在拉萨设立汽车修理厂。它也规定继续修筑从青藏公路的羊八井至日喀则及日喀则至江孜的公路。³⁵此外，除了康藏公路养护和重点改善的费用外，国务院规定在1955–57年间另追加4,200万元用于西藏的公路建设。³⁶

3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西藏自治区文研会；中国藏学研究中心，2005: 117–20。

31. 李威海，1996: 190–95。两天之后的3月10日，毛泽东也拜访了班禅同他道别。

32. 达赖喇嘛，访问记，1994，安娜堡，密歇根州。

33. 达赖喇嘛，访问记，2004。

34. 所有这些报告和决定收录于西藏自治区党史办公室（1998）；有一些在香港友联研究所（1968: 105–25）。

35. 从日喀则到江孜的公路于1955年10月20日开通（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1990，1955年10月20日条目）。

36. 西藏自治区党史办公室，1998: 42–43。

关于建设事项的决定批准拨发新的经费和调派技术人员建设一系列项目，这些项目包括：在拉萨建设一座水力发电站，派遣技术人员到日喀则考察在公路修通之后建设类似水力发电站的可行性，在日喀则建设一座小型火力发电站，在拉萨建立一座皮革厂和一座生产农业工具等产品的小型铁制品厂，修筑拉萨河和年楚河（Nyanchu）的河堤水坝，防止洪水危害，并向一部分农田提供灌溉。决定也批准向拉萨的七一国营农场拨配更多设备和技术人员，改善生产，拨发经费扩大拉萨干部学校的规模，并扩建日喀则小学，使其住宿设施从容纳两百人扩大到容纳五百人。最后，决定批准修筑日喀则到拉萨的碎石公路，在日喀则修建班禅喇嘛堪厅的办公室，在拉萨修建一座招待所，并拨发一百万元给全藏购买农业工具。³⁷

除了这些正式决定之外，张经武、阿沛和计晋美分别作了1951年以来这三年的工作总结报告。张经武的报告列出了所取得的各项成绩，但是也明确指出大汉族主义和不尊重西藏宗教及文化的失误。

与此同时，中央给拉萨的西藏工委发去一份指示（1955年3月），强调需要继续保持谨慎。尽管已经完成通往拉萨的两条公路的修筑，也达成关于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协议，但是毛泽东仍然告诉在拉萨的官员要保持谨慎，慢慢来，因为条件还不适合开始谋划重大的改革。他也告诉他们不要鼓励达赖喇嘛做过于进步的事，因为这会造成他被人民孤立的潜在危险。

中央对西藏各项问题的指示

中央于1955年2月20日讨论了西藏问题，以下是我们的答复：

- (1) 我们基本上同意西藏工委1955年的工作方向，并对它做了一定的修改和扩充。我们把全部文件返还给你们，希望你们加以研究并根据西藏具体情况执行。你们也应当执行我党在少数民族地区工作中的戒骄戒躁、戒除自大的政策。
- (2) ……此次达赖、班禅同时来京，初步确定了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停止藏钞、整编藏军各方案，并在双方历史悬案谈判上达成了协议。这些都说明他们这次来京有结果，有进步，怀疑顾虑减少，进一步向我们靠拢，这是好的。但必须认识到

37. 西藏自治区党史办公室，1998: 43-44。

这只是进了一步，而不是一大步，摆在我们面前的困难和障碍还是严重的。决不可由于这一进步，而滋长骄傲自满、急躁冒进情绪。对于西藏现在的形势我们不能过于乐观。我们在西藏的形势仍然不是很稳固。如果有什么事情发生，我们可能会遭遇大麻烦。我们也不能高估左派的力量。就他们的政治观点来说他们是左的，是倾向我们祖国的，但是就他们的阶级成分来说他们是右的。我们不能同他们讨论土地改革和社会改革的问题，我们也不能要他们加入共产党。不要鼓励他们在发言和行动中表现得过于进步，那样他们就会把自己隔绝于群众之外，使我们非常被动。

我们应当充分认识到达赖和班禅凭借其在西藏人民中享有的至高无上的宗教威信而发挥的政治作用，要给予他们适当的保护和鼓励。不要鼓励他们说或者做任何有违他们的宗教习俗的事情。即使他们愿意这样说或者这样做，也要尽力劝阻他们，以避免对他们造成任何不便或者甚至给他们带来危险。³⁸当他们返回西藏后向他们提供充分的安全保卫。要杜绝在你们工作中的任何粗心大意的行为。西藏工委的政治工作是一项严肃的事业……³⁹

我们将会在下一章中看到，这次旅行对达赖喇嘛的影响是巨大的，但是其中也有一个不和谐的音符。在他们最后几次见面其中的一次，毛泽东说宗教是毒药，这让达赖喇嘛大吃一惊。达赖喇嘛叙述说：

我见到毛泽东的最后一天，他很高兴。他坐在椅子上，朝我挪了挪，然后问我西藏有没有人知道怎么发电报。……他〔毛泽东〕谈了经常性的电报沟通，说了很多关于如何领导人民，如何开会，如何征集意见的事情。他给了我很好的建议，我很高兴。紧接着他说宗教是毒药，我当时有点害怕，心想，哦，原来宗教真正的敌人在这里。

38. 时至今日，达赖喇嘛和很多流亡藏人都宣称中国人不让达赖喇嘛实行改革是因为他们想自己亲自动手。但是，这里和前面引用的其他文件中的证据表明，毛泽东和中央担心年轻和理想化的达赖喇嘛会试图在没有预先凝聚共识的情况下强行实施改革，并因此疏远精英，削弱自己的影响力。而达赖喇嘛影响力的削弱当然可能对毛泽东的渐进主义策略产生负面的影响。

39. 《对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未出版的手记）》，出版日期不明（划线部分为强调）。

我通常都做笔记。他说的话刺痛了我，所以我稍微把脸转了一下，一字一句地记下了这些话。⁴⁰

在另一次和这个话题相关的访问中他说：

在最后一次会见中，虽然正式的告别仪式已经进行过了……然后他对我说了大概是三件事。第一件事，我返回拉萨后应该如何动员那些人，〔我应当〕听取他们的意见，但是决定权应当掌握在自己手中，以及如何同大众沟通。第二件事，和他直接联络的最佳方式是通过电报，他说：“你应当训练几个信得过的西藏人使用这些高科技的东西。”接下来第三件事，他告诉我：“你的脑袋是科学的，这很好。宗教是毒药。”当我要离开时天已经黑了，气温也很低，但是毛主席没有穿大衣。他走到我的车旁，为我打开车门。他的动作有点笨拙〔大笑〕。⁴¹

尽管这句话引起负面的印象，但是达赖喇嘛的访问效果还是超出了中国方面哪怕是最乐观的预期。他们已经成功地完成一件在范明看来是不可能的事：他们已经真正成功地把达赖喇嘛争取过来。达赖喇嘛本人对此的评价如下：

在我从中国返回的时候我已经有了一些信心，认为能够和他们好好地合作。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西藏能够实现现代化。而且较之非党员我也对共产党员更为信任。

问：当你返回西藏时你感觉很好，其他每个人的感觉也很正面。那个时候你觉得西藏能够获得的最好的东西是什么呢？……

使西藏现代化之类的。对我们来说，利用中国人的帮助来建设西藏，而对中国人来说我们不争论西藏是否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平措汪阶（杰）〔平汪〕也有那样的感觉。他知道西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但是我们必须使我们的国家发展起来，而中国共产党和以前的中国人不一样〔即他们会给予帮助〕。这就是平措汪阶（杰）的信念，是他告诉我的。以前的中国人具有很强烈的沙文主义倾向，但是共产党并不这样。而且实际上全世界的工人阶级都在闹革命，

40. 达赖喇嘛，访问记，1994，安娜堡。

41. 达赖喇嘛，访问记，2004。

所以国家边界已并不重要了。正因为这样想，我才觉得只有好处没有坏处，觉得我们可以共同建设一个国家，这就是我们的目标和信念。也正因为如此，平措汪阶（杰）和其他一些党员成了我最好的朋友，这是真的。⁴²

毛泽东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胜利，达赖喇嘛被他在中国的所见所闻极大地影响了。从 1950 年亲政以来，达赖喇嘛第一次开始构思一幅新西藏的图景，第一次开始积极地对他的政府的政策施加影响。现在他渴望和中国人一起努力建设一个属于并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新西藏。

于是，经过在北京和中国内地六个月令人惊叹的旅行之后，两位喇嘛和他们的随行人员于 1955 年 3 月 12 日动身前往青海省，开始了他们返回西藏的行程，而这将是下一章的主题。

42. 达赖喇嘛，访问记，1995。

第二十一章

返回拉萨

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一同开始了返藏的行程。他们先到西北，在甘肃省著名的黄教寺院拉卜楞寺举行了一场法会。据说有一万多名藏族人参加了这场法会。一名目击者略带夸张地回忆说：“简直是太挤了，挤得我双脚都离了地。”¹在这次联袂露面之后，两位喇嘛和来北京时一样沿不同路线返回。班禅喇嘛一行走西北（青海到西藏）线，达赖喇嘛走西南（四川到西藏）线。

达赖喇嘛一行先到西南的大城市重庆，然后坐火车于4月20日到达成都。他计划在成都停留数日，然后前往西康省的省会康定，康定以后就都是藏族地区了，最后再从康定经昌都到拉萨。但是一场大地震严重地损坏了道路，迫使达赖喇嘛在成都停留了数周。在成都的时候，他和四川省第一书记李井泉之间不愉快的交往给他的访问造成不好的影响。

当达赖喇嘛访问中国的城市的时候，当地省长和第一书记等高级官员只要在城里就一定会亲自去迎接他。但是这一次，达赖喇嘛注意到四川省的第一书记并没有出现，于是询问了一下。平汪回忆说：“正如我所说的，达赖喇嘛是个善于观察的人，他注意到一些事情，包括李井泉没有出现这一情况。他问我和负责接待的中国官员李井泉去哪儿了，我们含糊地说大概李井泉不在城里，但是达赖喇嘛似乎并不相信我们的话。”²

达赖喇嘛准确地察觉到平汪和徐淡庐（为这次旅程派给达赖喇嘛的政府联络官）是在骗他。³平汪和徐淡庐都认为李井泉的缺席是一种不敬，

-
1. 平汪，访问记，2000，北京。
 2. 戈尔斯坦、道帛喜饶和司本石初，2004: 200。
 3. 徐淡庐平时负责西藏工委在拉萨的安全工作。

有可能会破坏达赖喇嘛访问内地的总体成效。而且实际上徐淡庐一直在幕后劝说李井泉出面欢迎他，只是没有成功。下面的记录叙述了这一过程：

徐淡庐为达赖打前站到成都后，即向四川省有关领导和部门汇报达赖抵川的活动安排及具体事项、注意的问题等。

当徐淡庐发现欢迎达赖的领导名单中没有省委第一书记的名字，就提请省里最好安排省委第一书记去迎接达赖。省里有关部门因第一书记工作忙没安排。徐淡庐犯难了，他知道……他们可能不了解情况，不了解这点小事是关系到统战和民族政策的大事，不能因枝节小事而影响民族团结大业。

在北京时，毛主席、刘委员长，特别是周总理都亲自去看达赖呢，你一个省委书记有何理由不去欢迎达赖呢？徐淡庐又想起这次护送达赖返藏前，李维汉特地交待他说：“达赖这次回去可和来的时候不一样了，是国家领导人了。在各地迎接接待他的时候，你要按中央有关规定做好安排。”

想到此，徐淡庐认识到省委第一书记不出面不是一件小事，一定要说服省委第一书记，请他出面迎接达赖，徐淡庐便直接去见面省委第一书记。见到省委第一书记，徐淡庐陈述理由后，这个第一书记不但不听徐淡庐的意见，还理直气壮地说：“达赖一个娃娃家，为什么非得要我欢迎他？”

徐淡庐耐心地解释说：“达赖虽然年轻，可 he 现在是副委员长，是国家领导人，而且是西藏地区的宗教领袖，你抽空见个面，这样做只会对工作有好处。”省委第一书记找理由说：“他去北京路过我们省的时候，我不是出面迎接了吗？见一面就行了。”

徐淡庐仍耐心地劝说：“在北京时，毛主席、刘委员长、周总理都很尊重达赖，还亲自去看他。”言外之意是连毛主席都去看达赖，你一个省委书记也别拿什么架子。谁知省委第一书记听徐淡庐这么一说更不高兴了，说反正我就是不去，你看着办吧，你愿意向中央汇报也行。

徐淡庐见事已至此，再劝说也没用，只好商量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把这事圆过去。便对省委第一书记说：“您不去也可以，那这一段时间就说你病了，不易见人。这样在达赖那里也好说。”省委第一书记想了想说：“这个办法好，就这么办。”徐淡庐接着说：

“那你这一段时间就不要在公开场合露面了，等过几天说病好了后再露面，免得达赖疑心。”⁴

但是李井泉在达赖喇嘛到达的第二天就公开露面，并且还上了报纸。

达赖第二天看到报纸上登着省委第一书记出席纪念会的消息和照片后，知道第一书记并没有生病，气得把报纸一扔，在屋里生闷气。⁵

徐淡庐从达赖的随从处听到反映后，知道省委第一书记这回把漏子捅大了。马上赶到省委找有关部门商量，看想个什么办法补救，以挽回影响，消除达赖的疑心，不要让他从这件事引申开去，认为中央和毛主席等领导对他的热情接待都是来虚的。那样的话，达赖到内地近半年的工作就白做了，这可不是可以掉以轻心的小事呀。

可四川省委的一些同志却对此不以为然，认为徐淡庐是危言耸听，哪有这么严重，不就是省委第一书记没有出面迎接达赖吗？有什么了不起，他要是中央领导我们保证去接。

徐淡庐费尽口舌，怎么说也无济于事，心情十分沉重。他心想：为什么我们党内的一些高级干部对统战工作、民族工作这么不重视，对民主人士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地位认识如此不足？！……

徐淡庐只好给北京打电话，向李维汉报告这里发生的事情。李维汉听后明确答复说：省委第一书记对达赖的态度是明显错误的。达赖现在是全国人大的副委员长，虽然他不是中共党员，在党内没有职务，但他是国家领导成员，省委书记只是一个省的党内负责人，是个地方官，国家领导来了，地方上的党政军领导都应迎接。省委第一书记应选择适当时机与达赖见面，以挽回不良影响。

徐淡庐接到李维汉的指示后，正为如何向省委第一书记汇报而犯难时，北京来的一个电话，使以后的事情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也使省委第一书记处于尴尬处境。⁶

4. 李威海，1996: 280-83。

5. 达赖喇嘛一点也不记得他被李井泉冷落或者相关事件的经过，但是他不否认可能有这么一回事。因为平汪和李威海的书（这本书是根据档案和访问材料写成的）都包含几乎相同的描述，所以看来无疑是发生过的。

6. 李威海，1996: 283-84。

和李井泉的态度不同，中央很严肃地看待这个事件。当时周恩来正从著名的印度尼西亚的万隆会议返回，于是中央要他绕道成都，并告诉徐淡庐通知达赖喇嘛在成都多停留几天等候总理接见。达赖喇嘛同意了。四川省党委也收到通知要为总理的到来做准备。四川的官员一听到这个消息马上意识到他们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可能要受到批评或者更严厉的处罚，所以他们前去找徐淡庐。

省里的有关部门也主动找上徐淡庐的门来，问周总理来了，迎接总理的领导同志的位置是怎么安排好？是省委第一书记排前面呢，还是让达赖排前面好？

徐淡庐这次也不着急了，把这个皮球踢了回去，说：“这个问题最好请示你们第一书记去。”他不软不硬地说话给他们听，“你们自己看着安排，一个是副委员长，一个是省委第一书记，怎么安排都行。”

省里的同志原想向徐淡庐讨教个折衷的办法，他们也知道达赖对省委第一书记没来迎接他生了一肚子气。这次总理来，省委第一书记和达赖势必要见面，这见面的场合要是安排不好，就会造成尴尬的局面。他们也左右为难，一边是国家领导人，另一边是他们的顶头上司，这可真难办呀！

此事最后还是由省委第一书记拍了板，他想了想勉强地说：“还是让达赖排第一吧！”

周总理乘坐专机来到成都。达赖和四川省党政军领导，包括那位省委第一书记一起到机场迎接。迎接总理的队伍以达赖为首，在达赖左侧稍后站着的是省委第一书记，再往后则是省长，……等人。总理笑容满面地出现在机舱口，步履轻快地走下飞机。……

见周总理走下舷梯，省委第一书记抢先一步迎上去，伸出手欲和总理握手。周总理看了他一眼，却没理他，而是把手伸向了达赖，使劲晃动达赖的手亲切地说：“达赖喇嘛，幸亏我回来得及时，否则就赶不上给你送行啦！我是特地为你送行来的呀！你近来好吗？身体怎么样？”……

此时，站在一旁的省委第一书记的脸上是红一阵白一阵，站也不是，走也不是。他知道，总理肯定了解了他对达赖的态度一事，总理是特意来做善后工作的，替自己为党和政府挽回影响。总理对达赖这么热情和关心，对他就是一种无言的批评。总理是要给达赖一个面子，给自己一个台阶下呀。……

达赖对周总理说：“总理，你今天休息一下，明天我去看你。”周总理摇摇头，“那怎么成呢，还是我去看你，就这么说定了。”

第二天，总理果然去看达赖，省里的主要领导闻讯都来了。省委第一书记为难地对总理说：“总理，你说我去不去呢？”……省委第一书记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达赖到成都你为什么不去迎接他？”总理严肃地说：“你这个主人是怎么当的？！这时候才想起来该去见他，晚了！”总理确实生气了，他看看周围的人说：“我们好不容易做的团结工作，建立起和西藏上层人物的亲密关系差一点被你毁掉了！”人们都肃立注视着总理，谁也不敢说一句话。

总理压了压火气，“算了，你就不要去了，由我去和达赖解释吧。”⁷

平汪回忆了达赖喇嘛和周恩来的会见：

〔周恩来〕在成都待了三天。一天……周恩来专程来拜访达赖，和他谈了两个多小时。达赖喇嘛告诉周恩来他的行程一切都很顺利，所有的官员尤其是毛泽东对他非常好。另外，他说他很高兴讨论以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来代替军政委员会。访问其他城市，看到中国发生的一切，他很受启发。他说西藏很落后，人民很贫穷。他说他现在清楚地知道了西藏和内地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西藏需要逐渐实行改革。周恩来答复说：“毛主席和我完全了解所有西藏人都信仰达赖喇嘛，也极为尊重达赖喇嘛。你的想法是正确的，但是当你回西藏之后，最好不要立即实行改革。”我想周恩来是觉得达赖喇嘛太年轻、太易受外界影响，所以可能会过于冒进，得罪拉萨保守的宗教和世俗官员……

在他们第二次会面中，周恩来把对达赖喇嘛说的话做了一些补充。他说：“对于在西藏实行改革的问题，你们应当仔细地谋划。中央的方针是稳定优先。现在你已经亲眼看到了内地经历的巨大变化，相比较而言，西藏很落后。但是在西藏，实行改革的条件尚不成熟，所以你们应当小心。如果领导者的想法和群众的想法之间存在巨大落差，那么改革是不会成功的，只有当领导者的想法和群众的想法协调之后才能实行改革。虽然周恩来说的是“群众的想法”，但我知道他其实指的是上层集团。如果改革终结了旧社会的赋税和

7. 李威海，1996: 283-84。

乌拉差役，真正的群众肯定会很高兴，但是贵族和寺院不会高兴，可能会反对改革并在西藏制造混乱。⁸

随后，达赖喇嘛前往西康省的康定。西康属于所谓民族意义上的西藏，因为它在近代不属于政治意义上的西藏，但是却几乎完全由康巴人组成。⁹ 达赖喇嘛在经过这片藏族地区的时候，举行了多场法会，并会见了多位藏族领袖，向他们表示对未来的看法。他回忆说：

从打箭炉（康定）到拉萨，每个较大的市镇我都会停留两三天，举行法会。〔每到一处〕都有数千人聚集。那时，我经常说中国人是来帮我们的。我满怀信心地说，有了中国人的帮助我们一定能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好。有一两个月，在重要的地点我都是这么说的。那些中国人非常友好，见到我也非常高兴。在我遇到党员的时候，我会很高兴。我常常打听某人是不是党员，如果是党员我就会觉得很轻松，〔觉得〕同他们说话很容易了。由于这个原因，1955年可能是最好的年份。¹⁰

在返回拉萨的路上，达赖喇嘛在工布见到张国华，他对这次会见的回忆很好地体现了他这一时期的心境。“我在林芝见到他，我记得那是一个晴天，会见地点是在我的帐篷里。我告诉他，从拉萨到北京去的路上我心中充满疑虑和担忧。现在我回来走的是同一条路，心中却充满了自信和希望。我是这样告诉他的，那时的情况就是这样。”¹¹

虽然有些书中提到在返藏的路上，康巴人向达赖喇嘛陈情要求他帮助他们反抗中国人，但是达赖喇嘛对此予以否认。他说惟一和他谈了政治问题的是著名的德格头人夏克刀登（Chagö Tomden），“我在他家住了两三个晚上。曾经有一次他来找我，和我说所有的藏族人应当组成一个独立的国家。……我迟疑了半天，没有说什么。我知道这是一个相当严肃和相当危险的话题。”¹²

8. 引自戈尔斯坦、道韩喜饶和司本石初，2004：201-2。

9. 对于政治意义上的西藏和民族意义上的西藏的论述，见戈尔斯坦，1997。

10. 达赖喇嘛，访问记，2004，达兰萨拉（原版中英文访谈内容未经校准）。

11. 达赖喇嘛，访问记，2004（原版中英文访谈内容未经校准）。

12. 达赖喇嘛，访问记，2004。

就这样，达赖喇嘛以沉默应付过这个尴尬的时刻。除此之外，返藏的最后一段行程走得很顺利。在1955年6月23日，达赖喇嘛到达拉萨，从他出发到现在差三个星期就满一年了。

达赖喇嘛的这次旅行对毛泽东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胜利。他的渐进主义策略的既定路线是先争取达赖喇嘛，然后再通过他改造西藏和西藏人。达赖喇嘛的访问是一个毛泽东向他展示这是一个新中国并说服他成为中国真正一员的机会。中国人也很高兴地了解到达赖喇嘛非常聪明、对新思想很开放、观点很进步。亲眼见到一个现代国家使达赖喇嘛印象深刻，也增强了他以前的认识，即西藏必须现代化。对毛泽东和中央来说，最重要的是达赖喇嘛接受了共产主义这一旨在改善普通人的生活的思想意识和运动。佛教和共产主义都是追求帮助人民战胜苦难的这一想法非常有效，也非常有吸引力，它使达赖喇嘛更容易把西藏看成是这个除了西藏之外都奉行无神论的国家的一部分。达赖喇嘛也渴望引入民族平等和国际社会主义（Socialist International）的概念。在和中国共产党的官员及领导人打交道的时候，他也变得游刃有余。在这次旅行中，他还第一次开始把自己当作一个中国人，而且我们也已看到，他实际上提出了加入共产党的要求。

对达赖喇嘛来说，这次旅行也是一个巨大的成功。他在19岁的年纪就见到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并且得到极大的尊敬。同时，他还见到和学到了很多东西。如今，他觉得西藏能够作为一个由西藏人管理的自治区融入新的中国，所以感到很乐观，对未来充满希望。现在，作为中国一部分的西藏是否应当进行现代化和改革已不成问题，真正的问题是达赖喇嘛如何在精英中凝聚共识，实现这个目标。

■ 回到拉萨

在达赖喇嘛回到拉萨之后，西藏政府向留守在拉萨的西藏官员通报了中国取得的各项成果和进行的活动。阿沛带头就所发生的事件和达成的协议作了一个报告。西藏俗官夏札回忆说他听了这份报告。

在他们回来之后的一个星期里，阿沛〔在孜仲林卡〕作了一个简报。……他从到达中国说起，谈了发生的事情，包括讨论的问题和结果，双方说了些什么话等等。在整个会议过程中，阿沛是主要的

发言人。索康也在那里，绕噶厦也在，但是主要发言的人是阿沛，他每一方面都讲到了。¹³……他提到他们取得的成果包括用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来代替军政委员会，这个筹备委员会由西藏全部三个部分——西藏政府、班禅喇嘛集团和昌都解放委员会——组成。于是人人都很高兴。

问：阿沛有没有说这是很大的成功？

说了，说了。这是作为至尊的访问成果列出来的。他说因为是达赖喇嘛去谈的这些事，所以我们应当努力把它们执行起来。他说的时候语气很坚定。他把每一件事都说得很清楚，如在某月某日发生了什么事情。他说的是如此精确，以至于人们都很好奇他怎么记得这么清楚。¹⁴

大概在同一时期，达赖喇嘛也在一次法会上发表了一些政治谈话，表明他对西藏的未来的一些看法。他解释了这些谈话的经过。

但是当我回来的时候我仍然满怀信心。……〔我受邀〕在坚赛宫（Jenselingga Palace，在罗布林卡）做一场观音法会（藏语：*cenrezi wangchen*）。我在那里提到了几项重要的政策性问题。〔我〕满怀信心地说，我们是平等的关系。中国人是来帮助我们的，我们必须利用这个机会自己动手建设我们的国家。我在公众面前说这个之前和范明商量过，他也表示同意。……我〔在演讲中〕谈的正是平措汪阶（杰）的观点。团结必须建立在信任之上，信任必然来自平等。就这样我满怀信心地说出了这些见解。那时是我最满怀激情的时刻。¹⁵

达赖喇嘛在这个有史以来第一次公开论及西藏和中国人的讲话中没有具体谈论藏军和藏钞等政治问题，但是很清楚地传递了非常正面的中国政府及当时在西藏的中国人的形象。这个达赖喇嘛和那个被描述给美国和印度政府的达赖喇嘛截然不同。

他的这次讲话澄清了很多问题：西藏对世俗事务的认识很欠缺，为了更快地发展，西藏有必要和中国人紧密合作。与此同时，达赖喇嘛还强调

13. 实际上索康详细地解释了关于藏军问题的协议，这将会在下面讨论。

14. 夏札，访问记，1992，拉萨。

15. 达赖喇嘛，访问记，2004。

被派来西藏的中国人是来帮助西藏人的，西藏人和中国人是平等的。他指出世俗领域的发展是很重要的，因为自治就意味着自己要有能力处理自己的事。他也对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表示了正面的看法，实质上是要西藏人不要担心它。他说所有的事情都会根据具体情况一步一步适当地推进，任何事情都不会草率地进行，以后他们就会知道更多细节。他的讲话中这一部分的内容译文如下：

对于〔我们的〕世俗事务，我们管理得不好，管理方法有缺陷。因此，我们必须加以改善。主要是我们自己应当充分努力。但是鉴于我们在世俗事务上缺乏经验，我们想快速有效地实现这个目标是很困难的，所以重要的是要依靠汉族。总的来说，我们应当对各民族都友好相待，尤其应当友好地对待汉族。

在有些人的观念中，中国人和西藏人是老爷和仆人的关系，但是实际上不是那样，我们享有民族之间的真正平等。这就像一位父亲的五个孩子，尽管他们的学识和能力不同，但是他们都拥有平等的权利。正因为我们处理不好世俗事务，所以汉族干部来到这里帮助我们。他们不是来当老爷的。并且只有在条件适当、具体情况允许并且所有人都希望的情况下他们才会对我们进行帮助。如果条件不适合，那么我们就不得不耐心等待。

中央政府派汉族干部来是为了西藏好，派他们来不是为了制造麻烦。假如汉族干部怀着一片好心却做了一些和当地情况不相适应的事，那是很不好的。此时我们不应顾全〔他们的〕面子，而应当直接指出他们的错误，趋利避害，改造他们。

对于极少数在原则性问题上犯了错的汉族干部，如果他们丝毫无望于造福西藏的话，我们可以把他们送回去；对于西藏干部，他们将来应当能够自己肩负责任，而这就叫做自治。例如，在一个僧人家庭中，如果这个家庭的人都能够自己完成自己的工作，那么这就叫自治。如果这些人不能干好他们自己的工作而需要雇人来完成，那么就不是自治。因此，培养包括僧俗官员在内的西藏干部是很重要的。

在现在的这些干部中，很多人老实实在地为政教事业和人民的福利出谋划策。上一年，为了管理好政府的收入和臣民的福利，政府收回了宗和所属庄园的管理权。那些作出了如此重大成就的官员们，我从内心深处为他们感到高兴。即使你们不出家不修习佛法，

但是只要你们本着忠诚的态度为政教服务，那么也会有益今生和来世。以后，所有人都应当承担起责任，而不应当做有违因果轮回的盘算。

有些人只关心自己的事情。这是因为他们心胸过于狭隘。你们大家都知道，过去有一段时间，某些掌管〔西藏〕的政治人物为了金钱和财物〔贿赂〕不择手段。于是政府事务被耽搁，臣民遭受痛苦折磨，而西藏却没有得到什么好处。所以人们应当悔悟过去的作为，重新开始，改造自我。

某些人以革命〔中国人的到来〕为托辞，不顾西藏的风俗制度，行为乖张粗暴。这是不对的。所谓革命不是混乱（藏语：*gonju khunglung mepa*）。这种〔极左的〕行为也应当被改造。

如果僧俗官员和〔共产党〕干部能够团结一致，那么他们就可以在政府事务上有效地发挥作用。对于那些干部，你们应当直接并且及时地指出他们的错误，杜绝蛊惑和欺骗。举个例子说，一个人搬不动的石头，四个人或者五个人就可能搬得动。所以如果你们能够友善地对待你们的邻居，那么你们就能互相帮助，互相支持。

札仓中的僧侣和〔札仓的〕康村及米村中的僧侣在行事中也偏向他们自己的小圈圈。

所有的新教派和老教派，如果它们是圣洁的，那么就都是一样的，因为它们都是在追求觉悟。所以各教派都应当避免任何的偏见和不友好。类似地，不管是何地区，不管是卫是藏是康还是堆（Tö，阿里），我们所有的人都是西藏人，所以不应当歧视任何人，大家要高度团结。

我想可能会有一些人，他们不了解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所以他们有疑虑。但是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只会根据具体情况一步一步地运作，而不会草率行事。你们将会慢慢了解详情。

总之，西藏的主要特点是我们拥有被我们视为生命的佛教。所以我们应该发展它，恢复它，传播它，并且设法使它长久地免受破坏——这就是我们的原则。所以，所有人不论僧俗都应当做有益于今生和来世的事，而不应当与之相违背。¹⁶

这份达赖喇嘛的“忠告”是他尽力影响公众观点和态度的开始。虽然其内容很温和也很宽泛，但是他把中国和在西藏的中国干部描述为前来帮

16. 引自藏文版阿乐群则，1958: 18–21。

助西藏发展的朋友。并且他也遵循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嘱咐，没有试图在条件不成熟、未曾争取到精英的情况下强迫实行改革。毛泽东希望达赖喇嘛在凝聚共识及同中国人搞好关系的过程中开始扮演更为积极的领导角色，而这个讲话表明达赖已下决心要这样做了。现在的问题是达赖喇嘛是否具有扮演这种角色所需要的政治技巧和个性，以及能否在塑造新西藏这一远景的过程中发挥关键性作用。毛泽东认为答案是肯定的，所以把中国争取西藏人的希望寄托在他身上，而排斥了范明的策略。到目前为止毛泽东的策略看起来都是正确的。

后来在 1955 年 12 月，毛泽东和中央根据西藏更积极的新形势给西藏工委发去一份很有意思的指示。公路的开通使他们在西藏的存在得到物质上的保证，也进一步增强了左派在西藏的力量。于是共产党现在准备着手争取广大的精英阶层。在共产党看来，这些精英就是中间派和右派。

对西藏工作的某些问题的指示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三日

西藏工委：

我们已经全面研究了西藏工委十一月十一日、十一月十三日和十一月十七日的电报。以下是我们对西藏工委的指示：

自从去年达赖、班禅来京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及川藏、青藏公路通车后，西藏形势已发生了重大的、有利的变化。在这种新的情况下，我们应该更积极地开展工作，特别是应该更广泛、更放手地开展统一战线的工作，以巩固既得成绩，进一步地肃清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影响，孤立反动分子，为建立西藏自治区和逐步开展群众工作创造条件。

我们统战工作的重点任务仍然是增强左的〔进步的〕力量。从上一年度的情况看，我们可以肯定达赖喇嘛已经从中间派转变为了左派。这证明中央在几年前争取达赖的方针是正确的，同时也证明我们对达赖会转向左派的估计是完全正确的，这是我们党在西藏工作上的重大胜利。对达赖我们应当继续给予保护和帮助，并且我们也应当帮助他团结上层中的大多数。不要鼓励他过于向左靠，时机还不成熟。我们希望他避免被群众孤立。如果我们这样做，就能够使达赖在西藏发挥更大的作用。

要继续执行相同的保护和帮助阿沛的方针。虽然他无疑有某些不足，但是他仍然是左派中一股强大的力量，我们应当依靠他。

要设法教育他和上下级搞好关系，在工作中更多地和不同的方面协商，同时警惕不要被大多数人孤立。在对左派中其他人员做工作时也应采取相同的方针。我们务必确保左派的力量随着局势的改善而得到壮大。我们需要挖掘左派中新的力量并且帮助他们成长。同时，我们也必须尽力加强我们对中间派和右派的工作，特别是争取中间派的工作，否则我们的左派力量将会继续被孤立。要改变我们过去只同上层中进步的少数打交道的习惯，扩大我们的统一战线。我们不仅应当争取中间派和右派，也应当协助左派做这方面的工作。不仅我们应当努力工作，也应当推动他们，教他们做这方面的工作。

要向达赖和阿沛充分解释同中间派和右派打交道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可以告诉他们我们打算同中间派和右派说的话。我们在西藏的统战工作的目的是加强藏族的团结，反对帝国主义者，为将来的社会主义改造打基础，同时改造封建上层。这和我们在内地的工作是一致的。我们不仅需要实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革，也需要逐步把资产阶级改造成工人阶级的成员。

当我们在西藏逐步实行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革的时候，我们需要把僧侣和贵族中的上层逐渐改造成社会主义社会的公民。对人的改造和对社会的改革是互相影响的，也是通过和平手段废除西藏封建制度的必要部分。对人的改造是极为困难和复杂的工作，但是这是我们的职责所在。从我们和资产阶级以及少数民族的上层合作的经验来看，对人的改造不仅是非常重要的也是能够办到的。在今天的统战工作中，我们应当特别注意这个问题。例如，当我们和封建上层成员讨论改革的问题时，我们应当告诉他们中央的方针是西藏的改革应当由西藏人民和那些同西藏群众紧密联系的上层成员来实行。中央不能就改革的问题替他们作决定。改革将会使社会不同阶层的人受益。对于上层来说，只会使他们的生活更好而不会使他们的生活更坏。我们应当广泛传达这个讯息……

中央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三日¹⁷

尽管毛泽东对达赖喇嘛采取积极的态度，而达赖喇嘛也明显地表现出一些进步性，但是并非所有的中国官员都同意达赖喇嘛是进步的。我们已

17. 《对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未出版的手记）》，出版日期不明。

经看到四川的李井泉和他的官员的态度，¹⁸ 另一方面，在西藏范明仍然延续着他的看法，认为指望达赖喇嘛是徒劳的。实际上，范明认为他只是在哄骗北京。

达赖在北京的时候被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副主席，而班禅被选为中国政治协商会议的副主席。团结的问题解决了。达赖极为高兴，所以尽力表现得非常进步：他热爱祖国，他进步，他甚至希望加入共产党！所有这一切都是假的，这你都知道。但是他骗过了一些人，这些人以为达赖是治国之才，他热爱祖国等等。他们以为达赖真是一个爱国和进步的领袖……

达赖举手投足表现得像个左派人物，他以这种方式欺骗人们。他〔说他〕信仰共产主义，他希望加入共产党，等等。他哄骗当权者，而当权者信以为真。拉萨有谣言说我们把达赖当作人质，所以我们很快就让达赖和班禅返回了西藏。在他回西藏的时候大家以为他是爱国和进步的，就这样他得到了一个四处炫耀的面具。¹⁹

此外，尽管达赖喇嘛支持在世俗方面进行改革和成立西藏自治区，但是很多西藏人仍然强烈反对改革，敌视中国人。他们反对接受在北京商定的改革，认为西藏政府是被胁迫才接受的。和过去的司曹一样，他们希望西藏保持过去的样子，而不是用中国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和制度来代替传统的价值观和制度。从实质上说，他们最想要的是没有中国人。毛泽东认为如果不增加精英和大众对改革的支持，那么即使是达赖喇嘛也很难改革西藏。现在看来，他的看法是正确的。达赖喇嘛对于改革的热情很快就被保守和民族主义的现实抵消了。

温和派官员夏札回忆了他对在北京达成的协议的负面看法：

〔阿沛解释的〕两个问题不是很令人满意，我就不满意。所以我要如实地告诉你，对不对？第一个问题是有关藏钞的，说是中央政府会〔用中国的货币〕兑换藏钞，然后再给西藏地方政府提供一定数额来满足它的开支。第二个问题是关于藏军并入解放军的……说中央政府会承担所有的相关费用。……我不满意。如果真的这样了，

18. 实际上，李井泉即将在四川省的汉族和藏族地区全面实行民主改革。这场民主改革将会引起 1956 年初著名的康巴暴乱。

19. 范明，访问记，1993，西安。

那么事情就将无法挽回了。如果不能使用自己的货币并且不能拥有藏军，那么西藏的东西就没有了，一切很快就变成中国的了。²⁰

夏札对这两条协议的不悦在西藏是普遍存在的。尤其是藏军的改革计划立即就遭到攻击，因为很多军官和士兵强烈反对缩减的计划。这并不奇怪，因为札齐代本团的代本是扎西班牙饶，而他就是前面讨论过的反对中国人的秘密组织朗色林派的成员。札齐代本团的士官甲本格占回忆了噶厦试图实行在北京商定的计划时所发生的事情：

在至尊〔从中国〕返回后，孜仲林卡里举行了一个为期三四天的会议〔讨论这次旅行〕。噶伦索康提到了藏军，他说现在因为边界将会由中国人的中央政府来守卫，所以藏军太多了。他说我们同意只保留一千人。这一千人中，五百人是警卫团，剩下的五百人是〔拉萨的〕警察。其他地区不需要驻守军队。

他说过去旧的代本团中有三千人，将要保留的这一千人将会部分从这里面挑选。因为五百人的警卫团将会从现有的警卫团中挑选，所以将会从旧的代本团的三千人里挑选出另外的五百人。

〔他说〕他相信其他士兵中很多人〔希望〕回家，所以要想尽办法让他们回家。不想离开〔拉萨〕的军官和士官将会得到非军事性的工作。对于普通士兵我们将会建立一个委员会，给他们一些建筑工作或者其他工作做。我们留下的这一千士兵将会得到比现在更高的薪水。我们〔西藏政府〕将会供应粮食等物资，薪水和制服将会由中央人民政府提供。这就是谈判的结果，所以要按这个逐步地改。

当时没有人发表意见。但是在拉萨的警卫代本团、札齐代本团、噶当江孜代本团和恰当代本团四个代本团讨论了形势，认为如果至尊在这样的时刻没有适当的警卫、领土没有士兵军队〔是很可怕的事〕，所以根本不应当进行这样的改革。当下的问题不是我们的士兵太多，而是我们的士兵太少。因此我们全体站出来，不愿意离开至尊。我们决定绝不接受这项改革。于是我们通过西藏政府军事司令部（藏语：马基康，*magjigang*）发出了大量的请愿书。……但是我们没有从噶厦得到任何答复。

20. 夏札，访问记，1992。

在我们等候答复的时候，我们很想知道改革的情况以及要发生的事情。后来，至尊受噶玛巴喇嘛的邀请访问楚布寺。这个时候，札齐代本团、江孜代本团和恰当代本团派了三位代表到楚布寺去，直接向达赖喇嘛呈交我们的请愿书。我们在请愿书中说明了我们送给噶厦的请愿书的全部内容，并说我们没有收到任何答复。我们还说我们立场一致，完全站在同一条阵线，无论如何，我们不能在这个困难的时期离开〔军队〕。另外，如果政府支付我们的薪水真的有困难，那我们可以不拿薪水，我们会快乐、恭敬地服务。但是我们不会离开，也不会实行改革。这就是我们请愿的内容。

在楚布寺的时候，卓尼钦莫帕拉和善地对待了这些代表。当至尊正在转山时，他们成功地把这份请愿书呈交给了他。像这样不循正常途径的面对面请愿一般总会受到某些惩罚。〔但是这一次〕没有被惩罚，并且在一两个月内，上面发布命令说西藏军队不是太多而是太少，所以没有必要实行改革，和以前一样就可以了。在那段时期，粮食局没有给我们发薪水。但是在命令发布后，所有〔欠我们的〕都补发给我们了，于是每个人都很满意、很高兴。以上就是我们〔作为军人〕留下来的过程。²¹

这两个月里在背后发生的事情我们不得而知，最终的结果是虽然噶厦和达赖喇嘛确实在制服上做了一些改变，但是在缩减藏军的主要议题上还是向藏军屈服了。中国人从一开始就对西藏的英式制服很不满：达赖喇嘛警卫团的所有人都穿着英式制服，其他代本团中尽管士兵穿着藏式制服，但是军官穿的还是英式制服。如今，外国的制服终于被终结了。从那时开始，警卫团及其他代本团的军官都穿上了解放军的军服。尽管如此，藏军的其他士兵仍然穿着西藏的制服，一直到1959年。²²

与此类似，由于相同的抵制行为，用中国货币兑换藏钞的计划也从未实行过。在这个问题上，寺院强烈地反对改革。由于他们是西藏主要的放贷者，所以他们的强烈反对和前面夏札所说的流行观点共同扼杀了这一改革，西藏继续印刷和使用自己的货币直到1959年暴动。在这两个议题上，西藏政府从来没有公开说过不实施，只是拖着什么事也不做。很明显西藏人仍然有非常强烈的愿望，希望维持这些象征着西藏分离于中国的明显标志。

21. 甲本格占，访问记，1992，达兰萨拉。

22. 夏札，访问记，1992。

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计划也引起了不满和反对，并且成为反对中国人的人民会议再次出现的主要诉求之一。我们在前面看到当达赖喇嘛受邀要去北京时，“人民”中的阿乐群则等人请求他不要去。在这一行动失败后，阿乐群则等人又发起和组织了一场长寿法会。后来在1955年年初，当西藏政府组织官方迎接团去藏东欢迎达赖喇嘛的时候，阿乐群则像在达赖喇嘛从亚东返回时所做的那样，请求允许他们派出一个人民会议迎接团，而这个请求也得到了批准。于是阿乐群则回到拉萨后迅速同本唐仲译（Bumtang Trunyi）和日喀则拉布（Shigatse Lhabju）一起开始招募成员成立一个新的人民会议，这个新的人民会议将会再次向中国人提交一份请愿书。这份请愿书将会在下一卷中讨论，但是这里有必要引用请愿书的一部分内容，因为这些内容表现了在改革西藏问题上达赖喇嘛所面对的强烈的反中民族主义态度和观点。社会中的一部分人憎恨中国人，并且执拗地反对改革西藏的传统制度。

中国共产党破坏了我们所有的风俗和制度，也完全背弃了他们签署的《十七条协议》，所以我们强烈反对他们，并因此提出以下请愿……

但是要说到西藏现在的情况，我们需要指出我们的宗教面临非常严重的危机，即将堕入黑暗和毁灭的无底深渊。达赖喇嘛已经被剥夺了政权权力。西藏民族犹如一支风中的蜡烛，正面临着严重的危险。造成这个危机的根源有：中国共产党一直在压迫西藏人民，迫使他们接受共产党思想，中国共产党奉行最令人发指的侵犯政策，中国共产党没能履行对西藏人的承诺。为了使我们的国家避免在将来堕入危险，我们已经在早些时候向中国政府和达赖喇嘛提交了一份正式的抗议书。

从前，在达赖喇嘛的下面有摄政、噶厦和各种各样的政府机构，是他们在执行管理全西藏的任务。但是自从中国共产党占领西藏以来，所有过去的政府机构都已被终止运作，并且中国人已经在他们的地盘上建立了大量的非法机构来实施管理。……共产党不仅增加了管理机构，还成立了一些像“爱国青年联合会”和“中文学校”这样的组织。这样做的惟一目的是向西藏青年强行灌输共产主义，以摧毁这个民族的文化和文明。另外，中国共产党违背人民的意愿，摧毁了西藏政教一体的社会制度，也破坏了西藏人民的宗教。因此，我们以西藏人民的名义站出来向达赖喇嘛请愿。

我们请求达赖喇嘛取缔“爱国青年联合会”组织并关闭“中文学校”，阻止中国共产党向西藏人民灌输共产主义的行为。因为我们已经有了达赖喇嘛的政府，所以我们决定不接受他们建议的区域自治政府。与此同时，我们也要求中国共产党驻西藏的军事代表允许我们到北京去向当局表达抗议。如果中国共产党无视人民的意愿，用武力压制人民发自内心的请愿，那么我们以西藏人民的名义宣誓，我们决心流尽我们的鲜血、牺牲我们的生命以反抗共产党，我们也绝不会配合中国共产党在西藏的任何活动。²³

最后，正如前面已经指出的，不遗余力地反抗中国人的西藏民主主义组织坚堪孜松不仅开始在印度扩大反抗活动，也开始跟在西藏的反对中国人的西藏人联成一线，尤其是和朗色林派以及达赖喇嘛的卓尼钦莫帕拉。在 1950 年代的下半段，这个组织会在反对中国人在西藏的存在、阻挠达赖喇嘛和中国人亲密合作建设新西藏的行动中发挥重要作用。

因此，如果在北京达成的改革意向是对达赖喇嘛从中国返回后的能力和决心的初步试探，那么这个开头将会布满荆棘。毛泽东和周恩来向达赖喇嘛提出的在开始改革的时候需要极度小心的忠告，证明是非常正确的，即使是那些他们在北京认为可以做的事也是如此。所以尽管争取到达赖喇嘛是毛泽东的一个巨大胜利，但是很明显这并不意味着事情已尽在掌握之中。达赖喇嘛需要建立强有力的领导以争取西藏精英，说服他们接受他设想中的新西藏。

23. 引自帕特森，1960: 112-14，但是帕特森的书中没有给出来源（划线部分为强调）。

第二十二章

结论

达赖喇嘛结束为期一年的中国内地之旅返回西藏，这标志着 1950 年代中藏关系达到高潮。达赖喇嘛在中国的所见所闻和毛泽东等共产党领导人对他的态度深深地影响了他，他因此同这些领导人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此外，他也深深地迷上了可以借以推动社会经济改革和改善西藏贫苦大众生活的共产主义思想体系。他满怀建设西藏和使西藏现代化的热情回到了西藏。毛泽东已经把达赖喇嘛争取过来了，似乎西藏现在会甘愿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重要的少数民族地区之一，等待被逐渐转化为由达赖喇嘛领导的自治区。

中国的成功源自审慎的谋划和执行。并入西藏很明显从一开始就意味着把两种截然相反的社会和政治体系摆在一起。西藏基于庄园领地的封建社会经济制度无疑属于一种世袭的人压迫人的精英制度，这是中国共产党致力打倒并已经在中国其他地方打倒了的制度。但是在西藏，毛泽东选择不把“解放农奴”作为当务之急。相反，在这段历史时期内包括领主和庄园领地在内的传统西藏社会得以继续存在，不做任何改变。与此类似，尽管有约两万人的解放军进驻拉萨和卫藏，但是达赖喇嘛的政府仍然被允许保留自己的军队、旗帜和货币等事实上独立时期的重要标志，同时也被允许继续征税、逮捕和惩处归属于它的罪犯、审讯民事案件、单方面决定如何分配其收入以及提拔和贬黜其机构中的官员。令人惊讶的是，西藏甚至依然可以抓回逃跑的农奴用鞭子抽打，而不用承担任何责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这种宽松的政策是空前绝后的。

设计和指导这一面向西藏的温和政策的是毛泽东。他的政策包括最低目标和最高目标。最低目标是解放西藏，不管西藏的领导者同不同意成为中国的一部分。如果需要，中国会直接入侵，用武力占领西藏。毛泽东的

最高目标也是要解放，但是他为西藏设计了一项更雄心勃勃、更高明的战略，即创造一个稳定、忠诚、对中国有归属感并愿意实行社会主义改革的西藏，并让西藏以这种方式并入中国。为了实现这个转化，毛泽东制定了一项务实的“渐进主义”策略，并且直接监督它的实施。

这项策略的第一步是寻求“和平解放”西藏，即引诱达赖喇嘛签订一项接受中国主权、接受数万中国军队和官员进驻西藏的协议。毛泽东巧妙地运用胡萝卜加大棒的策略实现了这一步，他送上的胡萝卜对西藏领导人来说实在是太有吸引力了。达赖喇嘛和西藏政府被允许继续掌权，而且实行改革首先需要得到他们的同意。但是，因为西藏精英很明显对改革西藏没有兴趣，所以附上这样的条款就意味着改造西藏可能要花上很长的时间。毛泽东接受了这个现实，他认为和平改造带来的长远收益要远远大于缓慢结束农奴制度和庄园制度所造成的潜在问题。

中国最终成功地诱使达赖喇嘛派出代表团去商定一个名为《十七条协议》的协议。它也成功地说服达赖喇嘛不顾很多人（例如美国、他的家人以及很多高级官员，例如朗色林、索康和夏格巴等）要他推翻协议流亡国外的呼吁，返回拉萨在协议的框架下继续其统治。

然而，和平解放仅仅是第一步。协议为西藏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建立了合法的框架，并且允许中国军队和官员和平地进入卫藏，但是它本身并不是最终的结果。毛泽东的渐进主义策略的第二个阶段集中在两个相关的问题上：（1）争取达赖喇嘛和西藏精英，并同他们一道逐步执行《十七条协议》，以便最终在他们的认可下进行社会主义改革、设立西藏自治区；（2）稳定中国人驻守西藏的物质基础，使他们不会因为内部暴乱或外部进攻而被迫撤离。

毛泽东关注的是精英，尤其是达赖喇嘛。这是因为他认为西藏贫苦的农民群众还没有充分的准备，在不久的将来他们也不能理解和接受阶级斗争的观念，而且宗教和喇嘛对他们强有力的控制是很难克服的，所以中国吞并西藏的最佳方式是和精英合作并通过精英来完成。从本质上说，毛泽东着手改变的其实是精英的道德框架。

但是，在中国共产党内部并非所有人都同意毛泽东的观点。范明认为尝试争取达赖喇嘛的封建精英是徒劳的。他主张的是同班禅喇嘛一道迅速在农奴中培育土地改革的呼声，其计划是把班禅喇嘛及其堪厅作为一个独

立于西藏政府的自治实体，让他们控制后藏。一旦班禅喇嘛控制了这一地区，他就会主动在这一地区结束庄园制度和农奴制度。当达赖喇嘛政府统治下的农奴看到他们附近发生的事情后，他们就会自发要求同样的待遇。范明认为这将会迫使达赖喇嘛紧跟其后，在他的地区废除旧制度。

但是毛泽东否决了这一策略，他认为像这样利用班禅喇嘛会使达赖喇嘛方面对中央政府产生深深的仇恨，西藏的并入也无法通过积极的方式实现，而在毛泽东看来，这会对中国的长远利益产生很大的影响。西藏和中国正处于它们历史中一个独特的过渡时期，这个过渡需要很小心地把握，以使西藏人最终成为社会主义中国的忠实公民。渐进主义和达赖喇嘛是实现这个目标的关键，所以毛泽东坚决要求包括范明在内的在西藏的干部们按照他的渐进主义路线办事。

毛泽东知道，改造西藏僧俗精英的态度和想法是一项大胆的计划，需要多方面的技巧，需要妥协和时间。所以他不断地指示在西藏的中国官员不要急于改革西藏。这个政策不管是在宣传中还是在实际操作上都要非常小心，慎重稳进。重点首先是达赖喇嘛和较为进步友好的精英人群，接下来是争取更多精英中犹豫不决的中间人群，同时孤立和打击强硬、反中的人群。这个过程所需要的时间长短取决于中国人的策略在多大程度上成功地影响了西藏精英。但是毛泽东愿意等上五年或者十年，或者甚至更长的时间来实现这个目标。他在这一点上预留的时间是没有限制的。

于是，在拉萨的中国官员开始同精英们建立相互合作、友好的关系，设法使精英们相信他们来西藏是为了帮助他们实现现代化、帮助他们发展西藏，而不会像以前的中国政权那样压迫他们、剥削他们。西藏工委想把自己塑造成“新中国人”，所以他们尽一切努力在言行中表现出他们对西藏宗教、语言和文化的尊重，包括给拉萨周边所有的僧侣发放布施等。

然而，尽管中国人愿意在西藏慢慢地推进，但这并不代表他们愿意什么都不做。他们的目标很明确，就是逐步用中央政府领导下的西藏自治区政府取代神权和封建的西藏独裁政府，以改造西藏。前面已经提到，他们希望等到达赖喇嘛和大多数西藏精英都相信这些改革是必要的。《十七条协议》没有规定具体的时限，其中的任何条款应当在什么时候实行也没有限定，都取决于对西藏的局势和观点的主观判断。

中国在西藏的初步策略也有一个现实的方面，即尽快稳定解放军的物资供应。在没有从中国内地通往拉萨的公路的情况下，解放军最初不得不完全依靠西藏来解决粮食问题，在军事物资补给方面他们也很脆弱，如果发生冲突，新的补给需要由驮畜通过漫长艰险的道路送来。结束这种依赖是优先任务，因此毛泽东批准了一项紧急方案，即修筑两条通往拉萨的公路，一条始于四川省，另一条始于青海省。与此同时，他也命令在西藏的军队把口粮生产当作和筑路同等重要的优先任务来抓。北京还机智地同印度政府商定了一个方案，把中国的大米通过加尔各答运送到拉萨。但是在西藏什么事情都很花时间，实际上一直到1954年12月这些公路才开通。

然而，在从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地位问题上西藏方面没有一致的观点和清晰的策略。在《十七条协议》签订后的几个月里，成千上万的中国军队和官员进入拉萨。虽然差不多所有的精英都把解放军看成是一支占领军，而不是一支来解放他们的军队，但西藏政府还是必须决定如何同中国军队和干部打交道，如何应对《十七条协议》这一规定西藏如何从属于中国的协议。正如前面提到的，《十七条协议》的规定很模糊，在某些事情上也存在前后矛盾之处，并且有大量解读和操弄的空间。达赖喇嘛、西藏政府和西藏传统制度的未来可能要取决于西藏政府如何把握好这些规定。

但是和中国人不同，西藏方面没有形成统一的策略。西藏政府的两个最高机构司曹和噶厦互相不配合，各自奉行极为不同的策略。两位司曹从一开始就对中国人采取敌视、对抗的态度，试图抗拒中国人提出的任何建议。中国人占领西藏使他们很愤怒。在他们看来，共产党刚刚血腥地入侵了昌都，现在却伪善地宣称他们这些“新中国人”是来帮助西藏的，这深深地刺激了他们。他们认为阿沛通过谈判得到的结果是一个很糟糕的协议，所以他们也对这个谈判很不满。他们认为西藏是独立的，并且天真地认为最坏的情况也只是让西藏和中国之间形成一种像清朝时期那样松散的保护关系，那么几乎所有的中国军队和官员都会撤走。

司曹的态度反映了西藏大多数人的态度，所以当人们看到他们敢于冲撞中国人的时候他们就成了英雄。但是他们所说的和所做的只是凭着一时的愤怒和意气，而不是仔细谋划如何同中国人交涉以更改协议或者重新解读条款。于是几乎每一次司曹和中国方面的领导人会面，最终都会以叫嚷和大声抗议告终。两位司曹不顾西藏已经战败并已签订接受中国主权的协

议这一现实，似乎认为只要告诉中国人他们在西藏不受欢迎就可以让他们改变政策。

司曹的愤怒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他们的行为却和他们的目的背道而驰。他们的行为只是鼓励了抵抗活动，促成自称为人民会议的西藏历史上第一个非精英政治组织的出现，进一步导致拉萨街头的混乱。于是拉萨的局势迅速恶化，到1952年3月，这个城市已处于暴力冲突的边缘。

相比之下，噶厦采取了不一样的、务实的策略。噶伦们看到中国人占领他们的国家心里也很愤怒，他们也担心共产党最终会改变西藏的政教制度。但是他们觉得既然输了战争，那么最好的策略就是要紧扣《十七条协议》，以它为方针，努力同中国人发展友好合作的关系。所以他们的策略是设法使这个协议尽量有利于西藏的利益和福祉。

然而，在噶厦内部也存在着不同的观点。比如阿沛，他认为重大的改革是不可避免的，所以西藏最好采取主动，自己来执行这些改革。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如果某人根据自己的尺寸做一顶帽子，那么戴起来会非常合适；如果他不这样做，事后再去戴做给别人的帽子，那当然不合适。其他一些噶伦也倾向于推动改革，但是大多数噶伦都反对任何单方面的激进改革。因此，噶厦在对待中国人和协议的问题上也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立场，而是根据所发生的事情具体处理。总的来说，噶伦们意识到改革是一定要实行的，但是希望能够尽可能缓慢地实行，这和阿沛的观点是不同的。但是他们很显然都热衷于和中国人友好合作，并在《十七条协议》的指引下行事。正因为如此，他们觉得司曹正在走的是一条危险的、不会有好结果的道路，所以他们想方设法抵消司曹所表现出来的敌意和仇恨。反过来，司曹也不信任噶厦（尤其是阿沛），所以私底下的事情都瞒着他们，不和他们合作。因此，在这个极为危险的时刻，西藏两个最重要的机构——噶厦和司曹没有相互协调，而是沿着相反的方向前进。

在首支解放军部队到达拉萨后的一个月左右，中国方面的领导层向西藏政府施压，要他们实行《十七条协议》规定的改革，因而使局势恶化。中国方面想要实行的改革包括开办西藏第一所小学、成立西藏军区司令部、把藏军并入解放军和成立新的军政委员会。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这些改革没有得到西藏方面很好的回应，尤其是两位司曹，他们坚决反对改革藏军和成立军政委员会。这也促进了反中的人民会议的成长。西藏工委

无意中做了毛泽东告诫他们要不惜一切代价避免的事情，即在没有得到精英们配合的情况下走得太快太远。于是毛泽东在 1952 年直接控制了西藏事务，命令所有与西藏相关的决定都要事先向北京请示。从那时开始，毛泽东和中央就直接管理了西藏事务。

在这个时期另一个重要的角色是达赖喇嘛。从理论上说他本应该在他的官员和政府中推行一项统一的策略，但是 1951 年时他才 16 岁，基本上还游离于政治事务之外。不论是他自己的意向还是他的随从们的建议都促使他回避积极参与决定西藏应对中国人的策略。因此，在 1952 年因为人民会议同中国人作对以及中国人构筑工事、提高戒备，局势几乎失控之前，他基本上还只是个旁观者。正如我们看到的，在那次危机中，中国人和噶厦最终诉请达赖喇嘛干预。在经过相当的迟疑之后，达赖喇嘛同意命令司曹辞职、取缔人民会议。这时，中国方面在毛泽东的指示下搁置了所有有关兼并藏军、成立军政委员会的交涉。他们也向噶厦妥协，允许司曹不撤职而以保留全部礼遇的方式离任，并且不惩罚人民会议的任何领导者。在司曹退出政坛之后，噶厦立即恢复了它作为政府最高机构的地位。同时动荡的局势很快消散，西藏进入一个和中国人友好合作的新时期。

在这个新的气氛下，中国人成立了广受欢迎的青年组织和妇女组织，开办了新式学校，创办了一份报纸，并组织了一系列到中国内地的参观调研之旅。在接下来的两年里，有一千多名西藏人到中国参观或参加会议，大约五百名西藏人进入位于北京的民族学院学习。在西藏，逾一千名西藏人报名进入新的小学学习。在西藏政府方面，一个由阿沛领导的改革机构成立了。阿沛不仅是中国人最信任的噶伦，也是达赖喇嘛最信任的噶伦，达赖喇嘛经常私下里同他讨论政治事务。而且就达赖喇嘛而言，他本身是赞成改革、赞成使西藏现代化的。因此，在 1953 至 1954 年间，西藏政府的改革大会制定了改革利率、改革年代久远的债务以及改革宗的行政的法令。然而，尽管阿沛在 1952 年享有很高的声望，但还是缺乏作为政治领袖的技巧，他既未能改变大多数较不进步的官员的态度也未能改变人民的态度。

与此同时，中国方面在毛泽东干预后果断地终结了范明的图谋，决定支持西南局和达赖喇嘛。虽然范明的失败在当时没有被达赖喇嘛和西藏政府察觉，但是它意味着西藏获得了制定其官员和人民都能接受的改革方案的时间。

在这个友好合作的新时代，达赖喇嘛受邀出席了1954年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拉萨有很多人反对他去，担心中国人会不让他按时回来或者对他不敬，或者更糟糕的是，影响年轻且本来就很容易受影响的达赖喇嘛的态度和观点。但是，达赖喇嘛和噶厦觉得很有必要亲自去见见中国的领导人。经过大量的争论之后问题陷入僵局，于是像以前一样，中藏关系的命运又一次交由神灵决定，打卦的结果是同意这个行程，于是僵局解开了。

达赖喇嘛在中国内地看到的東西和遇见的领导人对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甚至使他一度要求加入共产党。毛泽东的按部就班、争取达赖喇嘛的策略原本看来不太可行，但是现在却取得了令人吃惊的成果。西藏现在已经准备进入毛泽东所规划的第三个阶段，即在达赖喇嘛的协助下成立新的行政机构，也就是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西藏在社会、经济和政治上成为中国的一部分看来似乎是板上钉钉的事了。

但是，尽管达赖喇嘛和阿沛那样的进步官员心中满是热情，改革的实施却在西藏遭到强烈的抵制。西藏很多人，尤其是那些寺院领袖和他们的僧官盟友都反对土地改革，也反对放弃其他象征西藏“独立”或者独特性的标志，例如西藏自己的货币。他们对《十七条协议》的解读是除非他们同意否则就不需要进行改革，因此他们觉得只要说“不”就真的可以什么都不用改。

毛泽东知道西藏依然存在着这种态度，所以他继续奉行他的渐进主义策略，甚至在1954年12月公路开通使中国人在西藏的存在得到保障之后，这一点也没有改变。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当达赖喇嘛在1955年3月离开北京的时候，毛泽东和周恩来都曾嘱咐他不要凭热情推动一些他的人民还没有准备好接受的改革。他们告诫他要耐心地做工作，巧妙地為将要推动的改革收集舆论。在1955年12月，毛泽东还向在拉萨的西藏工委重申了相同的信息。

但是西藏在1951年还处于非现代的阶段，没有向人民宣传或者影响舆论的手段。在西藏政府看来，政治与人民无关。所以西藏不存在可以让达赖喇嘛影响舆论的内在机制。我们已经看到，达赖喇嘛最早在1955年回到拉萨时就在一次法会上表达了他的“政治”观点，但是如果他要改变公众的态度、為他的主张凝聚共识，所要做的就不止这些，他还要创造出一种新的方法来影响舆论，包括用较为进步的官员代替保守的官员。

然而，尽管达赖喇嘛感到很乐观，但是西藏政府在北京同意结束使用藏钞、缩减藏军、成立西藏自治区的消息马上在拉萨引起了不满和反对的情绪，情况和1952年时非常相似。在拉萨，第二个反中的人民会议于1954—55年间在新的领导下重新出现。它反对1952年以来发生的变革，尤其反对即将成立的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到1955年秋天的时候，它挑战达赖喇嘛所谓的新西藏的观点。到1956年年初，它再次复制了1952年人民会议制造的那场混乱。

除此之外，在西藏外部也存在着需要达赖喇嘛应付的复杂势力。当达赖喇嘛在中国的时候，一个独立于西藏政府的秘密反中抵抗组织在印度出现了。这个组织被称为坚堪孜松，为首的是达赖喇嘛的哥哥嘉乐顿珠和其他两位政府官员夏格巴和洛桑坚赞。这个组织一直在寻求印度和美国的帮助。在1955年的下半年，它和在拉萨反对中国人的朗色林派以及达赖喇嘛的卓尼钦莫帕拉联成一线，将会成为一股反抗中国人占领西藏、反对向中国妥协的重要势力。

相似的是，在远离拉萨的中国腹地，随着毛泽东在1955年发动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一场重大的左倾转变开始了。毛泽东不满意中国集体化的缓慢进程，所以现在要求加速实现全面公社化。因为毛泽东继续在西藏坚持他的渐进主义策略，所以这场公社化的风潮并没有直接影响到西藏。但是尽管如此，这场风潮却对四川省造成巨大的影响。李井泉在藏族（康巴）地区推行的社会主义改造导致了1956年的一场血腥暴动。

最后，美国政府也是1950年代的一股重要势力。它在1951—52年间坚持不懈地诱使达赖喇嘛推翻《十七条协议》流亡国外。如果成功，达赖喇嘛就可以成为冷战中亚洲一个非常有价值的反共喉舌。但是正如我们看到的，尽管毛泽东的“胡萝卜”附带要求接受中国的主权，美国提出的援助仍然不足以和毛泽东的“胡萝卜”相媲美。对大多数的精英来说，尤其是那些宗教意识较浓、较为保守的精英，要达赖喇嘛流亡的观点是万万使不得的。他们认为只有达赖喇嘛在西藏，西藏的宗教和文化才能得以延续。于是到1952年年底的时候，达赖喇嘛不会逃离西藏的事实就已经很明显了，美国对西藏的积极关注也因此减弱了。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55年底美国再次对西藏产生兴趣为止。美国这次关注的是康区／四川的骚乱和通过达赖喇嘛的哥哥嘉乐顿珠支持康巴暴动的可能性。

于是，尽管达赖喇嘛在 1955 年夏回到风平浪静的西藏，心中满怀热情要使西藏现代化，要改善贫苦西藏人的生活。但是在远处，来自不同方向的乌云已经开始形成，并已隐约闪现。这些乌云很快就会涌向西藏，考验达赖喇嘛的期望和想法，挑战他对局势的理解。他和他的主要官员以及在北京和拉萨的中国官员如何应对这场暴风雨将会是下一卷的中心。

附录二

1953 年噶厦改革西藏债务的法令

This edict from the Kashag was issued in the Water-Snake year [1953] to the counties, the estates, the lenders, and the borrowers regarding analysis of the payments and the exemptions of grain loans taken from the government, the aristocrats, and the monastic estates.

THE ORDER

According to the plan submitted previously by the Reform Conference (tib. Legjō Jitso), loans were among the various kinds of reforms that should be put into practice. As a result of the obligation to send both taxes and soldiers [as a corvée tax] and, on top of that, failures in both their crops and animal husbandry, the poor serfs (tib. miser) had to take loans from the government, the aristocrats, and the monastic estates for their food and seed. They were [often] unable to repay the loans in autumn, which caused the interest to be added to interest for many years.

One debtor had to pay loans to many lenders, so the loans and the borrower became imbalanced, like the proverb “The sickle and mountain are imbalanced [a sickle is too small for cutting all the grass on a mountain]” (tib. risor gandzō). So even if they paid [the interest]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it was impossible for them to repay the loan [the principal], and, therefore, they became extinct [ceased to exist as a household]. So the poor taxpayer households (tib. tremi) had a very hard time physically and mentally during their entire lifetime.

Consequently, H.H. the Dalai Lama gave profound instructions that we should not let this continue and must implement a reform that gives relief to these poor people. So we don't have any choice but to adhere to these profound instructions and implement reforms as soon as possible.

We had sent an edict regarding the easy way for repaying money loans in the nomads' area in the far western (Tō) and northern areas, where there are no arable

fields to be cultivated. For the remaining [areas] in Ü-Tsang, in the Water-Snake year we have also sent an edict (and printed copies of the edict) regarding making loans for sowing seeds, the rates of interest, and how to repay the loans taken before the Water-Dragon year [1952]. In this we said that we would clarify these in the future, and according to that [we are doing so below]:

[Loans of] government grain were meant for the happiness of the miser and charged only 10 percent interest (tib. gamgye jusur). Also, for these, adding the unpaid interest to the principal (tib. gyela gyegya) and imposing penalties for delaying the payment were not allowed. However, recently it seems that some (officials such as those in charge of the grain salary [tib. druphog] in Ü-Tsang, and the 10 percent lease fee of the grain of the Agriculture Department [tib. soley jubog], and barley for religious offerings [tib. chöndru], and the treasury offices in the Potala and Jokang [tib. tsheshō chandzō], and the Shöl office) signed loan agreements with poor taxpayer miser that added interest on to the principal if the yearly interest due was not paid. Regarding this matter, all the loan agreements that have been made by all the successive officials must be analyzed, and all of the interest that was added on to the principal must be completely eliminated.

The principal and interest of the loans of the miser who are completely extinct [literally, have ceased to exist, but normally means have run away leaving their house and land] should not be imposed on either the new taxpayers who replaced them or their guarantors. All the principal and interest [on such loans] must be completely eliminated.

As for the taxpayer borrowers whose economic condition is good and who have the means to repay the loans but in the past have petitioned and received exemptions written on their petitions, they will not be exempt from repaying the loans now. And as for the rich households who willingly took the ownership of the fields that used to belong to the extinct subjects [subjects who ran away (or died out)] and guaranteed to pay the loans owed by the extinct subjects and to do the tax work, they will not have any exemptions. They must repay the principal and interest according to the agreements.

As to the loans that were taken newly from the Iron-Tiger year [1950] of the sixteenth sixty-year cycle to the Water-Dragon year [1952], if the borrowers and guarantors have become extinct, the payment and exemptions must be done as specified below. Otherwise, if the borrower and guarantor are still alive, he or she must pay all the principal and interest.

The borrowers from the middle class we have classified into three categories. With the exception of new loans taken after the Iron-Tiger year, all those old loans taken before the Earth-Ox year [1949] must be repaid and exempted as follows:

The best off of the middle-class (tib. dringrab) borrowers will be exempt by the amount of one-tenth of the principal [10 percent].

The medium middle class (tib. dringbar'bring bar) will be exempt by the amount of one-eighth [12.1 percent] of the principal.

The lowest of the middle class (tib. dringtha) will be exempt by the amount of one-fifth [20 percent] of the principal.

For all, the remaining principal must be paid at the rate of 10 percent interest.

If the borrowers still exist but are really poor, half of the principal will be eliminated, and the remaining principal must be paid according to the payment arrangement as follows:

Those who owe from 10 to 100 khe of barley must pay one-tenth [10 percent] of the principal in interest each year.

Those who owe from 100 to 200 khe of barley must pay one-twentieth [5 percent] of the principal in interest each year.

Those who owe from 200 to 400 khe of barley must pay one-fortieth [2.5 percent] of the principal each year.

Those who owe from 400 to 600 khe of barley must pay one-fiftieth [2 percent] of the principal each year.

Those who owe from 600 to 800 khe of barley must pay one-eightieth [1.25 percent] of the principal each year.

Those who owe from 800 to 1,000 khe of barley must pay one-hundredth [1 percent] of the principal each year.

For those who have more debt than that, the officials in charge of government grain must submit a plan for payment arrangements according to the law and the karmic law of cause and effect and according to the borrower's economic condition for repaying the loans.

In the future when you provide new loans, government grain is meant only for the miser under the government or aristocrats or monastic estates. Otherwise, it is strictly not allowed to lend government grain to government lay and monk officials and to the rich traders who want to take loans to make profit.

Furthermore, government grain must be lent to the taxpayer subjects evenly for both the food and seed they absolutely ne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ir economic condition. When collecting the principal and the interest, they are absolutely not allowed to go against the original loan document and do the following things: When collecting a barley sample [of what is being paid], the people who measure the bags of grain (tib. bo), the house managers and the sweepers, may not measure it as rounded bo (tib. bokha tolen) [meaning the container must be filled just to the lip with grain, not heaped on top so that the payer is giving more than he owes]. And they cannot add a penalty for delaying the payment or add it to the principal, nor can they take food or money or eggs as gifts [bribes]. They are strictly not allowed to cause harm directly or indirectly by any means to the happiness of the subjects by using the above-mentioned pretexts. The subjects who want to take loans from the government's grain must also be grateful to the government and pay the yearly 10 percent interest on the principal.

In order to keep giving offerings and have the funds for rituals increase, not decline, the sponsors of the Three Great Monasteries (Drepung, Sera, and Ganden) and other monasteries have donated trust funds for offerings and for the expenses of the rituals performed in the monasteries. So we have informed the abbots and th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three great monastic seats that they must be well concerned about the well-being of their subjects without causing harm to the offerings and the rituals performed in the monastery.

We received a request from the monasteries saying that the private barley of the big labrang and the rich monk households should not be mixed in with the barley of the monastic common trust funds that are meant for the offerings and rituals. In the future, the Senior Monastic Council (tib. lachi) and the monastic officials must guarantee that such mixing [of private monk and monastery grain] will not happen again.

Concerning the funds given out by religious trust funds, the borrowers whose economic conditions are good and who have the means to repay the loans and who also have taken the loans through legal procedures, and the rich people who have taken the ownership of lands that used to belong to extinct households, will not have any exemptions. They must pay the principal and the interest according to the agreements.

As for the new loans [from religious trusts] taken since the Iron-Tiger year of the sixteenth sixty-year cycle [1950] and before the Water-Dragon year [1952], if a borrower has become extinct, his loan must be paid as listed below. For the remainder, the principal and the interest of the borrowers and guarantors who are alive must be repaid at the rate of 20 percent interest (tib. ngadru dro), because that barley goes for the offerings and for the performance of the rituals.

As for the middle of the middle class and the worst of the middle class, it [the interest] should be completely exempted, but we found that their yearly interest deficits [owed interest not paid] (tib. gyeche) were added on to the principal by changing the old agreement into a new one. Therefore, it is inconvenient for us to find out and separate the amounts of the deficit interest and the principal. And some people made a separate agreement for the interest deficit, so if we completely exempt the interest deficit, these people might suffer some loss.

Therefore, except for the loans taken since the Iron-Tiger year, the old loans taken before the Earth-Ox year have been classified into three different categories of economic conditions among the middle class as follows:

For example, if the principal was 100 khe and the interest deficit was 100 khe, when the deficit interest was added on to the principal, the total became 200 khe.

For the best middle-class borrowers whose interest deficit was not added on to the principal, they will be exempt for one-tenth (10 khe from 100 khe) of the principal and one-third (33 khe, 6 dre, and 4 phū from 100 khe) of the interest deficit. The total exemption will be 43 khe, 6 dre, and 4 phū. For the people whose deficit interest was already added on to the principal, they will be exempt for one-fourth of the total amount (50 khe from 200 khe).

For the medium middle-class borrowers whose interest deficit was not added on to the principal, they will be exempt for one-eighth of the principal (12 khe and 10 dre from 100 khe) and half (50 khe from 100 khe) of the deficit interest, and the total exemption will be 62 khe and 10 dre. For those whose interest deficit has already been added on to the principal, they will be exempt for one-third (66 khe, 13 dre, and 2 phū from 200 khe).

For the worst middle-class borrowers whose interest deficit was not added on to the principal, they will be exempt for one-fifth of the principal (20 khe from 100 khe) and two-thirds of the deficit interest (66 khe, 13 dre, and 2 phū from

100 khe). For those whose interest deficit is already added on to the principal, they will be exempt for half (100 khe from 200 khe).

If the borrower and the guarantor are both extinct, the loan will not be pursued, and both the principal and interest will be completely exempt from the taxable field.

If the borrower still exists, but if he is really poor and doesn't have the means to repay the loans, or if the borrower has died and only the guarantor exists and the interest deficit was not added on to the principal, the deficit interest will be completely exempted and half of the principal (50 khe from 100 khe) will be exempted.

For those interest deficits already added on to the principal, five-sixths (166 khe, 13 dre, and 2 phū) will be exempted. The remaining deficit will be paid according to the payment arrangement for a fixed number of years, starting from the Water-Snake year as follows:

The borrowers who owed from 10 khe to 100 khe must pay one-tenth per year.

Those who owed from 100 khe to 200 khe must pay one-twentieth per year.

Those who owed from 200 to 400 khe, must pay one-fortieth per year.

Those who owed from 400 to 600 khe must pay one-fiftieth per year.

Those who owed 600 to 800 khe must pay one-eightieth per year.

Those who owed 800 to 1,000 khe, must pay one-hundredth per year.

As for the borrowers who owed more than that, the lenders and the borrowers must make interest payment arrangements according to the law and the karmic law of cause and effect.

The payment arrangements made through the previous loan investigations and the payment arrangements made through the lawful agreement between the lenders and the borrowers will not be changed, and they can be paid and received as before.

For the taxpayer's fields that the lenders forcefully took away in lieu of the loan, regardless of there being a written agreement, exemptions must be made as much as possible from the principal according to his economic conditions. And the remainder must be paid through payment arrangements, and all of the taxpayer's lands must be returned to the owner from the harvest of the Water-Snake year [1953].

As for the fields that were handed over to lenders for a fixed number of years through mutual agreement as a replacement for a good amount of the payment arrangement, there is no need to make changed payment arrangements for the loan. For the number of years that are left, the lenders must reduce them as much as they can according to the economic condition of the borrowers. And the borrowers must make their own choice whether they want to take back the lands and make a yearly payment arrangement to the lenders.

In the future, if the borrowers agree to hand over fields to the lenders for a fixed number of years to repay their loans, they are allowed to do that. And it should be the replacement for a good amount of payment arrangement [i.e., must not un-

dervalue the land]. Otherwise, the lenders are not allowed to take away the taxpayer's lands by force or take it away for good. So when the government, the aristocrats, and the monasteries make loans to all the subjects, they are not allowed to violate the Water-Snake year edict and the printed copies sent to the counties and the estates.

When the big and the small labrang, the monk's households in the monasteries, aristocrats, government officials, and other rich monks and laymen made loans, some of the borrowers who were the taxpayer subjects had quite a good living condition, and they took loans for doing business. For this type of loan and the new loans from the Iron-Tiger year [1950] to the Water-Snake year [1953], if the borrower and the guarantor are extinct, the payment and the exemptions must be done as listed below. Otherwise, the loans owed by the borrowers and guarantor who still exist must be paid according to 14 percent interest (tib. *dūngye dro*).

As for the loans taken not for trading but for paying taxes, corvée soldiers, food, and seed, if the borrower's economic condition is good, the loans taken before the Earth-Ox year [1949] must be paid according to the mutually agreed payment arrangement.

For the old loans taken before the Earth-Ox year, the calculation is based on [several conditions], for example, if the principal was 100 khe and the interest owed was 100 khe and if the interest owed had been added on to the principal. We classified three different categories among the middle-class families.

For the best middle-class borrowers whose interest deficit was not added on to the principal, one-eighth (12 khe and 10 dre from 100 khe) will be exempted from the principal and half (50 khe from 100 khe) will be exempted from the interest deficit. If the interest deficit was already added on to the principal, one-third (66 khe, 13 dre, and 2 phū) will be exempted.

For the medium middle-income borrowers whose interest deficit was not added on to the principal, one-fifth (20 khe from 100 khe) will be exempted from the principal, and two-thirds (66 khe, 13 dre, and 2 phū) will be exempted from the interest deficit. The total exemption will be 86 khe, 13 dre, and 2 phū. For the interest deficit already added on to the principal, half (50 khe from 100 khe) will be exempted.

For the worst middle-class borrowers whose interest deficit was not added on to the principal, one-fourth (25 khe from 100 khe) of the principal will be exempted, and four-fifths (80 khe from 100 khe) from the interest deficit will be exempted. For the deficit already added on to the principal, two-thirds (133 khe, 6 dre, and 4 phū) will be exempted.

If the borrower and the guarantor are both extinct, the loan will not be pursued. For those who have the taxpayer's land, the principal and the interest will be completely exempted.

As for the borrowers who are really are poor and don't have the means to repay the loans, or if the borrower has died and only the guarantor is left, if the interest deficit was not added on to the principal, the deficit interest will be completely exempt, and four-fifths of the principal (80 khe from 100 khe) will be exempt.

If the interest deficit was added on to the principal, then they have to pay one-twentieth of the interest and principal together. The remainder is exempt (190 khe from 200 khe). Except for the above exemptions, the remaining interest deficit must

be paid through yearly payment arrangement starting from the Water-Snake year as follows:

The borrowers who owed from 10 to 100 khe must pay one-tenth.

Those who owed from 100 khe to 200 khe must pay one-twentieth.

Those who owed from 200 khe to 400 khe must pay one-fortieth.

Those who owed from 400 to 600 khe must pay one-fiftieth.

Those who owed from 600 khe to 800 khe must pay one-eightieth.

Those who owed from 800 khe to 1,000 khe must pay one-hundredth.

As for the borrowers who owed more than that, the lenders and the loan takers must make interest payment arrangements according to the law and the karmic law of the cause and effect.

The payment arrangements made through previous loan investigations and the payment arrangements made through the lawful agreement between the lenders and the borrowers will not be reformed, and it [the loan] can be paid and received as before.

For the taxpayers whose lands were taken forcefully by lenders for loan payments, regardless of any written agreements to this, exemptions must be made as much as possible from the principal according to their living conditions. And the remaining loan must be paid through payment arrangement, and all of the taxpayers' lands must be returned to the owners from the harvest of the Water-Snake year [1953].

As for the land that was handed over to the lenders for a fixed number of years through mutual agreement as a replacement for a good amount of the payment owed, there is no need to make further payment arrangement for the loan. For the remaining years, the lenders must reduce the number of years as much as they can according to the economic condition of the borrowers. And the borrowers must make their own choice whether they want to take back the lands and make a yearly payment to the lenders.

In the future, if the borrowers agree to hand over the land to the lenders for a fixed number of years to repay their loans, they are allowed to do that, and it should be a replacement for a good amount of the payment owed. Otherwise, it is not allowed for the lenders to take away the taxpayer's land by force or take it away for good. So when the government, the aristocrats, and the monasteries make loans to all subjects, they are not allowed to violate the Water-Snake year edict and the printed copies sent to the counties and the estates.

The heads of the government, the aristocrats, and the monasteries must adhere to the above-mentioned points and make the exemptions on loans to one's own subjects. Furthermore, they must lend them new loans and voluntarily make more exemptions on paying the loans for many years, according to the economic conditions of the borrowers.

They must try their best to show concern and benefit for their livelihood, and are definitely not allowed to neglect the suffering of the poor and uneducated subjects who are unable to make accusations regarding their problems that would cause

them to become extinct. The lenders of the government, the aristocrats, and the monasteries must make the right choice between taking and discarding.

If some lenders think about the happiness of the poor subjects and one's own present and future benefit and therefore make more exemptions than what we mentioned above, nothing is more beneficial for the happiness of the subjects than this kind of good deed. Therefore, the government will rejoice in it. All people must keep in mind the points of the edict, and this edict must be included in the catalog of the records in the county. On the date and month of the Water-Snake year [date and month not given].*

* From the original woodblock printed book, housed at the Library for Tibetan Works and Archives.

附录三

在印度的秘密抵抗组织的协议

Memorandum of agreement among the members of the secret meeting on the question of indeoendence [*sic*] of Tibet, dated the year, Wood Horse of the sixteenth Rabchung, month—date.*

We, the members of the secret meeting, undertake before our protecting deities, Lhamo, Norjin Daikpa Chansing, Dahla Woeden Karpo, Gyalchen Shugden, the following main points.

The country of Tibet is consisted of areas from Toe Shang Shung Bon area to the area of Gyamo Thakpa, and Toe Ngari Korsum, Bhar U-Tsang Rushi to Dokham Chushi Gangduk. The country was blessed by Lord Buddha and according to its prediction, it was known to be a place of Phakpa Chenre Zsi. The people of this country was peacefully regined [*sic*] from the time of Ngatri Tsepo to Tri Ralpa Chen and many rulers who initiated the religion, and set rules. From Domtom onwards many scholars worked and great progress was made on the teachings of Lord Buddha. Succession of Dalai Lama was unceased from Gedun Drupa. The fifth Dalai Lama was able to unite the land as one country, and till today the country under the duel government system had been achieved the freedom of religion and enjoying the fruit of the land. The government had been keeping good relations with all the neighboring government, but due to lack of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land, no proper defense systems were established always setting examples of peaceful method all over the world. At such time, when in 1950, Tibetan year iron-tiger of Rabchung sixteenth,

* Mimeograph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e Tibetan document. The Tibetan version was not available to this study. The English has not been corrected. The translation was obtained from the library of the late Tsipōn Shakabpa.

the Chinese communists attacked Tibet without understanding the meaning of priest patron relation between the two governments. They claimed that Tibet was part of China and it must be liberated from the toke [*sic*, yoke] of imperialists. Special representatives were sent to New Delhi, India to meet the Chinese ambassador to explain that Tibet was an independent country and it wishes to remain as it was. While these negotiations were going on, a sudden attack by Chinese from different directions in mass scale and arrested the minister who was in-charge of political and defense along with his staff. Thereafter, the Government of Tibet appealed to the United Nations.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 with a limited number of entourage left for Yatung. Still in consideration of our past relation of priest-patron, government sent representatives to China for talk. Chinese brought out a pre-prepared agreement of their own and coerced the Tibetans to sign it. The agreement mentioned that the position and power of the Dalai Lama would remain the same, there would be no change on the present system and China would not interfere, freedom of religion, culture, protection for the monasteries, all officials of the government would remain as before and all Tibetan territories from Dha Tsedo onwards would be given back to Tibet. For the time being, the Dalai Lama returned to Lhasa from Yatung.

In spite of the agreement, the Chinese began to bring in a large number of troops to Lhasa and other areas. They set up an autonomous state beyond Kongpo Gyamda, backed up the Telhun Labrang [Tashilhunpo] by permitting to set a private army, so many problems were created by not keeping up with the country's law, bought many houses and properties in the city of Lhasa under pressure. And used many vacant land without paying any tax. They also began establishing many new offices, indoctrinating all young people, in communist system, collecting grains by force from the Government, religious institutions and from the people, procuring so many animals from the nomads resulting gradually the number of animals, one hundred percent increase in food price because of influx of population, construction of motor roads from China, under the name of tour many Government officials, representatives of the monasteries, representatives of people were taken to China by force in spite of their unwillingness to go, and these were the reasons that the people began appealing to the Government and the Chinese. When the appeal was made in view of justice, the Chinese pressed for the resignation of the two Prime Ministers accusing they were the supporters of the Imperialist, and jailed fiv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people. Moreover, sudden invitation came to the Dalai Lama to visit China. The three monasteries and people of U and Tsang appealed that His Holiness is the heart and soul of the people and that he should not be taken to China. They ignored the appeal by the people and His Holiness was taken to China. People were put in a state of great grievance like fish taken out from the water on a land. People in their own country suffered so much that it was difficult to pass day and night under such frightening oppression. Still more, they announced that Political and Military office would be established and so many Chinese men and women were brought into Tibet. This was to accomplish their wish to genocide Tibetan people by bringing in Chinese because of Tibet's small population.

We have received so many letters from Tibet stating the Chinese atrocities in Tibet and pinning their hope on us, we are compelled to take up the matter in consideration of our religion, political affairs and our kinsfolk. We therefore, called out

meeting on 16th Rabchung, wood horse year, day 14th of fifth month, corresponding to 14-7-1954 to discuss on regaining our independence. It was not a forced members to join the body but they were to voluntarily. In order to achieve our aim the following signed people would agree to undertake the followings—

1. Till we accomplish our independence, we would sacrifice our lives and our wealth without ever retreating from difficulty and loss of moral. We would continue our effort year by year, even it takes a lifetime.
2. Effort should be made for the speedy return of His Holiness to the capital of Tibet.
3. At such important matter like this, all should unite to take up the question in hand whether it becomes successful or not. No one should blame each other, they should not depart from this due for self interest.
4. All discussions should be kept secret and they should not be permitted to reveal to outsiders. Shall undertake to bear all penalties should anyone be seen, heard and proofed.
5. Should any question arises as to a person's undesirable character, they should reveal it frankly without protecting a person for his embarrassment. All matters must be settled by self undertaking.
6. In case certain understanding arises among the members, members themselves should mediate between the parties and should never be publicized. Not only helping for one another, they should help others in order to win confidence in us.
7. When there are new entrees in this association, they should be examined thoroughly, even it takes a month or a year. When such candidate is approved by all members, he can enter this association with a guaranty by one the member.
8. Whatever the matter, great or small, each should express their opinion clearly. Then the matter will be discussed in meeting and decision taken. If votes arrive at equal numbers, whether it be on political or military, a Zendrill* would be made.
9. There may come on certain times that matters concerning the independence of Tibet cannot be discussed due to various reasons. They can be kept unrevealed for a time but eventually the cause and reasons must be explained at the meeting.
10. Our main political aim is that His Holiness would retain his leadership of the dual Government, all people in U, Tsang, Dokham, Amdo and Golok will have equal power in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country, which consists

* The following note appeared embedded in the agreement: Zsendril [*sic*] is made by rolling two equal size of dough which contains the letter "Yes" or "No." The two round doughs are put in a cup and rolled around before a deity (image or a thagka [*sic*] painting). The decision is take on the one which comes out of the cup.

of education, health, improvement of people's living condition, freedom of speech, defense, freedom of various sects of religion. Whatever the best should be taken up. Such activities that hampers the progress should avoided so that the people may not be disappointed. We must ban all the activities of Communists and the atheists.

11. If there becomes necessary to add to the above points, we shall discuss on the matter.

In all time we are abide by the above memorandum and if anyone found to be dishonest it was needless to say that ills would fall upon you by the influence of the deities, not only during this lifetime but effects would befall upon you in your next life.

The following signators and their guarantors had undertaken that they would bear the responsibility if such incidents occur. . . .

参考文献

- 阿乐群则 (A lo chos mdzad) 。 *The Political Testament and Warning by H. H. the 13th Dalai Lama to His People in 1932 and an Advice by H. H. the 14th Dalai Lama to His People in 1955* 。噶伦堡：西藏镜报社，1958。
- . *Bod kyi gnas lugs bden 'dzin sgo phye ba'i lde mig zhes bya ba* 。澳大利亚，1983。
- 阿里斯 (Aris, M.) 和昂山素季 (Aung San Suu Kyi) 编。《纪念黎吉生西藏研究国际研讨会会议论文集》 (*Tibetan Studies in Honour of Hugh Richardson: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Seminar on Tibetan Studies*) 。国际藏学会第二届研讨会论文集，牛津，1979；威斯敏斯特 (Warminster)：阿里斯和菲利普斯 (Aris and Phillips)，1980。
- 阿玛德 (Ahmad, Z.) 。 *China and Tibet, 1708–1959: A Resume of Facts* 。伦敦，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60。
- . *Sino-Tibetan Relations in the 17th Century* 。罗马：Istituto Italiano per il Medio ed Estremo Oriente，1970。
- . “The Historical Status of China in Tibet”，《西藏杂志》 (*Tibet Journal*) 1, 1 (1975): 27。
- 阿沛·阿旺晋美 (Ngabö, Ngawang Jigme) 。〈在西藏人民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录音〉。拉萨：私人收藏，1989年8月30日。
- . “Behind the Unrest in Tibet”，《中国春季文摘》 (*China Spring Digest*) ，1988。
- . “Rang skyong ljongs kyi skabs lnga pa'i mi dmags 'thus tshogs kyi tshogs 'du thengs gnyis pa'i thog gnang ba'i gal che'i gsung bshad”，*Bod ljongs nyin re'i tshags par* ，第1–6页，1989年8月31日。
- 艾夫提麦尔德斯 (Eftimiades, N.) 。 *Chinese Intelligence Operations* 。马里兰州安纳波利斯 (Annapolis, MD)：海事研究出版社 (Naval Institute Press)，1994。
- 艾克林 (Eekelin, W. F. van.) 。 *Indian Foreign Policy and the Border Dispute with China* 。海牙：马蒂纳斯·奈霍夫 (Martinus Nijhoff)，1964。
- 爱泼斯坦 (Epstein, I.) 。 “Serfs and Slaves Rule Khaesum Manor”，《远东视野》 (*Eastern Horizon*) 16, 7 (1977)：21。
- . “Visual Denunciation of Serf-Owner's Atrocities”，《北京评论》 (*Peking Review*) 29 (1977)：11。
- . *Tibet Transformed* 。北京：新世界出版社，1983。
- 巴伯 (Barber, N.) 。 *From the Land of Lost Content: The Dalai Lama's Fight for Tibet* 。伦敦：霍德和斯托顿 (Hodder and Stoughton)，1969。

- 巴莱斯特拉奇 (Balestracci, A.)。"Four Rivers, Six Ranges", 《喜马》(*Himal*), 3-4 月号 (1991): 第 14-15 页。
- 巴尼特 (Barnett, R.) 和阿基涅尔 (Akinar, S.) 编。《Resistance and Reform in Tibet》。伦敦: 赫斯特公司 (Hurst and Company), 1994。
- 班禅喇嘛 (Panchen Lama)。“On Tibetan Independence”, 《中国建设》(*China Reconstructs*), 1 月号 (1988): 第 8-15 页。
- 班觉·贡桑 (Paljor, Kunsang)。*Tibet: The Undying Flame*。印度达兰萨拉: 至尊达赖喇嘛信息和公共关系办公室, 1977。
- 班纳吉 (Banerjee, S. M.)。“A Forgotten Chapter on Indo-Tibetan Contact: A Further Review”, 《加尔各答评论》(*Calcutta Review*) 23, 1 (1952): 32。
- 鲍登 (Bawden, C. W.)。《The Modern History of Mongolia》。伦敦: 基更保罗国际 (Keegan Paul International), 1989。
- 贝尔 (Bell, C.)。“The Dalai Lama, Lhasa 1921”, 《皇家中亚细亚学会杂志》(*Journal of the Royal Central Asian Society*) 11, 1 (1924): 44-45。
- . *Tibet, Past and Present*。牛津: 克拉伦登出版社 (Clarendon Press), 1924。
- . *The People of Tibet*。伦敦, 牛津: 牛津大学出版社, 1928。
- . *The Religion of Tibet*。牛津: 克拉伦登出版社, 1931。
- . *Portrait of a Dalai Lama*。伦敦: 柯林斯 (Collins), 1946。
- . “China and Tibet”, 《皇家中亚细亚学会杂志》36, 1 (1949): 54。
- 北京评论。“Tibet—Its Ownership and Human Rights Situation”, 《北京评论》, 9 月 28 日-10 月 4 日 (1992): 第 9-42 页。
- 比巴 (Beba, K.)。“Tibet Revisited”, 《中国建设》6, 9 (1957): 12。
- 伯葛司罗福斯基 (Bogoslovskij, V.)。“Tibet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a Russian View”, 《西藏评论》(*Tibetan Review*), 8 月号 (1978): 第 15-18 页。
- 伯里奇 (Burrige, K.)。《New Heaven New Earth: A Study of Millenarian China's Tibet》。牛津: 巴斯尔·布莱克韦尔 (Basil Blackwell), 1969。
- 伯曼 (Burman, B. R.) 和罗伊 (Roy, B.)。“Thirteenth Dalai Lama's Plan for the Modernization of Tibet”, 《西藏评论》, 11-12 (1976 年 12 月): 12-14。
- . *Religion and Politics in Tibet*。新德里: 维卡斯 (Vikas), 1979。
- 布尔 (Bull, G.)。《When Iron Gates Yield》。伦敦: 霍德和斯托顿, 1957。
- . *Forbidden Land: A Saga of Tibet*。芝加哥: 穆迪出版社 (Moody Press), 1967。
- 布拉德 (Bullard, M. R.)。《China's Political-Military Evolution》。博尔德 (Boulder, CO): 西景出版社 (Westview), 1985。
- 布拉德舍 (Bradsher, H. S.)。“Tibet Struggles to Survive”, 《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 47, 4 (1976): 750-62。
- 布兰特 (Brandt, C.), 施瓦茨 (Schwartz, B.) 和费正清 (Fairbank, J.) 编。《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Chinese Communism》。马萨诸塞剑桥: 哈佛大学出版社, 1952。
- 布劳恩 (Brauen, M.) 和皮卡弗莱 (Per Kvaerne) 编。《1977 年 6 月 26 日至 7 月 1 日青年藏学学者研讨会西藏研究论文集》(*Tibetan Studies Presented at the Seminar of Young Tiberologists, Zurich, June 26-July 1, 1977*), 国际藏学会第一届研讨会论文集 (Proceedings of the First Seminar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Tibetan Studies)。苏黎世: Völkerkundemuseum der Universität Zürich, 1978。

- 布雷彻 (Brecher, M.)。 *Nehru: A Political Biography*。 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69。
- 车仁多杰 (Phu pa, Tshe ring stobs rgyas)。 *Mdo stod chu bzhi sgang drug bod kyi bstan srung dang blangs dmag gi lo rgyus*。 印度新德里：曲细岗珠中央委员会 (Delhi: Welfare Society of Central Dokham Chushi Gangdrug)，2000。
- 车仁·仁钦卓玛 (Taring, Rinchen Dolma)。 *Daughter of Tibet*。 伦敦：智慧出版社 (Wisdom Publications)，1986 (原出版于 1970 年)。
- 陈 (Chan, V.)。 *Tibet Handbook: A Pilgrimage Guide*。 加州奇科 (Chico, CA)：月亮出版社 (Moon Publications)，1994。
- 陈炳 (Khren, Bing)。“Bod dmag gi lo rgyus mdor bsdus”，《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四辑，第 180–207 页。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1。
- . “Rgyal khab la rgyab gtod byas na pham nges yin”，收录于 *Gsar brje'i dran tho*，第 72–98 页。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
- 陈子植 (Khreng, Tse-ri)。“Chab mdo sa khul bcings 'grol gtong ba'i dmag thab”，《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 208–50 页。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
- 次仁·德吉 (Tsering, Diki)。 *Dalai Lama, My Son: A Mother's Story*。 新德里：印度企鹅图书 (Penguin Books India)，2000。
- 次仁顿珠 (Tshe ring don grub) 编。 *Gsar brje'i dran tho*。 拉萨：新华出版社，1989。
- 次仁顿珠 (Tshe ring don grub) 和 鄂金群培 (O rgyan chos 'phel) 编。 *Bod ljongs spyi bshad*，第三卷。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91。
- 次仁·旺杰 (Tsering Wangyal)。“Sino-Tibetan Negotiations since 1959”，收录于 *Resistance and Reform in Tibet*，罗伯特·巴尼特和希林·阿基涅尔编。伦敦：赫斯特公司，1994。
- 次仁·夏加 (Shakya, Tsering)。 *The Dragon in the Land of Snows*。 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99。
- . “The Genesis of the Sino-Tibetan Agreement of 1951”，收录于 *The History of Tibet: The Modern Period: 1895–1959, the Encounter with Modernity*，亚历克斯·麦凯 (Alex McKay) 编，第 589–606 页。伦敦：劳特利奇寇松 (Routledge Curzon)，2003。
- Chu sgang lo rgyus rtsom sgrig tshogs chung 编。 *Chu sgang lo rgyus*，第一卷。德里：卫朵康曲细岗珠福利会，2000。
- 达尔维 (Dalvi, J. P.)。 *Himalayan Blunder: The Curtain-Raiser to the Sino-Indian War of 1962*。 孟买：撒克公司 (Thacker and Company)，1969。
- 达拉 (Takla, T. N.)。“The Revolution Betrayed: Notes on Some Early Tibetan Communists”，《西藏评论》，6–7 月号 (1969)。
- 达拉·平措扎西 (Stag lha, Phun tshogs bkris)。 *Mi tshe'i byung ba brjod pa*，第三卷。印度达兰萨拉：西藏著作档案馆，1995。
- 达赖喇嘛 (Dalai Lama)。 *My Land and My People: Memoirs of the Dalai Lama of Tibet*。 纽约：布达拉出版社 (Potala Publications)，1962。
- . *Ngos kyi yul dang mi mang*。 大吉岭：自由出版社，1963。
- . *Freedom in Exile: The Autobiography of the Dalai Lama*。 纽约：哈珀 - 柯林斯出版社 (Harper-Collins)，1990。
- 达斯 (Das, Chandra Sarat)。 *Indian Pundits in the Land of Snow*。 加尔各答：菲尔马·马克巴迪亚 (Firma K. L. Mukhopadhyay)，1965。

- 达斯 (Das, Taraknath) 。 *British Expansion in Tibet* 。 加尔各答 : N. M. Raychowdhury & Co. , 1929 。
- 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当代中国的西藏》，第一卷。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
- 德雷尔 (Dreyer, J. T.) 。 *China's Forty Millions* 。 马萨诸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76。
- 邓小平。《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北京：外文出版社，1957。
- 东嘎·洛桑赤列 (Dung dkar, Blo bzang'phrin las) 。 *Bod kyi chos srid zung 'brel skor bshad pa* 。 北京：少数民族出版社，1981。
- . *The Merging of Religious and Secular Rule in Tibet* 。 北京：外文出版社，1991。
- 杜特 (Dutt, S.) 。 *With Nehru in the Foreign Office* 。 加尔各答：米纳瓦协会 (Minerva Associates) ， 1977 。
- 《对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 (未出版的手记)》。出版日期不明。
- 顿杜普 (Dhondup, K.) 。 *The Water-Horse and Other Years: A History of 17th and 18th Century Tibet* 。 印度达兰萨拉：西藏著作档案馆，1984。
- . *The Water-Bird and Other Years: A History of the 13th Dalai Lama and After* 。 新德里：Rangwang 出版社，1986。
- 敦哈姆 (Dunham, M.) 。 *Buddha's Warriors: The Story of the CIA-Backed Tibetan Freedom Fighters, the Chinese Invasion, and the Ultimate Fall of Tibet* 。 纽约：杰里米·塔彻 (Jeremy P. Tacher) / 企鹅出版社，2004。
- 顿康·格桑德吉 (Don khang, Shal bzang bde skyid) 。 “Pan che sku phreng dgu pa mes rgyal nang khul du gsar phebs kyi snga rjes”，《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四辑，第1-32页。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4。
- 顿珠嘉措 (Don grub rgya mtsho) 。 “An Account of the History of Sposmad Ka gnam Sdepa”，《西藏研究》 (*Tibet Studies*) 1 (1989) : 83-89。
- 多嘎次丹 (Dolkar, Tseten) 。 *Girl from Tibet* 。 芝加哥：Loyola 大学出版社，1971。
- 朵噶·彭错饶杰 (Mdo mkhar, Phun tshogs rab rgyas, et al.) 等。 *1953 lo'i rgyal khab dbu brnyes rten 'brel mdzad gzigs tshogs pa'i tshogs gtso nas rgyang sgrags rlung 'phrin thog gungs pa'i legs sbyar* 。 北京：民族出版社，1954。
- 多田等观 (Tokan, Tada) 。 《十三世达赖喇嘛》。东京：东亚文化研究中心，1965。
- 恩珠仓·贡布扎西 (Andrugsang, Gompo Tashi) 。 *Four Rivers, Six Ranges: A True Account of Khampa Resistance to Chinese in Tibet* 。 印度达兰萨拉：至尊达赖喇嘛信息和公共关系办公室，1971。
- 范明。〈把五星红旗高高地插在喜马拉雅山上：回忆十八军独立支队（西北西藏工委）进军西藏〉，手稿（1987），第1-150页（摘自《世界屋脊风云录：纪念和平解放西藏四十周年》，第一卷，第48-76页；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1）。
- 菲希尔 (Fisher, M.) ， 罗丝 (Rose, L. E.) 和赫滕巴克 (Huttenback, R. A.) 。 *Himalayan Battleground* 。 纽约：普雷格 (Praeger) ， 1963 。
- 费正清 (Fairbank, J. K.) 。 *The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 1800-1985* ， 第一版。纽约：哈珀和罗出版社 (Harper and Row) ， 1986 。
- 弗兰奇 (French, P.) 。 *Tibet, Tibet, A Personal History of a Lost Land* 。 纽约：阿尔弗雷德·克诺夫 (Alfred P. Knopf) ， 2003 。
- 弗朗西斯 (De Francis, J.) 。 “National and Minority Policies”，《美国政治和社会科学院年报：关于中国的报道》。费城：美国政治和社会科学院，1951。

- 福特 (Ford, C.)。《Donovan of OSS》。波士顿: 布朗·李特尔 (Little, Brown), 1970。
- 福特 (Ford, R.)。“Tibet Radio Asks Aid against Reds”, 《纽约时报》, 1950年2月1日。
- . *Captured in Tibet*。伦敦: 潘恩图书 (Pan Books), 1957。
- . *Wind between the Worlds*。纽约: 大卫·麦凯出版社 (David McKay), 1957。
- 高平。《修筑川藏公路亲历记》。北京: 中国藏学出版社, 2001。
- 葛丹 (Skal Idan)。“Tsha rong zla bzang dgra 'dul gyi skor”, 《西藏文史资料选辑》, 第五辑, 第249-93页。西宁: 青海新华出版社, 1985。
- 戈尔德 (Gelder, S.) 和戈尔德 (Gelder, R.)。《The Timely Rain》。伦敦: 哈金森 (Hutchinson), 1964。
- 戈尔斯坦 (Goldstein, M. C.)。“A Study of the Ldab Ldod”, 《中亚杂志》(Central Asiatic Journal) 9 (2) (1964): 125-41。
- . “An Anthropological Study of the Tibetan Political System”, 华盛顿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1968。
- . “The Balance between Centralization and Decentralization in the Traditional Tibetan Political System: An Essay on the Nature of Tibetan Political Macrostructure”, 《中亚杂志》15, 3 (1971): 170-82。
- . “Serfdom and Mobility: An Examination of the Institution of ‘Human Lease’ in Traditional Tibetan Society”, 《亚洲研究杂志》(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30, 3 (1971): 521-34。
- . “Stratification, Polyandry and Family Structure in Tibet”, 《西南人类学杂志》(Southwestern Journal of Anthropology) 27, 1 (1971): 64-74。
- . “Taxation and the Structure of a Tibetan Village”, 《中亚杂志》15, 1 (1971): 1-27。
- . “The Circulation of Estates in Tibet: Reincarnation, Land and Politics”, 《亚洲研究杂志》32, 3 (1973): 445-55。
- . “Adjudication and Partition in the Tibetan Stem Family”, 收录于 *Chinese Family Law and Social Change*, 布克邦 (David Buxbaum) 编。西雅图: 华盛顿大学出版社, 1978。
- . “Lhasa Street Songs: Political and Social Satire in Traditional Tibet”, 《西藏杂志》7, 1-2 (1982): 56-57。
- . “Reexamining Choice, Dependency and Command in the Tibetan So-cial System: ‘Tax Appendages’ and Other Landless Serfs”, 《西藏杂志》11, 4 (1986): 79-112。
- . *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1913-1951: The Demise of the Lamaist State*。伯克利: 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 1989。
- . “The Dragon and the Snow Lion: The Tibet Question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收录于《中国简报》(China Briefing), 凯恩 (A. J. Kane) 编, 第129-68页。哥伦比亚博尔德: 西景出版社, 1990。
- . “Religious Conflict in the Traditional Tibetan State”, 收录于《西藏文化观点: 威利回忆文章》(Reflections on Tibetan Culture: Essays in Memory of T. V. Wylie), 爱泼斯坦 (L. Epstein) 和舍伯恩 (R. Sherburne) 编。纽约州刘伊斯顿 (Lewiston): 埃德温·梅林 (Edwin Mellen), 1990。
- . “Tibet: After the Fall of Chamdo”, 《西藏杂志》26, 1 (1991): 58-95。
- . *The Snow Lion and the Dragon: China, Tibet, and the Dalai Lama*。伯克利: 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 1997。

- . “On Modern Tibetan History: Moving beyond Stereotypes”, 收录于 *Tibet and Her Neighbours: A History*, A. 麦凯编, 第 219–26 页。伦敦: 汉斯-约尔格·迈耶 (Edition Hansjoerg Mayer), 2003。
- 戈尔斯坦 (Goldstein, M. C.) 和 贝尔 (Beall, C. M.)。 “The Impact of China’s Reform Policy on the Nomads of Western Tibet”, 《亚洲调查》 (*Asian Survey*) 28, 6 (1989): 619–41。
- 戈尔斯坦 (Goldstein, M. C.), 道帛喜饶 (Dawai Shrap) 和 司本石初 (Siebenschuh, W. R.)。 *A Tibetan Revolutionary: The Political Life and Times of Bapa Phüntso Wangye*。 伯克利: 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 2004。
- 戈伦夫德 (Grunfeld, T.)。 “Tibet: Myth and Realities”, 《新中国》 (*New China*) 1, 3 (1975): 17–20。
- . “Some Thoughts on the Current State of Sino-Tibetan Historiography”, 《中国季刊》 (*China Quarterly*) 83 (1980): 568–76。
- . “In Search of Equality: Relations between China’s Ethnic Minorities and the Majority Han”, 《亚洲研究会刊》 (*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 171 (1985): 54–67。
- . “Developments in Tibetan Studies in Tibet Today”, 《中国季刊》 115 (1988): 462–66。
- . *The Making of Modern Tibet*。 纽约: 夏普 (M. E. Sharpe), 1996。
- 格拉蒙 (De Gramont, S.)。 *The Secret War*。 纽约: 帕特南之子 (G. P. Putnam’s Sons), 1962。
- 格拉索 (Grasso, J.), 科林 (Corrin, J.) 和 科特 (Kort, M.)。 *Modernization and Revolution in China*。 纽约州阿芒克: 夏普, 1991。
- 戈帕尔 (Gopal, R.)。 *India-China-Tibet Triangle*。 勒克瑙 (Lucknow): 普世达·肯达 (Pustak Kendra), 1964。
- 格普 (Gup, T.)。 *The Book of Honor*。 纽约: Anchor Books, 2001。
- 噶厦 (Bka’ shag)。 *Rgyal khyab chab dbangs rnams la gzhung sger chos bcas nas ’bru bun gtong len sgrub chag dbye ’byed byed phyogs skor spyi khyab rdzong gzhis khag dang / bun gtong byed po / bun len mi ser bcas par rtsa ’dzin bka’ tham bkod rgya*。 西藏著作档案馆原件, 1953。
- 噶雪·曲吉尼玛 (Ka shod, Chos rygal nyi ma)。“Rgyal zur rwa sgrenng dang stag brag dbar gyi don rkyen gang dran du bris pa”, 《西藏文史资料选辑》, 第六辑, 第 1–113 页。 拉萨: 西藏军区出版社, 1985。
- 噶雪·曲吉尼玛和拉鲁·次旺多吉 (Lha klu, Tshe dbang rdo rje)。“Lha sar bdyin ji’i slob grwa zhig btsugs pa dang thor ba’i bya rim”, 《西藏文史资料选辑》, 第二辑, 第 55–225 页。 拉萨: 西藏人民出版社, 1983。
- 功德林·维色坚赞 (Kun bde gling, ’Od zer rgyal mtshan)。*Mi tshe’i lo rgyus las ’phros pa’i gtam thabs byus snying stobs kyi ’bras bu*, 第二卷。 印度迈索尔: 自行发行, 2000。
- 贡恰罗夫 (Goncharov, S.), 路易斯 (Lewis, J. W.) 和 薛理泰 (Xue, Litai)。*Uncertain Partners: Stalin, Mao and the Korean War*。 斯坦福: 斯坦福大学出版社, 1993。

- 贡桑孜·索南旺堆 (Kun rtse, Bsod nams dbang 'dus)。 *Lhar bcas 'gro ba'i 'dren mchog gong sa skyabs mgon rgyal dbang sku phreng bcu bzhi pa bstan 'dzin rgya mtsho chen po mchog thog mar rtsad dpyod ngos 'dzin gdan zhu ji ltar zhus skor rang myong ma bcos lhug par bkod pa'i bden gtam rna ba'i dud*。印度达兰萨拉：西藏政府文化出版社，1968。
- 古德 (Gould, B. J.)。 *On the Discovery, Recognition and Installation of the Fourteenth Dalai Lama*。新德里：印度政府出版社，1941。
- . *The Jewel in the Lotus*。伦敦：查托和温达斯 (Chatto and Windus)，1957。
- 古德曼 (Goodman, M. H.)。 *The Last Dalai Lama: A Biography*。波士顿：香巴拉出版社 (Shambhala)，1987。
- 古拉特 (Goullart, P.)。 *Forgotten Kingdom*。伦敦：读者联盟 (Readers Union)，1957。
- 古普塔 (Gupta, K.)。 “The McMahon Line 1911–1945—the British Legacy”，《中国季刊》47 (1971)：524。
- . *The Hidden History of the Sino-Indian Frontier*。加尔各答：米纳瓦协会，1974。
- 国际法学家委员会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f Jurists)。 *The Question of Tibet and the Rule of Law*。日内瓦：国际法学家委员会，1959。
- . *Tibet and the Chinese People's Republic*。日内瓦：国际法学家委员会，1960。
- 国务院情报办公室 (Office of Intelligence Research)。“Tibet”。华盛顿特区国家档案馆，外交类，1948。
- 哈雷 (Harrer, H.)。 *Seven Years in Tibet*。纽约：达顿 (E. P. Dutton)，1954。
- 哈里斯 (Harris, C.) 和次仁·夏加 (Tsering, Shakya)。 *See Lhasa: British Depictions of the Tibetan Capital, 1936–1947*。芝加哥：塞林迪亚出版社 (Serindia)，2003。
- 贺广福 (Ha'o, Kong phu'u)。“Sku tshab krang cin wu'u yi sku 'gram du las ka byed skabs”，《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九辑，第113–32页。拉萨：西藏军区出版社，1986。
- 赫斯贝里 (Hersberg, J. G.) 编。 *The Cold War in Asia*，第6–7卷。华盛顿特区：伍德罗·威尔逊研究人员国际中心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1995。
- 黑贝雷尔 (Heberer, T.)。 *China and Its National Minorities: Autonomy or Assimilation*。纽约州阿芒克：夏普，1989。
- 霍夫曼 (Hoffmann, H.) 编。 *Tibet: A Handbook*。布鲁明顿 (Bloomington)：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1976。
- 集美拉达仁波切，喇嘛 (Chime Radha Rimpoche, Lama)。“Tibet”，收录于 *Oracles and Divination*，洛伊 (M. Loewe) 和布莱科尔 (C. Blacker) 编。哥伦比亚博尔德：西景出版社，1981。
- 吉杓权。《白雪》。北京：中国物资出版社，1993。
- . 《西藏平叛纪实—1959年叛乱》。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
- 加尔布雷思 (Galbraith, J. K.)。 *Ambassador's Journal: A Personal Account of the Kennedy Years*。波士顿：霍顿·米福林 (Houghton Mifflin)，1969。
- 加佛 (Garver, J. W.)。 *Protracted Contest: Sino-Indian Rivalr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出版社，2001。
- 降边嘉措 (Jambey Gyatso)。*《班禅大师》*。北京：东方出版社，1989。
- . 《雪山名将谭冠三》。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1。

- 蒋介石。“Message of President Chiang Kai-shek to Tibetans on March 26, 1959”，《自由中国和亚洲》(*Free China and Asia*) 6, 4 (1959) : 3。
- 降央诺布 (Jamyang Norbu)。“The Tibetan Resistance Movement”，收录于 *Resistance and Reform in Tibet*，罗伯特·巴尼特 (Robert Barnett) 和希林·阿基涅尔 (Shirin Akiner) 编。伦敦：赫斯特公司，1994。
- 杰恩 (Jain, G.)。 *Panscheela and After: A Re-appraisal of Sino-Indian Relations in the Context of the Tibetan Insurrection*。纽约：亚洲出版社 (Asia Publishing House)，1960。
- 杰杰巴·丹增多吉 (Dge rgyas pa, Bstan 'dzing rdo rje)。“Kha bral ring lugs pas lha sar drag po'i ngo log zing 'khrug dngos su bslangs pa'i gnas tshul 'ga' zhig”，《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二辑，第 133—41 页。拉萨：人民出版社，1990。
- 杰尊平措 (Rgyal mtshan phun tshogs)。“Nga mdo spyi'i las byar skyod skabs kyi gnas tshul'ga'zhig”，《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九辑，第 13—29 页。拉萨：西藏军区出版社，1986。
- 金斯伯格 (Ginsburg, G.) 和麦索 (Mathos, M.)。 *Communist China and Tibet: The First Dozen Years*。海牙：马蒂纳斯·奈霍夫，1964。
- 经纬 (Jing Wei)。 *100 Questions about Tibet*。北京：北京周报出版社，1989。
- 卡拉斯科 (Carrasco, P.)。 *Land and Polity in Tibet*。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出版社，1959。
- 卡莱尔 (Carlyle, M.) 编。 *Documents on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49-50*。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53。
- 卡兰 (Karan, P.)。 *The Changing Face of Tibet: The Impact of Communist Ideology on the Landscape*。莱克星顿 (Lexington)：肯塔基大学出版社，1976。
- 卡罗爵士 (Caroe, Sir Olaf)。 *Englishmen in Tibet: From Bogle to Gould*。伦敦：西藏社会丛书 (Tibet Society Publication)，1960。
- . “Tibet: The End of an Era”，《皇家中亚杂志》47 (1960) : 22—34。
- 卡普斯坦 (Kapstein, M.)。 *The Long March: Chinese Settlers and Chinese Policies in Eastern Tibet*。华盛顿特区：西藏国际运动 (International Campaign for Tibet)，1991。
- 卡西内利 (Cassinelli, C. W.) 和埃克瓦尔 (Ekvall, R. B.)。 *A Tibetan Principality: The Political System of Sa sKya*。纽约州伊萨卡 (Ithaca)：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69。
- 凯门 (Cammann, S.)。 *Trade through the Himalayas: The Early British Attempt to Open Tibet*。新泽西州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51。
- 凯墨·索朗旺堆 (Khe smad, Bsod nams dbang 'dus)。“Don tshan bcu bdun bzhag skor gyi bka'slob dge'o”，在西藏教师培训学校发表的演讲的油印稿。印度达兰萨拉，1965 年 11 月 25 日。
- . *Rgas po'i lo rgyus 'bel gtam*。印度达兰萨拉：西藏图书馆，1982。
- 康博伊 (Conboy, K.) 和莫里森 (Morrison, J.)。 *The CIA's Secret War in Tibet*。劳伦斯 (Lawrence)：堪萨斯大学出版社，2002。
- 克尔提活佛 (Kirti sprul sku) 编。 *Mdo smad pa dge 'dun chos 'phel gyi skor ngag rgyun lo rgyus phyogs bsdoms*。印度达兰萨拉：西藏图书馆，1983。
- 克结顿珠 (Kar rgyal don grub)。*Mdo khams cha phreng gi lo rgyus gser gyi snye ma*。印度达兰萨拉：西藏著作档案馆，1992。
- 克拉克 (Clark, L.)。 *The Marching Wind*。纽约：冯科和瓦格纳尔斯公司 (Funk and Wagnalls Company)，1954。

- 克劳斯 (Knaus, J. K.)。《*Orphans of the Cold War: America and the Tibetan Struggle for Survival*》。纽约：公共事务出版社 (Public Affairs)，1999。
- . “Official Policies and Covert Programs: The U.S., State Department, the CIA, and the Tibetan Resistance”，《*冷战研究杂志*》(*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 11, 3 (2003)：54–79。
- 柯乐博 (Clubb, O. E.)。《*Twentieth Century China*》。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64。
- 克雷格 (Craig, M.)。《*Kundun: A Biography of the Family of the Dalai Lama*》。华盛顿特区：Counterpoint 出版社，1997。
- 克里斯蒂 (Christie, C.)。“Great Britain, China, and the Status of Tibet, 1914–21”，《*现代亚洲研究*》(*Modern Asian Studies*)，10 月号 (1976)：507–8。
- 柯林 (Corlin, C.)。“A Tibetan Enclave in Yunnan: Land, Kinship, and Inheritance in Gyethang”，《1977 年 6 月 26 日至 7 月 1 日青年藏学学者研讨会西藏研究论文集》，马丁·布劳恩和皮卡弗莱编，国际藏学会第一届研讨会论文集。苏黎世：Völkerkundemuseum der Universität Zürich，1978。
- . “The Symbolism of the House in rGyal-thang”，收录于《纪念黎吉生西藏研究国际研讨会会议论文集》，迈克尔·阿里斯和昂山素季编；国际藏学会第二届研讨会论文集，牛津，1979；威斯敏斯特：阿里斯和菲利普斯，1980。
- 拉胡尔 (Rahul, R.)。“The Structure of the Government of Tibet, 1644–1911”，《*国际研究*》(*International Studies*) 3, 3 (1962)。
- 拉鲁·次旺多吉 (Lha Klu, Tshe dbang rdo rje)。“Mi dmangs bcings ’grol dmag lha sar bca’ sdod byas rjes”，《*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第 337–50 页。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1。
- . “Nga’i pha lung shar rdo rje tshe rgyal dran gso byas pa”，《*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二辑，第 93–109 页。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3。
- . “Rang nyid bskyod pa’i lam bur phyr mig rags tsam zhig bltas pa”，《*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第 26–49 页。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4。
- . “Rwa stag gnyis kyi ’gal rkyen dang/rgyal zur rwa sgrengh lha sar skong ’gug byed par bskyod pa’i brgyud rim”，《*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五辑，第 1–58 页。西宁：青海新华出版社，1985。
- . “Yab gzhis lha klu’i khyim tshang gi lo rgyur skor”，《*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十六辑，第 1–324 页。拉萨：人民出版社，1993。
- 拉姆次仁 (Lha mo Tshe ring)。*Btsan rgol rgyal skyob*，第一卷。印度达兰萨拉：阿尼玛卿文化研究中心 (Amnyemachen)，1992。
- 拉森 (Larsen, K.) 和辛丁-拉森 (Sinding-Larsen, A.)。《*The Lhasa Atlas: Traditional Tibetan Architecture and Townscape*》。波士顿：香巴拉出版社，2001。
- 拉乌达热·土登旦达 (Lha’u rta ra, Thub bstan bstan dar)。“Bod shi bas bcings ’grol ’byung thabs skor gyi gros mthun don tshan bcu bdun la ming rtags bkod pa’i sngon rjes su”，《*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第 90–119 页。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1。
- . “Ngas ’Lung shar don rkyen’ nang zhugs pa’i gnas tshul”，《*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第 60–70 页。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4。
- . “Tha’i ji khyung ram don grub rgyal po las zhabs gnas dbyung gis btson bcug rgyan ’bud btang skor”，《*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八辑，第 115–31 页。拉萨：西藏新华出版社，1986。

- . “Gros mthun don tshan bcu bdun la ming rtags bkod pa dang lag len bstar rgyu’i skor gyi gnas tshul”, 《西藏文史资料选辑》, 第九辑, 第 44–57 页。拉萨: 西藏军区出版社, 1986。
- 拉宗卓嘎 (Lha’dzoms sgrol dkar)。“Sku bcar thub bstan kun ’phel gyi skor”, 《西藏文史资料选辑》, 第三辑, 第 135–64 页。拉萨: 西藏人民出版社, 1984。
- 莱尔德 (Laird, T.)。《Into Tibet: The CIA’s First Atomic Spy and His Secret Expedition to Lhasa》。纽约: 格洛夫出版社 (Grove Press), 2002。
- 莱·英赫意 (Rlas, Ying he’e yi)。“Bod du zing ’khrug zhod ’jags gtong bar bskyod pa’i gnas zin”, 收录于《革命回忆录》(藏文版), 第 147–60 页。拉萨: 西藏人民出版社, 1989。
- 兰姆 (Lamb, A.)。《Britain and Chinese Central Asia》。伦敦: 劳特利奇和基根保罗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60。
- . 《The China-India Border: The Origins of the Disputed Boundaries》。伦敦: R. I. I. A., 1964。
- . 《The McMahon Line, 1904–1914》。伦敦: 劳特利奇, 1966。
- . 《The Sino-Indian Border in Ladakh》。堪培拉: 罗克斯福德图书公司 (Roxford Books), 1973。
- . 《Tibet, China and India, 1914–1950》。堪培拉: 罗克斯福德图书公司, 1989。
- 朗杰邦堆 (Rnam rgyal dbang ’dus)。“Bod ljongs rgyal khab chen po’i srid lugs dang ’brel ba’i drag po’i dmag gi lo rgyus rags bsdu”。达兰萨拉, 1976。
- 朗色林·班觉晋美 (Rnam gling, Dpal ’byor ’jigs med)。“Mi tshe’i lo rgyus dang ’brel yod sna tshogs”。印度达兰萨拉: 西藏著作档案馆, 1988。
- 乐于泓 (Le Yuhong)。“Bod zhi bas bcings ’grol skor gyi nyin tho gnad bshus”, 《西藏文史资料选辑》, 第一辑, 第 117–69 页。拉萨: 西藏人民出版社, 1982。
- . “Bod bskyod nyin tho gnad bshus”, 《西藏文史资料选辑》, 第六辑, 第 234–331 页。拉萨: 西藏军区出版社, 1985。
- . “Bod bskyod nyin tho gnad bshus”, 《西藏文史资料选辑》, 第八辑, 第 292–336 页。拉萨: 西藏新华出版社, 1986。
- . “Bod bskyod nyin tho gnad bshus”, 《西藏文史资料选辑》, 第九辑, 第 165–235 页。拉萨: 西藏军区出版社, 1986。
- . 〈回忆投身和平解放西藏的历程〉, 《西藏党史资料》2 (1991): 14–32。
- 冷战国际历史项目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The Cold War in Asia*。华盛顿特区: 伍德罗·威尔逊研究人员国际中心, 1995–96。
- 李国清编。《西藏大事记 1949–1981》。拉萨: 西藏人民出版社, 1983。
- 黎吉生 (Richardson, H. E.)。《Tibetan Précis》。加尔各答: 印度政府出版社, 1945。
- . “The Rva-sgreng Conspiracy of 1947”, 收录于《纪念黎吉生西藏研究国际研讨会会议论文集》, 阿里斯和昂山素季编, 牛津, 1979; 威斯敏斯特: 阿里斯和菲利普斯, 1980。
- . 《Tibet and Its History》。哥伦比亚博尔德: 西景出版社, 1984。
- . 《Adventures of a Fighting Monk》。曼谷: Tamarind 出版社, 1986。
- . 《Ceremonies of the Lhasa Year》, 阿里斯编。伦敦: Serendia 出版社, 1993。
- 李觉。〈回忆和平解放西藏〉, 收录于《世界屋脊风云录》, 第 16–17 页。北京: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1991。

- 李苏·吉美旺秋 (Sle zur, 'Jigs med bdang phyug)。“Taa blab cu gsum pa gshegs rjes bod kyi chab srid dus babs”,《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第1-26页。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4。
- 李铁铮 (Li Tieh-Tseng)。《The Historical Status of Tibet》。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56。
- .《Tibet Today and Yesterday》。纽约:布克曼协会 (Bookman Associates),1960。
- 李威海。《历史的一页:达赖班禅进京纪实》。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6。
- 李志绥 (Li Zhisui)。《The Private Life of Chairman Mao》。纽约:蓝登书屋 (Random House),1994。
- 联合国。“Official Record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Fourteenth Session, Plenary Meetings,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1959。
- 列维 (Levi, W.)。“Tibet under Chinese Communist Rule”,《远东调查》(Far Eastern Survey) 23 (1954): 1-9。
- 刘学成 (Liu Xuecheng)。《The Sino-Indian Border Dispute and Sino-Indian Relations》。马里兰州拉纳姆 (Lanham, MD): 美国大学出版社,1994。
- 龙格 (Long, J.)。“Going after Wangdu”,《落基山杂志》(Rocky Mountain Magazine), 3-4月号 (1981): 36-42。
- 龙厦·乌金多吉 (Lung shar, O rgyan rdo rje)。“Rgyal zur rwa sgrenng btson khang du bkrongs pa'i gnas tshul dngos”,《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第119-34页。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4。
- 鲁宾 (Rubin, A. P.)。“Review of The McMahon Line”,《美国国际法杂志》,61 (1967): 827。
- .“The Position of Tibet in International Law”,《中国季刊》35 (1968): 130。
- 洛桑嘉措 (Gyatso, Lobsang)。《Memoirs of a Tibetan Lama》。伊萨卡:雪狮出版社,1998。
- 洛色 (Blot she/Lotse)。“Li thang khul gyi lo rgyus”,手稿,1965。
- .《Bod chol kha gsum gyi ya gyal mdo khams sgang drug gi nang tshan li thang spo 'bor ra ba sgang du khe shing tsher lon jon ye bstan blo tshe nas so sos rgyal khab kyi don du shabs 'degs shus pa'i mi tshe'i lo rgyus tshangs pa'i thig shing bzhugs so》。大吉岭:西藏难民自助中心,2001。
- 罗西兹克 (Rositzke, H.)。《The CIA's Secret Operations: Espionage, Counterespionage, and Covert Action》。纽约:读者文摘出版社,1977。
- 洛珠群增 (Blo gros chos 'dzin)。“Rwa stag don rkyen skabs ngas bod dmag thengs gnyis pa dang mnyam du rwa sgrenng don du bskyod skor”,《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八辑。拉萨:西藏新华出版社,1986。
- 马凯蒂 (Marchetti, V.) 和马克斯 (Marks, J. D.)。《The CIA and the Cult of Intelligence》。纽约:戴尔 (Dell),1975。
- 马克拉斯 (Mackerras, C.)。《China's Minorities: Integration and Modernization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
- 马林 (Mullin, C.)。“The CIA: Tibetan Conspiracy”,《远东经济评论》(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1975年9月5日。
- .“How the CIA Went to War in Tibet”,《卫报》(Guardian),1976年1月19日。

- 麦格拉纳汉 (MaGranahan, C.)。"Arrested Histories: Between Empire and Exile in 20th Century Tibet", 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博士学位论文, 2001。
- 麦金尼斯 (MacInnis, D. E.)。《Religion in China Today: Policy and Practice》。纽约州玛丽诺 (Maryknoll): Orbis Books, 1989。
- 编。《Religious Policy and Practice in Communist China》。纽约: 麦克米伦 (Macmillan), 1972。
- 麦凯 (McKay, A.)。"Kicking the Buddha's Head": India, Tibet and Footballing Colonialism", 《运动历史国际期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Sport) 2, 2 (2001): 89-104。
- 编。《The History of Tibet: The Modern Period: 1895-1959, the Encounter with Modernity》, 第三卷。伦敦: 劳特利奇寇松, 2003。
- 麦克法夸尔 (MacFarquhar, R.)。《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Vol. 1, Contradictions among the People, 1956-1957》。纽约: 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 1974。
- 编。《The Politics of China, 1949-1989》。马萨诸塞剑桥: 哈佛大学出版社, 1993。
- 麦科克代尔 (McCorquodale, R.) 和尼古拉斯 (Orosz, N.) 编。《Tibet: The Position in International Law》。伦敦: 塞林迪亚出版社, 1994。
- 麦克斯韦 (Maxwell, N.)。《India's China War》。伦敦: 乔纳森角 (Jonathan Cape), 1970。
-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英文版)。北京: 外文出版社, 1958。
- 。〈批判大汉族主义〉(英文版), 收录于《毛泽东选集》, 第87-88页。北京: 外文出版社, 1977。
- 。"On the Policies of Our Work in Tibet—Directive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收录于《毛泽东选集》, 第74-75页。北京: 外文出版社, 1977。
- 美国国务院。《Policy Review Paper—Tibet》(手册)。华盛顿特区: 美国国务院, 1949。
- 。"Unrest in Tibet"。华盛顿特区国务院远东研究局, 国家档案馆, 外交类, 1956。
-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9, the Far East: China》, 第九卷。华盛顿特区: 政府印刷办公室, 1974。
-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1, Korea and China, Part 2》, 第七卷。华盛顿特区: 政府印刷办公室, 1983。
-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2-1954, China and Japan, Part 1》, 第十四卷。华盛顿特区: 政府印刷办公室, 1985。
-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8-1960, China》, 第十九卷。华盛顿特区: 政府印刷办公室, 1996。
- 美国情报局 (US Information Agency)。“Documents on Contemporary China, 1949-1975”。华盛顿特区, 国家档案馆, 外交类, 1955。
- 美国战略情报局 (US 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 研究分析办公室 (Research and Analysis Bureau)。“西藏调查”。华盛顿特区, 国家档案馆, 外交类, 1943。
- 梅纳 (Mehra, P.)。“India, China and Tibet, 1950-54”, 《印度季刊》(India Quarterly) 12 (1956): 3-22。
- 。“Tibet and Russian Intrigue”, 《皇家中亚杂志》45, 1 (1958): 32。
- 。“Beginnings of the Lhasa Expedition: Younghusband's Own Words”, 《藏学会刊》(Bulletin of Tibetology) 4, 3 (1967): 9-18。

- . “Tibet and Outer Mongolia vis-à-vis China, 1911–1936”, 收录于《1961年亚洲历史大会研究论文集》(*Studies in Asian History: Proceedings of the Asian History Congress, 1961*)，K. S. Lal 编，第240页。纽约：亚洲出版社，1969。
- . *Tibetan Polity 1904–1937: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13th Dalai Lama and the 9th Panchen Lama*。威斯巴登 (Wiesbaden)：奥托·哈拉索维茨 (Otto Harrassowitz)，1976。
- 孟 (Meng, C. Y. W.)。 “Miss Liu’s Mission to Tibet”，《中国每周评论》(*China Weekly Review*) (1930)，第22–24页。
- 米切尔 (Michael, F.)。 *Rule by Incarnation: Tibetan Buddhism and Its Role in Society and State*。博尔德：西景出版社，1982。
- 米特 (Mitter, J. P.)。 *Betrayal of Tibet*。孟买：联合出版社 (Allied Publishers)，1964。
- 莫里克 (Mullik, B. N.)。 *My Years with Nehru: The Chinese Betrayal*。孟买：联合出版社，1971。
- 莫罗 (Morrow, M.)。 “Super Secret Missions: CIA Spy Teams inside Red China”，《旧金山编年史》(*San Francisco Chronicle*)，1970年9月4日，第24页。
- 莫瑞斯 (Moracs, F.)。 *The Revolt in Tibet*。纽约：史特林出版社 (Sterling Publishers)，1960。
- 莫斯利 (Moseley, G.)。 *The Party and the National Question in China*。马萨诸塞剑桥：麻省理工大学出版社，1966。
- 莫斯奇 (Mirsky, J.)。 “The Secret Massacre”，《观察家》(*Observer*)，1990年8月12日，第17页。
- 尼米 (Niemi, M. L.)。 “Recent Trends in Chinese Communist Control of Tibet”，《远东调查》27 (1958)：104–7。
- 尼姆少校 (Neame, Maj. Gen. P.)。 “Tibet and the 1936 Lhasa Mission”，《皇家中亚细亚学会杂志》26, 2 (1939)：245。
- 诺布达娃 (Norbu, D.)。 “Who Aided Khambas and Why”，《西藏评论》，7–8月号 (1974)，第19–23页。
- . “The 1959 Rebellion: An interpretation”，《中国季刊》(1979)：77。
- . “An Analysis of Sino-Tibetan Relationships, 1245–1911: Imperial Power, Non-coercive Regime and Military Dependency”，收录于 *Soundings in Tibetan Civilization*，阿兹 (B. N. Aziz) 和马修·卡普斯坦 (Matthew Kapstein) 编。新德里：马诺哈尔 (Manohar)，1985。
- . *Red Star over Tibet*。新德里：史特林出版社，1987。
- . “China’s Dialogue with the Dalai Lama 1987–90: Prenegotiation State or Dead End?”，《太平洋事务》(*Pacific Affairs*) 64, 3 (1991)：351–72。
- 诺布·降央 (Norbu, Jamyang)。 *Warrior of Tibet: The Story of Aten and the Khambas’ Fight for the Freedom of Their Country*。伦敦：智慧出版社，1986。
- 诺布·土登晋美 (Norbu, Thubten Jigme) 和哈雷 (Harrier, H.)。 *Tibet Is My Country*。伦敦：哈特·戴维斯 (Hart Davis)，1960。
- 诺布·土登晋美 (Norbu, Thubten Jigme) 和特恩布尔 (Turnbull)。*Tibet*。纽约：西蒙和舒斯特 (Simon and Schuster)，1968。
- 帕特森 (Patterson, G.)。 “Kalimpong: The Nest of Spies”，《二十世纪》(*Twentieth Century*) (1958)，第163–527页。

- . *Tragic Destiny*. 伦敦：费伯和费伯（Faber and Faber），1959。
- . *Tibet in Revolt*. 伦敦：费伯和费伯，1960。
- . *Peking versus Delhi*. 伦敦：费伯和费伯，1963。
- . *Requiem for Tibet*. 伦敦：Aurum 出版社，1990。
- 潘尼迦（Panikkar, K. M.）。*In Two Chinas: Memoirs of a Diplomat*. 伦敦：乔治·艾伦和昂温（George Allen and Unwin），1955。
- 佩塞尔（Peissel, M.）。*The Secret War in Tibet*, 美国第一版。波士顿：布朗·李特尔，1972。
- 彭巴次旺（Pemba, Tsewang Y.）。*Young Days in Tibet*. 伦敦：乔纳森角，1957。
- 彭绕·仁钦朗杰（Phun rab, Rin chen nam rgyal）。“Gzhung bla'i dbar thog ma'i 'gal ba yong rkyen”，《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四辑，第123-32页。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4。
- 平措次仁（Phun tshogs tshe ring）。*Rwa stag gi don rkyen dang de'i ngo bo'i skor gleng ba*. 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92。
- 平措扎西（Puncog Zhaxi）。“My Experiences during the Peaceful Liberation of Tibet”，《中国的西藏》（*China's Tibet*）12, 3（2001）：14-15。
- 普布觉（Phur lcog）。*Lhar bcas srid zhi'i gtsug rgyan gong sa rgyal ba bka' drin mtshungs med sku phreng ba...gsum pa chen po'i rnam thar rgya mtsho lta bu las mdo can brjod pa ngo mtshar rin chen phreng ba zhes bya ba'i gleg bam stod cha cha sa*，第1卷和第2卷。拉萨：铁虎年手抄本，1935。
- 普劳蒂（Prouty, F. L.）。“Colorado to Koko Nor: The Amazing True Story of the CIA's Secret War against Red China”，《丹佛邮报》（*Denver Post*），1972年2月6日，第6卷，第11-17页。
- . *The Secret Team: The CIA and Its Allies in Control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World*. 新泽西州恩戈莱坞德克里夫斯（Englewood Cliffs）：Prentice-Hall 出版社，1973。
- 恰贝·次旦平措（Chab spel, Tshe brtan phun tshogs）和诺章·吴坚（Nor brang o rgyan）编。*Bod kyi lo rgyus rags rim g, yu yi phreng ba*，第二卷。拉萨：西藏新华出版社，1991。
- 恰普曼（Chapman, F. S.）。“Lhasa in 1937”，《地理杂志》（*Geographic Journal*）91, 6（1938）：304。
- 强巴（Byams pa）。“Zing slong jag pas shang dga' ldan chos 'khor nas mtshon cha 'don 'khyer byas skor”，《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五辑，第222-28页。西宁：青海新华出版社，1985。
- 强俄巴·多吉欧珠（Bya ngos pa）。“Bod sa gnas srid gzhung gis 'thus mi tshogs pa btang nas mthun phyogs rgyal khab la g.yul rgyal bkra shis bde legs zhu ba dang "go min rda hud" tshogs 'dur zhugs pa'i don dngos”，《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二辑，第1-28页。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3。
- 乔德里（Chowdhury, J. N.）。“British Contributions to the Confusion of Tibet's Status”，《探求》（*Quest*）54（1967）：35-36。
- 乔杜里（Choudhury, D. P.）。*The North-East Frontier of India, 1865-1914*. 加尔各答：亚洲协会（Asiatic Society），1978。

- 琼让·仁增朗杰 (Khyung ram, Rig 'dzin rnam rgyal)。“Nga'i pha khyung ram don grub rgyal por khirms chad phog pa'i lo rgyus”，《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八辑，第132—39页。拉萨：西藏新华出版社，1986。
- 热振堪布·降边嘉措 (Rwa sgrenng mkhan po, 'Jam dpal rgya mtsho)。“Bod dmag gis rwa sgrenng du spel ba'i spyod ngan”，《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五辑，第78—91页。西宁：青海新华出版社，1985。
- 热振札萨 ('Jam dpal gyal mtshan) 和图但念扎 (Thub bstan snyan grags)。“Rwa stag don rkyen nang gi bzhi sde smyung gnas bla ma”，《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八辑，第83—95页。拉萨：西藏新华出版社，1986。
- 人民会议 (People's Association)。*《请愿书》* (手稿)。印度达兰萨拉：卫藏协会，1952。
- 仁钦次仁 (Sga gra'u dpon, Rin chen tshe ring)，强多珠一 (Chab mdo drug yig) 和洛桑邦堆 (Blo bzang dbang 'dud) 编。*Chu sgang lo rgyus*，第1卷。印度德里：卫朵康曲细岗珠福利会，2000。
- 塞恩 (Sen, Chanakya)。*Tibet Disappears*。伦敦：亚洲出版社，1960。
- 塞尔登 (Seldon, M.) 和里皮特 (Lippit, V.) 编。*The Transition to Socialism in China*。纽约州阿芒克：夏普，1982。
- 桑珠颇章·丹增顿珠 (Bsam 'grub pho brang, Bstan 'dzin don grub)。*Mi tshe'i rba rlabs 'khrugs po*。新德里：桑颇 (Sampho)，1987。
- SCMP (Survey of China Mainland Press)。*Survey of China Mainland Press*。香港：美国驻香港总领馆，1960—77。
- 色新·洛桑顿珠 (Sreg shing, Blo bzang don grub)。“Go min tang gi 'thus mi hong mu'o sung taa la'i bcu gsum pa'i dgongs rdzogs mchod sprin spro 'bul du yong ba'i gnas tshul thor bu”，《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二辑，第73—225页。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3。
- 沙略·次丹汪秋 (Sharlho, Tseten Wangchuk)。“China's Reforms in Tibet: Issues and Dilemmas”，《当代中国杂志》1, 1 (1992)：34—60。
- 沈宗濂 (Shen Tsung-lien) 和柳陞祺 (Liu Shen-chi)。*Tibet and the Tibetans*。纽约：渥太根图书 (Octagon Books)，1973。
- 施拉姆 (Schram, S. R.)。*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Mao Tse-tung*。纽约：普雷格，1965。
- 史密斯 (Smith, R. H.)。*The Secret History of America's First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72。
- 史密斯 (Smith, W.)。*China's Tibet: Chinese Press Articles and Policy Statements on Tibet, 1950—1989*。马萨诸塞剑桥：文化复兴 (Cultural Survival)，1989。
- . *Tibetan Nation: A History of Tibetan Nationalism and Sino-Tibetan Relations*。博尔德：西景出版社，1996。
- 舒尔曼 (Schurman, F.)。*Ideology and Organization in Communist China*。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68。
- 斯多达 (Stoddard, H.)。*Le mendiant de l'Amdo*。巴黎：民族学社 (Société d'ethnographie)，1985。
- 斯奈尔戈茹夫 (Snellgrove, D.) 和黎吉生 (Richardson, H. E.)。*A Cultural History of Tibet*。伦敦：乔治·韦登菲尔德和尼科尔森 (George Weidenfeld and Nicolson)，1968。
- 斯诺 (Snow, Edgar)。*Red Star over China*。纽约：格洛夫出版社，1968。

- 斯特朗 (Strong, A. L.)。《*When Serfs Stood Up*》。北京：新世界出版社，1960。
- 孙子 (Sun Tzu)。《*孙子兵法*》，克利里 (Cleary) 译。波士顿：香巴拉出版社，1991。
- 台克曼 (Teichman, E.)。《*Travels of a Consular Officer in Eastern Tibet—Together with a History of the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Tibet and India*》。马萨诸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22。
- . *Affairs of China: A Survey of the Recent History and Present Circumstance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伦敦：梅休因出版社 (Methuen Publishers)，1939。
- 泰维斯 (Teiwes, F. C.)。“The Establishment and Consolidation of the New Regime, 1949–1957”，收录于《*中国政治 1949–1989*》，罗德里克·麦克饭爱尔兰 (Roderick MacFarquhar) 编，第 5–86 页。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93。
- . *Politics and Purges in China*，第二版。纽约州阿芒克：夏普，1993。
- . *China's Road to Disaster: Mao, Central Politicians, and Provincial Leaders in the Unfolding of the Great Leap Forward, 1955–1959*，与沃伦·森 (Warren Sun) 合著。纽约州阿芒克：夏普，1999。
- 坦姆比亚 (Tambiah, S. J.)。《*World Conqueror and World Renouncer: A Study of Religion and Polity in Thailand against a Historical Background*》。西尼亚克 (West Nyack)：剑桥大学出版社，1976。
- 特里尔 (Terrill, R.)。《*Mao: A Biography*》，初版。纽约：西蒙和舒斯特，1993。
- 土登桑杰 (Thub bstan sangs rgyas)。《*Rgya nag tu bod kyi sku tshab don gcod skabs dang gnyis tshugs stangs skor gyi lo rgyus thabs bral zur lam zhes bya ba dge'o*》。印度达兰萨拉：西藏图书馆，1982。
- 图恩 (Tung, R.)。《*A Portrait of Lost Tibet*》。纽约：莱因哈特·霍尔特和温斯顿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1980。
- 托马斯 (Thomas, L. Jr.)。《*Out of This World: Across the Himalayas to Tibet*》。纽约：格雷斯顿出版社 (Greystone Press)，1950。
- . *The Silent War in Tibet*。纽约：道布尔迪 (Doubleday)，1959。
- 王福仁和索文清。《*藏族史要*》。北京：新世界出版社，1984。
- 王家伟和尼玛坚赞。《*中国西藏的历史地位*》。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2000。
- 汪杰·平措 (Wangyal, Phuntsog)。“The Revolt of 1959”，《*西藏评论*》，7–8 月号 (1974)。
- . “The Influence of Religion on Tibet's Politics”，《*西藏杂志*》1, 7 (1975)：84。
- 王小强 (Wang Xiaoqiang)。“The Dispute between the Tibetans and the Han: When Will It Be Solved?”，收录于 *Resistance and Reform in Tibet*，罗伯特·巴尼特和希林·阿基涅尔编。伦敦：赫斯特公司，1994。
- 王小强 (Wang Xiaoqiang) 和白南风 (Bai Nanfeng)。《*The Poverty of Plenty*》。伦敦：麦克米伦，1991。
- 维茨 (Wise, D.)。《*The Politics of Lying: Government Deception, Secrecy and Power*》。纽约：凡蒂图书 (Vintage Books)，1973。
- 维茨 (Wise, D.) 和罗斯 (Ross, T. B.)。《*The Invisible Government*》。纽约：蓝登书屋，1964。
- 威尔士 (Welch, H.)。《*Buddhism under Mao*》。马萨诸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72。
- 维格纳尔 (Wignall, S.)。《*Prisoner in Red Tibet*》。伦敦：哈金森，1957。

- 唯卡 (Wis, kha)。“Cun bco brygad pas bod skyod kyi las 'gan dang du blangs pa'i skor bkod pa”，《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第326-88页。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4。
- 威利 (Wylie, T. V.)。“A Standard System of Tibetan Transcription”，《亚洲研究杂志》22 (1959)：261-67。
- 韦斯曼 (Weissman, S.)。“Last Tangle in Tibet”，《太平洋研究和世界帝国电报》(*Pacific Research and World Empire Telegram*) 4, 5 (1973)：1-18。
- 韦斯曼 (Weissman, S.) 和夏克 (Shock, J.)。“CIA Asia Foundation”，《太平洋研究和世界帝国电报》3, 6 (1972)：3-4。
- 卫藏协会常务委员会 (Dbus gtsang chos kha'i spyi khyab rgyun las khang)。“Chu 'brug mi dmangs kyi sgrigs 'dzugs las 'gul la rjes dran lo rgyus snying don”，《卫藏协会常务委员会杂志》1 (1988)：1-18。
- 。“Srid zur klu khang pa'i lo rgyus sa bon”，《卫藏协会常务委员会杂志》1 (1988)：18-24。
- 伍德库克 (Woodcock, G.)。《Into Tibet: The Early British Explorers》。伦敦：费伯和费伯，1971。
- 伍德曼 (Woodman, D.)。《Himalayan Frontiers: A Political Review of British, Chinese, Indian and Russian Rivalries》。纽约：普雷格，1969。
- 希恩 (Sheehan, N.)。“Aid by CIA Put in the Millions: Group Total Up”，《纽约时报》，1967年2月19日，第27页。
- 希尔顿 (Hilton, I.)。《The Search for the Panchen Lama》。纽约：诺顿 (W. W. Norton)，1999。
- 西藏办公室 (Office of Tibet)。*《西藏简报》小册子*。纽约：西藏办公室，1994。
- 西藏观礼团 (Bod kyi rten 'bul tshogs pa)。*Bod kyi rten 'bul tshogs pas rtogs zhib sbyangs brtson zhus pa'i spyi bsdoms snyan zhu*。北京：民族出版社，1954。
- 西藏军区政治部编。*《世界屋脊风云录：纪念和平解放西藏四十周年》*，第三卷。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1。
- 西藏自治区党史办公室编。*《周恩来与西藏》*。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8。
- 西藏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Bod ljongs chab gros rig gnas lo rgyus dpyad gzhi'i rgyu cha u yon lhan khang)。*《西藏文史资料选辑》(Bod kyi rig gnas lo rgyus rgyu cha bdams bsgrigs)*，第一辑。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1。
- 。*《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二辑。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3。
- 。*《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4。
- 。*《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四辑。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4。
- 。*《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五辑。西宁：青海新华出版社，1985。
- 。*《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六辑。拉萨：西藏军区出版社，1985。
- 。*《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七辑。拉萨：西藏军区出版社，1985。
- 。*《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八辑。拉萨：西藏新华出版社，1986。
- 。*《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九辑。拉萨：西藏军区出版社，1986。
- 。*《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二辑。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90。
- 。*《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三辑。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91。
- 。*《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十六辑。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

- 夏尔孜·益西土登 (Shar rtse, Ye shes thub bstan)。“Rgyal zur rwa sgreng do dam srung bya byed ring gi gnas tshul srong por bkod pa”,《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二辑,第110—225页。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3。
- 夏格巴 (Shakabpa, W. D.)。《Tibet: A Political History》。康涅狄格州纽海文 (New Haven, CT):耶鲁大学出版社,1967。
- . *Bod kyi srid don rgyal rabs (Political History of Tibet)*, 第二卷。噶伦堡:夏格巴家族,1976。
- 夏噶娃 (夏苏)·居美多杰 (Shan kha ba, 'Gyur med bsod noms stobs rgyal)。“Gyur med bsod noms stobs rgyal. Ms. Rang gi lo rgyus lhad med rang byung zangs”。印度达兰萨拉:西藏著作档案馆,1990。
- 夏哈 (Shah, A. B.)。《India's Defense and Foreign Policies》。孟买:Manaktala, 1966。
- 夏扎·甘丹班觉 (Bshad sgra, Dga' Idan dpal 'byor)。“Go min tang gi'thus mi'u krung shing taa la'i bcu bzhi pa'i khri 'don mdzod sgor yong ba'i skor gyi gnas tshul dumb u zhig”,《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二辑,第82—92页。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3。
- 夏札·甘丹班觉,恰总·其米觉布 (Chab tshom, 'Chi med rgyal po) 和色新·洛桑顿珠 (Sreg shing, Blo bzang don grub)。“De snga'i bod sa gnas srid gzhung gi srid 'dzin sgrigs gzhi”,《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三辑,第1—196页。拉萨:人民出版社,1991。
- 香港友联研究所。《Tibet: 1950—1967》。香港九龙:香港友联研究所,1968。
- 谢尔万克 (Shelvankar, K. S.)。“China's Himalayan Frontiers, India's Attitude”,《国际事务》(International Affairs), 1962年10月,伦敦。
- 谢里登 (Sheridan, J. E.)。《Chinese Warlord: The Career of Feng Yü-hsiang》。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66。
- 辛格 (Singh, A. K. J.)。《Himalayan Triangle》。伦敦:英国图书馆,1988。
- 辛哈 (Sinhah, N. C.)。《Tibet: Considerations on Inner Asian History》。加尔各答:菲尔马·马克巴迪,1967。
- 辛克莱 (Sinclair, W. B.)。《Jump to the Land of God. The Adventures of a United States Air Force Crew in Tibet》。俄亥俄州考德威尔 (Caldwell):卡克斯顿出版印刷公司 (Caxton Printers), 1965。
- 牙含章 (Ya Han-krang)。“Taa la'i bla ma'i rnam thar”。西宁:青海出版社,1986。
- . *The Biographies of the Dalai Lamas*。北京:外文出版社,1991。
- . *Biographies of the Tibetan Spiritual Leaders, Panchen Erdenis*。北京:外文出版社,1994。
- 杨一真 (Yang, dbyi kran)。“Bod dmag khul khang thog mar 'dzugs skabs dang 'mi dmangs tshogs 'du' zer ba rdzus mar 'thab rtsod byas pa'i gnas tshul”,《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九辑,第58—85页。拉萨:西藏军区出版社,1986。
- 佚名 (Anon)。*Concerning the Question of Tibet*。北京:外文出版社,1959。
- 益西楚臣 (Ye shes tshul khriims)。“Rwa sgreng don rkyen nang ngas sgrubs pa'i by aba 'ga'zhig”,《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八辑,第60—83页。拉萨:西藏新华出版社,1986。
- 阴法唐 (Dbyin pha' thang)。“Bod skyod thog ma'i dus kyi 'tsham 'dri'i byed sgo zhig dran gso byas pa”,《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二辑,第224—25页。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3。

- .〈邓小平与西藏和平解放〉，《西藏党史资料》1（1992）：1-10。
- 袁莎（Yuan Sha）和周爱明（Aiming Zhou）。“The 17-Article Agreement and Things Related to It”，《中国的西藏》12,3（2001）：6-11。
- 扎西·多杰次仁（Gashi, Dorje Tsering）。*New Tibet: Memoirs of a Graduate of the Peking Institute of National Minorities*。印度达兰萨拉：至尊达赖喇嘛信息和公共关系办公室，1980。
- 扎西平措（Zhaxi Puncog）。“My Experiences during the Peaceful Liberation of Tibet”，《中国的西藏》12,3（2001）：12-15。
- 张国华（Chang, Kuo-hua）。“A New Tibet Is Arising”，《人民的中国》10（1953）：7-11。
- 。“Jun bco brgyad pa bod skyod kyi gnas tshul ngo ma bkod pa”/“Bcun bco brgyad pa bod skyod gnas tshul ngo ma bkod pa”，《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二辑，第180-223页。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3。
- 张戎（Chang, Jung）和哈利迪（Halliday, J.）。*Mao: The Unknown Story*。伦敦：乔纳森角，2005。
- 赵慎应。《中央驻藏代表——张经武》。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95。
- 。《张国华将军在西藏》。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8。
- 哲仲（Bkras sgron）编。*Bod kyi gсар brje'i lo rgyus*。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92。
- 至尊达赖喇嘛办公室。*Tibet in the United Nation: 1950-1961*。新德里，出版日期不明。
- 至尊达赖喇嘛信息和公共关系办公室（Information and Publicity Office of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Tibet under Chinese Communist Rule: A Compilation of Refugee Statements, 1958-1975*。印度达兰萨拉：至尊达赖喇嘛信息和公共关系办公室，1976。
- 中根千枝（Nakane, Chie）。《拉萨地图》。东京：东京大学东方文化研究所，1984。
- 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1949-1966》。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90。
- 。《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1949-1994》，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95。
-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编。《西藏工作文献选编1949-2005》。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
-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和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编。《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藏学出版社，2001。
-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科研处。《毛泽东民族文稿》，手稿。北京，1993。
-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Tibet—Its Ownership and Human Rights Situation”，《北京评论》，1992年9月28日至10月4日：9-42。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北京：外文出版社，1983。
- 中央情报局，国家情报调查（CIA, National Intelligence Survey）。*Communist China, Section 23, Weather and Climate, Part 5—Tibetan Highlands*。弗吉尼亚州卡罗尔顿：解密文件检索服务，卡罗尔顿出版社（Carrollton Press），1964年9月。
- 周（Zhou Jin）编。*Tibet: No Longer Medieval*。北京：外文出版社，1981。
- 周星盈（Kra'o hreng dbying）编。*Bod kyi gсар brje'i lo rgyus*。拉萨：西藏出版社，1992。
- 祝文磷（Chu Wen-lin）。“Peiping's Nationality Policy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Part I”，《发布和研究》（*Issues and Studies*）5,8（1969）：12-23。
- 朱旭人（Kru'u, zhi'u hran）。“Lha sa'i dmag 'thab skor rjes dran byas pa”，收录于 *Gсар brje'i dran tho*，第60-71页。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



索引

词目以汉语拼音排序。

A

- 阿乐群则，170，175，261，315–16，481–83，538
- 阿鲁纳恰尔邦 (Arunachal Pradesh)，21，379
- 阿沛
- 班禅喇嘛，285–88，291–92，386，389–92，425
 - 北京谈判，86–88，94–98，303–6
 - 昌都，47–48，83–85
 - 达赖喇嘛，478–89，482，489，496，529–30
 - 返回西藏，158，172–74，205
 - 改革，188–89，192–95，499，501，545–47
 - 粮食采购，223，247–53，408
 - 民众大会讨论协议，218–21，224–25
 - 签订《十七条协议》，105–9
 - 实施协议，300，310–12，421–22，453–56，462，518
 - 司曹–人民会议事件，339–40，343，353，358，362–63，383
 - 西藏人对协议的反应，110，153–55，185，544
 - 中国人，211，215，217–18，533–35，405–6
- 艾奇逊 (Dean Acheson)
- 对藏政策，147，159–60，225，228–29，232

美国派团出使拉萨，117

《十七条协议》，124–25

艾森豪威尔 (Dwight D. Eisenhower)，463

B

- 巴杰帕伊 (G. S. Bajpai)，71，74n23，92，134，237
- 白云峰，293
- 班禅喇嘛，133，151n39，517–18，523，530
- 返回西藏，158，211，252，263，265–89，385–95
 - 赴京，477，485–89，492–93，495–96，499
 - 毛泽东，501–2，505，507，514
 - 美国，380–81，475
 - 《十七条协议》，103–4，304
 - 西北局–西南局之争，296–97，423，425–27，429–30，434，542–43
 - 西藏工作会议，434–36，450，456
 - 与达赖喇嘛，203，290，294，314
 - 与共产党，25，224n54
- “板门店会议”，435–36，486
- 又见西藏工作会议
- 北线 (青藏公路)，245，415，420，486
- 又见青藏公路
- 毕苏，457
- 伯克 (James Burke)，113

薄一波，435

不丹，21，114，162，281，467

C

差役，8-9，336，408，458，502，528

马役税，393

人役税，393

又见乌拉

昌都解放委员会，287，430，499，530

昌都战役

阿沛，47，84，211

昌都，39n1，44

昌都人民解放委员会，207n5

昌都谈判，81，84-88，95，96-97

达赖喇嘛致毛泽东的信，55

骑兵，35

西北局-西南局之争，290-91

西藏向联合国申诉，59，77，81，89，91

战前准备，38，41-42，47

战役，46-47，110-11，118

中印关系，67，72-73

中藏在印度的谈判，48-49

长寿法会，482-83，538

朝鲜战争，54，107，113，329，435

陈竞波，30，294

陈毅，504

成都，30-31，523-24，526-27

赤江仁波切，3，50，141，198，380，
400，477

赤门大宅，170，243

重庆，30-31，216，269-73，278，286，
290，523

川藏公路（南线），245，420

又见南线

春都，民众大会，7-8

又见民众大会

D

大汉族主义，179，308，518

达赖喇嘛

民众大会，春都，8

十三世达赖喇嘛，见十三世达赖喇嘛
十四世达赖喇嘛，见十四世达赖喇嘛
统治，2-7

印章，6n11

与班禅喇嘛的矛盾，266-67

转世制度，1-3，23n11

庄园制度，9

达亚尔（H. Dayal），131，143，145，161，
163

大洋学校，401

又见色新学校

大藏区，473

大札仁波切，摄政

辞职，53，193

热振-大札之争，193，199，314-15

十四世达赖喇嘛家族，199-204，234

当采仁波切

离开青海，54-55

前往美国，123-24，130

热振事件，199

与嘉乐顿珠在美国，225-28，232，
237-41，369-72，380-81

与美国人，128-30，133-34，138，147-
49，158-63

邓小平

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赴京，477，488

进军西藏，26，29-30

西北局-西南局之争，290，435-36

西藏工作，179-80

杜特（S. Dutt），161-64

杜义德，29-30

E

恩珠（仓）·贡布（扎西），175

F

范明

班禅喇嘛返藏，283-86，289，388-91

班禅喇嘛赴京，485，488，496，507-12

班禅喇嘛和达赖喇嘛的关系，393-95

前后藏，279-82

前往拉萨，158，241
 西北局－西南局之争，290-94，422-50
 新西藏工委，295-98
 与班禅喇嘛，271，276-78
 与达赖喇嘛，520，530，533，535，
 542-43，546
 与西藏政府，300-2，352，369，378，
 383
 战前准备，26
 分治
 历史，267
 毛泽东及中央的观点，385，426-33，
 443
 西南局的观点，281
 又见前后藏
 妇女联谊会，403-7

G

改革大会，432n11，455-56，458-61，546
 改革局，432n11，456，460-62
 干部学校，307-10，330，402，404-5，518
 高岗，435-36
 又见西藏工作会议
 格达活佛，35
 格鲁派，1，8，16
 格西，194，223
 功德林札萨，457，477-79，501
 广东省，257-58，411
 规模寺院制，13，15，16
 又见寺院制度
 贵族，2-7，9-13，49
 毛泽东的策略，37
 内地参观学习，412
 尧西家族，199-200
 人民会议，318-19，321，322n19，326，
 328
 言行标准，171-72，206-8
 英国的影响，21，233
 与共产党合作，243，247-53，261-62，
 408
 债务改革，458-61

又见政府
 国家民委，400，486，488-89
 国民党
 班禅喇嘛，268-71
 嘉乐顿珠，40，233-34，237，467-68
 美国对藏政策，117，164
 热振阴谋，201，314
 西藏向联合国的第一次申诉，79
 现代学校，307n12，400
 朱绶光，40
 国旗
 西藏，雪山狮子旗，军旗，300-1，473，
 512，513n27
 中国，181，213-4，300，302

H

哈雷 (Heinrich Harrer)
 达赖喇嘛，196
 美国，113-14，225，227，229，241
 逃跑方案，162
 韩德逊 (Loy Henderson)
 达赖喇嘛流亡，147，159，227，229-
 31，373
 哈雷，113-14
 美国对藏政策，93，117-20，122-24，
 126
 西藏商务代表团，43，48，117
 西藏向联合国的申诉，94
 贺龙，26-27，29，179
 护法神拉姆，班丹拉姆，52，144
 街头歌谣，168n3
 黄正清 (阿巴·阿洛)，271，276n35
 火蛇年法令，393

J

吉堆巴学校，400
 计晋美
 达赖－班禅不和，358，389，424，449，
 431-32，501
 范明，286n62，294，427，449
 毛泽东，508，510，518

与共产党，269–70，272–74，276–78，
284
与国民党，270
机密附件，秘密附件，101，103，106–7，
151，287，300
又见《十七条协议》
嘉乐顿珠
共产党，40，311–12n29，343，372–81
流亡抵抗组织，463–70，473，548
美国，232，237–38，241
热振，201–3
印度，163n76
在中国，233–36
“家中之政府”，19n1
渐进主义政策（策略），36，40n5，103，
178，182
达赖–班禅不和，385，429
达赖喇嘛，164，491，519n38，529
结论，542–43，547–48
司曹，217，348，368，373，383–84
西北局–西南局之争，281，294，303，
308
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498
又见毛泽东
坚堪孜松，470–73，475–76，513，539，
548
蒋介石
班禅喇嘛，269–70
共产党，21，26，32，34，82，410
嘉乐顿珠，234，268，463，467
美国，126，164
西藏政府，1，168，314
江乐金，189，253，311，408n17，421
江孜水灾，471–74，494
江孜英文学校，48，404
阶级斗争，179–80，299，542
结论，541–49
街头歌谣，168，186，329
通胀，254
为中国人服务，262
西藏政府，168

中国人的粮食生产，256
进口、转运物资，257–58
金瓶掣签，269–70
警卫团
改革，101，500，536
制服、歌曲，213，214n22，537
军政委员会，25n18，299n1，545–46
班禅喇嘛，范明，426–28，430–31，
433，441–43
达赖喇嘛，466，491，495，498–99，
527
柳霞，409–10
民众大会讨论协议，141，172，184，
189，219–23
人民会议，312，318，368，384
《十七条协议》，19，102–4
西北局，26n22，386
西南局，26n21，179n32，293
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530
执行协议，299，303–7，345–47，351，
353，399
又见结论

K

卡斯特罗 (Hector D. Castro)，61，74–76
凯墨札萨 (索南旺堆)，53
班禅喇嘛，285，287，304–5
北京谈判，88，95–96，108
返回亚东，146，150，153–54
民众大会，219，224，
与共产党合作，212–14，311
堪厅，朗玛岗，265n2
达赖–班禅不和，287–88，389–91，
424，435，442
范明，276，296，542
共产党，273，280
江孜水灾，471
内地参观团，409，427，430，487–88，
499–501
西藏政府，268–69
库库拉 (Coocoola)，226，229，232n75，
382，463–64

L

- 拉鲁 (次旺多吉)
 昌都, 35, 47n32, 83n4, 85, 97
 粮食危机, 247, 251
 民众大会讨论《十七条协议》, 218, 220–21, 224
 热振事件, 200, 203–4, 314
 人民会议, 325n27, 332–33, 339
 实施协议, 244n3
 司曹事件, 183, 186–88, 331, 362
 西北局–西南局之争, 291
 亚东辩论, 110
 拉萨发电站, 518
 拉萨联队 (足球队), 191, 404–5
 兰州, 25, 109, 271, 276, 279, 284
 朗顿, 7, 224, 408
 朗玛岗, 见堪厅
 朗色林派, 327, 334, 469, 536, 539, 548
 朗生, 11–12
 朗子辖 (拉萨), 325n27, 342, 344
 乐于泓
 开办小学, 311–12
 粮食危机, 249, 252n28
 实施协议, 172–74, 211, 220–23, 306
 司曹事件, 360
 西北局–西南局之争, 292–94
 张经武和达赖喇嘛首次会面, 150, 153
 张经武进入拉萨, 169
 中藏联合庆祝国庆, 213–14
 李井泉, 523–26, 535, 548
 李觉, 259, 289, 296, 352, 360
 李维汉
 北京谈判, 286–87, 303–6
 达赖–班禅不和, 275, 279, 281, 284
 达赖喇嘛, 178
 达赖喇嘛、班禅喇嘛赴京, 486, 489, 496
 达赖喇嘛返回拉萨, 524–25
 西藏工作会议, 434–35
 联合国, 115, 117–18, 475
 朝鲜战争, 113–14
 关于西藏申诉的辩论, 74–79
 美国鼓励西藏向联合国申诉, 120–21, 123–27, 130, 135, 148, 164
 蒙古加入联合国, 115
 西藏向联合国的第二次申诉, 87–94, 103n43
 西藏向联合国的第一次申诉, 52–53, 55, 57, 59–65, 71, 73, 81
 中国加入联合国, 66–67, 69
 粮食采购局, 408
 粮食危机, 211, 222, 241
 粮食采购, 222–23, 408, 251–53, 257–60
 粮食短缺, 248–50, 251–52
 粮食生产, 246–47, 255–56
 司曹, 207, 247–48, 250, 331
 通货膨胀, 254–55
 修筑公路, 246
 林仓仁波切, 3, 50, 141, 194, 477, 496
 林恩 (R. H. Linn), 160–61, 229, 231
 刘格平, 488, 502, 504, 512
 柳霞
 达赖–班禅不和, 389
 粮食危机, 250
 美国, 120–22, 128
 内地参观团, 409–11, 430
 西藏外事处, 413–15
 羊毛贸易, 262
 张经武和达赖喇嘛首次会面, 212, 224
 鲁康娃, 170–71, 183, 192–93, 251
 撤职, 348, 350–51, 357, 360–62, 364
 对抗中国人, 173, 185–88, 205–8, 210, 250
 国旗争议, 214, 218, 301–2
 人民会议, 325–26, 329–30, 332, 339, 345
 《十七条协议》, 154, 172
 又见司曹
 泸州, 30–31
 罗家镐, 259, 431
 洛桑坚赞, 堪穷, 327, 469, 470, 476, 548

洛桑三旦, 138–39, 197, 203, 341
 达赖喇嘛赴京, 498, 504
 嘉乐顿珠, 231, 233, 371, 375–80, 383

M

马步芳, 270
 “麦克马洪线”, 69
 毛泽东
 班禅喇嘛, 271–72, 274–80, 282, 284–86
 达赖–班禅不和, 385, 387, 429, 450
 达赖喇嘛返回拉萨之后, 533–35, 539
 达赖喇嘛赴京, 479, 486, 488–89, 529
 达赖喇嘛在北京, 491–92, 495–501, 503–5, 517–21
 渐进主义, 36–38, 40n5, 163–64
 范明, 294, 297–98, 369
 军政委员会, 305
 实施, 177–82, 384, 399–400, 409
 司曹, 303, 348–51, 353–54, 356–59, 364
 藏文学校, 308
 又见渐进主义政策
 粮食生产, 246, 249–50
 人民会议, 329, 343, 368
 《十七条协议》, 98, 103, 106–8, 151–52, 237
 西藏工委的合并, 289
 西藏工作会议, 433–36, 448
 修筑公路, 415, 420
 印度谈判, 39–42, 46–47, 55
 与班禅喇嘛谈话, 507–11
 与达赖喇嘛谈话, 512–13, 517
 又见结论
 美国
 达赖喇嘛流亡, 147–49, 158–64, 225–32
 对藏政策, 93–94, 103n43, 113–14, 116–36
 嘉乐顿珠与当采在美国, 236–41, 369–74, 377–78, 380–83

西藏对美国提议的反应, 140, 144
 西藏流亡抵抗组织, 463–67, 473
 西藏商务代表团, 48n36
 西藏向联合国申诉, 60–62, 64, 71, 78–79, 90
 夏格巴, 43–44
 与西藏羊毛贸易, 262–63, 338n64
 蒙藏委员会, 270
 缅甸, 55, 114
 民众大会, 春都, 7–9, 16, 313n1
 北京谈判, 46, 49–52, 86
 达赖喇嘛赴京, 477–78
 改革, 455–57
 联合国申诉, 60–61, 90
 《十七条协议》, 218–21, 307, 455–57
 西藏自治区, 498–99
 亚东辩论, 94, 137–38, 141, 143
 印度谈判, 46, 49–52, 60–61
 莫里克 (B. N. Mullik), 164n76, 468, 470, 474
 慕生忠, 282, 289, 295–97, 434n15, 437

N

南线 (川藏公路), 245, 415, 420, 485
 又见川藏公路
 尼赫鲁 (J. Nehru)
 美国对藏政策, 144, 163n76
 西藏流亡抵抗组织, 236, 379, 464, 468
 江孜水灾, 471, 474
 又见嘉乐顿珠
 西藏向联合国申诉, 135
 中藏谈判, 42–43, 47, 68, 103n43
 农奴, 9–15
 又见人身契约金, 庄园制度

P

帕拉, 卓尼钦莫, 50, 138, 142
 达赖–班禅不和, 391–92, 486–87
 反抗中国人, 380, 382–83, 539, 548
 人民会议, 176, 481

潘尼迦 (K. M. Panikkar), 71–72, 91, 163

培根 (Ruth Bacon), 114, 117, 164

彭德怀

班禅喇嘛, 271, 274–75, 277

朝鲜战争, 114, 293n77

当采仁波切, 54

军事准备, 25–28

西北局–西南局之争, 292–93, 297, 436

碰头礼, 389n13, 391

平措汪杰, 平汪

达赖喇嘛、班禅喇嘛赴京, 486, 488–89, 491–92, 496, 502

达赖喇嘛、班禅喇嘛在北京, 520, 527

工委合并, 295–97

国旗, 512–13

合作, 222, 243, 310, 404, 406, 408

军政委员会, 303, 305

李井泉, 523, 525n5

人民会议, 339, 358

十八军进藏, 109, 205, 209n11

《十七条协议》, 101

司曹, 206

统战工作, 35, 37, 83

西北局–西南局之争, 281, 288, 293, 300, 429

西藏工作会议, 436

平措扎西, 达拉·平措扎西

北京谈判, 95, 98n38

改革, 191, 311, 456

嘉乐顿珠, 233, 234n85, 235–36

美国, 226n61, 382

热振事件, 201, 202n82

司曹事件, 383

Q

骑兵 (西北局), 35, 47, 109, 158, 280

西北局–西南局不和, 290–92

前后藏

北京的观点, 毛泽东, 281, 385

范明, 277, 279, 281, 290

历史, 267

西藏工作会议, 435

又见分治

签证

英国, 41, 59, 68, 92

美国, 94, 120, 123–25

墙报, 海报, 324, 325n27, 329

青藏公路 (北线), 420, 517, 533

确吉坚赞, 见班禅喇嘛

群培土登, 90, 94, 140–42, 456

R

人民代表大会

达赖喇嘛, 477–79, 481, 483, 547

第一次会议, 492–93, 495–97

接待安排, 487–88, 492, 502, 533, 535

人民会议/议会

成立, 313, 316, 320–25

达赖喇嘛欢迎仪式, 176–77

对抗中国人, 328–34, 373–74

复活, 481–83, 548

请愿, 334, 338–39

取缔, 341–45, 364–68

司曹, 325–26, 349–51, 354–60, 545

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 538

学校, 312, 399

影响, 383–84, 546

又见伪人民会议

人身契约金, 米波, 10, 502

日喀则分工委, 426–28, 430–32, 433, 456–57, 488

S

萨尔瓦多, 61–62, 73–79

色拉杰 (色拉寺杰札仓), 314–15

色新学校, 拉萨小学, 311, 399–402

僧兵, 48, 208, 401, 504

僧官, 2–4

又见寺院制度, 西藏政府

十八军

达赖–班禅不和, 279–81

- 发起进攻, 46, 83
- 进驻拉萨, 205, 209, 238n97, 241
- 粮食危机, 246-49, 254
- 前往拉萨, 109, 158, 223, 225
- 修筑公路, 245-46, 415
- 与西北局不和, 289-92, 296, 301, 423-25, 445, 449
- 战前准备, 28-35, 37-38
- 十点文件, 97-98
- 《十七条协议》, 98-106
- 班禅喇嘛, 270n21, 287-88, 290, 385, 393
- 范明, 425, 429-30
- 合作与改革, 406, 409, 413, 421, 453
- 机密附件, 秘密附件, 103
- 又见机密附件
- 军政委员会, 306-7, 498-500
- 粮食采购局, 248, 252, 258
- 美国的反应, 122-23, 126-28, 226, 262
- 民众大会讨论, 205-7, 211, 215-19
- 签订, 接受, 98, 104-5, 299
- 人民会议, 313, 316-17, 333-35, 338, 365-68, 538
- 司曹, 172-74, 184-85, 351
- 西藏的反应, 106-8, 138, 140, 143, 156
- 张经武, 151-54
- 准备执行, 177, 179, 182, 192, 210
- 又见结论
- 十三世达赖喇嘛
- 与班禅喇嘛的矛盾, 266-69, 269n13
- 政治宣言, 临终遗言, 313-16
- 十四世达赖喇嘛
- 阿沛, 192-93, 421-22, 454-56
- 班禅喇嘛, 275-77, 279-81, 283-89, 294, 485-89
- 班禅喇嘛返回西藏, 212, 385-95
- 撤消司曹, 341-42, 344-45, 348-52, 357, 359-69
- 赴京, 477-89, 491-521, 523-39
- 共产党内部矛盾, 423-25, 427, 429, 433-36, 450
- 又见范明
- 哈雷, 113-14, 369-83
- 合作, 213, 311, 405-6, 458-59
- 家族, 199-203, 369-83, 463-64, 466-68, 472-76
- 结束流亡, 94, 108-9, 137-46, 155-56, 158-64
- 军政委员会, 222-23, 303-7
- 流亡亚东, 19n1, 81-82, 86, 88
- 毛泽东, 21, 23-25, 55, 178-82
- 美国鼓励达赖喇嘛流亡, 118-20, 122-36, 147-49, 225-32, 236-41
- 《十七条协议》, 19, 98n38, 100, 103-7
- 司曹, 183-84, 186
- 向联合国申诉, 90
- 张经武, 149-54, 167, 174, 199, 215
- 正式接受《十七条协议》, 217, 219, 221, 224
- 执政、能力、个性, 50-53, 194-99, 204
- 中印通商及交通协定, 470
- 中藏谈判, 35-40, 95-98
- 又见结论
- 司曹, 司伦, 6-7, 19
- 北京谈判, 86-88, 98, 154-55
- 撤职, 341, 343-68
- 对抗中国人, 170-75, 185-89, 204-15, 217, 383-84
- 嘉乐顿珠, 373, 380
- 军政委员会, 306-7
- 粮食危机, 247-48, 250-51
- 人民会议, 317-18, 320, 325-32, 338, 340
- 申健, 42, 72
- 西北局-西南局不和, 296, 300, 302-3
- 亚东辩论, 137-38, 141
- 与噶厦, 183-84, 221, 223, 368
- 张经武欢迎仪式, 169-70
- 四水六岗(曲细岗珠), 175
- 寺院制度, 13-16
- 又见规模寺院制
- 俗官, 见政府
- 索穷噶厦, 251-53

T

塔尔寺, 54, 123, 268-73, 278, 283-84
 谭冠三, 404-5, 423
 军队合并, 280, 289, 296-98
 十八军进藏, 33
 司曹事件, 352, 360
 修筑公路, 415
 藏文学校, 308-9
 《天佑女王》(*God Save the Queen*, 歌曲),
 213-14
 通货膨胀, 又见粮食危机
 同性性行为, 15n25
 统战工作, 35-38, 525, 533-34
 土登贡培, 贡培, 189, 192, 408n17

W

王其梅

 昌都, 83-85, 88, 109
 十八军先遣支队, 158, 172, 205, 216,
 228
 司曹, 172, 207-10, 352, 360
 西藏工作会议, 434, 437, 448-49
 与西北军合并, 289, 296
 住房需求, 243
 伪人民会议, 329-30, 342, 483
 又见人民会议
 乌拉, 9, 180, 393
 改革, 432, 454, 458-59, 528
 修筑公路, 416, 419
 乌兰巴托, 313, 498
 乌兰夫, 498

X

西北局

 班禅喇嘛, 273, 275-77, 386, 388, 427
 当采仁波切, 54-55
 第一野战军, 158, 241, 271, 291, 297
 进驻拉萨, 81, 158, 241, 249n17
 军事准备, 25-29, 46, 54
 粮食运输, 260
 西北局-西南局之争, 300, 308

 达赖-班禅不和, 265, 283, 395,
 423-44, 486-88
 工委合并, 295-97
 军队合并, 35, 109, 289-97, 290
 前后藏分治, 279-82, 427
 西藏工作会议, 434-37, 447
 喜德林(寺), 2, 323
 《西姆拉条约》(*Simla Convention*), 42-43,
 63, 67
 西南局, 25n18, 105
 达赖-班禅不和, 428-29, 432, 486,
 488
 粮食生产, 246
 毛泽东, 348-49, 384
 前后藏分治, 279-81, 284
 西藏工作会议, 434-35
 与西北局部队合并, 289-90
 与西北局不和, 35, 265, 290-95, 297-
 98, 422-26
 藏军改编, 300-1
 战前准备, 26-29, 36-37, 46, 179, 181
 西藏福利协会, 472-73
 西藏赴内地参观团, 409-13
 西藏工委, 244, 543, 545, 547
 班禅喇嘛, 394-95
 达赖喇嘛、班禅喇嘛赴京, 477, 479,
 488, 500-501
 工委合并, 289, 295-97
 江孜水灾, 471
 军政委员会, 303
 粮食运输, 260
 毛泽东, 384, 533
 内部矛盾, 301, 308, 423-24, 426-30,
 432-34
 人民会议, 333, 339, 365
 司曹事件, 341, 343, 345-46, 348-53,
 356-60
 西北局工委, 280, 282
 西南局工委, 281
 西藏工作会议, 434, 436-49
 执行协议, 310-11, 399-400, 409,
 456-58, 518-19

- 西藏工作会议, 434-51
 又见高岗
- 西藏军区
 成立, 222, 299, 431
 解放军部队合并, 290
 藏军, 208, 300, 303, 342, 344, 545
- 西藏平民, 2, 9, 175-76, 313
- 西藏商人协会, 145
- 西藏商务代表团, 60, 117
- 西藏外交局 (西藏政府), 22-23, 39,
 120-22, 262, 413-14, 430
- 西藏外事处 (中藏联合办公), 413-15,
 469
- 西藏自治
 美国, 124, 229-30
 西藏向联合国的申诉, 91
 宗主权, 63, 69-70
- 西藏自治区, 495, 497-99
 筹备委员会, 见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
 分治争议, 426, 428, 431, 433, 487
- 西藏自治区筹委会
 达赖喇嘛的讲话, 531-32
 军政委员会, 527, 530
 毛泽东与班禅喇嘛的对话, 510
 人民会议复活, 538, 548
 西藏自治区, 498-99
 组建, 499-501, 517-18, 547
- 西藏政府, 2-7
- 夏格巴 (Shakabpa)
 流亡抵抗组织, 463-64, 468-70, 472-
 73, 513-14
 向联合国申诉, 53, 55, 57, 60-61,
 87, 90
 亚东辩论, 138, 142, 156
 印度谈判, 39-53
 与达赖喇嘛的兄弟, 225, 236, 377-80
 与美国接触, 122-23, 125-28, 130-
 33, 147-49, 160-61
- 下密院, 322, 326
- 香港, 40-42, 59, 68, 108-9, 214, 236
- 谢林 (次旺朗杰), 203n85, 251, 403-5
- 辛哈 (N. C. Sinham), 57, 88, 185, 197,
 379
- 辛亥革命, 20, 438
- 修筑公路, 415-21
- 徐淡庐, 294, 343, 523-26
- Y**
- 亚东
 达赖喇嘛流亡, 19, 81-82, 86, 88
 无线电基站, 44n24
 亚东辩论, 94-95, 111, 137-39, 143-
 45
 印度政府驻藏代表, 70
 张经武, 107-9, 149-50, 152
 中藏谈判, 96-98
- 牙含章, 281-82, 289-90, 296-97, 386
 班禅喇嘛, 394, 426
 北京的西藏工作会议, 434-35, 437,
 448
- 杨岗, 406
- 杨公素, 413
- 羊毛出口, 145, 257, 262-63, 337-38
- 译仓, 4, 8, 142
 达赖喇嘛、班禅喇嘛会晤仪式, 391
 达赖喇嘛赴京, 477, 479
 改革局, 456
 亚东辩论, 138, 140
- 印度
 十四世达赖喇嘛, 81, 103
 西藏, 21-22, 66-73, 141-45, 164n76,
 307
 西藏流亡抵抗组织, 375-81, 463-68,
 468, 471-76, 539
 西藏向联合国申诉, 39, 53-55, 57n1,
 65-66, 71-79, 90-95
 西藏羊毛贸易, 262-63
 张经武, 108, 145
 中国转运物资, 255, 257-59, 261
 中印通商和交通协定, 468-71
 中藏谈判, 41-48
 印章, 6, 8, 105, 367n51, 513-14

英国外交部, 62-65, 77-78, 135, 161
 游击战, 24, 48, 107, 110, 133, 167, 232
 宇妥, 156, 229-32, 237-38, 243, 373
 “远行之政府”, 19n1
 袁忠贤, 44-52, 72, 95, 284

Z

藏币, 藏钞, 213, 254n32, 541, 547
 《十七条协议》, 103-4
 停止使用藏币, 500, 536-37
 藏军, 24, 49n38, 81-82, 241, 243n2
 班禅喇嘛, 386, 423, 425-28
 昌都, 46-47
 改革, 172, 299-303, 500, 518, 535-37
 搁置藏军改革, 345-47, 351-53, 384, 399, 410
 旗帜, 制服, 军歌, 213-14
 热振事件, 314-15
 人民会议, 316, 318, 320, 322-23, 330, 337-39
 骚扰解放军, 208-9
 《十七条协议》, 101, 103, 107, 111
 司曹事件, 341-42
 藏英战争, 393
 张国华, 209, 222, 243, 255, 374
 达赖-班禅之争, 279-80, 389, 395, 429, 434
 毛泽东, 512, 516, 528
 色新学校, 400
 十八军进藏, 28-31, 33-34, 158, 179, 241
 司曹-人民会议事件, 185, 250, 352, 339, 360-61
 西北局-西南局不和, 289-90, 293-98, 300-1, 423-26
 西藏工作会议, 437, 448-50
 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 499
 修筑公路, 246, 415
 张经武, 260, 374, 387, 389, 415
 达赖喇嘛, 107-9, 145-46, 149-60, 174-75, 197-99

 达赖喇嘛赴京, 477-81, 485, 488, 492, 507-13
 到达拉萨, 167-74
 庆祝国庆, 213, 216-17
 人民会议, 175, 330, 334-40, 366
 《十七条协议》, 221-25
 实施协议, 301, 308, 518
 司曹事件, 185, 341-45, 349-53, 356-57, 359-64
 统战工作, 178, 180, 188n46
 西北局-西南局之争, 293-98, 395, 423, 426, 429, 431
 向达赖喇嘛转交中央的礼物, 211, 215
 张荫棠, 185, 266
 中国国庆庆祝活动
 1951年庆典, 211, 213, 215, 217, 221
 1952年庆典, 409, 495
 中国内战, 23, 114, 235-36, 269, 315
 中国入侵西藏, 见昌都战役
 中国诊所, 210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协商会议, 211, 214-15, 495n4, 535
 中间阶层, 318-20
 中央军事委员会(中央军委), 282, 297, 500
 中央情报局, 120n9, 129, 229, 238, 371, 380
 中印通商和交通协定, 468-71
 仲札团, 24
 周恩来
 达赖喇嘛、班禅喇嘛抵京, 489, 491, 504
 李井泉, 526-27
 西藏谈判代表团, 150
 朱丹, 234
 朱德
 班禅喇嘛, 274-75
 嘉乐顿珠, 40n5
 迎接达赖喇嘛、班禅喇嘛, 489, 491-92, 504
 中藏协议, 82, 150

朱绶光, 40, 234

庄园制度, 2, 9-12, 16, 23, 190, 541

 渐进主义政策, 37, 141, 324, 453, 542-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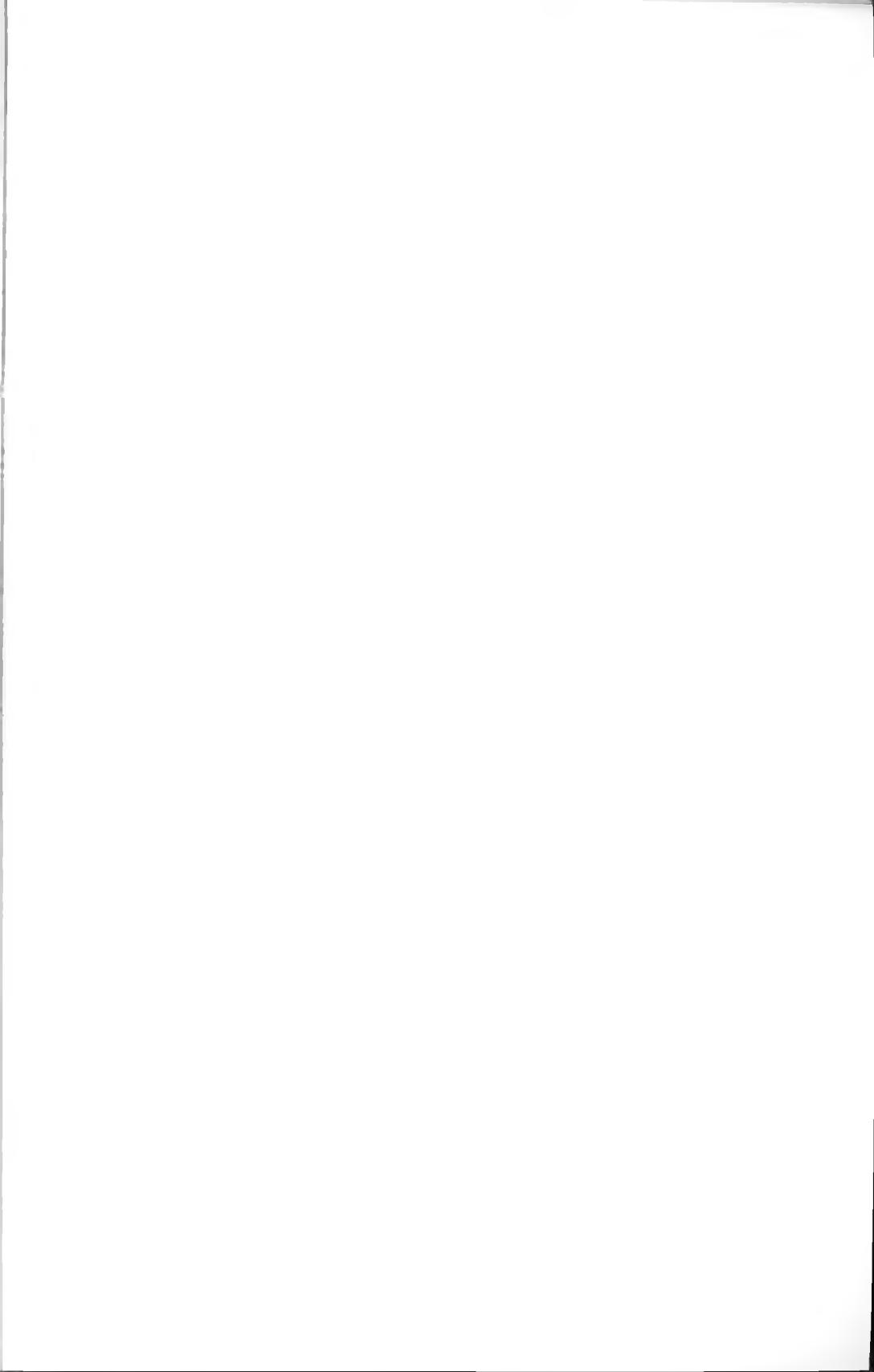
 改革, 456-58, 460-61, 502

卓木, 见亚东

卓尼钦莫, 大卓尼, 3, 203, 328

宗教, 喇嘛教; 藏传佛教, 见寺院制度

足球, 142, 191, 404-5





西藏 现代史

第二卷

暴风雨之前的平静
1951-1955
(全译本)

“尖锐精辟……戈尔斯坦所讲述的故事引人入胜，让人不忍释卷……这是一本不可或缺案头参考书。”

——《亚洲研究期刊》(*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一段不容置疑的历史……令人难以置信的完整、细致、具有说服力。”

——《中国政治学期刊》(*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关于1950年代中藏关系的最佳回顾……强力推荐。”

——《图书馆期刊》(*Library Journal*)

如果不详细阐述1950年代所发生的事件的来龙去脉，则无法全面地了解中国与达赖喇嘛之间的政治纠葛。本书对1951年后的西藏历史进行探讨，让我们重新思考这段历史，这将在很大程度上改变我们对该段历史的解读。本书的研究材料包括一些新近公开的史料，以及对包括达赖喇嘛和一些中国官员在内的历史亲历者的深入访谈。戈尔斯坦以朝鲜战争、中苏关系紧张、美国冷战政策等一系列事件为背景，来解读宿命性的中藏政治纠葛，其对关键人物的刻画往往出其不意，却又令人回味无穷。

梅·戈尔斯坦 (Melvyn C. Goldstein) 是凯斯西储大学 (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 的人类学教授，同时也是该校藏学研究中心的负责人之一。他的代表作有《西藏现代史》(*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第一、二、三卷，《雪狮与龙》(*Snow Lion and the Dragon: China, Tibet, and the Dalai Lama*)，以及《一位藏族革命家》(*A Tibetan Revolutionary: The Political Life and Times of Bapa Phüntso Wangye*) 等，均由加州大学出版社出版。

封面图片：毛泽东与达赖喇嘛 (右)、班禅喇嘛 (左) (1955年)，陈宗烈摄。

历史 / 人类学

ISBN 978-988-8139-69-9



9 789888 139699